

TO

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及發展

A Study in the Writing and Acting of History

THE

| 到芬蘭車站 |

FINLAND

艾德蒙·威爾森 (Edmund Wilson) 著 劉森堯 譯

STATION

歷史選書 38

到芬蘭車站

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及發展

TO THE FINLAND STATION

A Study in the Writing and Acting of History

著◎艾德蒙·威爾森

(Edmund Wilson)

譯◎劉森堯

To The Finland Station
A Study in the Writing and Acting of History
Copyright © 1972 by Edmund Wils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 Giroux, Inc., In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歷史選書 38

到芬蘭車站：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及發展

To The Finland Station: A Study in the Writing and Acting of History

- ◎ 作者.....艾德蒙·威爾森 (Edmund Wilson)
- ◎ 譯者.....劉森堯
- ◎ 編輯委員.....詹宏志 盧建榮 陳雨航 吳莉君
- ◎ 責任編輯.....林志懋
- ◎ 發行人.....涂玉雲
- ◎ 出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02-23517776 傳真：02-23519179
- ◎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愛國東路 100 號 1 樓
電話：02-23965698 傳真：02-23570954
網址：www.cite.com.tw E-mail：service@cite.com.tw
- ◎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 字樓 504 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 ◎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M) Sdn. Bhd.(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 3833 傳真：603-9056 2833
E-Mail: citekl@cite.com.tw.
- ◎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 ◎ 初版一刷..... 2000 年 6 月
- ◎ 初版二刷..... 2002 年 1 月

ISBN：957-469-065-2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Printed in Taiwan

售價：420 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目錄

譯序

致謝

一九七一年作者序

第一部 ■

第一章 米西列發現了維科

第二章 米西列與中世紀

第三章 米西列與法國大革命

4
1

3
3

2
9

1
3

1
1

7

第四章	米西列要活在他的歷史裡	5
第五章	米西列夾在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	5
第六章	大革命傳統的式微：雷南	6
第七章	大革命傳統的式微：泰涅	7
第八章	大革命傳統的式微：法朗士	8

第二部

第九章	社會主義的起源：巴貝夫的答辯書	9
第十章	社會主義的起源：聖西蒙的階層制度	10
第十一章	社會主義的起源：傅利葉和歐文的理想社區	11
第十二章	社會主義的起源：安芳登與美國社會主義運動	12
第十三章	馬克思：救世英雄，也是魔王	13

第十四章	馬克思決心要改變世界	1	4	5
第十五章	恩格斯：來自曼徹斯特的年輕人	1	5	3
第十六章	馬克斯和恩格斯開始合作	1	6	3
第十七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磨劍	1	7	3
第十八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創造歷史	1	8	3
第十九章	辯證法的奧秘	1	9	9
第二十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回去寫歷史	2	1	7
第二十一章	歷史演員：拉薩爾	2	4	3
第二十二章	歷史演員：巴枯寧	2	7	1
第二十三章	馬克思：商品的詩人與無產階級的獨裁者	2	9	7
第二十四章	馬克思死在他的書桌上	3	3	1

第三部 ■

第二十五章	列寧：烏里亞諾夫兄弟們	3
		4
		9
第二十六章	列寧：革命大導師	3
		7
		1
第二十七章	托洛斯基：年輕的老鷹	3
		9
		9
第二十八章	托洛斯基向歷史認同	4
		2
		1
第二十九章	列寧向歷史認同	4
		3
		7
第三十章	列寧抵達芬蘭車站	4
		4
		7

譯序

一、首先要說明的是，這本談論馬克思主義的書在二十年前或甚至十年前，以當時台灣政治環境看，絕無出版之可能，現在，在原書出版將近六十年之後，特別是俄國共產政體解體將近十年之後的今天，中譯本在此與國內讀者見面，實在是意義非比尋常。

二、本書根據美國紐約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圖書公司於一九七二年所出版的版本翻譯而成，該書最早出版於一九四〇年，後來於一九七二年該書再版時，作者曾補上一篇序言，修正自己部分看法。這篇序言主要在於修正作者對列寧的印象，因為在本書第三部談論列寧和托洛斯基的部分，作者由於手頭資料的限制（當時大多數資料皆由蘇聯官方所提供），他在描寫列寧時會很一廂情願大肆美化他的形象，到了一九七二年，許多非官方資料紛紛出籠，他對列寧的印象因而大為改觀，他特別提到革命期間紅軍屠殺沙皇一家人這件事情——這在蘇聯官方一向列為秘密懸案，如今證實這是列寧下達的命令。托洛斯基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流亡日記》(Diary in Exile)中早已提過此事，他本人當時亦認同列寧的做法。

三、本書所引用著作及資料極多且極龐雜，旁徵博引之功夫極深，但作者撰寫此書之宗旨並非出於學術觀點，所以並無羅列註解和書目，換言之，這不是一本學術論著，即使作者在本書中第二

部談論馬克思和恩格斯部分論及「辯證法」及對《資本論》(Das Kapital)的批判時(請參閱本書第二部第十九章和二十三章)，絲毫不帶學究氣息，雖然所處理材料枯燥生硬，但讀來依然意趣橫生，興味盎然，這是本書之最大優點。

四、關於書名，原著者在《到芬蘭車站》總書名底下附有一個副標題：「歷史之寫作及行動研究」(A Study in the Writing and Acting of History)，以全書內容觀之，這的確十分切題，但譯成中文卻又失之玄奧突梯，幾經斟酌，今譯者擅自竄改為「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及發展」，既符合原書之內容題旨，且又一目了然，絕無賣弄玄奧之嫌疑，盼讀者察諒。此外，原書附有四篇附錄，經仔細查照，覺實乃累贅多餘。這四篇附錄分別為一齣描寫馬克思的短劇，一篇馬克思年輕時代的微積分習作，一封恩格斯寫給馬克思的信，以及最後一篇〈佛克特先生及其現代繼承者〉。我認為這四篇附錄頗有畫蛇添足之嫌，實無收錄之價值，故特此割捨，望讀者一併察諒。另本書時間序列跨越百年，作者旁徵博引，提及西方歷史上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為利中文讀者了解，中譯本皆以楷體字附加介紹。

五、本書分為三部，從目錄標題中可窺出各部各章節之內容概要，第一部主要以十九世紀法國大歷史學家米西列(Jules Michelet)為主，闡述法國大革命傳統衍生而來的社會主義思想，這可看成為全書的導言，對十九世紀法國社會思想之發展有興趣的人，這個部分當不可錯過，如想更進一步了解，米西列所撰之經典大作《法國大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及法朗士(Anatole France)所寫《飢渴的眾神》(The Gods Are Thirsty)和《企鵝島》(Penguin Island)此兩本小說則大可一讀。

第二部談十九世紀歐洲社會主義起源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過程，可以說是全書的核心部分，當然也是精華部分，馬克思主義的形成和發展，娓娓道來，不偏不倚，可謂十分貼切中肯。譯者認為，要了解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則讀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的通信集比什麼都有用，《共產主義宣

言》(Communist Manifesto)這本小書似也可一讀，至於《資本論》一書則看個人的興趣和需要才讀，這不是一本閒書。

本書第三部主要描述以列寧和托洛斯基爲主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共黨革命，這似乎是全書較弱的部分，也許作者爲資料不足所限，始終無法真正勾勒出俄國十月革命前後始末的完整面貌，對列寧之所以成爲列寧的過程亦語焉不詳，以至最後革命爆發時列寧一行人從瑞士回到彼得格勒之際，竟讓人感覺充滿傳奇色彩，好像突然黃袍加身一般。當然，近代俄國革命之歷程繁複龐雜，絕非三言兩語能夠交代清楚，關於這點，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閱托洛斯基所撰《我的自傳》(My Life)及《俄國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兩書。

六、的確，隔著距離看別人的革命，好像霧裡看花，總不免蒙上一層理想浪漫的色彩，當年英國詩人華滋華斯看法國大革命的眼光即是如此，美國社會主義分子及法國作家紀德(André Gide)和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起初看俄國革命也是如此，法國小說家安德烈·馬候(André Malraux)看中國共黨革命亦未嘗不是如此，他們把別人的革命浪漫理想化了，好像一場革命之後，人類所有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烏托邦立即實現，他們往往忽略了這之間當事人背後所付出的血淚代價，俄國這場社會主義革命遊戲即使早已成爲歷史，但其所付出的慘痛代價卻至今仍未償付清楚，我們這樣說絕無批判鄙夷的意思，但是非曲直並不難判斷，這一切歷史會有交代。

七、這本書的翻譯完全出於一場書緣，一九八三年八月，一位在台灣學習中文的美國朋友，名叫石大爲(我從來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字)，他當時看到我正在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集，就趁夏天回美國之便，爲我帶回兩本威爾森的著作，一本是文學評論選集，另一本即《到芬蘭車站》，他建議我既然對馬克思主義有興趣，不妨考慮把後者譯成中文，十六年來，我心中不時想著這件事情，也

惦記這位朋友（如今早已失去聯絡），現在中文譯本終於完成，我把這本譯著獻給他。

劉森堯 謹識

一九九九年秋識於法國波特爾 (Poitiers)

致謝

本書作者特別要感謝以下人士提供批評、資訊和材料：麥斯·伊斯特曼 (Max Eastman)、克里斯欽·高斯 (Christian Gauss)、法蘭茲·賀勒齡 (Franz Höllering)、席德尼·胡克 (Sidney Hook)、羅伯—尚·朗格 (Robert-Jean Longuet)、瑪麗·麥卡錫 (Mary McCarthy)、麥斯·諾麥德 (Max Nomad) 與赫伯特·索羅 (Herbert Solow)。在某些章節中，作者大量取材自卡爾 (E. H. Carr) 的巴枯寧傳記、阿諾·施羅考爾 (Arno Schirokauer) 的拉薩爾傳記和托洛斯基的列寧傳記第一冊。尤其是麥斯·伊斯特曼的著作《馬克思、列寧與革命科學》 (Marx, Lenin, and the Science of Revolution)。

另外還要感謝《新共和國》 (The New Republic) 和《黨派評論》 (Partisan Review) 兩份期刊，本書某些章節最初是在這兩份期刊上發表的。

文中出現的俄國姓名，除非已經英語化或為人熟知，作者都加上重音節符號，以期至少能稍微避免俄國姓名出現在英文文件中會產生的發音問題。

一九七一年作者序

我們經常易於將其他國家的社會動亂加以理想化，英國人像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和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等人就曾經把法國大革命加以美化，法國人拉法葉(Marguis de Lafayette)也會美化了我們美國的獨立革命。俄國距離西方很遠，許多美國的社會主義和自由派分子即認為俄國的革命將掃除一切舊的壓迫現象，廢棄商業文明，同時將建立一個如托洛斯基(Leon Trotsky)所說的，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合乎人性的社會。我們這種想法實在太過於天真，我們沒看出來，新的俄國必然還是包含了許多舊的俄國：檢查制度、秘密警察、頹頹醜陋的官僚嘴臉，以及殘酷專制的極權作風等等。本書主要在於探討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如何形成，一個基本的「突破」如何發生，以及現階段人類歷史如何因而產生重大變化。我無意推斷現今的蘇聯政府是否會成爲人類史上最專制的政權，以及史達林(J. V. Stalin)是否爲俄國有史以來最爲殘酷無情的沙皇。本書應該可以看成是一些革命家自認爲在努力建造一個「更好世界」的忠實紀錄。我在撰寫過程中少不了一些個人的偏見，也許應該趁此加以修正，至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是非功過——不管暗示了什麼——我則不願加以評斷。

曾經有人批評我對法國社會主義傳統語焉不詳，比如有人問我：喬雷斯(Jean Jaures)和左拉(Emile

Zola) 在哪裡？我的答覆是：他們沒有討論的必要。至於法朗士 (Anatole France)，我覺得他沒有得到該有的讚賞，撰寫本書之時，我即已不贊同小皮埃爾 (Le Petit Pierre) 和柯納爾神父 (Abbé Coignard) 對他的看法，現在更加不贊同。我最近重讀法朗士的《當代歷史》(Histoire Contemporaine) 一書合成一冊的新版本，我覺得比第一次初讀時更加喜歡，書中所描寫十九世紀法國的政治和社會，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政治和社會的真實寫照，而《飢渴的眾神》(Les Dieux Ont Soif) 這本小說中，透過一位不妥協的政治狂熱分子所發出的警告，正好吻合了俄國革命前大屠殺事件以來的一切現象。總之，我對法國大革命之後的作家並未適當加以對待，但是從他們身上我倒是學到不少東西。

至於馬克思 (Karl Marx) 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我已經沒什麼話可以再補充，一位叫做大衛·麥克雷倫 (David McLellan) 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最近出版一本他稱之為馬克思的《摘要大綱》(Grundrisse) 英譯本選集，這本書的原稿有一千頁之多，寫於一八五七年的十月到一八五八年的三月之間，至目前為止只出現兩個版本，一個是一九三九年的俄文本，另一個是一九五三年的德文本。麥克雷倫先生認為這本書極為重要，可以說是「馬克思的思想重鎮所在」，並且宣稱「任何關於馬克思思想後續發展的研究，如果忽略這本書，必將注定失敗」。其實，這本手稿只是馬克思企圖勾勒出他整個體系的大綱而已，根據麥克雷倫先生的說法，由於這本手稿的出現，許多學者可以更加確定「馬克思是個人文主義者，是個存在主義者，甚至是個『精神的存在主義者』(真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然而，《摘要大綱》畢竟從未真正出版，可以說是馬克思不願意寫完他的作品的另一典型例子，我認為他一向提出的問題都是過於龐大，以致根本無法加以解決(《摘要大綱》主要的重點似乎著重在經濟問題上面，馬克思如同往常一直想仿效荷馬史詩的寫法——把自己寫的東西看成是一種原始文化

的產物——心理學方面的問題因而懸而未決)。因此，《資本論》(Das Kapital)的第一冊，這是馬克思唯一自己生前出版的部分，在今天看來多少像是某種騙局，他在勞動價值上面做大做文章，帶動無產階級和資本家進行無情的階級鬥爭，至於中間人所創造的價值則隻字不提，原稿在此即告中斷。然而，《資本論》第一冊書中的煽動性憤怒情緒卻在該書出版之後引發了許多的革命行動。坦白說，如果說以馬克思早期未發表的文字為基礎去研究他的知性發展，這未免流於枯燥乏味而徒勞無功，終究只能淪於學院式獨立研究的考據行為罷了，馬克思的目的始終都是在挑撥人們的情感。

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評我在本書中對列寧(Nikolai Lenin)形象的描繪過於美好，關於這方面的批評，我必須承認有道理。我當初在撰寫此書之時，所能得到關於列寧的資料一概都是從蘇聯官方手中得來，都是經過批准認可的。托洛斯基寫過許多關於列寧生平的文字，他也認為蘇聯官方的管制行為甚至都使得列寧家人所編撰的家庭紀事也變為不十分可靠，而托洛斯基在他自己所寫的《我的自傳》(My Life)一書中，對列寧的吹捧筆調簡直就像柏拉圖(Plato)在寫蘇格拉底(Socrates)。直到最近我們才真正有機會看到一些非經蘇聯官方管制的資料，某些當事人所寫的對於列寧的「反面」印象，如史圖夫(Dyorr Struve)和華倫提諾夫(N. Valentinov)。我們得到另一個印象是，列寧只對不和他作對的人才會流露關注和溫和的態度，至於對其他人，他的態度則是粗魯而惡劣。史圖夫和華倫提諾夫這兩個人曾經都是列寧得意的助手，但最後都對他背叛唾棄，我在此引用一段史圖夫所寫關於列寧的文字(引自理查·派普斯[Richard Pipes]所撰《史圖夫——左派的自由分子，一八七〇—一九〇五》[Struve: Liberal on the Left, 1870-1905]一書)……

我對列寧的印象一開始就不好，這種印象延續了一輩子。但是他令人不愉快的印象並非來自他的唐突態度，而是比一般唐突態度更爲超越的東西，是一種嘲弄揶揄的態度，一部分是做作出來，另一部分則是與生俱來，發自他最深層自我的一面，他對待敵手一向即持此種態度。他一開始即把我當敵手看待，即使我跟他最親近的時候也是如此，他會如此並非源於理性，而是直覺在作祟，也就是一般獵人所說的「嗅覺」。後來我開始比較接近普列漢諾夫(G. V. Plekhanov, 1856-1918, 俄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歷史學家和記者，有「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之稱。後來反對列寧，並否定十月革命)，他和人接觸的方式也是擺出一副唐突而幾近於嘲弄揶揄的姿態，和列寧比較起來，他倒像是個貴族。他們這兩個人對待人的態度，用一句不容易翻譯的法文形容詞講，就是「粗暴跋扈」(casant)，但是在列寧身上，他的那種粗暴跋扈方式，則接近於令人無法忍受的暴民風格，同時也是乏味而冷酷。

許多人和我一樣對列寧有相同的印象，我隨便提兩個人，很不相同的兩個人：薇拉·札蘇利區(Vera Zaslích)和米開·吐甘—巴拉諾夫斯基(Michael Tugán-Baranóvsky)。薇拉·札蘇利區是我這輩子見過最聰明敏銳的女人，她就很討厭列寧，她甚至討厭列寧的長相，他們在政治上的爭執並非只是理論或策略上觀點的歧異，而且主要也是由於各人在氣質上的差距。

多年來我一直和米開·吐甘—巴拉諾夫斯基走得很近，他常常告訴我他對列寧有多麼討厭，他對列寧的嫌惡多少出於一種純真的本能，有人認爲他的這種傾向顯得愚蠢。他以前和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Alexander Ulyánov)很熟，而且也很要好(亞歷山大後來因參與謀刺沙皇而被處決)……他經常以困惑而接近嫌惡的口吻提到兩個兄弟竟然會那麼不同，哥哥有一種純潔而堅定的道德感，而且待人溫和而有分寸，即使是對待陌生人或敵人也是如此，弟弟則否，他老是擺出

一副唐突而殘酷的姿態。

的確，列寧對待部屬的態度始終充滿冷淡、輕蔑及殘酷，在我看來，列寧身上這些反常的怪異性格正好也是他從事政治活動的本錢，他眼睛所看到的，除了一心一意要完成的目標之外，其他一無所有，他藉此與其他一些政治圈的朋友形成一個權力的核心，而他唐突和殘酷的本性——從我們開始交往以來，此一本性即顯露無遺——和他對權力的酷愛巧妙而不自覺地緊緊結合在一起。我們實在很難看出，是他對權力的酷愛促使他不斷努力在追尋他的理想目標，還是適巧相反，他透過對理想目標的追求，以便能夠達到掌握權力的願望。

華倫提諾夫的見證（在他所撰《與列寧的會面》〔Meetings with Lenin〕一書中）與上面所述可說大同小異：「沒有人能夠像他那樣，對自己所設定的計劃那麼熱心，性格那麼堅定，能夠叫別人屈服於他的意志之下，而事實上他這個人給人的第一印象竟是那麼唐突粗魯，實在毫無魅力可言。即使像普列漢諾夫或馬托夫（Julius O. Cederbaum Marov，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孟什維克派領導人）或任何其他人都沒有列寧那種本事，可以對他人產生催眠式的影響力，然後加以掌握引導。他們會緊緊跟隨他，好像跟隨一位獨一無二且無可置疑的領導者一般。的確，列寧的出現確是一種少有的現象——特別是在俄國——他那鋼鐵般的意志，驚人的毅力，不可思議的行動能力，所有這些都賦與他一種牢不可破的自信心……。」後來華倫提諾夫和列寧鬧翻，他們之間有如下的對話，華倫提諾夫說：「我不會忘記你竟然那麼快把我列入你最痛恨的敵人行列，只不過我在哲學領域上和你意見不同而已，你竟對我橫加謾罵攻訐。」列寧回答道：「你說得對，在這一點上面你說得很對，所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人都是我的敵人，我不願和這種人來往，我不要和他們坐在一起……。」列寧不願意和我握

手，說完話轉身就走，我從此脫離布爾什維克(Bolshevik)的組織。」

錫隆諾(Guazio Stone)也提到他加入共產黨時對列寧的印象：「每次他一走入大廳，整個氣氛就變了，變得很有生動有力。他會把一股熱情感染給別人，如同在聖彼得堡(S. Peter's)時，大家圍在塞迪亞宮(Scitia)，散發出一股熱烈的光芒，籠罩著大會堂的四周圍。可是如果和他面對面交談或就近觀察他——看他剪報、聽他下輕蔑的判斷、他分析事情的能力、下決定的果斷聲調——你絕對感受不到任何神秘的氣氛。我記得一九二一年前往莫斯科時，我偶然聽到他一些簡潔有力的評斷語氣，當時感覺身體好像受到重擊一般。」

吳爾夫(Bertram D. Wolfe)有機會讀到高爾基(Maxim Gorky)的一些重要文章，終於能夠指出蘇聯官方所刊行的高爾基的《與列寧在一起的日子》(Days with Lenin)一書充滿了謬誤和歪曲，甚至根本就捏造了高爾基和列寧之間的關係。他們兩人之間的基本差異在於列寧只想到階級，而高爾基想到的則是人的問題，他一向把宗教看得很嚴肅——雖然他並不相信基督教——常常談到「尋找上帝」的問題，列寧對這個則表示很生氣：「任何宗教的觀念，任何牽涉到小神祇的觀念，即使只是一點點，都是一種不可寬恕的罪惡。」高爾基自認有責任保護知識分子——藝術家、作家及科學家——就要列寧給他一個可以為他們做事情的職位，他不斷跟列寧請願，後來列寧變得很不耐煩，就跟他說，這種事情和革命事業相較起來根本就是雞毛蒜皮小事，是微不足道的。不過，列寧倒不像史達林(Stalin)那樣趕盡殺絕，他有仁慈的一面，比如他就開釋了許多「有罪的人士」。二十年代初期，列寧要處決一批社會革命黨的人，高爾基出面橫加干預，甚至以絕交相要脅，後來列寧讓了步，把這些人暫時關在監獄，但不久史達林繼位之後，還是把這些人「清除」掉了。高爾基曾創辦一份雜誌，叫做《對話》(Beseda)，其目的主要是拉攏蘇聯和外面世界的關係，但這份雜誌卻不准在蘇聯境內發

行，而且不刊登俄國人寫的文章。高爾基就跟列寧警告不要太過於專制，因為革命的目的即在於掃除專制，但列寧對這個話聽不進去。最後，高爾基在不同的時期寫了三個對列寧的印象手記，其中包括了不少批評的語調，最後一個也是最著名的一個即是《與列寧在一起的日子》，但在史達林主政時期，卻已被動過了手脚。原來版本的結論是這樣：「一個人所作所為如果是正確而誠實的，那麼他最終必將勝利，否則，只有注定失敗一途。」這個結論改爲「列寧死了，但是他思想和意志的繼承者還活著，他們將繼續他未完成的工作，這在人類史上將是一樁空前的勝利」。高爾基所有有關猶太人的看法全被蘇聯官方刪除，底下有關列寧的一段談話同樣被刪除：

我常常和列寧談到革命策略和生活方式殘酷的一面。

「你期待怎麼樣呢？」他困惑而生氣地反問：「在這種空前的惡劣鬥爭中，你還想談什麼人性嗎？」

「在一場戰鬥中，你如何衡量必要和不必要的攻擊？」在一次熱烈爭論之後他這樣問我。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只能以詩般的曖昧方式回答：「我認爲沒有其他的答案。」（這是什麼意思？）

有一次我問他：「你會爲人民感到難過嗎？我自己是會的。」

「我只爲聰明的人感到難過，我們之間聰明的人很少，我們是一個充滿才能的民族，可是聰明才智方面卻又流於懶散。有聰明才智的俄國人大都是猶太人，或至少血液中含有猶太人的成分。」

從上面這段對話中我們看得出來，列寧對易於妥協和愛爭論的俄國人顯得很不耐煩，因此他會

爲此而憤怒，我們看不到我在書中所描繪他仁慈的一面，這並不足爲奇。

有兩段個人的插曲我在書中未曾提及（因爲我當時並不知道），也許跟革命運動無關，不過似乎可以在此順便一提。我從《艾蓮諾·馬克思：一個社會主義悲劇》（Eleanor Marx: A Socialist Tragedy）這本書知道，馬克思和他的管家蓮琴（Lenchen Helene Demuth）生了一個兒子，這位管家是當初馬克思和燕妮（Jenny von Westphalen）結婚時，燕妮的母親讓她陪嫁過來的嫁粧，她一輩子忠心耿耿陪著馬克思一家人，幾乎不支領什麼酬勞。馬克思和蓮琴生的這個私生子叫亨利·佛德烈克·德慕特（Henry Friedrich Demuth），從母姓，出生於一八五一年六月，當時正是馬克思一家人落難英國倫敦最爲窮困潦倒的時候，一家人擠在蘇活區（Soho）一個只有兩個房間的小公寓裡。這位私生子後來好像過繼給一個勞工階級的家庭撫養，從此不知下落，但一八八〇年代卻再度出現，不久就拋下妻子兒女移民澳洲。馬克思的女兒艾蓮諾一直以爲佛德烈克是恩格斯的兒子，她對父親的形象一向認定爲理想完美，後來知道事實真相時自然十分吃驚，但她對這位同父異母弟弟依然保持非常友善的關係。在這方面列寧的形象似乎比馬克思更爲人性一些，他有一位極爲親密的女性朋友，甚至可以說他極爲愛她。這位女性朋友名叫伊奈莎（Inessa Armand），母親是蘇格蘭人，父親是一位法國的歌唱家，她從小被祖母帶去俄國，長大後在一個法裔的俄國工業家家中當家庭教師，十八歲時和工業家的兒子結婚。不久之後她成爲布爾什維克革命分子，成爲列寧的忠實黨徒，她帶著兩個最小的孩子離開了丈夫，但仍繼續靠丈夫接濟過活，直到她丈夫的財產被布爾什維克革命沒收充公。她成爲列寧的得力助手，爲他彈奏貝多芬，陪他出席黨會議，她能流利使用五種語言，對列寧的幫助更是不可限量，因爲列寧除了母語之外，只懂得一些簡單的德語而已。一位法國的社會主義分子說，他有一次看到列寧「在

一家咖啡館裡，用兩隻蒙古的小眼睛，不斷瞪著我們這位法國小姑娘，看個不停」。列寧的元配妻子娜德芝妲(Nadezhda Konstantinovna Krupskaya)也常常提到這位女孩，甚至有一度還想讓賢，自己退出來，讓列寧把這位女孩娶過來。伊奈莎是少數被列寧直稱「你」而不稱「您」的人之一，可見他們之間親密的程度，他們常有書信往來，一九一七年，列寧從瑞士回彼得格勒(Petrograd，即聖彼得堡)時，伴隨他一起回來的伙伴中，她即是其中一員。她曾經入獄三次，有一次甚至還被流放到外省。根據各方面的記載，她確是一個相當迷人的女性，但根據描述，她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是「營養不良、飢寒交迫……因工作過度而不斷面露疲態，顯然疏於自我照顧所致」。一九二〇年她坐著載貨火車前往高加索區(Caucasus，俄國南部，位於裏海和黑海之間，與土耳其和伊朗相接壤)，不久即因染上傷寒而死在那裡。我在上述引用吳爾夫的那段文章中，他也曾提到伊奈莎這個人，巴拉巴諾娃(Angelina Babanova)曾告訴他說，當列寧聽到伊奈莎的死訊時，幾乎當場崩潰，「我從未見過他那樣子，這似乎比死了一位『好布爾什維克黨員』或一位好朋友還嚴重。他失去了一位最親密的伙伴，他情不自禁。」巴拉巴諾娃和其他一些人都認定伊奈莎和列寧生有一個女兒，這位女兒後來嫁給一個德國共產黨員，這位德國共產黨員最後卻被史達林「清算」掉了，烏里亞諾夫(Ulyanov，列寧本姓)家認領了這位女孩。巴拉巴諾娃曾在社會主義政治研習會中和伊奈莎共事過，她跟吳爾夫說：「我對伊奈莎不太有好感，她喜歡賣弄學問，從她的穿著(永遠一成不變的樸素裝扮)和思想言行等，你可以看出來她是個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分子。她精通多種語言，列寧對此則是一竅不通。」列寧重感情，有人不計利害關係願意死心塌地為他奉獻一切，他當然感動。

德卻爾(Isaac Deutscher)所撰《列寧的童年時代》(Lenin's Childhood)，未完成的列寧傳記的第一部分，書中對列寧的先祖有不少的著墨。但是關於烏里亞諾夫這個家族的起源，最多也只能追溯到列寧的

祖父那一代，再往上就一無所知了。德卻爾推測列寧的上面幾代祖先可能是農奴，混雜有蒙古人、韃靼人或卡馬克人(Kalmuck，居住在高加索東北部的蒙古族人)的血統，他的祖父來到亞斯特拉汗(Astrakhan，俄國西南部城市，位於伏爾加河三角洲上)一帶，這裡是許多農奴的避難所，列寧自己則說：「我對我的祖父一無所知。」他的祖父當時從事裁縫，很貧困，晚年時環境比較好轉，已經列入為低階層的中產階級，但由於出身寒微，始終無法獲得真正的公民身分。到了列寧的父親那一代，由於接受較高的教育，並且終生獻身教育界，終於取得榮譽貴族的頭銜，真正躋身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行列。但是列寧自己——雖然母親也算是系出名門，他自己也一向自視為學者——卻始終是一副粗俗相。

德卻爾另外撰寫了三大冊的托洛斯基的傳記，對托洛斯基的整個政治生涯描寫得可謂巨細靡遺，比我在本書中大而化之的描寫自然要詳盡得多，不過，我認為我所寫的似乎沒有更動修改的必要，托洛斯基早年生涯的部分，德卻爾和我所引用的資料來源大致相同：托洛斯基自己的自傳以及麥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所撰的《里昂·托洛斯基：一位年輕人的畫像》(Leon Trotsky: The Portrait of a Youth)。關於處決沙皇家族這件事情，我後來讀了托洛斯基的《一九三五年流亡日記》(Trotsky's Diary in Exile 1935)，則印證了我一向的看法：列寧不知道而且不同意這件事情，這不是真的(這件慘案在蘇聯官方當局一向列為秘密檔案)。這則日記讓我們了解到，托洛斯基和列寧一樣，對這件事情的態度都是冷血無情：

和史維洛夫(Sverdlov)談話時，我隨口順便問：「喔，是的，沙皇在哪裡？」他回答：「全都解決了，沙皇槍決了。」「他的家人呢？」「他的家人一起解決了。」「全部嗎？」我問，露出明

顯訝異的樣子。「全部！」史維洛夫答道：「有什麼不對嗎？」他在等待我的反應。我問：「誰下的命令？」「我們在此一起決定的，伊利區(Lyich，即列寧)認爲我們不要讓白軍有依靠的目標，特別是在目前這種艱難的處境之下……。」我不再追問，覺得事情已經告一段落。的確，這個決定非下不可，剛好可以藉此昭告世界，我們要奮不顧身繼續無情戰鬥下去。沙皇家族的處決不僅可以嚇唬敵人，瓦解他們的士氣，同時可更進一步警惕我們自己，要知道此去只有前進，沒有退路，擺在前面的，不是全面勝利就是毀滅。黨中央的高階層智囊團中可能有人不同意此種做法，但工人大衆和士兵則絕不會有任何疑慮，因爲他們絕不會了解和接受任何其他的決定。列寧很了解這個，他懂得如何和群衆一起感覺、一起思考，特別是在此一大的政治轉捩點之際……

我來到國外時，有機會讀到關於當時如何槍決以及如何焚化屍體等等的描寫報導，我不知道這中間有多少是真實的成分，有多少是杜撰的成分，我只能說我對槍決如何執行實在絲毫不感興趣(沙皇夫婦和他們的兒女先被用槍加以射擊，然後用刺刀加以刺殺，最後把屍體全丟入一個舊的礦坑)，坦白說，我不了解這種好奇心。

關於這個新的版本，我改動的地方非常少，只修飾一下原來的附錄部分，然後拿掉以《三十年代末期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 at the End of the Thirties)爲名的平裝版本中〈一九四〇年的總結〉(Summary as of 1940)一文，我把此文放入我另一本選集《光線之岸》(The Shores of Light)之中。

到芬蘭車站

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及發展

TO THE FINLAND STATION

A Study in the Writing and Acting of History

—
第
一
部
—

第一章

米西列發現了維科

一八二四年一月裡的某一天，一位教哲學和歷史的年輕法國教授，名叫朱勒·米西列(Jules Michelet)，他在本書中的翻譯註解裡發現了喬凡尼·維科(Giovanni Vico, 1668-1744, 義大利歷史哲學家)這個名字，有關維科的資料引起了極大的興趣，遂立即著手學習義大利文。

維科的時代早他一百年，維科的著作也寫在一百年前，但從未譯成法文，事實上，在義大利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他是個窮學者，生在義大利南端貧窮落後的那不勒斯(Naples)，當時正值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時期，但由於宗教法庭的干預，這個運動很快就式微了。維科因為出身寒微，脾氣又古怪，遂與學術生涯絕緣；他發現晉身無望之後，只好躲起來埋首做學問，然後不斷發表一些不受歡迎的東西。一七二五年他出版一本著作，叫做《治理國家之新科學原則暨治理百姓之自然法原則》(*Principles of a New Science Dealing with the Nature of Nations, Through Which Are Shown Also New Principles of the Natural Law of Peoples*)。維科讀過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英國哲學家、政治家，提倡歸納法，對後世科學研究有重大影響)，他認為培根所倡導那一套研究自然世界的方法，一樣可以應用在研究人類歷史上面。他後來也讀了格勞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 荷蘭法學家、神學家)，格勞秀斯認為人們應該透過人類的語言和行動，來研究哲學和神學的歷史，並以此建立一套法則的

系統，可以涵蓋所有各種不同的道德系統而放諸四海皆準。

當時年輕的米西列正在探索一套歷史新科學的原則，在他的研究計劃中，有一個是「當成個體看待的種族」之歷史，有一系列的「用哲學眼光研究詩人」，以及一本著作專門研究「民族性和語言的關係」。他寫道，他想「把歷史和哲學混在一起」，因為兩者「可以互相補足」。那年的七月，他開始正式讀維科的著作，他廢寢忘食讀完第一冊。從米西列和維科的心靈交會，我們可以毫不誇張的這樣說，一個嶄新的哲學和藝術世界已然誕生：再創造之社會歷史的世界。關於他這時期的生活狀況，他後來寫道：「一八二四年，維科，努力，地獄的陰影，莊嚴，黃金枝。」「從一八二四年起，」他寫道：「我被維科深深迷住了，我不斷沈溺在他那偉大的歷史原則之中。」

我們即使從今天的眼光去讀維科，都可以感受到米西列的那種興奮。想來真是奇怪費解，我們竟然能夠在《新科學》(Scienza Nuova)一書之中看到一顆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心靈，在十七世紀末葉褊狹的法律學派烏煙瘴氣中依然清醒，透過一種帶有學究氣的陳舊論述方法發言。在這裡，站在維科那充滿洞見的穩定光芒面前——我們彷彿望向地中海一帶的風景——我們看到了瀰漫在遙遠時代的地平線上的薄霧隱去，然後是傳奇故事的雲層升了上來，在那陰影底下，我們看到一些怪物，英雄和神祇漂浮離去，我們現在看到了我們一向所熟悉的地球上孤獨的人類。曾經叫我們驚異的神話只是跟我們一樣的人類之投影而已，如果我們能夠在自己身上找出秘訣，學會怎樣正確去讀這些，就會了解 and 我們一樣的人如何從在從事冒險，而這些在今天看來是不可理解的。

事實上那些我們了解到的絕不會只是冒險故事而已，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歷史都是偉大人物之生平或突出之事件的記載，或者就像是上帝所安排的一場盛宴。但是我們現在可以了解到影響社會進化的其實正是社會發展的根源，社會發展的環境，就像個人一樣，其發展過程也要經過成

長的階段。」就我們所知道的歷史的事實，」維科寫道（我在此引用米西列當時所譯的維科《新科學》一書裡頭的話，這和維科的原著也許有些出入）：「指的乃是其原始的源頭，而非其現在所具有的共同基礎，亦非其連續性或凝聚性。」他又寫道：「事物的本質指的正是這些事物在某一特定時間以某一特定方式所形成的樣子，只要環境相同，那麼其所引起之現象必然相同。」接著他又說：「在那包裹住最遙遠時代的黑夜中，出現一道光線，讓我們看清事情的真相；我要說明的是此一不容爭辯的事實：社會環境絕對是人類的創作；而其原則正是由人類智力之發展來左右。」他最後說：「政府必須符合被統治者之天性，政府正是此一天性之產物。」

米西列在維科的著作中所發現的這些觀念，儘管是維科最先加以闡明，對米西列而言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發生於維科的時代和米西列的時代之間。比米西列早一代的伏爾泰(F. M. Arouet de Voltaire, 1694-1778，法國哲學家，十八世紀歐洲啓蒙運動主導人物)早就把神和英雄趕開了；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法國哲學家、法學家)早就說明了人類的制度和種族習慣及氣候有關。不久之後米西列又在海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德國文學評論家、詩人，其作品中預了演化論的出現，對歌德和德國浪漫主義運動有很大的影響)身上進一步發現了文化的進化理論，在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身上發現了社會變遷的化學作用論述。那麼，我們如何解釋《新科學》這本書會對一個一八二〇年代的人產生那麼大的啓示作用呢？理由很簡單，因為維科的著作中具有一種由突出之力量 and 視野所構成的想像力，使得米西列能夠全然領悟人類社會的有機特性，同時了解到透過歷史重新去詮釋組成人類生活的各種力量和要素的重要性。「維科是我心目中唯一的大師，」他寫道：「他的生命力量及人性之自我創造原則，成爲我教學和著作的重心。」維科自己認爲他的成就在於闡述「人類法則之形成」

以及說明「習俗所賴以形成爲律則的特殊狀況和一般過程：宗教、語言、政治、商業、命令、帝國、法律、軍隊、判決、處罰、戰爭、和平、聯盟。」他說，所有這些社會要素，「根據其特殊狀況及形成過程，由此而形成爲一種永久的正當性，這種正當性是獨一無二的。」那年八月，米西列在學校的授獎場合上如此說：「沒有人能夠把某一門學問獨立起來而與其他學問互不相干。……所有的學科合而爲一：語言、文學和歷史，物理、數學和哲學；兩個互不相干的學科在現實上是互有關聯的，甚至可能結合在一起，形成爲一個獨特系統。」接下來幾年之間，他把維科的一般原則強而有力運用在歷史的實際寫作上面。

第二章

米西列與中世紀

在十八世紀啓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中有一個決定性的重要觀念是維科所沒有的，而這個觀念在他的前輩大師培根的思想中卻已經露出端倪：人類進步的觀念，亦即人類自我改進能力的觀念。維科也許有相當的獨創性，但卻無法完全擺脫他的神學觀點，這種觀點把人類改進的目標寄望在天堂上面，而把個人的救贖交給上帝決定。他能夠看出人類社會處在不斷發展的狀況，但卻認為歷史是一種反覆循環的現象。

米西列不同，他出生於一七九八年，身上帶有法國大革命的傳統，他在拿破崙(Napoleon)和波旁(Bourbon)復辟王朝底下成長，年輕時還受洗為天主教徒，當過杜伊勒利(Tuileries，法國舊王宮，建於一五六四年，一八七一年焚毀)王宮中小公主的家庭教師，但他卻一直很窮，他的父母都是出身於有教養的小布爾喬亞階級(Bourgeoisie)——他的一位遠祖還當過拉昂(Laon)大教堂的風琴師——他的父親開印刷廠，卻由於拿破崙嚴格管制出版而被迫關門。米西列出生的前兩年，有一次印刷廠遭到搜查、追查雅各賓黨(Jacobin，法國大革命中的激進政治團體)文件，桌上正擺著活生生的罪證，這可能置米西列的父親於死罪，但拿破崙的警察卻沒想到要檢查看看：這時正在懷孕的米西列母親相信，後來胎兒死產都是這場驚嚇所造成。米西列十歲時，他的父親因為債務問題被捕入獄，他和母親兩

個人一起陪著父親入獄，不久印刷廠就被拿破崙的警察給查封了，還在門口貼上封條；這件事帶給他極大的痛苦，他後來就在自己的遺囑中規定，以後他死了不得封上他的棺材。法國大革命的原則從未離他遠去，即使在他的青年時代，這些原則已經為傳統中產階級的觀點所掩蓋之時，他的立場依然不變。

一八三〇年的七月，反對法王查理十世(Charles X)的聲浪演變成爲工人和學生的叛變，他們占據巴黎三天，並且逼走王室。這時的米西列雖然腦中仍是維科的影子，卻逐漸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法國大革命傳統的理想主義重新在心中喚起，和維科的理論緊緊結合在一起。他這時靈感如潮，用很快的速度寫出《人類歷史概述》(Introduction to Universal History)，他說，這本書在「燃燒的巴黎走道中匆促完成」。書一開始這樣寫道：「這個世界如果以戰爭開始，亦將以戰爭結束：人對抗自然的戰爭，精神對抗物質的戰爭，自由對抗宿命的戰爭，歷史只不過是這些無止境之鬥爭的紀錄而已。」基督教會經帶給這個世界道德的福音，現在法國要帶給這個世界社會的福音。「歐洲在解決社會和知識方面的問題一向成效不彰，現在只有由法國來詮釋、翻譯，並加以普及。」

可惜工人和學生的勝利並未持續多久，外省方面並不支持巴黎，自由派的中產階級並不要共和，他們全面倒向奧爾良政黨(Orléanist party，擁護波旁支系奧爾良家族的立憲君主主義派，路易腓力即此家族成員)，推出路易腓力(Louis-Philippe)做國王，成立君主立憲政體。米西列又回到杜伊勒利王宮當另一位小公主(路易腓力的女兒)的家庭教師，但這次他同時獲得一個更重要的職位：檔案室的主管。在這裡他能夠有機會接觸法國歷代王朝的各種珍貴檔案資料，他遂開始著手寫《中世紀歷史》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米西列走進檔案室時，腦中帶著維科的影子以及七月革命的回聲。七月革命才剛結束不久，他親身經歷到的活生生法國歷史，和他的想像緊緊結合在一起。這本書的前面兩冊處理到早期法國高盧族(Gaul)的歷史時，由於資料稀少，米西列自稱很遺憾，無法讓過去「復活」過來。但是在《法國的地圖》這一章，描述法國的歷史，我們就真正看到米西列的特點了，這個時期的材料多了，奇蹟也跟著發生了。

米西列在這個時期所寫的信件可以勾勒出他此時對他的工作之概念及熱情。
他在信中寫道：

經由專注和觸類旁通，我相信我已經找到一股相當熱烈的火焰，可以融化各種歧異，使之在歷史中栩栩如生。……我發現我如果不了解人類活動這些部門，我則無法詮釋社會事實，我現在更加了解我們過去的分類研究並沒有作用。……要把這麼多各自不同的要素組合在一起，沒有在自己的內在先建立一股強勁的力量便做不到，要組織這些充滿熱情的東西，自己本身沒有熱情就不行。一盞燈的熱度如果足夠融合一個民族，那麼也就一樣足夠燒毀這個民族的根柢。……我從未碰過這麼多豐富的資料，而其內容是那樣五花八門。……我現在正企圖把過去毫不相關的學科串連在一起：比如法律、藝術等等，我要說明某一個雕刻或某一幅畫在法律歷史中如何成爲一樁事件，我要探索從矮胖農奴高舉封建時代的聖人神龕到宮廷中的新奇設計種種社會運動，這是由工業和宗教串連在一起的線。想像這種交互作用似乎沒什麼，可是要用確定的方式去取捨實際行動的方法與分量，用科學方法建立出一套新的理論，這可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由於這股火焰的燃燒，中世紀背後的事蹟和傳聞因而變成一片透明，現在則要收縮成爲一個嶄新的全景焦點。過去沒有人真正探索過法國的檔案，以前寫的歷史都是抄來抄去，很少真正動用到第一手的原始資料。米西列後來如此說道：「過去二十年之中我穿梭在這些寂寞的迴廊中間，沈浸在一片靜默裡頭，我彷彿聽到了許久以前受苦的靈魂在跟我低聲細語，這些靈魂現在已經成爲過去的灰燼了。」許多士兵投入戰爭之中，這提醒他認識到殘酷的現實，他遂想到他是否該用史考特（Walter Scott, 1771-1832，英國小說家、詩人，著有《薩克遜英雄傳》等歷史小說）寫歷史小說的方式來撰寫歷史，把騎士時代「御用的年譜作者」孟斯特勒（Enguerrand Monstrelet）和佛拉薩（Jean Froissart）所留下來的東西記錄進去。有人說米西列是個浪漫主義者，他所撰寫的歷史充滿了曲折的色彩，甚至還講究文字修辭（特別是早期階段）。但我們知道他的基本態度是絕對寫實的，而不是浪漫的。他完全獨立作業，他說，浪漫主義的運動「和他錯身而過」，「我們多少都是浪漫主義者」。他二十二歲時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我們在空氣中聞到一種病態的味道，我很幸運能夠及早培養出良好的感覺和自然的情感來與之互相抗衡。」

米西列所撰寫的歷史中少不了中世紀的偉大故事，他還以一種特殊的手法處理得栩栩如生，但他的主要目的正是要掃除這些故事中的神秘色彩，並且將之與當時的經濟和社會背景緊緊結合在一起，而這都是他所排斥的浪漫主義學派所不知道的東西。浪漫主義的特點是對突出的個人本身有興趣，而米西列則是對代表群體和運動的突出個人有興趣。用莊嚴高貴的老式文體去記載十字軍東征（Crusades）和英法百年戰爭（Hundred Years' War），已經不足以呈現其複雜多樣之細節，他巨細靡遺描寫那些訓練有素的兵團和砲手如何出征打仗，他有興趣的不是那些迷人的個人魅力，而是戰爭技巧的發展。

我們讀描寫農人叛亂那一章，對「瓦盧瓦的菲利普」(Philippe de Valois, 1293-1350、法國瓦盧瓦王朝第一代國王，在位期間與英王愛德華三世爭奪王位而引發英法百年戰爭)和「善良的菲利普」(Philippe le Bel, 1396-1467、勃艮第公爵，「瓦盧瓦的菲利普」之孫，創建中世紀晚期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之一)這些突出個人的印象可能很快就忘記，但是對於農人的恐怖描寫卻會永遠記得。「今天，」米西列寫道：「遺留下來的城堡已經不多，李希留(Richelieu, 1585-1642、法國政治家)攝政時期及大革命時代即已如此，然而，當我們前往蒙科內(Montcornet)峽谷旅行，深入亞爾丁(Ardennes)森林，沿著台幼堡(Taillebourg)或坦卡維(Tancarville)的城牆而行時，我們會在自己的頭上看到一隻傾斜的眼睛注視著我們走過去，我們的心頭一陣緊縮，想到幾百年來有過多少人在這些城堡牆腳下受苦受難，無謂的犧牲糟蹋掉，我們不必去翻歷史書就可以了解這些，我們父執輩的痛苦雖然早已被忘記，但是卻仍在我們身上悸動著，如同一個人的一隻手被砍斷了，在被砍斷的那隻手上仍感到痛苦一般。」

聖女貞德(Jeanne d'Arc, c.1412-1431)之所以廣受歡迎並且變得有名，米西列可以說貢獻良多，但他並不以神話人物或聖徒的眼光去看她，他把她當做是法國人愛國心表現的代言人，他寫道：「有什麼傳奇比這則真實的故事更美的呢？但我們要小心，不要把這則故事變成傳奇。我們要虔敬的保留故事中所有細節，甚至包括最人性的那部分，我們必須尊重其中動人卻也駭人……一個歷史學家在描寫這段事蹟時，不論多受感動，都要堅守真實，不要為理想主義的情感因素所左右。」他認為聖女貞德是行動派英雄的最佳典範，「與基督教的被動性完全相反」。因此，他的研究立場乃是以理性為出發點，完全符合十八世紀的哲學——反教權主義，以民主為依歸。基於這個理由，雖說《中世紀歷史》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充滿許多真知灼見，但在我看來仍比不上米西列其他歷史方面的著作。米西列真正推崇的並非騎士制度和基督教幾百年來所培養出來的道德情操，而是科學家和藝術

家的英雄主義、宗教和政治上的新教徒、人類了解自己處境以及理性控制其發展的努力。走過中世紀，米西列迫不及待想趕快進入文藝復興運動。

路易十一 (Louis XI, 1423-1483) 的時代對米西列而言頗有不勝負荷的感覺，特別是在處理聖女貞德之後，他覺得有氣無力，儘管他的筆調依舊，卻顯然已經疲態百出，他讓我們覺得他對這個時代毫無認同之感，寫路易十一的時代寫到一半時，終於忍不住發出一聲長嘆。「十五世紀的歷史真長，」他寫道：「這段時間真是漫長，對於活在那段時間的人是如此，對於想走進去把這段時間重新活一遍的人更是如此，我的意思是，對歷史學家而言，歷史不只是一場遊戲，他必須以一種信心努力進入過去的生活。……可是生命在哪裡？誰能指出來哪一個是活的，哪一個是死的？我要對哪一個部門產生興趣？在這麼多不同的人當中誰是既不含糊又不犯錯誤的？有沒有值得我們注意的人，他身上有人類賴以生存的清斷觀念和原則？我們的確步步走向冷漠和道德的死亡，我們仍然繼續沈淪下去。」

同時，米西列自己的時代依然在保守與共和之間掙扎著，教士們攻擊米西列所寫的歷史，我們這位大革命的孩子必須出面為他的原則辯護。克萊蒙汀 (Clémentine) 公主已經出嫁，米西列只好辭去家教的職位，而他在法蘭西皇家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卻廣受歡迎，他開一系列反耶穌會 (Jesuit) 的課程，他的同事包括了好鬥的吉內 (Edgar Quinet) 以及遭放逐的波蘭愛國者米基維茲 (Adam Mickiewicz, 1798-1855, 波蘭民族主義詩人) 等人。一八四二年的七月，米西列寫道：「行動，行動！只有行動才能得到安慰！我們的行動不只針對人，還要針對思想的潛能——把思想和行動強而有力結合在一起。」從一八四三年起，他堅持一條確定而不妥協的路線，他把中世紀丟到一旁，他覺得自己已經在這上面折騰夠了，如果再繼續去賦之以理想化是很危險的，對過去的盲目禮讚只會徒然帶來反動，

老式的專制又帶著浪漫回來。米西列並不實際參加政治行動，但卻將他的歷史從十五世紀直接跳到法國大革命，他覺得大革命的目標和成就已經被緊接而來的混亂所淹沒了，他現在感到自信滿滿，身上的一股熱情又不斷竄升，到了一八四八年遂爆發開來，他全身投入三個世紀的史詩，下半生在此上面全力以赴，而《中世紀歷史》對此而言居然只是個序曲而已。

第三章

米西列與法國大革命

成熟期的米西列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許多方面，他很像小說家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法國小說家)，反而不像一般的歷史學家。他有小說家的社會觀察力以及掌握角色的能力，同時又有詩人的想像力和熱情。也許是諸多因素的巧妙組合，所有這些特點都沒有應用在當代生活上面，反而往後投注在歷史上面，然後又和追求事實的科學習性緊緊結合在一起，使他全身投入不眠不休的探索研究。

米西列在孤獨中長大，他大部分的時間都投注在個人的研究上面。他早期的生活很困苦貧寒，他出生在一個陰暗潮濕的荒廢教堂裡，風雨常常從破敗的窗戶滲透進來，這裡正是他父親用來當印刷廠辦公室的地方，他的童年及青少年時代即是在這種沮喪的環境中度過，他後來寫道：「我好像是在巴黎街上兩個鋪石中的一棵蘆葦，在缺乏陽光的滋潤下長大。」米西列一直到十五歲時家裡都還沒有肉吃，也沒有酒喝，三餐吃的總是蔬菜和麵包，而他們所住的是地窖，米西列在上學的這幾年之中，冬天時從未有過暖氣，他的手因而凍傷龜裂，傷疤一輩子都未曾消失。全家人擠在一個地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從小看著父母一天到晚吵架，他十七歲時，母親不幸死於癌症。他平常在學校表現得很害羞柔弱，也很怪異，常常成爲同學嘲弄的對象，他始終交不到朋友，他們的世界相距太

遠，別的同學一放學立即投入舒適悠閒的中產階級世界，他卻必須在印刷廠工作，他十二歲就學會了排版印刷。

在這樣荒涼不健康的環境中，他卻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帝國，他越覺得飢寒交迫，就更感到迫切想追求心靈上的滿足。他是家庭中父母唯一寄望最高的小孩，所以許多好處都盡量推給他。許多年之後，他寫信給女婿談到他外孫的教育問題時就這樣說道：「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艾提安了，我必須給他我的父母曾經給予我的，他們犧牲一切給予我的自由，讓我有自由的時間去做我的事情，但我們不能濫用這種民主的方式。一個人必須工作，有的人受制於別人意志的使喚，有的人受制於命運不得不然，但多虧我父母，我可以免除這些。」儘管巴黎潮濕寒冷的冬天讓米西列的青年時代不好過，他一輩子還是以巴黎人自居，因為巴黎帶給他一切知性的遺產，他在信中曾經這樣寫道：「我急著想趕回我們的巴黎，巴黎像一個每天都有千百個鍵可以玩的鍵盤——我指的當然是那些數不盡的知性的泉源。」

另外，米西列出身開印刷廠的家庭——提供給他一個特殊的見解和訓練——米西列家的印刷廠讓他們培養出共同的興趣和團隊精神。出版對他而言，代表著當代思想進步的偉大象徵。米西列家開的印刷廠多少具備有文藝復興時代著名印刷廠如艾提安(Engens)或阿迪斯(Adises)的遺風，關於這個米西列有生動的記載——那幾個學養豐富的世家，為發現稀世古籍而興奮得徹夜難眠，他們不但重印這些經典古籍行銷於世，還特別花工夫去編輯作註。米西列的父親也具有這方面的修養，所以他的歷史撰寫工作很多時候還從父親那裡得到不少幫助。米西列對出版品以及人類科學的興趣可以說多少正是環境所使然，他身上所散發的那種魅力，讓人覺得他不像是十九世紀的學者，反而比較接近像是文藝復興時代最後的偉大文豪。他早年即已精通拉丁文和古希臘文，這在當時已算是罕

見，他後來又學會英文、義大利文以及德文，並且不斷吸收這些語文的文學和各種知識。他沒什麼資財，卻遊遍整個西歐地區，東歐地區雖然無緣親臨斯地，在精神上卻不知神遊多少回了。他給人的印象是，他絕對不同於目下大學研究所中所培養出來的只專精一個小部門學問的那種學者，我們覺得他好像什麼書都讀過，好像遍覽所有博物館，參觀過所有繪畫，私下訪談過所有顯赫權貴人物，並探索過歐洲各大圖書館和檔案室，全部皆收歸於自己囊中。龔固爾兄弟(Edmund and Jules de Goncourt, 1822-1896, 1832-1870, 法國小說家)說，米西列的魅力在於他的作品「像是手寫的，而不是印刷的，沒有一般印刷品那種刻板僵硬的感覺，像是思想的手寫原稿」。但米西列其實是回到出版的更早階段，比記者和學者更早一步將第一手知識傳達給我們。他就是一個人走向知識源頭，努力得到其中可學的；這種方式既無學術性的呆板束縛，同時更直接面對讀者。

米西列一開始即懂得在困頓重重的學問領域中如何去鞏固自己，但他外在的生活環境始終都是陰沈沮喪。他的母親死後，他的父親受聘去管理一個機構，一半是管膳宿的公寓，一半則是精神病療養所，米西列跟著父親在那裡生活了大約八年左右，竟日與舊王朝遺留下來的那些既窮困又瘋癲的人士為伍，當然還有照顧這些病人的醫生和護理人員。他不久和一位女侯爵的年輕隨身女伴結婚，他們之間並無多少共通之處，十五年後妻子死於肺癆，留下兩個小孩。在這些年之間，米西列已經成爲年輕教授，他每天早上四點起床，讀書寫作，然後整天教書上課，他就是在散步時都要隨身攜帶一本書，以便隨時翻閱。他此時結交一位親密好友，一位醫學生，他和他分享知識的熱情，他說知識的熱情「侵蝕」他的整個年輕時代；可惜這位醫學生不久也得了肺癆，病了很久才死去，米西列爲此感到很傷心難過。

在文學上可能找不到第二個出奇的例子，像米西列那樣將個人有限的經驗拓展成爲想像力的偉大作品。當這位纖弱而孤獨的印刷廠老闆的兒子把自己全身投注於他的書中時，我們看到的不是和他同時代那些浪漫主義者所做的那樣，只是把個人的喜悅和絕望膨脹成爲一種英雄主義風格，我們看到了由舊封建社會蛻變而成爲現代世界的一齣苦澀戲劇。他筆下的法國歷史，雖然多樣龐雜，卻展現出一種大膽的情感花樣，而這正是米西列自己的經驗寫照。導向大革命的前幾個世紀就像是漫漫長而孤獨的年輕時代年復一年的等待，只爲求得自我表現、解放、要求該有的權利，以及與他人來往的自由。故事的高潮點在於巴士底(Bastille)監獄的陷落，臨時政府的成立，法國各地社區聚集一起，宣誓博愛精神及效忠革命。米西列是第一個探索及強調此現象的史家，他寫道：「我相信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這樣，人的心胸變得那麼寬廣和具有包容力——而且，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這樣，人的階級、財富及黨派都不復存在。」然而，這竟然只是曇花一現而已，不久之後，舊的封建勢力又在新的目標和希望之中復燃，革命的領導者很快即又陷入新和舊的內在矛盾衝突之中——而米西列在找出自己的定位之前，一樣處在保皇和革命的夾縫之間。他的確正是此一矛盾環境下的產物；但同時卻又是此一重大社會變遷下所塑造出來的傑出歷史學家。這種社會制度中的矛盾觀念在未來的社會經濟思想中占有相當分量的地位，此時卻已經在米西列的身上成形，在他以後的歷史著作中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把箭頭指向舊王權的這些困境。在米西列的眼中看來，社會中存在著兩種典型的內在對立要素，一個是階級的團結，另一個是國家的責任，但此一對立現象互不相容，阻擾了個人或政治實體的運作，而超越此一對立狀況，我們可以深深感受到米西列的世界中存在有一種兩極對立的情感力量，形成爲其道德的系統，一個是冷淡的、反社會的自我主義，另一個則是促成人類團結的動力。

我們回到米西列的時代，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在這以前，他尚未完成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史。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前夕，他們認爲他講課帶有大強烈的煽動性，他的課因而被迫停掉，革命之後，他的職位才得以恢復。一八五一年，拿破崙三世(Louis Bonaparte)稱帝，他終於被迫正式解職，同時之間，他又拒絕宣誓承認新皇帝，因此連檔案室的職位也只得一併被解除。他這時變得兩袖清風，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手上在進行的歷史而已，他寫道：「人如能安貧，則道不遠矣。」他的《法國大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只寫到羅伯斯比垮台(Maximilien Robespierre, 1758-1794，法國大革命領袖，爲雅各賓派成員，掌權期間實行恐怖統治，垮台後被送上斷頭台)，現在他要把路易十一死後到巴士底監獄陷落這之間的空白填補起來，然後又從羅伯斯比的垮台寫到滑鐵盧戰役(Waterloo，比利時中部城鎮，拿破崙於一八一五年在此被各國聯軍擊敗)。

隨著時間的逝去，一冊又一冊的累積，經過一輩子四分之三的世紀時間，米西列建構出史無前例的《法國史》(History of France)鉅構，爲他那個時代的法國人勾勒出法國完整的過去歷史，無人能望其項背，他那個時代的許多名家都以極大的熱忱和興致讀他的作品，這些人包括拉馬丁(Alphonse-Marie-Louise de Lamartine, 1790-1869，法國詩人、政治家和歷史學家)、蒙塔朗貝爾(Comte de Montalambert)、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十九世紀法國最多產的作家，著有《鐘樓怪人》等書)、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德國猶太裔詩人、散文作家，一八三〇年後流亡巴黎，成爲國際民主運動領袖)、赫爾岑(A. I. Herzen)、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法國社會主義者、政治理論家)、貝朗傑(Pierre-Jean de Béranger, 1780-1857，法國民主主義詩人、民歌作家)、雷南(Ernest Renan, 1823-1892，法國哲學家、歷史學家)、泰泊(Hippolyte-Adolphe Taine, 1828-1893，法國文學評論家、歷史學家、實證主

義哲學家)、龔固爾兄弟及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 法國小說家, 代表作爲《包法利夫人》)等人。他不但是個藝術家, 同時也是個思想家, 他在思想世界的鑽研既深且廣, 對許多當代作家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

關於米西列在他的著作中所欲傳達的內涵問題, 因爲他對其論點的解說方式與其敘述風格多少有些歧異, 這個容後討論, 我們現在先從藝術和哲學的觀點來看他的歷史架構。

米西列在描寫他從維科而來的觀念時(「社會的有機特性及「人性自我創造」的特性), 他面臨了兩個主要問題, 其中一個是如何組合本質相異的材料, 然後說明各式不同人類活動之間相互關係的問題, 這是一樁相當吃力的工作, 我們可以從他的書信中看出他對這個問題的反應。另外一個問題則是如何去捕捉歷史之特殊形式及色彩的問題, 他必須以當代人的姿態回到歷史裡面, 好像過去的歷史發生在當代, 同時用客觀的眼光去看已經發生過的這些歷史。就這兩個層次問題的成就而言, 我認爲米西列所展現的真不愧是大思想家和大藝術家的風範。

首先是個人與群眾之間關係的融合問題, 而這個融合過程的描寫至今無人能夠超越, 即使在小說方面亦然。米西列在《法國大革命史》之中這樣寫道:「另外一件事情我們要強調且捧爲真理者則是, 老百姓永遠比在位者重要。我發現我挖掘得越深, 越感覺到最好的東西乃是藏在底層, 在那朦朧的深層底處。我終於了解到, 過去認爲戲劇中的真正主角是那些代表群眾說話的堂皇顯赫的發言者, 這種看法實在是錯誤的, 他們的動力並非來自其自己本身, 而是來自別人, 所以戲劇中的真正主角是老百姓, 不是他們。爲了找出老百姓, 並將其置回適當之位置, 我必須貶低我們一向認爲在歷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在上位者的重要性。」至於米西列對一些傑出人物的描寫, 在他筆下他們

則是和塑造他們的社會群眾密不可分，兩者互相依存，息息相關。那些大革命的領導者在他筆下遂變得栩栩如生，充滿特殊氣質，我們在讀他們的事蹟時，感覺和他們一起呼吸，可以深深感受到他們的愛憎情緒，因此，米西列描寫個人和描寫群眾，可以說一樣成功，即使描寫某個城市或某個地方，也是一樣成功生動，比如里昂(Lyons)、阿維農(Avignon)、旺代(Vendée)等，這些地方在他筆下同樣充滿栩栩如生的突出個性，而其中之社會要素的互相作用，正如同個人的個性表現，充滿複雜多樣的面貌。其次是次要人物的描寫，像謀刺法王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1610，法國波旁王朝第一代國王)的拉拜雅克(François Ravallac)，或十八世紀的神秘主義者居庸夫人(Madame Guyon)，或根本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如阿美昂(Amiens)地區的某位不幸教師，他的故事似乎正是所有對大革命後繼續發展失望和覺醒的縮影——這些次要人物米西列會用一章的篇幅來描寫，讓我們可以更加了解整個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

米西列在個人的細部描寫與地區群體的活動及整體的分析研究之間來回穿插呈現，這種寫作技巧仔細看來，實在是相當引人入勝。

米西列真正開始展現其迷人寫作方法大約始自《法國大革命史》的中間部分，在這個部分之中，他把外省的革命發展和巴黎的政治事件兩者之間的關係整合在一起。我並不同意英國傳記學家史特拉區(Lytton Strachey, 1880-1932)的看法，他認為米西列寫得最好的部分是大革命之前的二百年(事實上，十六、十七及十八世紀那幾冊乃是寫於大革命那個部分之後)。大革命這個部分在題材的處理上相當複雜，也相當艱難；米西列在處理這個部分時難免顯得零散不一，且有過分擁擠的感覺，這顯示出他有意全然掌握一向被簡化成訓誡講道的複雜現實，包括革命和反革命。儘管保皇黨(Toyalists)和羅伯斯比都有各自的大革命史——但米西列認為兩者皆為「君王」史——米西列宣稱他已圓滿寫出

了第一本共和史，確實也是如此。至於大革命之前幾百年那部分的幾冊，米西列在處理手法上則是緩慢而清晰，在呈現歷史事件時有條不紊，不慌不忙，且帶有一種交響樂的效果，充分顯示歷史學家在處理歷史時完美成熟的藝術手法。米西列在處理他的題材時，一路反覆交疊，就像在編織一條繩子一般：三級會議節節進逼，取得重大進展；王室日益昏聩無能；戰爭技術的更新發展；揭開啓蒙運動的幾本重要著作；新教徒被迫害的插曲；一連串巫教的審判揭示天主教會的式微等等。然而，如果說這樣的手法像在編織繩子卻又顯得粗枝大葉，因為這之間更為吸引人的則是一種活生生的生命意象之展現，充滿智慧的探索以及巧妙的鋪敘手法，兩者融為一體，此即米西列高明之處，舉例來說，在描寫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那個部分，他就把王室的陰謀和莫里哀(Molière, 1622-1673，法國劇作家)的喜劇情節及當時法國的經濟狀況等三者交融在一起；或者，有一整冊描寫攝政時期(一七一五—一七二三)——米西列在其信簡中對此頻頻發出慨嘆：「真是難，真是零散，沒有比重建這段歷史更困難更累人的了！」——這段時期自由派的攝政王有心要勵精圖治，好好振作一番，無奈他所隸屬的階級早已顛覆腐敗至極，根本欲振乏力，他的所有努力只得徒然付諸東流。米西列在結束這段故事時的筆調相當簡潔有力，攝政王奧爾良公爵(Duc d'Orléans, 1674-1723)眼看著所有改革皆成泡影，不禁放聲長嘆：「可憐的國家，當政者竟然是個醉鬼、王八蛋！」

米西列在記載史實之時，常常會停下來描述一番當時歷史背景的一般生活狀況：習慣風俗、服裝、道德氣氛等，他在此展現出某種特殊的才華，把自己和他筆下的歷史融合在一起，此即他和一般史家在方法運用上的主要不同之處。一般史家在描述歷史之時可以輕易下筆，因為他們只是依照史實按部就班寫下去；米西列則不然，他把我們帶入時光隧道，和過去的歷史人物一起在歷史的軌

道上摸索著前進，分享他們英雄式的信仰，因未曾預期的災難而沮喪，即使全部的後見之明，仍然覺得我們不知道到底會發生什麼事。米西列以一種詩人的敏銳感去展現時代的節奏、運動或意圖中每一種變化，然後以變化多端的技巧去處理各式各樣不同的情境。他在論自然史的書中所展現的才華有時如小鳥輕飛，有時如大海鳥之展翅，有時又如雲雀之輕盈歌唱，有時卻又如老鷹之翱翔氣勢，頗有但尼生 (Alfred Tennyson, 1809-1892, 英國詩人) 的詩作風格，像他這樣寫歷史真是少見而又別開生面。前面已經述及，米西列以一連串的插曲來呈現法國大革命的前奏過程；我們看到事件不斷進行而不帶太多作者的評論，一如我們在許多個人和群眾的行為中看到某些趨勢反覆發生，而逐漸被表明。在此我真看不出有什麼文學作品在鋪敘技巧上和米西列相提並論，我們看著歷代王室的興替，感受到他們的仁不義，以及他們對百姓的漠視。楓丹白露 (Fontainebleau) 和凡爾賽 (Versailles) 的王宮彷彿變得更為寒冷，也更為空曠，而那裡的人影卻變渺小了，也更為孤寂——他們向來可不是這麼可憐討厭的。米西列憶起他以前居住的療養院裡頭那些怪異可憐的舊王朝遺老，我們可以想像那位太陽王路易 (Louis the Sun King, 即路易十四) 如何在他那密閉的內房裡哀聲嘆氣，他成天為那位又老又聾的曼特儂夫人 (Madame de Maintenon, 1635-1719, 法王路易十四的第二任妻子) 煩擾著，為教士們的爭吵感到不勝其煩，最後竟然在頑劣的國會裡失態發火了。整個王朝眼看著搖搖欲墜，米西列以象徵手法告訴我們這個王朝的末路，他只是簡單描寫為了讓凡爾賽王宮的噴水池能夠噴水，馬利 (Mali) 地區如何勞師動眾的搞水利工程，弄得周遭幾哩外的地區雞犬難安。

描寫「聯盟軍」(Federations) 那幾章顯得相當扣人心弦，而描寫「恐怖時期」(Terror) 最後幾天的那幾章則緊湊得讓人透不過氣來，巴黎死屍遍地，叫人讀來不寒而慄，一章接著一章，米西列不斷把我們推向冷淡的人性深淵，在委員會和議會的房間裡，令人觸目心驚的精彩好戲一幕接一幕不斷

上演著。「我已經改變了我的歷史節奏，」他在信中寫道：「已經沒什麼大的篇章了，只有小的章節，節奏越來越快，而高潮點將出現在恐怖時期。」他現在的寫法是記載逐日發生的歷史，而不是逐年或逐月——甚至連當天的天氣細節都要寫進去，比如：「十月三十日，天亮時下著雨。」這一天吉倫特黨(Girondist，法國大革命時期立法議會與國民公會中的一個派系，因同情外省而不同情巴黎，招致羅伯斯比等派系仇視。在羅伯斯比掌權的恐怖時期，許多成員被送上斷頭台)的人要上斷頭台：「陰霾的天氣，眼看著冬天就要來臨，希望不要太難堪，大家都很頹喪，不想再看到隨便處置人犯。」……接下來成立執政內閣，氣氛終於鬆懈了下來，人們終於能夠走出屋子上街了。不久拿破崙上場，打開另一層視野——我們望向整個歐洲，從愛爾蘭到俄羅斯，這時我們了解到，整個歷史視野已經涵蓋住了整個的西方世界。

米西列有一個特出手法在日後經常被人借用，然而真正加以發揚光大的則是小說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法國小說家)。普魯斯特得自米西列的靈感甚多(雖然方式未必盡同)，特別是《索多姆與戈莫拉》(Sodomie et Gomorrhe)一書(譯按：即《追憶似水年華》第四冊)，他模仿米西列描寫某種衰落過程的方法，同時學習米西列的人物相對論描繪手法。米西列的重要歷史人物在不同的年代及不同的場合會給予人極為不同的印象——換言之，每一個人物在特定時刻場合所扮演的角色絕不會同於他們在別的時刻場合所扮演的角色，米西列在《法國大革命史》第五冊的結尾時這樣說：「歷史就是時間。」這句話簡直是針對普魯斯特而發，加上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俄國作家，著有《戰爭與和平》等書)對他的影響，他採用此種戲劇性對比手法巧妙呈現他的人物，好像經濟學圖表上的曲線，在時間中來回穿梭走動。米西列自己則很自然使用此一手法描繪他的歷史人物，因為他把自己投入社會的有機發展過程之中，他能夠看清當時人物的行事動機，然後與他們一起呼吸

並互相認同。他在人物的對比手法上和普魯斯特不同的一點是，他呈現個人價值隨著時間環境的變遷而有所發展變化，特別是大革命時期爲甚，個人的個性人格一樣跟著改變，由於社會和制度的變化，沒有人能置身度外。以伏爾泰爲例，他年輕時正處於急欲革新的舊王朝時代，看似聰明機靈，就像其他聰明的年輕人一樣，在宮廷中玩著結黨營私的遊戲；之後在一次決鬥中失敗逃往英國，從英國回來之後變成一個嚴肅的人，埋首寫作，不問世事；一度在他思想守舊的姪女影響下，陷入思想衰退期，在法國邊界上搞起自己的小宮廷，就像他之前唾棄的那個——後來又在社會上變得活躍起來，成爲人類啓蒙新良知的代表，爲西爾文(Pierre-Paul Sirven)和卡拉斯(Jean Calas)兩個案件翻案，因而名噪一時；最後，在他死後不久，一七九一年大革命的新一代將他的遺骨送進「先賢祠」(Panthéon)，以大革命的先知加以供奉，他似乎想都未曾想到。反看西哀士神父(Abbe Sieyès)這個人物，他在舊王朝時代發表論第三階級(Third Estate)的小冊子，風光而不可一世；可是一到了大革命時期，面對國民公會(Convention)時卻又顯得軟弱無能。拿破崙是另一個例子，米西列很不喜歡他，對他沒什麼好評價，他遠征埃及凱旋歸來時，在得意風光的處境下，把自己膨脹得偉大到不可一世的地步。

第四章

米西列要活在他的歷史裡

米西列對歷史的專注、對歷史題材的認同，使得他的成就無與倫比。他自己的情感和生平的遭遇經常闖入他的敘述之中，因此許多歷史事件看起來好像就是發生在他身上。普魯斯特曾爲此滑稽模仿米西列，這樣寫道：「這是我的長處，也是我的短處，而且，生命必須是這個樣子。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在位時，極權主義達到頂峰，幾乎扼殺了整個法國的自由。這兩年來——要寫超過一百年的歷史（二六八〇—一七八九）——真叫我頭疼不已，每天都想就此停筆不寫，還好，寫到一七八九年六月二十日網球場的宣誓（Oath of the Tennis Court）這一段時，才總算鬆了一口氣。」這只是普魯斯特的模仿文章，真正的情況則要從他的書信看出來：「我現在正在寫大革命中最難寫的一段，真是痛苦萬分。我已經寫到九月那個部分，修道院的大屠殺，死屍遍地，慘不忍睹，我現在正要前往革命法庭，也就是說，要去斷頭台那裡。」接著又寫道：「我現在來到了一個關鍵要點，我正要進入國民公會，我站在恐怖時期的門口，就在此時，內人也正準備要臨盆了。……這真是緊張的一刻，坦白說，我心裡非常害怕。」我們終於了解到，米西列把自己當做是穿越千年，爲自己打開一條出路的人類精神本身——忍受漫長的崩毀，在歡悅中凱旋重生，內心陷於毀滅性而又找不到出路的衝突交戰。因此，當他寫到一七九八年的時候（他自己就是在這一年出生），把自己的出生

當做事件加以記載，就好像自梅洛文王朝(Merovingian, 486-715，法蘭克王國第一個王朝)和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 梅洛文王朝之後，查理大帝所建的法蘭克王國)以降，所有的發展都是要走向這件事，我們也不會感到驚訝。而這樣寫法的效果倒也不會顯得怪異，反而十分自然，他想告訴我們的是：「在這種極致經驗的驅迫下，人們可以用另一種嶄新的視野去看過去發生的事情，而且也更了解我要告訴你們的。」

當然，人類歷史一旦已經發生過的，我們必然無法回頭再走進去，一個十九世紀的人絕對無法理解十六世紀的人心裡想的是什麼，我們無法重新塑造歷史的完整原貌。我們可以不關心過去發生的事情，卻不能不關心自己的時代所發生的事情，要關心自己的時代所發生的事情，就必須有所行動。

他採取幾個方向，首先，他所處理的題材相當龐大，經常無法適度控制範圍以至於超乎其能力之所能及。《法國史》區分為堂皇好幾大冊，每一冊皆各自處理不同之特殊題材，米西列引領我們來回穿梭幾個世紀，娓娓道來，有時卻又不免掛一漏萬，有所疏忽，主要還是因為他要說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他在其中一冊的序言中就很委婉說明他有時難免無法周到的理由，實在是出於歷史事實過於繁多蕪雜的緣故。他在書信中談到節縮成爲單冊的《法國史》時這樣說：「你無法想像要把幾百年的歷史濃縮成爲一本書，這有多難！」同時，他的科學精神讓他相當著迷於檔案室資料，他是寫大革命歷史的史家當中完全依賴第一手檔案資料的第一個人，後來不久市政廳燒燬時，他竟是唯一一手上握有當時革命自治團體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 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法國戰敗後，巴黎共和派人士於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到五月二十八日起義組成的革命組織，對抗保守的凡爾賽政府，最後以失敗、遭到屠殺告終)檔案資料的史家。他的學生莫諾(Gabriel Monod)爲他寫傳記時就抱怨說，他

給的參考資料不夠學術性。然而，最講究方法的泰涅和善妒的聖波浦(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 1804-1869)，法國文學評論家、作家)這兩位名家都不得不承認，即使米西列的方法和他們非常不一樣，他的作品依然極具價值。

其次，米西列走入歷史的方式，雖說可以引領我們像先前時代的人那樣去看他們的歷史，他卻經常要以後代人的智慧眼光去介入他正在敘述的歷史，他會警告、勸阻或甚至責備他的人物，卻無法左右他們。同時，他所處的時代也有許多事件吸引他的注意，他寫小冊子反對耶穌教會，努力維護革命傳統，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要保衛法國，根據莫諾的說法，他轉為喜歡當眾發表演說，他肯定歷史的教訓是告訴我們「行動原則」，以及製造「知識以外的其他東西——靈魂和意志」。他抱怨他一輩子從末能夠知行合一，他一直都在忙著從事超乎他能力範圍的艱鉅工作。他在信中如此寫道：「我永遠離開了和諧的道路，總結我這半生——像顆砲彈。」然而他筆下的歷史早已尋得脈絡，他也沒有因為行動而放棄歷史，甚至在一八四八年的時候，他對公共事務的熱情已然達到了高峰，他的朋友吉內投向政治活動時，他毅然放棄了政治而回去繼續寫他的歷史。如行為學家所說，他早年的生涯方針注定將他帶向獨立自主、文學、研究——他的頭髮早在二十五歲時就已經變白了。他後來再婚，對象是比他年輕許多的女人，年輕的妻子崇拜他，而且和他互相契合。我們從他的作品中獲得一個印象，覺得他從早年開始就是一個習慣孤獨生活的人。他半夜工作，陪伴他的是幾百年來已逝的死者，由他們賦與他力量 and 信心，然後再由他把這股力量 and 信心傳遞給活著的人們。

第五章

米西列夾在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

他在演講中和小冊子裡想告訴他們什麼？在他的一生當中，不斷有革命的呼號，但革命的傳統卻又不斷挫敗，他的結論是什麼？他認為人類進步該導向哪個方向，該如何展現出來？

一八四八年之前不久，即在動手寫《法國大革命史》之前，米西列曾經寫了一本小書，叫做《人民》(The People)。

書的前半部〈論奴役與怨恨〉(Of Slavery and Hate)主要在於分析當時的工業社會，作者仔細研究各個階級，並說明所有這些階級如何串在一起形成一個社會的經濟網——不管是剝削者還是被剝削者，其行為動機皆起源於爲了追求生存而不得不和鄰人敵對抗衡，無論其如何追求往上爬升，終究還是免不了衰落。農人永遠欠錢莊或律師債務，而且擔心土地被剝奪，他們羨慕工廠的工人。工廠的工人成天被機器束縛左右，時間上又不自由，他們羨慕商行的夥計，但是商行的夥計屬於他們的主人，是僕人同時也是工人，他們羨慕中產階級，但中產階級也並不輕鬆，特別是製造商，他們擔心貨物賣不出去，又要監督他們的雇員，怕他們怠工，兩者遂形成對立的局面，互相怨恨。商人有顧客的壓力，顧客總想占他們便宜，而他們想占製造商的便宜，希望弄來的東西物美價廉，他們的處境最爲尷尬，必須對顧客必恭必敬，又要防同行的競爭，大家互相怨恨。至於公務人員，待遇微

薄，卻又要努力追求尊嚴，他們不斷換工作環境，一方面要和商人一樣，必恭必敬，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自己的政治和宗教觀點和當局有所抵觸。最後，中產階級可以說是最缺乏公共精神的一群，他們的利益永遠和資本家互相掛鉤，另一方面又害怕共產黨，他們和群眾保持一定距離，把自己關在自己的階層之中，在偌大的房子當中，緊緊關住自己，陪伴他們的是空虛和淒涼。

接下來呢？《人民》一書的後半部並不如前半部那麼準確有力，從今天的眼光看來甚至是荒謬的。米西列和大多數十九世紀的作家一樣，宣揚某種福音時就笨態百出，這種情形我們在英國人身上屢見不鮮：拉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英國藝術評論家)論美，梅瑞底斯(George Meredith, 1828-1909，英國小說家、詩人)論自然，馬修·阿諾德(Mathew Arnold, 1822-1888，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人、評論家)論文化——這些名家說起教來都是大而無當，不但不知所云，簡直就是一派胡言。米西列依然不能免俗，他一離開他的歷史案牘，立即變成爲十九世紀蹩腳的自由主義者，說起話來頭頭是道，卻不免被許多事實所蒙蔽，充滿一廂情願的論調。他說，中產階級自我隔絕於廣大群眾，他們背叛了革命傳統，每一階級都在互相怨恨，那麼，怎麼辦呢？我們要有愛，像小孩子那般天真無邪，越純真越好，最好像傻瓜。還有，教育！富人和窮人要一起上學，富人不必驕矜，窮人也不必自卑，他們一起被教導對祖國要有信心。「這裡，」米西列不得不承認：「問題來了，有人會懷疑：我自己都沒信心了，如何給予人們信心？」他回答：「你要反躬自省，想想你的子女——法蘭西就在你身旁！」

接下來他的語調趨於嚴厲，但他自己並不很清楚他在說些什麼。「人依照其物質條件來形成其靈魂，多麼有意思！現在，這裡有一個窮人的靈魂，一個富人的靈魂，一個商人的靈魂。……：人似乎是他的環境的附屬品。」他對人民的概念很模糊，有時甚至很神秘，變成幾乎是人性的同義詞：「人

民，依其最高之概念而言，並非就是人群，依我觀察所得，真正的人民並非指某些階級而言，其最高形式只出現在某些天才之間，偉大的靈魂則附屬於其間。」

他反對社會主義：他認為法國的財富至目前為止分配得過於瑣碎，法國人的財富觀念很強。但是國家的財富卻操縱在公務人員手裡，這毋寧是噩夢一椿。不：中產階級和人民必須學習如何好好互愛。

接著是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事件，巴黎的無產階級由社會主義者領導和市政當局抗爭工作權，卻被中產階級鎮壓了下來。米西列在日記中寫道：「真是難堪的一天，我實在不應該寫《人民》這本書。」

但是他畢竟屬於他的時代，他看過許多政治制度失敗了，浪漫的理想主義頻頻向他招手，他卻要和社會混亂糾纏在一起。他在《人民》一書中這樣寫道：「不管是年輕還是年老，我們都累了，距離上回的大革命，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為什麼還不肯承認這點呢？……許多人和我一樣，經歷過一些不同階級和各種歷練，仍保有一顆赤子之心，但是在鬥爭中雖然使出渾身解數，卻仍不免迷失自己。」米西列專注於歷史著述之餘，還是不斷從事社會研究，並頻頻發表典型的十九世紀道德福音。《愛情》(Love)與《女人》(Women)一書顯然是他後來第二次婚姻生活的心得報告，在這之前他和女人的關係都不夠圓滿，但這次他似乎尋到了幸福，他在書中不斷呼籲法國人要注重家庭，並且尊重婚姻生活的神聖性，後來有人告訴他說因為他這本書，許多妓院都被迫關門大吉，他聽了之後還滿高興的。《兒子們》(Our Sons)一書箭頭則指向教育，每個時代的自由主義者都把所有希望寄託在教育上面，米西列自然不能免俗；《人性的聖經》(The Bible of Humanity)一書則企圖結合舊有宗教的一切優點，由此提供一種新的宗教倫理——我們這個時代仍然有許多人在幹這種事情。

米西列的本性中一直存在著互相對抗的正反兩極，正極的力量不斷帶領他對抗負極，他後期所寫的歷史因而顯出了一種不同凡響的力量，他在拿破崙三世的壓迫下固然也寫出一些平凡的敗作，特別是處理舊王朝滅亡之前的那段歷史，但大抵而言，他這時的寫作風格早已脫離浪漫主義囉哩累贅的文學風格，而重新回到他早期最崇拜的羅馬時代史家塔西特斯（Tacitus）的雄渾簡潔風格。他在此以一種簡潔尖銳的筆調，兼具斯湯達爾（Stendhal, 1783-1842，法國小說家，十九世紀法國現實主義文學先驅，代表作有《紅與黑》）的冷靜文風，寫出當時的政治腐敗，寫出政治犯的悲慘下場，路易十四對新教徒的迫害殺戮，許多修女在陰暗而沒有通風的監獄中活活被悶死，他寫這些時充滿悲哀沈重的筆調——許多靈魂受苦受難，許多寶貴生命白白犧牲掉，全都湮沒在歷史的深淵中，讀這些片段的歷史，真要叫人捲卷慨嘆。這段時期的米西列也對自然的歷史產生了相當濃厚的興趣——主要是由他的第二任妻子所引起，她在這方面相當熱心——研究的結果，也出版了幾本如《論昆蟲》（*The Insect*）及《論鳥》（*The Bird*）之類的著作，他談到了自然的演進和歷史發展的關係，他發現人類在歷史中的許多行為，和自然界中鳥和昆蟲的行為，居然有許多共通的地方，此時正是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英國博物學家，演化論創始者）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和自然主義風行的時刻。

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曾帶給米西列相當大的衝擊，普魯士軍隊入侵法國之時他剛好在外省，他聽說法軍潰敗了便急著想趕回巴黎，他覺得他人如果在巴黎，也許多少還有用處。巴黎淪陷之時，他住屋周圍的房子都被燒燬了，他的房間卻安然無恙，只有他的坐椅被燒焦而已。他當時已經七十二歲，為了安全起見，還是趁普軍大舉入侵之前趕快逃離了巴黎。

早在普法戰爭爆發之前，他已經和馬克思及恩格斯等一千人簽署了國際和平宣言，此時他更寫

了一本小冊子叫做《法國在歐洲之前》(France Before Europe)，在書中他呼籲「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組織一個武裝的和平聯盟」。他在此顯然把法國的處境和其他地區的處境混淆在一起了，「偉大的勞工團體，勤勉勞動的所有國家的工人們，大家要聯合武裝起來跟死亡的威脅抗爭，那就是普魯士和俄羅斯的軍國主義。」他盛讚至目前為止革命活動進行得很溫和，只死了一個人。社會主義者相當有節制，社會主義也只是地區性的活動，一千萬的工人和兩千六百萬的農人相比，數目上仍差一大截，而第二帝國主要也是由農人支撐起來。不過，所有階級要建立一種手足情誼，法蘭西不必畏懼「社會問題」。

不久之後，米西列移居義大利比薩(Pisa)躲避戰禍，這時傳來法國投降的消息，緊接著巴黎公社成立，他中風了。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看到工人的反動，而這次共產黨政府則盤據巴黎達兩個半月之久。在凡爾賽的中產階級政府處決了所有的人犯，巴黎公社則屠殺掉中產階級的人質，這裡頭包括了巴黎的大主教。中產階級政府緊接著圍攻巴黎，共產黨不甘示弱，迎頭奮戰，並燒掉市內公共建築，雙方激戰達八天之久，共產黨不支而潰敗，中產階級進城大肆屠殺男女達兩萬至三萬人之譜。這場內戰的消息傳到米西列那裡時，又引起了他第二度中風，這次相當嚴重，變成半身不遂。但他努力恢復健康，他要繼續工作，他逃離巴黎時資料都有隨身攜帶，他又開始奮力撰寫他的歷史，上回寫到大革命中的羅伯斯比這個人物。米西列最後這幾冊歷史不但寫來充滿陰霾，而且苦澀。雖然他的歷史觀念是有機的，把人性當做一個總體看待，但是當他在處理人性的行為反應時，他總是免不了牽涉到一個主題：國家。但他的國家主義觀念是特別的，使他把「祖國」和革命傳統畫上等號，特別是在法國。法國以革命之名，打算領導並啓蒙全世界。但是，米西列所關注、以國家共同利益和目標為號召的老式國家主義——早在聖女貞德時代便已出現，而在一七八九年的聯盟

軍身上鮮明體現——此時卻有了變化，那就是近代的帝國主義。首先是拿破崙，接著是拿破崙三世，他們都是大革命的叛徒，在米西列眼中看來，他們都是理想國家主義的破壞者，因此，他的最後幾冊歷史努力著要重新發揚光大老式的國家主義觀念，他在其中一冊的序中寫道：「我出生時正經歷一場土地的革命，然後一生當中則目睹著工業革命的洗禮。我出生時是巴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 1760-1797, 參見本書第九章)的恐懼，一路活過來則是目睹國際主義的恐懼。」十九世紀的歷史，他用三個名詞加以總結：工業主義、軍國主義及社會主義。

他的年紀已經老邁，再也寫不下去了，寫到拿破崙的放逐終於只得宣告棄筆。他最後一冊的最後幾句話像一則墓誌銘，他寫道：「他們把他放逐到聖赫勒拿島(Saint Helena)實在是一樁大錯誤——這麼一個崇高而醒目的舞台，讓這個惡棍可以把自己鑿造成被綁在高加索山受難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 希臘神話中的天神，因盜取天火給人類而觸怒宙斯，被綁在高加索山上，後由赫丘力士救出)，他會利用群眾的同情，並且說盡好聽的謊言準備捲土重來，帶給帝國另一場血腥災難。」這的確是一則墓誌銘，因為米西列在寫完這些不久之後，心臟衰竭死了(一八七四年二月九日)，享年七十六歲，他最後幾冊歷史在他死後才出版。他很想再繼續寫下去，但是卻死了，死得倒是時候，他的故事以及他當代發生的事件，都剛好告一個段落，接下來的歷史必須用另一個新的觀點去看。我們很難想像，他如果繼續活下去，面對第三共和，不知會作何感想？

然而，他的作品卻是完整的；我們從今天的眼光去看，他突然把筆觸停在那個地方，就作品的藝術性而言，可以說相當勻稱圓滿。最前面幾個世紀寫野蠻的時代步調顯得較快，然後進入近代的國家主義，筆鋒轉向聖女貞德；之後，啓蒙與追求獨立的國際潮流——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使得故事發展超出了原定架構(或者應更確切的說，是把義大利和德國放進了原定架構)；文藝復興之

後，他的步調開始放慢了，寫作的視野也寬廣了，我們看到法國的統一、法國國家主義的強化，另一種新的文藝復興於焉誕生，到法國大革命而達到高潮；這時寫作的規模變龐大，我們看到了每個人物心裡的想法，這時候的一天可能比中世紀時的一世紀還長；當這齣偉大的戲劇落幕之後，步調又變快了，同時更展現另一層寬廣的視野；革命大戲及國家史詩的目標都達成了。我在此無意詮釋歷史，也無意為米西列說明什麼，我只是在抒發讀米西列的感想而已。他身處一個變化多端的時代，多采多姿的個人生涯，竟而把歷史寫得那麼巧妙圓滿，我們看到他如何將國家主義的理想妥協於人類生活的關心上面。

《法國史》的確是一部充滿想像熱忱的偉大傑作，無可匹敵——透過無限的努力去描述並詮釋一個近代國家的發展過程，沒有任何一本別的書可以讓我們在讀完時覺得自己曾經活在裡面，和多少個世代的人們有過一種親密的神交。我們同時更進一步體會到：我們自己正是這則故事的最後一章，另外的下面一章則等待著我們去創造。

但是，要創造什麼？要如何去創造呢？米西列無法告訴我們，他的智慧光芒早已隱沒在他那朦朧而又辛辣的華麗文體之中了。

第六章

大革命傳統的式微：雷南

「你手上握有一樣稀罕的東西，」米西列有一次對一位年輕作家這樣說：「這是其他人（其他的文學人士）所缺乏的：對人們及其體液的感覺。就我自己而言，我最近重讀上回寄給你的東西（《法國大革命史》第一冊），我發覺我多麼缺乏這個。……我的詩作過於晦澀，無法博得大眾的欣賞。」

法國的中產階級在大革命中從封建貴族的手裡奪得了權力，經過一番自我調整以及保皇派的反動和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派的挑戰之後，終於還是成爲統治階層，但是這中間經過或多或少保皇派、拿破崙派，以及教士的騷擾之後，其革命傳統卻衰微了下來，「革命」這個字眼反而變成工人階級在底下反抗壓迫所使用的口號。十九世紀的法國是一個偉大的文學時代，其在小說和歷史方面的成就可比之於英國伊莉莎白(Elizabeth)時代的詩或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繪畫，但是細察其文學的內涵，即使有不少是源於社會的觀察，卻已經不再是革命的文學了，啓蒙時代的餘韻固然還在，卻少了政治方面的熱忱，特別是浪漫主義運動以後，其文學觀念變成著重於細膩巧工，而拋棄十八世紀的優雅雄渾及講究技巧。米西列則挺身努力於維護大革命的傳統，並以創作這種文學的代言人自居。他有小說家的敏銳洞察力，有強烈的社會意識和道德感，加上他的藝術鑑賞力和寫作才華，他的作品應該有相當程度的可讀性，即使不同意他的看法，大約也不至於排斥他才對。

然而，事實是他很快即喪失了魅力，一八九八年大家在紀念他的百年誕辰時，有人寫了一篇文章題名為〈爲什麼不再有人讀米西列〉(Why Michelet Is No Longer Read)，並認爲紀念他的百年誕辰並不恰當，他說，大家不再讀米西列，因爲沒有人能夠了解他，在一八五〇年的時代，他固然不乏眾多追隨者，但時過境遷，十九世紀末的年輕一代對世界充滿疑慮，沒有人相信他的熱情和信念。誠然，米西列創造了大革命的宗教，但大革命現在已經不流行了，因爲其功過已經有了定位，人們一想到雅克賓黨的恐怖作風就退避三舍，而且，米西列一向喜歡攻擊教會，而現在教會正受到相當的尊敬。

我們不妨好好看他一眼，這是古提爾(Thomas Couture)爲他畫的一張像：一八四二年，米西列時年四十又四，樣子看起來意志堅定，但面部表情似乎繃緊了些——一張長長的平民嘴巴，充滿自信的下巴，嘴巴緊閉，鼻子很挺，鼻孔微張，顯得堅毅豪放，眼神深邃而尖銳，顯示出內在精神的廣闊圓滿，眉毛沈重有如一雙翅膀，那是持續努力用功的記號。

現在我們來看雷南和泰涅這兩個。對米西列來說，是人創造了面具來掩蓋本來面目。但在這兩個人的情況，是專業身分創造面具遮掩本來面目。雷南的肚子很大，肥碩的雙手，臉蛋圓圓胖胖的，一雙眼皮往下垂著——這是當時法國天主教士中最聰明、最誠實的一位，但骨子裡還是一位教士；泰涅戴眼鏡，眼鏡後面是一雙大近視眼，頭是禿的，下唇蓄有一撮稀疏的小鬍子，一雙活潑的眉毛——這是當時法國大學教授中最聰明的一位，但從頭到腳還是一位教授。米西列身處一個紛亂卻充滿熱情的世代，他憑著毅力鍛造出自己的特出個性，並建立起自己的學問招牌和地位。雷南和泰涅和他多少有些不同，他們屬於博學多才的一群，但相同的一點是，他們都超越個人的利害考量在追求真理：雷南起先學習神學想當教士，可是當他發現他無法接受教會所編撰的歷史時，就毅然

脫下袂綵離開神學院，特別是他寫出惡名昭彰的《耶穌傳》(Life of Jesus)一書之後，更使他喪失了法蘭西皇家學院的席位。泰涅的情況一樣，他的物質原則不斷與他的學院上司互相抵觸，最後只得掛冠求去，與教職永遠絕緣。雖然如此，他們不久卻為社會大眾所接納，最後還成為法蘭西學會(Academie Française)的成員(小說家福樓拜提到雷南時如此說：「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而在這幾年之前，米西列和吉內的遺骨已經堂堂移入了先賢祠。

雷南和泰涅的時代比米西列晚大約二至三十年左右，他們都受到米西列的影響，把學問和創作才華結合在一起，努力於重新創造過去。雷南告訴我們他在學校讀書讀到米西列寫的歷史時興奮的情況：「我看到歷史從水泥的裂縫中向我奔過來。……我發現神學院外的俗人中也有那麼嚴肅和有學問的，這真令我驚訝，我看到教會和古典的外面存在著某些別的事物……對我而言，路易十四之死不再是世界末日了。有許多觀點和看法在古典中或十七世紀裡，都是從未出現過的。」

三年後雷南離開神學院，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跟著爆發，他說：「社會主義的問題好像突然之間從土地中冒了出來，震撼了整個世界。」他寫了一本書叫做《科學的未來》(The Future of Science)，大談這方面的問題，他以十八世紀的思想為基礎呈現他的進步觀念，卻充滿說教的口吻，像是教堂裡講壇上的福音傳播。他說，人性所要求的，不是政治口號或是官僚體系的改變，而是「道德和信念」。歷史學家提耶利(Augustin Thierly)及其他一些人認為這本書對群眾而言，過於「大膽」，他們認為他應該用「拐彎抹角」的手法呈現他的論調會較好一些，這本書遂壓著不敢發表，四十年後，這本書正式出版時，雷南說：「法國人喜歡清晰和謹慎，但這有時不免限制住思想的宣洩，當時對我而言，實在是縛手縛腳。法文只適於表達清晰的思想，可是一些最重要的法則，比如左右生命之變遷者，卻都是曖昧不明的。其實，法國人早就了解達爾文主義的論調，但卻是要等到最後才願意加以接受，

他們早就了解這些，但是在其語言結構中卻老是把這個排斥在外。因此，法國人並不看重珍貴的真理，並不是他們不懂，而是認為無用或不好表達。」法國的中產階級一向對政治社會的問題很冷漠，雷南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期待進步，但是卻只能寄望在科學方面，至於政治，如同法國自然主義者對待達爾文主義的態度，雷南認為不必太過期望。米西列因為不肯承認拿破崙三世的王位而丟掉飯碗，雷南認為不值得：「我的看法是，只有那些前朝的政府人員才有必要這麼做，……或是那些準備反抗他的人，如果是出於正義良心，我認為大可不必。除了剝奪公職人員的職位之外，其他的所作所為才真正有必要加以正視。……至於我自己，我承認我並沒有重要到被解除職位，只不過讓我看得更清楚的一點是，最好遠離政治，我們不想貪圖好處，也不想有什麼負擔。」

雖然如此，雷南卻是理想的公職人員，一八六九年（普法戰爭前一年）他在眾議院大聲疾呼：「不要革命，不要戰爭，戰爭和革命一樣糟。」當普法戰爭在進行，巴黎已經被包圍之時，他站在一個不受歡迎的陣線上，他主張和談。

一八七〇年之後，法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處境變得很尷尬，他們既是戰敗國的統治階級，同時卻又在屈辱中占盡許多便宜，這個弔詭衍生出許多奇怪心態。愛德蒙·龔固爾(Edmond de Goncourt)在日記中曾經提到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期間的雷南——我們看到他稱讚德國人，因為他的學問有很多是得自他們，他的朋友為此和他爭吵不休；他揮動兩隻短手，朗誦著聖經以對抗那些預言法國終將復仇的先知；他認為對「理想主義者」而言，天主教的教義超越在愛國主義的情感之上，並強調「理想主義者的祖國乃是能夠自由思想的國家」。有一天，他站在窗口看到一個法國軍團從他面前經過，群眾正夾道歡呼著，他轉身輕蔑地說：「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是有美德的！」

可是，雷南眼中的美德是什麼呢？他憑據什麼去定義美德呢？雷南的作品乍看有些戲謔，其實背後是相當嚴肅的。他的美德觀念來自什麼派別呢？簡單的講，來自他的宗教訓練：責任感以及自負，但是後者卻促使他以一種無比的道德勇氣和教會攤牌，他說，天主教義及教士的訓練逼使他看輕愛國主義，似乎是這種美德誘使他反對愛國主義，成爲一種自圓其說的藉口。雖然他最早醉心於啓蒙運動的哲學，並以此對聖經發出科學性的批判，以補充伏爾泰的不足論點，可是，前文已經述及，啓蒙運動的精神在當時早已被大權在握的法國中產階級糟蹋了，雷南的美德觀念逐漸淪於架空，與米西列背道而馳。他在一本書的序言中曾經爲道德節操列等級，聖徒排在第一位，而行動的人則排在最後。他說，高尚的道德一付諸行動之時必然要大打折扣，因爲這個世界並不完美。這個觀念引起了米西列的注意，他駁斥道：「我們的朋友雷南極力宣揚的這個觀念實在很糟，被動式的內在自由，忙著尋求個人的救贖，這可能會給這個世界帶來災難。」一八八四年法蘭西學院頒大獎章給米西列、吉內以及米基維茲等三個人以表揚其生前之功績，雷南發表的講詞和米西列以前的強硬口吻則形成一有趣對比。他說他只是強調安靜追求真理的重要性，也許這個世界紛擾不斷，我們還是必須拿出對策來，最後他甚至還糾正自己，他說：「我們要面對戰爭，和平並不屬於我們。」然而，街上暴動者和書齋裡學者之間的關係至此終於消失瓦解了。

在《基督教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一書中，雷南透過他所敘述的故事，充分表明了他對當時所處時代的態度。不管在任何意義上，該書以古代世界的式微、基督宗教的興起爲題材，都稱得上是公正適切。對普遍包容與公平正義的追求，是雷南最令人印象深刻之處。然而，這本書的藝術形式和行文落筆都免不了有其偏見；故事還沒有寫完，雷南的公正天平早就失去了平衡。《基督教的起源》這套書第一冊描寫耶穌的生平，最後一冊則以描寫羅馬皇帝奧理略(Marcus Aurelius, 121

1100, 羅馬皇帝、新斯多噶學派哲學主要代表人物)收尾,坦白說,寫奧理略的部分比寫耶穌的部分好得多。對我來說,龔固爾稱爲「費奈隆式(Fénelonized)的米西列」(費奈隆是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的天主教神學家,因其著作被教宗譴責而退隱)的這本《耶穌傳》,一直是最不成功的。雷南把耶穌描寫成一個「迷人的醫生」,有意把他寫成是雷南的化身,反而故意淡化世人最熟悉和最津津樂道的悲劇部分。他對使徒保羅(Paul)的描寫反而較爲成功,但卻叫我們不喜歡他這個人,我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保羅來到雅典傳播基督教的福音時,聖經上的描寫應該是,他對著希臘雕像大喊:「啊,純潔可愛的形象!」雷南卻讓他改口說:「眾男女真神們!那位醜陋的小猶太人(指耶穌)已經把你們烙上了偶像的標記啦!」接著他把啓示錄(Apocalypse, 基督新約聖經最後一卷)描寫成是基督徒反對羅馬帝國的一篇檄文,一開始他即以諷刺性筆調批判使徒約翰(John)不該選擇帕特摩斯(Patmos)小島唱出如〈達弗妮絲與克洛埃〉(Daphnis and Chloe)這一類的古典牧歌,藉此來強調他刻意經營的怪異美學。雷南曾經花費不少功夫在猶太文學上面,他發現他們的道德意識一點都無法引發他的共鳴。當我們讀到奧理略皇帝這個部分時,我們發現雷南對希臘羅馬文化的偏愛實在是多於對基督徒事蹟的關注。早在二十年前寫《耶穌傳》時,他的態度並非如此,他那時候這樣寫道:「奧理略和他的貴族們對後世並沒什麼貢獻,奧理略死的時候,只留下幾本好書,一個不肖子,以及一個搖搖欲墜的帝國。耶穌至少留給後人珍貴的道德教訓,對大多數人而言,哲學並沒什麼用處,聖人的教訓才有用。」但是在《基督教的起源》中的奧理略部分(一八八一年出版),他的筆鋒卻已有了變化,他認爲羅馬人透過他們的立法改革,多少已經接納基督教福音,並將人道原則付諸實際行動,那麼,我們不禁要自問,我們還需要基督教嗎?一個高度發展的社會不是自己會自然達到這個地步嗎?奧理略擁有耶穌一切愛的美德,是個標準的羅馬紳士,他除了要對人類的事務苦思焦慮之外,還要應

付帝國許多吃力的戰爭，他可以說正是一八七〇年之後法國知識分子的最佳典範——對政治傳統的覺醒，對國家的外侮不痛不癢，厭惡當代的潮流，但同時卻又要堅持好好教養自己，努力追求個人的目標理想。「他（奧理略）和我們一樣，把美德建立在理性和本性上面。聖路易（Saint Louis, 1214-1270-即法王路易九世，發動兩次十字軍東征，死於第二次東征途中，死後被追封為聖徒）是個很有美德的人，依照他那個時代的觀念而言，也是個偉大的君王，因為他是個基督教徒；奧理略是個最值得讚賞的人，並非因為他是異教徒，而是因為他是個已經解放了的自由人。他是人類天性的榮耀，而不屬於任何特定宗教。……他實現了最完美的良善，最絕對的寬容，對同情和責難皆不屑一顧。』在惡劣和不義的人群中生活，要懂得認命——這是這位聖人的生涯規劃。他是對的，最堅固的良善必須建立在全然的漠視上面，並且認清楚這世上的一切都是虛幻無常的。……世界上沒有比這個更值得讚美的了，直到今天還是。」這種道德原則讀起來真是迷人，但是對雷南那個時代的人而言，實在是失望多於鼓勵。當一個教士不得不訴諸奧理略的禁欲主義——一開始告訴我們聖人的價值在所有人之上，後來標舉為典範的聖人卻像個有所行動但對行動的價值缺乏信心的凡人——他還能找到什麼樣的鬥士來捍衛他的信仰呢？

雷南畢竟還是堅持完成了他的歷史著作。《基督教的起源》無疑是一部傑作——也許在闡述歷史概念方面是最傑出的一部。雷南要告訴我們的，讓我們得以謹記於心的是，所有的教條、觀念以及象徵的東西，在不同時代以及不同的人手上，這些東西會不斷修正變化的，他以一種無人能及的敏銳智慧娓娓道出耶穌的故事和教訓如何在歷史遞嬗中，不斷的變化並揉合成為嶄新的東西：使徒所傳播的基督教已經不是耶穌的基督教，聖經中的基督教早已在希臘人或猶太人的手上有過一番修正，羅馬皇帝尼祿時代的基督教和猶太地區的原始基督教已經十分不同了。我們今天所獲得的觀念

像幾條源遠流長的細絲，互相交結在一起，實在值得去仔細分析研究。

但我們要注意的是，雷南主要在於強調宗教和哲學觀念的相對性，米西列身上也有相對性——他的人物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下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其固有價值則恆常如一。在雷南眼中看來，後面幾代的時光中，價值觀念卻已經不是那麼穩定了，我們聽到他說：「我們要認清楚這世上的一切都是虛幻無常的。」對米西列而言，觀念的運作只是人類歷史活動中的一環而已，雷南則認為觀念是歷史的重心，其他都是背景的陪襯——觀念就像是框架中一張織成的網，我們要探向網的核心。雷南透過宗教題材帶領我們遨遊在古代的智慧之中，去體驗當時的社會氣氛和思想結晶，《基督教的起源》一書固然還是遵循米西列的有機歷史寫法，但是雷南的歷史已經不是純然人類活動歷史，而是人類思想觀念的歷史。

第七章

大革命傳統的式微：泰涅

雷南的風格帶有某種頹廢的傾向，在當時頗受歡迎。他始終認為當代的法國文學應該回到十七世紀的語言，只有古典詞彙才足以表達當代的情感和思想，他自己的風格即充分展現古典格調的明朗嚴謹，然而即使他的語言十分準確，他的作品卻給予人一種朦朧不清的感覺。和米西列相較，米西列的語言顯得很嚴密，有活力和熱情，雷南的文風就顯得有些蒼白了，他缺乏一種鮮明的訴求，我們如果長時間坐著讀他的作品，恐怕不久就要支撐不住而昏昏欲睡了。

泰涅的效果則十分不同，泰涅不想走入過去，他帶著當時的時代往前走，正因為如此，他適巧就展現了當時一些最不迷人的特性，我們讀他的作品，立即在他的形式和風格中感受到十九世紀中產階級的許多特點，即使尚未往下讀，光打開書本，這種風味就已經很強烈了。

亞米埃(Henri-Frédéric Amiel, 1821-1881，瑞士日記體作家、哲學教授)這樣批評泰涅：「這個作家對我而言，有一種難堪的效果，好像滑輪滑動的聲音，像機器轉動的聲音，有一種實驗室的味道。」他的批評實在很有道理，泰涅可以說正是當時偉大機械風格的絕佳代表，他的作品有一種機械式的不屈不撓準確性和單調的力量，他有一種敏銳的天賦才能，對時代頻頻發出疑惑的質詢，這使得他的作品充滿自負堅硬的語調，和當代中產階級連成一氣，互相唱和，而中產階級的財富來源正是機

器。就這方面而言，他和麥考萊 (Lord Macaulay, 1800-1859, 英國政治家、歷史學家) 很像，他有一段時間還對麥考萊敬佩得五體投地，但他所敬佩的已經是十九世紀後半期的麥考萊，是時麥考萊在心智方面早已轉向哲學，對當時的時代充滿嫌惡，取代了原先的樂觀傾向。令人費解的是，泰涅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章專論麥考萊，責備他犯的一些錯誤，而這些錯誤其實正是他自己正在重蹈覆轍的東西。泰涅一向堅持自然主義的客觀性，最後還是不免和麥考萊一樣，全面倒向中產階級的道德領域，他理直氣壯批判麥考萊的，正是他自己最明顯的缺點。

我們這裡並非指頹廢而言，泰涅使用繁複的句子，冗長的段落，浩大的篇幅，他想傳達的無非是正蒸蒸日上的中產階級訊息而已，但這之間卻多少摒除了人性的成分，正好暴露了泰涅品味能力之不足。他彷彿就像是工廠的加工業不斷努力製造產品，目的就是爲了把客廳裝飾得更好看，他不斷在作品中大量引用比喻的手法，誠然這種手法有時確有其高明之處，但大多數時候還是顯得矯揉造作，甚至是荒謬笨拙。他寫到伏爾泰時這樣說道：「這個人是空氣和火焰的化身，沒有人能比他更有活力，他身上的原子比任何人更具爆炸性。沒有人的心智結構像他那麼優美，但同時卻又那麼不穩定和那麼真實。我們可以拿他來和準確的秤盤相比，這種秤盤很敏感，不容許一點點的氣息吹在上面，但除了這個，其他構造則是很馬虎粗糙。只有很輕的重量才容許置到這種秤盤上面，很小的物品才行，這時候，其準確性就百分之百了。」比喻得真有意思，至少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伏爾泰的特質，而這正是我們從來不知道的。我們再看看他的另一個比喻：「我把十八世紀比成坐在飯桌旁等吃飯的一群人，我們不只要把食物端到他們面前，還要把食物弄得很好吃，容易咀嚼，又容易消化，這必須是一道特別烹調的好菜。他們都很貪吃，也很挑剔，我們要把菜做得很芳香可口，用感性讓他們胃口大開。」問題是，爲什麼只爲了要讓我們知道十八世紀的寫作是用「鹽和香

料」調味，就得告訴我們這麼多？「智慧得靠機靈調味」是眾人皆知的觀念；泰涅需要的是簡潔的文字。但不管怎麼樣，泰涅很殷勤爲我們擺設一個宴席，我們起先擔心菜色不對胃口，結果泰涅卻以「感性」叫客人們「開了胃」，埋頭大吃起精心調理的食物。不久之後，他在《當代法國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ontemporary France)一書中論《革命政府》(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的那個部分，才真正讓我們領教文學上最蹩腳的比喻手法，泰涅要生動描繪出法國在大革命時的險惡處境，許多聰明才智之士不是被處決就是放逐或躲起來，只剩下愚蠢和殘酷之輩在當權，他這樣寫道：「完全顛倒了，革命政府控制下的法國，好比一個人用頭走路，用腳在思想。」他覺得這樣比喻很有意思，我們往下讀到下一章，一開頭還是這樣寫著：「想想看，一個人用頭走路，用腳思想。」——然後有半頁的篇幅都在談這個。我們不妨拿泰涅和米西列作比較，米西列的意象顯然更爲深刻自然，讓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他會這樣寫：文藝復興劃分爲二，有如先知以賽亞(Isaiah)；大革命被投機者暗中破壞，有如拉洛瑟爾(La Rochelle)地區的白蟻在啃蝕；俄國沙皇和瑞典國王傾巢南下有如兩隻北極熊，撼動著歐洲的房子；被恐懼凍僵而說不出來的話，在國民公會的空氣中漸漸解凍了；十八世紀的法語像光一般在世界各地旅行……等等不一而足。

泰涅僅及於表面的功夫，這和米西列十分不同，即使和雷南相較，也是不可同日而語，泰涅只是呈現表面的事物而已。我們回頭看米西列，我們看他的作品絕對不是只有表面，他的筆鋒觸及到社會底層的複雜面並觸及到事物的本質，他首先抓住人和事件，然後才全面揭開歷史，有如奧德修斯(Odysseus，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的主角，在特洛伊戰爭中獻木馬計使希臘軍獲勝)和千變萬化的海神奮戰，先抓住身體，然後一一擊破其各種變形。米西列透過這種辛苦而不穩定的掙扎，最後寫出一種充滿創意的文學形式，他沒有現成的觀念可資運用，他的觀念都是經過苦思焦慮的結果，他

除了表面的功夫，更有底層的激烈波動。雷南和泰涅描寫歷史則沒有這種深刻的功夫，他們只是把人類生活混亂的一面整理出來，卻不肯自己走進去，始終與之保持距離。雷南從來不肯接近激烈的事件或感情，因為他怕安穩的生活受到干擾。泰涅則把歷史放進機器攪拌，讓歷史現象自己流出來，所以同一事件的所有案例都歸納在同一個章節，他以大而化之的手法處理歷史，不在他一般性的歸納範圍之內的事件，就一概不會出現，這的確只有表面功夫，不可能看得到深度。不過，透過他那獨特的機器，泰涅倒也製造出了一篇有價值的論文。

在一八五〇年左右長大成人的法國那一代藝術家和思想家，沒有人會對政治有興趣。拿破崙三世在一八五一年引發的那場政變把他們推向了絕望沮喪的深淵。許多人不肯宣誓效忠拿破崙三世，泰涅和雷南一樣不願意捲入這場爭論。他主張選民有權把權力賦予合適的人選，儘管這些選民是群蠢蛋；而如果他像他這種異議分子不服從多數人的決定，那無異於叛亂行爲——他暗示這種行爲極爲不妥，等於和整個社會爲敵。然而，他還是拒絕簽署一份要求大學教授表示「謝恩」與「虔敬效忠」的文件。他寫信給一位朋友這樣說：「我們大概十年之內都不能涉足政治，唯一的出路只有純文學或純科學。」

許多人和泰涅一樣，逐漸遠離了浪漫主義，遠離了革命的熱誠，完全拋棄了十九世紀初澎湃一時的熱烈情感，他們慢慢傾向於追求客觀性的理想以及準確的科學性觀察，也就是所謂的自然主義。雷南和泰涅故意表現出脫離米西列的陣營，然後大談科學，對泰涅而言，在歷史科學方面，他並不如米西列那般醉心於追求人性，一八五二年他寫出了他的志向，「要把歷史當做像生理學和解剖學那樣的有機科學來處理。」一八五六年他在《論泰德斯·李維》(Essay on Titus Livy)一書的序文中這樣說：「斯賓諾莎(Spinoza, 1632-1677, 荷蘭哲學家)說，人存在於自然之中，不是王國中的王國，而是整體的

一個部分，而精神機器——也就是我們的存有——的運動，就和他所處的物質世界一樣，都要遵守定律的規範。」這裡的問題不再是人性自我創造以及自由對抗宿命的問題，而是一個機器如何在另一個機器中運轉的問題。一八六三年泰涅出版《英國文學史》(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一書，在那篇著名的序言中，他完整闡明了他的哲學觀點及寫作方針：文學作品的處理方式「和其他學科沒有兩樣，唯一的問題是力學的問題——構成文學作品的種種力量，其大小與方向共同複合成文學作品的整體效果」。道德問題和物理問題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道德沒有精確工具可做量的測度。但「道德和邪惡正如同硫酸鹽和糖」，而所有的文學作品皆可透過對種族、時代背景及重大事件去加以分析。

由這樣的理論所產生出來的文學批評可能會很枯燥乏味，但是泰涅的文學知識豐富，且善於將文學事件加以戲劇化。他把文學作品看成是各個時代和民族的結晶，如果用米西列「完整重建過去」的標準來看，泰涅極出色的完成了其中一個部分，對後世的文學批評可以說貢獻良多。從他所使用的方法看，我們可能會以為他只打算分析出文學作品中的化學性成分；事實不然，他把文學作品看成是一種標本，而且很高興讓我們看看他的標本。不過，泰涅的興趣也不純粹是動物學的。泰涅具有某種強烈的道德觀念，因此特別偏愛英國文學。雖然「受不了」約翰生博士(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國作家、評論家、辭書編纂者)，但他喜歡以清教徒的口吻嘲弄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復辟時代的淺薄無聊，他做得最好的一次是以密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英國詩人)在《失樂園》(Paradise Lost)中對著墮落天使咆哮的吼聲，來介紹復辟時代的劇作家。不過，他寫得最好的、儼然有批評大家風範的一章，就是拿法國詩人繆塞(Alfred de Musset, 1810-1857)和英國詩人但尼生互相比較的一章，把英國式的道德觀寫得糟不可言：

我們想像他們那位大詩人（但尼生）正在瓦特島（Wight）上享受他的生活，他正埋首於寫過時的史詩自娛，每天陪伴他的是一堆好書，一群朋友，以及忍冬花和玫瑰花，多麼愜意的生活！沒關係，我們看看我們這邊這位詩人（繆塞），雖然處境齷齪悲慘，卻要比他高明得多，我們的詩人在懷疑和絕望的處境中，看得更高更遠，他望向無止境的永恆，好像站在暴風雨中的懸崖上，注視著海浪滔天的海洋。宗教的榮光和敗壞，人類的掙扎和命運，這些世俗的一切，在他眼中看來不過像是曇花一現，他感到內在深沈情感的風暴，遠大的夢想以及強烈的喜悅，他依賴這些而活。他不只是業餘行家，光體驗這些並不够，他要創造，他要在全人類思想中蓋上戳記，他要告訴世人，人是什麼，以及什麼才是愛、幸福、真理。他受苦受難，但他不會停止想像；他體力不支，但他不會停止創造；他堅持自己的信念勇往直前，在世人面前挺身而立，活生生血淋淋的。這世上只有一件事值得人拚全力去追求，那就是努力去實現我們全心全意相信的真理。世人讚賞但尼生，卻忽略我們這位布爾喬亞和波西米亞的貴族，不過我要說的是，我比較喜歡繆塞。

這篇文章不只是在為繆塞辯護，同時也是為泰涅自己辯護，這裡充滿知性英雄主義的吶喊，他不斷強調繆塞的理念，其實那也正是他自己的理念，他的目的無非只是想博取我們對他的尊敬。在此我們似乎有必要回頭看看他其他書中所描寫的一八三〇年的時代（他生於一八一八年），除了他自己認為曾經獻身的「純粹科學」的理想之外，他認為第二帝國時代的法國在道德思想層次上實在是乏善可陳，他學習解剖學和心理學，也到精神病院實習，但不久他發現這似乎與他的心性不合，旋即改弦易轍，莫名其妙投入他的機械宇宙之中，當他動筆寫他的藝術哲學時，他就引進一套道德的

評判標準，以人格好壞爲標準來批評一個藝術家及其作品。他的後半生，我們發現他又轉向愛國主義的情操了。

法國在普法戰爭中一敗塗地，緊接著是巴黎公社，這些都帶給了泰涅極大的震撼與困擾。一八一七年的秋天他回到桌案前，展開一樁龐大且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延續達二十年之久，直到他死時（一八九三年）都還未完成。他開始研究政治和經濟，重點放在從大革命前夕經過拿破崙一直到當代爲止。他不斷強調他的研究目的是純科學的、他看待法國的態度就和他看待佛羅倫斯(Florence)或雅典一樣客觀，但卻難以令人置信：《當代法國的起源》一書有明顯的政治目的，我們可以從此書看到，這位受到大革命啓蒙，因大革命而得以愉快享有眼前財富和權利的布爾喬亞，他和革命的關係從十八世紀末到如今，已發展到什麼樣的地步。

令人訝異的一點是，這本書不同於米西列或雷南的作品，泰涅完全不談歷史，這根本是一篇長篇大論的論文。如果說雷南是個思想方面的歷史學家，他讓歷史事件穿插其間，泰涅則是文學方面的歷史學家，但他描寫國會和暴動，卻充滿令人吃驚的謬論。書本和圖畫可以擺在圖書館和博物館任人靜靜地閱讀瀏覽，但社會生活卻必須親身去體驗，泰涅可以盡其所能讀遍所有的書和資料去了，解社會的鬥爭衝突，卻不能光憑想像去重新塑造資料及書本上所描寫的現實世界，他會把政治現象加以簡化，可是一碰到要描寫某一位作家的生活時，他的筆調卻又變得栩栩如生。在他的歷史結構中，充滿了簡化和分類，結果許多事件的運動都一概不見了，米西列在描述歷史時，經常把敘述內容超出框架的範圍，泰涅一開始即設定範圍，並盡量減少其中元素。他說他正在從事的只是「公共權力的歷史」而已，至於「外交、戰爭、財政及教會」的歷史則交給其他史家去處理。他把政治和

社會的一般活動盡量簡化，然後又不忘記擺出一大堆資料來支撐他的論點。在泰涅的時代，用堆積資料的方式來寫歷史似乎早已是一種風尚，泰涅竟然不能免俗，並且還不斷強調他的科學方法，他說他只提供證據，其他結論則留待讀者自己判斷，可是他從未想到要為我們說明為什麼他要使用那些資料，他也沒想到，他簡化歷史在先，資料的堆積在後，我們會無所適從，甚至會懷疑其資料之引用是否得當，或甚至是否正確，他用一大堆羅馬數目字標示著許多重要事件，把像法國大革命這麼複雜和混亂的人類危機輕輕帶過，這種簡化方式當然會造成我們的懷疑和不安。

我們反看雷南，他跟我們解釋古代世界崩潰之後，那個時代所需要的不是學者，而是聖徒，我們仍然還會懷疑奧理略皇帝的文明是否真有價值存在。泰涅卻只是不斷強調舊王朝之瓦解乃屬不可避免，所有舊王朝的愚昧錯誤已經為新的統治階級所糾正，老百姓只有保持理性並拿出耐心，所有的一切會慢慢步上正軌的。一般而言，我們對要不要宗教或要不要革命的信念多少還是取決我們和這兩樣東西的距離遠近，以及是否有足夠冷靜思考的空間，泰涅一開始即低調處理君主政權對宗教信仰和自由思想的迫害事實，然後幾乎就完全避去不提；甚至把巴士底監獄的陷落成是野蠻無意義的舉動，他告訴我們當時監獄只有七個犯人，這種舉動根本就是一種野蠻的行為。他在談社會檔案紀錄的某些篇章倒是較為接近人情，他寫到農人的悲慘處境，寫到他們暴動，劫掠土地和偷麵包，在筆調上就充滿了哀淒和同情。寫到一七八九年的聯盟軍這一段令米西列深為震駭的史實，泰涅卻帶著一種諷刺而且高高在上的語調。革命軍隊的精神和成就，他一開始就沒打算要提，後來雖然以比較肯定的語氣提及，但也只是輕輕帶過，稍微點到而已。至於那些革命的領導人在他筆下則沒有一句好話，完全以嚴酷的動物學觀點目之，把他們當作某一個品種的「鱷魚」。

那麼，在泰涅的眼中，除了繆塞之外，經由悲慘、衝突，以及解放而提升上來的人性觀念，是

否還不夠讓他覺得振奮？大海怪經過千辛萬苦變成人的樣子，卻讓他鬱鬱不樂，大革命中馬拉（Jean-Paul Marat, 1743-1793，法國大革命中激進的山岳派領導人）那一幫人讓他感到害怕，即使丹敦（George-Jacques Danton, 1759-1794，法國大革命時期政治家，原為律師，革命爆發後組織激進革命團體）或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都叫他感到不自在，這些人叫他退避三舍。他倒是沒想過由於這些人的殘酷愚行，由於他們的掙扎抗爭，他才能保有今天的文化享受和高人一等的舒服地位，事過境遷，他竟然以冰冷的筆調描寫他們，他那多采多姿的想像才華完全棄而不用。他不是曾經以自然主義者自居，並且奮不顧身出來對抗顛預無能的學術圈子嗎？他擲給我們一張由家庭主婦和知識分子揉合而成的奇怪社會藍圖，他呼籲：不要讓國家走太遠，我們只要保有軍隊和警察，以免於外侮和盜匪的騷擾，如此即可。政府絕對不可干預榮譽和良心，此兩者乃泰涅最看重的十九世紀美德，同時不要干預私人工業的運作，因為此乃個人財富和社會興盛的來源。

事實上，泰涅早已把大革命的暴民及其組成的臨時革命政府，和後來巴黎公社的社會主義革命放在同一水平看待。他和雷南一樣，一向把自己和一些高等人士看成是地球上的菁英分子，他比雷南更進一步的是，他要代表群眾。雖然他並不太欣賞與他同一等級的那些中產階級們，可是當有危險狀況出現時，他還是非常擁護他們訂的法律和下的命令。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如同他早期的作品所顯示的，他的想法並不是這個樣子的。他不喜歡舊王朝，他不喜歡大革命，他不喜歡拿破崙和他的姪兒所建立的軍事主義法國。他來不及寫到關於法國家庭的最後成就，但他倒是有此一寫作計劃，其道德基礎即奠立在他所設定的系統上面。他也來不及寫到他那個時代的法國，但已經觸及到了當時科學之運用及濫用的問題，他指出經由菁英分子的研究和運用，科學的確帶來許多好處，可是如果放到庸俗之輩的手裡，那麼災難就要臨頭了。

第八章

大革命傳統的式微：法朗士

阿那托·法朗士在年歲上來講，大約比雷南和泰涅年輕二十歲上下，巴黎公社時期，他正好二十七歲。他當時是國民軍(National Guard)的衛士，在要塞守衛時讀羅馬時代詩人維吉爾(Virgil, 70BC-19BC)的作品，人們認為他不適於在前線服役。社會主義政府在巴黎成立的時候，他的處境陷入危險，他就弄了一本比利時護照化名逃離巴黎，躲到凡爾賽，當時中產階級政府的總部就設在這裡。他從凡爾賽寫信給父母，信中提到他在這裡看到一群共產黨囚犯，覺得很有意思：「一群惡棍……你們可以想像有多討厭。」盧森堡(Luxembourg)公園的火藥庫發生大爆炸，在凡爾賽都可以聽到爆炸巨響，許多人都嚇昏了。年輕的法朗士從遠處望著這場大火，同時心裡擔憂著他陷在巴黎的家人。不久，巴黎公社被鎮壓，他回到巴黎時看到羅浮宮和國家圖書館安然無恙，覺得很高興，因為「巴黎的知識生活並未遭到破壞，」他寫信給友人這樣說道：「瘋人和罪犯組成的政府正準備要施行他們那一套計劃的當兒，終於被擊垮了。巴黎在一團廢墟中又升起了三色旗。」

他是巴黎一位書商的兒子，他們坐落在伏爾泰堤岸(Quai Voltaire)上的住家兼店面是巴黎文化交流的中心，接近十九世紀末尾之際，巴黎的文化一天比一天豐盛，當時許多學者、小說家、詩人經常在他們家中出入。他們的家就在法蘭西學會附近，法朗士十五歲時，在學校學期末的作業中，他

畫他家的書店——叫做提伯(Thibault)書店——然後畫一條線和法蘭西學會的圓屋頂連在一起，這次的作業還得到佳作獎。兩年後，有一次他寫信給父親，當時他父親正在學會參加會議，他的信這樣說：「我真不知要如何回你的信，因為此時你正坐在那神聖的殿堂裡，正在聆聽那雄辯滔滔的聲音，以及那令人無比嚮往的詩句——而我現在所能看到的卻只是一片綠地，一片藍天，以及一些農莊的茅草屋頂。」

他當時的崇拜偶像是雷南，他寫過一篇叫做《哥林斯的婚禮》(The Wedding at Corinth)的詩劇，即是將《基督教的起源》一書加以戲劇化，他的一本小說《席維斯特·伯納的罪惡》(The Crime of Sylvestre Bonnard)，描寫一位心地單純善良的老學者的生活，據說即是影射雷南在西西里島(Sicily)上的冒險故事。雷南晚年寫了一本書叫做《哲學的戲劇》(Philosophical Dramas)，他在書的序言裡有一句話大意是，以諷刺和同情的態度面對人生，法朗士對這句話不時津津樂道並將之奉為創作的座右銘。事實上，法朗士年輕時代在文壇上嶄露頭角，主要都是以模仿晚年的雷南為主，但他自己後來變得不喜歡《席維斯特·伯納的罪惡》這本書，他一直希望能以這本書進入法蘭西學會，後來果真如願以償，五十二歲時終於獲選成為學會的成員，他當然異常高興，他說他這輩子都在努力做讓他那伏爾泰堤岸上的母親覺得高興的事情。

然而，年輕時代的法朗士，在他那甜美迷人的聲音底下，畢竟還是隱藏著一些別的東西。他是一個能力很強的人，但小時候卻深深嘗到被冷落的滋味。那時父母送他到一間著名的教會學校唸書，當時社會的階級意識還很強，他日後告訴他的秘書布魯松(Jean-Jacques Brousson)，他在那裡唸書時，從未得過獎狀。所有的獎狀統統落到有貴族名字的學生頭上——因為老師如此建議學校。「一些第二等的獎狀則頒給第三階級，那些醫生、法官或律師的小孩——都是一些朗誦、繪畫或宗教心得報告的

獎。但即使是分派這些餐桌上掉下來的麵包屑，仍然有私心作祟。」學校的老師告訴他父母，說法朗士很笨，並建議他們讓他退學，他們期望把他教育成材，將只是徒然浪費金錢而已。法朗士的祖父原來是鞋匠，他小時候在田莊當工人，後來去從軍，從未有機會上學，他一直到二十歲時才靠自修學會讀書寫字，然後慢慢往上爬，終於成為伏爾泰堤岸上著名的書商；因此，法朗士畢生懷著小資產階級對大資產階級及貴族階級的怨恨。他是一個性情溫和的人，但說不定什麼時候心中這股怨恨又會爆發出來。他有一次就對學會中一位子爵院士大發雷霆，只因爲那位子爵曾經答應他投贊成票使他成爲院士，但後來食言了，他爲此大動肝火：「你錯了，閣下先生，」這位子爵院士想道歉說明，他還是繼續揶揄他：「謝謝您的票啊！你自己答應的，你是個紳士，說話要算話，不可以食言的。你錯了，閣下先生，真謝謝您的票啊！」後來他當選爲院士之後，他小時候唸的教會學校，曾經要他退學的那位老師（是個教士）來跟他祝賀，他很生氣的將他斥退了，法朗士一輩子恨透了教士，他始終認爲天主教會的教育對美和官能享樂充滿敵意，根本就是扭曲人的本性。

法朗士這方面的傾向在德雷佛斯（Dreyfus, 1859-1935，猶太裔法國軍官，被誣告出賣軍事機密給德國，判處終身監禁，引起軒然大波，後獲平反）案件中充分顯露無遺。一八九五年，德雷佛斯一案在法國喧騰一時，法朗士當時已經五十歲，這個案件雖未必如巴黎公社那樣造成社會危機，但卻對整個社會的結構提出了相當大的質疑。其實，其根本的核心問題乃在於自由派中產階級和軍隊、保皇派以及教會之間的衝突。法朗士當時既慵懶又膽怯，他有一個猶太朋友卡伊雅薇夫人（Madame Carrière），這位女性朋友對他很好，爲他周章工作，把自己住宅的一個房間借給他當沙龍，總之，不斷幫他提升地位。這次的德雷佛斯案件，法朗士使出渾身解數，出盡鋒頭，迫使案子重審並於一八九九年全盤翻案，這中間想必卡伊雅薇夫人多少有推波助瀾的功勞。在法國歷史上，這種翻案功夫早

已有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十六世紀法國諷刺作家、人文主義者)和伏爾泰的傑出表現在先,似乎已經形成一種優良的法國文人傳統,如今法朗士的表現一樣傑出。他到處演講發表文章,充分展現著蕭伯納(Bernard Shaw, 1856-1950,愛爾蘭劇作家、散文作家)式的諷刺功夫。他的《當代史》(Contemporary History)這本書寫得相當有趣娛人,帶著詼諧的筆調,詳盡分析當時法國社會的上層結構,這本書可以說正是德雷佛斯案件衝擊下的產物。他在小說《林蔭大道上的榆樹》(The Elm Tree on the Mall)的開頭,就把出場的角色皮耶達涅設定為鞋匠的兒子,似乎有意影射他的父親,這位年輕人從小聰明機靈,由於受到一位修道院長的感化,決心進神學院攻讀神學,立志要當教士,但是沒想到竟對天主教教義不感興趣,還被抓到偷讀維爾蘭(Paul Verlaine, 1844-1896, 法國詩人、象徵主義詩歌代表人物)和李斯列(Lecomte de Lisle, 1760-1836, 法國詩人)等人的淫詩。修道院長擔心他會變成另一個雷南,就在他正為教會肅穆莊嚴的禮拜儀式感動得想好好潛心修習時,被開除了,送回他父親的鞋鋪,而他又笨手笨腳,根本不可能從事補鞋匠的工作,而教會的大門又與他永遠無緣,我們這位年輕人從此離家去闖天下,心中「永遠恨著教士」,這似乎正是法朗士心裡的真實寫照。

小說的這段序曲顯示出法國式的簡潔和冷靜,而這正是法朗士的拿手技巧,這種技巧讓我們在開始閱讀時感受不到小說的力量,直到讀到最後一行,效果就很強烈了。我們繼續往前讀下去,令人驚訝的是,我們那位年輕人皮耶達涅竟消失不見了,再也沒出現過,我們一開始都以為他是小說的主角,現在換了另一個角色叫做貝傑雷先生,他似乎是席維斯特·伯納的化身,他冷靜而喜歡嘲弄,他是一位寒酸的拉丁文教授,被科學系的部門擠壓到陰寒的地下室去上課(在法朗士的時代,純文學的東西總是和科學格格不入)。不久爆發德雷佛斯案件,這位教授因為主持正義為德雷佛斯聲援而聲名大噪,他來到巴黎並且得到一個更好的教書職位。很明顯,法朗士把小說前面的年輕人影射

爲他的父親和他自己的化身，而現在的教授則是他當前的化身，真正的功名成就。

這時候的法朗士的確是真正的功名成就，從伏爾泰堤岸的小布爾喬亞搖身一變而成爲大布爾喬亞，他的書再版個不停，財源滾滾，法國各地火車站的書報攤都擺有他的書，他真的富有起來了，他開始有能力買他喜歡的書和畫，還有精緻的家具和骨董，他覺得很高興。在卡伊雅薇的文藝沙龍裡，他是全巴黎最活躍和最受歡迎的文士，他一向笨拙的動作體態和膽怯口吃的習慣，至此全部一掃而光，而成爲文藝沙龍最健談的人。緊接著他自己購買一幢大宅，然後脫離卡伊雅薇夫人自立門戶，最後，他們竟也鬧翻了。

坦白說，這位夫人一定是個很難相處的女人，法朗士等這一刻似乎等很久了，他們會翻臉，我們一點都不覺得驚訝。她占有欲很強，處處要干涉法朗士的寫作，並且隨時調查他的行蹤。然而，卡伊雅薇對他並不是全然沒有好的影響，比如從他寫《紅色百合》(The Red Lily)到寫《克蘭克比爾》(Crinquebille)這個階段，他們在一起這段時間，法朗士在性情上就很隨和，同時也很乾脆，之前他沒有這些特點，之後這些特點也跟著消失不見了。政治上的挑戰激發他一種慷慨的熱情，也激勵他奮發向上，這時候他的思想就很集中很有力量，卡伊雅薇夫人做的最得當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從喜歡寫歷史仿作的習慣拉向從事描寫當代生活的小說創作。

法朗士一向對歷史情有獨鍾，他寫了一系列的小說和短篇故事——這無疑是他作品的主要骨幹——而這些多多少少還是包含了從荷馬時代之希臘到拿破崙三世時代之巴黎的歷史要素，他甚至也寫了描寫當時法國的《當代史》一書，可是我們讀法朗士的這本書，卻覺得距離米西列的歷史觀多麼的遙遠！法朗士缺乏米西列那種宏偉的歷史觀，但他的特點是他能捕捉到一個時代的精髓，他可以說是未來某種時尚的偉大先驅：爲知識的目的而追求知識。我們先理解這個現象並加以領會：純

粹爲了樂趣，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去看事情的演變發展並加以領略分析其中之奧妙，但不必介入，不必認同，也不必去下結論。法朗士似乎尚未走到這個地步，他有時想建立起自己的系統，有時也想加入群眾的行動，但他缺乏米西列那種高超一致的視野去爲自由和宿命抗爭，去統合人和自然的鬥爭以及精神和物質的對抗，他最樂於玩的諷刺遊戲是去表達自由、精神，以及人如何被挫敗。我們假設某種情況，荷馬史詩中阿奇里斯(Achilles)的憤怒所飄逸出來的惡毒之歌被放牛人的吵架聲打斷；聖女貞德宣揚戰爭，糾合群眾去打仗，然後成爲民族女英雄，另外有個女孩，也是神明附身，巴黎被圍困時她在城牆上走著，宣揚和平與基督的愛，卻冷不防被一支箭射了下來。在法朗士的筆下，他會把已經公認的歷史帶上偏鋒，使之蒙上異色的色彩。法朗士在《猶太的總督》(The Procurator of Judea)一書中，就充滿了模仿雷南的筆調，雷南的書在寫到使徒保羅面對羅馬總督加利歐(Gallio)時，把兩人強烈對比，加利歐是有教養的羅馬人、權力的象徵，而使徒保羅則是沒沒無聞的小人物，但加利歐所代表的文明卻已經是強弩之末，使徒保羅則代表未來的希望。法朗士在《猶太的總督》中甚至描寫彼拉多(Pilate，羅馬派駐猶太地區的總督，下令將耶穌處死)總督忘了耶穌的存在。法朗士後來不久寫的另一本書《在白色石頭上》(On the White Stone)，在筆調上卻又完全不同，他認爲加利歐才是未來的希望，因爲羅馬人已經擁有開化的文明，基督教則否。此外，法朗士用諷刺詼諧的筆調描寫一些聖徒的傳聞故事，恐怕連伏爾泰都不會看得懂。總之，他善於使用自己的豐富想像去處理歷史故事，比如凱撒征服高盧(法國)的故事，他就用一位高盧酋長的眼光去看這件事情，跟史實完全不同。法朗士在自己家開的書店中瀏覽過太多軼聞野史，卻未接受過嚴格的歷史訓練，他寫出來的歷史故事自然會跟人不同。

至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法朗士晚期的小說中不遺餘力在這方面努力著墨描寫，而其所展現之

強烈批判筆調，則令讀過他先前寫的《當代史》的人大為訝異。《飢渴的惡神》這本小說描寫大革命恐怖時期的故事，他把嚴苛節制的羅伯斯比描寫成享樂主義的農夫領袖——他拿大革命最醜陋的一面和舊王朝最迷人的一面互相對照比較。法朗士年輕時曾經這樣說過路易十四：「這個怪異討厭的傢伙，米西列早就以他的尖銳眼光看出他的卑鄙可恨，現在再也不能放縱作怪了。」他現在對路易十四的評價固然比以前好些，他還是不願以貴族為英雄主角。他選了一位有文化教養的中產階級，他在舊王朝時代致富並享受所有舊社會的一切好處，在道德上亦高人一等。但到了大革命時卻被雅各賓黨送上了斷頭台。這位中產階級可以說是貝傑雷的化身，而同時又帶有席維斯特·伯納的感性。

無憂無慮的中產階級最後還是屬於勝利的一方，我們這位中產階級（他叫布羅多(Proteux)的漂亮房子被沒收充公，愉悅的社會生活被剝奪；但他堅忍不拔的古典精神承受一切，在前往斷頭台行刑的途中，還在讀著羅馬詩人魯克修斯(Juvenius，西元前一世紀的羅馬詩人、哲學家)的作品。法朗士這種一廂情願的耽溺越來越深，以致不可自拔。但他並不因此感到真正快樂。而且人們開始懷疑他不是作家，有部分原因是他們想看的，法朗士無法提供。法朗士不僅像泰涅和雷南那樣，呈現一個陰暗無光的十八世紀啓蒙運動，他甚至把啓蒙傳統描寫成分崩瓦解的模樣；他以他的聰明才智寫出知識世界中原則的支離破碎。在他的世界中道德家和感官主義者永遠互相對立，因為後者主張享樂是人類毫無價值的生活中之唯一的撫慰；道德家越來越令人厭惡，而感性主義者卻又越來越乏善可陳。

在政治立場上法朗士是個社會主義者，但他的最後兩本小說《飢渴的惡神》和《天使的叛變》(The Revolt of the Angels)卻告訴我們革命只會帶來專制的暴政，其專制兇暴的程度絕不會亞於先前的

政權。他在《企鵝島》這本書中曾勾勒出一種歷史情況，即現代的工業文明被無產階級無政府主義者從地球表面上完全剷除，但結果是人變得更不自由，也更不理性，情況只有更糟，大家都退回太初的原始階段，去耕耘土地播種。我們回到了維科的歷史循環理論，但上帝卻永遠存在。《企鵝島》固然是一本奠立在一種假想基礎上面的諷刺性小說，但我們可以看出來，這一類主題在法朗士的心中始終縈繞不去。他在他的政治論文中曾這樣寫道：「慢慢的，而且是必然的，人類會實現智者的夢想。」但是有時候他的論調也會被科學的夢魘所破壞，對泰涅和雷南，或甚至左拉而言，科學是一種力量，是一種訓練，但對法朗士而言則不是。泰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決定論者，他從他的機械觀念中衍生出一種堅固的方法和有力的邏輯，只不過是他的美學和道德觀很少受到他的物質主義原則影響而已。法朗士自稱是改革家和樂觀主義者，卻常常陷入憤世嫉俗和憂鬱的泥淖，深深懷疑人類生活的機械特性而否定人性的價值。他常常閱讀當時的天文學雜誌，深感人類在宇宙中的渺小無能——這種看法可真會震撼巴斯噶(Blaise Pascal, 1623-1662, 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讓李歐巴第(Count Giacomo Leopardi, 1798-1837, 義大利詩人、哲學家)吃驚，讓維尼(Alfred de Vigny, 1797-1863, 法國詩人、小說家、劇作家)的莊嚴詩歌變得無所適從，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 英國小說家、詩人)的小說也變得不再那麼悲觀絕望——法朗士卻若無其事，穿著拖鞋和睡袍，手上拿著天文學雜誌，和其他客人一起談笑風生。

席瓦利耶(Makon M. Chevalier)寫過對法朗士的精彩研究，他認為法朗士之所以無法寫出一本他完整思想體系的鉅著，乃是他那搖擺不定的才華特性所致，他的揶揄嘲弄手法固然有其獨到之功夫，但是卻無法整合他的一些觀點，又從來不肯長久抓住某個系統去好好專注研究，遂形成一堆散漫而缺乏系統的東西。他比伏爾泰更嚴重，有人就批評「他的想法個別來看都很清楚，合在一起卻是一

團糟」。法朗士晚年的作品比以前所寫的東西更爲堅實，也更具野心，但一樣缺乏某種有機的凝聚性。我們在其中看到了什麼呢？——燃燒的希望逐漸爲可怕的沈淪所吞噬，色情的想像和社會抗議混雜在一起，還有，隨著年華老去而變得更明顯，那就是陰沈而令人厭煩的虛無主義。他在此強烈顯露被矛盾所折磨而欲振乏力，遂把荒謬感化爲殘酷，另外一方面，他的孤獨感也加深了，他早在普魯斯特之前就已經強調愛的孤獨感覺了，要把禁錮的感情拿來和他人分享是不可能的，這是普魯斯特的中心主題，而法朗士早在他之前即已反覆彈唱不休了。在《紅色百合》和《一個默劇演員的故事（歷史喜劇）》（*A Mummer's Tale* [*Histoire Comique*]) 這兩本小說中，他就描寫由於婚姻責任的羈絆或社會習俗或血緣關係的阻撓，愛情變成不可能，以致當事人發瘋成狂。米西列也曾經爲社會失調所苦，但他能夠從他背後的大革命中調理出一套和他人團結相處的哲學，並藉此深入人性的探討，透過他所寫的歷史，他成功地將自己帶入人群並成爲其中一員，一起成爲憂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法朗士則否，他徒有滿腹才華和智慧，卻對人的世界充滿疑懼和絕望，越陷越深，以致不可自拔。

在德雷佛斯案件喧騰期間，左拉的榮譽勳位被取消之時，法朗士也同時自動把他的榮譽勳位繳帶送回，並且脫離學會的圈子，晚年時經過學會一再懇求，他才再回去學會。一九〇五年俄國發生革命時，他對著勞工階級聽眾發表演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主張參戰，並以七十歲高齡要求入伍當兵，可是後來一聽到當時同盟國（德、奧、匈三國）的和平要求被協約國拒絕時，他再也不肯做任何的愛國表示了。「是的，」他告訴勒高夫（*Marcel LeGoff*）：「我已經又說又寫，像個門房一樣。我覺得很丟臉，可是沒辦法，非如此做不可。」但一直到戰爭末期，法朗士再也沒作任何抗議的表示。因爲他受到了驚嚇：他的老友卡伊奧（*Joseph Cailaux*, 1863-1944，法國金融家、政治家，歷任財政部長、總理等職）被法朗士在德雷佛斯案中的老友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法

國政治家，兩度出任總理，主持一九一九年一次大戰後的巴黎和會，態度強硬，有「老虎總理」之稱（總理送進監獄，而且據說當時克里蒙梭也放話給法朗士，如果法朗士敢再隨便批評政府，下場會和他的朋友一樣。他的身旁經常圍繞著一群食客和女性仰慕者，以及一堆收藏的藝術精品，同時也經常接見和晤談一些激進分子，他稱他們為「同志」。根據秘書布魯松的紀錄，有一次在某個場合有人問他怎麼會「被拐進社會主義」，他回答說：「被拐總比被逼好。」勒高夫告訴我們，有一次他回答某個訪客關於未來的問題：「未來？老實說，可憐的朋友，我們沒有未來——什麼都沒有。一切要從頭來，人們把事物建立起來，然後推倒，然後再建立起來，反反覆覆，永無休止。人們如果無法跳出感情的窠臼，一切將不可能改變。過一段好日子之後，又要擾亂一陣；人們互相廝殺一番，然後一切回復原樣。」他接觸過太多人，對他們既有禮卻又不懷好意，伏爾泰比較幸運的是，他只須對一樣東西不懷好意——教會。在法朗士的時代，德雷佛斯案件喧騰過後，教會的權力已經整個式微，再也不能禁止任何人拿它當題材挖苦嘲弄，法朗士則繼續歌頌享樂主義，可是有一次他對秘書布魯松說：「如果你能懂得我的靈魂，你會嚇壞了。」布魯松回憶：「他握著我的雙手，緊緊握住，不斷顫抖著，兩眼瞪著我看，我注意到他眼中正含著淚珠，滿臉痛苦的样子，他嘆著氣說：『這世上沒有人比我更不快樂的了！別人以為我很快樂，其實我從未快樂過——一天、甚至一個鐘頭也沒有！』」

他晚年跌入虛無主義，變得沒以前那麼活潑可愛，顯得極為不對勁。他有幼稚的一面讓我們覺得越來越不喜歡，那就是企圖回到更為純真語言的時代。他企圖在小說中使用十六世紀拉伯雷時代的語言來諷刺當代的政治生活，用十八世紀的語言來批判當代的社會體制，他這種仿古傾向使得他的文體有時暴露出一種過分造作的根本弱點。現在瀕臨老境，爲了逃避自己的孤獨、避開戰禍，忘

卻獨生女之死（他離婚時女兒歸前妻扶養），他讓心情回到童年時代的回憶裡，寫成《朋友的書》（My Friend's Book）和《皮埃爾·諾吉耶爾》（Pierre Nozière）兩書，表露出他迷人的一面。他用傳統法文寫的關於悲劇作家拉辛（Jean-Baptiste Racine, 1639-1699，法國劇作家、詩人）的文章相當吸引人，他和雷南都一致認為，十八世紀以後，特別是到了他那個時代，法文實在已經被糟蹋得無以復加，他死時留下的一系列未完成手稿可以看出他在挽回古典法文文采的努力，然而《小彼德》（Little Peter）和《人生綻放》（Life in Bloom）則似乎是自覺而且經過冷靜設計。他不知道隱去了多少的痛苦，撫平多少粗糙的事物！藝術在十九世紀的燦爛陽光照耀下顯得相當嫵媚成熟，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竟又顯得那麼顛頑老邁，我們看十九世紀時代周恩（Anders Zorn, 1860-1920，瑞典畫家、雕塑家）為他畫的蝕刻版畫畫像，他雙手扶在桌上，面向我們，張開兩隻又黑又大充滿諷刺眼神的眼睛，嘴上還蓄著第二帝國時代流行的小鬍子，一副容光煥發的樣子；到了老年，我們看范東冉（Kees van Dongen, 1877-1968，法國畫家，擅長肖像畫，野獸派代表人物之一）為他畫的畫像，他自己都不喜歡，他說得不錯，看起來好像正在融化的乳酪。

最後，經過一輩子的努力和榮耀之後，新的一代竟然不肯接納他，他的「現象延續性及事物相對性」觀念——他從頭到尾堅持不懈——則由象徵主義者及其徒眾加以運用到法朗士自己都不認得的地步，另一方面法朗士在政治上的興趣及社會意識，到了他們手裡也都一概不見了。象徵主義者相信社會孤立，甚至連一點改造社會的幻想都沒有。法朗士死後，他在學會的位置由一位著名的象徵主義者填補，這位填補者卻藉此貶抑法朗士的地位。他的葬禮那天，一群極端象徵主義者夥同達達主義者（Dadaist）及一些新浪漫主義的年輕作家，發表一篇措詞強烈的宣言來反對他，這篇宣言叫做《屍體》（A Corpse），「不要上帝！不要愛！」羅塞爾（Pierre Drieu de la Rochelle）這樣寫道：「不要過分

的絕望，不要富麗堂皇的憤怒，不要注定的挫敗，不要決定性的勝利！」另外，戴達依 (Joseph Delteil) 這樣寫道：「懷疑，那友善的懷疑，叫我全身發冷。爲了感情，我要變得沒感情，我要的是樂觀主義、信心、熱誠，以及熱血！」他們批判法朗士的妥協、懦弱、傳統主義、愛國主義、寫實主義以及背叛大革命。

他們走到一種極端的相對主義，他們主張自動的機械性寫作，使用精神病院病患的病歷做寫作資料，擺脫責任的束縛，倡導道德的無政府主義，設定個人作家和社會之間關係的範圍，他們甚至跳回到比米西列更遠的範圍：他們發現他們的下一個步驟應該拋棄相對性的教條，走入另一個新穎的教義、符碼，以及確定的原則和行動計劃。最典型的象徵主義者有兩個人，都是詩人，一個是藍波 (Jean-Arthur Rimbaud, 1854-1891，法國詩人，爲象徵主義運動先驅)，另一個是羅特列亞蒙 (Comte de Lautréamont, 1846-1870，法國詩人，對超現實主義者和現代派作家有巨大影響)，前者曾經爲保衛巴黎公社而戰，後者曾經參加反抗第二帝國的顛覆活動，不久被拿破崙三世的警察所殺害，後來超現實主義發起人布列東 (André Breton, 1896-1966，法國詩人、評論家，超現實主義運動創始人之一) 在《超現實主義第二宣言》(Second Surrealist Manifesto) 中，曾經莫名其妙把這兩個人的名字拿來和馬克思及列寧的名字擺在一起。達達主義的下一步就是共產主義；無論如何，有一、兩個前達達主義者夠嚴肅到可以讓自己服從共產黨的紀律。

然而，在探討了中產階級的革命傳統，及其到法朗士時期的分解式微，我們有必要回溯與中產階級改革完全相反的社會主義發展。

第二部

第九章

社會主義的起源：巴貝夫的答辯書

法國大革命期間，羅伯斯比垮台之後，督政府(Directory)成立，這是一段較為緩和的時期，但卻被一個人的活動騷擾著，此人自稱為格拉寇斯·巴貝夫(Gracchus Babeuf)。

督政府成立後，大革命立即進入一段反動時期，讓拿破崙有機可乘而竄起。由於大革命，大批中產階級趁機崛起，他們擊潰君主專政的封建體制，解除貴族和教士的特權，許多財富落到少數人的手裡，卻因此引發另一場新的階級衝突。而恐怖時期所引發的反動，更摧毀了大革命的理想。政府的五位要員和商人及財政大員互相勾結，把充公的財產拿去做投機生意，從軍備買賣中擷取暴利，卻造成通貨膨脹和金幣貶值，一七九五年的冬天，巴黎地區因為飢寒而倒斃街頭的，不計其數。

巴貝夫的父親是新教徒，曾經被喀爾文教派(Calvinist)派往國外和路德教派(Lutheran)磋商宗教聯盟事宜，後來在軍隊服役，官拜上尉，當過家庭教師。回到法國後境遇十分淒涼，他教兒子讀書識字，還必須去街上撿廢紙來寫字，他讓兒子學習拉丁文和數學。臨死時他遺留給兒子一本希臘史家普魯塔克(Plutarch, c.46-c.120)的著作，並期望他能學習書中人物格拉寇斯(Caius Gracchus, 153BC-121BC, 古羅馬政治家)的榜樣，同時要他手扶在劍上發誓，畢生要拚死為群眾的利益奮鬥。

這是一七八〇年的事情，大革命爆發時巴貝夫已經二十九歲，他參與攻打巴士底監獄。他曾經

當過外省小鎮上封建領主的簿記員，如今他要把那些他登記過的資料檔案悉數燒燬。後來他也當過新聞人員和公務員，大革命時他成爲狂熱分子，他唆使小鎮上的酒館老闆拒繳制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已廢止的酒稅，他拍賣徵收的土地，並把公有土地劃分給窮人使用，地主和地方官府對他發出通緝，並將他逮捕入獄。到了一七九三年，他終於在巴黎公社中獲得一個職位。當時巴黎一般人的生活窮困不堪，他發現公社的會計作業有問題，他的結論是當局有人故意製造饑饉，藉著要求物質供應的機會大撈油水，他受命調查這件事情。政府當局卻阻撓調查工作，並以他在外省當公務員時的作爲爲由，冠上莫須有的詐欺罪名，對他發出逮捕通緝命令。

在一七九四年七月的「熱月革命」（Thermidor）推翻羅伯斯比的恐怖統治後，巴貝夫聚集許多和他一樣堅持革命理想的志同道合之士，他發表〈人民論壇〉（The Tribune of the People）一文，批判一七九五年所頒布的憲法，因爲這個憲法廢除普選權，並且加上很高的財產資格門檻。他主張不僅政治上要平等，經濟上也要一樣平等，如果做不到，他宣稱寧可引發一場內戰，也不要「這個扼殺饑民的可怕協定」。然而，那些從徵收貴族和教會財產中得到好處的人不肯放棄這個財產原則。〈人民論壇〉遂被查禁，巴貝夫和他的同黨只得琅瑯入獄。

巴貝夫被關在監獄的時候，他七歲大的女兒活活餓死。他早已準備一輩子要與貧窮爲伍，要在窮人中大受歡迎，他的公務員生涯只是徒然給他帶來麻煩而已。出獄之後，他決定組織一個政治團體，以對抗督政府所制定的政策，這個政治團體即赫赫有名的「平等會社」（Society of the Equals）。他們發表一份〈平等宣言〉（Manifesto of the Equals）（當時並未真正公開），主張：「廢除私人土地所有權，土地不屬於任何人。……我們已經忍無可忍，許多人勞動流汗，卻讓少數人坐享其成，一百萬人剝削兩千萬人的情形已經持續夠久，太久了。……從沒有人去設計一個遠大的計劃，更別提付諸實行。」

某些有智之士和聖人以微弱而顫抖的聲音不斷空談，沒有人有勇氣真正站出來講真話。……法國的人民！張亮眼睛並敞開心胸，迎接完整的幸福，和我們一起打拚，開創平等的共和！」

平等會社自然難免被查封的命運，當時執行查封的正是拿破崙，但他們立即轉入地下活動，同時策劃一次起義叛變，他們準備成立一個新的督政府。他們還草擬了一份憲法，以供「良善者所組成的偉大國家社區」之用，而且也制定出詳盡的社會藍圖。他們要廢除所有城市，人民全部散居於鄉村，國家將「照顧所有的新生兒，免費供給牛奶食物，並妥善照顧產婦。然後將新生兒帶往國家會館集中養育，他們將在那裡學習成爲真正公民所必須具備的一切美德和啓蒙」。因此，教育絕對是平等的，同時每一位健康的人都要工作，辛苦繁重的工作大家輪流擔當，生活之所需則一概由政府供應，大家在公社裡一起用餐，政府將管制所有外國商品以及一切印刷品。

當時的紙鈔已經貶得一文不值，督政府打算發行土地權狀當現金用，藉此挽救危機，結果，土地權狀發行當天立即貶值百分之八十二，群眾這時確信政府已經破產，當時光巴黎一地即有五十萬人急需救濟。此時巴貝夫和他的同黨在城裡到處張貼有歷史意義的布告，宣稱大自然賜與人們享受美好事物的平等權利，組織社會的目的即是爲了維護此一權利；大自然同時賦與人們工作的義務，逃避這項義務就是有罪；在一個「真正的社會」中，不應該有富人，當然也不應該有窮人；大革命的本來目標就是要剷除不平等，並促進所有人的幸福，如今，顯然大革命「尚未完成」，那些廢除一七九三年憲法的人，可以說犯了對人民大逆不道的罪行。

在咖啡館裡頭，他們大唱由他們自己創作的歌曲：「又冷又餓，快死的人們權利被奪盡……新來的人兒穿金戴銀，四體不動腦袋不動，躺在窩裡坐享其成；而你們，勞苦的人們，啃鐵當飯像駝鳥。……一個沒有頭腦的議會，五個可怕的督政官；士兵驕縱橫行，民主蕩然無存：這裡，共和國

在這裡！」

巴貝夫的「暴動委員會」在軍隊和警察中間布滿許多黨羽，從事間諜工作，成效極為不錯，政府爲此解散巴黎的軍隊和警察，然後重新組織。一七九六年五月初，計劃好的叛變前夕，平等會社被密探出賣，領導人不幸被捕下獄。巴貝夫的手下企圖糾合一群同情他們的騎兵警察，卻被專爲此次事件而新組的國民軍部隊擊潰。

巴貝夫被裝在囚籠裡遊街示眾，一路押往文當(Vendôme)，不久之前奧地利也如此對待他們一位法國同胞，巴黎人都覺憤恨不平。

巴貝夫在法庭的抗辯達六次之多，其抗辯內容竟達三百多頁之譜，的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疊動人文件。他知道自己難逃一死，也知道大革命至此已經告一段落。攻陷巴士底獄以來，七年的陣痛使法國人精疲力竭，再也沒什麼鬥志了，他們唯一寄望的革命軍隊，早在該年春天的義大利戰役勝利後，已經落到了拿破崙手裡。在國內，自從恐怖時期以後，大家已經恥於使用暴力。巴貝夫曾經糾合雅各賓餘黨，但人們已經受夠他們了。不妥協原則和斷頭台在人們心裡餘悸猶存，他們要的是自由寧靜的生活，相安無事的日子倒也延續了好一段時間。中產階級已經登上權力寶座，怎麼樣也不肯放棄既得利益，窮人除了認命，不可能再挺身去爭取什麼，巴貝夫並不是不知道這些，他的答辯書遂奠立在現實的基礎上去表明他的社會主義主張。他不再談大革命的原理：莊嚴、熱情以及混亂。這個時候人們只能看到眼前，巴貝夫卻能高瞻遠矚，瞻前顧後，看出事情的真正本質，大革命的理想：自由、平等、博愛，早已完全落入新的統治階層手裡，形成新的特權、不公正，以及新的壓迫，巴貝夫以無比的勇氣和見識仔細分析這種尷尬曖昧的新處境，他的答辯書像是啓蒙運動未

實現之理想的總結，及其最終目標之告白。這份答辯書論其莊嚴宏偉之內涵，誇張一點的講，實在不亞於蘇格拉底的《自辯》(Apology)一書。

巴貝夫認為，真正的問題癥結不在於反叛政府這件事情上面，而是在統治階層中所瀰漫的某些錯誤觀念，這才真正嚴重。他說，他眼見人民的權利在督政府底下被漠視踐踏，而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只限定於少數特權階級身上，他看到特權又回來了，他看到人民被剝奪出版和集會的自由，請願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也一併摒除，人民立法的權利也消失了，人民無法控制執政機關，而任其胡作非為，救濟和教育更是付之闕如。他認為一七九三年的憲法經過五百萬人投票認可，才是能夠真正代表民意的法律，而現在的憲法，認定的人還不到一百萬人，中間又充滿多少曖昧模糊的程序，自然不能代表民意，如果他今天真的反叛政府(當然，在法庭上他極力否認他的反叛行為)，他反叛的即是一個不合法的政府。革命的根源在於人民實在是被壓榨得忍無可忍，大家要反抗壓迫，他們這樣做是對的，因為社會組合的目的本來就是在實現大多數人的幸福，如今壓迫變本加厲，不管統治者怎麼說，只有繼續革命一途，如果統治者想抵制革命，那就是罪惡。

在歐洲地區，幸福是一種新的觀念，但是我們今天知道，不幸的人才是在地球上真正重要的力量，他們有權利說話，但統治他們的人卻要漠視他們。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去享受美好的事物，社會的真正作用就是在於維護這種權利，並不斷增加共同的利益。工作和享樂一樣，每個人都有份，大自然規定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工作，要逃避工作的責任就是一種罪惡，同時，犧牲別人去擷取自然所賦與的利益也是一種罪惡。真正健全的社會是沒有富人也沒有窮人，沒有像我們現在這樣擁有私人財產的制度。我們目前所設定繼承和不能讓與的法律是「違反人

性」的制度，個人擁有私人地產，其生產的東西超出其個人所需，這實在無異於偷竊行爲，而我們的一般社會機構，平常的商業交易，根本就是強盜作風，由野蠻的法律加以批准認可。

巴貝夫繼續說道：

那麼，你們也許認爲我的觀念會把整個社會帶回野蠻時代，然而本世紀的哲學家們並不如此認爲，我自己就是他們的弟子。你們應該責怪前面的君主專制政府不像你們現在的共和政府那麼喜歡追根究柢，你們要責怪他們沒有阻止我去接觸馬布利(Abbé Gabriel de Mably)、海維修(Claude-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法國啓蒙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法國-1784、法國啓蒙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文學家)及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法國思想家、文學家，著有《民約論》等書)等人有毒的書，他們才是今天的慈善家！如果不是這些老慈善家把他們的毒傳給我，我今天會和你們一起分享你們的道德原則和一切美德，我會接受你們的溫柔感召，和你們站在一起，對受苦受難的群眾不聞不問。你們不記得起訴書裡引用了盧梭一七五八年的一句話了嗎？他說：「人膽敢擷取比自己所需還多的東西，而別人卻餓得快死，這真是可惡至極。」我敢於把這句話的來源揭示出來，乃是因爲你們現在已經不可能對盧梭怎樣了。還有馬布利，這位廣受歡迎、充滿感性的人道主義者，他不正是更可惡的陰謀家嗎？他說：「我們的罪惡中，最大者莫過於財富之不均等。」我們擬的〈平等宣言〉從未從塵封的盒子中拿出來，但是早已造成許多騷動了，其理念並未超出馬布利和盧梭的範圍。還有狄德羅，他說自古以來從上到下，主宰人性的就是個人利益，而個人利益則源於財產的觀念，基於此，

哲學家們就堅持認為，如果財產觀念的根不斬除，根本無法談論什麼樣形式的政府才是可能最好的政府——狄德羅問，如果所有的財貨為共同持有，國家的周期性動亂是否即可免除，他認為每一位國民從公共團體中取其所需，並為此一公共團體貢獻所能，如此一來，如果還有人想恢復可厭的財產原則的話，他就是人類的公敵，危險的瘋子，應該把他關起來！——同胞們，「危險的瘋子」正是你們加在我身上的稱謂，而我只不過是要求平等而已！

還有，達利安(Jean-Lambert Tallien)和拉姆斯(Armand de la Meuse)這兩位先生，他們現在是督政府和立法局的要員——法庭怎麼沒傳喚他們呢？才幾年前而已，達利安正在編輯《無套褲黨的朋友》(The Sans-Culottes' Friend,「無套褲黨」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貴族對貧苦的共和主義者之蔑稱)這本書，他當時告訴我們：「如果財富不要那麼不平等，無政府狀態自然就會停止。」拉姆斯向國民公會宣稱：「每一位誠實的人都應該承認，不是真正平等的政治平等，只是一種騙人的假相而已，」而「革命團體所犯最殘酷的錯誤是沒有限制財產權，後來更把人民出賣給富人貪婪的投機。」

耶穌基督教導我們要愛我們的鄰人，以及我們要別人怎麼對待我們，我們就要怎麼對待別人。我相信基督的這種平等觀念如果今天拿來宣揚，肯定會讓他惹上反叛政府的罪名。

我在家中時雖然沒看到外面事情的發展，但總會有人把消息傳給我。前些時我因為寫的東西而被關進獄中時，我把內人和三個小孩留在家中，他們挨餓無助，我七歲大的小女兒由於配給的麵包不足(減到兩盎司)，竟活活餓死了，另外兩個兒子也瘦得不成人形，我出獄看到他們時幾乎認不得了。除了我們，還有幾千個家庭——事實上是巴黎大部分的居民——他們的臉因饑荒而消瘦，走起路來搖搖擺擺。

我希望改變他們的處境，但未想到要用武力的方式，我所期盼的是，人們能夠獲得啓蒙，並且知道他們是至上的，權利是不能隨便被剝奪的，同時要懂得去爭取自己的權利。但是，我認爲我應該告訴他們爭取權利的方法，我不要求其他，只求一切以他們爲依歸，如此而已。

想想看，馬布利、狄德羅、盧梭，還有海維修，這些人都失敗了，我如何能期盼成功呢？我是他們不成材的學生，而現在的共和也比君主專制時代還更加不如。

他提醒他們馮戴米埃(Vendémiaire)地區保皇黨的叛變都已經得到赦免並且開釋了，而太子黨(Pretender)也公開宣稱，如果現在的新憲法規定執政內閣的領導人是一個而不是五個，情況可能會更好。平等會社的人相信政府本來早就設計好要屠殺他們，就像南部地區共和黨人的大屠殺一樣。貝夫大罵共和黨人的醜陋嘴臉，竟激動得無法自制，法官就要求他停止發言，並宣布擇日再審。

巴貝夫下結論說，他並不怕死刑，他的革命行動早已培養出他視死如歸的精神。他感到最安慰的是，妻子和小孩都很支持他，他們都以他爲榮，都來法庭爲他加油打氣。

「可是，喔，孩子們，」他最後說：

我現在在這些板凳之上——只有在這裡，我的聲音才能讓你們聽見，他們一直不肯讓我和你見面，這是違法的——我只能說我很遺憾，我一直想把最好的東西——自由，一切良善的根源——遺留給你們，可是我已經可以預見到未來只有奴役，我只能遺留給你們苦難，此外別無其他！我甚至連我的國民美德、對專制暴政的痛恨、對自由和平等的熱烈奉獻，以及對人民的熱愛，這些都沒辦法遺留給你們，因爲這些只會給你們帶來禍害，在勢必降臨的專制暴政下，

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呢？我只能遺留給你們奴役，這真叫我至死都要痛苦難堪。我現在所能做的，就是教你們如何在目前這種處境之下忍氣吞聲承受加在你們身上的鎖鍊，但連這個我也無能為力了。

法庭經過一番激烈爭辯之後，最後投票結果還是判巴貝夫死罪。在這之前，他的一個兒子曾經自己弄了一支蠟燭台改造的匕首，偷偷送進監獄給他。當他聽到法庭宣判他死刑時，他企圖以這支匕首當眾自殺，結果只受重傷，並未如願。第二天早上（一七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他被押往斷頭台行刑，一起上斷頭台的還有三十位他的黨羽，其餘一概以徒刑發落。

巴貝夫被捕時曾經將妻兒託付給一位朋友，臨刑前他寫一封信給這位朋友，信中這樣說道：「我相信，將來有一天，人們一定會重新考慮我們所擬訂為人類求幸福的方針。」

他的這份答辯書埋沒了將近一百年左右，當時的報紙只刊載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一直到一八八四年這份答辯書才以完整的版本面世，巴貝夫從此名噪數十年。

第十章

社會主義的起源：聖西蒙的階層制度

如果巴貝夫是法國大革命想衝向其終極目標的最後努力，那麼，十九世紀初葉大行其道的平等主義者和集體主義者年紀上雖然和巴貝夫差不多，但卻是屬於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

聖西蒙伯爵(Comte de Saint-Simon, 1760-1825)可以說正是這些人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遠祖曾經是著名的公爵，在路易十四國王的朝廷當過編輯王室年譜的大官。他和他的親戚雖然後來自動放棄公爵的頭銜，因為他認為頭銜並不代表什麼，但他卻重視家世，特別是冠有聖西蒙這個姓的家世。他十七歲時規定他的僕人每天早上喚他起床時一定要這樣叮嚀他：「起床囉，伯爵先生！別忘了你有大事要做！」大革命期間的恐怖時期他被關在監獄，他說他的祖先查理曼(Charlemagne, 742-814，即查理大帝、查理一世，法蘭克國王、查理帝國皇帝)曾經出現在他面前，並跟他說聖西蒙這一房會出現一位大英雄和大哲學家，他以後在知識領域上的成就，將可和查理曼大帝在軍事上的成就等量齊觀。

大革命爆發的時候，聖西蒙站在一旁冷眼旁觀。他知道舊王朝已經壽終正寢，在這之前他也去過美國，參加他們的殖民地獨立戰爭，但他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一個過程，主要在於破壞，沒什麼事可以讓他積極投入。他趁機做房地產投機生意，很賺了一大筆錢，卻被合夥人拐跑其中一大部分。這時他想起先祖查理曼大帝的面諭，遂開始以一種英雄式的天真，有系統的著手做成爲大思想家的

準備工作。

首先，他在技術學校的門口購置一棟房子，開始學習物理和數學，然後在醫學院旁邊也購置一棟房子，開始學習醫學。有一陣子他的生活極為放蕩糜爛，他說這是出於道德好奇的動機，想了解一下低層面的生活面貌。他不久爲了想擁有一間文藝沙龍而結婚，但很快即離婚，因爲他愛上了當時著名女作家史達埃夫人 (Madame de Staël, 1766-1817, 法國作家、文藝理論家、沙龍主人)，他跟她求婚，他說當代最傑出的女性和當代最傑出的男性成婚，製造出來的下一代一定是雙重傑出，但史達埃夫人只是笑一笑。他去德國和英國兩地旅行，尋求知識方面的啓發，卻空手而回，十分失望。

我們讀有關聖西蒙的生平時，會覺得他像個瘋子，可是我們看其他一些和他同時代的社會理想主義者，會發現都是同一個異想天開類型，十九世紀初期的前面幾年是一個相當混亂的時期，在思想方面不可能活潑得起來，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哲學會經是大革命的思想基礎，如今仍然還是大多數人的思想指導原則（聖西蒙的教育即曾爲阿隆貝 (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 法國數學家、啓蒙思想家、哲學家) 所指導)。以前大家認爲理性主義哲學能夠解決所有問題，後來則發現並不能解救社會的暴政和貧窮，現在教會和舊的社會體制瓦解了，卻一時產生不出如「百科全書學派」(Encyclopædic; 狄德羅和阿隆貝在十八世紀中葉主編了一套三十五卷的《百科全書》，於一七五〇—一七七六年出版，是一部大型的社會和政治工具書，撰稿者包括伏爾泰、孟德斯鳩、盧騷等人，形成一個重要的啓蒙運動團體，稱爲百科全書派) 那樣多少具有權威性質且又廣爲接受的思想（聖西蒙就計劃過編纂一部十九世紀的百科全書）。大家終於體會到，想利用一種機械性思想體系去大幅度改變人類的命運，只會徒然給許多人帶來災難而已，可是，商業和工業尚未發展到一個地步，舊的哲學卻已經要過時了，成爲一些無用之輩的夢幻對象。因此，這時候的法國人剛從舊社會的束縛掙脫出來，

卻不知道未來要怎麼走，只好胡亂發明思想系統，盡其想像之能事去設想未來的可能樣子。

有些人希望回到一個修正過的形式上較為浪漫的天主教系統，這時要多虧聖西蒙，這位查理曼大帝的後裔、中世紀的崇拜者，他適時以一種知識的勇氣投入這後大革命的思想漩渦中，然後理出一個頭緒並建立一套新的系統。他知識廣博卻不專精，凡事充滿好奇，又是貴族後裔，覺得自己有责任為人類的未來盡一點力量，從一八〇二年以來他寫出一系列文章，結集成《一位日內瓦居民書簡》(*Letters of an Inhabitant of Geneva*)，批判當時一些基本問題，並指出未來社會的可能走向，這些都不是當時一些職業的思想家能夠看得出來的問題。

聖西蒙說，十八世紀犯了一個基本錯誤：一方面認為人類擁有絕對的意志自由，另一方面又認為控制物質世界的乃是一些恆常不變的律則，人和大自然遂格格不入。社會也有其自身之律則，有其一套社會發展的科學原理，我們透過對人類歷史的研究，即可加以掌握。

聖西蒙對歷史作一番研究之後，他的結論是社會有周期性的穩定和動亂。他認為中世紀即是一個穩定的時期，宗教改革和大革命則是一個動亂的時期，現今的社會已經成熟到了一個地步，準備要進入另一個新的穩定時期，現在全世界要在科學方面組織聯合起來，這當然將涉及到工業方面的問題，而不是十八世紀的人所想的形而上的問題。大革命的舊政治體系與我們的社會現實無關，拿破崙的軍事獨裁更是不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拿破崙以為社會的原理是不斷的戰爭和征服，其實社會的真正原理卻是生產和消費，解決社會問題必須取決於利益衝突的調整，而政治的主要任務在於控制工作以及工作進行的狀況。自由主義者強調個人自由實在是大錯特錯，在一個社會裡，少數人必須服從多數人，在此一原則下才能談個人自由。

因此，我們不要自由主義，我們不要軍人干政，把世界交給科學家、工業領袖及藝術家。新社

會的組織不能像巴貝夫所說的那樣基於平等原則，而要根據一套價值層級制度。聖西蒙把人類劃分為三個階級：智者、有產者以及無產者。智者主掌「精神權力」，是為最高機構的要員，這裡所謂的「最高機構，聖西蒙將之命名為「牛頓議會」(Council of Newton)——因為根據他在幻覺中得到的啓示，上帝選出來坐在祂旁邊傳達上帝意旨的人不是教皇，而是牛頓。根據聖西蒙的構想，這個議會的組合成員將包括三個數學家、三個物理學家、三個文學家、三個畫家及三個音樂家，其任務是設計新發明以及創造藝術，藉此改善人的本性，同時期待發現一種新的地心引力原理，用來規範社會行爲，以保持人與人之間行爲的平衡。十八世紀主張共產主義的哲學家莫雷列(Abbé André Morellet)在其《自然的符碼》(The Code of Nature)一書中即認為，自愛法則在道德領域中扮演著類似萬有引力定律在物理世界中的角色。「牛頓議會」裡成員的薪水採由各地自由樂捐的方式給付，大家有義務捐錢，因為那些天才們為大家的命運付出努力。樂捐方式是國際性的，因為這是全世界休戚與共的事情，也是避免發生國際戰爭的最好方法。

至於實際的統治，則交由社區中有足夠收入可以維持自己生活的人來執行，他們為國家做事不支領酬勞。無產者將服從於此一統治，因為這符合他們本身的利益，大革命期間他們曾胡作非爲，造成一片混亂並陷自身於饑荒。有產者是負責實際統治的一群，因為他們擁有較多的「智慧才能」。不過，所有的社會制度，不論是知識上、道德上及物質上的，皆以改良「最貧苦、最多數的階級」為主要目標。

政府將分為四個分支：法國、英國、德國及義大利，至於地球上其他地區的居民，聖西蒙則認為屬於較為次級的一群，分別劃歸某個管轄區，並被指派供應當地議會運作所需的經費。

聖西蒙在一番浪蕩冶遊之後，終於決心散盡家財，以親身體驗的方式研究貧窮問題。他特別主

張要和社會上的所有階級深入交往，同時又要跳出來觀察，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他們。當時一位崇拜他的人士戲稱他爲「無套褲黨大爺」(grand seigneur sans culotte)，因爲他神情愉悅開朗，有一個唐吉訶德(Don Quixote)式的長鼻子，帶點「憤世嫉俗的自由」，住在舊王宮附近。當時聖西蒙在蒙馬特(Monmartre)地區當抄寫員，每天工作九個鐘頭，換取一點微薄的酬勞。他以前一位僕人看不過去，主動要求幫他忙，弄好一點的地方給他住。除了他的學生之外，好像沒什麼人有興趣讀他出版的著作，但他還是不眠不休的寫，每天晚上半夜工作，因爲只有這個時候和自己最接近。

他在最後一本著作《新基督教》(The New Christianity)中，以新的觀點重述他的主張，他這時認爲要治理社會光有超人的天才還是不夠，如果要讓社會免除無政府的騷亂、建立秩序，一種具有統御性的宗教還是必要的；但他指的不是天主教或新教，他認爲我們要的是一種新形式的基督教。耶穌基督的基本教訓——「愛你的鄰人」，如果應用到現代社會，將使我們看清大多數的鄰人原來都是貧窮悲慘的。現在的重點應該是在底層的「無產者」身上，而不是最上層的精神導師；不過層級制度還是不變，聖西蒙的整個訊息重點還是在他對「位高責任重」此一觀念的個人理解。有產者階級必須了解的一點是，如果窮人的處境改善的話，這對他們也有好處，而最上層的智者更必須讓人知道，他們的利益和群眾是互相一致的。爲什麼不直接走向群眾呢？他用對話方式一問一答，因爲群眾有時不可理喻，我們必須阻止他們以訴諸武力的方式對抗政府，我們要好好說服他們。

最後他在結論裡——他這輩子寫的最後幾句話——談到當時的「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即俄羅斯、普魯士及奧地利三國爲了對抗拿破崙而成立的組織。聖西蒙說，剷除拿破崙是正確的，但是如果不斷擴張武力呢？他們不停的增稅，保護富人和教會，以及他們的宮廷，他們以武力追求進步，他們的武裝兵士至少兩百萬人以上。

他最後這樣下結論：「各位王公們，請聽聽上帝的聲音，這是上帝藉由我口要告訴你們：再一次成爲好基督徒，請不要相信僱傭軍人、貴族、異教的教士及腐敗的法官會成爲你們的支柱；以基督之名團結在一起，履行基督教義賦予掌權者的義務；記住，基督教義要求掌權者貢獻力量，盡快改善窮人的處境！」

聖西蒙現在的情況真是每下愈況，以前接濟他的那位僕人不久死了，他無法出版自己寫的著作，他必須自己動手謄寫，然後送去給當時一些學者及賢達人士過目，期盼他們會對他的論點有興趣，結果全部如石沈大海。這段期間他這樣寫道：「已經十五天了，我每天只吃麵包喝白開水，屋裡沒有暖氣，我甚至還賣掉衣物才能找到人來抄寫我的作品。我今天會落到這麼淒慘落魄的地步，都是起因於我對科學和群眾利益的熱情，也起因於我期待以非武力方式解決當前歐洲社會危機的願望。我不得不承認我目前的困境，我期盼有人能伸出援手，讓我順利繼續工作。」最後他從老家那裡弄到一小筆補助津貼，才勉強撐了下來。

一八二三年，他試圖舉槍自戕卻沒死，繼續寫作到一八二五年，他很覺意外：「你能不能告訴我，爲什麼七顆子彈往頭上射下去，居然沒死，而且還可以繼續思考？」一八二五年快死的時候，他拒絕親友來看他，因爲怕會妨礙思路。

根據他的一位學生描述，他臨終前這樣說：「我這輩子可以用一個觀念來概括：爲所有人類能自由發展他們的能力而奮鬥。我的第二本著作出版四十八小時之後，所有的工人團體將會聯合起來：未來是屬於我們的！」他說完之後，伸手碰碰頭，就與世長辭了。

第十一章

社會主義的起源：傅利葉和歐文的理想社區

聖西蒙臨終前預言工人團體將會聯合起來，不久之後竟真的實現了——然而並非如他所期盼的，直接導向一個新基督教社會的實現。同一時期也出現其他先知，他們試圖在舊社會中自己創立起小型但有發展潛能的新世界。

傅利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和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在年歲上比聖西蒙和巴貝夫年輕十歲左右，他們兩人在外貌上很像，生涯的發展也很接近，在思想上都傾向於十九世紀初期發展出來的特殊哲學。傅利葉來自法國貝桑松(Besancon)地區，父親是布商，他自己曾像推銷員那般往來各地推銷布料。歐文來自英國威爾斯(Wales)地區，父親是製造馬鞍的工匠，他自己則幹過布料商的夥計。他們和聖西蒙一樣，對當時自由主義的政治風氣皆喪失信心，與傳統文化格格不入，傅利葉從未停過對歐洲傳統哲學的批評，他認為「兩千三百年來的歐洲哲學只是將人性導向一場浴血而已」，如今上帝有意要貶抑那些職業哲學家，駁斥所有那些「錯誤的政治和道德學說」，並推選他，夏勒·傅利葉，「這位幾乎是文盲的商店夥計」來把神的真正意旨宣揚給人類。依他看來，一千年來所有政治家的錯誤乃在於誤用宗教和政治的特性，「上帝的律法首要乃是為工業立法，這是當務之急」，但

許多政府最近才開始著手做這件事情，然而方向卻是錯誤的，因為他們著重在「工業地盤劃分和商業詐欺，卻美其名爲『自由競爭』」。至於歐文，他似乎受過《論政治之公正性》(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1793)一書作者高德溫(William Godwin, 1756-1836，英國政治思想家，提倡無神論、自由主義和個人自由)的影響，但他從未提及，而且除了會計之外，好像也從未接觸過類似這方面的東西。他曾經試圖往政治方面發展，但沒有成功，他認爲想從「激進派、輝格黨(Wigs, 一六七九~一八〇年間因反對約克公爵詹姆斯的王位繼承權而成立的英國政黨，在一七一四年之後長期支配英國政治，到十八世紀末逐漸衰微)或托利黨(Tories, 一六七九~一八〇年因反對把約克公爵排除在王位繼承人選之外而成立的英國政黨，在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後得到君權神授主義者的支持而發展起來)，或任何的宗教團體那裡」，「期待任何合理的東西以挽救這個社會於日益蔓延的危機處境之中」，是不可能的。

從畫像上看來，歐文的樣子有點像一隻溫馴文靜的兔子，獨斷堅定的典型英國鼻子，橢圓形的臉蛋，加上一雙深邃而看似無辜的橢圓形眼睛，好像要伸向兩片面頰似的。傅利葉披著一條白色圍巾，臉部看似平淡無奇，卻有一種老式法國理性主義者的威嚴，嘴巴緊閉，羅馬式的單薄鼻子，一雙清澈澄明的虔誠眼睛，稍微分得開了些。

歐文和傅利葉皆以淡泊名利和性情坦率聞名於世，同時意志非常堅強，他們將其特殊方式的人道主義胸懷與其對精密準確的制度之熱情緊緊結合在一起，他們都直接親身經驗到當時正在西方世界中迅速擴展的工商體制最惡劣的一面。法國大革命時，國民公會的軍隊攻陷里昂，傅利葉的家產被沒收充公，他自己也險些被送上斷頭台。他親身經歷到里昂地區由於紡織業的發展，而致使該地居民處於一片烏煙瘴氣之中；他也親眼看見他的老闆成功獨占市場後，企圖趁著饑荒哄抬穀價，而任由一整船的穀物腐爛，然後倒入馬賽港水中。傅利葉的同情心相當強烈，小時候在學校唸書時，

常常爲了保護弱小同學免於被欺負而被打得鼻青眼腫，六十歲時，有一次聽說一位年輕女僕被她的女主人虐待，他就不辭辛勞獨自在雨中步行幾個小時去爲這位女僕主持正義。他這種對人類中弱者的強烈同情胸懷，使他能夠激發出一種樂觀奮鬥的意志，促使他願意爲他們無條件效勞。在他奇異而孤獨的生命中，傅利葉不僅理出理想社區中各個團體間的複雜關係，並計算出容納住民的房屋精確尺寸；他同時也估計這個世界將會延續整整八萬年之久，這中間每個人將往返於地球和其他有人居住的星球之間達八百一十次之多，而人類在這之間將繁衍一千六百二十六代。

歐文和傅利葉一樣，對人的苦難特別敏感。他回想小時候父母送他去舞蹈學校學跳舞，他看到許多小女孩找不到伴一起跳舞時的難堪模樣，令他印象極爲深刻。他十歲時就獨自離家出外奮鬥，一路發展得很快，二十歲時就受聘管理曼徹斯特(Manchester)一家棉花工廠，底下有五百個工人。他是當時最先採用新式紡紗設備的廠商之一，可是他很快就對人們「只注意死機器卻忽視活人」的可怕落差感到震驚；他深刻感受到「這種情況之糟並不亞於美國的黑奴，而且會繼續惡化，我後來在西印度群島和美國所看到家庭中的黑奴，處境甚至都要比英國工廠中的白奴好得多，特別是健康、伙食和衣著方面，英國家庭工廠中的工人和受壓榨童工實在是遜色多多」——至於英國廣大鄉間的佃農和奴僕，那更不用提了。事實上，遭受磨難不只是工人，雇主的處境也日趨惡劣。「我已經受不了那些只懂賤買貴賣的合夥人。這種工作把人的優良本性破壞無遺。我這輩子在各種工商行業中打滾，長期的經驗告訴我，這個自私無情的制度不可能培養出優良品行。真理、誠實、美德，都成了徒具虛名的東西，過去如此，現在亦然。在這種制度底下，我們看不到真正的文明，所有人都被訓練成爲了利益的衝突，彼此對立、彼此毀滅。這是一種低下、粗野、無知而且拙劣的社會運作模式；我們看不到長期、全面而且實質改善的可能性，除非產生更好的模式來培養人格、創造財富。」

雖說傅利葉否決法國大革命的哲學，歐文從生活經驗中得出他的結論，但他們都不約而同擁護盧梭的學說，盧梭的人性觀念在當時十分盛行，即使不必實際去讀他的著作，都可以在空氣中感受到他的學說的存在。他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之所以變壞乃是由於環境使然。傅利葉認為人的本性就像工具箱中的工具，分爲幾種類型的「情感」——亦即本能和私心——這是上帝所賦與而各有不同之用途。如今社會的問題在於這些「情感」被扭曲誤用了，如果這些情感能夠導向正途，那麼「和諧」將統御一切。歐文一輩子不斷反覆強調人是由教育和生命初期不能自我控制的影響因素塑造而成，如果人格形成的階段就只教他正確的事，那麼，他們的快樂和良善就能以「數學般的精確」達成。

傅利葉和歐文皆提議，爲了證明個人和群體之間的利益是相容的，有必要在大的社會之中建立一種獨立自主的小型社會。

傅利葉構想中的社區是建立在私有資本之上，而且不以完全平等爲目的。人人有選舉權，富人家的小孩和窮人家的小孩接受完全一樣的教育，同一社區中人們所得的差距不能太大。不過所得差距還是會有，而且要有某種階層制——但不是傳統的那種階層制：資本家不是處在最上層的地位。在分配紅利時（至少要保證足夠最低生活所需），十二分之四給予資本家，十二分之五給予勞工，另外的十二分之三則歸技術人員。吃重的工作比輕鬆的工作待遇要高，而必要的工作比次要的工作更爲優先，而次要的工作又優先於製造奢侈品的的工作。

在傅利葉想來，透過這樣的組織安排人和工作之間的關係，人的「情感」則可適度爲有利的目標服務，每個人都有合適喜歡的工作做，則所有的工作就沒有理由做不成，每個人都能適度發揮所

長，就沒有什麼好不滿足的了，因此，也沒有理由抱怨工作的不可勝任，人們不必為工作過度所苦，每個人皆各有自己的品味偏好，自己的情感傾向，那麼他可以參加各種活動來滿足自己。至於工業生產方面的效率，則由各個不同團體的互相競爭來加以激發。傅利葉制定了一套計劃，既能提高工業生產，同時又能皆大歡喜。有兩個問題困擾著他——為什麼男孩子老是喜歡髒亂，以及社區中的垃圾處理問題——他想到解決的辦法：讓男孩子們處理垃圾的問題。

歐文的社區則是要實現絕對的平等，唯一的階層制是以年紀來劃分：尚未衰老的成人組成治理會議。小孩子三歲時由特別的機關帶離開父母，然後統一扶養和教育，至於交易媒介則以一小時勞動價值為單位。

傅利葉構想出他的理想社區之後，立即對外宣布他每天中午在家準備接見對他的計劃有興趣的富豪之輩，可以一起討論興建這樣一個社區的事宜，他等了整整十年，信念依舊，但直到他於一八三七年逝世之時，卻沒有一個人來找過他，他感到極為失望。

歐文比較幸運，他終於建造出了他的理想社區，他對外宣稱，傅利葉有一度曾來跟他求助，他建造社區的共產主義構想乃是從他這裡而來，總之，他自己才是這項偉大計劃的核心人物——的確，他在當時的風光真可說是不可一世。

從今天的眼光看，歐文所做的事就和他同時代的《卡列布·威廉斯》(Caleb Williams)或《科學怪人》(Frankenstein)這一類幻想小說一樣不可思議。歐文和傅利葉一樣都是大公無私的社會理想主義者，他一生的奮鬥生涯令人想起汽車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 1863-1947，美國汽車工程師和製造商)。他最初在蘇格蘭的新蘭那克(New Lanark)地區擁有自己的棉花廠時，幫他做事的是一群又髒又亂、酗酒、極不可靠的男女工人——當時會在棉花廠做工的都是最沒尊嚴的一些人——以及一批從

外地孤兒收容所用船運來的五歲到十歲的童工。他以一個威爾斯地區外地人的身分來蘇格蘭打拚，在相當不利的條件下，他竟能在二十五年之間創造出一個高水準生活且教育普及的社區，並且贏得了各方的愛戴。他比其他同行給予他們更高的工資，更短的工作時間，帶領他們走過不景氣的階段，他把該給合夥人的盈利壓到最低限度，然後將多出來的這些錢用來改善社區的生活。他不斷問各界，一個正常的社會是不是應該像這個樣子？如果所有小孩都能像他在自己的社區中所施與的教育方式，很早就將他們帶離父母，適度加以管教，不體罰不責罵，這些小孩將來是不是都會很成材，成爲另一種新面貌的人類？

歐文在最初並未想到教育素材如何尋找，並使其教育理念付諸實現的問題，他也沒想到人是那麼不完美的動物，如何開始以及託付給什麼樣的人去實踐這些教育工作的問題。他在新蘭那克所面對的是一群最難纏的人，他也沒想到憑自己的一股毅力能夠把那麼惡劣的環境變成一個模範社區，但他可能也沒想到，他建造了新社區之後，他要適度加以管理並使之繼續運作。

歐文在他的工廠中所扮演的是慈善家的角色，而不是全能的上帝。當他發現激勵不足以使員工努力、誠實，歐文就想方法來查核並限制他們。他在工人身上掛一個四面漆有四種不同顏色的木牌，每一種顏色代表不同的表現。那麼他每天巡視時，由工頭展示木牌的顏色，說明該工人前一天的表現。當他看到代表「表現惡劣低下」的顏色，就只要把目光集中在怠惰的工人身上即可。看著顏色逐漸變成代表良好的顏色，歐文的心情也愉快起來。這些評比也會登錄在本子上，讓歐文知道當他不在時工人們的表現如何。他也設計出一套對付偷竊行爲的辦法，相當有效。然而，他沒想到這個道德世界是他一手創造出來的，他培訓出來的教師到別的地方去並不能得到像新蘭那克那樣的成就，他後來把社區移交給別人管理時，情況也開始變糟（後來在合作社運動中和歐文共事過的憲章運

動(Chartist Movement，一八三八到一八四八年英國無產階級爭取實施《人民憲章》的激進運動，其目標為男子普選權、廢除議員候選人財產資格等。最後雖然失敗，但對十九世紀工人運動產生深遠影響)領導者拉威特(William Lovett)，就說歐文根本是個專制霸道的人，根本不可能用民主的方式和他一起工作)。

事實逐漸顯露，歐文發現他的合夥人大都無法配合他的那套方法，他就必須不斷換合夥人，以致最後根本沒有人願意和他合夥，他終於體認到一項殘酷的事實：資本主義貪婪成性，根本是不看情面的。後來不久，英國通過反童工法案(有史以來第一次)，他的信念更加動搖了，他特別前往國會進行遊說，不僅遭到紡紗工人的激烈反對，同時更是被他所信任的政治人物所否決。他在倫敦見到的一些政治經濟學家，都是些缺乏實際經驗的空談家，談起理論頭頭是道，卻根本不了解實際狀況。他當時受邀參加一次座談會議，商討拿破崙戰爭後經濟蕭條的對策，出席該會議的都是他心目中赫赫有名的顯要，包括知名經濟學家、慈善家、政壇要員、商人等，主持會議的人是坎特伯里(Canterbury)的大主教，但他發現，在場只有他這個沒讀過什麼書的人真正了解，當時的失業潮是由於戰後許多人解甲歸田，而因戰爭所形成的市場需求偏又突然萎縮；他更進一步指出，數以百萬計的人丟掉工作是由於引進機器所致，此話一出，全場大為震驚。他年輕時當過棉紗工廠的經理，當時的老闆就住在工廠附近，但從未來工廠看過，只有一次——招待外賓參觀工廠時。他這時終於比較了解，要人們知道真正的狀況，恐怕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當時許多人還是很注意他所發表的意見，這些人包括內閣要員、主教和王室親王，他們了解到底層百姓的騷動不安，也知道歐文是一個有辦法安撫底層百姓的人。然而，了解、知道是一回事，

拿出對策去實際行動卻又是另一回事，歐文可以體會他們關心的心意，但這些人高高在上，養尊處優，你要他們拿出行動去改善人類處境，那是不可能的。接著發生了一樁意外事件，這使得他改變了念頭。

一八一七年，他前往法國參加一項主權國會議，他在會中結識一位外交界老前輩，也是這次會議的秘書長，他跟這位外交界老前輩說明，由於現在科學的發達進步，要是人們能夠把各自的利益互相結合在一起，為改善人類的處境而努力，則教育會變得普及，大多數人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同時衣食方面會更為富足。他告訴許多人他這方面的看法，但外交界老前輩的回答卻令他驚訝不已，他說，是的，他們——歐洲各統治階層，他代表他們——很清楚這個，但是他們並不要這個，如果群眾變聰明富有了、獨立了，統治階層如何控制他們？「這位秘書長此話一出，我心中已無意和他繼續討論，我想到我還有更艱鉅的工作要做，那就是讓政府和百姓認清導致彼此互相對立、妨礙彼此實際利益與真正幸福的重大盲點。我可以預見，存在於各階級、各國之間的偏見是如此難以克服，除了耐心和毅力，還得有蛇一般的智慧、鴿子一般的善意和獅子一般的勇氣。」但他「主意已定，決心勇往直前，奮鬥到底」。

英國當局這時也察覺到在歐文身上有一股理想主義者的顛覆力量，他公開演講抨擊教會，宣稱宗教是真理的最大敵人，他同時也攻擊財產和家庭制度（這已經比傅利葉激烈極端，傅利葉在他的社區構想中，是把宗教、財產及家庭三者加以改變形式而已）。現在教會已經開始反對他了，朋友開始害怕和他有接觸，也和他疏遠了。

他認定整個歐洲都病了，他決定另尋一塊淨土來實現他的新世界理念。他漂洋過海來到美國，他在印地安納州的新和鎮（New Harmony）向一個德國的教派購買一塊三萬畝的土地。一八二六年的七

月四日，他發表〈心靈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Mental Independence)，要從人類三個最大壓迫「私有財產、非理性宗教及婚姻」獨立出來，同時邀請「世界各國勤勞且品性良好的人士」來加入他的社區，然後他把社區留下給他人管理，自己回英國去了。但美國人並不比英國人好到哪裡去——的確，事實證明新和鎮的美國人只有更壞。美國西部人並不如蘇格蘭的無產階級那麼好管教，沒有限制的邀請，招徠了各式各樣的流氓和無賴，歐文的合夥人泰勒(Taylor)是個居心叵測的傢伙，他根本一開始就在打別的主意，後來歐文回來時，兩個人終於鬧翻。原來當初泰勒誘使歐文買下他的一塊土地，兩人一起合作建立社區，因為他本人也有此意。就在合約簽訂的前一晚，泰勒偷偷把許多農具和牛隻弄進那塊土地，結果簽約當天，歐文必須一起接收這些東西，他走之後，泰勒在社區蓋起威士忌酒廠，故意抵觸他的禁酒主張，同時自己也開起一家皮革廠來和歐文開的皮革廠互別苗頭。新和鎮的社區維持不到三年即告解散，歐文變賣土地家當之後黯然回到英國。

但他並不死心，他先後又在英格蘭和愛爾蘭兩地試辦他的社區，金錢一分一釐投注進去，卻都去無回。他似乎不太有金錢的概念，早期在新蘭那克的時候，當時棉紗生意一片好景，他只有一個社區讓他操心，他處理錢財方面的弱點還不是很明顯，如今他四處投注金錢，廣泛張羅器材設備，卻不知道怎麼好好維持他的社區，投下去的資財最後都不見了。

他終於一文不名了，他必須依靠兒子們來接濟他的生活。這時他已不再是富有的製造商，統治階級也不再對他有興趣，他開始扮演另一全新角色。一八三二年英國國會通過的選舉法修正案，只為中產階級爭取到選舉權，這下子勞工階級感到整個夢幻破滅，紛紛反彈。歐文和他們一樣失望，站在同一陣線上。他已經不是工廠雇主，新蘭那克的社區也早就放棄了與「歐文主義合作運動」(Owenite Cooperative Movement)及「全國團結工會」(Grand National Consolidated Trades Union)聯手合作。

然而，用政治方法尋求改革還是讓他覺得不耐煩，他雖然已經有過慘痛的失敗經驗，他還是堅持認為他所構想的制度最為理想，只有這個方式才能一勞永逸解決抗爭不息的勞工問題。工會運動不到一年就解散了，但他對憲章運動和穀物法(Corn Law，一八一五年英國政府頒布法令對進口穀物徵收高關稅，受到激進派政治團體廣泛批評，認為是犧牲消費者權益來保護地主利益。後於一八四六年廢除所有穀物法)抗爭之類的活動興致並不大，因為他相信這些都不是一勞永逸的辦法。他無計可施，越來越失望，感到人類前途實在已經沒什麼指望，他最後竟轉而相信超自然的神靈力量。他晚年相信，他曾經熟識的一些寬宏大量的賢達人士，如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讚頌革命、批評封建及傳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美國第三任總統，《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總統、查寧(William Ellery Channing, 1780-1842，美國基督教公理會自由派牧師，主張神學人文化，反對酗酒、蓄奴、貧窮、戰爭)、肯特(Kent)公爵等人(他此時已忘卻最後這位老兄曾經跟他借過一大筆錢沒還)——這些人在生時都曾經認同他的構想，有相同的理念，如今都作古了——都要從另外一個世界回來了，回來和他促膝長談，並且鼓勵他再接再勵。

他需要他們來肯定他多年前就已提出、但未通過時間考驗的想法——他相信，「雖然那些教育程度不足的人們可能還感覺不到，但某些意義重大的進步已經明白顯現」；他相信，「幸好，那些彼此對立的利益關係如今已走到謬誤與矛盾的末路」，因為「當人們精於創造財富的同時，卻有更多人困於貧窮，以及貧窮所帶來的重大危機」；他更相信，「團結原則」很快就要取代「分裂原則」，而所有人都應該認清，「只有透過促進社區的幸福，自我的幸福方能達致。」

一八五八年，歐文在散盡家財之後回到威爾斯小鎮的家鄉，他就死在以前父親開馬鞍製造店的隔壁房子。他十歲離家奮鬥，平步青雲，在棉紗製造業方面做得有聲有色，如今回到老家安息了。

第十二章

社會主義的起源：安芳登與美國社會主義運動

我們在聖西蒙、傅利葉及歐文身上發現的特殊氣質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某些特徵，歐文的朋友雪萊，則把此種特殊氣質表現在文學上面。他們的言行舉止都透著一種哲學意味的古怪，要弄一種到今天才似乎有人懂的玄奧修辭，而他們的社會洞見至今仍深具價值。

我們在後來的歷史學家米西列、雷南及泰涅等人身上也看到了相同的情況，他們把這種修辭風格發揮得更華麗動人，並且藉著賦予本質性解釋的抽象過程而定型化。在早期的那些先知們看來，工商體系的發展是那麼的違反人性和不切實際，要加以制止並改變其走向一點也不困難，如今這個體系開始全面接管各個領域，並且或收編或打擊了許多社會批評家。未來不再是傅利葉和歐文這班人所想像無限開闊、自由創新的世界了。中產階級的地位已經穩定不移，典型的社會批評家是德高望重型的大學教授，聖西蒙、傅利葉及歐文等人的社會洞見，就如同其異想天開的行徑一樣，跟他們完全格格不入。如果這些教授名氣夠大，大可拿泰涅的「良心」和「榮譽」這些漂亮話來高談闊論、教誨聽眾。這些批評家越來越強調個人自由的重要性，變得越來越膽小。相較之下，聖西蒙就顯得很大膽，他主張個人的權利應受社區利益的節制，而畏畏縮縮的泰涅則主張政府不應干涉個人良心及私人工業的營運。

聖西蒙的主張雖然未曾實現，但他死後卻在他的弟子手裡以不同面目發展開來，想來實在頗為耐人尋味。我們前面有提過，聖西蒙在晚年曾提出「新宗教」的觀念，他認為新社會的建立必須以此為基準才能實現，他不斷提出「以上帝之名」的口號。他臨終前有一位叫做羅德利克(Olinda Rodericus)的年輕猶太學生隨侍在側，把他的宗教訊息謹記於心，成為散播此一訊息的忠實使徒，演變發展為後來的聖西蒙教派。

然而，後來成為這個教派領導人的並非羅德利克，而是一位叫做安芳登(Prosper Enfantin)的法國工程師。一八二五年聖西蒙逝世那年，聖西蒙教派開始活動，他們發表一篇論文，主張以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方式整合工人階級，同時更主張廢除私人財產及關稅制度，另一方面他們也在文章中大肆攻擊有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壓榨剝削。漸漸地，安芳登越來越相信自己是彌賽亞(Messiah，古猶太書籍中預言將復興以色列並建立普世王國的人)先知，他把自己和聖西蒙的其他弟子捧為聖西蒙教派的「教父」。一天早上，大約六點半左右，安芳登仍在睡夢中，一位叫做戴希達爾(Custave d'Eichthal)的人在這個時候登門拜訪，他是猶太人，是兄弟會的一員。他進門時情緒非常高昂亢奮，他說他前一天剛在聖母院參加領聖餐儀式，當時突然頓悟到「耶穌已經降臨在安芳登身上」，安芳登正是上帝一對神聖兒女中的一個，他要對人類宣揚新的福音。安芳登一開始半信半疑，他告訴戴希達爾，除非那位彌賽亞現身，不能再冠上其他名堂，然後請求這位信徒讓他回床上睡覺。戴希達爾出去之後不久又折了回來，把安芳登從床上拉起來，宣稱時辰已到，他非趕快宣布自己是上帝之子不可。安芳登立即起床，靜靜穿上襪子，然後叫一聲：「上帝吾主！」

此後安芳登被稱為「基督」和「教皇」，聖西蒙主義者也設計一種特殊的服裝和不同凡響的禮拜儀式。安芳登則自己留起一撮鬍子，刻意裝扮成耶穌的樣子，襯衫胸口則繡有「父主」字樣。

巴黎當局開始取締聖西蒙教派，並關閉他們的聚會場所，安芳登帶著四十名徒眾躲到巴黎郊區，在那裡蓋起自己的禮拜堂。他們穿紅、白、紫等色的服裝，自己動手幹活維持生計。他們說：「當無產階級握著我們的手時，他們會觸摸到和他們一樣粗糙的雙手，我們正在為自己培養無產階級的氣質。」

當時正是路易腓力在位時期，他們以妖言惑眾的罪名被逮捕起訴，「父王安芳登」被抓去關了一段時間，從此粉碎了救世主的美夢。事實上，他並不是那種喜歡自欺欺人的幻想型之輩，出獄之後他回去過正常生活，從事工程方面老本行。以前聖西蒙就很肯定工程學問的重要性，他相信未來建設新社會的工作當中，工程師將占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去美洲訪問時就會鼓動當時的墨西哥總督開鑿巴拿馬運河。現在的安芳登就以工程師身分前往埃及訪問，他不斷鼓吹開鑿蘇伊士運河的計劃付諸實行，之後他還親自參與運河的開鑿工作，表現極為優異。回法國之後，主管巴黎和里昂的鐵路業務，一八五二年，他還負責將兩地鐵路合併為巴黎經里昂至地中海岸的鐵路系統。

我們看到聖西蒙的福音如何在安芳登身上產生多麼奇怪有趣的作用，而導向一種罕見的微妙效果。安芳登起先以上帝之子自居，最後卻成爲一流的鐵路工程師，不管是宗教，還是鐵路工程事業，都含有聖西蒙的教訓成分在內：新的快速運輸是把人們聚集起來的手段，而合併則是邁向統一的一個步驟。然而，安芳登也許太過於理性，太不知道變通，太過於法國作風，他無法把自己從社會之中分離出來，也沒辦法像聖徒一樣把自己當作上帝的化身。另一方面，當他一旦安於他的工程事業及鐵路工作之後，他不覺和人類宗教的活動脫節了。

這些政治理想主義者不了解社會變遷的真正機制，更無法預見他們所厭惡的社會制度將不可抑

制的發展起來。他們只能憑自己的想像設計出一套制度來和當時的制度互相對抗，並想辦法實際建立出這樣的理想小社區，期待能掀起一股仿效的風潮，這就是一八三五年前後出現在英法兩地的「社會主義」(socialism)一詞意義。

在美國，則抱持一種新的社會樂觀主義，加上廣闊的無主之地，很快即成爲那些理想主義的試驗場所。事實上，美國早在一八二五年即已出現勞工階級和有產階級分立的情況，最後形成了勞工組織。當時許多爲了逃離封建體制和饑荒從歐洲過來的移民，他們在美國擁擠的大城市中立即陷入另一種新的悲慘境遇，他們面臨另一批欺壓他們的新雇主。此時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適時解除了此一悲慘狀況，造就出一批新的政治思想家。

我們在前面曾提到歐文於一八二四年來到美國，旋即展開歐文主義運動，當時成立的歐文式社區少說也有一打以上。有一個叫做布立斯班(Albert Brisbane)的美國人剛從巴黎回來，他引進傅利葉主義，在《紐約論壇報》(The New York Tribune)開闢專欄，專門介紹傅利葉主義思想，結果相當成功，一八四〇年代之間相繼出現至少四十個以上傅利葉式的共產村莊。這一波潮流適逢信仰復興運動，與超驗派(Transcendentalism)、斯維登堡派(Swedenborgianism，瑞典科學家及神學家斯維登堡(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22)，其通靈幻像和對《聖經》的神秘詮釋，成爲日後新耶路撒冷教會的基礎)、至善派(Perfectionism)以及唯靈派(Spiritualism)等等，以不同方式結合起來。但這波潮流延續到一八五〇年代初期，碰到西部地區爭取自由農場的抗爭風潮，這波抗爭最終以一八六三年的「自耕農場法案」(Homestead Act，早期美國法律，准許將一六〇英畝公有土地授予定居移民)通過收場，把大家的注意力從勞工組織和社會主義的身上轉移開了。這波潮流盛行之際，據保守估計當時所成立的社區至少有一百七十八個，這包括了實行共產主義的宗教社區，其成員從十五個人到九百人不等。希爾奎特

(Morris Hilquit) 在其《美國社會主義史》(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 一書中以爲遠不止此，他相信「這些社區的成員成千上萬。歐文式和傅利葉式的社區據估計占地在五萬畝以上，有些社區只收容純美國人，有些社區如法國的伊卡利社區 (Icarian) 或德國宗教團體，則只收容外來移民。有些社區完全以宗教爲主，如純基督教徒，有些社區則相反，只收容自然神論者或根本沒信仰者。有些社區倡導「純粹的愛」，有些社區則主張「自由的愛」，有些社區施行全面素食，有些社區實行純粹的共產主義，有些——特別是傅利葉式社區——則組織成像是合資的股份有限公司，有些社區完全廢除金錢的使用，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和外面的世界進行交易，有的則在社區內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進行熱絡的交易行爲。有一位跟隨歐文來到美國的蘇格蘭女人，名叫法蘭西絲·萊特 (Frances Wright)，她在田納西州的狼河 (Wolf River) 一帶建立一個專門收容黑人的社區，對象都是些她用錢買來或跟別人要來的黑奴，準備好好教育一番，然後加以解放。

美國特有的發展是出現了反共產主義的社區，有一個叫做喬西亞·華倫 (Josiah Warren) 的美國人，他曾經參與過歐文在新和鎮辦的社區，他後來發現這個社區之所以失敗乃在於其「合併」的觀念，及由此發展而來的個人自主與平等交易的教條。他起先在俄亥俄州和印地安納州一帶遊蕩，後來開了幾家叫做「時光商店」的雜貨店，顧客以批發價格付現金購物，加上一點額外的商店維持費用，然後以一張「勞動便條」支付華倫在這筆交易中所耗費的時間。他後來把這種做法告訴歐文，歐文回英國後在倫敦開設一個規模很大的職業介紹所。不久之後，華倫在長島 (Long Island) 創立一個叫「現代時光」(Modern Times) 的村莊，大幅度給予個人在財產、職業及興趣方面的自主權，華倫自己宣稱在這種情況之下，「沒有組織、沒有委任代表、沒有憲法，也沒有法律或內規，每個人爲自己和自己自己的事業設定行事的準則；沒有官員，也沒有先知或教士。」如果召開任何集會，絕不是要商討什麼

大計，而是「大家聚在一起親切聊天」，談談音樂或舞蹈，或是其他一些「有趣的娛樂」。「甚至沒有人發表任何意見，告訴我們該如何做事情。」這似乎沒有必要，一位女士說，因為「一旦主題確定了，就不必再談什麼，剩下的就是行動」。「現代時光」出了一個叫做亨利·艾德格(Henry Edger)的人，他被聖西蒙的弟子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法國哲學家、實證主義和社會學創始人)指派為十大門徒之一，負責在美國宣揚孔德稱為「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科學宗教，後來還嘗試創設孔德式社區。另一個叫做安德魯斯(Stephen Pearl Andrews)的人，他發展出一套「宇宙學」(Universology)系統以及一個以精神和知性為主的階層制度，名之曰「潘塔其」(Pantarchy)。有一位叫做尼可斯(Thomas L. Nichols)的博士，他出版一本書叫《玄奧人類學》(Esoteric Anthropology)，發起「自由之愛」(Free Love)運動，他帶著一批人的名單，然後在全美各地為這些人尋求願與之結為「親戚」的人，他後來成為天主教徒。

一八四四年的八月，有一位遊客來到俄亥俄州的一個社區，他這樣說道：「我坐了一個古老的果園裡，對面是我投宿的房舍，我看到綠色樹葉下的工作坊裡，木匠正在工作檯邊工作著，工業的聲音、磨坊轉輪的聲音，還有許多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我心裡不禁暗忖：我的眼睛確實看到人們正在努力掙脫各種名目、各個民族的奴隸束縛，我的耳朵確實聽到他們在為獨裁專制敲打喪鐘的聲音。我看這個社區的建立，其重要性一如我們美國獨立建國的努力，比奠定英國自由體制的大憲章(Magna Charta，一二一五年英國大封建領主迫使英王約翰簽署之法律文件，明文規定國王對一切自由國民所必須遵守的法律和習慣)還要偉大。」

然而，後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我們看到這些鋸木工廠和麵粉工廠不停在運作，社區土地不斷在擴充，宿舍和餐廳人聲鼎沸，彷彿一片欣欣向榮，但這片好景卻沒有維持多久。這些社區很少能

維持十年以上，大都在兩年之內就結束了。首先是他們自己內部紛爭不斷，然後又是外部公共意見的壓力；來自低階層的人攀不到社會主義的理想，而來自高階層的人又不肯屈就自己參加勞動。然後接著又是災禍連連：火災和傷寒。一條小河流的氾濫，可能致使整個社區的人全染上瘧疾，而他們買的土地又可能由於買的時候判斷錯誤而事後發現一無用處，一些機械器材也是經常買來之後無法操作而棄置不用，然後貸款的壓力把他們活活給拖垮。荒謬的是，他們常常買了土地之後發現產權不清而致使糾紛連連，而財務會計方面由於沒有人內行，更是弄得一團烏煙瘴氣，有時甚至也會為女人的問題爭風吃醋。俄亥俄州一個社區的成員後來就說道，他們感到痛苦不堪，因為「他們對有資金的人缺乏信心，而讓他們有信心的人卻又缺乏資金」，也因為「必須不斷接納貧病老弱之輩」，這些社區最後大都以與外界的法律訴訟宣告終止，也有的是有人禁不住地產增值的誘惑而乾脆脫手，趕快脫離社區。

伊卡利社區是一個比較值得一談的案例，其創始人卡貝(Etienne Cabet, 1788-1856，一八三〇、四〇年代的法國共產主義者)的父親原來在法國時是個桶匠，卡貝自己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晉身為律師和政治人物，由於他忠於大革命的原則，這使得他到了波旁復辟王朝時，處境變得十分尷尬曖昧，到了路易腓力時代，他的處境更為不利，他的職位已經變得微不足道，而且又因為在內閣中唱反調而蒙上罪名，上級給他兩個選擇：去坐牢或自己放逐國外，他選擇放逐到英國，他越來越傾向於極端左派。在英國放逐期間他寫了一本小說，叫做《伊卡利之旅》(Voyage en Icarie)，書中描寫一個施行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小島，那裡的居民享受一種高所得生活，廢除財產繼承制度，制定工資給付標準，成立國有工廠及公立學校教育，倡導優生學，由政府統一發行唯一的報紙。

這本小說在路易腓力時代的勞工階級中廣受歡迎，並且產生相當巨大的回響，到了一八四七年之際，卡貝已經擁有二十萬到四十萬人的徒眾。這些信徒很熱切渴望將小說中的伊卡利主義付諸實行，卡貝接著發表〈到伊卡利去！〉(Allons en Icarie)宣言，他心目中的伊卡利就是美國，他認為現在的歐洲已無革命的容身之處。他去向歐文求教，歐文建議他去德州，那裡地廣人稀，而且才剛合併入合眾政府。卡貝打定主意之後，隨即和一家美國公司簽訂合同，購置一塊一百萬畝的土地。一切打點妥當，卡貝帶著第一批六十九個徒眾從哈佛港(Le Havre)浩浩蕩蕩出發，船開航之前，大家在港邊柱子上簽下信奉共產主義的誓約，卡貝說，「看到這群誓做先鋒的人們」，他對「人類的新生不再有懷疑」。然而，一八四八年三月，當他們船抵新奧爾良(New Orleans)時，才知道他們被那家美國公司騙了：他們的領土並不在紅河畔，而是深入內陸兩百五十英哩人跡罕至的荒地，而且只有一萬畝，還四處分散，並不連在一起。不過大家還是騎著牛隊到了目的地，抵達那裡時，所有人都染上瘧疾，隨行醫生也瘋掉了。

經過一番折騰之後，大家終於在伊利諾州的諾佛(Nauvoo)建立起自己的社區。伊卡利社區雖然一直支撐到將近十九世紀末才宣告解散，然而其發展過程卻備嘗艱辛，大家並未過過好日子，他們甚至還要依賴法國家鄉寄錢來才能撐下去。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後，法國政府允諾設立國有工廠，大家對伊卡利主義的狂熱開始衰退，伊卡利社區也就一直負債沉重。他們從頭開闢這片荒地，進展極慢，很難自給自足。還有，大家學起英語有如老牛拖車，比什麼都慢，好像永遠學不會，每次開政治會議，每個人競相用法語發言。此外，內部爭端迭起，意見不合，這才真正嚴重，其癥結乃在於美國的拓荒精神與法國的空談理論根本就格格不入。卡貝是典型的十八世紀心態，他構想出一套自認完美的體系，相信這個體系將帶給人們快樂，自然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小說中的烏托邦仿效法國大革

命的國民公會和美國憲法，有一個總統、一個議會；但一旦落實在實際的社區中，卡貝卻發現自己不得不變成一個獨裁者。然而他卻又沒有歐文那種高超的精神和堅強的毅力，他像個最布爾喬亞的共產黨領導人，他對農業和工業幾乎完全沒有概念，老是把社區局限在一種小心翼翼的小法國格局式的經濟。他禁止人們抽煙喝酒，並嚴格控制他們的行為，實行大家互相監視的制度，他已儼然一副獨裁暴君姿態，人們實在已經忍無可忍，大家在他窗口大唱〈馬賽進行曲〉，並且在會議上公開批判他，他們問：「我們離開家鄉三千哩，還是得不到自由嗎？」一八五六年，大家把他趕出社區，這位老人不久即死在聖路易。

伊卡利社區接下來還有第二波革命，那就是年輕一代對老一代的抗爭。年輕一代受「工人國際」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影響，他們要求婦女平等的政治權利以及私人花園公有化——這是老一代的居民在貧乏的生活中主要的樂趣，他們大都早已歸化為美國農人了。這一次又造成另一批人脫離社區，他們最後到了加州，之後便不知所蹤。一八九五年，老一代的伊卡利居民——這時已所剩無幾——正式宣布解散社區，他們說，他們現在和其他美國人沒什麼兩樣了。

在當時的社區實驗當中，最成功的當數紐約州的歐涅達(Oriskany)社區，這個社區從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七九年延續了長達三十二年之久，其集體主義宗旨從頭至尾未變，其創始人諾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 1811-1886)可以說是當時美國這一波社會主義運動中最為傑出的人物。

諾伊斯來自佛蒙特州的布拉托波羅(Bratelboro)，生於一八一一年，出身政治世家，曾在哈佛讀神學，但很早就皈依至善教派。依至善教派的教義，人死時不必任何救贖，人在這個世上可以自己避開罪惡。然而，當諾伊斯第一次去紐約，年輕的他感到十分震驚：他覺得肉體的誘惑正把他推向

地獄的深淵，以致晚上無法成眠，他晚上獨自一人在街上遊蕩，然後走入妓院尋求救贖。他和當時一些其他社會主義者不同，他很注重性愛，他後來創立他的社區時，就宣導一種可以避免懷孕的做愛技巧，把性愛建立在一種新的公有基礎上面。諾伊斯以身作則，大力倡導做愛的藝術和原則，佛蒙特州的居民終於受其感化，不再把性愛看成是罪惡，反而是人生的一種享受，甚至是一種世俗的救贖方法。由於他自己也自律很嚴，竟能在許多徒眾中產生莫大的影響力。

諾伊斯是一個智慧很高能力很強的人，而且又肯虛心研究其他社區，從別人的經驗中吸收知識來改善自己，研究的結果，他因而寫出一本極具價值的書《美國社會主義諸家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ms)，他認為許多社區的成功和失敗皆有其脈絡可尋，他就看出傅利葉系統中的荒謬性。傅利葉根據某些抽象原則發展出一個理想社區的模型，以為這個社區不需其他現實條件配合，便可自動運作起來。諾伊斯主張首先要組合一批人，他們互相了解且互相信賴，而且不能離開實文明中心地區太遠，同時不能太依賴土地，土地並不如工業那樣能迅速孳生財源。最後，很重要的一點是，領導人一定要住在社區裡，而且要親自領導。他同時更強調應該「嚴禁引入發明家們寫出來但尚未實驗成功的任何社會主義理論，發明家們什麼也不用做，只是搖搖筆桿、動動嘴巴，就要一大群心思簡單的人們傾其所有，做為這些烏托邦狂想的代價，這太殘忍了。」但是，這裡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單憑社會主義或宗教，無法建立出一個成功的社區，兩者必須結合在一起才行，同時必須有一股夠強的感召力量——諾伊斯稱之為「靈感」——這才能瓦解舊有家庭單位，將之重新組成社區的新單元、新的家。他認為運作最成功的實際範例是紐約地區創立於一七七六年的震顛派(Oaker)，由英國公誼會分出的美國基督教新教一支，因在其宗教儀式中渾身顫動而得名宗教社區，他們創立之後延續了整整一個十九世紀，而且繁榮興盛。葛瑞里(Horace Greeley, 1811-1872，美國報人，創辦《紐約

論壇》說：「在這期間有數百家銀行和工廠，數千家商家，經營的人不乏其精明聰穎之輩，最後仍不免紛紛倒閉，以致消失不見。」即使到我在寫作這篇文章之際，我還在報上看到報導，這個教派仍能動員五千個徒眾，其中包括六個老先生及一個老太太。諾伊斯認為這個教派能夠成功，就像摩門教(Mormonism)和基督教一樣，是由於他們能在第一代領導人安修女(Mother Ann)去世之後，產生第二代偉大領導人，帶領他們度過這段混亂時期。

諾伊斯很了解這種情況，因此在管理他的社區時，事無大小，一定親自掌管料理，他管理下的許多工廠都大賺其錢(其中一個金屬片工廠至今仍存在)，同時他又不斷產生「靈感」來推動他的宗教理念。社區的晚期(一八六九年到一八七九年)，他大力推行優生制度，他稱之為「血統文化」(stipiculture)，透過一個監督機關挑選配偶或禁止結合，以製造更優良的下一代，像諾伊斯自己以六十幾歲的高齡，還做了九個小孩的爸爸。然而，諾伊斯並未做到他所說的最後一個成功條件：他找不到一個強勢的繼承人。他年紀越來越大，社區的問題跟著越來越多，幾至險象環生，無法加以控制。首先是牧師群起反抗，後來他又不得不放棄「複合婚姻」的制度。最後，由於糾紛爭端此起彼落，諾伊斯只好離開，整個社區又走回了個人所有制的老路。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諾伊斯由於深思熟慮，想得比較周全，他的社區在早期的美國社會主義運動中運行得比別人成功。他後來雖然仍難逃瓦解命運，但他把社會主義和宗教結合在一起的巧妙做法，卻為後人所津津樂道，後來許多「地區性教會」轉為共產主義社區，多少即是遵循他此一理念而來。

我動手寫此文之前的幾個星期，我在地方性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新澤西州有一個歷史最悠久

的傅利葉社區正在拆除，這個社區最早於一八四三年到一八五五年之間開始施行傅利葉式社會主義。這個社區最早一代的後裔如今仍散居在新澤西州的林地中，住在老式的有長廊的建築物裡頭，由於年代久遠，房子的外觀顯得灰白老舊，但仍不失其當初興建時所秉持的傅利葉理念：雄偉壯觀，以今天眼光看，並不亞於大莊園、軍營或大飯店。他們在這裡設有一個番茄加工廠，依傅利葉規定，工廠設於離社區有點距離的樹叢中。上個世紀中葉有許多名人包括葛瑞里·達那(Charles A. Dana, 1819-1897, 美國報人，曾任《紐約論壇》編輯主任)、查寧及瑪格麗特·福樂(Margaret Fuller, 1810-1850, 美國評論家、文學家，曾為《紐約論壇》撰寫文學評論)等，都來這裡住過，這裡有一度還成爲法國的政治難民庇護所。詩人喬治·阿諾德(George Arnold)即死在這裡，他在這個傅利葉社區中長大，看著它瓦解，不時還會回到這個古老避難所，在忍冬樹和蟋蟀聲中，寫出盛讚享樂主義及隱遁生活的精彩詩篇。亞歷山大·伍考特(Alexander Woolcott)在這裡出生，他在這裡學到的觀念，後來使他寧可放棄研究收音機，也要批判納粹主義。

這裡的建築有一個很大的側翼，已經年久失修，最近才剛拆除，這裡曾經是大家吃飯集會的地方，他們在這裡聽演講和音樂會，也在這裡舉辦宴會和舞會。女士們穿著長及膝蓋的短裙或短褲坐著等人邀舞，一副驕傲得意的樣子。這裡像是世外桃源，沒有塵世的紛擾。後來在這裡住過的一位傅利葉主義者曾這樣說，他們「渴望逃離文明社會的勾心鬥角，在文明社會裡，虛偽和無情的競爭將人的高尚本性破壞無遺」。他們曾經期望透過他們屹立不搖的堅忍、純正無私的示範，引領時代朝向人與人之間穩固的伙伴情誼、有計劃的生產、快樂的勞動、高水平的文化——但這個社會似乎正莫名其妙地與這一切背道而馳。

第十三章

馬克思：救世英雄，也是魔王

一八三五年八月，德國莫塞爾河(Moselle)地區的特利爾鎮(Trier)，一位就讀佛烈德利希—威廉高中(Friedrich-Wilhelm Gymnasium)的年輕猶太學生正在撰寫他的畢業論文，題目叫做〈一個年輕人對選擇職業的看法〉(Reflections of a Young Man on Choosing a Profession)。這篇文章充滿高尚理想，寫來頭頭是道，非常引人入勝，顯示出這位心懷大志的年輕人準備要實踐自己的偉大志向。我們這位年輕人名叫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當年正值十七歲，他在文中說，選擇職業，最重要的是必須確定不會淪為只是他人的奴僕，無論如何要讓自己處於獨立的地位，同時要確定這個職業必須能夠服務人類——否則大可去當學者或詩人，但那不是成為偉人的途徑。我們只有努力去為人群謀福利，才能真正肯定自己，我們的負擔才能解除，才不會陷於沾沾自喜的膚淺滿足。因此，我們要時時警惕自己，不要陷自己於最危險的誘惑之中：迷於抽象的思考。

閱卷老師特別注意到，文章中有一種反省限制住高漲的大志：「我們不可能僅憑自己的志向去選擇職業，我們在社會中的關係早在我們能決定之前，就已經成形了。我們的物理性自然環境早就威脅著要阻礙我們的進路，而且沒有人能漠視。」

如此說來，在當時年輕的馬克思心目中，社會關係的枷鎖就已經顯現為個人自我實現的障礙了。

馬克思想到的是，人類文化的形成受制於物理和地理環境？或是那些一直阻礙猶太人發展的限制——他們的稅捐比別人重，不准隨意活動，不准任職公務，同時更不准從事農業和手工藝？

兩者都有，馬克思的血液中不知累積有多少猶太教士的養分，他的母親娘家那邊的猶太教士淵源至少可追溯到一個世紀前，而父親這邊的猶太教士傳統更是未曾斷過，有的在十五和十八世紀中曾經顯赫一時。馬克思的祖父就是特利爾地區的猶太教士，他的一位叔父也是，他的父親赫爾塞(Hirschel Marx)顯然是這個家族中第一個放棄猶太教士傳統、投入更廣大世界的人。

十八世紀的德國猶太人早已脫離了猶太社區的範圍，打破了社會孤立和宗教閉塞的藩籬，這要追溯到一項導致中世紀制度和觀念鬆解的意外發展。一位叫做摩西·孟德爾頌(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作曲家孟德爾頌祖父，主張猶太文化與西方文化同化論)的猶太哲學家，他藉著把聖經譯成德文，帶領他的同胞接觸外界的德國文化，在馬克思那一代之前，猶太人就已經在當時德國的文學和思想領域中占有一席之地了。但是孟德爾頌(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德國文藝理論家、劇作家]有一齣戲劇《智者拿撒》[Nathan the Wise]即是以他為主角)的成就不僅只是帶領他們跳出猶太教的窠臼，他更為他們打開啟蒙運動的大門，這使得許多年輕的一輩大開眼界，立即丟棄傳統猶太文化的包袱。孟德爾頌的幾個女兒也加入一個由有教養的猶太婦女組成的團體，那裡面有許多文藝沙龍和「哲學家」戀人，這些猶太婦女還受洗為新教徒或天主教徒。馬克思的父親赫爾塞是個康德派的自由思想家，完全不理會傳統猶太文化的約束。他們住的特利爾鎮就在法德邊境上，他除了接受德國哲學的薰陶之外，更熱愛盧梭和伏爾泰的學說。由於法國大革命的影響，當時對猶太人的許多限制遂告解除，赫爾塞因而能夠研讀法律，並且成為成功的律師。後來普魯士把拿破崙趕

走之後，又以法律規定猶太人不能出任公職，赫爾塞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德國名字海因利希(Heinrich)，並帶領全家受洗成爲基督徒，後來更成爲特利爾地區律師團體的領袖了。

馬克思家的隔壁住著一位子爵叫馮·威斯特華倫(Baron Ludwig von Westphalen)，雖然是個普魯士軍官，但也深受十八世紀文明的影響。這位子爵的父親曾經當過費迪南公爵(Duke Ferdinand of Brunswick)的貼身秘書，這位公爵是自由主義者，也是伏爾泰和溫克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德國考古學家、藝術史學家)的好友，子爵的爵位即是這位公爵冊封給他的。威斯特華倫子爵能懂七國語言，熱愛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荷馬史詩能夠琅琅上口。他常常帶著年輕的馬克思在莫塞爾河一帶山坡上的葡萄園散步，告訴他聖西蒙如何想要用科學方法把社會組織起來，顯現上帝的慈悲，顯然聖西蒙在子爵的心目中很有分量。馬克思家的世系源遠流長，他們的先祖住過荷蘭、波蘭和義大利，最後才在德國落腳定居下來。威斯特華倫子爵則是半個德國人，他的另一半血統是蘇格蘭人，因爲他的母親來自蘇格蘭的貴族家庭，所以他的英語說得和德語一樣好。威斯特華倫家和馬克思家都屬於這個古城中一個新教徒官員的小社群，他們在一萬一千個天主教人口中，爲數不到三百，而且多數是從外省遷來特利爾——這座城曾是羅馬時代的要塞、中古時期的主教教區，在威斯特華倫子爵和馬克思當時，則是由德國人和法國人輪流統治。威斯特華倫家的庭園很大，兩家的小孩常常在那裡一起玩耍，馬克思的妹妹和威斯特華倫家的小姐燕妮·馮·威斯特華倫(Jenny von Westphalen)感情十分要好。有一天，馬克思發現自己愛上燕妮了。

馬克思十八歲那年的夏天，他從學校放假回來，燕妮答應了要嫁給他。她比馬克思大四歲，是鎮上大家公認的大美人，許多地主的兒子和軍官不斷上門提親，她卻沒有一個看得上眼的，她只喜歡馬克思，但是爲了嫁給他，卻足足等了七年。她不但長得漂亮，而且聰明有個性，也很健談，這

完全要歸諸她那傑出父親的嚴格訓練。馬克思對她的感情用得很深，終生不渝，他常常從學校寄給她一些他自己寫的很蹩腳的情詩。

馬克思大學時代寫給燕妮的許多情詩，他自己後來都覺得由於過分注重修辭而顯得矯情，然而從我們今天的眼光看倒未必如此，那是馬克思在進入他那嚴酷的經濟批判體系之前，我們唯一有機會看到他溫柔多情的一面的時候。其風格固然是僵硬緊繃，似乎比較適於表現諷刺性題材而與浪漫情感不免有些格格不入，但是對崇拜馬克思的讀者而言，在這些充滿抒情筆調的情詩底下，要窺探出他日後那種磅礴氣勢的蛛絲馬跡，似乎也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在這些情詩當中，我們看到他描寫一個瘦骨嶙峋的老人，躺在水底下，當月亮出來時，老人隨著水的波動而開始起舞。我們看到他描寫一幢黃色屋子裡有一個人，這個人很小，他有一個瘦巴巴的可怕老婆，我們的詩人必須為他們蒙上一層陰影，以免影響他的幻想。他也描寫一些假裝有教養和品味的醫生，他們把世界看成是一袋骨頭，他們的心理學觀念認定人的夢是由麵條和餃子所組成，而他們的形上學觀念認為一顆藥丸即可逐出人的靈魂。他同時描寫一些多愁善感的人為牛隻被屠殺而哀泣不已，那麼，有沒有像巴蘭(Balan)，基督教聖經中的先知，原來被派遣去詛咒以色列人，在遭到自己所騎驢子責備後，轉而祝福了以色列人)的驢子那樣可以和人類講話溝通的？

馬克思有一首歌謠描寫一位水手被暴風雨驚醒，他要離開他那溫馨寧靜的小鎮，他要出航，他揚起帆破浪前進，看著天上的星星來導引他的航線，他全身熱血沸騰，他感到興奮喜悅——因為他在和大海奮戰，他要征服海洋。在另一首歌謠中馬克思描寫另一位水手頻頻被美人魚的歌聲騷擾著——他和海涅筆下的水手十分不同，他並不為歌聲所引誘——他對著美人魚女妖們當面宣稱她們的

魅力對他起不了作用，他心中的神遠遠勝過她們的妖術，女妖無奈，只得放棄對他的誘惑。另一首歌謠描寫一位如普羅米修斯一般的英雄，他咒罵剝奪他身上的一切的一位天神，他立誓即使自己力量薄弱，他也要復仇，他要建立自己冷酷而堅固的堡壘，讓世人刮目相看，並藉此對抗天神的天打雷劈。普羅米修斯是馬克思最喜歡的希臘神話人物，他特別在他後來的博士論文中引用希臘悲劇詩人伊斯奇勒斯(Aeschylus, 525BC-456BC, 古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悲劇中普羅米修斯對赫米斯(Hermes, 希臘神話中衆神的使者)講的一句話：「你要了解，我絕不會拿我的不幸和你身上的枷鎖交換，我寧可被綁在這顆石頭上，也不願意浪費我的生命去當天父宙斯的忠實信差。」

馬克思在別的詩中更是宣稱地球上所有巨人的榮耀終將毀滅，只有人類靈魂的吶喊才會長存，他說：「燕妮！但願我們的靈魂能夠緊密結合在一起，我要用輕蔑的眼光睥睨這個世界，我要以創造者的姿態大步跨過這個世界！」

馬克思的父親曾經說過，他的父母除了把他生下來以及給予他母愛之外，什麼都沒留給他，現在他的兒子在條件上可要比他好得多，他希望馬克思日後能繼承他在特利爾法律界的地位。他知道兒子的能力高人一等，卻不贊同他把才華發揮在別的方面，雖然他也勉勵馬克思要為「人群幸福」而努力，但還是要先建立人際關係的管道要緊，他給許多達官顯要寫信，希望他們以後能夠多多提拔他的兒子。他也不斷給兒子寫信，言詞中充滿了期盼和鼓勵的語氣，希望兒子的才華不要誤用；有時自然也難免責備兩句，比如他就批評兒子自私沒責任感，從不考慮父母的立場——馬克思顯然很少寫家書，只有在要錢的時候才會寫信，老馬克思對這點很不滿，因為兒子要錢的次數實在太多，他以為他老子是在挖金礦的嗎？母親寫信的口吻比較不同，她要兒子時常保持房間的清潔，每週至

少用海綿和肥皂洗澡一次，並且叮嚀他對窮困的人要有同情心。

馬克思是在一八三五年秋天進入波昂(Bonn)大學，不久即加入酒館俱樂部，每天喝酒鬧事，不但負債累累，還被學校當局以「夜間醉酒鬧事」為名加以記過處分。他也同時加入因具有顛覆思想而被警察當局監視的「詩人俱樂部」。一八三六年夏天，他捲入平民酒館俱樂部 and 貴族協會之間的糾紛而和人比劍決鬥，後來在眼睛上面留下一記刀疤。有一張當時酒館俱樂部會員聚在一起留下來的石刻版畫，馬克思當時十八歲，他站在後面，頭抬得很高，頭上頂著一頭黑髮，像戴著一頂鋼盔，眉毛又黑又濃，兩眼炯炯發亮。當時他的父親已經同意讓他轉學到柏林(Berlin)大學，當時的柏林大學在一般人眼中像一間「工廠」，與德國其他一般大學愛喝酒鬧事的風格十分不同。

馬克思從此在柏林待到一八四一年的三月三十日，為了配合父親的願望，他起先只得選擇修習法律，可是後來卻逐漸轉向他所喜歡的哲學，在當時德國一般的大學中，哲學可以說是「一門偉大的學問，而馬克思正是天生的哲學大家，現在他終於找對了方向，他關起門來潛心沈思苦讀，「不交朋友，」他說：「不接近大自然、藝術以及社會。夜以繼日不停沈思苦讀，不斷經歷內在和外來的鬥爭。」他在這段時候博覽群籍，極度用功，同時還寫詩和哲學方面的東西，也從事翻譯工作。

從信中看來，馬克思的父親是越來越覺得困擾了。馬克思是否在頭腦和才智方面凌駕於感情之上？盤據他的到底是聖靈，還是浮士德(Faust，德國中世紀傳說中一術士，為獲得青春、知識和魔力，將靈魂出賣給魔鬼)的魔鬼？他可能建立家庭幸福，帶給他旁邊的人快樂嗎？老馬克思的信令人十分印象深刻。馬克思的女兒後來告訴我們，馬克思非常敬愛他的父親，經常津津樂道談論著自己的父親，他一輩子無論到哪裡，身上都會帶著他父親的一張畫像，他死的時候，恩格斯還特別把這張畫像一起裝入他的棺木裡頭。但馬克思雖然從父親那裡學到許多，卻也有不少抗拒。馬克思和父親之

間的通信充滿了戲劇性，兩個人在價值觀念上幾乎是格格不入，而這方面的歧見在他父親寫給他的
一封長信中達到高潮（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九日）——他父親在五個月後離開人世——他父親嘗試最後
絕望的努力，希望能把兒子從歧路中挽救回來，他跟馬克思說，他希望自負的天才可以成爲有用的
思想家，只有和有教養的人們交往才能得到藝術的成就，他必須以一種溫和而有益的姿態將自己呈
現在世界面前，如此才能博得認同和好感。最重要的一點，要好好對待燕妮，她爲了死心塌地愛他，
已經放棄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他如果想回報她的話，就應該好好努力爲她提供一個像樣的生活環境，
而不是一個煙霧瀰漫的小房間，充滿難聞的煤油燈氣味，要她和一個瘋狂的學者關在一起生活一輩
子。

老馬克思很喜歡燕妮，自然就非常贊同這門親事，但他已經可以預見未來他們可能的樣子，自
己卻無能爲力改變什麼。這時候的馬克思早已脫離喝酒鬧事的生活圈子，而回到了猶太教士的嚴格
生活方式，他把自己完全孤立起來，他只與少數在智力方面他看得起的朋友交往，他在學問上已然
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終至病倒。在鄉間養病期間，他讀完黑格爾的全套哲學作品，開始讀黑格爾
的弟子寫的東西，他已經開始準備要成爲他那個時代的偉大俗世教士。一個世紀之前，沙洛門·梅
蒙(Salomon Maimon)曾經努力將猶太教義和康德的哲學結合在一起；如今的馬克思也是猶太傳統意
義下的導師，卻能完全免於猶太制度的束縛，全然掌握西歐世界的思想，將在現代世界中扮演一個
史無前例的領導者角色。

他唯一有意見的是猶太人放高利貸的行爲，此一行爲早已招惹各地人們的極度反感，他自己當
然也十分反對，但他認爲此種行爲毋寧是資本主義的一種惡劣變相徵兆，只要資本主義瓦解，高利
貸自然會消失。就他自己而言，尊嚴和獨立，以及對高超道德的信念，這些賦予他英雄風采的品性，

都源自於古以色列的偉大時代，而從古老榮光到現代，這期間的悲慘歲月，馬克思並未意識到。

果真如此嗎？馬克思有兩首詩出版於一八四一年，其中一首描寫一位瘋狂的小提琴手，穿著白色袍子，配著一把軍刀。他爲什麼那麼瘋狂地拉小提琴呢？他爲什麼拉到流血呢？爲什麼要把弓拉到斷裂呢？——爲什麼海浪要怒吼？神靈回以另一個問題。海浪滔天，衝擊著懸崖——靈魂衝擊著地獄。——但是，音樂家，你以嘲弄來撕裂你自己的心！神賦與你藝術的天賦，你就該高奏天籟般的音樂。不，這個瘋子回答，我要用這把血污泛黑的軍刀刺穿靈魂。上帝不懂得藝術，也不尊崇藝術，藝術自地獄的蒸氣中而來——它使頭腦瘋狂、人心遽變。魔鬼爲我打著拍子，我要演奏死亡進行曲。——在馬克思的一生當中，魔王路西弗(Jucif)，早期基督教著作中對墮落之前的撒旦之稱呼)總是跟隨在普羅米修斯後面：他是救世英雄的反面。恩格斯和艾德加·鮑爾(Edgar Bauer)曾經寫過一首諷刺詩，把馬克思描寫成「特利爾來的黑人」，是野蠻人，同時是一隻巨大魁梧的怪獸，牠不用爬的，而是用跳的方式攫取獵物，牠張開雙臂，伸向天空，彷彿要摘下天空似的，牠握著雙拳生氣怒吼，好像有一千個魔鬼在抓牠的頭髮。馬克思晚年時，大家都叫他「老尼克」(Old Nick，撒旦的別稱)，他最小的兒子還叫他「魔鬼」。的確，魔鬼和叛逆者都是浪漫主義者最常用的面具，然而我們這位魔鬼角色卻要比浪漫主義的乖僻世界豐富得多。

第二首詩描寫兩位情人之間的對話，情人說，吾愛，你的哀傷刺痛了你——你在我的氣息底下顫抖著。你喝盡了你的靈魂：閃亮、我的珠寶——閃亮，閃亮，喔，年輕的血！——親愛的，女孩回答，你看起來很蒼白，不愛說話。聽那天上飄下來的音樂！親愛的，情人說，音樂飄下來，而且閃亮著——我們一起私奔吧，讓我們的靈魂緊緊結合在一起——然後，耳語，戰慄的眼神：親愛的，

你喝了毒藥，你一定要和我一起離開。夜已降臨，我再也看不到光了——他用力把她擁抱過來，她死在他懷裡。她被深沈的痛苦刺戳著，她的眼睛再也不會張開。

老馬克思於一八三八年五月去世，馬克思和燕妮於一八四三年的六月成婚，是時他已從柏林大學畢業兩年。

第十四章

馬克思決心要改變世界

馬克思第一個階段的偉大工作，乃是全心全力投注在以當時德國現況去看德國哲學思想的研究上面。

我們如果從法國大革命的立場去接觸德國的哲學世界，則會覺得德國哲學很怪異。當時法國的一些抽象理論——不管是自由、平等、博愛，或是傅利葉的和諧及熱情等原則——至少都是一些期待喚起社會和政治改革的社會原理，可是比較之下，當時德國的抽象理論就顯得很不著邊際，像是不定型的模糊神話，彷彿懸在柯尼希堡(Königsberg，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出生地)和柏林上空的雲端，偶爾以仲裁之神的姿態降臨現實人間。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就認為德國哲學家不能為社會提供任何實際原理，主要得歸咎於一種過時的封建政權所帶給他們的束縛，舉例來說，康德的「自我決定論」(self-determination)可以說正是法國大革命對德國中產階級之影響的知性反省，不能說沒有衝擊力量，但始終還是無法擊倒舊的體制——因此，此一「意志」終究還是「自圓其說的意志……成爲一種純意識形態的決定論及道德的假說」，對現實社會毫無影響力可言。

黑格爾認為社會，亦即「國家」，乃是絕對理性的實現，個人必須服從。他後來又補充說明，他所謂的「國家」指的是「完美的國家」。黑格爾晚年由於政治立場和社會地位的關係，他更進一步公

開聲明，所謂「完美的國家」已經由當時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I)統治下的普魯士加以具體實現，社會已經停止發展，其模式已然臻於完美堅固。然而此一「完美國家」的狀態只是德國理想主義陰影下一種精神的象徵而已，是一種原始的神聖「觀念」(Idee)的產物，透過理性而實現。國王是「君權神授」的代表，他的權力和地位是至高無上的，由最進步的黑格爾思想加以提升鞏固，並成爲行政的最高指南。

然而，黑格爾還是有他的革命原則，在他還沒有成爲普魯士大學教授之前的年輕時代，法國大革命曾經帶給他相當程度的震撼，他仔細研究過大革命的前因後果，他認爲這是一個社會汰舊換新的有機過程，無可避免。那麼，爲什麼這些過程會突然爆發呢？法國一八三〇年的另一場革命曾經帶給德國騷動不安，雖然很快即告平息，卻帶來一股反動的力量，其中的一個特點即是企圖恢復正統宗教。這時一個新的黑格爾學派趁機興起，他們想用黑格爾的思想來對抗基督教。一八三五年，大衛·史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 1808-1874, 德國基督教神學家、哲學家)出版他的《耶穌傳》(Life of Jesus)，這本傳記可以說是黑格爾思想影響下的產物，黑格爾要德國人了解人類體制的發展乃是不同民族的天才所努力而來的結晶。大衛·史特勞斯和黑格爾都一致認爲基督教代表一種理想的真理，但是《耶穌傳》中質疑四大福音書並非真實歷史紀錄，而根本就是神話，這倒令德國人感到吃驚訝異，福音書的最早根源固然是有跡可查，卻是想像多於事實，是早期基督徒無意識的想像作品。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四一年之間，布魯諾·鮑爾(Bruno Bauer, 1809-1882, 德國青年黑格爾學派代表人物，與其弟艾德加皆曾與馬克思爲友)出版他對福音書的批判，他企圖消除福音書中的神話成分，他研究新約聖經的許多文件資料，證實這是偽造的作品，甚至根本就認定：耶穌並不存在。鮑爾等於全盤否定了基督教，但他仍是臣服於黑格爾學派，他後來發展出一套「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的理

論，說明現實中任何事物如果脫離了精神就不存在，而人的肉體和靈魂是分開的，這在哲學上仍屬一大懸案。

一八三七年，馬克思還在柏林大學就讀時，他獲准加入「學者俱樂部」，鮑爾是其中的會員，「青年黑格爾學派」(Young Hegelian)的運動正是從這裡發展而來。馬克思起初相當信服黑格爾的哲學，這是當時德國思想界最具權威的學術，但很快隨即加以反抗。馬克思不信神的原則與「絕對觀念」(Absolute Idea)互相抵觸，他在博士論文中(有意思的是，他所運用的還是黑格爾的方法)這樣寫道：「哲學的天職在於呈現事實，其教條正是普羅米修斯的教條——簡單的講，不信神。其出發點即在於反對地上和天上所有的神祇，因為神並不認同人類自我意識本身的至高神聖性。」我們將會看到，這裡馬克思所說的人類自我意識絕不會只是一種普遍的抽象概念，這與鮑爾所定義的自我意識會有所出入。

鮑爾此時是波昂大學的教授，他答應馬克思要為他在那裡弄一個教書職位，馬克思也期待和他一起共事，他們曾經一起撰文嘲弄黑格爾學派，也一起討論過要出版一份無神論者雜誌。然而，當馬克思畢業之時，鮑爾由於反宗教和主張立憲而被當局杯葛，第二年春天終於被炒了魷魚，馬克思想進波昂大學執教的希望也跟著告吹了，我們這位號稱是當時德國新一代最有才華的哲學家，許多人看好只要他一踏進大學講堂，整個德國會立即對他刮目相看，然而，年輕的馬克思博士本來以為他會繼康德、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von Fichte, 1762-1814，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及黑格爾等先輩大師之後，在學術方面大放異彩，如今整個希望泡湯了，他和學術生涯也從此永遠無緣。

一八四〇年，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繼承王位，許多人期盼他們的新王會有一番新氣象，

然而，他只是帶來另一次新的封建保守傾向而已，這時德國人終於覺悟到非採取政治行動不可了。十九世紀的四〇年代，他們還沒有國會，也沒有陪審制度，更沒有言論和集會的自由。這位新王本著中世紀遺留下來的浪漫式君王思想，他根本不理會這些。同時之間，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思想已經開始騷擾著德國的哲學和政治，起先從法國的源頭逐漸滲透入萊茵河地區，這塊地區可以說是發展他們社會主義思想最理想的園地。這裡種葡萄釀酒的農人都很窮困，當時由於普魯士和海西亞（Sachsen，德國西南部地區）的關稅同盟關係，他們釀造的酒無法和外界一起競爭，政府又根本不理會這個。聖西蒙教派的思想很快沿著莫塞爾河一路發展過來，當地的主教不得不出面將之斥為異端邪說。一八三五年，一位叫加爾（Ludwig Gall）的德國人在特利爾出版一本社會主義的小冊子，書中宣稱有產階級和勞工階級的利益根本是互相對立衝突。一八三四年，老馬克思曾經主持幾次政治宴會，會中不斷斷論要求成立國會，大家並且大唱〈馬賽進行曲〉，特利爾當局禁止當地報紙報導這些消息，還驚動了當時尚未稱王的威廉王子——此後，這類活動都納入了警察的監視範圍。

一八四二年的前面幾個月，馬克思寫了一篇文章批評新的普魯士檢查制度，在這篇文章中，我們首度見識到馬克思銳利無比的批判才華：無懈可擊的邏輯分析以及咄咄逼人的機智，這些都是他日後對付壓榨人權者的有利武器。這篇文章自然通不過當時的檢查標準而不准在德國刊登，卻在一年後發表於瑞士，雖然隔那麼久才和世人見面，但馬克思初試啼聲，卻在西方世界獲得了熱烈的回響。

他現在開始為《萊茵新聞》（*Rheinische Zeitung*）撰寫文章，這是在科隆（Cologne）地區發行的一份自由派報紙，科隆是當時萊茵河地區的工業中心，支持這份報紙的正是當地有錢的企業界老闆，他們的利益和舊天主教社會時有衝突糾紛發生，他們需要一個發表意見的園地。當時為這份報紙寫文章

的都是一些年輕知識分子，馬克思在一八四二年的十月甚至還成爲這家報紙的主編。

馬克思爲《萊茵新聞》工作，這才發現他所面對的都是黑格爾無法爲他解決的問題，當時的萊茵議會由威廉四世召集會議，爭論要否通過懲戒盜林法案（這裡所謂的盜林指的不過是在林中撿拾木柴），馬克思發現，在林中撿拾木柴是當地農民自中世紀以來即擁有的權利，如今新政府企圖加以剝奪這項權利。他用一種諷刺筆調寫出他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他認爲盜林和撿木柴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當局的做法顯然有意混淆是非，根本是不公平不恰當的。馬克思花了一天一夜的時間寫出這篇痛陳時弊的宏文，他直截了當指出政府並不把人當人看待，其做法就是要置人民於死地才罷休。他的文章獲得當地居民的熱烈回響，大家紛紛寫信給報社，同時也提到莫塞爾河地區釀酒業的悲慘處境，馬克思著手調查這件事情，發現情況的確很糟，但是他在處理這件事情時卻和萊茵地區的政府發生了對立衝突，接著又和當地另一家敵對的保守派報紙發生筆戰，對方罵他們有共產主義傾向，當時的馬克思對共產主義並不是很了解，這下子他們把他的興趣挑了起來，他決定開始好好研究什麼是共產主義。

《萊茵新聞》在馬克思的手上只撐了五個月之久而已，由於批評俄國沙皇政府，終於被查封停刊。

由於這樁事件的緣故，迫使馬克思離開政治，重新回到更大範圍的觀念研究上面。他說，整個政治氣氛太齷齪難堪了，他在寫給一位友人的信中這樣說：「用屈膝卑躬的姿態去爲自由奮鬥真是糟透了，你只能用大頭針，而不是木棍。我對假道學、愚蠢、兇暴的當局，以及我們的因循苟且姿態實在是厭煩至極，現在當局又終於還我自由了。」他在這同一封信中又繼續提到，他現在終於完全脫離家庭了，母親還健在，他根本沒有資格要求父親的遺產。他和燕妮訂婚了，兩個人時刻都不能分離。「現在德國已經沒有我容身之處，繼續待在這裡，只會徒然降低品格而已。」

然而，馬克思在離開「祖國」之前，還要跟黑格爾好好格鬥一番，黑格爾的理想主義至那時之前仍然盤踞他整個心扉，他的政治思想如何和黑格爾的律則哲學決裂，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留待他和恩格斯開始合作之時再談，我們不妨先總結他這幾年之間的動向，萊茵地區的經驗，讓他深刻體驗到人性的貪婪，他看到德國理想主義哲學的一無是處，他更看到地主欺壓農民的醜陋嘴臉，而他自己更是被排斥於大學講堂之外，甚至連寫文章表達自己的意見都被禁止，他幾乎等於是動彈不得了。

當時除了史特勞斯和鮑爾之外，還有一個叫做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 德國哲學家)的學者，他也是以批評宗教聞名於世，他於一八四一年出版《基督教的本質》(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一書，這本書對馬克思那一代的年輕人也曾經造成很大的影響。費爾巴哈認為黑格爾的「絕對觀念」為了體現理性，不免也要和物質結合在一起，為何必須如此，黑格爾自己也無法證明，「絕對觀念」要說明的無非是神如何化身為肉體罷了，而黑格爾自己也只不過是基督教的最後一個偉大辯護者而已。我們要忘掉「絕對觀念」，好好去研究人和世界的關係，最後我們一定會發現，宗教的傳聞和一切教規說穿了只不過是人類心靈的外在表現罷了。

費爾巴哈的成就在於抽離史特勞斯的宗教想像成分，並且在鮑爾的純自我意識注入倫理的要素，然後將宗教和群眾結合在一起，成為生活中的一個部分。他自己企圖製造一種替代宗教的東西，一種以性和友誼為基礎的對愛的崇拜，然後在人性中建立一種理性。

他適時為馬克思提供一個全然摒除宗教的憑藉，馬克思不要宗教之後，他的下一步工作正是要把人的情感和道德置入社會的變遷之中，他同時要把德國哲學中的「意志」的觀念轉化成為實際的行動，這種「意志」的哲學從來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假說，即使像費希特那樣注重行動的哲學家都

免不了受其蒙蔽，如今他要做的就是將此一抽象概念付諸實際的行動。

他在一八四五年做了許多評論費爾巴哈的筆記，他認為以前的唯物主義其缺點乃在於過分注重外在事物對心的作用，認為心是完全被動的，而理想主義的缺點則在於其觀念在現實世界中完全派不上用場。一種思想的實際與否要看其是否能在行動中發揮作用，我們真正接觸到的是外在的世界，我們唯一能掌握的就是我們和外在世界之間的關係，我們在外在世界中只有採取行動，如果我們用我們的觀念改變了這個世界，那麼就可以證明我們的觀念是正確的。

像歐文那樣的烏托邦主義者相信不同的教育會塑造出不同的人，在現實中歐文無疑是個唯物主義者，但他自己卻無法解釋他憑什麼可以教育別人，他和他人一樣，都是繼承前代而來，處在相同的環境之中。那麼，這個世界是否存在兩種人類？不，在人類的活動中只存在有一種動力原則在運作，我們如何解釋世間事物之變遷和我們人類的努力兩者之間的吻合現象？

費爾巴哈想像一種有抽象宗教情感的抽象人，但是在現實世界中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他的宗教情感和和他的其他情感一樣，都是與他所生存的環境和時代息息相關，這裡的問題在於能否將宗教的超自然觀念導向實際行動，進而改變這個世界。

至於傳統的唯物主義，其觀念一樣脫離了社會性，他們把人類獨立成個人去看，然後才形成一種「公民的」組織。馬克思所提出來的新唯物主義乃是從一個更為有機的觀點來看待人類，那就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

我在此只是依照文件資料加以轉述而已，卻引來許多的爭論和批判，我從未在這些資料上加上任何自己的意見或加以分析解釋。馬克思從未真正發展他這方面的哲學，這是一八四八年的前夕，他早就急於拋棄舊的哲學問題，正準備要展開他的革命事業。看來他只是隨意勾勒一下他的行動方

針而已，他在他的筆記最後以一句話總結他對當時處境的看法：「歷來哲學家只是不斷以各種方法在詮釋這個世界，現在，情況要改變了。」

第十五章

恩格斯：來自曼徹斯特的年輕人

一八四二年的秋天，當時馬克思還在編《萊茵新聞》，有一天，一位曾經在他的報紙上投稿的年輕人來探訪他。這位年輕人看來一副極度聰明的樣子，他是萊茵河區一位工廠老闆的兒子，最近剛剛開始信仰共產主義，他正要前往英國，現在路過科隆，他的父親在曼徹斯特有生意等著他去料理，同時，此行也想順便看看那邊民權運動發展的狀況。

當時的馬克思才剛剛開始接觸有關共產主義的東西，對曼徹斯特也幾乎是一無所知，因此對這位年輕人的來訪表現出非常冷淡的樣子。另外還有一層理由，原來此時馬克思正在與以前柏林的那批朋友吵架，他和他們之間的過節其實很簡單，柏林那批青年黑格爾學派的人由於受到當局的壓制，退縮到純理論的不妥協姿態，標榜純粹無神論和純粹共產主義，完全與社會隔絕，一方面對實際行動又無能為力，最後只好靠裝瘋賣傻來譁眾取寵，其風格有些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流行一時的達達主義，他們的目的就是要驚嚇世人，要全世界的人都來注意他們。馬克思很討厭這種行徑，並認為擺不妥協的姿態是沒用的，他只想把手上的報紙變成一種政治利器，這批柏林的朋友投來的稿子全部被他退回，兩邊之間的過節由此產生，最後竟演變為反目成仇。因此，當這位年輕人風塵僕僕出現在他面前時，他懷疑他是柏林那邊的敵人派來刺探消息的特務，他不但對他冷淡，還不分青紅

皂白請他快快離開。

這位年輕人名叫佛烈德利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年紀比馬克思小兩歲半，但在當時已經是個小有名氣的作家了。他於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巴爾曼(Barmen)地區的一個工業鎮，那裡有許多石頭建造的漂亮房子，在街道兩旁排得整整齊齊。在房子與房子中間有時可以瞥見一條叫做烏伯(Wupper)的清澈小河，小河緩緩流入萊茵河，河的一旁沿岸有許多綠色的漂白工廠、紅色屋頂的房子、花園、草地及樹林等，恩格斯十八歲時曾經用匿名方式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報紙上，描寫這一帶地區的美麗景觀，但是，他文章中寫道，烏伯河的另一邊岸上，景觀恐怕就不太一樣了，我們看到艾伯菲(Eibfeld)狹窄而沒有特色的街道，德國的第一家紡織工廠即是在此設立，河岸上到處是紡織工廠，底下的河水是一片紫色，全是染料的顏色。恩格斯注意到「德國以前特有的清新而有活力的公眾生活」已經在他的家鄉小鎮消失不見了。我們也許從未聽過艾伯菲和巴爾曼兩地的古老民謠，以前的磨坊工人會用猥褻的聲調輕輕吟唱，有時喝醉酒時就乾脆在大街上引吭高歌。以前喝啤酒和萊茵葡萄酒是很愉快的事情，現在許多廉價的酒水不斷從普魯士傾銷進來，把酒館的格調破壞無遺，變得粗俗不堪，許多工人每晚都要在那裡喝得酩酊大醉，經常打架鬧事，有時甚至還拿刀互相廝殺，每當酒館一打烊，許多人喝醉酒了就隨地在外面的稻草堆或馬廄裡睡覺，有的甚至掉到糞坑裡淹死了。

恩格斯寫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理由很簡單，這些人成天在屋頂很低的房間裡工作，每天不斷吸進灰塵和煤煙，他們必須整天站在織布機前或蹲在火爐旁邊不停工作著。有很多人甚至從六歲開始就把生命耗擲在那裡，生命簡直毫無樂趣可言，他們生活中唯一的慰藉就是上帝的福音和喝酒。

恩格斯的父親就是紡織工廠的老闆，他在曼徹斯特和巴爾曼兩地都設有工廠，他雖然不喝酒，

卻對上帝的福音非常熱中。恩格斯的祖父在十八世紀後半創立了他們家的產業，據說他是第一個成立工廠社區蓋房子給工人住的工廠老闆，房子所有權歸工人，然後從他們的工資中扣繳房子貸款。恩格斯的父親在觀念上也很進步，他是萊茵地區第一個引進英國機器的工廠老闆，他同時是該地區喀爾文教派的領袖，該教派以嚴酷和頑固聞名遐邇。

恩格斯的個性非常活潑可人，他雖然在嚴格的神學環境中長大，卻很熱愛文學和音樂，至於宗教情操的束縛，他必須花很長的一段時間才加以擺脫。他的父親教誨他做人要「虔誠」，這個意思就是要努力認真工作，而努力認真工作的對象就是自己家裡的事業。他不准有人在家中讀小說，而恩格斯希望成爲詩人，父親則斥之爲無稽，他覺得這個小孩不夠穩定，就送他去不來梅(Bremen)一位牧師家學習教規，同時在一家公司學習出口生意的業務。史特勞斯的《耶穌傳》一書爲他指出理性批評的一盞明燈，幾個月來，他自稱爲「超自然主義者」，他不斷想擺脫宗教的束縛，結果，他終於在黑格爾的「絕對觀念」之中重新尋得了他那已經失落的上帝。

他寫戲劇和歌劇的評論，也寫旅行遊記和神秘故事，他寫了許多以東方背景爲題材的詩，他喜歡英國詩人雪萊的詩，還把他的詩譯成德文。他也寫以自由爲主題的狂想詩，他歌頌自由，把自由帶給全德國，使德國變成像沒受工業污染的萊茵地區，大家脾氣很好，都愛笑，都很誠實坦白：新的太陽、新的酒及新的民謠！

年輕時代的恩格斯樣子很迷人，他長得瘦瘦高高的，一頭棕色頭髮，兩顆藍色的眼珠子炯炯發亮。他不像馬克思一副冷酷深沈的樣子，他的個性很隨和活潑，很喜歡說笑話。在不來梅的時候，他每天運動，擊劍或騎馬，至於游泳，他可以一口氣在威塞(Weser)河兩岸間來回游四趟。他善於觀

察，他常常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畫許多他所看到的人物：胖胖的股票經紀商，他們每次開口講話一定先來一句「依我看來——」；留往上翹八字鬚或留腮邊鬚的年輕人；他的一位行為怪異的老合夥人，每天早上喝醉酒之後就跑來他屋前，然後拍著胸脯大聲說：「我是這裡的公民！」不用馬鞍的馬車夫，以及在甲板上堆滿咖啡的船夫；一群寒酸落魄的厭世派(Welshmen)詩人，其中有一人，恩格斯還建議他，想變瘦的唯一可靠方法就是去寫一本關於厭世派的書。他自己寫詩就像寫散文那般容易，他可以輕易學通一種外國語言，所以他精通多種外國語，當時他在年輕商人俱樂部中最感愉快且最叫人刮目相看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可以在那裡讀懂世界各國的報紙。他喜歡喝好酒，酒量因而特別好，他有一張很有趣的畫，畫中有一個老酒棍正在品嚐發酸的老酒，一旁是個推銷員酒商，正在勸對方買酒。恩格斯也極愛好音樂，他參加過一個歌唱社團，還為他們寫過一些曲子。他有一封寫給妹妹的信，信中提到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鋼琴家)最近剛到不來梅開一場演奏會，他說李斯特非常迷人，許多婦女都被他迷得東倒西歪，她們把他喝過的茶葉偷偷收藏起來，帶回家做紀念，但李斯特對這些婦女似乎不感興趣，他演奏會一結束就和一群學生去酒館喝酒，他很慷慨大方，一口氣就花了三千泰勒(Fthal)之多請客——可以想像他平常是怎樣花錢的！

我們看得出來，恩格斯是一個多麼會享受生活的人。馬克思的思想，從道德眼光看可以說相當寫實，有時固然也摻雜一些想像的成分，但大抵而言，總還是充滿許多抽象邏輯的推論，多少帶有神秘的氣息，他幾乎不去觸碰一般人類。恩格斯對世界的感覺則非常不同，他用自然的眼光看這個世界的一切，他用一種單純的心思去深入他人的生活之中。馬克思在讀大學時很少寫家書，有的話也只是跟家人述說他的志向，恩格斯跟家庭的感情則十分親近，即使在不來梅時也是如此。他每次給妹妹寫信，總會從妹妹的眼光去看自己的經驗——從一八三八年某一天他對她詳細描述一隻母雞

帶著七隻小雞，其中一隻黑色小雞如何上前吃他手上的小蟲，到一八四二年他告訴她關於他的一隻新的小狗，這隻小狗如何「展現適應酒館生活的能力」，牠在圓桌上如何被餵食以及如何被教導狂吠，「簡直像個貴族！」他對妹妹巨細靡遺描述這些日常生活瑣事，他想像他們在家裡的生活情況，大家圍在一起聽父親唸無聊的聖經，除此，大家生活愉快，充滿規矩和教養。他想像自己跟蹤她回去寄宿學校，看著她回去過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寄給她許多挖苦嘲弄而且十分有趣的詩，有一首詩描寫她曾在波昂遇見的一個跛腳學生，他要她知道，這個學生其實比她想像的更迷人、更英俊。

有一天他去碼頭的一艘船上玩，那是一艘準備開往美國的船，上頭的船艙「很優雅，布置得很舒服的樣子，像是貴族的沙龍，桃木的家具，還鑲著金」。可是他往下層的船艙走下去，他發現那裡「人疊人，好像街道上疊在一起的石頭」，男女老幼，還有生病的，大家抱著自己的行李擠成一堆。他想像他們在暴風雨肆虐的大洋中漂流，大家擠在一起，還必須把唯一的通風口關閉掉。他看得出來這些都是誠實善良的德國人，「絕對不是祖國裡惡劣的一群人」，但是祖國凌虐他們，他們只好選擇離開祖國。

一八四一年的秋天，恩格斯離開不來梅前往柏林服兵役，他選擇柏林，因為那裡的大學吸引他。他從未接受過學術訓練，但是他想學哲學。他一到那裡立即和曾經影響過馬克思的青年黑格爾學派攀上關係。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即是出版於那年，這本書對恩格斯產生很大的影響，他從此脫離神學的束縛而走向人類行動的道路。同一年，一個叫做摩西·海斯(Moses Hess, 1812-1875, 德國共產主義者)的人出版名為《歐洲三巨頭》(The European Triad)的書，他是一位猶太製造商的兒子，曾經在英法兩地四處旅行，他認為如果不消除惡性商業競爭，國與國之間的怨恨就不可能消失，他是把聖西蒙主義帶入德國思想界的第一位德國作家。恩格斯後來在科隆遇見他，經由他而立即轉

化爲信仰共產主義。

次年十一月恩格斯前往英國，停留整整二十二個月之久，這段時間英國剛好碰上前所未有的經濟蕭條，曼徹斯特的棉紡工廠幾乎全部停擺，街上到處是失業的工人，他們向過路行人強行乞討，態度十分惡劣。早在該年夏天之前，要求開放全民選舉的民權運動以及要求勞工代表進入國會的呼聲達到了高潮，英格蘭北部全面罷工，後來鬧到以警察向鬧事群眾開槍爲收場。隔年五月，又發生製磚工人罷工，也是以流血收場。在威爾斯地區，被剝削的農人群起攻擊稅吏的住屋洩忿。

恩格斯以一個外國人的冷靜眼光觀察這一切，他拿自己的家鄉來和這裡做分析比較。他仔細研究整個城市的結構，他發現城裡商業中心的外圍是勞工階級散布的地帶，而勞工階級散布的地帶另一邊則是別墅和花園，四周圍則爲美麗的田園風光所圍繞，這些別墅的主人如此設計的理由，就是爲了每天來回於證券交易市場和住所之間，可以避免看到勞工階級生活的慘狀，因爲他們每天經過的街道上布滿許多商家，剛好遮去了背後骯髒悲慘的另一片天地。然而，當你走在曼徹斯特的街道上時，仍然難免看到一些跛腳走路的人，他們的膝蓋往內彎，脊椎骨也變了形，這些殘障的人剛好順便提醒你，曼徹斯特的繁榮正是這些人付出代價在背後推動出來的。

恩格斯很仔細觀察這一類人，在這同時，他愛上一個叫做瑪麗·彭斯(Mary Burns)的愛爾蘭女孩，她是恩格斯工廠裡的女工，最近才剛調升職位，負責操作一種新型的自動機器。她是一個個性獨立的女孩，據說恩格斯曾經跟她提議不要再當女工，她拒絕了，不過，她倒沒反對他在沙福(Salford)郊外弄一個小房子給她和她的妹妹住。恩格斯從此過著一種怪異的雙重生活，白天他奔波於工廠和城裡住家之間，晚上則和彭斯姊妹一起度過，他正準備寫一本書揭發工業生活的黑暗面，瑪麗是個極

端的愛爾蘭愛國主義者，剛好刺激著恩格斯的革命熱情，同時又成爲他探查這個城市黑暗面的最佳嚮導。

他看到許多工人像一堆老鼠蟻集在簡陋狹窄的住屋裡，全家人或好幾家人擠在同一個房間，不分男女老幼，生病或健康，全都睡在一起，不但沒床，也沒家具，因爲全都拿去賣掉當柴燒了。地窖又濕又冷，許多人甚至擠在那裡和豬隻睡在一起。他們吃發霉的麵包和腐爛的食物，住的地方又毫無污水處理設備，滿地糞便，臭氣沖天，病毒到處孳生，傷寒和霍亂的傳染病普遍流行，甚至外溢蔓延到那些別墅花園地區了。

一般工廠喜歡雇用女工和童工，因爲工資便宜，結果造成男人大量失業。許多正在發育的男女童工，由於長期負重工作，造成發育不良，體形扭曲。許多婦女懷孕或產後仍未恢復健康，一樣要工作個不停，很多人因爲無力工作而被解職，爲了求生最後只得淪入風塵。至於童工，他們大都六歲左右就要住入工廠參加勞動，教育和遊戲一概付之闕如，父母也不管他們的死活，因爲他們自己也忙著在工廠勞動，這些小孩日積月累受剝削壓榨，最後沒有一個是發育正常的。在鐵礦和煤礦的礦坑中，許多男女，甚至小孩，在暗無天日的惡劣環境中夜以繼日出賣勞力，還要冒高頻率的意外傷亡危險，據估計每年有一千四百人由於意外災難而死在礦坑裡，不是纜繩斷了就是通風設備不良產生爆炸，那些倖免於難的也大都以染上肺病收場。至於農人，自耕農的處境稍好，沒有土地的佃農大都要仰賴地主的鼻息，有時甚至要淪爲無事可做的游民，沒有人理會他們的死活，他們要是敢偷取地主的東西，下場是抓去官府嚴辦。

在恩格斯眼中看來，中世紀農奴的處境怎麼樣都比這裡工廠的工人要好得多，他們至少附著於土地之上，有其一定的社會地位。這裡的工人不是，他們只是生產的工具，毫無存在的尊嚴可言。

這段時期，嚴格的勞工保護法尚未成立，許多以前的農人、手工藝者、甚至小中產階級，他們莫名其妙紛紛投入工廠和礦區的生產勞動。一碰到經濟蕭條，這些人變成無事可做，許多人淪為街上的小販或清道夫，或根本以乞討為生——有時甚至全家大小一起出動，沿街乞討食物——等而下之的，就去當小偷或出賣靈肉。恩格斯說，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英國經濟學家)認為人口不斷增加的結果，生存所需的物質就會變得不夠分配，許多人就會淪於慘境，社會的罪愆於焉產生。新的「濟貧法」基於此，以違反人道原則把許多貧民區改為監獄，專門關窮人，窮人寧可在外頭挨餓也不願被關進監獄。

這一切帶給恩格斯許多啓示，他看到勞工問題終於被帶進國會討論，大家在討論中產階級反對的「穀物法」之餘，終於開始猛烈辯論「濟貧法案」(Poor Relief Bill)和「工廠法」(Factory Act)的問題，他認為「階級的對立已經完全改變了政治生活」。他現在終於能夠更進一步體認到所謂經濟利益的重要性，這個問題過去許多史家不是過於小看就是完全加以忽略了，他的結論是，在現代的環境中，這個問題毫無疑問已經躍為首要之務了。

他在倫敦看到那麼多人口，感到訝異無比，覺得這些人就像是空氣中的塵粒，這些人，「難道不都是來自各階層的人類，一樣都在追求幸福嗎？難道他們追求幸福的方法和手段不一樣嗎？他們照來攘往，各行其是，好像他們之間沒有什麼關聯似的，大家各走各的，不互看一眼，大家擺出一副冷漠的姿態，只顧關心自己的利益，卻要聚集在一起。」

其實，十九世紀的當時情況正是如此，其思想的核心正是自私和利己，不管別人死活。當時的歷史學家米西列，他寫作的時代和恩格斯差不多，他就慨嘆他的時代正在流行個人自我主義，不斷在和社會團結的理想抗爭，他回頭去挖掘過去的歷史，去找出國家和人民的源頭，同時與之認同，

並對「人民」產生一種信心，用以對抗當時個人的孤立現象。年輕時代的馬克思就曾提出，要為人類服務，首先就得驅除利己主義之心。對聖西蒙而言，天主教和封建體制的瓦解，讓他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最混亂的幾年之間能夠建立起一套階級制度，為未來的社會理出一套秩序。至於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像傅利葉，他們本來就厭惡社會的競爭，他們就構想出一套新的合作方式來抵制人與人之間的惡性競爭。

工業文明換來的代價是不斷製造血腥衝突，接下來是一連串的妥協。在當時二十幾歲年紀的恩格斯眼中看來，一個社會已然混亂到這個地步，似乎只有引發一場內戰才能消除競爭和剝削的制度。英國的中產階級已經分散到兩個對立的陣營之中，英國社會到最後會變成只剩下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和極度富有的有產階級互相對抗的狀況。他認為已經無法期待這批有產階級會有什麼妥協，他們根本不理會現實的情勢。他有一次在曼徹斯特和一位英國富紳談起這裡的悲慘狀況，他說他從未見過一個「這麼惡劣的城市」。這位紳士仔細聆聽之後，跟他說：「可是許多財富正是從這裡製造出來的，不是嗎？日安，先生。」

恩格斯認為這裡的「知識分子」實在一無用處，他們在學校讀書時被迫學拉丁文和古希臘文，現在只知道讀聖經註解和長篇小說。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蘇格蘭散文作家、歷史學家)剛剛出版《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一書，似乎只有他意識到英國當時處境的嚴重性，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觀點竟充滿了德國哲學錯誤的意識形態：要求人要相信上帝而不要相信他們自己。恩格斯認為現在英國迫切需要的是一種新的德國哲學，說明人最後會成爲他們自己的主宰者。

依當時情況看來，英國的工人很可能會採取暴力手段去爭取自己的權利，果真如此，這會使法國大革命看起來像一場溫和的遊戲。如果工人當權，他們有可能會建立一個和諧團結的社會。恩格

斯心目中所構想的完美共產主義社會與聖西蒙死前所揭示的可說相去不遠，他現在更進一步了解到，想達到這種境界，光是期待其自然發展是不夠的，一定要拿出行動才能達到預期的結果，他已經在民權運動者所標榜的口號中看到了他所期盼的：「政治權力是手段，社會幸福是目標。」

第十六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合作

同一時期中，馬克思已經結婚成家，一八四三年的十月他帶燕妮前往法國巴黎，此時他已徹底研究了法國的共產主義，同時正在研究法國大革命，他打算寫一本關於這方面的書。

一八四四年的年初，他在《德法年鑑》(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雜誌上讀到一篇恩格斯從英國寄來的文章(馬克思自己也是這份雜誌的撰稿者)，這篇文章以相當精闢獨到的眼光談論當時英國的「政治經濟」問題，恩格斯談到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 英國經濟學家，著有《國富論》，主張經濟自由放任)、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 英國經濟學家，主張自由貿易)、馬庫洛區(John Ramsay MacCulloch)及彌爾(James Mill, 1773-1836, 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功利主義代表人物)等人的經濟理論基本上只是一種假道學的理性學說，掩飾了私有財產制度背後的貪婪企圖，而這終究危害到了英國的人民：「國富論」使大多數人變窮了，「自由貿易和競爭」使許多人成爲奴隸，同時更鞏固了中產階級的壟斷行爲——所有的貿易理論均是一派謊言；對於抽象價值的討論則盡其所能談得更抽象些，藉以掩飾實際狀況：透過商業交易行爲來剝削勞工階級，以繁榮的假象來粉飾危機。馬克思讀完這篇文章之後立即和恩格斯開始通訊，然後立即著手研究這些英國經濟學家的理論。

八月底的時候恩格斯從英國經由法國回德國巴爾曼家鄉，他一到巴黎便立即去探望馬克思，這次見面，兩人一見如故，同時發現兩人之間有太多話要談，竟忍不住相處了整整十天之久，兩人之間在文學和知性方面的合作於焉開始，他們對許多事物的看法都不謀而合，以至於可以互相補足。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就像通了電的銅和鋅，他們熱烈討論一八四八年前夕逐漸退了色的黑格爾學說，他們一起合作鍛造出一股新的思潮，為當時社會注入新生命。這股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形成實在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馬克思—恩格斯體系可以說是三百年哲學和勞工階級觀念的結合，是許多思想的結晶，然後經過調和之後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我們在此無意去追溯所有思想家如何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沒有這個必要，我在本書中所使用的焦點式敘述方法無意把讀者導向一個錯誤觀念，以為偉大思想是某一特殊族類的偉大人物所創造出來，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一些人物他們的社會主義思想如何演變而來，席德尼·胡克(Sidney Hook)教授在他那本精彩的大作《從黑格爾到馬克思》(From Hegel to Marx)一書中，即準確指出馬克思和德國哲學之間的關係。我前面討論過的那些人物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形成他們思想背景的基础，有許多來源未必都是清晰明瞭的，有的來自一些街頭暴動者，有的來自無名的政治家或新聞記者，有時則是來自一些宣傳小冊子或市井百姓的閒談，有時甚至是來自一些含混無意識的想法等等。

因此，我們不妨趁此勾勒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那個時代，從十九世紀初葉以來，整個大環境的思想是如何發展出來的，然後說明他們是怎樣和這些思想結合在一起，以至進一步發展出他們的套體系。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們那個時代的人從黑格爾的哲學中所獲得的最重大啓示，就是歷史變遷的觀念，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三年之間的冬天，黑格爾曾在柏林大學講授「歷史哲學」（我們該記得，米西列在隔年發現了維科），他以一種抽象而神秘的口吻強調一個概念，即歷史上許多偉大的革命人物，他們以過人的意志撼動山河，但我們別忘了他們背後推波助瀾的社會要素。他舉例說，凱撒（Caesar）在四處征討並擊敗政敵之後，一手摧毀羅馬帝國的體制，然後登上權力的最高峰，他當時如此做法有其不得不然的趨勢，只有獨裁手段才能整合龐大的羅馬帝國。

黑格爾寫道：

大環境需要他如此做，他只是順手推舟而已，歷史上許多偉大人物的豐功偉業莫不是如此得來，他們的個人目標和大環境的意志緊密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稱他們為英雄，因為他們的作為並非源於事物的正規運作方式，而是來自一種看不見的泉源——並非現象存在的那種——那是一種內在的精神，隱藏在表面底下，在適當的時機才爆發開來。他們把自己呈現出來，由內而外發散出一種力量，撼動四周圍，改變整個歷史，此即他們生命目標的核心所在。

這類人物在從事行動之時，並不理會一般觀念的存在，他們是講究實際的政治人物，但他們同時也是思想家，他們很了解時代的需要——事物發展的適當時機，此即他們的時代和環境對他們的要求，因為大環境已經在醞釀變化，他們適時走出來，順手推上一把。因此，這些歷史人物——時代的英雄——大抵都能深謀遠慮，他們的行爲，他們說的話，都是時代的最佳圭臬。這類人物以他們的目标來滿足自己，而不是滿足別人，別人給他們的意見或建議可能會限制他們生涯的發展，因為他們實際上看事情比別人看得更清楚，了解得也更透徹，所以是他們給別

人意見和建議才對。主導他們一切行徑並且讓他們能夠在歷史中昂首闊步的，正是一種看不見的內在精神，而這種精神盤據在他們的內在，你感覺不出來，等到他們把這種精神散發出來時，你會跟著他們走，他們是群眾的精神導師，他們的內在精神由於群眾的認同因而更形擴張開來。

我們稍後會更進一步探討黑格爾的歷史變遷觀念中特殊的動力原則，這裡我們不妨先了解他的一個概念，他認為每一個時期的人類社會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總體。他說：

我們要說明，一個民族所採行的體制形成爲一種實體，一種精神，這其中包含宗教、藝術及哲學，或者說，包含許多的觀念和思想，換言之，即是一般所謂的文化，當然其外在層面還包含有氣候、鄰居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國家是一種個別的總體，你對它毫無挑選餘地，甚至政治體制也是，你只能介入並加以尊重其獨立存在的事實。

然而，黑格爾還是認爲，經由革命的歷史發展以及「觀念」的具體實現，都在當代的普魯士身上達到頂峰，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他們同意黑格爾的革命進步觀念，但對他的「絕對觀念」則不敢苟同，他們認爲未來世界改變的方針將是以共產主義的革命爲基礎。

他們這個時期對共產主義有他們自己的看法，他們以一種尖銳的現實態度接受前人在這方面的觀念，但對烏托邦主義者一廂情願的幻想和濫情則一概加以排拒，從聖西蒙那裡，他們接受他認爲現代政治是爲了控制生產的看法；至於傅利葉，他對中產階級的責難，他對由中產階級所主導的重商主義的批判，對啓蒙運動的揶揄嘲諷，他們對這些也都加以接受；還有歐文，他們也同意他所說

工廠制度是社會革命之根本的論調。但他們卻不同意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所標榜施行社會主義要剷除上層階級的理论，他們認為中產階級的利益是根深柢固的，你無法連根拔除。馬克思後來在《費爾巴哈題綱》(Theses on Feuerbach)一書中特別強調，教育者自己要先受教育，他不能拿上帝那一套教條硬塞給學生，他必須自己先把這些教條消化了，經過一番去蕪存菁的功夫，才能宣揚這些教條，馬克思和恩格斯努力在做的，正是這種去蕪存菁的功夫，他們把烏托邦主義者的目標和黑格爾的有機發展理論結合在一起，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他們終於能夠看得更清楚，組織小單位的共產主義社會並不能拯救整個社會，更不可能在大的重商體制社會中存活下來，這是美國社會主義者諾伊斯始終沒看出來的，美國社會主義運動最終不免徒勞無功，正是因為他們沒有認清這點，他們更是忽略了階級鬥爭這種機械作用的事實。

馬克思來到巴黎之後，才從法國的歷史學家真正接觸到階級鬥爭的概念。提耶利(Augustin Thierry)在《英格蘭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England)一書中(出版於一八二五年)，把諾曼征服者登陸英國的歷史(Norman Conquest, 指一〇六六年諾曼地公爵對英格蘭的軍事征服)看成是征服者和薩克遜人(Saxons, 原居今德國北部的日耳曼民族，於西元五到六世紀期間殖民英格蘭)之間的鬥爭過程，季佐(Francois-Pierre-Guillaume Guizot, 1787-1874, 法國歷史學家、政治家)在《英國革命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一書中，則從中產階級的觀點，把英國革命歷史看成是中產階級和君主專政的鬥爭過程。

但是現在階級鬥爭的根則必須深植於經濟上面，恩格斯從他的曼徹斯特經驗中體驗到經濟的重要性，馬克思對這方面的了解則主要來自書本。其實，重視經濟問題這種觀念在一八四〇年代並不算新的現象，有一位叫巴納甫(Antoine Barnave)的法國律師，他曾經在一七九〇年大革命中的國民

會議裡當過主席，他就認為階級不同之起源乃是由於經濟之不平等所致，任何一個時代，掌權的階級不僅是立法來保障他們自身的權益，而且「還要主導他們的習慣並創造他們的偏見」，讓社會在經濟問題壓力下不斷產生變化，因此，中產階級的竄起和勝利只是意謂著另一批新貴族取代封建的舊貴族而已。巴納甫在政治上是溫和派，他同情王室，一七九三年終於被送上斷頭台，他寫過的文章於一八四三年結集成書出版，馬克思從未在著作中提過這個人，所以我們不知道他有否讀過他寫的東西。總之，一八四〇年代初期這幾年的思想可以說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是互通聲氣的。德國一位愛國主義派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一八四一年出版一本名為《國家政治經濟體系》(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著作，他以工業的立場去看社會的發展，緊接著一八四二年一位叫做戴札米(Theodore Dézamy, 1803-1850)的法國共產主義者出版一本叫做《公有制法典》(Code de la Commune)的著作，戴札米曾經是卡貝的信徒，如今卻要回過頭來批評他，卡貝相信透過跟中產階級求助，則勞工的處境可以得到改善，他駁斥此一看法，並主張要接受階級鬥爭的殘酷事實，從而以唯物主義、無神論及科學方法為基礎建立一種新形態的社區。戴札米並未在書中觸及到無產階級的觀念問題，但他強調無產階級(他把農民包括在裡面)應該聯合起來以追求解放。我們還記得巴貝夫在他的答辯書中即已強調過無產階級雖然被剝削欺壓，卻是腐敗的社會中一股不可輕忽的龐大力量。

一八四三年十二月，馬克思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德法年鑑》上，這篇文章題名為《黑格爾法哲學批判》(Critique of the Hegelian Philosophy of Law)，他在文中設定無產階級將扮演新的黑格爾主義角色，準備解放德國。

這是一個急進的階級，是中產階級社會中的一個階級卻又不屬於中產階級，它是一種秩序，

卻要破壞所有秩序。這個階級具有普遍性，因為它承受了普遍性的苦難。這個階級要求的不是個別的正義，因為它承受的並非個別的惡行，而是全面的惡行。它要求的不再是歷史的頭銜，而是人類的頭銜。它不是片面地反對德意志國家所帶來的後果，而是絕對性地反對其成立的前提。如果不將自身從社會的所有其他階級手中解放出來，從而解放這所有的其他階級本身，它就無法解放自身。總之，它代表人類自身的完全喪失，只有全人類的救贖才能使它得到救贖。無產階級代表社會解體的一個特殊秩序。

馬克思雖然寫得這麼深入，無產階級對他而言還是一個抽象的哲學概念，他終究還是以一個猶太人的身分來看待無產階級的問題，難免多少含有感情的成分在內。「猶太人的社會解放等於是從猶太主義中解放出來，然而，如果其他領域不跟著一起解放，這種解放即不能稱之為解放。」——馬克思把無產階級的問題和猶太人的問題扯在一起，好像把兩篇不同的文章放在一起，然後下相同的結論。我們看得出來，一方面馬克思對工業體制下的無產階級一無所知，另一方面，卻又不肯從猶太文化的眼光去嚴肅看待猶太人的問題，他認定當今猶太人的問題根源乃在於放高利貸之類的瑣碎問題，這個問題不消除，猶太人的問題便永遠存在，他們將永遠受敵視，和他想像中的無產階級一樣，永遠無法出頭。

在這段期間，恩格斯對馬克思的最大貢獻乃在於，他糾正了馬克思對無產階級無知的一面。他當時從英國帶回許多資料，準備寫一本書，即後來的《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他現在坐了下來，開始動筆寫作，他在此所呈現的社會背景拓寬了馬克思的視野，他指出工業所帶來的繁榮會周期性不期然掉入蕭條的境況——恩格斯強調，這

是工業家的盲目胃口所引起——這時災難就應運而生，對馬克思而言，這正是推翻神的權威地位、重新尋回人類原來精神面貌的大好機會。

對恩格斯而言，馬克思像是在道德信念和智慧力量方面的支柱，而此兩方面正是維持他和當代社會之間平衡的兩大重要基石，他很了解他所身處的社會的一切缺點，但馬克思則不然，雖說如此，馬克思在意志方面和分量上卻又比他更爲優越。恩格斯寫的東西很清晰明朗，而且幽默有感情，他的風格很像啓蒙運動時期的法國作家——介於康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法國哲學家、數學家、政治家，其著作宣揚進步的理想和人類的無限完美)和狄德羅之間——反而不像是德國傳統哲學的產物。他雖然未受過學院訓練，在學識上卻相當傑出，他很快即學會英語，可以用英文寫作，向歐文辦的報紙投稿，而法文也學得和英文一樣好。他對資訊的吸收特別敏感，有一種新聞記者特有的敏銳觸覺，馬克思就常說，他在這方面總是落在恩格斯的後頭，但是無可否認，恩格斯寫的東西就缺乏馬克思特有的煽動力，馬克思從一開始寫文章在文詞上就相當銳利，我們看他在主編《萊茵新聞》時寫的關於盜林的批判性文章，不但有見地，同時充滿煽動性，很容易就挑起讀者熱烈澎湃的反應。反看恩格斯，他對工業體制之殘酷行徑的體驗可說是直接而深刻，即使寫出像《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那樣精彩的傑作，就是挑不起我們義憤填膺的情緒，想要挺身去抗議或戰鬥什麼的，我們只是想期待，期待一個圓滿解決衝突的方法。「馬克思是天才，」恩格斯後來如此說：「我們其他人至多只是有才華而已。」

恩格斯會反抗父親，有人認爲這多少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甚至認爲馬克思取代了恩格斯心目中心父權的地位，這種說法距離事實並不遠。恩格斯有很孩子氣的一面，一八四七年九月，當時他已經二十七歲，他有一封信給馬克思，提到他推辭了某個共產黨委員會副主席的職位，因爲他看起來

「實在是過分年輕了」。年輕時代的恩格斯早就充滿了叛逆精神，他父親嚴格訓練他學習做生意，以及對宗教的虔誠態度，至目前為止，他仍遵循父親的期望，走做生意的實際路線，他後來雖然丟棄了宗教，但父親在宗教方面的信念對他的影響並沒有消失，年輕時他父親曾經將他送去給一位喀爾文教派的牧師管教，他看到這位長輩流利的口才，宣揚可怕的喀爾文教義邏輯，他真不知道這對群眾是福還是禍。馬克思是個偉大的道德家，許多時候也是個偉大的布道家，恩格斯脫離宗教之後，他似乎帶給了他另一種全新精神的宗教信仰。

恩格斯不久回到巴爾曼和家人一起生活，從事家族事業，同時和馬克思繼續保持聯繫，也許是這些通訊的關係，他對他現在的生活越來越覺得不滿意，甚至感到相當不耐煩。

他在離開家鄉前往曼徹斯特之前，曾經和家鄉一位門當戶對的女孩訂下婚約，此番回來，必須重新面對這件事情，不免覺得耿耿於懷——他在寫給馬克思的信中牢騷連連，特別是目前的生活才真正叫他厭煩：「我的妹婿不斷勸我，加上父母的壓力，我不得不暫時屈服於他們的意願。我現在已經在辦公室上班十四天了——我的戀愛事件同時也逼我不得不如此，可是越想越覺得沮喪，整天在錢堆裡打滾實在太可怕了，巴爾曼這個地方太可怕了，浪費時間太可怕了，但更可怕的是，要我當布爾喬亞階級和工廠製造商，去對抗無產階級。在我老子的工廠工作幾天之後，我才真正體會到這種可怕的感覺，以前竟從未注意到這些……要不是每天還能把一些精力放在寫英國的悲慘處境這本書上面，我可能真的要瘋掉了，這多少紓解了我的一些怨恨。要是你不去寫作的話，要當一個共產主義者，同時又維持自己的布爾喬亞地位，這似乎並不困難，但是如果你同時要從事宣揚共產主義真理，又要經營工廠做生意賺錢，這似乎就做不到了。」

當時摩西·海斯來找他，他們一起舉行勞工階級會議，同時一起在艾伯菲地區發行一份共產主義報紙，幾個星期過後，他寫給馬克思的信變得活潑起來，充滿了生機。他說，現在到處都有共產主義者在活動。

然而，老恩格斯開始生氣了，他無法忍受兒子和海斯的交往，更無法忍受他在巴爾曼地區宣揚共產主義。「要不是爲了我的母親——她本性那麼善良可愛，對父親百依百順，我又那麼愛她——我絕對會和那個專橫的老頭對抗起來。已經八天了，我的母親也爲我的事情頭痛生病了——所以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一定要離開，我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耐在這裡繼續待上幾個星期。」

最後，他發現有警察在注意他了，他終於在一八四五年的春天離開巴爾曼。他有一封信暗示他故意鬧事，這才能名正言順被迫離開巴爾曼，也才能有正當理由向和他有婚約的那位女孩說再見。

他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和馬克思會合，由於德國政府對法國政府施加壓力，馬克思只得被迫離開巴黎，等於是被驅逐出境，這項舉動讓當時躲在巴黎的德國政治難民感到憂心，下達驅逐命令的正是曾經寫過《英國革命史》的季佐，他此時已經成爲法國總理，他的階級鬥爭論調曾經給馬克思帶來啓發作用。

恩格斯接著回曼徹斯特把女朋友瑪麗·彭斯帶來法國，此次馬克思和他一起同行前往曼徹斯特，他向馬克思介紹曼徹斯特地區的活動，並介紹他認識一些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家。二十五年後他們舊地重遊，恩格斯提醒他，他們當時如何站在曼徹斯特圖書館的窗口，透過彩色玻璃窗望向窗外一片晴朗的天氣，他們當時已經可以感覺到人類的智慧之光正逐漸趨於成熟，就要在這個充滿骯髒和畸形的城市之中宣告人類尊嚴已然降臨。

第十七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磨劍

對恩格斯而言，馬克思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是航行中的羅盤，讓他不致偏離航道。對整個左派而言，馬克思所扮演的角色功能亦大致如此。

我們已經研究過，法國大革命的傳統首先淪入誇張華麗的民主，繼則是懷疑的人文主義和反民主論調，最後則是反社會的虛無主義，然後法國的歷史學家爲了自己的利益也終於向中產階級靠攏，而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至此算是取得了絕對優勢，但卻也變得粗俗不堪。馬克思是猶太人，始終置身於社會之外，另一方面，他又是天才，置身於社會之上。從知性訓練或世界一般知識的眼光看，他沒有無產階級的不利條件，但他也絕不屬於中產階級——甚至也不是如雷南和福樓拜等人所說的中產階級「菁英分子」。他的個性是特立獨行那種，絕不爲中產階級社會所威脅或誘惑，他生性多疑善妒，但同時卻又孤傲不群，顯然他是個個性強烈極端的人，其程度甚至超乎我們的想像。從另一個角度看，他要不是這樣的人，如果是個和善而溫文儒雅的人，他就不可能完成那麼艱鉅的工作——這種工作需要超乎凡人的無比堅強毅力才能完成。我們記得雷南曾經勸告我們「要把所有的人都當成好人並善待他們，除非我們已經證明出來他們不是好人」，他自己也承認他有時和當代其他作家有所聯繫，並非出於興趣，而是出於一種善意——我們不會忘記，雷南後來的道德力量變得薄弱無力，

正是由於他的這種體貼殷勤所使然。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段期間至一八四八年革命之間所寫的著作——《神聖家族》(The Holy Family)、《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哲學的貧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都是試圖在有系統陳述他們的革命觀點，這包括了許多的破壞性工作，特別是對當時的德國而言是如此，因為他們瓦解了當時在世人眼中極具價值的形上學體系，以及中產階級思想家對現狀的思考成果。

早期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顯得很活潑有趣，他們用一種粗野而有節制的德國式幽默挖苦嘲弄許多哲學家，他們引用他們的朋友海涅所說的話來打情罵俏：「土地屬於俄國人和法國人，海屬於英國人，我們則擁有夢幻的仙境，在那裡我們無需跟人競爭。」他們發現他們正在從事的竟是一樁龐大的諷刺性批評工作：他們的對象是全國性的知性生活。他們以前一些同志隨著時間變遷，多少都採取了妥協的態度，他們向基督教認同，辦保守的報紙或和普魯士帝國主義互相唱和。甚至像摩西·海斯那樣的人，恩格斯曾從他那裡學到多少觀念，如今也已和「真實社會主義者」互相掛鉤，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他們的社會主義原則顯然又倒退回開始時的純抽象概念上面，他們同時表現出反對改變體制的要求，表面上裝出不妥協樣子，事實上，他們只是努力在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罷了。

馬克思絕對不是一個溫和的人，他天生善於批判別人的意見，好像他那尖銳的心智能力是專為批判別人而附在他身上似的，他似乎只有從批判別人當中才能建立起他自己的想法。這種方式很容易招惹是非，他擺出一副易怒的姿態，有時卻不免淪於乏味，梅林(Franz Mehring)說得沒錯，他這時期寫的東西充滿挑釁論戰的筆調，不但賣弄學問，有時甚至還發出不可捉摸的愚蠢論調。在《神聖家族》一書中，馬克思攻擊布魯諾·鮑爾及其兄弟，恩格斯都覺得他的分析過於冗長瑣碎，你即使多麼看輕對方的論點，也不必如此趕盡殺絕。

恩格斯的文風就顯得很清晰流暢，馬克思截然不同，他經常使用長篇大論來嘲弄他的對手，一路鞭打到底，絲毫不肯鬆手，有時也愛引用黑格爾的辯證法，說得似是而非，喋喋不休，直到把讀者逼入夢鄉爲止，但我們無法否認，這之間還是充滿了真知灼見。他對人類滿懷熱情，我們有時還是分不出他究竟是魔鬼還是聖徒。他經常耽溺於自我之中而無法與他人溝通，但有時卻又不斷爆發出宏觀偉論，幾至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地步。

我們不妨試看他 and 普魯東 (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法國經濟學家、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創始人之一) 之間的論戰，藉以了解他這個時期的風格，而此種風格成爲他日後特有的商標，另一方面，我們也可藉此了解馬克思體系的發展脈絡。

馬克思和普魯東結識於一八四四年的夏天，普魯東的父親是製桶匠，他自己後來則成爲印刷業者，他自我教育極爲成功，憑著自修而能精通古希臘文、拉丁文以及希伯來文。一八四〇年他出版一本書，在書名底下打了一個大問號：「什麼是財產？」(What Is Property?)，他的答案是：「財產即偷竊」(Property is theft)，這本書在當時相當引人矚目，馬克思向來對他很敬佩，在巴黎居留這段期間，經常爲他解說黑格爾的哲學。

兩年後馬克思從布魯塞爾寫信給普魯東，說他和恩格斯正在辦一份共產主義通訊雜誌，藉以聯絡全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者，他希望他能爲他們寫些稿子。他寫完信順便在信末加上一則附言，要普魯東小心一個叫做卡爾·格林 (Karl Grün, 1817-1887，德國政治理論家，是「真正社會主義派」代表物之一) 的新聞記者，因爲他這個人是「真正社會主義派」(True Socialists，一八四〇年流行於德國知識分子之間的一種思潮，試圖從唯心論的角度來宣揚社會主義) 的成員，馬克思用一些尖酸刻薄的暗

示語句說了這個人的許多壞處。

普魯東收到信後，回信說他很樂意加入他們的陣營，但可能因為雜務繁多且生性疏懶，恐怕無法提供太大的幫助云云，接著他繼續說道：

承蒙來函，不勝感激惶恐之至。的確，我們應該好好合作，一起為發掘社會法則以及為運行這些法則而努力，然後尋求最好的方法來檢視這些法則。但是要記住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們在消滅舊有的頑固教條之後，不能自己再設定新的教條去套在人們的身上，我們不要跌入你以前的同胞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矛盾模式，他好不容易擊垮了天主教，便立即忙著弄出一個新教，過去三百年來，德國一直努力在剔除路德的新教條，我們不能重蹈覆轍，我由衷讚賞你匯合各方意見的做法，希望大家能夠坦誠互相交換意見，以一種有學問有遠見的胸襟去做世界的表率，雖然我們站在這個世界的前頭，但不要以一種新宗教的使徒自居——即使這是一個有邏輯和有理性的宗教。我們要歡迎並鼓勵所有的抗議行爲，我們不要故步自封，我們反對排除異己的行爲，以及神秘主義之類的作風。我們不要關著門研究問題，即使大家之間有歧見，也要拿出來坦誠討論，也許有爭論，但目的是要化解歧異，而不是要助長對立，爭論之間也許有尖銳或諷刺的言詞，但那無妨，我們要的是和諧的結果。如果我們都能接納上述的狀況，我毫無疑問會很高興加入你們的行列，否則——免談！

普魯東最後提到格林先生，這才是重點，他說卡爾·格林帶著妻小流亡在外，沒有經濟來源，他了解馬克思對他「哲學方面的憤怒」，這可以理解，誠如馬克思對他所指控的，格林「爲了生存，

到處鑽營，賣弄現代哲學觀念」。事實是，格林正準備要將普魯東的作品譯成德文，普魯東期盼馬克思高抬貴手，收斂一下一時的憤怒之氣，好讓格林的譯作能夠多些銷路，以紓解一下經濟困境。

結果這惹得馬克思大為光火，他開始惡毒批判普魯東的新著，這和他以前對普魯東作品的稱讚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結果，在解剖普魯東的過程中，他自己因而首度建立起一套對抗先前所設之假說的反假說。他起先盛讚普魯東「把政治經濟之基礎的私有財產……以一種不容情的科學方法去加以研究批判」，現在他認為「財產即偷竊」的說法乃是侵犯財產的行為，其前提已經設定擁有財產的權利了。

這是「抽象人」(Abstract Man)的老論調，意謂人擁有私人物品的神聖權利，這正是小布爾喬亞階級的論調。普魯東認為罷工是一種罪惡，違反了基本的「經濟體系」，且違反了「既定之公共秩序」。馬克思會跟他解釋黑格爾的發展理論，如今他創造出一套新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觀念，其論調並非以黑格爾觀念為主，認為不必以勞工階級為中心去顛覆舊有體制從而建立一套新的，他認為只需在現存體制中解決窮人問題即可。

馬克思現在擺開「抽象人」論調回到黑格爾身上，回到「歷史人」(Historical Man)的論調，其原則及其自身之存在取決於其所生活年代之特定狀況，新的狀況無由產生發展，只有透過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鬥爭衝突才有可能。

我們在此正式遭遇到馬克思的第一個創見，他認為這是他對我們日後稱之為「馬克思主義」之體系的一個重要貢獻。恩格斯說，他於一八四五年春天抵達布魯塞爾時，馬克思立即對他展現一套歷史發展的理論，認為歷史是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不斷鬥爭的過程，這些鬥爭可以說乃是各個不

同歷史時期生產模式所促成的結果——所謂的生產模式指的是人們賴以供應其自身之食物、衣著及其他生活之所需的製造方式。這種現象可以說與社會中的政治、哲學及宗教等現象之興起是一致的，目前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鬥爭已然達到空前未有的狀況，被剝削者的人權已經蕩然無存，而剝削者藉著盤據生產機器之優勢繼續壓榨被剝削者——如今只有勞工階級起來反抗，打倒機器的所有者，社會的階級才能消除，人類的精神才能真正得到解放。

馬克思和恩格斯能夠在短短時間內很快吸收他們那個時代社會和歷史方面的思想，然後加以融會貫通成爲一套有系統的理论，進一步澄清了過去許多神秘觀念，也糾正許多當代觀念的複雜不明之處，並爲未來指示出一條明確可行的道路，這是當時其他一些思想體系做不到的。他們同時還有另一項成就：他們提出「動力原理」(dynamic principle，馬克思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提出的一種觀念)——關於這個，我們容後詳細討論——他們的整個理論體系得以推動，且在歷史進展中屹立不移，這也是當時其他理論體系難以望其項背的。而且，透過「動力理論」這個觀念，個人得以自覺在歷史進展中的地位，並促使自己去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關於這個理論，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的開頭部分即已詳細加以說明，但此書卻從未正式發表，這非得等到一八四七年和一八四八年之交，他們爲國際共產聯盟所寫的《共產主義宣言》，他們的此一觀念才得以真正公之於世。

他們在此一概摒除德國思想中不著邊際的抽象理論——他們甚至已經不屑於去加以嘲弄——他們的箭頭直接指向當時社會的實際問題。《共產主義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結合了馬克思寓現在於過去的銳利簡潔和恩格斯掌握時代脈絡的坦誠人道主義胸懷，我們在此可以看到馬克思對恩格斯的強烈影響。恩格斯所寫的〈共產主義原理〉(Principles of Communism)這一部分——顯然在匆忙中寫

就——對當代工業社會問題的分析可說相當的鞭辟入裡，語調中含有極少感情及誇張的成分。而整本《共產主義宣言》以四、五十頁的篇幅，強而有力分析一般的歷史理論、歐洲社會狀況以及革命行動的方針等等。

此一革命行動的方針即是要「顛覆整個現有的社會秩序」，同時擬出以下的行事大綱：

- 一、徵收所有土地，並以土地租稅所得支付國家開銷。
- 二、大幅降低所得稅。
- 三、廢除繼承權。
- 四、沒收所有僑民及亂民之財產。
- 五、國家透過一個中央的國家銀行並以壟斷方式統一操作信貸方式。
- 六、由國家統一管理交通事務。
- 七、大量開辦國營工廠以增加生產，同時不斷開墾荒地，並依計劃方式經營已開發耕地。
- 八、大家都有工作義務，機會均等，同時要組織工業及農業軍隊。
- 九、農業及城市工業要齊頭並進，藉以消除城鄉差距。
- 十、所有兒童得以享有免費教育，不得參加工廠生產，教育與生產互相結合。

從進化的觀點看，《共產主義宣言》顯得很冷酷無情，絲毫不留情面，我們上面所引述的普魯東信件中對此已有毫不保留的批評，的確不錯，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教條化的，他們對待個人也是不公平的——恩格斯現在變得和馬克思一樣不能容納異己，也變得和他父親一樣獨斷霸道。但是這種大膽和無情正好是那個虛幻時代所需要的，我們曾經指出，那個時候的史家和社會主義者大都拿資本主義理想中抽象的道德觀念——毫無疑問都是來自德國——來應付一些棘手的問題，但是自從《共產主義宣言》問世之後，整個情況因而全面改觀。

有人在大談「正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應是：「正義在哪裡？在資本主義之下，只有無產階

級受害者最深，他們經常被迫失業挨餓，有時不得不走向犯罪的道路。」有人在大談「自由」，他們的回應是：「自由在哪裡？你如果不限制雇主的自由，工人們就不可能有自由。」有人在大談「家庭生活」和「愛」——這正是共產主義要加以摧毀的——他們認爲此兩者爲布爾喬亞階級所特有，無產階級的家庭早已因爲小孩和女人必須到工廠工作而告瓦解了，而年輕女人的愛早就斷送在礦坑和工廠之中了，如果礦坑和工廠關門，她們就只有出賣皮肉一途了。有人在大談「善良」和「真理」，馬克思和恩格斯則認爲，只有當我們的道德家及哲學家們不再以剝削和壓榨爲手段去參與社會時，我們才會了解什麼叫做「善良」和「真理」。

由於上述這些，《共產主義宣言》可以說是當時對抗布爾喬亞意識形態最強而有力的一股思潮：只要是布爾喬亞統御一切的地方，所有封建的、家長制的及純樸的關係就蕩然無存，它首先就摧毀了人和其「自然上屬」的多样性封建關係，它只是在人跟人之間建立起一種以自我利益爲主及冷酷無情的「金錢交易」關係，在自私自利的前提之下，大家不再講究熱誠和感情，個人的尊嚴淪落到以交換價值之高低爲依歸來衡量。談到自由，布爾喬亞根本漠視一切自由，其心中只存在一種穩固而可恥的自由——也就是說，做生意的自由。總之，布爾喬亞以一種公開的、不覺慚愧的、直接而粗暴的剝削取代了宗教和政治經過偽裝的剝削。

《共產主義宣言》已經擺明跟布爾喬亞階級宣戰，而其最後的論點則可視之爲社會思想的一個轉捩點，「正義同盟」(League of the Just，流亡巴黎的德國社會主義者於一八三六年組成的團體，曾參加布蘭奇暴動，失敗後轉往倫敦，於一八四七年改組爲共產主義同盟，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取得領導權)

的口號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但是對於這個，馬克思和恩格斯絕對不肯苟同，馬克思宣稱有一群人他是無法將之認同爲兄弟的，他和恩格斯的新口號是：「統治階級在共產革命之下必將垮台，無產階級的桎梏即將解除，他們終將勝利，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正義之戰及正義之怨恨已經取代了曾經號稱是新基督教的聖西蒙社會主義，四海之內不再都是兄弟，不再有任何真正的人類團結，只有剷除社會上階級的存在，「真實的人性」才有可能實現，同時，要達到這樣的社會目標，無產階級和革命思想家必須團結起來，一起對付他們的敵手，他們的敵手——這些人除了追求自我利益和崇尚「金錢交易」之外，簡直一無所有——已經毫不留情地破壞了這種團結。

我們已經描述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家世背景，《共產主義宣言》可以看成是他們一生事業生涯的分水嶺，在這之後，他們所扮演的將是一種嶄新的英雄式角色，他們可以說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社會思想家之中，透過嚴格訓練，最早成爲沒有階級之分及帶有國際性格的先知，他們能夠掌握整個西歐的動向，透過愛國情操的要素，將政治運作、哲學理論及實際的勞動狀況，與一般社會動向的內容緊緊結合在一起，做一番詳盡的研究，對他們而言，所有的反抗力量似乎逐漸匯合在一起，邁向相同的偉大目標。

《共產主義宣言》於一八四八年二月在倫敦印行的時候，沒有多少人知道，只分發給「共產主義同盟」(Communist League)的少數幾百個會員而已，並未真正公開發售，對一八四八年的事件也沒有造成特別的影響，隨著當時巴黎工人運動的失敗而逐漸銷聲匿跡，然而，這份宣言卻不知不覺在西方世界流傳開來，根據兩位作者於一八七二年所言，這份宣言有兩種法文譯本，在德國印了十二版，一開始即出現了波蘭文和丹麥文譯本，英譯本出現於一八五〇年。《共產主義宣言》沒有提到俄國和

美國——這兩個國家對當時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是「歐洲社會秩序的兩根柱子」——俄國是一個「反動的堡壘」，是西歐世界的原料來源，以及西歐世界的貨品市場，而美國也是，既是市場也是原料供應地，同時更是歐洲移民的主要場所。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共產主義宣言》於一八六〇年代初期譯成俄文，一八七一年在美國出現了三種不同的譯本，因此，當時全世界的工人有可能都接觸到了這份宣言，其廣為流傳的程度，大可與基督教的聖經互別苗頭，我寫作此書時，南非地區的一種荷蘭文方言的譯本才剛剛問世。

馬克思和恩格斯此時還很年輕，一八四八年這一年帶給了他們無窮的希望，他們帶著無比的銳氣和自信，對著被工業體制壓迫的人們宣揚他們的福音，教他們思考，並且教他們如何準備開始戰鬥。

第十八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創造歷史

我們在本書的前面部分曾經研究過幾位作家，他們企圖以一種藝術性的和諧手法處理混亂的歷史，至於當代事務則反而介入爭論不休，如米西列即是（他被法蘭西學院革職一事，在恩格斯看來，只是一種中產階級作風，以便提升其所寫作之歷史的地位而已）。或者，如雷南也是，因為和當局對抗，只得默默走回書房伏案寫作。我們如今接觸到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是天才型人物，他們卻把歷史的事實活生生拿來和當前人類事務互相較量對抗。

如果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以作家身分而言並不那麼廣受歡迎，有幾個理由可以說明這層事實。首先，他們所下的定論與讀者層的階級利益互相抵觸，而作家不受歡迎正是由此一階層的人所決定，許多文學史家及經濟學家一致抵制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正好印證了後兩者所創之階級影響文化理論的正確性。另外一個理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不再汲汲營營追求哲學或文學的榮耀，他們自認為已經尋得左右人類社會進展的方針，他們也許拙於言詞，也缺乏政治手腕，但是卻善於運用自身之才能，以期達到革命的目標。他們所寫的東西如同建築界所說，是要有「功能作用」的，而這個正是過去法國大革命中馬拉或丹敦的言論所達不到的。他們的志向已經不再局限在德國思想上面，他們要走國際路線，馬克思用法文和普魯東論戰，而這個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交相運用法、德、英等

三種語言在寫作——報章雜誌的論文、論戰、宣言等等，所有這些作品直到最近才由蘇聯以完整的形式加以出版。

在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爲了出版他們的哲學著述，的確遇到不少困難——主要是當局嚴加查禁的緣故。比如《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他們不管如何努力，終其一生只能出版其中一些片段而已。其實這本書包含了他們最基本的思想觀點，後來他們終於妥協於當局的壓制，只好自我安慰認定這些思想主要是對他們自己才有重要性，恩格斯這樣說：

我們並不期盼讓一些書呆子來觸碰這些新穎的科學思想，我們早已全然進入了政治活動，我們和知識界並非全無聯繫……和無產階級的組織團體更是密不可分。我們有責任把自己的觀點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當然，爲歐洲的無產階級，特別是德國的無產階級，指出正確的道路，對我們而言，實在是責無旁貸。只要我們自己把這些觀點澄清了，我們將立即著手進行此事。

我們要了解的是，在一八四〇年代，要把德國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扯上關係，實在是非常困難同時也是很激進的一件事情。赫爾岑說詩人海涅和他圈子的那些人「從不了解一般百姓……他們根本不知道民生疾苦，他們只能透過拉丁文了解羅馬時代無產階級身上的問題」。這些人有朝一日從他們的象牙塔世界走出來，像浮士德從奧爾巴哈的地窖裡走出來，四處張望一番，他們的學者式懷疑精神立即受到干擾，「不得不馬上從實際生活縮回他們的學問世界，他們這樣會感到較舒適自在。」

海涅就說過他和共產主義者的裁縫師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 1808-1871)相識的尷尬經驗……

這個人和我講話時擺出一副粗魯無禮的德性，簡直叫人完全不知所措。我站在那裡，他卻坐著，也不肯脫掉帽子，還用右手把右腳提到椅上，用膝蓋頂著下巴，然後用左手不斷騷弄著右腳的腳跟。起先我以為他會擺出這副無禮的姿態是因為他長久做裁縫工作的關係，後來我發現我錯了。我問他為什麼老是這樣抓腳，魏特林擺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態度回答，好像事不關己似的，他說他在德國監獄被關過許多次，每次都要戴腳鐐，腳鐐太小了，就引起腳部慢性的皮膚過敏，所以現在才會常常沒事就抓腳。我承認當魏特林告訴我關於腳鐐這件事時，我覺得有些訝異，我以前在孟斯特(Münster)的時候，曾經用滾燙的雙唇吻過萊登(Leyden)的裁縫師約翰(John)的遺物——他戴過的腳鐐，對他用刑的鉗子，這些都還留在孟斯特的市政廳——我對這位已故的裁縫師相當尊敬，可是對眼前這位還活著的裁縫師威廉·魏特林卻無比厭惡，雖說他們兩位都是為同樣目標在奮鬥的烈士。

馬克思和魏特林相識的經過就十分不同了。

威廉·魏特林是一位德國洗衣婦的私生子，他的父親是拿破崙麾下的一位軍官，他始終不知道他的父親到底是誰，他從小學習做裁縫，很討厭軍人，到了當兵的年齡時，他就離家逃兵役去了。他自己教育自己，學習古代的語言，曾經試過想創造一種世界語，二十七歲時他寫過一本書，叫做《人性何去何從》(Humanity as It Is and as It Ought to Be)。當時——一八三〇年代之際——巴貝夫的思想曾在巴黎的工人階層之間再度流行開來，有一群流亡在巴黎的德國裁縫師組織了一個社團，叫做「正義同盟」，這個社團和巴貝夫運動的風潮有所關聯，魏特林加入了這個社團，並且很快即成為德國工人階級最重要的領導人物。一八四二年，整個思潮突然之間匯合成為所謂的「馬克思主義」，魏特林

此時出版一本書叫做《和諧與自由的保證》(Guarantees of Harmony and Freedom)。此書馬克思極為讚賞，並稱之為「德國工人階級巨大且閃亮之發端」。這個時期，魏特林由於參加一八三八年五月十二日布蘭奇(Louis-Auguste Blanqui, 1805-1851, 法國共產主義者)暴動而被法國當局驅逐出境，他轉而向瑞士尋求庇護，但是一到那裡旋即因褻瀆罪名被捕入獄，判刑六個月，褻瀆的罪名主要是他出版一本書，裡頭把耶穌描寫成共產黨和私生子。接下來是一連串逃亡躲避追捕的日子，他以被迫害的共產黨聖徒自居，過著苦行僧的生活，身上除了做裁縫的工具之外，其餘一無所有。

最後，他出現在布魯塞爾，這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必須研究如何來接待他了。恩格斯說馬克思一家人「把他看成像超人一般」來接待他，但馬克思卻不是能夠長久忍受和自己旗鼓相當的那種人，他不會忘記提醒那些出身寒微而自學成功的思想家，如普魯東和魏特林，他是擁有哲學博士頭銜的思想家(語言學者威廉·李卜克內希[Wilhelm Liebknecht, 1826-1900, 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之一]說馬克思常常拿亞里斯多德和伊斯奇勒斯的一些文句來考他而自鳴得意，他知道那些文句他是譯不出來的)。

一八四六年三月三十日，布魯塞爾的共產黨召開會議，討論工人階級運動的策略，魏特林也受邀參加，關於這次會議，一位叫做亞倫柯夫(P. V. Annenkov)的俄國年輕學者曾加以報導，他當時正在各地旅行，也曾寫過一封信給馬克思。

亞倫柯夫的描寫相當生動，他寫道：

(馬克思看起來像是)一位精力充沛、性格強烈且信念十分堅定的人物——以外表而言也是相當突出特別，滿頭黑色的鬚髮，兩手長滿了毛，身著一件斜邊扣子的外套，給人一種望之生畏

的印象，即使他的行為有時顯得相當怪異。他的動作有些笨拙，卻大膽而充滿自信，他的儀態言行和社會傳統格格不入，但卻孤傲不群，講起話來聲音宏亮有力，非常適於發表煽動性的批判言論。他不開口則已，一旦開口必定語驚四座，這讓人感覺他對人類心靈瞭如指掌，能夠輕易加以掌握駕馭。……

至於那位裁縫師煽動家魏特林，一頭金髮，長得很好看，鬍子修得整整齊齊，一襲華麗的禮服，看起來像個商人，反而不像我所想像的寒酸工人樣子。

大家互相介紹之後——主要是以充滿感情的禮貌介紹魏特林——我們在一張綠色小桌子旁坐定，馬克思坐在首位，手上拿著一支鉛筆，正埋首閱讀一份文件，他的親密伙伴，修長俊挺的恩格斯則以一種英國式的嚴肅語調，為會議的開場發表談話。他談到勞工改革者此時應該摒除己見，一致努力為勞工朋友們樹立某種共同的教條，以便大家遵守和追隨，因為大家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去從事研究理論方面的問題。這時，恩格斯話還沒有講完，馬克思突然抬起頭來，大聲問魏特林下面這個問題：「告訴我們，魏特林，你用共產黨的宣傳在德國到處製造事端，並且贏得許多勞工朋友的附和，他們也因此而丟掉了飯碗，請問，你要如何為你的社會革命活動辯護，你的基礎是什麼？」……

一場難堪的辯論於焉開始，雖然難堪，卻持續不久。

魏特林似乎想把爭論重點擺在一般簡單的修辭學上面，他表情肅穆凝重，他說他並不是想發展出新的經濟理論，他只是想利用目前法國現有的一些理論，提醒勞工們的悲慘處境，要他們張開眼睛，看清加諸他們身上的許多錯誤做法……

我很訝異，因為和恩格斯的談話比較起來，魏特林的談話顯得含混而缺乏條理，不斷重複和

修正自己前面說過的話，在下結論時更是語無倫次，不知所云。

亞倫柯夫說，這次參加會議的人來自各路人馬，有許多人是魏特林的忠實讀者，「要不是馬克思不斷皺眉頭提醒，他可能會繼續漫無節制講下去。」馬克思語帶諷刺宣稱：

如果沒有很好的理論基礎做後盾，是不可能喚起群眾的運動的。如果只是喚醒空洞的希望，不但不能解救那些受苦受難的人，反而會徒然給他們帶來災難。「在德國，要喚起勞工朋友的覺醒，沒有科學的思想和具體的教條是行不通的，光憑空洞的宣傳伎倆，只會製造出虛幻的偶像，徒然愚弄群眾而已。」他接著對亞倫柯夫做了一下手勢，然後強調，魏特林所扮演的角色在俄國可能行得通，像德國這樣文明的國家，不拿出具體的教條是行不通的。

魏特林蒼白的雙頰突然變得通紅，他的談話也跟著變得活潑而直接，他的聲音頓時充滿了興奮的顫抖語調，他強調一個人能夠以正義、團結以及博愛的名義把許多人聚合起來，絕對不會是泛泛之輩，他感到高興的是，即使他今天在此飽受抨擊，他一想到來自祖國各地的許許多多信件，感激的和表達意見的，他就覺得很欣慰，這使他想到，他所付出的努力並沒有白費，至少比那些閉門造車的理論分析和批評，對受苦和受壓迫的人而言，會更爲有價值一些。

後面這幾句話把馬克思激怒了，他簡直怒不可遏，握住拳頭，往桌面猛然一擊，桌燈差點掉了下來，他跳起來，大叫：「無知完全無濟於事！」

我們一夥人跟著站了起來，大會就在這裡結束。

亞倫柯夫當下驚訝莫名，跟馬克思匆忙告別離去，馬克思怒氣未消，一個人在屋裡走來走去。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次清黨行動（下一個對象是一個叫做克利格（Hermann Kriege）的倒楣德國人，他後來前往美國，在那裡辦了一份共產黨報紙，專門宣揚博愛精神），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馬克思爲了在勞工階級中尋求權力的泉源，不惜與其他勞工領袖翻臉決裂，但是他從未贏過，除了少數一些忠心的弟子之外，他從未贏得別人對他的信服，他無法叫人對他心服口服，去爲他赴湯蹈火，至於一般勞工階級，他雖然未必像海涅那樣畏懼他們，實際上也是保持相當程度的距離。不過，他批評魏特林有一點是正確的：當今首要之務是要以傳統老式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去喚醒勞工運動。他要做的正是要勞工階級明白，他們必須學習歷史事務，要注意潮流並判斷處境，總之，他要他們相信，他們需要的不是福音傳道，而是實際行動的政治才能。卡爾·舒爾茲（Karl Schurz）於一八四八年革命之時在科隆見過馬克思，他即認爲馬克思的態度慣常是「充滿挑釁而叫人無法忍受」，所以他的許多提議總是被否決，「因爲他的行爲經常傷害別人，大家只好跟他作對。」他的高傲和冷漠固然是一大缺點，但是他在政治上客觀而銳利的見解以及深遠而周到的眼光，則又是無人能及的優點，勞工運動畢竟還是少不了他。

因此，一八四八至四九年之間的許多事件，他終究還是扮演了一個重要而有力的角色。

一八四七年的春天他曾經加入「正義同盟」——這個團體後來改名爲「共產主義同盟」，這段時間裡——一八四六至四七年之間——歐洲的鐵路迅速擴張，可是之後不久卻是嚴重的不景氣，有五萬人在一夕之間竟突然失了業。一八四八年二月法國終於爆發一場革命，一隊士兵向一群和平示威者鳴槍示警而點燃了革命火花，國王路易腓力迅即垮台，法國宣布共和。馬克思此時正在布魯塞爾

幫忙草擬一份敬告法國臨時政府的宣言，這時有一份比利時的警察報告說他從母親那裡弄到一筆款項，捐給比利時工人買武器，他當即被比利時政府驅逐出境。他來到巴黎，為「共產主義同盟」建立了一個新的總部，他反對由一群流亡者所發動的革命行動，他們這些人固然勇氣十足，卻不知道自己正在訴求什麼，結果他們一越過萊茵河進入德國境內之後，立即潰散敗逃。

馬克思和恩格斯於四月十日回到德國的科隆，是時該地的「共產主義同盟」支部正在萊茵地區發動一次改革的請願活動，不久之前，他們才發動一次遊行，並且和當局有過一次正面衝突，士兵向遊行隊伍開槍。這個支部的領導人叫做戈夏克(Andreas Gutschalk)，是一位猶太屠夫的兒子，學習出身，後來在科隆一帶的勞工階級地區為窮人看病，頗受當地的勞工階級愛戴，他還組織了一個叫做「工人同盟」(Workers' Union)的團體。當時普魯士經過一番折騰之後，成立了國會，戈夏克主張工人應當出面杯葛，馬克思不贊同此一做法，他認為中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前，工人階級不宜輕舉妄動。馬克思這時又辦了一份報紙叫《新萊茵新聞》(Neue Rheinische Zeitung)，他把所有的家當，包括燕妮身上僅存的一些私房錢，悉數投資在這份報紙上面。他不顧其他領導人的反對，藉此機會解散「共產主義同盟」，他認為既然有了報紙，可以做為領導的媒介，此一機構似已不再存在之必要。他同時引發以擁護「民主」為名的論爭，一概不考慮工人階級及共產主義的利益，就在戈夏克被捕入獄之時，他接管了「工人同盟」。

辦《新萊茵新聞》的這幾個月時間，可以說是馬克思最為銳氣煥發的一個時期，恩格斯負責報紙的外交版面，他後來說這個時期他們寫的每一篇文章都充滿了爆炸性，列寧在一九一四年說這份報紙乃是無產階級革命最佳媒介的典型代表，無可踰越。日復一日，馬克思不斷煽動國會採取大膽行動，不時用文章對他們冷嘲熱諷，至於國會裡的議員們還不習慣政治權力，不知道如何制衡囂張

跋扈的政府，結果是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根本不詢問國會，就直接和正在交戰中的丹麥宣布停戰，同時也拒絕接受君主立憲的體制，並且派兵鎮壓保護憲法的人，最後——一八四九年的六月——終於宣布解散國會。這時戈夏克早已出獄，立即對馬克思展開攻擊（這令人想起魏特林對馬克思的譴責）：「他們對解救受壓迫者並不熱心，工人的痛苦和窮人的飢餓，對他們而言只能引起科學性教條的研究興趣。……那麼，我們這些無產階級，為什麼要為這個流血？我們有什麼理由為了避免中世紀的地獄，或者，如您布道先生所宣揚的，為了進入您那共產主義所標榜的模糊天堂，就得乖乖一頭栽在腐朽的資本主義世界裡？」恩格斯後來曾對戈夏克提出批判，他認為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呆子」、「時代環境下完美的煽動家」、「微不足道的完美先知，只適於雕蟲小技」。他們後來完全決裂，戈夏克回去從事實際運動，在大霍亂流行的時候走入貧民區為窮人治病，但是該年秋天自己亦不幸染病去世。

馬克思一路奮戰到底，那年春天科隆城裡到處是士兵，當局不斷對他提出警告威脅，柏林的政府派出警探跟蹤他，準備對他採取行動，但科隆政府當局卻不讓他們這麼做。有一天，兩位便衣軍官來到他家裡，恐嚇他並聲稱他侮辱到了他們的軍階，他穿著睡衣拿著未上膛的手槍把他們趕出家門。有一天他被告到法庭，因為他唆使他人拒絕繳稅，他在法庭上引用他寫的論文，說明法律只是社會關係的一種反映，如果社會關係改變了，原來的法律便應失效，因此，他並沒有破壞法律，那是因為革命的關係使法律荒廢了，而政府又糟蹋了人們由憲法所賦與的應有權利。他說得頭頭是道，竟影響了陪審團的決定，陪審長還跟他致謝一番，因為他說得「實在太有道理了」。此時《新萊茵新聞》的發行量已經增加到了六千份，印刷費用卻跟著節節上升，財務上竟反而變得吃緊，一般中產階級對這份報紙一向抱持畏懼的態度，不可能出錢贊助，馬克思只好親自到外地籌錢，他最後只找

到一位贊助者——一位破壞分子，兩人一起回到科隆。可是才一回到家裡，卻收到一張驅逐令，當時德萊斯登(Dresden)和巴登(Baden)兩地的五月暴動才剛結束不久，當局找不到適當的藉口驅逐他，只好以不受歡迎的外國人爲由，以及聲稱他旅居國外時偽造普魯士國籍爲藉口，將他驅逐出境。他將他的身分證件公開，印了兩千份，有的還以一泰勒的價錢出售，有些買的人還把買來的證件框起來，上面印有「解放勞工階級」字樣。

同時，一八四八年之間，恩格斯也被控告，罪名是公開煽動法蘭克福的議會拒絕接受解散命令。九月，戒嚴令頒布，他又被控叛國罪，他只好逃回家鄉躲避，父母勸他到比利時去，不要再回德國來了，但他一到布魯塞爾，旋即又被比利時警察趕到法國去了。

他一向喜歡巴黎，他稱巴黎爲「世界的樞紐」，可是這次回來，他發現他「不能忍受這個城市了」，巴黎已經死了，不再是以前的巴黎了。「林蔭大道上到處是中產階級和警察，舞廳和劇院都關門了，街上的流浪兒也都不見了。」他決定前往瑞士，但身上沒錢，只好走路前往，他要慢慢繞遠路過去，因爲「誰都捨不得離開法國」。他拿法國和其他鄰國比較：西班牙荒地太多；義大利的商業太落後；英國煤煙太多，天空太過陰霾；德國北部一片沙質平原，阿爾卑斯山把它和南歐隔開——德國沒出產什麼好酒，只有啤酒、杜松子酒、黑麥麵包，以及河流和革命，後兩者統統流入沙裡。可是法國，五條大河，面臨三個海洋——還出產大麥、米和玉米，還有橄欖油、麻布和絲，而且，到處有酒！「那麼多好酒！」他列舉他最喜歡的幾種白蘭地酒，從波爾多(Bordeaux)到艾慕索(Ai Mousseux)，「想想，各種不同的酒引起各種不同的醉法，從大跳康康舞到馬賽式瘋狂，不一而足！」在法國當過兵的人都知道，放假時在法國各地遊蕩，是多麼賞心悅目的事情！恩格斯走在山區裡，到處是葡萄園，在秋日陽光下閃閃發亮，在這裡雖然沒有瑞士或萊茵河區那麼壯觀的風景，可是靜謐和諧的氣息卻

叫人無比的心曠神怡。

從上面充滿文學性的描繪筆調，我們可以看出來，恩格斯在和馬克思的交往過程當中，他的性格面是多重的。在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之前的幾年之間，他不斷努力在模仿馬克思銳利而尖酸刻薄的批判風格，在革命運動中，不管是戰友還是敵手，一概以「狗」、「臭蟲」、「笨瓜」、「野人」、「傀儡」、「綿羊」、「小廝」或是「畜生」等稱之，接下來幾年，甚至還把人類和「驢子」畫上等號。他們昔日的戰友摩西·海斯，他是第一個欣賞馬克思才華的人，也是第一個把共產主義介紹給恩格斯的人，在一次萊茵地區的暴動中，他們還一起併肩作戰，可是後來恩格斯卻用尖酸粗魯的語調批判他，在寫給馬克思的信中他這樣說：「我們有必要再理會那個白癡嗎？」他們甚至都覺得工人的愚蠢和無知實在不可原諒。但是現在，他漫步在羅瓦爾河(Roie)的河谷中間，心中卻洋溢著充實敦厚的感覺，這裡的鄉下人對他那麼和善親切，他為他們的小孩畫路易·拿破崙(Louis Napoleon)和卡維納克(Cavaignac)將軍的漫畫，他向他們強調，他畫得很像。

在丹皮埃爾(Dampierre)的時候，他遇到了三四百個巴黎來的工人，他們都是以前國家工廠的工人，現在政府派他們來這裡建水壩，他發現「他們並不在意自己的階級利益，也不關心當下的政治狀況」。他們離巴黎遠遠的，生活過得也似乎不錯，他心裡想，他們會棄工從農的。恩格斯以慣有的敏銳觀察力分析法國農人的政治觀點，他發現他們的父親那一代好不容易從貴族和教士手中得到了土地的所有權，他們絕不會有興趣去和巴黎的工人革命湊熱鬧，但他們似乎也不會了解，現在的銀行家和資本家正和以前的貴族和教士一樣，逐步在剝削他們。他來到了勃艮地(Burgundy)，他發現那裡的人「是那麼的天真純樸，本性那麼善良，對外人完全沒有戒心，而且，很滿足於他們的封閉世界」。因此，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責備他們「對政治的無知，以及對路易·拿破崙的盲目狂熱」。勃艮

地每一條街上到處布滿鮮紅，這當然不是斷頭台的結晶，原來一八四八年葡萄大豐收，當地居民必須把去年儲存的葡萄酒倒掉，以容納今年新的葡萄酒，勃艮地鎮上的女人們由於葡萄盛產而得以享受一些法國的高級文明——女孩子們，看來整潔光鮮，苗條細緻，比起德國家鄉擠牛奶的女孩那種平板的感覺，恐怕是要高明得多了。他和她們一起躺在草地上吃葡萄喝葡萄酒，有說有笑，幾個鐘頭過去了，然後又從容上路。

來到瑞士之後，完全沒有馬克思的消息，本來還期望他會寄些錢來給他用，他不免開始擔心，馬克思是否會像對待其他許多人那樣，毫不留情把他也給甩了。其實，馬克思正在忙他自己的事務，他後來在給他的信中這樣寫道：「別以為我會棄你於不顧，你永遠是我最近的朋友，希望你也是這樣想才是。」

一八四九年的年初，恩格斯終於能夠回科隆，是時馬克思又出外去籌錢，他暫時接管報紙的主筆位置。他盼望匈牙利爆發一場革命，也期待奧地利在義大利北部的戰事會再度把法國人挑起來。普魯士這邊正調派國民軍要鎮壓保護憲法的人，一場內戰眼看一發不可收拾，混亂從艾伯菲引發開來，這個城鎮到處是失業的磨坊工人。到了五月，街道上到處架起柵欄，監獄被攻破了，鎮民成立「公共安全委員會」來接管鎮上政務。接著德萊斯登和巴登又引發了暴動，匈牙利正準備入侵奧地利，恩格斯回到艾伯菲，剛好被「公共安全委員會」指派擔任一項防禦任務，他就把工人武裝起來，竟嚇壞了中產階級。他回到艾伯菲的第一個禮拜天早上，他綁著紅色頭帶，興致非常高昂，帶領著一批槍手來到銜接艾伯菲和巴爾曼的橋上，竟不巧遇上正要前往教堂的老恩格斯先生，場面真是尷尬極了，父子之間的衝突至此終於不可收拾，這件事情的經過始末不久在鎮上流傳開來，鎮民都很生氣，因為老恩格斯是鎮上頗具聲望的人，不久，他們就到處張貼布告，要求恩格斯離開鎮上。

《新萊茵新聞》暫時停刊，他和馬克思一起前往法蘭克福，他們不斷鼓動當地的議會以武力維護憲法，但沒有成功。然後又一起前往巴登和萊茵地區西部一帶，他們至此終於了解，各處的暴動在聲勢上並不如他們所預期的那麼浩大。在回科隆的路上他們被逮捕，但很快即又釋放，馬克思離開萊茵地區前往巴黎，恩格斯則又回到萊茵地區的西部，現在想再扮演任何政治角色似乎已經不可能了，地方臨時政府想提供職位給他，但他嫌當公務員沒出息，缺乏革命精神，他想為地方上的報紙寫文章，但筆調太激烈，似乎又不合時宜。他發現整個地區像個「大酒館」，人們不斷批評普魯士啤酒，卻一副無憂無慮的樣子，他偶然在一張過期的科隆報紙上讀到普魯士已經進占外省了，他這時才真正了解德國革命的特性，他把這個消息散布給當地居民，然後入伍當兵去了。

恩格斯參加過四次戰役，他在寫給燕妮·馬克思的信上這樣說道：「子彈的呼嘯聲實在很令人討厭，在這次戰役當中，雖然有些膽怯，但我看到十幾個人在戰火下也是很膽怯，最後大家只得硬著頭皮蠻幹……不管怎樣，這裡有一位《新萊茵新聞》的編輯跟他們一起併肩作戰，真是不錯。」他的部隊開往佛萊堡(Freiburg)，準備幫助當地政府對抗普魯士人，但是他們尚未抵達，當地的政府早已棄械遁逃了，恩格斯和他的指揮官威利區(August Willich)打算說服上級讓他們以僅存的人馬背水一戰，但上級不同意，最後他們只得退入瑞士，恩格斯看著一批人馬穿過黑森林撤退，覺得好像在度假遠足，時值七月，山上遍地瀰漫著花香，非常宜人。他寫給馬克思夫人的信上說，威利區是個勇敢而有謀略的軍士，可是一離開戰場就比不上「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了。

宜人的度假遠足，子彈的呼嘯聲，山上遍地的花香。

可是，馬克思從巴黎寫來的信就沒這麼愜意了，我們看到的是他對人類的不斷哀嘆，以及對道

德情感的無力感覺，他注定自己要受苦受難，別人也要一起跟著受苦受難，他必須棄自己所愛的人的幸福於不顧，他要對抗人類活動的自然過程，他要粉碎歷史潮流，他的最終結局是勝利，但同時也是悲劇。

恩格斯已經逃離荒蕪的巴黎，他在那裡所支持的勢力已經敗北，理想幻滅所帶來的陰影正籠罩著馬克思。路易·拿破崙一上台立即撲滅所有的反動勢力，城裡正在流行霍亂，到處瀰漫著一股陰霾的熱氣，根據赫爾岑的記述，抬往墳場的棺材可謂絡繹不絕。派往義大利幫忙抵抗奧地利入侵的法國共和軍隊竟把共和羅馬出賣給了教皇，馬克思此時已經身無分文，他在離開科隆時清理報社業務，竟然一文不剩，燕妮必須賣掉她所有的家當，一家人才能順利離開科隆，現在來到巴黎，她又必須典當首飾，她已經生了三個小孩，她很擔心他們會染上霍亂，現在她又有身孕了，預計秋天生產。

史帝芬·伯恩(Stephan Born)是個年輕的印刷工人，也是共產主義者，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曾經領導工人階級暴動，馬克思一家人住在布魯塞爾時，他和他們有來往，「他們住在郊區的一幢小房子裡，很拮据，甚至可以說很窮。」提到燕妮時，他說他從未見過一個女人像她那樣，「不管是外在還是內在，都是那麼柔和細緻。」當時有一個組織團體附屬於「正義同盟」，叫做「工人教育同盟」(Workers' Educational Union)，馬克思每個禮拜固定在那裡發表演說，演說之後由燕妮朗讀一些詩文助興。伯恩說有一次恩格斯帶著瑪麗·彭斯一起出席聚會，馬克思一家人顯出很冷淡的樣子，當伯恩走過來跟他們講話時，馬克思「對我眨一下眼，並且微笑了一下，讓我知道他的夫人在那位女士面前必須擺出一副很酷的樣子」(值得注意的是，伯恩非常贊同燕妮的做法，他認為在行為舉止上擺出不妥協姿態藉以維持尊嚴是有必要的，他同時認為恩格斯老是帶著瑪麗·彭斯在工人面前招搖，似

乎在提醒他們，企業家的兒子隨時可以糟蹋窮人家的女兒，這顯然有失體統）。

馬克思被趕出比利時之前，有一次燕妮外出找他，在路上被警察以遊蕩罪名加以逮捕，當晚被拘留在警察局，還跟一些妓女關在一起並睡在一起。現在，馬克思用假名住在巴黎，卻逃不過法國當局的眼睛，有一天早上，一個法國警察前來通知他們，限定他們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必須離開巴黎，如果他們還想留在法國，必須遷去住在偏遠的外省莫比罕(Morbihan)。「布列坦尼(Brittany)的邊境省！」馬克思在信中驚叫，他說法國當局簡直就是想置他於死地。

他決定前往英國尋求庇護，他寫信給恩格斯，要他在英國跟他們一起會合。

第十九章

辯證法的奧秘

我們現在必須進一步詳細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動所賴以支撐的系統結構及其機制。

他們稱他們的哲學為「辯證唯物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在談到馬克思主義時，許多人對此一術語經常產生誤解，因此我們不能以一般觀念來詮釋「辯證」和「唯物主義」這兩個詞彙。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所提到的「辯證法」並非蘇格拉底哲學中的辯論方法，而是黑格爾所說的變遷原理(Principle of change)。柏拉圖對「辯證法」的解釋是，調和兩個對立的觀念以獲致真理的技巧；而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種律則，雖然也是一種調和對立觀念的技巧運用，但在黑格爾看來，這種技巧運用並不限定於邏輯推理，同時也可用於自然世界和人類歷史上面。他認為這個世界一直在變遷，但其變遷包含此一不變法則：每一變遷一定經過三個階段的周期。

第一個階段黑格爾稱之為「命題」(thesis)，這是肯定和統一的過程。第二個階段是「反命題」(antithesis)，從「命題」分出來，然後否定「命題」。第三個階段是一個新的統一，結合「命題」和「反命題」，稱之為「綜合命題」(synthesis)。這三個階段並非只是反覆循環讓世界原封不動，「綜合命題」經常比「命題」更上一層，因為「綜合命題」把「命題」和「反命題」中最好的特性加以結合起來，成爲一種「更高層次」的統一。黑格爾舉例說明，早期羅馬的共和所代表的統一即是一種命題，此

一早期之統一乃由一批偉大的愛國者所完成。隨著時間的推移，共和的愛國者變成另一種類型，此即凱撒和龐培（Pompey, 106BC-48BC，古羅馬政治家，曾和凱撒結盟，後與凱撒衝突，戰敗後被殺）分庭抗禮的「個人巨頭」時期，這個時期的共和產生混亂，巨頭互相撻伐，羅馬的鼎盛亦達顛峰——這是從「命題」分裂出來的「反命題」。接著是凱撒削平群雄，為羅馬締造另一個新的文明里程，此即「綜合命題」，完成了另一個更高層次的統一：羅馬帝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擷取此一原理，且將其行動投向未來，這是黑格爾未嘗做到的。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他們的「命題」是中產階級社會，其根源乃是封建體制解體之後的統一。他們的「反命題」是無產階級，其根源是現代工業發展的結果，但是他們卻由於現代社會的分化和墮落而變成一蹶不振，他們非起來反抗不可。他們心目中的「綜合命題」是共產主義社會的來臨，其根源來自勞工階級和有產階級鬥爭的結果，此時勞工階級全面勝利，形成另一更高層次的統一，人類的利益從此互相調和。

我們現在不妨先看看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中的唯物主義那一面，黑格爾在哲學上是個理想主義者，他認為歷史的變遷乃是起源於「絕對觀念」在物質世界中一種進化的自我實現所帶來的結果，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爾翻轉過來，拿他出來大作文章一番，馬克思在《資本論》（Das Kapital）一書中如此寫道：「對黑格爾而言，他以『觀念』為名，將思想過程轉化為一種獨立的題材，此即真實世界的主宰，真實世界只是其外在表象而已。對我而言，剛好相反，觀念在人的腦中作用之後，只是成為物質世界的表象而已。」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所有的觀念都是與人有關，而且離不開當時特定的社會環境，其所以產生必然是奠立在人與其特定物質環境的關係之上。

這如何解釋呢？許多人在乍聽到馬克思主義一詞時，可能直覺認為：這指的是人類的所有活動

皆源於經濟利益的動機，人類所想的或所做的，皆離不開此一準則。他們可能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解答人類事務之複雜性的關鍵，他們因而可以名正言順批判他人由於金錢動機所帶來的成就。這種人如果仔細檢視其想法並加以哲學論辯的話，顯然他們落入了一種「機械作用」的圈套，此一「機械作用」代表良知的各種現象，充滿意志的幻象，是一種機械運動的反射，絲毫沒有作用可言。恩格斯告訴約瑟夫·布洛赫 (Joseph Bloch)，「近時的（一八九〇年前後）馬克思主義者」簡直是充滿了「胡言亂語、不知所云」，我們上述的例子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而已。

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贊同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所提倡的「純粹機械作用」(pure mechanism)，恩格斯說他們認為要把機械作用的準則運用到化學和有機自然的過程是不可能的，何況機械作用的律則亦有其功能上的限制，而推動化學和有機自然的過程的律則在層次上顯然較高。因此在社會上，經濟動機並非是唯一的主動要素，其他一切也並非一律都是被動要素。

然後呢？如果說決定社會關係的要素是經濟，而觀念則是來自這些社會關係之中，這種真實性有多少呢？如果說觀念並不是一種「被動的效果」，那麼其內涵及本質又如何呢？其又如何影響經濟活動呢？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又如何幫助帶動無產階級革命呢？

事實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將他們的觀點努力付諸實行，他們的觀念中有一點很重要而具啟發性的是，他們認定人類精神透過理性的運用可以掌握其獸性的一面，但許多人卻完全誤解他們的意思：人類是其欲念下的可憐犧牲品。馬克思曾經放下哲學，寫了一本小書叫做《費爾巴哈題綱》，他後來打算在寫完《資本論》之後寫一本書專門討論「辯證法」，但這項計劃來不及實現就死了。恩格斯在晚年也曾經論及這方面的觀點，首先是《反杜林》(Anti-Dühring, 杜林 (Eugen Carl Dühring, 1833-1921) 為德國社會主義者) 一書，後來是一本論費爾巴哈的小書以及一些長篇大論的書信，他自己亦

承認年輕時熱中研究哲學，對此涉獵並不多。事實上，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我們如果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的論述綴合起來，其實是相當有限。麥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在其精彩的論著《馬克思、列寧及革命之科學》(Marx, Lenin, and the Science of Revolution)中，就曾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階段所提出的一些論點有其互相矛盾之處。席德尼·胡克所寫《如何了解馬克思》(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一書雖說有謬誤，卻不失中肯，該書即試圖補充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留下的空白，並為他們抹去矛盾之處，然後為他們勾勒出一個系統。我們如果讀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之間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書中充滿譏諷筆調——我們會發現我們獲得的印象似乎是，人們所想的和所做的幾乎全是源於其最粗陋的需要。我們如果讀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代所寫的信件，是時馬克思主義已經開始引起人們注意並引發一些基本問題，我們發現老年的恩格斯正汲汲營營於努力陳述事物的本質，這給予我們的印象實在十分不同。「馬克思和我，」他寫道：「實在應該為我們的學生過分著重經濟問題負部分的責任，其實，我們強調其重要性只是為了對抗否定這個問題的敵手，我們一直沒有適當的時機好好徹底處理歷史過程中與之有相互作用的其他問題。」

我們現在不妨看看恩格斯在這裡提到的「有相互作用的其他問題」。

當我們聽到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點時，我們第一個印象是——恩格斯說他和馬克思是這種印象的始作俑者——一棵樹，其根部是生產部門，樹幹是社會關係，樹枝(或者說是「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是法律、政治、哲學、宗教及藝術等，它們和樹幹及根部的真正關係則由「意識形態的」(ideological)葉子加以掩飾。但這並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意思，他們認為上層結構的意識形態活動並非只是經濟要素的反映，亦非只是徒然裝飾門面，這方面的觀念其實是遠為複雜得多的。所有這些上層結構的各個部門——法律、政治、哲學等等——都在努力掙脫經濟方面的箝制，並且

努力形成自己的專業集團，免於落入階級偏見的圈套，同時他們的工作和經濟方面的關係又是非常間接而模糊，但他們各自之間的互相作用卻是很直接的，甚至影響到社會和經濟的基礎。

恩格斯在其信件中曾試圖爲他心目中法律部門的問題舉例說明，比如說繼承法，他認爲即有其經濟基礎的一面，必須考慮配合家庭發展的各個階段，但是我們實在很難判定在英國可以自由處理遺囑或是在法國有種種限制，是否由於經濟理由所致，不過此兩國不同的繼承法可以肯定跟經濟體制有關，而影響了財產的分配。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住屋問題》(The Housing Question) (一八七二年出版)一書中的第三部第二節，他就提到法律系統之發展的一些實際問題。馬克思有一次——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一書的初稿中——就談到藝術和經濟處境之間很難釐清的連帶關係，他認爲藝術的高度發展未必與社會的高度發展有關，偉大的藝術——比如希臘史詩——不一定是高度發展社會的產物，但我們卻可以解釋爲什麼某一個特定的時期會產生某種特定類型的藝術。單純天真的古希臘人，當時甚至尙未發明印刷技術，避雷針的觀念亦尙未產生，但他們在其神話中卻可以想像出打雷即代表宙斯在生氣，這是原始社會所可能製造出來的原始魅力，卻大大超乎他們社會狀況的水平。我們的困難在於如何指出藝術發展和社會發展之間的必然關係，馬克思在這方面始終無法自圓其說，而其上述之說明自然無法令人滿意，他的問題在於他無法說明避雷針觀念產生之時代的社會發展比荷馬史詩時代爲高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他在上述一書的別處亦有所提及：「物質和藝術之產生的關係並非對等，一般而言，進步的觀念並不適用於抽象的藝術創作上面，這種情況不能拿來和實際的社會關係相提並論，比如美國和歐洲兩地教育之間的關係。真正的困難之處在於，如何指出生產和法律之間關係的不平等發展，比如羅馬民法(刑法和公法較不適用)和現代生產的關係。」這段文字如同《費爾巴哈題綱》的文字，

顯然是觸到問題的核心，卻未再進一步詳細討論，馬克思知道這些問題的重要性，但稍事提過之後就未再進一步繼續發展了。

至於科學在他們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馬克思和恩格斯就顯得很混亂了，他們標榜他們工作的科學性質，他們不得不相信科學對社會的影響力，同時他們更應該知道科學和其他上層結構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緊密關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一書的序言中，提到社會革命所帶來的影響時說道：「由於自然科學之進步所帶來的經濟方面的物質改善，這和意識形態上如法律、政治、宗教、美學或哲學上的情況應該有所區別。」因此，自然科學不能置放於上層結構中意識形態的水平上等量齊觀，但自然科學有其一定的準確性，卻又不是上層結構的意識形態所能望其項背的，只有社會科學似乎可以與之共享此一準確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費爾巴哈的「抽象人」之同時，他們也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指出：「甚至純粹的自然科學只有在將目標及其物質方針指向商業和工業及人的感性活動之時，才能真正著手開始。」馬克思後來在《資本論》中宣稱：「在政治經濟的領域中，自由的科學研究所遭遇到的障礙比在別的領域所遭遇到的還要難纏，因為科學研究的本質在此遭遇到了人性中最激烈、最基本，同時也是最討厭的一面：個人利益的爭執。」恩格斯在《反杜林》一書中較少談到科學研究的問題，但他說，有些科學項目如機械和物理，相當依賴數學的基礎，我們看的是結果，而不是過程，即使是數學本身亦然，中間經常充滿許多不確定因子或謬誤，只有確定的結果才有準確性。至於涉及到活生生有機作用的科學，不變的準確真理則包括凡人必有一死以及雌性哺乳動物必有乳腺。其他科學他稱之為具有「歷史準確性」的，就似乎沒準則可言了：「我們一旦越過所謂石器時代的原始人類階段之後，人類處境的重複發生只是例外，而不是規則，即使有重複發生的情況，也絕不會全然相同。當其發生之時，我

們可以認出一個時期中社會和政治形式之間的內在關聯，一般而言，這類形式大抵已經過時或就要幾近絕跡。」至於處理人類思想法則的科學——如邏輯和辯證法——其情況亦然，不會更好。

在政治方面，他們所設定的方針是其制度價值必須與階級息息相關，但有時他們卻不得不承認在某些狀況下一種政治制度會形成爲一種絕對價值，馬克思主義的原始主張即認定國家必須由某個階級專政。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一書中認爲，路易·拿破崙(即路易·波拿巴)的政權有一段時間把法國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平衡拿捏得非常好；恩格斯在《家庭之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一書中宣稱：「在某種特定狀況下……當互相敵對的階級達到某種程度的平衡時，政府會獨立出來，成爲他們之間的仲裁者，十七和十八世紀君主專制時期的專制政權即經常成爲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平衡力量。拿破崙一世和第二帝國時期的法國，專制政府經常利用無產階級來對抗中產階級，反之，也利用中產階級來制衡無產階級。」

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懷疑過他們自己的社會革命理論，而且更確定他們的理論終究會實現。我們知道，他們倡導階級的意識形態，主要目標就是在提升無產階級的權益，但他們從未想要刻意標榜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在效能上到底和別人有何不同。

所謂的效能從哪裡開始、在哪裡結束呢？我們不禁要納悶。我們如何區別一種法律或一件藝術作品，在程度上有多少是階級至上的產物，有多少是別方面的產物？有多少程度以及在何種狀況下人類的觀念是依經濟事務而行？關於此一論點，恩格斯留給我們的最後看法是(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一日寫給約瑟夫·布洛赫的信)，雖然經濟要素「未必是唯一的決定要素」，但是「在歷史上，實際生活中的生產以及再生產，終究還是成爲決定要素」。可是一種法律制度或一種文學性文化的產生難

道沒有價值嗎？沒錯，羅馬帝國終究不免陷入經濟的困境，但是羅馬的法典和維吉爾(Virgil, 70BC-19BC, 古羅馬詩人)的詩有隨著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消失嗎？「終究」到底是什麼意思？如果沒有奧古斯都(Augustus, 63BC-14AD, 羅馬帝國第一代皇帝, 原名屋大維, 在位時獎勵文化藝術)皇帝, 就不會有維吉爾的史詩作品《伊尼德》(Aeneid), 這點毋庸置疑, 同樣, 如果沒有維吉爾的亞歷山卓港前輩羅迪奧斯(Apollonius Rhodius), 《伊尼德》一樣無從產生。那麼, 到底維吉爾有多大程度是以文化生活的主腦身分在導引一個社會？「終究」指的是時間的最終時刻, 或者只是人類行為中基本動機的決定性時刻？

我們要澄清這層困難, 不妨了解以下事實即可, 當某個種族或某個階級在餓肚子時, 是不可能創造什麼文化的, 但是只要環境一繁榮起來, 他們立即跨越國度和階級, 共同創造作品出來; 可見一個社會的經濟一衰亡, 創造藝術的人就跟著衰亡, 但他們曾經創造的作品會留傳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個問題從未詳細加以解釋, 馬克思研究過羅馬的法典, 顯然有意針對這個問題發揮一番, 可是, 為什麼沒有呢? 總之, 關於人的直覺創作意志和人為求生存盲目鬥爭此兩者之間的關係, 他們只是簡單的用三言兩語加以概述: 「人創造自己的歷史, 但並不是他們所喜歡的歷史。他們無法選擇自己想要的環境, 只能依照所面對的環境、根據過去所留下來的材料去創造歷史。」(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一八五二年)或者: 「人創造自己的歷史, 卻只能依集體意志、集體計劃為之。」(恩格斯一八九四年給漢斯·史塔肯堡(Hans Storkenburg)的信)這是為什麼呢?

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寫了一篇論文, 叫做《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演變》(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Outcome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他在此論文中即嘗試對上述論點做一詳盡闡述: .

人創造自己的歷史，不管歷史如何演變，每一個人在此一過程中皆遵循自己的欲望行事，由於各人欲望不同，便對外在世界造成不同的影響，由此即組成了歷史，這裡牽涉到的是各人的欲望是什麼的問題，熱情和努力決定了人的意志作用，但是促成熱情和努力的方式卻又有許多種，可能是外在事物的刺激，可能是理想、野心，或是「對真理和正義等的嚮往」，也許是出於個人的怨恨或各式各樣的幻想等等。從某方面而言，就我們觀察所得，多數個人的意志在歷史上的活動所帶來的結果，經常和他們的意願十分不同，甚至相反，這種意志活動跟歷史結果的相比實在微不足道。從另一方面看，我們不禁要問：這些意志活動的動機其背後的推動力量是什麼？在這些歷史演員的心目中，變成這些動機的是哪些歷史要素呢？舊的唯物主義從未回答過這個問題。

恩格斯的回答是：「以經濟解放為目標的階級鬥爭。」可是他卻從未說明「理想」如何可以帶動階級鬥爭的進展。

問題在於從一開始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採用了某種足以阻礙我們上述論點的東西：他們採用了黑格爾辯證法。從他們把辯證法納入他們的半唯物主義系統那一刻起，他們就創造了一種神秘主義的東西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一開始就是理想主義者，他們認為他們已經把黑格爾從高空拉到地面上來，從來沒有人像他們那樣努力在打破人類的迷夢，並且進一步指出他們的悲慘處境，然後將他們帶向實際問題的核心。但事實上他們持續不斷的努力——英國人或法國人絕不會這樣蠻幹——卻與他們

本身的氣質背道而馳，他們一直在對抗德國的理想主義，卻同時不知不覺帶著這種理想主義在奮勇前進，年輕時代的馬克思曾經和醫生打趣說，人的靈魂可不可能靠一顆藥丸來拯救，現在辯證唯物主義就像一顆藥丸，要來拯救整個世界。

德國的哲學一向充滿了抽象的思辨，像天馬行空一般，我們如果用英文或法文去讀，會覺得不知所云，一頭霧水。他們的體系龐大，卻又非常單純；雖然抽象，卻又十分豐富，源源不絕。他們有一種力量，會叫人感到自滿、感到安慰，並且沈醉其間，隨時準備奮戰，好像異族的歌曲和詩歌，會叫人感受其美妙的魅力而渾然忘我。他們好像以前從北方入侵的蠻族，在接受基督教的時候，卻又要保留他們的異教精神，也好像基督教義被十八世紀法國的理性主義取代時，就趕快戴上純粹理性的面具一樣。其實，他們反對人神同性論，自己卻是神話的創造者。德國人在社會觀察方面一向就沒什麼貢獻，他們沒寫過什麼偉大的社會小說或戲劇，卻不斷產生創造神話的天才，像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德國詩人、作家，代表作為《浮士德》、《少年維特的煩惱》)的「永恆女性」(Ewig-Weibliche)，康德的「無上律令」(Kategorische Imperativ)，黑格爾的「世界精神」(Weltgeist)及其「觀念」(Idee)——這些東西不但主導當時德國人的心靈，而且還好像神一般纏繞住整個歐洲。馬克思在我上面所轉述的他的文章裡，把黑格爾的觀念描述成「造物主」，這位造物主一直和他長相左右，即使他自認為已經擺脫了，還是如此。他始終相信黑格爾的「三組一體」：「命題」、「反命題」以及「綜合命題」，其實，這裡的三組一體正是來自古老的「三位一體」基督教神學觀念，而此一基督教神學觀念則是來自柏拉圖，但更早的來源則應該是古希臘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580BC-500BC，古希臘哲學家、數學家、畢達哥拉斯教團創始人)或之前時代的神秘三角觀念，這種觀念代表一種權威，同時是男性性器官的象徵。有一次馬克思這樣寫道：「哲學在世俗世界中的地位，正如同手淫

在性愛中的地位一樣。」因此在研究世俗世界時，他堅持使用辯證法，「一體二位」或「三位一體」的「命題」、「反命題」和「綜合命題」遂成爲馬克思主義者研究世界事務的不二法門，簡直已然超乎了理性的程度（奇怪的是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國作曲家〕從未寫過有關辯證法的歌劇，也許《尼布龍根》〔Nibelungen〕一劇中華頓、布龍希和齊格非二者之間的關係或可勉強算得上吧）。

辯證法的觀念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說非常根深柢固，終其一生均是如此，其思想技巧完全以此爲主，其文學風格亦然。他陳述觀念的方法來自辯證法中對立的似是而非辯證結果，這之間包含了許多類似純粹符咒的要素，這種情形尤其見諸他早期的著作當中，有時頗有效果，有時卻又矯揉造作不堪，令人無比厭煩：「路德打敗了以虔誠爲基礎的奴性，因爲他用以信念爲基礎的奴性加以取代；他粉碎了權威的信仰，因爲他重建了信仰的權威；他將教士轉化爲俗人，因爲他將俗人轉化爲教士；他解放了人的外在信仰，因爲他將信仰帶入了人的內心；他解開了身體的束縛，因爲他把束縛拴住了內心。」像這類似是而非的辯證手法在他的著作中屢見不鮮，而於寫作《資本論》談到剝削者的剝削時達到高峰。

他晚年熱中於研究高級數學，關於這個，他告訴拉法格（Paul Lafargue, 1842-1911，法國勞工黨創始人之一，後與馬克思之女羅拉結婚）說：「我終於再度找到了辯證法最單純也是最合邏輯的形式。」恩格斯研究數學和物理以及化學和動物學，他努力想證明主導自然界的正是辯證法則。俄國人在十月革命之後，對這方面的研究可謂不遺餘力，隨著馬克思主義政治勢力的發展，他們也把這方面的研究擴展到許多其他國家。最近的例子是兩位聲名卓著的英國科學家——拜納爾（J. D. Bernal）和哈爾丹（J. B. S. Haldane, 1892-1964，印度裔英國遺傳學家、生物統計學家），他們也不斷努力在印證辯證法在物理、化學以及生物方面各自的運作情況。各人對這方面思想的態度實在是取決於他對純粹形而

上哲學的興趣而定，有些人以詩的形式去接觸形上學，他們把形上學看成是詩作的一種抽象表達形式，但一觸碰到辯證唯物主義觀念，恐怕就要退避三舍了，他們寧可以戲劇性眼光去看待某些社會變遷，再牽扯到其他，那就太遠太複雜了。

要批評恩格斯並不難——他有許多例子都是舉自黑格爾的《大邏輯》(Logic)——比如他就說「否定的否定」(「反命題」對抗「命題」的行動)在數學上一樣成立： a 之否定的否定是 $+a^2$ ，也就是說，原來正 a 的平方，層次更高。」但是我們知道 a 的否定不是 a^2 ，而是 a ，如果我們想得 a^2 ，根本不必否定什麼，只要正 a 乘以正 a 就可以了。當然，恩格斯也承認「建立第一個否定，第二個否定才有可能存在」。但是，如果說辯證唯物主義者爲了得到辯證的結果，他們首先必須設定自己的立場，那麼，恩格斯如何解釋辯證法存在於所有自然過程之中呢？黑格爾的法則是「從量變到質變」，馬克思認爲他可以看到從中世紀同業工會逐漸蛻變爲資本主義的變化過程，如同分子不斷增加的碳化過程。胡克教授發表在第二期《馬克思主義季刊》(Marxist Quarterly)上的一篇論文〈辯證法與自然〉(Dialectic and Nature)就曾經指出，拿恩格斯所舉水在某個溫度時突然變成蒸氣或冰的例子來說，對某個不同的觀察者而言，其變化在不同的時刻必然有所不同：這位觀察者所看到的水是裝在散熱器裡頭，他看到水溫突然變化時，他知道的是——也許他打了一個噴嚏——房間裡的溫度正由熱變冷。還有，要不是透過水質的顯微鏡分析，分析出其中之電子，我們如何知道水在沸點會從液體變成蒸氣？

拜納爾和哈爾丹所舉的例子也是如此，拜納爾的許多研究顯示其實與辯證法則並沒什麼關係——如同門德列夫(D. I. Mendeleev, 1834-1907，俄國化學家，建立化學元素周期表)的元素周期表，恩格斯對這個極感興趣，認爲可以說明量決定質的現象，但卻與「反命題」及「綜合命題」沒什麼關

係，自然就牽扯不到辯證法則了。至於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對論」，拜納爾則認為恩格斯的著作「與當今或是過去的物理學根本扯不上什麼關係」。拜納爾甚至還提到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欲望壓抑理論，免不了牽扯到了辯證法的周期法則，本能是「命題」，壓抑是「反命題」，淨化昇華則是「綜合命題」，真有意思！可是如果病人最後不是淨化昇華，而是發瘋了，而且自殺了，那麼，「綜合命題」中相對元素的調和作用在哪裡？從低層次進化到高層次的現象在哪裡？當然，在一些別的領域裡，其變遷是經由累積而來，累積本身在我們看來即是一種變遷。哈爾丹說，比如像冰變為水即為一種神秘現象，但是我們如何證明此即為辯證的「三位一體」？哈爾丹把變化和選擇的過程訂為三位一組，如同黑格爾總是喜歡以三組一體的東西提出論證——維科也喜歡用三這個數目字看事情：三種語言、法律的三個系統、三種政府等等，至於但丁(Alighieri Dante, 1265-1361，義大利詩人，著有史詩《神曲》)，他把他的詩分為三個部分，每個部分又分為三十三篇，但是，這些又如何證明出來「三位一體」呢？

在最近一期的馬克思主義季刊《科學與社會》(Science and Society)中引發了一場有趣的爭辯，倫敦經濟學院的勒諾(A. P. Lerner)教授批評哈爾丹把辯證法帶入生物學的領域，並準備在此一科學領域中樹立起「馬克思主義教室」。哈爾丹則答辯說，他受莫斯科一家國立出版社委託，以辯證法研究孟德爾(Gregor Johann Mendel, 1822-1884，奧地利遺傳學家，發現遺傳基因原理)遺傳學的進化理論，他發現辯證法的思考方式對他實驗室的工作實在是助益良多，他雖然沒說他的研究成果「如果沒有研究恩格斯則不可能達成」，但他卻說「沒有研究辯證法則不可能達成」。勒諾教授則認為他「那麼熱情擁抱辯證法，未免太痛苦了」，哈爾丹教授則說他擁抱辯證法「整整六年，並不是一開始就愛上的」。「我希望，」他接著說：「生物學的學生除非確信辯證法對當今以及未來的生物學發展有用處(我如

此認為，勒諾教授卻不以為然），否則不要輕易去接觸辯證法。」他很感激勒諾教授對他的「刺激性批評……但是最有價值的批評則是來自和我一樣研究這門學問以及崇尚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工人」。這些話我們聽來似乎耳熟能詳，這難道不像是準備接受布克曼道德重整基督敎派(Buchmanian，一九二〇年代由美國路德派牧師布克曼在英國牛津大學發起的宗敎信仰復興運動)或是天主教虔誠告白嗎？

的確，辯證法正像是一個神秘宗敎的敎派，沒有神性的人格，只有人類歷史。馬克思年輕的時候說過：「我痛恨所有的神。」但他自己卻像航海的船員必須在胸前掛上神的護身符，他創造了自己的護身符。他在早期《萊茵新聞》上面寫的一篇談論新聞自由的文章中認為，作家「應該學習傳道敎士的原則：只服從上帝，而不是服從人，因為人總是受制於欲望和需要」。至於恩格斯，他小時候曾受敎於喀爾文敎派的傳敎士，這位敎士每個禮拜天都會在艾伯菲的禮拜堂講道，他每次都把敎友弄得麻木欽泣不已，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就說過，這位敎士會使用一種嚇人的邏輯論證來馴服聽眾，比如他首先設定人類的無能，人類沒有能力行善，這種能力只能由上帝賦與，但上帝的意志是自由的，而且是武斷的，他只能賦與少數人這種能力，這些人是有福的，其他人則永遠受天譴，「永遠嗎？」敎士會這樣問，然後自己回答：「是的，永遠！」這一類經驗在恩格斯小時候的腦海中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馬克思將自己的意志認同在辯證過程的「反命題」上面，他在《費爾巴哈題綱》一書中這樣寫道：「哲學家只是解釋這個世界，我們的職務是改變這個世界。」意志的作用在德國的哲學中始終扮演一種超人力量的角色，馬克思加以挪用，在「辯證唯物主義」上面大肆發揮，然後與他的革命

觀念和革命動力緊緊結合在一起。

對列寧這種果斷而充滿活力的人而言，意志的作用無疑如虎添翼，讓他充滿自信，認定歷史是站在他這一邊，他的目標一定可以達成。因此，辯證法簡化了整個畫面：把複雜的社會濃縮成正與反兩個陣營，不但肯定鬥爭必將成功，而且亦將一勞永逸。辯證法象徵著一股顛覆舊社會的新生力量，同時也代表打擊野蠻和混亂的團結良知，它更取代了以前舊式的口號：「打倒暴君，還我自由！」——他們認定革命乃是一種歷史的有機發展，一股顛覆力量正蓄勢待發，而且志在必得。

然而，信仰一種新的神聖力量並非一蹴可幾，要將舊的信仰連根拔除誠非易事，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一書中認為：「歷史並沒有成就什麼，也未擁有過什麼，根本沒戰鬥過什麼。只有人——活生生的人——真正在活動，真正在戰鬥和擁有一切。絕對不是『歷史』利用人去達成其目標，『歷史』什麼都不是，只是人追逐目標的一種活動而已。」他已經認定無產階級是辯證法所選定的鬥爭工具，而且勝利必然可以預見，他擺出一副超人的姿態。一八五六年，他在一次演說中告訴英國民權運動者，說在中世紀時代的德國有一種叫做 *Völsung* 的秘密法庭，「專門對付不仁不義的統治階層，如果一幢房子標示有紅色十字架的記號，則表示屋主已經被秘密法庭宣告判決了。現在歐洲所有的房子已經烙印上神秘的紅色十字架記號，歷史是裁決者，執行者則是無產階級。」然後是另一個更高的法庭，工人階級是劊子手，有一個叫做「歷史」的非人格總體依照其法則獨自處理一切事務，人類的故事不管你或你的敵手如何做，皆按部就班演出。過去基督教歷史所宣揚的，透過工作以求救贖的教條，今後將變為透過恩典以求救贖的教條。自然然而，馬克思主義者經由與辯證法的「反命題」互相認同，宣告其為一種宗教信仰，然後進入人類心靈，乘著自動扶梯上樓去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意志一旦決定要改變這個世界，立即化為一股看不見的力量，推動著自動扶梯，它會

一路將你送上頂樓，亦即將你送到「綜合命題」的幸福狀態。然而馬克思主義中有一種強烈的道德要素，使得自動扶梯大過於自動化，無法把每一個人順利送上頂樓，有的人卡在半路上，進退不得，較為不幸的則反而被推入不幸的深淵。因此，第二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一八八九年各國社會黨在巴黎成立的國際聯合組織)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雖然確定社會主義必將來臨，卻不幸捲入支持帝國主義的戰爭，剝奪了勞工階級所有的自由；同樣，第三國際(Third International，一九一九年各國共產黨在列寧主導下於莫斯科組成的國際聯合組織，也稱共產國際)的共產黨，即使奉行辯證法則不遺餘力，卻縱容史達林胡作非為，甚至動搖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

馬克思挾其強烈道德觀及宏大的國際觀，試圖把原始的德國意志觀念推向一種實際行動，以帶給人類繁榮、幸福以及自由。然而一旦此一行動在辯證法的偽裝之下，扯上了半神姿態的歷史法則，把人類對自身思想、抉擇和行動的責任都諉之於此一歷史法則——我們現今所身處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墮落階段——那麼它就成了暴君壓迫人民的工具了。舊式的德國意志觀念似乎也沒往好的方面發展，反而留在德國成爲狹隘的愛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最後淪爲納粹主義的工具。俄國人和德國人一併拋棄了基督教義中好的一面，卻保留了其壞的一面。德國理想主義的造物主絕不是愛之神，也不了解人類的不完美，因爲它並不宣揚對自己謙卑及對他人寬宏的美德。馬克思緊抱自己的「舊約聖經」，卻沒做到人性化的傳教工作，他認爲人類應該互助合作，以求快樂幸福，但這必須等到「綜合命題」的階段才能完成，然而他在現階段卻又不相信人類的兄弟愛。他其實很接近於他一向痛恨的德國帝國主義，德國的納粹主義也以歷史代言人自居，相信人類應該聯合起來，以求快樂幸福，當然，這得以亞利安種族(德國人)爲主以及臣服於希特勒麾下爲前提。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從事的工作，雖說有時被辯證法的奧秘所掩蓋而離了譜，以至於有其不完美之處，然而，從革命的觀點看，在當時確有其重要性，即使從今天的觀點看，仍有其值得注意的價值之處。我們現在不妨將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從辯證法分離出來，以一般的形式加以概述：

文明國家的公民，他們不但理性，而且有創造力，他們努力追求紀律和規範，因為這些可以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秩序、美以及健康。但是一旦他們被隔開，並且互相傷害，他們的缺點就暴露無遺了，他們只有在感受到這些衝突並著手努力去加以排除時，他們才能真正邁向道德的人類規律或政治系統或藝術流派，以有別於我們所看到的狹隘畸形的現象。人類行爲的潮流莫不是如此，任何要排除社會障礙的偉大政治運動，總是會把新的更進步的要素和其所要排除的要素以更寬廣的方式加以結合起來。人類精神的發展總是不斷在對抗弱肉強食的獸性行爲，並且不斷以追求人性的發揚爲主，直到大家體認到，人應該互愛而不應該互相傷害，到了那時，一種更高超的道德、一種更和諧的社會，以及一種更美的藝術乃得以建立起來，超乎我們目前所能想像的樣子。

雖然我們不能再依賴上帝給予我們超越人類能力的法律，雖然我們不必再僞裝認爲人類智慧所建立的體制可以放諸四海皆準，但我們現在可以宣稱我們新的改變社會的科學，雖說尚屬草創階段，卻是真正客觀可行，超乎歷史上以前的任何理論。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科學必須依賴社會環境而發展，事實很明顯，如果社會要繼續生存下去，新的平等原則必須建立起來，因此我們首先要建立一個沒有國家和階級界限的社會。如果說我們努力在爲無產階級的利益奮戰，那是因爲我們要維護整體人類的利益，未來由無產階級所代表的人類精神將大爲拓寬我們

的視野。

第二十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回去寫歷史

誠然，經濟動機的發現的確成爲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嶄新姿態寫作歷史的最佳利器。

在政治上他們正進入最爲灰黯的時期，但是他們在這個時期所寫的東西，包括報章雜誌的文章、小冊、著作及通信等，卻能夠以新的分析方法探討過去和當代所發生的事件，特別是他們之間的通信在十九世紀所扮演的角色，幾乎可以比擬於十八世紀伏爾泰和百科全書編撰者之間的通信在該世紀所扮演的角色。馬克思首先寫了《法蘭西階級鬥爭》(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1849-50)一書，這本書寫於他放逐到倫敦的第一年，發表於他和恩格斯所發行的《新萊茵新聞》雜誌上面。接著一八五二年他又發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主要探討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法國軍事政變事件。一八七一年發表《法蘭西內戰》(The Civil War in France)一書，主要分析巴黎公社的插曲。

馬克思這一系列以法國歷史爲主的著作當然比他寫在報章雜誌上的評論更見深度，在分析手法上亦更見細密，事實上，簡直可視爲當代探討歷史的偉大傑作。

我們現在不妨回頭看一下曾經幫助我們給馬克思主義定位的一些法國歷史學家，顯然他們對於當時發生在法國混亂而複雜的變化感到茫然迷惑，從共和、君主專制、無產階級叛亂到帝國體制，變化多端，面具換來換去，簡直叫人無所適從。現在馬克思揭去所有面具，並爲當時法國政治活動

提供一張圖表——這張圖表完全揚棄由一般口號和抽象概念所組成的傳統革命語言，它直接訴諸農人的麵包和酒以及巴黎人在生活上的舒適需求等這些廣大的利益上面。這段時期他在米西列的作品中看出了一七九三年二業城里昂的動亂根源，國民議會代表富人和革命領袖約瑟夫·夏里耶(Joseph Chalier)作對，這可以看成是一場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鬥爭，馬克思認為，要不是社會主義者的指點，他似乎仍看不出這一點。

現在，在《霧月十八日》一書中，他終於能夠充分掌握經濟線索，他發現立法黨(Legitimist)、奧爾良黨(Orleanist)、拿破崙黨(Bonapartist)、共和政府黨(Republican)以及秩序黨(Party of Order)全都是在裝飾門面，他進一步指出，自從路易腓力退位以來法國的實際情況是：大工業家、大地主和大資本家聯合起來對抗小中產階級和工人，所有的政黨想透過議會政府去達到自己的目標，卻始終事與願違，這倒給路易·拿破崙有機可乘，但他能夠竄起倒不是得自拿破崙的餘蔭，而是得自一些擁有土地的農人的支持，這些農人一向缺乏政治勢力，他們需要有人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和一群由中央集權政府所培養的職業官僚聯合起來，擁護路易·拿破崙以對抗中產階級。馬克思說，有一段時間路易·拿破崙倒也能夠維持各方面的平衡，但他始終還是無法面面俱到，總是難免顧此失彼，最後竟演變成兩面不討好，大家聯合起來反對他。同時之間，所謂的民主主義者企圖聯合擁護社會主義的勞工階級和擁護共和政府的小中產階級，以成立「社會民主黨」，這些民主主義者自認在階級衝突中所占的地位最為優越，然而他們還是失敗了，因為他們的智慧水平一直無法超越小中產階級的限制，同時，他們沒做到馬克思所說的：努力調和階級利益。我們在讀完《霧月十八日》一書之後，對當時議會政體所運作的語言、方式、慣例及企圖等可謂一目了然，他們喪失了其一貫性和理想色彩——全在我們眼前煙消雲散了。政府職位的爭奪遊戲及政治辯論等顯得愚蠢可笑，瑣碎不堪，我

們看到的是一齣接一齣爭奪權益的遊戲，而當事人卻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馬克思的這些文字顯得相當強烈有力，令人讀來興奮無比，真是思想史上少見的傑作。馬克思在此顯露出其最爲活潑銳利的一面——對政治的敏銳觀察實在是準確而又無微不至，充分顯露其組織的才華，然後有條不紊娓娓道出其中奧妙，同時字裡行間亦不斷流露機智和變化多端的隱喻，把索然乏味的政治現象描述得意趣盎然，令人讀來不忍釋手，最後則是以悲劇筆調來收場——這倒令人聯想到蕭伯納的戲劇手法——他能夠把一個無能議會的分崩離析描繪成像是莎士比亞筆下悲劇英雄的悲慘下場。

同時之間——一八五〇年的夏天——恩格斯則把他的注意力轉向一個較爲遙遠的過去歷史，一位名爲吉姆曼(Wilhelm Zimmermann)的德國人於一八四一年出版一本歷史書，專門探討一五二五年的德國農民戰爭，吉姆曼後來在法蘭克福議會的極左派陣營中相當活躍，他在這本歷史著作中，以同情的觀點描述一五二五年德國農民的叛變事件，但他畢竟是個理想主義者，因爲他把整個事件簡單歸納爲善良與邪惡的鬥爭，恩格斯即認爲他似乎簡化了這整樁事件的複雜性，他沒看出這之間階級鬥爭的要素，不過令恩格斯訝異的地方，倒是這個事件和當時新近發生的一八四八年革命事件在本質上竟是那麼相像。

恩格斯因此寫了一本小書叫做《日耳曼農民戰爭》(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他分析十六世紀未封建制度解體以及城邦共和興起之際的複雜社會狀況，他企圖勾勒出中世紀異端及宗教改革背後的社會經濟動機。他指出，路德在宗教上的叛變竟演變爲中產階級打倒政治權威及收歸教士財富的運動，同時更進一步指出，路德對天主教會的挑戰也更進一步挑起另一個更嚴重的後果：農民的叛亂。這個事件越演越烈，全德國農民形成有組織的叛變活動，他們提出幾項要求，包括廢除農奴、

減輕課稅、保障基本法律權利、解除教士特權並削減他們的所得和頭銜等等。他們的領袖是個新教教士，名叫孟哲爾(Thomas Münzer)，他主張在人世間立即建立一個「上帝的王國」，其實這是一個原始的基督教共產主義，孟哲爾的此一主張和路德產生了衝突，一五二五年四月，農民的叛變全面爆發，路德立即聲稱堅決反對此一更爲激烈的反教權運動，並譴責孟哲爾爲撒旦的工具，同時要求當局全面撲滅農民作亂，最後孟哲爾被逮捕並處以死刑，整個事件至此告一段落。

恩格斯認爲孟哲爾是個天才，他能夠超越他的時代看出共產主義的必要性，不幸這樣的思想卻超出他那個時代的處境太多，他的時代所代表的社會正是共產主義的「反命題」階段，在恩格斯眼中看來，孟哲爾和他於一八四八年在法蘭克福看到的許多人一樣，他們都努力在追尋一個不再有社會階級的社會，然而他們終究不得不妥協於當局的勢力，一切只是徒勞一場！

恩格斯在這方面的研究和馬克思可謂志趣相同，聲氣相通，但他則認爲這一切的革命行動，如果是爲了企求日後的高官爵位，則未免顯得愚蠢和鄉愿。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火焰現在已經熄滅了。

這場革命運動首先起因於瑞士地區激進分子對天主教徒的攻擊，然後蔓延開來，形成法國、義大利、德國、奧地利及匈牙利各國的叛亂活動，最後則由奧地利和俄國皇帝出兵救平匈牙利的叛亂收場。恩格斯說，這次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只不過是當做中產階級的替死鬼而已，隔年他和馬克思前往英國，他們仍然期待發生另一次危機以引發新的革命行動，馬克思相信法國遲早會再引發新的暴動，同時他和恩格斯希望他們新辦的《新萊茵新聞》能夠像以前他們辦的報紙一樣，在德國激勵出新的革命火花。然而，他們在研究促成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因素時，除了認定那是四〇年代經濟的

不景氣之外，他們忽略了政治發展和世界貿易的變革之間的關係，到了一八五〇年的秋天，中產階級再度繁榮活躍起來，他們在最後一期的《新萊茵新聞》這樣寫道：「只要現代的工業生產和中產階級的生產技術互相矛盾，另一次革命就可指望成功，我們期待另一次危機的爆發，則革命的成功就指日可待了。」

一八四八年的誇張勇猛行為和浪漫主義文學就此銷聲匿跡了，昔日常掛在口頭上的祖國、兄弟愛、自由等模糊而坦誠的口號也不再理會，但是遠程策略的尷尬問題卻浮現了出來。自從德國的革命失敗以後，「共產主義同盟」再度活躍了起來，接手的人正是恩格斯以前參加巴登戰鬥時的指揮官威利區，他主張立即採取行動，但恩格斯和馬克思則大不以為然，甚至還對他擺出一副嘲笑姿態，馬克思認為：「擺在工人面前的，可能是十五年、二十年或甚至五十年的內戰要打，這不單只是為了改變自己的處境，而是更進一步改變自己以便掌握政權。」他說，威利區的黨派「認為革命的原動力是純粹意志，而不是實際的處境」。當時的情況是，一八四八年之前所主張的革命哲學至此已經改弦易轍，一八五〇年九月十五日的一次會議，雖然馬克思擁有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支持他，但他知道群眾還是支持威利區，所以他就主張把總部移往科隆，因為那裡是他的勢力範圍，當時在德國有人準備要謀刺國王威廉四世，科隆地區有十一個共產黨員涉嫌被捕，據說證據乃是由警察偽造出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出面證明其為偽造，但由於政治因素，這十一個人當中還是有七個人分別被判三年到六年的有期徒刑，一八五二年的十一月，「共產主義同盟」終於宣告解體。英國方面的憲章運動並沒有熬過一八四八年的劫數，該年春天他們在英國北部地區大肆活動，並在倫敦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使當局十分緊張，請出了威靈頓（Wellington, 1769-1852，英國陸軍元帥、首相，在滑鐵盧戰役中指揮英、普聯軍擊敗拿破崙而聞名）公爵，並且嚴加戒備英格蘭銀行。這之後，由於景氣復甦，這個運

動就自動銷聲匿跡了，雖然馬克思辦報紙支援他們，卻已經起不了什麼作用了。

一八五五年六月，英國通過「禮拜天法案」(Sunday Trading Bill)，禁止人們在禮拜天喝酒，以低階層的人醉酒鬧事，此一法案引起人們的強烈不滿，倫敦的海德(Hyde)公園每個禮拜天因而聚集二十五萬或甚至五十萬人對著高階層人士大喊大叫：「到教堂做禮拜去！」馬克思很高興，他說：「英國快要爆發革命了。」他自己也跟著去參加示威遊行，而且極為活躍，有一次還差一點被逮捕，不久英國政府就解除了這項法令，人們也就不再鬧事了。

一八五一年二月，馬克思和恩格斯互相道賀，因為他們終於能夠擺開一切，把自己孤立了起來，「這符合我們的處境，也符合我們的原則，」馬克思說：「大家不必再互相忍讓或互相妥協，和那些笨驢談論無聊瑣事，這大可不必——我們再也不必去理會這一套了。」恩格斯回信說：「從現在開始，我們只對我們自己負責，如果那些先生們到時候發現還是少不了我們，我們就義不容辭出來。」他跟馬克思說他們現在開始應該寫些「有分量的大書」，在書中他們就沒必要再去「提到那些蜘蛛」，去跟那些革命的烏合之眾談政治經濟有什麼意思呢？

隔年六月，馬克思獲得許可進出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他每天早上十點到下午七點去那裡讀書，仔細閱讀一些工廠報告的藍皮書，這些藍皮書都是英國國會議員拿去賣給他所熟識的舊書商，那些沒拿出來賣的，有些議員就自己留著當做國會發言時攻擊武器的資料。

在知性上來講，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時的確是自由了，然而，對一個專門要和社會作對的革命家而言，他是不可能自由的，馬克思不會平靜下來，恩格斯也不可能閒下來。

他們新辦的雜誌又宣告失敗，把最後剩下的家當又全部賠光了，他們的雜誌只能在倫敦的德國

移民之間流通，而他們又習慣發表尖銳言論，最後大家變得不愛看他們寫的東西，他們努力勉強出了四期，最後又出了兩期合併的一期，然後就宣布停刊了。馬克思已經用掉他賣了父親最後一塊土地得來的錢，他母親再也不肯給他半毛錢，他就跟母親威脅說如果不給他錢，他就回德國去讓警察把他抓住關起來，但他母親再也不肯吃他這一套。有一陣子他考慮出版他作品的合集，期待能弄到一些錢，科隆有一個共產主義者剛買了一家出版社，願意爲他出版全集，分兩冊發行，不幸這個人於一八五一年的五月被警察逮捕，只出版了其中一冊（銷路似乎還相當不錯）。至於《霧月十八日》這本書之所以能夠出版，是因爲一位移民美國的德國裁縫師拿出他的全部積蓄四十塊美金幫忙的結果，這本書一共印了一千冊，其中三分之一運回歐洲發售，結果全部都送給了親朋好友以及同好閱讀，因爲沒有一家書商願意爲他發售這本書。

馬克思當初攜家帶眷來英國時，住在倫敦郊外的高級住宅區坎伯威（Canterville）一帶，後來在一八五〇年的春天因爲繳不出房租被趕了出來，一家人遷去住在蘇活區的窮人陋巷，全家人擠在兩個不通風的小房間裡頭，他們一共是六個人，馬克思夫婦之外，還包括三個小孩及一個女僕，這位女僕叫海倫·德慕特（Helene Demuth），他們都叫她蓮琴，她是燕妮出嫁時，母親送給她的結婚禮物，這位女僕很忠心，雖然馬克思一家人始終很窮，很少給她錢，但她一輩子跟著他們，直到他們相繼去世爲止。那年十一月，燕妮來到英國之後不久生的小男孩就死在這裡，他們在這之前被趕出來時，這個小男孩才剛出生不久，還在吃奶，關於這次事情的始末，燕妮在寫給一位朋友妻子的信中有很生動的描述：

我要跟你描述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這也有可能發生在其他政治難民身上。在這裡請奶媽給

嬰兒餵奶很貴，儘管我的胸部和背部持續痛個不停，我還是決定自己給嬰兒餵奶，但是這位可憐的小天使在吸我的奶時，也許也把我秘密的哀傷和痛苦一起吸了進去，竟開始不對勁起來，日夜不得安寧。自從他來到這個世界之後，沒有一個晚上好好睡過——頂多睡個兩三小時而已。最近他開始不斷抽筋，在生死之間徘徊不定，也許是不舒服的關係，他吸奶特別用力，我的奶頭都被他吸到紅腫或甚至流血了，血在他抽搦的嘴角滴著。有一天，我們的房東太太突然出現，冬天裡我們已經付過她兩百五十泰勒，而且商議好未來不用再付房租給她，而是付給房東先生，這個大家都同意了。她現在突然來跟我們要求我們還欠她的五鎊，她完全否決了先前的協議，我們一時拿不出這筆數目，這時，來了兩位法警，進入我們的屋子，盤據住我們所有的家私：床、家具及衣物等等，甚至連嬰兒的搖籃和我女兒的玩具也不放過，我女兒站在一旁哭個不停。他們威脅著說要在兩個小時之內把所有東西搬出去，果真如此的話，我寧可抱著發抖的小孩們躺在地上等死！我們的朋友康拉德·席蘭姆(Konrad Schramm)急著去城裡求救，他跳上馬車，馬匹頓起腳來，他當場摔倒在地，渾身流血，被抬進了屋子，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是好。

第二天我們必須離開那棟房子，天氣很冷，還下著雨，我丈夫急著為我們尋找落脚的地方，可是大家一看到我們帶著四個小孩，沒有人願意收留我們。最後一位朋友跑來為我們脫困，我必須把床賣掉才能清償藥局、麵包店、肉商以及牛奶商的帳務，牛奶商早在聞悉有法警來我們這裡時，就連忙趕來跟我們要錢了。我賣掉的床被抬了出去，搬上馬車——然後，你知道怎麼回事嗎？當時太陽早已下山，在英國晚上是不准運送家具的，這時房東又找來警察，說這些家具中可能夾雜有他們的東西，我們可能會偷偷運往國外，不到五分鐘，門口竟聚集了兩三百人，都是這一帶的居民。床只好又搬了下來，等到第二天天一亮就趕快運送去給買主。……

她在信中接著說很抱歉對朋友大吐苦水，但她需要一個人聽她傾吐胸中的悶氣，她接著說：

別以為這些小小的挫折會把我給擊垮，我很清楚我們的奮鬥絕不會是孤立無援的，我也知道我是幸運而且頗受眷顧的，因為我那親愛的丈夫仍然在我的身旁，他是我生命的支柱，但最令我感到痛心和難過的，莫過於他必須忍受那麼多無謂的瑣碎雜事，而且又沒有人可以幫助他，他曾經那麼熱心幫過許多人忙，現在他在這裡可竟然是孤獨無助了。

他們接下來就在蘇活區的迪恩街(Dean Street)住了六年，如同燕妮所說的，的確沒什麼人幫忙她的丈夫，可是隨著時間過去，她丈夫竟然也沒在幫忙他自己。我們現在面臨了一個有趣的事實，馬克思對金錢很敏感，這裡最令人訝異的「矛盾」在於，像他這種人畢生努力汲汲營營於喚起大眾對經濟動機的注意，自己對謀生這件事情竟會毫無概念，固然對一個流落異邦的政治難民要尋得一份固定像樣的工作的確不容易，但威廉·李卜克內希、威利區以及高蘇特(Ouis Kossuth)等人都能夠在倫敦養活他們自己，馬克思卻不能，在他整個三十年流亡英國期間，據說只動過一次想去找份固定工作的念頭。

一般人的觀念裡頭一向認為猶太人是十足的拜金主義者，馬克思對謀生觀念的抗拒，也許有一部分是來自對這種偏見的反動，他的作品有時也充滿濃厚的反猶太色彩，主要即是針對猶太人的拜金主義以及在中產階級社會攀龍附鳳這兩件事實上面。比如他在《佛克特先生》(Herr Vogt)這本小書中，就毫不留情批判猶太人的許多缺點，倫敦一家報紙的編輯以為他是英國人，就故意把他的名字

拼錯(馬克思使用筆名)，然後開始大肆攻擊他，事實上這位編輯是倫敦有名的馬屁精且喜歡製造是非的人。馬克思另有一次特意攻擊一位猶太奸商，批評他說「在希臘的九位繆思女神之外再設立一位希伯來繆思，稱之為時代的繆思」。馬克思在此所謂「時代的繆思」指的當然是「證券交換所」，如果說他看不起自己的族人，那是因為摩西發現以色列子民在金牛面前跳舞就大發雷霆，他看不起這個。

其實，馬克思不喜歡談有關錢的事情，多少還是帶有一種偏執的理想主義傾向，他年輕時在一篇文章中就這樣說過：「作家賺錢只要能夠維持生活和寫作就行了，但不能爲了賺錢而去生活和寫作……作家可不能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一種手段，那應該是一種目標，如果有必要，他要爲他的工作而犧牲自己，像宗教上的教士一般，堅持一個原則：服從上帝而不是服從人。不要像一般人那樣，成爲需要和欲望的奴隸。」這段文章寫在他發展出辯證唯物主義之前，但事實上，他一輩子的寫作生涯即是堅守此一原則。一八五九年他在一封信中如此寫道：「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堅守我的原則，我不能讓中產階級的社會把我變成金錢的奴隸。」我們注意馬克思所使用的字眼，既不想成爲金錢的奴隸，他就自認爲可以比別人高高在上的生活了。

然而，活在這個世界上他仍得受限於他的「人性需要和欲望」，即使他自己不想成爲金錢的奴隸，別人也會把他往那個路上推著走。

恩格斯在《日耳曼農民戰爭》一書中就提到，不管是中世紀或現代，苦行主義對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缺少的，他說：「在行爲上苦行修練，杜絕生活上的舒適便利，實行斯巴達(Sparta)式的訓練，過了一段時期之後，社會低階層的人就可以展開行動。爲了培養革命力量，爲了強烈感受自己低劣的地位，爲了團結集中力量，我們必須和整個社會秩序互相對抗，即使最微末的享受也不要追求，

那麼最後再大的壓力也無法擊垮我們了。」馬克思身爲無產階級的導師，他自然就義不容辭去以身作則，恩格斯也擺明和他的中產階級淵源斷絕一切關係。然而，馬克思一家人初抵倫敦時的悲慘遭遇，卻讓恩格斯覺得痛心難過。早在恩格斯和馬克思開始通信之初，他爲馬克思在比利時尋找住處，爲他說明早餐和菸草供應以及火車時刻之類的細節，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們之間亦師亦友的親密情誼。現在，一八五〇年的秋天，馬克思一家人難堪的一年之後，恩格斯覺得他們必須再度回到以前在家鄉所從事的「齷齪勾當」，然而，革命已經暫停，馬克思必須靜下來好好完成他的工作。

恩格斯回曼徹斯特他父親的公司（艾爾曼與恩格斯公司）工作，他不斷寫信回去跟父親報告蒸蒸日上公司的業務。父親於隔年春天來看他，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說，他的父親「當著公司其他人面前大談當下德國的進步情形，他太過相信我的風度和教養，結果我就狠狠瞪了他一眼，並頂撞了他幾句」。他和父親之間的惡劣關係始終還是沒辦法改善。他父親本來安排他去主持一家會計事務所，但他拒絕了，他答應他在這裡好好輕鬆工作三年，可以有餘暇寫他的政論文章，而且如果情況需要還可以隨時離開，他上班的地方是「工廠裡一間陰暗的房間，外面是一家酒館的院子」。他一向就討厭曼徹斯特，他抱怨在這裡的生活很孤單無趣，雖然有瑪麗·彭斯的陪伴，但他仍然必須保持單身生活的自由，他心裡老是想擺脫這種做棉花生意的生活。聖誕節時他父親送他一匹馬，他寫信給馬克思說：「你們在倫敦過得拮据不堪，我卻在這裡騎馬玩樂，這實在說不過去。」「早知道你們的狀況是這樣，我就不必急著買這匹馬，至少可以省下保養費，不過沒關係，我不必現在就立即付錢。」他很喜歡騎馬運動，有一次他騎了整整七個鐘頭的馬之後，他寫信給馬克思說：「騎馬實在是一種最有趣的運動。」不久他和一個他看不起的鄉紳一起騎馬去獵狐，他告訴馬克思說：「這實在是最佳的騎兵訓練，也是很理想的軍事訓練，因爲歐洲大決戰眼看就迫在眉睫了。」一直到一八五〇

年代末期，他始終相信，歐洲大決戰遲早是要發生的。

因此，他能夠不斷匯錢接濟馬克思，一八五一年八月，馬克思有了另一項收入的來源，達那邀請他為《紐約論壇》(The New York Tribune)寫專欄，當時《紐約論壇》的總編輯葛瑞里正醉心於社會主義，常常為傅利葉主義作廣告，達那是他的執行編輯，也是布魯克(Book)農場的執行委員，他於一八四八年在德國科隆和馬克思有過一面之緣，印象十分深刻，他現在邀請馬克思為他們寫專欄，兩個禮拜一次，評論歐洲的事務。

馬克思接受這項邀請，但他考慮到他的英文不夠好，而且「雙手充滿太多經濟研究」，他就要求恩格斯來寫這些文章，恩格斯一口答應了下來，但多少有些為難，因為他只有晚上有空，而且一年來他一直在忙一個系列研究，叫做「德國：革命與反革命」(German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專門研究當前德國新近發生的事件，有點像馬克思在研究法國的性質，比較沒那麼嚴謹端正。但恩格斯還是接了馬克思交給他的擔子，為《紐約論壇》寫稿，這些文章全部掛馬克思的名字，甚至恩格斯死後，這些文章收集成冊出版時，依然還是掛馬克思的名字。一八五三年開始之後，馬克思自己動手寫那些文章，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六年之間，他主要談論克里米亞(Crimea)戰爭，當時恩格斯正熱中於研究軍事策略，因為他相信無產階級革命沒有軍事後盾是不行的，他在軍事策略方面因此能夠提供許多寶貴意見。一八五四年的秋天，他們報導西班牙的革命，一八六一至六二年，他們談美國的內戰。同時之間，馬克思除了為《紐約論壇》評論英國政治現況之外，也為憲章運動的《人民日報》(People's Paper)寫些與英國政治相關題目的東西。

這些報導性的文章雖說不似馬克思自己私下研究所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那麼精彩，可以看

到馬克思的思想精華，但是依然可以提供給我們許多益處和某種知性的滿足，正如同閱讀馬克思的其他作品一樣。他所寫的這些報導性文章不同於一般的政治通訊報導，因為他沒有內幕消息，也沒有官方提供的資訊，他完全憑藉大英博物館所擁有的相關資料去寫他的東西，他一點都不馬虎，他一定研究過充分的相關資料之後才動手去寫這些通訊報導——比如像寫西班牙和印度這麼大的題目以及所有種類的外交及國會政務的報導等，莫不如此周到詳盡，再嚴謹的作家寫書的態度也不過如此而已。有一次他就跟恩格斯說，他提供給那些傢伙的東西和他們給他的報酬實在有些不成比例。

我們發現，如果拿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個時期所寫的評論性文章和他們後期宣揚馬克思主義的報導及政治性「論文」相比，其最大特點是伸縮性及對新事實的包容性。雖然辯證法的主要精髓乃是一種簡單的機械主義，有其固定的準則，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則發現每日的社會現象卻千變萬化，瞬息萬變。如果說他們想達到的目標是神秘不可捉摸，那麼，他們所擁有的達到目標的手段則是實際具體的。有某些假定的觀念——這個容後討論——他們是從早期比較理想主義時代的《共產主義宣言》發展而來，但這並未阻礙他們對現實的認識，他們知道他們的假說必須與現實配合。有許多專家學者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活動情況，就是沒看出他們在這個時期意識形態上的轉變，他們變得更加能夠認清事態的發展情況，然後願意去從經驗中學習教訓。

因此，他們開始對各式各樣的知性活動產生興趣，同時也開始能夠欣賞別人的作品，後面這一點對馬克思而言尤其難能可貴，他過去對別人寫的東西一向都是嗤之以鼻，與其他思想家也都是水火不容，他總是覺得自己最了不起，老是覺得自己比別人優越，恩格斯對他的模仿更讓他覺得沾沾自喜。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之中，我們看到這兩位大師立志要像但丁一樣（馬克思就常提到要向但丁看齊）自成一個世界，絕不借用別人的觀念，彷彿如此做才能凸顯自己尖銳的觀點，他們要發展

出自己特有的刻薄語調、獨樹一幟的姿態和個人風格的三語混用（德、法、英三語），如此他們則更能了解和掌握這個世界，至於其他人在他們看來充其量只是政治美學的小角色而已，這些人不但不懂歷史，他們連發生在自己周圍的事情也是一無所知。就這樣，在這層只有兩個個人在互動的關係之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片清晰明朗、知性的交談，以及全然的自信，在默契的交流和談諧的筆觸底下隱藏著一座瞭望台和一間實驗室。

在這不斷互動的思想領域之中，當然不會只觸及實際的政治問題，科學和文學也是他們關心的課題，他們藉此可以更深入了解人和社會。膽小的人會想要抓住一個公式，因為他們需要穩定感，勢利的人則會接受某種教條，藉此顯出高人一等，而第二流的人則不斷尋找憑藉，藉此攻擊第一流的人——所有這些都是爲了鞏固自己以便打擊別人，但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他們的武器是擷取自傳統的殘酷野蠻性質，然而，像他們這樣的思想領域的開拓者，他們負有導引人類觀念的重任，並且要對所有問題提出正確的答案，這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當然知道人類的知識非常有限，即使不斷努力，所能得到足以依賴的東西又是那麼少。雖然他們手中握有辯證法，但是他們知道這並不是萬靈丹，他們仍然必須不斷努力發展，不斷去吸收別人的觀念，手上的辯證法才會有所作用。馬克思在批評對手時一向尖酸刻薄，譬如普魯東即是一例，但他暗地裡會給予他們適度的評價，只不過大多數時候都是等他們死了之後才會這麼做，譬如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參見本書第二十一章）和歐涅斯特·瓊斯（Ernest Jones, 1897-1958，英國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的親密合作者和支持者）即是。至於對待他的前輩如李嘉圖和亞當·斯密，他則是小心翼翼，不露聲色地吸收他們的學問，他自己也承認他的「勞動價值理論」（Labor Theory of Value）觀念乃是得自一本一七四〇年出版的一位無名氏寫的小冊子。

此外，他們創立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從來就未想到會發展出像許多偉大勞工階級領袖所標榜的那樣（他們當然也接受辯證唯物主義）：一切思想以行動為依歸，一切以政治掛帥，不符合政治利益的，一概摒除在外。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未完全脫離文藝復興的傳統，他們想要在歷史過程中扮演一個角色，他們愛好學問，為學問而學問——或更正確的說，他們相信學問即是力量，馬克思一心一意想要在階級鬥爭中擊敗敵手，他聲稱自己最喜歡的一句拉丁文格言是：Nihil humanum alienum（人性是可以掌握的）。他們尊重過去的文化傳統，並不像俄國革命中的某個階段，或是某些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要把過去的文化一筆勾消。

恩格斯提倡人文的觀念在《反杜林》一書中表露無遺，最能夠為「自由藝術」教育的擁護者所認同。他說，杜林先生所主張未來的「人民學校」，「只不過是把普魯士的初級學校加以『貴族化』而已，他主張以更多的純數學和應用數學取代希臘文和拉丁文課程，再加上現實哲學的教育，然後提升德語教學到第三級的程度。」恩格斯認為，杜林「想排除古典語文的教學和現代語文的教學這兩個有助於超越現今世界中狹隘民族立場的途徑——古典語文的知識對接受古典教育的人而言可以拓寬視野，現代語文的知識可以消除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之間的隔閡，可以增進大家之間的認識和了解。」

至於美學教育方面，杜林先生主張全面革新，他認為古詩完全無用，宗教要完全禁止，至於古代帶有神話和宗教色彩的詩人必須一概摒除在教學之外，比如歌德最為推崇的詩的神秘主義就非排除不可。這麼說來，杜林先生恐怕非得自己創作符合其理性要求的詩來教育我們不可，讓他的詩展現完美世界的觀念，但這恐怕要浪費他不少時間吧！當他所構想的標榜理性至上的

經濟社區實現之日，大家才去用他的標準寫詩吧。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心目中，始終存有文藝復興時代理想人物，如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或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 義大利政治思想家、歷史學家)之流的典型，他們同時擁有科學和藝術的頭腦，他們同時是思想家也是行動家。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反對在分層合作的工業社會中，把人的才能限定在某一特定方面而阻礙了其他方面的發展，他們同時則對共產主義要塑造「完全的人」這種念頭抱持肯定的態度。他們一向努力在掙脫德國觀念主義的束縛，在他們看來，這種觀念在知性活動中，其不健全之情形實在無異於無產階級工人在工廠中只操作單一機械動作的情形，他們一直努力在朝「完全的人」方面發展他們的生活，恩格斯在這方面就很成功：商業上、玩樂、運動、懂多種語言、自然科學、經濟學、軍事學、寫文章、寫書、繪畫及作詩，還有政治活動等，他補足了馬克思在實際生活和運動方面能力之不足，馬克思的著作中自然就少不了恩格斯的影子，隨著時間發展，逐漸集中在經濟學上面，同時隨著機械進步的影響，如同我們所提過的泰涅的方法，在後期的馬克思主義中，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技巧、嚴酷以及抽象等色彩。不管怎樣，自始至終我們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中總是不斷看到豐富而多采多姿的花樣，充滿各式各樣人類領悟力的展現，讓人目不暇給。

對馬克思一家人而言，恩格斯每次來倫敦探訪他們，實在是一件大事。馬克思每次都會以極興奮的心情期待這位朋友的到來，而竟日無心工作，恩格斯來了之後，他們會徹夜促膝長談，抽菸喝酒，談個不停。然而，馬克思一家人在英國的生活依舊拮据難過。

馬克思當初接受《紐約論壇》的邀約寫稿時並未事先談妥條件，等到事後獲悉每篇文章的稿酬

只有五塊美金時，他著實訝異了一番。他開始自己動手寫文章的第一年之間，他一共爲他們寫了六十篇文章，執行主編達那很喜歡他寫的東西，他就把其中最好的部分當做不掛名的社論處理，其餘的掛馬克思的名字刊出，馬克思堅持一概以匿名方式刊出，他每個星期可以寫兩篇，可是隨著一八五〇年代初期經濟景氣的衰退，他變成每個星期只能寫一篇，雖然達那另外還提供他爲《大美百科全書》(The American Encyclopedia)及其他一些雜誌寫稿的機會，他發現他的收入還是減少了三分之二。

一八五三年，馬克思一家人住在倫敦蘇活區之際，一位警察去看過他們，這位警察後來留下了一篇極真實詳盡的記錄：

他們住在倫敦最便宜最糟的地區，他們只有兩個房間，對著街道的房間是客廳，臥房在後面，兩個房間裡的家具沒有一件是乾淨像樣的，而且是破舊不堪，上面積滿了灰塵，房間裡到處是一片凌亂。客廳的中間擺著舊式的大桌子，上面鋪蓋著一條油布，桌子上面堆滿了稿件、書本和報紙，還有小孩的玩具、馬克思夫人做刺繡的針線、邊緣缺角的杯子、很髒的湯匙和刀叉、燈泡、墨水罐、菸斗以及菸灰等等——所有這些東西全部堆在同一張桌子上面。

當你走進馬克思的房間時，菸草的氣味和煙霧薰得人眼淚直流，你起先什麼都看不到，好像在黑暗的洞穴中摸索，直到你的眼睛適應了之後，你才在一片朦朧中看清楚一些東西。所有的東西都蒙上了一層灰塵，而且很髒，你要坐下來時必須特別小心，因爲有一張椅子是三隻脚的，另外有一張是完好的，但小孩子才在那上面玩過煮飯的遊戲，這一張是給客人坐的，可是小孩在上面煮過的東西卻未移走，你如果不看好就一屁股坐上去，你的褲子就報銷了。馬克思和他的夫人對這些似乎早已習以爲常，他們以友善親切的態度接待客人，他們請你用菸斗抽菸，並

且以現場可能有的適合東西招待你。最後一場聰明有趣的談話於焉展開，彌補了剛才你所遭遇到的一切不適，這時你開始覺得自在起來，你會發現，他們其實很有趣，而且也很有創意。

有時候他們會連著好幾天只吃麵包和馬鈴薯，有一次麵包師事先通知他們說他要來收錢，他帶著麵包來，並要求見馬克思，馬克思那七歲半的小兒子就擋在門口說：「不，他不在。」然後接了麵包，把麵包拿去給他父親。他們不斷在典當東西，有時是馬克思的外套或小孩子的鞋子——他們因而無法外出。燕妮的首飾一件一件流入當舖，有一次，一件首飾上刻有阿吉爾(Agil)公爵的紋章字樣，當舖老闆就叫來警察，把馬克思抓了起來，當時適值週末，一些有地位的朋友都出城度週末去了，馬克思就在看守所裡度過一個尷尬的週末，直到禮拜一早上才放出來。有時候燕妮會難過得徹夜哭泣，馬克思會很生氣，他正準備要撰寫一本談經濟的書。

附近到處在流行傳染病，他們在一場霍亂流行風潮中僥倖躲過一劫，可是有一年冬天，他們全家人都染上了流行性感冒，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這樣說：「我的太太病了，女兒也病了，蓮琴在發高燒，我無法去請醫生來，因為我沒錢付醫藥費。」馬克思自己的屁股長了痔瘡，不能坐下來，也不能去圖書館。一八五一年的三月，他們又生了一個女兒，但一年後卻因為肺炎而夭折了，她從未有過搖籃，燕妮必須去跟一個法國難民借兩英鎊買一口小棺材，馬克思用德文夾雜法文寫信給恩格斯報告此一難堪狀況：「即使個性再怎麼堅強，也無法承受這種無情的打擊。」一八五五年的一月，另一個女兒又出生了，但同年的四月，另一個男孩卻死了。威廉·李卜克內希形容這個小男孩「有一對閃閃發亮的大眼睛，有一顆看來頗具前途的頭顱，與身軀似乎不是很對稱」。這個男孩顯然遺傳有他父親的智慧和才華，上述把麵包師巧妙打發走的就是他，但是他實在太纖弱，又沒得

到妥善的照顧。馬克思很傷心，其他幾個小孩死了他都沒這麼傷心。「自從這個小孩死了之後，」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道：「整個房子好像變空了，像荒廢了一般，他曾經是這裡的主要靈魂，你無法了解我們有多麼想念他，我已經遭遇過太多的霉運，但是現在才了解到什麼是真正的不幸，我覺得我要崩潰了。……儘管過去遭遇到這麼多可怕的不幸，可是一想到你和你的友誼，我就覺得十分欣慰，希望未來我們能夠一起完成一些有價值的事情。」兩年後，燕妮生了一胎死嬰，情況非常危險惡劣，馬克思告訴恩格斯說，他實在無法跟他描述當時痛苦的情形。

燕妮似乎並不是個很好的家庭主婦，不過性格倔強的蓮琴為她料理一切家務。但燕妮的個性很好，又有幽默感，她的女兒艾蓮娜(Beatrice)後來會回憶說，她的父母常常一起笑個不停，她對這個印象始終無法磨滅。威廉·李卜克內希當時年紀才二十幾歲，他也是從德國來的社會主義者政治難民，他對燕妮的印象是——

她扮演著雙重角色，有時是艾菲吉妮亞(Thigenia)，她要馴服和教育野蠻人，有時是伊蓮諾(Eleonore)，在馬克思沮喪無助的時候拉他一把，增加他的信心。對他而言，她既是母親和朋友，同時也是秘書和顧問。在我眼中看來，她實在是理想女人的典型。……如果說我在倫敦能夠撐得下去，有一大部分因素應該歸功於她。有時候，當我在放逐的大海中奮鬥前進而快要減頂時，她會及時出現，就像奧德賽船難時，羅可蒂亞(Leucothea)及時出現一樣，她會伸出援手拉我一把，讓我有勇氣繼續前進。

我們前面曾引述那位警察對馬克思住家的描寫，他說：「馬克思以丈夫和父親的雙重角色」而言，

在個性上有時不免稍嫌暴躁粗魯，但卻不失其溫和可親的本性。」所以大家還是喜歡接近他，他在家中是個大家長，他的命令所到之處，他的愛就跟著到那裡，他在女人和小孩面前絕不講粗話，也不隨便亂開玩笑，如果有人開了不太高明的玩笑，他會顯得不自在，甚至臉紅。他很喜歡和他的小孩玩耍，據說他在寫《霧月十八日》其中幾個較為辛辣的片段時，他的小孩正騎在他背上玩騎馬遊戲，還不斷鞭打他搖晃著前進。他常講故事給他們聽，其中有一個很長，還連續不斷，主角叫做漢斯·羅克勒，他開了一家玩具店，但口袋經常空空如也，他店裡有許多玩具，有男人和女人，有巨人和侏儒，有國王和王后，有主人和旅行家，還有鳥和各種四腳動物，就像諾亞(Noah)的方舟裡頭那樣，此外，還有木頭做成的桌子和椅子以及各式各樣大小不一的盒子和箱子，他雖然會變魔術，但他欠肉脞和魔鬼許多錢，他覺得很難堪，因為他始終還不出錢來，最後只好把那些漂亮的玩具一件一件賣給魔鬼抵債。不久之後，經過一番冒險和折騰，那些玩具又統統回到了他手上。

威廉·李卜克內希幾乎每天都來馬克思家探望，對這個家庭的生活作息有很生動的描寫。禮拜天，他們會用籃子裝著麵包、啤酒、乳酪以及烤過的小牛肉，全家人一起到郊外的綠地郊遊野餐，小孩子們很喜歡在綠色草地上玩耍，有一次他們在田野的一個角落看到一些很漂亮的風信子，他們顧不得「不准跨越」的警告標示，奮不顧身就闖了進去。回家的時候，他們顯得很愉快，他們會唱著黑人唱的流行歌曲，「而且，」威廉·李卜克內希說：「他們也唱故鄉的愛國歌曲。」譬如像「喔，史特拉斯堡，史特拉斯堡，美麗的故鄉」，這些都是馬克思在學生時代從一些民謠歌本上抄下來送給燕妮的歌曲。然後馬克思會朗誦《浮士德》和《神曲》，同時和燕妮一起朗讀以前從燕妮的父親那裡學來的莎士比亞戲劇的對白。在這一類場合之中，大家都約定好絕口不談政治或是抱怨流落異鄉的痛苦。

有時候，他們的女兒小燕妮——她像父親，有一對黑眼睛和一個寬闊的額頭——會突然陷入威廉·李卜克內希所描述「皮蒂雅 (Pitys, 古希臘阿波羅神廟中宣告阿波羅預言神諭的女祭司) 預言式的痴迷」，有一次，在像上述那種場合中，她突然陷入一種恍惚狀態，並且即席朗誦一首描寫外星球上來世生活的詩，她的母親很憂慮，馬克思立即加以制止並責罵一番。

流落異鄉的政治難民會感染一種很特殊的心態，這絕不是居留在自己國家土地上的人所能想像理解，他們也許理想過高，超越在自己的同胞之上，因而逼使他們不得不離鄉背井，切斷自身和同胞及自己所屬社會的一切聯繫，他們生活在異鄉要找工作和交朋友都很困難，其他像適應環境或尋求自己的事業等更是談何容易，他們不時盼望迫使他們流亡異地的政權早日垮台，因為他們想趕快回去故土。

對共產主義者而言，他們在外邦的處境更爲艱難，如果他們使用自己的語言寫作，所寫的東西只能在國外和自己同病相憐的難民圈子中流通，如果寄回去，則必須面臨妥協或查禁的命運（可參閱恩格斯寫給馬克思的信中談論到的，馬克思所寫披露科隆地區審判共產黨員的小冊子）。共產主義者既然要對抗整個社會，就應該投身到社會之中，不要同流合污。但他只能和少數同志來往，他們的性情和脾氣越變越壞，因為他們不斷把精力和情緒浪費在無謂的衝突和爭執之中，一片熱心變成勾心鬥角，才華變成變態的虛榮追逐，革命的兄弟情誼逐漸爲猜忌和懷疑所腐蝕。至於放逐在外的人，他必須同時承擔身爲社會公敵及異族身分的雙重壓力，他可能放棄原來既有的聯繫，同時指控他人背叛原來的原則，他同時擔心被人告密，被遣送回國下獄，他必須時時提防身邊的人，防止有人背叛告密。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始即看出這層危險，恩格斯於一八五一年二月十二日寫給馬克思的一封信

中即這樣寫道：「我們越來越看得清楚，移民團體像是一個體制，必然會把一個人弄得愚蠢不堪，或甚至把他變成個流氓，除非他完全遠離他們。」然而，對他們而言，要真正遠離移民團體是不可能的。他們的信件中還是不時提到大家對革命基金的爭執、政治聚會的杯葛、狹隘的判斷、焦慮不安的恐懼等等。同年的八月二日，馬克思在寫給威德麥耶（Joseph Weydemeyer）的信中就提到說，他最感困擾的事情就是他必須——

忍受我們的敵人卑鄙的作爲，他們不斷任意攻擊我，藉此來掩蓋他們的無能，他們在我背後說許多難聽的話，蓄意誹謗我，破壞我的名譽！……幾天前，那位「著名」的律師魯道夫·席蘭姆（Rudolph Schramm）在街上遇見一個熟人，當下立即靠過去對他小聲說：「不管革命會怎樣演變，大家都一致同意，馬克思是完蛋了，羅德貝吐斯（Johann Karl Rodbertus）可能會出來領頭，他會先下令把馬克思給斃了。」你看他們就是這樣在整我的，當然，對這一類無稽的惡毒中傷，我只能一笑置之，是絕對不會影響到我的工作的，但對內人可就很難堪了，她正在生病，每天從早到晚要操心許多事情，現在又搞來這些莫名其妙的名堂，她簡直快要崩潰了。

馬克思這個階段的生涯中所遭遇的最大的冒犯，乃是來自一個德國動物學教授的攻擊，這個人名叫卡爾·佛克特（Karl Vogt），他曾經在法蘭克福議會的左派陣營中占有一個席位，後來流亡到瑞士，他於一八六〇年一月出版一本小冊子，指控馬克思曾經跟一群向德國政府投誠的革命分子勒索，曾經在瑞士印製假鈔，同時也會經剝削工人以謀取自身的利益。這把馬克思惹得非常火大，他就在同年的十一月出版一本小冊子大肆反擊佛克特，他的朋友們都極力勸他不要浪費心機和金錢（因爲馬克

思自己出錢印這些小冊子)，但馬克思認為爲了妻子和小孩的名譽以及他自身人格的清白，他堅持不惜一切代價要向對方還以顏色，奮戰到底。

馬克思出版的這本小書《佛克特先生》的確爲自己辯白出了氣，兩人之間的激烈論戰也於焉展開，馬克思甚至在自己所贊助的一家報紙上羅列許多佛克特的罪狀，但顯然佛克特是爲拿破崙三世服務的職業宣傳打手，許多讀者和馬克思的朋友看法一樣，都認爲這一切最好還是留給歷史去裁決。的確，後來法國共和政府有出版第二帝國時期的檔案，其中赫然出現佛克特曾經拿了拿破崙三世四萬法郎的證據。同時之間，馬克思所出版的關於佛克特的這本書——其中有一章專門談論國際事務，特別揭露警察欺壓流亡異議人士的驚人内幕——則更進一步顯現出一個天才人物在蒐集資料和分析事務方面令人嘆爲觀止的周到功夫。然而，馬克思在此雖說能夠巨細靡遺掌握住各個要點，並且準確加以分析，無情而有力的粉碎了對方無稽的中傷誹謗，但是整體而言卻又稍嫌瑣碎囉嗦，特別是馬克思愛用冷嘲熱諷的筆調，有時固然讓人讀來感覺痛快淋漓，但卻又不免失之不自然和矯揉造作的嫌疑（馬克思和史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英國諷刺文學大師，著有《格列佛遊記》）一樣，在挖掘瑣碎事物方面似乎特別有一手）。

《佛克特先生》一書因而曾經鼓噪了一陣子，當初佛克特蓄意中傷馬克思時，馬克思曾經訴諸德國的法院控告佛克特誹謗，柏林法院拒絕受理控訴，他再一次提出，一樣被拒絕，最後投向最高法院，還是一樣不受理。在連續三次被拒絕之後，馬克思就只好訴諸文字，順便把這些法官嘲弄挖苦一番。皇家最高法院這樣寫道：「當下這個案子，我們處理時，似乎不會犯什麼法律程序上的錯誤。」馬克思說，簡單加上一個「不」字（這個字在德文句子中放在最後面），一位名叫希力克曼（von Schlickmann）的法官代表最高法院，把這個案子退了回去。如果不是這個「不」字，這個案子可能就會受理。

希力克曼先生根本不必理會馬克思的律師的抗議，他不必去討論，甚至提都不必提，他只簡單加上一個「不」字，就此結案了，我們不妨看看馬克思對這次事件經過的描寫：

拒絕受理所根據的理由是什麼？我的律師所呈具的詳細文件，他們的覆文在哪裡？這是我的疑點。

最高法院的說法：當下這個案子，我們在處理時，似乎不曾犯什麼法律程序上的錯誤。

如果我們把最高法院這句話裡頭的「不」字拿掉，這句話變成：當下這個案子，我們在處理時，似乎犯有法律程序上的錯誤。如此一來，上訴法庭的裁決就必須作廢，這之間的關鍵在於這個小小的「不」，希力克曼先生只是簡單加上這個「不」，就代表了最高法院輕而易舉回絕了我的律師韋伯先生的控訴請求。

強詞奪理，「不」。希力克曼先生「不」理會我的律師的抗議，也「不」和他討論案情，甚至也「不」提一下這件事情。他也許有他的理由，但他只須簡單加上一個「不」，他什麼都不用說了。「不」這個小小的字眼從權高望重的人嘴中說出來，真是威力無比。「不」的意思就是「無」，「不」！強詞奪理。

因此，最高法院否決了我的控訴。

因此，我的案子在普魯士法庭就此結案了。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來，馬克思這整本書背後所流露的，正是一個正直人士的無助憤怒，他的原則逼使他去反叛，在面對法律體制時，因為他反叛的行爲，他們立即否定了他的正直。在法庭作

出決定陳述之中，最令馬克思覺得惱怒的是，他們並不覺得佛克特的小冊子中對他有何誹謗中傷之處，他大可不必爲此反應過度。事實上，馬克思這個案子代表了所有類似的案子，你處於劣勢之際，你根本毫無抗爭之餘地。法庭說：你和整個社會作對，你如何期盼這個社會的法官爲你主持正義？奧古斯堡(Augsburg)的一家報紙曾經刊載誹謗佛克特的文字，他控告他們，但當地法院還不是拒絕受理他的控告，如同柏林的法院不理會馬克思對佛克特的控告。爲什麼不把這整件事情簡化爲去跟中產階級法庭討公道，讓他們把你和你的同志們推崇爲誠懇而懂得自我克制的革命分子？

在佛克特的誹謗中，除了偽造鈔票和勒索的指控之外，讓馬克思大爲光火的還有一項。佛克特在他的「小冊子」中以一封一位普魯士軍士寫來的信做結論，這位軍士名叫鐵周(Gustav Tschow)，這封信寫於一八五〇年，是時正是「共產主義同盟」鬧分裂的時候，而他也是這個同盟的一分子，他信上這樣寫道：「如果馬克思的心腸和他的頭腦一樣好，如果他的愛心和他的怨恨一樣多，即使他在許多場合曾經公開鄙視我，我還是願意爲他赴湯蹈火，他是我們這些人當中，我認爲最有資格成爲領導者的人，他能夠在大場面上表現出他的大將之風。」鐵周接著繼續說，可是，馬克思實在是爲權力欲望沖昏了頭，他只想唯我獨尊，他只能忍受能力比他差的人，心中則又瞧不起支持他的一群勞工階級。

因此，馬克思必須成立自己的正義法庭，藉以顯示他在道德立場上比那些警察特務、大小官僚、司法走狗更爲優越，他們沒有經過任何努力，沒有吃過什麼苦頭，也沒什麼知識背景，卻只憑自己的主觀喜惡，隨便一個「不」就要否決了一切。

在《佛克特先生》和《法蘭西階級鬥爭》這兩本書之間，剛好隔開了馬克思前面十年的流亡生涯，而這兩本書在筆調上之差距竟非常驚人。一八五〇年之際，馬克思年屆三十初頭，渾身充滿幹

勁，滿肚子的熱忱，他會把全部家當投注在辦革命報紙上面，即使是傾家蕩產亦義無反顧，這個時期他在作品中所流露的是一種知性成長的喜悅。到了一八六〇年寫《佛克特先生》時，幾年下來顛沛困頓的流亡生涯，書出版時燕妮精神幾近崩潰且又出疹子，幸運的是，醫生說由於出了疹子才免於精神崩潰，所有這些使得他在心力交瘁之下，寫出尖酸刻薄的嘲諷風格，對他曾經鄙夷的社會大肆撻伐一番。

然而，《佛克特先生》這本書並未如願達到目的，這本書在英國只賣出八十本，在德國始終未曾發行，因為把這本書帶出英國的一位德國出版商後來食言不肯發行。馬克思當初和這位出版商口頭協議，書的出版不管盈虧，雙方各自承擔一半，但這位出版商還有一位合夥人，這位合夥人並不理會這個，他要求馬克思負責全部的印刷費用，並以訴諸法律要脅，結果馬克思必須自己負擔全部的費用，他從未想到出版書要簽合約。

歷史演員：拉薩爾

國際主義和國家主義之間的衝突所引發的問題一向就缺乏適當的解決方法，法國大革命訴求是解決國內的問題，最後卻演變為拿破崙的帝國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起先所訴求的是，國際無產階級為自己的利益起來反抗國際中產階級對他們的壓迫，可是要展開鬥爭，首先必須確定其工業體系是否已經全然發展為資本主義，但他們面臨到一個問題，即各國在這方面的發展各有不同程度，即有的較「先進」，有的則否，這時，在各國的實際鬥爭中，就不免產生厚此薄彼的現象，如此一來，社會主義的策略運用，就面臨了國家主義的挑戰了。

這種衝突所製造的矛盾和困擾可以說比任何其他激進思想為甚——比如蕭伯納為英國在南非排擠荷裔南非人的政策辯護之言論；美國的社會主義者同意美國加入世界大戰，前提是先完成社會主義以解救資本主義；蘇聯要求其聯盟幫助他們在西班牙所扶持的無產階級革命等等。跟上述這些近時發生的事件比較起來，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顯然是國際事務的思想先鋒——在處理他們類似的問題時，似乎更為明智謹慎，然而，他們也有明顯矛盾的時候，比如他們譴責舊俄時代俄國的帝國主義企圖以及英國對愛爾蘭的剝削行為，但他們對當時丹麥人和捷克人的態度卻無異於英國人對愛爾蘭的態度，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弱小民族對文明的追求實在是微不足道。在當時德國的統一

問題可以說是他們的革命節目中很重要的一環，但是德國的統一必然會把德國人一起捲入鄰邦的一些紛爭，這些鄰邦中他們認為問題最為嚴重的就是波蘭，他們擔心波蘭會被俄國併吞。早在他們辦《新萊茵新聞》時代，他們曾經公開支持波蘭對抗普魯士人對他們的剝削，到了一八五一年的五月二十三日，恩格斯則寫信給馬克思，主張德國應該對波蘭施行鐵血政策，理由是「藉口保護他們，德國人必須占領他們的要塞，特別是波森(Bozen)要塞，同時盡量把其西部地區囊括為我們所有。我越研究歷史，越看得清楚，波蘭實在是該死的國家，不過有朝一日如果俄國自己爆發農民革命，波蘭可能才會顯現其作用，但到了那時就再也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了。波蘭人在歷史上除了不時挑起一些無謂的紛爭之外，對歷史實在毫無貢獻可言。在歷史上，波蘭從未有過任何像樣的成就，除了一天到晚和俄國對抗之外，實在一無可取。俄國則否，俄國至少在對抗東方方面，可說相當有成就。」恩格斯同時也認為：「精力充沛的美國佬從懶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接收加州，實在是件好事，因為他們更適合去經營這塊土地，藉以打通太平洋。」

普法戰爭爆發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德國人這邊，「法國人需要修理，」馬克思說：「如果普魯士贏了，國家的權力會歸向中央，這對德國勞工階級的團結有利，而且，西歐勞工運動的重心會從法國移向德國，這將會證明我們的理論優於普魯東的理論。」但是後來他們發現普魯士人的目的並不只是想修理路易·拿破崙而已，他們還想要亞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這兩塊土地，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時就表示對這種做法無法苟同了，因為這會逼使法國去和俄國結盟。同時間他們則贊同德法兩邊的「工人國際」(Workers' International)支部共同發表聲明，譴責國家間的戰爭——不過德國這邊的工人則聲稱，這次的戰爭德國實在是出於「自衛」，是一種「逼不得已的邪惡行為」。

要以實際的手腕去處理當下的處境並且仍不忘記最終的目標，這的確不容易，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做到了這一點，他爲統一德國付出了努力，他和法國開戰，首先就號召了南德和普魯士一起並肩作戰，而這正是他計劃中的重要一步。馬克思和恩格斯倒是想清楚區分德國的國家利益和普魯士人的激烈野心，他們來自萊茵地區，都討厭普魯士人，在他們的政治認知裡，他們始終無法認同普魯士的興起和壯大。在他們的通信中，我們讀到他們對德國所發生的一切事件的反應，實在頗爲耐人尋味。一八五一年的春天，馬克思去了一趟柏林之後，寫信給恩格斯這樣說：「到處——特別是在戲院中——看到那麼多穿制服的軍人，真叫人感到厭惡無比。」直到一八六六年五月之前，也就是讓普魯士變得更爲團結的沙多瓦(Sadowa，位於今捷克境內布拉格東北方，一八六六年七月三日普魯士和奧地利軍隊在此進行會戰，奧軍戰敗。此役之後，奧地利在日耳曼地區勢力衰退，普魯士成爲北日耳曼邦聯盟主)一役之前，恩格斯都還認爲如果俾斯麥要跟義大利宣戰，「所有的柏林人一定會鬧翻天，要是他們宣布共和，整個歐洲在幾天之內會天翻地覆。」他絕不會相信「如果南德和北德互相打起來，那是因爲俾斯麥要他們這樣做」。他更進一步肯定認爲，這種事果真發生，普魯士一定會敗，即使普魯士打贏了，「這也有好處，整個處境會變單純些，革命起來會更容易，一些小地方的騷動會自動銷聲匿跡，這會加速各方面的發展腳步，不管怎樣，一個統一的德國國會和普魯士的內閣將會是十分不同的。」

他跟馬克思轉述他從德國朋友那裡聽來的一些故事，這中間夾雜有對普魯士人的怨恨情緒，以及對一些地方如法蘭克福和納索(Nassau)等地人們的愚蠢和膽小感到無奈可笑(法蘭克福和納索不久前才剛被普魯士兼并)：「韋諾(W. G. Wenhner)剛從漢諾威(Hanover)回來，他跟我說普魯士軍官在那裡已經變得和當地的官吏和警察一樣令人討厭。」「南方的普魯士人比較不那麼囂張，他們似乎聰明一些，如果一切進行順利，我們的革命就可以早日完成了。」他不久又接到有關納索地區軍隊作戰策略的

第一手資料，那些兵士必須在梅因河(Main)上架一座橋，第一次動工時因為一場暴風雨而宣告中斷——「梅因河上的暴風雨！」恩格斯叫道——第二次他們回去繼續工作時，卻發現他們使用的鐵船不夠，他們趕快寫信去達姆鎮(Darmstadt)求援，祈求派出一些鐵船支援，「後來橋終於搭好，這些兵士接到命令往南移動，他們把搭好的橋留在那裡，也沒派人守衛，只拜託一位船夫順便看一下，幾天後普魯士人來了，他們輕而易舉占領這座橋，輕鬆愉快跨橋進城了。」恩格斯帶著戲謔的口吻描述這件事情，卻始終不願相信普魯士人贏了。

愛國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在面對俾斯麥鐵腕作風時所產生的這些問題，顯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與德國下一階段社會主義偉大的代言人費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上。

拉薩爾是布萊斯洛(Breisau)地區一位富有的猶太絲綢商人的獨生子，他出生於一八二五年四月十一日，年紀比馬克思小七歲，他的父親原來以故居地的名字羅斯洛(Rosau)為他取名，但他自己後來把它改為法國名字。他在個性方面以及和家庭的關係上面，和馬克思有極相像之處，他是獨生子，和馬克思一樣極富才具，也很受父親的疼愛，他父親為能生出這樣的兒子很感得意。和馬克思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很有感情，但調皮愛作怪，而且對自己的才華又非常自負。他常常跟自己的妹妹惡作劇，在學校裡，只要有同學對他的態度稍微不遜，他便要求決鬥。

拉薩爾和猶太教的決裂並非像馬克思那樣來自父親，而是來自他自己。他十三歲開始參與猶太教聚會，但一旦他學會獨立思考，他便不理會一切投身進去，馬克思則否，馬克思有父親為他指引進入理性的當代思想。拉薩爾瞧不起家庭的絲綢生意，他立志要走學術生涯，黑格爾當然首當其衝吸引住他的注意力，他父親問他打算將來學什麼時，他說，「在這世界上最偉大最豐富的，與人類的

利益息息相關的，那就是歷史的學問。」

起初他在萊比錫 (Leipzig) 的商業學院就讀，過得極不順遂，他的聰明才智毫無用武之地，他的火爆脾氣又和當地的教師格格不入，他的老師跟他說他將來最好去當演員，因為他適合演《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中專門放高利貸的猶太人角色夏洛克。十五歲時他醉心於海涅和伯諾 (Ludwig Borne) 的詩作，他聽說在大馬士革 (Damascus, 敘利亞首都) 有人迫害猶太人，他就在日記上很生氣寫道：「即使是基督徒也都知道我們的血液充滿了懶惰的成分——他們很清楚我們絕不會作亂，我們寧可死在沙場也不願意死在刑房裡。」他有一次寫信給馬克思說，他在一八四〇年以後就已經是個革命主義者——一八四三年之後，社會主義者。有一次他參加一個天主教辦的大學預科考試，他認為天主教和猶太人一向聯手在對抗他們的共同敵人普魯士新教，對他不會有歧視，但他被拒絕參加考試，理由是所填的申請表格不齊全。他立即向教育部門投訴，終於能夠順利參加考試，他考得很好——但口試時卻被刷了下來，原來口試的人是一位信新教的神學教授，這時他又去跟考試委員投訴，考試委員的主任就跟他說他自己的兒子也被刷了下來，拉薩爾不死心又去向教育部門投訴，這次他們只好跟他說明年再來。隔年他終於通過了考試，進入布萊斯洛大學。

在布萊斯洛大學他又惹了禍，一位教授抨擊費爾巴哈和年輕黑格爾學派，他為表示不滿就參加示威遊行以示抗議，結果學校當局罰他十天拘禁，他不久就轉學到柏林大學，一到那裡他就迷上了黑格爾。他每天早上四點起床勤讀黑格爾，他發現他自己就是黑格爾世界精神觀念的化身，「透過哲學，」他寫信給父親這樣說：「我已經變為自我包含的理性——換句話說，我是自己的上帝。」他批評自己的父親是中產階級，卻又不斷跟他要錢。有一次他從家鄉前往柏林，在半路上碰到一群紡織工人在罷工遊行，他聽他們唱反動歌曲，他突然感覺到自己正是無產階級的領袖。然而，他也期

盼自己在社會上能夠成功，他生活過得像個執褲子弟，一天到晚騎馬玩樂，在女人堆裡打轉，他跟女人求愛的辭令正如同他日後政治演說和立法辯論那樣鏗鏘有力。他說他有一封情書寫得好像一本政治宣傳的小卷子，「充滿邏輯的組織和源源不絕的熱情，我想一定是相當有效果的。」他二十幾歲時，身材修長，一頭鬢曲的棕髮，有一個看來很聰明睿智的額頭，整個樣子看去十分迷人。

接下來不久，他終於抓到一個讓自己一舉成名，以及為一個不公平社會的犧牲者打抱不平的機會，這整個發展過程充滿曲折，而且打破傳統慣例，這一切必須從頭說起。有一位女伯爵叫做蘇菲·馮·海茲飛(Sophie von Haatzfeldt)，出身名門，十七歲時下嫁給另一位也是名門出身的男士，其家世淵源和她的家族屬於同一系列，這個丈夫對她很惡劣，經常在外面拈花惹草，而且不讓她接近她的小孩，他還把她的女兒送去維也納的修道院，一八四六年，他還警告他們十四歲的兒子如果不和母親脫離關係就不讓他繼承財產，就在這個時候，拉薩爾介入了這樁家庭糾紛，女伯爵要求離婚，但當時德國的封建傳統而言，這幾乎不可能，而且當時形勢也對她相當不利，因為連她自己的兄弟都反對她，並且阻擾她的企圖，這時拉薩爾出面為她出力，他雖然讀的是哲學，不是法律，但卻挺身為她周章一切，並鼓勵她盡力維護自己的權益，女伯爵至此變得十分堅強，她開始吸雪茄，並且隨身攜帶手槍，據說有一次還拿著手槍威脅國王的一位侍從武官，因為這位侍從武官受指使要把她的兒子弄去軍校。拉薩爾說女伯爵「確信她自己有理，她對自己和對我有信心，她全心全意信賴我，讓我處理她的事情。因此，我區區一個年輕猶太人，完全沒有背景，必須卯足全力對抗一股龐大的惡勢力——我一個人獨自對抗全世界，對抗貴族和富豪，對抗政府官僚，而且要對抗所有的偏見，總之，我要以真理和正義對抗金錢權勢。」他為女伯爵打離婚官司等於就是在為女人出一口氣，他跟她說：「你似乎忽略了一項事實，那就是女人在歷史上其實是一種永恆概念的化身。」

他迅速展開工作：他首先從父親那裡弄來一筆錢，買通海茲飛屬地的農人出面作證反對伯爵，同時買通報章雜誌掀起對伯爵不利的輿論。伯爵這時似乎也準備要讓步，和女伯爵和解，但這時拉薩爾卻擺出高姿態而使得自己前功盡棄，他派人去要求伯爵出來當面協議，伯爵卻只派遣僕人出面，拉薩爾很生氣，就寫了一封口氣強硬的信要求對方出面道歉，否則將訴諸武力對其不利，這下子可真正惹火了伯爵，整個談判因此破裂，這場紛爭因而繼續拖延了整整八年之久。拉薩爾持續不懈，不屈不撓，他甚至買通人去偷竊伯爵的情婦家中的一個首飾盒，他認為這個首飾盒裡藏有一份契約，契約上載明給情婦的年金，違背了女伯爵及其小孩的利益。但是那份契約並未藏在首飾盒裡，去偷的人也被逮了個正著，送進了監獄。拉薩爾這時更卯足全力加緊猛幹，他猛烈控告伯爵，官司一場接著一場，動用到的證人達三百五十八人，審理此案的法官則達三十六人之多，而他自己更出庭充當辯護律師，他甚至發動許多農人在伯爵的屬地上示威遊行。最後偷竊首飾盒的案子揪出他是幕後主使人，他自己也被送進科隆的監獄，這是一八四八年二月的事情。

這件事情發生在法國革命暴動的前幾天，拉薩爾還在牢房的牆壁上貼了一張他在法國報紙上讀到的布蘭奇所寫的〈告人民宣言書〉(Manifesto to the People)。八月他出庭應訊，他在法庭上演講足足六小時之久，他把自己對首飾盒偷竊案的辯護一路發展成「自己不休對維護人權的努力」。同時間，海茲飛女伯爵不斷在公開場合出現，公開抨擊保守勢力的作風，同時宣稱自己是個無產階級。最後拉薩爾無罪開釋，並且以革命英雄的姿態出現在眾人面前，在杜塞道夫(Düsseldorf)地區，人們把他和女伯爵坐的馬車的馬匹弄走，由他們拉著穿過街道，接受民眾的歡呼致意，真是風光極了。他在科隆法庭上的辯護演說早已名聞遐邇，人們無不以大演說家的身分目之，他現在開始猛烈投入政治活動，他從杜塞道夫帶領一個代表團前往萊茵地區參加一個恩格斯所號召的大會，目的為宣布與

法蘭克福議會結盟以反抗普魯士，這件事情轟動了整個德國，但他自己也隨之於十一月被捕入獄，理由是支持由馬克思所簽署發動的鼓動人們拒繳稅捐及反抗政府的請願，馬克思和恩格斯努力想把他弄出來，但他的案子卻要等到一八四九年的五月才開庭審訊。關在監獄時，他不斷要求請願，把監獄當局弄得不勝其煩，他不時以各種方式威脅典獄長，典獄長只好跟市長報告，市長親自來看他，拉薩爾當眾譴責市長沒跟他道早安，並宣稱要控告監獄當局。最後當他出現在法庭時，他準備要發言的辯護詞早已印好在城裡四處發售了，他的辯護詞主要在控訴政府破壞了它自己同意的改革行為，並且利用法庭迫害那些執意要進行改革的人，同時也控訴法蘭克福議會沒為這件事情抗爭到底。他演講到一半時，發現庭上旁聽群眾被趕出法庭，他立即停止演講，他也知道法官早已讀過他的辯護詞原稿，他就要求立即當庭開釋，法官最後宣判他無罪，但是政府當局認為他這個人很危險，就把他拘留在監獄直到一八五一年為止，同時把海茲飛女伯爵也一起關了進來。

女伯爵的離婚官司在一八五〇年有了新的轉折，到了一八五四年伯爵在經過一番折騰之後，終於和女伯爵達成對女方極為有利的和解協議，這時拉薩爾和女伯爵之間的關係更為親密了，拉薩爾一向對自己的母親很有意見，他甚至曾經把母親描寫成「一隻生出一個老鷹蛋的母鵝」，他對女伯爵則是二話不說，百依百順——她大他整整二十歲。他們一起在杜塞道夫住了好幾年——因為柏林禁止他回去。女伯爵放棄了她的社會地位，而拉薩爾在她的養育呵護之下，則變得更为堅定，同時也更为溫文有禮。他對一位也牽扯在首飾盒偷竊案的猶太朋友這樣說：「我不能再和你有所牽連了，你變得既粗俗又無禮。」這位朋友當時正準備為這個案件要入獄服刑，他後來寫了一封信給拉薩爾這樣說道：「老天有眼，有一天你和你的同黨都會毀在你自己手裡。」

他對待女伯爵的方式也好不到哪裡，也是一副作威作福的姿態。一八五七年，他運用計謀終於

得以回柏林，但他不准女伯爵與他同行前往柏林，他說因爲王后極不欣賞她的作風，她不願意看到他們兩人一起出現在她面前，如果女伯爵堅持要來，他就非離開不可。這時正是他在文學上和社會上最爲春風得意的時候，他在柏林弄了一棟華麗的大宅，據他自己吹牛說，有四間很大的接待室，各處擺滿了書和酒，他在這裡宴請貴族朋友和時尚人物，同時也接待願意來探望他的人。有一位俄國軍官的女兒（拉薩爾曾經很想娶她）對這棟房子曾經有所描述，她說，大致而言，這棟房子並不太吸引人，塞滿許多各式各樣的家具和擺設，顯然是爲了炫耀：土耳其沙發、壁燈、銅器、大鏡子、厚的絲綢掛氈，以及日本和中國的陶器等，他的書房很簡單，比較嚴肅，品味似乎好些。他剛剛出版一本論赫拉克利圖斯(Heraclitus, 540BC-470BC, 古希臘哲學家)的著作，這本書他已經寫了好幾年，他在書中企圖說明黑格爾的理論和希臘哲學家的關係，但依馬克思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這本書大而無當，只是在炫耀學問而已。他同時也以農民戰爭爲題材寫了一齣散文悲劇，另外也寫了一本談外交政策的小冊子，企圖提高群眾對革命的興趣以及促使俾斯麥削弱奧地利的力量。他投資做股票生意，到義大利旅行，有一次他還用拐杖打一位軍官，因爲他們同時在爲一位已婚婦人爭風吃醋。他在法國認識上述那位俄國女孩並向她求婚，他還要求女伯爵支持他的決定，他給這位女孩寫了一封洋洋灑灑四十頁的情書，他當時要不是靠輪椅根本就已經不能走動。他二十二歲時染上梅毒，已經進入了第二期，後來從未真正根治，他有一條腿就因此而報銷掉了。他此時根本尚未弄到什麼真正的政治角色，精力卻已經銷蝕掉了一大半，這時已經是一八六〇年的末尾了。

一八四八年之後，他曾經兩次申請加入「共產主義同盟」，均遭到否決，一方面他們懷疑他別有居心，另一方面他和貴族身分的女伯爵有掛鉤——因此，他除了幫忙籌措基金和協助同志逃脫當局捕捉之外，他在革命行動中從未扮演過什麼像樣的角色。他一直很崇拜馬克思，他認爲馬克思才是

革命行動的真正首領，馬克思剛去英國時，他曾爲他籌過錢，要求他讓他在歐洲大陸爲他做些通訊工作。他也曾爲馬克思安排過出版一本書，甚至在普魯士新國王威廉繼位而發布政治犯特赦時，爲他奔走以期能夠讓他回德國定居。但是馬克思很討厭他的矯揉做作，也厭惡他說話的老大語氣，也許他羨慕他可以自由走動，可以在德國自由自在生活，但他顯然不願意欠他人情，他和恩格斯暗地裡拿他當笑柄。佛克特事件發生時，拉薩爾支持馬克思的立場，但他卻責備馬克思不該輕易相信原來那些對佛克特的指控，然後又批評他的多疑作風。馬克思當時正是在懷疑拉薩爾爲了出版自己的小冊子而故意阻礙他那本書《佛克特先生》的出版，因爲他們都是屬於德國的同一家出版社，拉薩爾也知道馬克思在懷疑他這件事情。馬克思爲了跟他表明自己坦蕩的心胸，就把他自己七年前收到的一封毀謗的信寄給拉薩爾看，此外還有許多中傷他的言論，都已經在「共產主義同盟」中存檔，他強調他對這些都一笑置之。拉薩爾則強調他永遠支持他的立場，但馬克思依然懷疑拉薩爾在他背後搞鬼，阻礙他那本書的出版。不管怎樣，拉薩爾還是邀馬克思於一八六一年來柏林看他，帶他去拍照片，請他吃鳥獸野味和蛋黃美奶滋，他和女伯爵帶他去看芭蕾表演，故意把他的包廂位置訂在皇家包廂的頂上，「藉機侮辱皇家」。這次拉薩爾特別和馬克思談論出一份激進報紙的計劃，他們兩人一起聯合發行，資金的問題由女伯爵去負責周章。當時新王威廉剛登基上台，頒布特赦令，看樣子革命會跟著舊火復燃，拉薩爾認爲這是辦報紙的好時機。

然而，拉薩爾努力了老半天，當局還是堅決不肯讓馬克思回德國定居，他們的合作計劃以泡湯收場，可惜此時德國又爆發了一場新的勞工運動，他們終究無法一起躬逢其盛。隔年七月，拉薩爾前往倫敦探望馬克思，他腦中充滿許多新的政治構想，想在德國好好發揮一番，但馬克思自從上回坐在皇家包廂上面觀賞芭蕾表演，看到戲院中到處是穿制服的軍人，他此時已經十分意興闌珊。不

久前普魯士國會中許多自由派議員還在杯葛國防部長的擴軍計劃，結果威廉王於三月十一日宣布解散國會，四個星期之後，拉薩爾在柏林一間工廠的工人組織面前發表演說，這場演說他稱之為「工人計劃」(Workers' Program)。一八四八年通過的全民投票權法案到了一八四九年修訂為三級投票權法案，投票權依納稅多寡來決定，換句話說，即依收入多寡決定有無投票權，這一來工人階級和小布爾喬亞階級的投票權又被剝奪了，而此時，政府爲了支付額外的龐大開銷，又不斷在上述兩階級身上加稅剝削。拉薩爾這時候以全民投票運動的領導人自居，他在演說中清晰且強而有力的述說他的論點，同時更進一步闡明歷史的唯物理論：階級鬥爭、工業發展、無產階級在未來將要扮演的角色等等，至於全民投票權的爭取只是目前階段性的工作，「到目前爲止，社會低層階級對改善自身處境和命運的努力，可謂不遺餘力，並未違背歷史潮流，亦未抵觸道德內涵，而且根本上和全人類的發展是互相一致的，也符合『觀念』的運作，甚至和文明的演進及歷史的法則也是聲氣相通的，總歸一句話，這可以說正是『自由』的發展結果，你們現在努力在做的，也正是對『人性』的要求而已。」他接下來對著一群自由主義者大談馬克思的社會動力理論，他說，憲法的問題「並非法律問題，而是權力的問題」，他們制定憲法並不是用白紙寫黑字，而是由權力的遞嬗關係來決定。拉薩爾期待勞工能夠和自由派中產階級建立合作關係，那年五月一次新的選舉中，自由派大獲全勝。

不久之後，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談到拉薩爾的「工人計劃」，他認爲：「這實在是共產主義宣言以及我們常談到的其他一些觀念的很壞示範，變得很庸俗平凡。」他認爲拉薩爾談到的關於憲法觀念，也是很幼稚可笑。不過，平心而論，我們如果從另外一個觀點看，拉薩爾努力想做的也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有效應用在實際政治上面，馬克思對他的批評實在有失公平。此時辦報紙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馬克思曾寫信給恩格斯談到這件事情，他說拉薩爾只能當編輯助理，而且「還要加

以嚴格訓練」。當初在柏林討論這件事情時，馬克思跟拉薩爾提議要把恩格斯拉進來一起參加，拉薩爾回答說沒什麼問題，「三個人並不會太多」，但條件是如果要投票表決事情，他和恩格斯只能算一票，否則他永遠就沒有表達意見的餘地。現在，拉薩爾來探訪他，他恐怕必須回報他去年去柏林時他對他的熱情招待，而此刻正是他手頭最拮据的時候。

馬克思一家人終於能夠脫離蘇活貧民區，一八五六年，燕妮的母親去世，遺留了一百二十英鎊給她，那年十月，他們花去四十鎊買了一套全新家具，搬進一棟四層樓的房子，房子坐落在哈佛斯塔克山丘（Taverstock Hill）的梅特蘭公園（Maitland Park）一帶格拉夫頓街（Grafton Terrace）上，這是一棟相當華麗的住宅，有漂亮的石頭窗台，鑲在紅磚的牆壁中間，玻璃窗往外凸出來，把隔壁的房子隔開。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下次他到倫敦來，會發現他們已經住在「一棟迷人的屋子裡」。然而，他們一家人才安頓好，美國的《紐約論壇》開始縮減馬克思的專欄文章，此時，他的開銷增加，收入卻反而減少了，在梅特蘭公園的生活並不比蘇活貧民區的生活好到哪裡，但他必須給女兒們裝飾門面，他寫信告訴恩格斯，要是只是爲了他自己，或只是爲了兒子，他寧可去住在較低級的地區，如白教堂那一帶，「可是，女兒們都已經在長大，太寒酸可不是一件好事。」女兒都很聰明，馬克思送她們去讀私立學校，她們是班級上年紀最小的學生，功課卻是最出色，經常得到獎狀，父親還送她們去學音樂，然而她們總是要面對這個世界，貧窮是永遠掙脫不開的事實，父母的辛酸總是讓她們覺得難過。拉薩爾來那年，兩個女兒一個十七歲，另一個十八歲，小燕妮已經不再像小時候那樣愛幻想外星球的來世生活，二月的時候，馬克思還寫信告訴恩格斯說，她才在醫生那裡住院住了兩個月：「這小孩越來越瘦，她現在已經可以了解我們在生活上的窘境，她會生病，可能就是起因於此。……」

她不讓我們知道她暗地裡去找過楊太太，原來她想到劇院裡工作。」

「可憐的孩子們，」馬克思在六月裡如此寫道：「我真爲他們感到難過，外頭正在舉辦博覽會，他們的朋友都去玩樂去了，他們卻只能在家裡枯坐，而且還要擔心朋友上門來找他們，看到家裡的悲慘境況（他們現在已經窮到孩子的衣服和女僕蓮琴的鞋子都拿去當了）。」在這一封信裡，他還提到燕妮每天都說她但願她和小孩子們能住到墳墓裡去。拉薩爾來的時候是七月，他和馬克思家的姑娘們早已熟悉，去年馬克思夫人生水痘正在復元的時候，臉上留下許多疤痕，他還特地寫了一封文詞並茂的信給她，安慰她不要爲面容擔心，很快就會復元的。她寫了回信，拉薩爾又去信說，她的信既溫和又迷人，他每讀一個字就忍不住想親她的手。的確，燕妮每次寫給拉薩爾的信，字裡行間總是流露很豐富的情感。她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接受過男人的崇拜了，也很久沒和別的男人有任何接觸了。上次她精神崩潰的時候，馬克思曾送她去藍姆斯蓋特（Blumensaat）療養，她在那裡就結識了許多如她丈夫所形容「最出眾且最聰明健談的英國女士」。馬克思告訴恩格斯說，這對她有好處，「悶了這麼多年，她也該去接觸一下和她同類的人。」上回馬克思從柏林回來的時候，拉薩爾特地託他爲家裡每個小姐帶回一條披肩當做禮物，最小的杜茜（Daisy）披上她的披肩在屋裡走來走去，用英語說道：「活像一隻孔雀！」現在拉薩爾就在倫敦舉行博覽會的熱鬧季節裡翩然降臨，身上還夾帶著柏林特有的芬芳。

燕妮想要好好招待他，如她丈夫在信中跟恩格斯所報告的，「家裡能當的東西都拿去當了。」誰知道屋漏偏逢連夜雨，這時房東上門來要他欠的二十五鎊房租，如果不給就叫警察來，修鋼琴的人也來了，是個粗漢，他們還欠他六鎊，如果不給就法庭見，接著麵包商、雜貨商以及茶商也跟著上門來要錢，一時之間一群魔鬼不約而同蜂擁而至，要命的是連稅單也到了。同時之間，醫生更告訴

他們小燕妮的情況不是很好，必須去海邊休養兩個星期，小杜茜好像也得了黃疸。拉薩爾一來就說他的股票虧了五千泰勒，他來這裡之後，馬克思注意到，他每天光菸錢和坐馬車的開銷至少就要花到一鎊以上。馬克思跟恩格斯說這傢伙似乎覺得他，馬克思，沒有固定「職業」，只從事一些「理論性的工作」，可以隨便糟蹋他的時間，更令他生氣的是，這傢伙居然提議不妨把一個女兒送去德國當女伯爵的侍女，這似乎可以解決他的部分難題。他發現拉薩爾越來越誇張了：「他用怪里怪氣的聲音扯淡扯個不停，奇怪的姿勢和表情也是一大堆，讓你完全抓不到頭緒。」馬克思覺得拉薩爾跟一年前很不一樣，他說，他變得「神經很不正常，他認為他現在是個大學者，是個極有深度的思想家，同時也是個很傑出的投資家，還有，他覺得自己很像劍俠唐璜(Don Juan，西班牙傳說中的風流浪蕩子)，也很像革命派的大主教李希留。」也許——後來的事件會加以證實——馬克思感受到拉薩爾的變化並非全然由於他自己心情不好，拉薩爾那時候也的確顯現出了一些不尋常之處，可能是梅毒的病毒正在血液和骨髓裡作怪，使他莫名其妙變得興奮異常，行為舉止因而脫了序。馬克思有時用嚴厲的眼光瞪他，他就變得不知所措。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為拉薩爾取了許多他想得到的各種和猶太人有關的好笑綽號：「他像個猶太男爵或（顯然從他那位女伯爵而來）男爵猶太。」他現在越研究拉薩爾的頭髮及其特殊頭型，越覺得他一定帶有黑人血統：「這顯然是結合猶太和德國以及黑人的血統混雜而成的特殊結晶，這傢伙喜歡自作主張，這即是黑人血統的證明。」

有一天，馬克思露出心情不好的神色，拉薩爾就問他是否有經濟上的困難，馬克思就坦白說，商人威魯他還出欠債，否則停止供應食品，並且還要告他。拉薩爾就當場表示他可以幫忙，他可以無條件借他十五鎊，如果要再多借的話，需要一個人擔保，恩格斯或誰都可以。馬克思當下就先跟他借了十五鎊，另外再安排向他借六十鎊。拉薩爾不久就離開了倫敦，八月裡馬克思收到他從威爾

巴德(Wildbad)寄來的一封信，信中言明堅持要恩格斯出具一張親筆的擔保書，寫明在借據到期的前八天清償他的借款——他說：「當然，我並不是不相信你所寫的他的同意書，我只是必須確定在任何意外狀況或死亡的情形發生時，我仍能追回我的款項。」馬克思不想這麼做，就給拉薩爾回了一封信，帶著戲謔嘲諷的口吻，他說他的名字不想和他那種「中產階級身分」的人有任何瓜葛，而且他根本不想跟他玩「中產階級遊戲」。拉薩爾收到信後大為吃驚，開始擔心馬克思會賴帳，事情越演越糟。就在借據到期的前六天，拉薩爾寫了一封很不客氣的信給馬克思，要求他立即還錢，同時他一年前跟他借的一本書也必須一併歸還，他隨後也寄給恩格斯一封短箋說明自己的意圖，這筆錢很快即清償了，馬克思隨後也寄給他一封信，信中起先說明自己的歉意，他說當初他要求恩格斯的親筆擔保書時，他的確不該輕忽此事，可是他也不該在他情緒最低沈差一點就準備要自殺時，擺出一副咄咄逼人好像要訴諸法律的姿態，他希望他們之間的友誼可以禁得起這種「小搖晃」的考驗，他隨後會立刻把書寄還給他，可嘆這還得花上他十先令的郵資，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此告一個段落。

拉薩爾這次回德國將要演出他一生中最大的事業，為期僅僅兩年。八月，普魯士的議會拒絕撥款支持超過兩年服兵役的法案，國防部長要求役男服兵役年限延長為三年：據說前面兩年訓練如何射殺外國敵人，第三年則訓練如何射殺父母。這時候的國王有意要遜位，因為他找不到一位首相可以幫忙他不須看國會的臉色就可以輕鬆治國，俾斯麥出面阻止國王遜位，並說服國王讓他擔當首相，他可以做到符合國王的願望。俾斯麥一上台就施行「鐵血政策」，首先處理和奧地利間的紛爭，然後以普魯士為主進行壯大德國的工作。有四年的時間他完全剷除國會預算，不理會國會的存在，逕行擴軍計劃，他所使用的藉口很簡單，因為國王和國會對預算問題有意見上的差距，憲法不知如

何處置，因此由他的內閣出面執行裁決。就在這時，拉薩爾的《工人計劃》一書才一出版旋即被警察沒收查禁，拉薩爾自己也被起訴，罪名是「公開煽動無產階級仇視有產階級」。他現在又公開演說敦促議會暫停議事以示抗議，可是一八六二年的德國自由派議員和一八四八年時的那一群自由派議員一樣顛覆無能，他們一樣任其議事權力荒廢不用，也任其改革責任旁落他人之手。

十二月初，有一個從萊比錫來的勞工代表來找拉薩爾，要求他組織一個德國勞工階級的議事團體，他當時正狂熱研究經濟問題，並在德國各地展開各種史無前例的鬧事活動。隔年元月初，他為「工人計劃」事件出庭應訊，他在庭上一口氣演講了四個小時之久，他不斷以言詞攻擊檢察官，而這位檢察官正是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775-1854, 德國哲學家)的兒子，他不時引用他父親著作中的言論來責難他，律師想阻止他發言，他不肯罷休，他繼續長篇大論發表擁護無產階級的言論，一群從萊比錫專程來聽他演講的勞工團體會員聽得心花怒放，因為有人為他們講話，為他們打抱不平。到了三月，他為他們揭櫫戰鬥宣言：「勞工的黨現在要成立了，這個黨必須同時有理論上的認知基礎以及實際的戰鬥能力，我願意為此赴湯蹈火。」五月，他正式組織這個勞工黨，冠名為「德國工人同盟」(General Union of German Workers)。

俾斯麥終於開始注意到他這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就邀請他來會面商談問題，他們討論勞工階級的處境，拉薩爾主張應該成立一個國家慈善團體專門幫助勞工，透過開放全民投票來籌措基金，讓勞工自己能夠投票選舉，然後藉此擁有借貸門路以解決經濟困難。拉薩爾和馬克思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方面的觀點未必全然一致——拉薩爾把國家看成不只是統治階層的一種工具，有時這個統治階層在必要時會淪為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而且國家同時也是一「在道德規範內的個人總體，可以保障個人的教育、權力及自由等，如果光只是個人之結合，缺乏道德

規範，國家便不成立」。他甚至並不反對君主專政，如果君主能夠代表「道德規範」的話。拉薩爾死後，俾斯麥在國會中就說，拉薩爾絕不是主張共和的人。在這段時間裡，拉薩爾和俾斯麥雖然在政治手段和終極目標方面各有不同，他們倒是有一個共同的欲望，那就是打倒中產階級自由派。（這裡有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拉薩爾不同於馬克思，甚至不同於俾斯麥，那就是他想把兄弟愛觀念再度帶回社會主義之中，而這個觀念馬克思早已加以摒除：「把工人角色視之為社會統治原則的人……他絕不會想去分化社會的各個階級，他會要求社會和諧……他主張愛，從一開始這即是廣大民眾心裡的企求，但一旦鬥爭來臨，這便行不通了。」）

此時拉薩爾把俾斯麥看成是一個龐大權力的首領，在指導另一個龐大權力的首領爲他服務，爲他效力。「德國工人同盟」成立時，他送了一份同盟規章給俾斯麥，同時附上幾句話：「在此爲閣下獻上敝王國的憲法，您可能會爲此而羨慕我。」不久俾斯麥開始箝制新聞言論並取締政治聚會，拉薩爾對他發出警告：他在激發革命。拉薩爾得意洋洋來到萊茵地區，在索林根(Solingen)時，一位自由派的當地市長叫來警察取締他和同黨的聚會，他打一封電報給俾斯麥，要求「盡速給予滿意說明」。他後來又在柏林到處惹是生非，自由派在十月的選舉中大獲全勝，他以演說煽動暴亂，當地檢察官以叛亂罪名下令加以收押，這位檢察官正是謝林的兒子，拉薩爾說，他曾經用他那傑出父親的言論教訓他，想必他一直懷恨在心，事實上，他曾經要求俾斯麥把他調到別的地方，俾斯麥也確實做了。

一八六四年的一月，德國正醞釀要跟丹麥開戰，拉薩爾極力勸服俾斯麥在把德國帶入戰爭前先開放全民投票權，否則戰爭一開打，長期下來會造成國內動亂，國王會把他免職，要不然「歷史會給予你的政府和你的專制作風適當的懲罰」。但俾斯麥心裡很清楚，權力在他手上，他勝券在握。在上一回他和拉薩爾的會面中，這位當權貴族手持雪茄，吞雲吐霧（在國會和許多外交場合，他已經習

於目中無人般擺著這種高傲架式)，勸拉薩爾如果想好好經營自己的生涯的話，「就乖乖找個醜女人安頓下來」。俾斯麥把丹麥誘入戰局，讓他們誤以為英國會出兵幫忙他們，然後速戰速決，一個月之內把丹麥擊垮——拉薩爾在他的一篇工人宣言中曾說：「想當歐洲霸權，癡人說夢話！」——這場勝仗普魯士賺到了什列斯威(Schleswig)、霍爾斯坦(Holstein)和勞恩堡(Lauenburg)等三個地方，而且今後可以自由使用基爾港(Kiel)。俾斯麥至此已經不再需要拉薩爾幫他清理「進步人士」，他就要部下給拉薩爾寫張條子，告訴他說他太忙今後恐怕不能再和他會面，但拉薩爾不肯就此罷休，他誠懇要求要和他一起討論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的問題，因為這同時也牽涉到什列斯威和霍爾斯坦這兩個地方，可以說都是俾斯麥急需處理的棘手問題。他把信寫好了，卻擱置著三天未付郵寄出，然後再補上一條附言，言明上回由部下代筆之便條令他相當不悅，今後兩人之間的通信應該由首相親自執筆云云，俾斯麥當然未再加以理會，兩人的關係至此終於畫上休止符。

但拉薩爾繼續搞他的暴動，當局也開始正式加緊抵制他，而他自己也實在弄得筋疲力竭，警察一天到晚來家裡搜查，他不斷繼續寫小冊子，準備演講稿，他的聲音突然變得聽使喚，他必須在喉嚨擦拭硝酸銀，努力老半天之後才能勉強擠出一些聲音來。他抱怨聚會的禮堂空氣太差，他說他討厭工人代表團，真希望能夠在自己的書房裡指揮作戰。雖然如此，工人們對他還是忠心耿耿，因為他們很清楚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能夠像他那樣，具備有魔鬼一般的勇氣。他再一次因叛亂罪名被帶上法庭，他又發表長篇大論演說，然後又獲無罪開釋，但他回到杜塞道夫之後還是被判監禁十二個月收場，他又開始陳情抗爭，最後改為六個月。

他現在不知能否面對這個煎熬，如果秋天開始服刑，他的神經可能會承受不了了，到時就只有逃往國外一途了，他倒是很想去瑞士療養一番。他在六月的最後一天離開杜塞道夫，一大群工人一路

示威到車站給他送行。

在麗琪——卡巴德(Rigi-Kalhad)時他遇上了一位年輕女孩，這位女孩他在柏林時就已認識，而且早就跟她有過一段曖昧關係。她是一位叫做馮·多尼茲(von Donniges)的歷史學家之女，身上帶有猶太血統，據說在外表上跟拉薩爾長得有幾分相像，一頭金紅色頭髮，一顆「碩大而帶有反叛味道的頭顱」，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而言，她算得上是聰明前進的女性，他們認為他們之間很相像，而且可以互相補足，但有時卻也有互相排斥的危險。她名叫海倫(Helene von Donniges)，她稱他為「老鷹」，「主人或大師」，她說他「具有魔鬼的風采」，她還說如果她的父母不同意他們在一起，她就要和他一起私奔去埃及，但她還是希望他能夠尊重她父母的意見。至於拉薩爾這廂，他倒是希望能夠和她風風光光結婚，他們一起去瑞士日內瓦她家裡，徵求她父母的同意。

但事與願違，多尼茲先生簡直是氣瘋了，海倫就要求拉薩爾先帶她去法國，拉薩爾不同意，他希望得到她父母的認同，然後兩個人名正言順的結婚。他帶她回家——這下子整個完了，她父母把她帶離日內瓦，讓他無法見到她。他幾乎快瘋了，他要求女伯爵去拜託曼因茲(Mann)主教出面去跟海倫的父親說項，他同時也找來一位革命的朋友拉斯托(Wilhelm Rüstow)上校為他幫忙，他甚至藉機攻擊華格納，目的是希望刺激他去跟巴伐利亞(Bavaria)的國王為這件事情插上一腳，因為多尼茲先生是巴伐利亞的官員，可惜華格納不吃這一套，他認為拉薩爾這個人「非常沒意思」，並認為他的動機只是出於「虛榮和不實在的哀憐」而已。最後拉薩爾找上了巴伐利亞的外交部長，要他跟海倫的父親施壓，讓他們能夠見面，他甚至去尋求法律途徑，並證明巴伐利亞的法律規定海倫已經成年，她父親沒有權利壓制她。最後多尼茲先生同意讓他們見面，拉薩爾要求兩小時，可是這時海倫卻宣布拒絕和他見面，同時告訴他她並不想跟他結婚，她要嫁給一位羅馬尼亞的年輕貴族，他們其實早就

已經訂過婚的。拉薩爾自從成爲革命家以後一向就反對決鬥，這時他忍不住向多尼茲先生和那位羅馬尼亞年輕貴族下戰書，要求決鬥，羅馬尼亞人欣然同意，日期訂在八月二十八日。拉斯托上校勸拉薩爾在決鬥前好好練習槍法，但拉薩爾相當有自信，認爲沒有必要，結果決鬥那天，對方一槍射中他的肚子，他根本都來不及反擊，不久就一命嗚呼哀哉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拉薩爾的死訊都感到吃驚，恩格斯一向擔心有人會取代他的位置成爲馬克思的親密伙伴，而馬克思和拉薩爾的確頗有這個傾向。令馬克思生氣的地方是，拉薩爾死後竟被德國勞工階級加以神化，他以慣有的嘲諷筆調寫信給恩格斯談論此事，他說拉薩爾的確有其超人之處，因爲他中槍之後感染腹膜炎，竟還能繼續存活了四天，一般人頂多兩天。恩格斯爲此去查閱醫學書籍，並告訴馬克思，腹膜炎可能活過許多天，不一定兩天或四天——有一位巴黎工人被馬踏到肚子，他繼續活了六十或七十個小時。

雖然恩格斯說過對他們而言，拉薩爾「目前是一個不可靠的朋友，未來有可能會成爲敵人」，而且也奇怪：「像拉薩爾這樣一位政治人物怎麼會去和一個羅馬尼亞的小鬼決鬥？」（這之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勸過他不要貿然和人決鬥。）但是，他也承認他們的朋友的確是「德國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同時也是「最令資本家和進步黨那些混蛋感到害怕的人物」。馬克思的確爲此事感到非常良心不安，他寫信給恩格斯說道：「親愛的佛烈德利希，拉薩爾的不幸事件整天纏繞在我腦海裡頭，不管怎樣，他畢竟也是一位系出名門的老戰將，是我們的敵人的敵人。而且，事出突然，我們無法相信一位曾經那麼活潑有力的人現在竟然死了，像一隻老鼠那樣，躺在那裡再也不能說話了。至於他致死的原因，你說對了，這實在是他一向不謹慎的行爲所導致的。讓我感到遺憾的是，我和他之間過去幾年

的關係一直蒙著一片烏雲，這固然是他的錯，卻令我於心不安。不過，值得安慰的是，在他最得意的時候，我從未接受任何人的挑撥去攻擊過他。」他聽說海茲飛女伯爵提到拉薩爾對他很失望，他就寫信給她：「不提他的能力問題，我個人相當敬愛他，不幸的是，他從未能感受到這一點，而我自己也未會好好表達出來，我們都沒好好互相了解對方。」

也許恩格斯有部分看法是正確的，他認為拉薩爾是他自己那種輕浮而錯誤的騎士精神底下的犧牲品，他寫給馬克思的信這樣說道：「拉薩爾顯然做錯了一件事情，他不必逞強去做無謂的英雄，他大可在家裡好好享福，然而他要的是猶太式的魯莽榮耀，而不是精神上的成就。」英國小說家喬治·梅瑞底斯曾寫過一本以拉薩爾的生平為主的小说，叫做《悲劇的喜劇家》(The Tragic Comedians)，這本小说主要根據海倫·多尼茲後來所寫的回憶錄寫成，書中特別提到促成拉薩爾一生悲劇下場的重要導因，無非是他過於傲慢和神經質的本性，而不是他浪漫的騎士精神。梅瑞底斯的小說主要是處理拉薩爾和海倫之間的愛情故事，並未往前回溯拉薩爾在那時之前的事蹟，但小說一開始即指出驕傲這種特質是他追求英雄主義的絆腳石。他和海倫的戀愛事件玩得似乎過了火，正如同他當年和海茲飛女伯爵之間的關係一樣，他耗掉幾年的光陰為女伯爵奔走奮鬥，最後卻變成兩人之間糾纏不清，耽誤到了自己的正事。他和科隆當局之間的情形也是如此，他不斷擺出挑釁姿態，卻在那裡的監獄進出個不停。他和馬克思之間的關係亦未嘗不是如此，馬克思對他的神經質惡劣態度，逼得他斷然拂袖而去，失去了和一位旗鼓相當的伙伴一起合作的機會。最後，他和俾斯麥的關係也是虎頭蛇尾，硬要把對方逼到再也不肯見他，才要罷休，這一切都是驕傲的特質所使然。

在與俾斯麥的關係這件事情上面，如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如果說拉薩爾把自己出賣給俾斯麥，讓俾斯麥牽著他的鼻子走，這種說法實在有失公允。拉薩爾的驕傲特質和史威夫特其實很像，

他擺出一種高傲姿態爲無產階級奮鬥，如同史威夫特擺出高傲姿態爲窮苦的愛爾蘭人奮鬥一樣。這種人除了在文學藝術或道德及思想方面可能大有作爲之外，在政治上則否，另一方面，他又無法和一些別的貴族王公適度搞好關係，更不要說那些警察和教士了，這方面拉薩爾和狄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很不一樣。在理論上說來，拉薩爾純粹是爲了享受權力而追求權力，但實際的問題是，一個人想追逐自己的權力，怎麼可能可以無視於手中正握有權力的人的存在呢？他一廂情願想設立國家的工人慈善機構，想把俾斯麥統治下的德國弄成社會主義國家，他既然把自己出賣給俾斯麥，怎麼可能又要回過頭來不斷去跟他作對？拉薩爾實在是一個少見的不妥協分子，充滿了奇特而帶悲劇性的風格。

一八六〇年代初期對馬克思而言實在是一段難捱的艱苦日子，他斷然與拉薩爾決裂，同時和恩格斯之間的關係也出現了危機。

一八六三年的元月七日晚上，恩格斯的女朋友瑪麗·彭斯突然中風死亡，「我無法對你形容我此此刻的感覺，」恩格斯給馬克思簡單寄去一張便條：「這個可憐的女孩全心全意愛著我。」馬克思也是簡單回覆了一封信，表示：「這個消息相當令人震驚，瑪麗的個性那麼好，又那麼聰明、那麼忠心。」然後又開始抱怨最近手頭如何拮据，倫敦這邊貸款的事情沒有著落，「如果，」他最後說：「死的不是瑪麗，而是我的母親，她的身體毛病很多，也拖了好長一段時日了……」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不忘他的嘲弄本色，卻似乎過火了：「你看，處在某種壓力的情況下，即使是再『有教養的人』，腦中也是會浮現一些奇怪的念頭的。」

要了解馬克思這封信會對恩格斯造成什麼樣的反應，我們似乎有必要追溯一下自從恩格斯去曼

徹斯特之後，兩個人在過去十一年之間的通信內容。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馬克思不停跟恩格斯抱怨他的艱苦處境以及不斷跟他要錢，恩格斯也答應給他一些固定津貼之類的補助，但馬克思老是覺得不夠用，要恩格斯想辦法挪用公司的公款來多接濟他一些，這實在有違恩格斯的商業良心。這還不夠，他還要求恩格斯爲他寫美國報紙的專欄文章，然後稿費由他自己來領，我們想像一種情況，恩格斯白天要去公司上班，有時候晚上還要加班，他同時又要爲馬克思趕寫那些文章，以便能夠如期交稿，而這些文章刊登時又要掛馬克思的名字，稿費又由他支領，當然恩格斯的英文程度比馬克思好得太多，也許這是個牽強的理由，但我們可以想像，這種朋友關係是多麼不平等！恩格斯的處境實在是既有趣又值得同情。一八五二年有一陣子恩格斯必須每天在公司待到晚上八點，有一次他答應英國民權運動者要爲他們寫一篇文章，他就寫信給馬克思，告訴他給《紐約論壇》的文章必須往後順延一個晚上才能寫，馬克思回信說：「既然你的時間這麼緊，你當然還是應該優先考慮美國那邊的文章，因爲這些文章是絕對延誤不得的。」後來恩格斯就勸馬克思自己用德文寫這些文章，然後再由他譯成英文，事實上，這種差事未必更爲輕鬆。過了很久之後，馬克思的英文似乎磨練得像個樣子了，他終於可以自己接手寫那些文章，但他還是不時要求恩格斯爲他蒐集軍事和商業方面的資料，以便他的文章好寫一些。一八五七年，恩格斯終於病倒了，可能是由於工作過度，他當時分攤美國那邊要馬克思爲《大美百科全書》寫的一些文章，他即使在病中也毫無怨言幫忙寫那些文章，大都是軍事和武器方面的專門文章。等他病情好了以後，他寫信給馬克思說，他終於又可以出去玩他最喜愛的騎馬運動了，馬克思立即回信：「我要恭喜你能夠再度玩你的馬術表演，只是要小心，可不能玩得太激烈把脖子也摔斷了，你那匹馬似乎太野了些。」一八五八年，他要求恩格斯爲他買一本他要用的書之後，他寫道：「想必你那邊應該有足夠的資料可以爲我

寫這篇談英國在印度的軍備狀況的文章，禮拜五以前交稿，如果可以，那真要感激不盡，這樣一來，我就可以省掉一個禮拜讀那本書的時間了。」一八五九年，恩格斯要自己寫一本小冊子，馬克思擺出一副老師對學生說話的姿態：「要完全擺脫以前寫《紐約論壇》那些文章的寫法（除非有某些戰事發生，超乎你的小冊子的觀點，但這種可能性不大），準備功夫要很周到才行。」「寄來的五英鎊已經收到，你寫的關於戰爭文章要稍加潤色才行，多渲染一些，因為你寫的對象是一般報紙，而不是專門性的軍事雜誌。描述多些，個人化一些，就可以超越《泰晤士報》的一般通訊文章，我自己不來這一套，這會造成我自己風格上的分歧。」

同時，恩格斯自己一方面為資本主義生意人，另一方面卻又不斷宣揚共產主義思想，這種矛盾顯然極為強烈，以前在德國家鄉，這種情形不難解決，現在似乎不那麼容易了。這種尷尬的處境在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寫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表露無遺，字裡行間還流露出對工業製造衰退情形的興奮語氣：「過去幾週來，這裡的股市行情十分有趣，股市下跌時我流露出興奮情緒，大家對我感到莫名其妙。的確，我經常作悲觀的預測——那些笨驢因而對我十分不滿。禮拜四那天，整個情況最為淒慘，到了禮拜五，這些先生們正在猶疑銀行法未定案不知會給股市帶來什麼影響，緊接著棉花股上漲了一便士，大家就說：這下好了，最壞的終於過去了。但是昨天，大家又開始垂頭喪氣了，行情一片低落，買氣簡直跌到了谷底，由此看來，我們的市場還是跟過去一樣糟。」

恩格斯從來不會露出不耐煩的樣子，只有一次，那就是馬克思一家人搬進格拉夫頓街的時候，當時的情況感覺起來似乎不錯，可是不久卻接到消息說，馬克思在《紐約論壇》的專欄文章要減縮，而且還說「我現在的處境比過去五年來任何時候都要糟」，這時候他就忍不住透露出他的不耐煩口氣了：「你的來信簡直像是青天霹靂，你搬了新家，一切安頓就緒，我本來以為情況已經好轉了，現

在，看樣子情況並沒那麼樂觀……二月初我會先寄上五英鎊，以後每個月就寄這個數目給你，雖然未來一年仍有大筆債務要料理，不過我還是做得到這個。」一八六二年，他給馬克思的一封信這樣寫道：「我如果跟你報告我的開銷情況，絕對不是要對你所謂對我更進一步的『壓榨』有所抗拒，事實上，我一直希望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能夠互相幫助——這絕對談不上誰『壓榨』誰，但我只是要讓你知道，目前要我拿出超過十英鎊的數目，坦白說，我實在是做不到。」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瑪麗·彭斯中風死亡，但恩格斯對馬克思前述那封信的反應還牽涉到其他要素，像恩格斯這樣溫和善良的人，要應付像馬克思這麼霸道而憤世嫉俗的人，他實在是付出了相當重大的代價，這在他們之間的通信中可以看得出來。馬克思像個撒旦式的天才，善於挖苦嘲諷，而且經常展現強烈的效果，此即他天生本性的流露，恩格斯在這方面就及不上馬克思，但他也有強烈的幽默性格，愛開玩笑，有時也愛嘲弄挖苦他人，但從不會逾越尺寸到傷害他人的程度。此外，馬克思一家人對瑪麗死訊的反應實在是過於冷淡了一些，在前述那封信中，馬克思根本就未提及燕妮的哀悼之意。可憐的恩格斯，他做了馬克思做不到的：否定中產階級家庭——他過著一種波希米亞式的生活來反叛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從今天的眼光看，這個犧牲不能算不大。這些年來，他一直被一個觀念纏住，即認定瑪麗·彭斯是十八世紀蘇格蘭大詩人羅伯·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的後代，爲了證實這個，他去過許多趟蘇格蘭和愛爾蘭，卻始終一無所獲。

對於前述馬克思寫給他的那封短信，他攔了好幾天才給他寫回信：「親愛的馬克思，你應該可以了解我此時哀痛的心情才是，而你對此事的冷淡態度竟讓我久久無法持筆回信給你。我所有的朋友，包括那些俗氣的假紳士們，都對我表現出令人感動的關心態度，幾乎超過了我所預期的樣子，而你卻非得在這種時刻照樣表現出你凡事漠不關心的優越態度不可(請慎思爲是)。」

他接下來談到錢的問題：「你該知道我目前的財務狀況，你也知道我一向都是盡我所能在幫助你渡過經濟難關，但是你提到的要我爲你籌措的那筆大數目，我實在無能爲力，望你能夠察諒。」他爲他列出可能弄到那筆錢的三個方式，最後則說：「如果都行不通，就只有去找你那位荷蘭的舅舅了。」

十天後馬克思回了一封信，他說他很抱歉，他告訴恩格斯說他上次那封信寄出去之後就覺得很後悔懊惱，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跟往常一樣擺出玩世不恭的姿態」。他這時還是不改常態，接下來以更多的篇幅開始吐露他的悲慘處境，甚至還責備由於他的上封信，使得燕妮開始不斷對他施加壓力，因爲燕妮認爲他們目前的生活再也維持不下去了。這倒好，他可以宣布破產，把兩個大一點的女兒送去當家庭教師，把女僕蓮琴打發去別的地方，然後他和燕妮帶著小杜茜去住在貧民救濟院。

當然，恩格斯不會讓他們這麼做，他就大膽開出一張一百英鎊的支票寄給馬克思，他知道他到時候是不可能付得出這筆帳的，然後有整整二十二天的時間他不再寫信給馬克思，馬克思寫來兩封信他也攔著不回覆。可憐的馬克思，他在信中除了還是不斷流露焦慮的語氣之外，他仍舊繼續寫些不得當的事情：他想對恩格斯表示歉意，就跟他說他告訴燕妮說，他們所有由「中產階級的困擾」所引起的麻煩，沒有一樣比他們所帶給他的麻煩還要嚴重，而這讓燕妮心裡非常不安，以致家務做得一團糟。他接著就問恩格斯有一種叫做「自動機」的機器要怎麼用——瑪麗·彭斯曾經有過一台——然後長篇大論和他大談特談「機器」和「工具」的不同。在這封信裡頭有一段文字值得特別注意——我們無法區辨這是馬克思對恩格斯的道歉之意，還是他對他自己笨拙一面的解釋——這跟馬克思的生活和思想有很重要意義的關聯。他跟恩格斯說他對機器的東西很無知，他說他正在上一個

實用機械的課，「純實驗性質，這些東西對我而言，就好像學習語言一樣，我了解數學的公式，可是需要用到直覺去了解機器的操作時，我就完全沒辦法了。」恩格斯沒有回信，下封信也沒回，馬克思擔心他是否又冒犯了他，「我跟你提機器的事情，只不過是想讓你分心，幫你忘掉你的哀傷罷了。」也許馬克思倒是真的想讓他的朋友表現一下對方所熟悉而他自己又一竅不通的知識，藉以討好對方而紓解自己內心的不安，他不斷暴露自己贖罪的心情。他說，已經十二天了，他讀不下書，也寫不出東西，連抽菸都覺得乏味——「我的眼睛不知道感染到了什麼，老是覺得不對勁，不知是否和頭部神經的失調有關……我常常要是變瞎了眼或發瘋了，不知道是什麼樣子。」最後，馬克思終於展現了極難得的個人情感：「這個地方，」他跟恩格斯談到曼徹斯特：「對你而言恐怕已經變得很寂寞難耐的了，我自己就有這種經驗，每次經過蘇活那一帶，就覺得很不自在。」

恩格斯最後回信了，他要馬克思原諒他長期以來的靜默，他努力在學斯拉夫語，藉以忘掉自己的沮喪，「但是寂寞的確叫人無法忍受」，他暗示他曾不斷去尋歡作樂，「這有用，我現在又找回自己了」。他們又回到了昔日的親密交情，恩格斯現在對馬克思的態度又多出一層幽默的慈悲心，一八六七年中他有一封信用法文這樣寫道：「馬克思老爹來了！」他用充滿感情的語調揶揄馬克思說，前一年秋天他開了一張支票給人，卻不知道上面到底填了多少數目字。

瑪麗·彭斯死了幾個月之後，恩格斯開始和瑪麗的妹妹麗琪住在一起，她比瑪麗更有虔誠心，而且個性也相當好。有一次恩格斯提到她時這樣說：「她出身愛爾蘭真正的無產階級世家，她對自己的階級有一股很強烈的感情，這對我而言，比一般『受過教育的』和『敏銳的』中產階級女孩更為合適。」他的生活又回到了往日的正常狀況。

一八六三年的一月和二月的幾個星期之間，可以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整個交往過程中最為陰暗

的一個時期，馬克思以其過人之能力戰勝自己個性上的嚴重缺點，並且贏得恩格斯的同情和諒解，雖然他未真正得到什麼回報，但他們之間的關係總算是兩過天青了。

第二十二章

歷史演員：巴枯寧

由於一些因素的湊合，馬克思現在的生活越來越安定，更為像個樣子。威廉·伍爾夫（Wilhelm Woltf）——在德國的社會主義同志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最信任的一位朋友，馬克思還把《資本論》一書獻給他——於一八六四年的春天去世，他留給馬克思八百英鎊，同年的秋天，恩格斯正式成為「艾爾曼與恩格斯」公司的股東，經濟情況更加好轉，能夠給馬克思更多的生活補助。馬克思的女兒羅拉於一八六六年夏天和一位來自古巴的年輕醫生訂婚，這位年輕人叫做保羅·拉法格，是法國人、西班牙人、黑人及印地安人四種人種的混血後代，他們訂婚兩年後結婚。小燕妮於一八七二年的秋天嫁給一位叫做夏爾·朗格（Charles Longuet）的法國社會主義者，他於法國的巴黎公社瓦解之後逃往英國，在倫敦大學充當講師。馬克思兩位大女兒都已經順利出嫁，不過，從政治觀點看，馬克思認為兩位女婿實在都不算出色：「朗格是最後一個普魯東主義者，拉法格則是最後一個巴枯寧主義者——願魔鬼與他們同在！」一八六七年的春天，他完成了《資本論》的第一卷，該年秋天出版，這是他首度將自己的一般觀念加以詳細闡述並發展擴充，他於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相當艱澀難讀，即使是他的門生都望之生畏，所以並沒有造成什麼影響，倒是同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同時面世，大為受人矚目（馬克思認為這本書可為歷史的唯物主義提供自然科學方面的一個

基礎)。

當時，自從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運動之後，十年來工人運動頗有死灰復燃的趨勢，在英國，工會的活動逐漸取代了民權運動，工業城市的興起帶動了建築業和製造業的一陣景氣，但是到了五十年代末期，這些行業的工人卻又被不景氣拖垮了。法國的情形也是大同小異，拿破崙三世忙著建設巴黎而大興土木，但普魯東和布蘭奇的徒眾也同時忙著組織失業的工人，而此時也正是拉薩爾領導普魯士工人在德國到處鬧事的時候。一八六二年，威廉·李卜克內希從放逐地英國回到德國，把一位年輕的車床工倍倍爾(August Bebel, 1840-1913，德國社會民主黨及第二國際創始人之一)引進馬克思社會主義之門，到一八六五年卻又被普魯士政府驅逐出境，他就來到德國南部組織了「德國工會同盟」(League of German Workers' Unions)。一八六〇至六五年之間美國爆發內戰，由於棉花短缺，造成了紡織業的危機。美國於一八六三年廢除奴隸制度，俄國於一八六一年廢除農奴，一八六三年波蘭發生農奴暴動，這一連串的事件促發了自由和革命的激進思潮。到了一八六三年七月，國際工人運動終於透明化，英國的工會活動由於德、法、比三國勞工的引進而受到阻礙，他們就要求法國工人一起參加抵制雇主的活動，但是法國方面由於勞工領導者遲遲無法決定是否要和中產階級的政治團體決裂，以至於在行動上比英國慢了將近一年之久。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國際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即第一國際)在倫敦的聖馬丁大禮堂(St. Martin's Hall)成立，拉薩爾死後四個星期，馬克思受邀參加他們舉行的新勞工組織第一次大會，受邀參加的還有他的兩個女婿，馬克思自此以後成為他們的精神導師。

我們讀馬克思這個時期的通信內容會感到很訝異——儘管他這個時期經常抱怨失眠和身體到處有毛病——他由於經濟上趨於安定，學問知識上更上一層樓，和其他人的關係更為和諧，我們看到

了一個更爲充滿自信的馬克思，我們可以感覺到他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面顯得更加熟練老到，他要應付的對象很多，包括不同的政黨，甚至他不贊同的主義教條：老一代的歐文主義者和民權運動者、布蘭奇和普魯東的徒眾、波蘭和義大利的愛國主義者等等，他現在不但能夠忍受他們，而且還能夠和他們和睦相處。也許他想專心一意完成他的著作，一時之間不願去惹是非。當然，被懷疑跟蹤以及「共產主義同盟」瓦解等的噩夢如今已經遠去，他的日子好過了一些，同時，拉薩爾也已死去，沒有人可以同他競爭了。

這個時期的馬克思儼然已經建立起一股龐大的勢力，中產階級麾下的警察勢力已經拿他莫可奈何，有許多人不得千里來登門求教，在這充滿政治幻覺的時代，他們想求取某種永恆性的真理原則，在他們看來，馬克思彷彿是革命和變動潮流中的不倒翁。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對六十年代中的馬克思有過很生動的描寫，在梅特蘭公園的住宅二樓是馬克思的書房，房間的採光非常良好，房間裡擺有一張簡單的書桌，三英尺長，兩英尺寬，書桌前有一張木製的扶椅，這是馬克思工作的地方，旁邊還擺著一張皮製的長沙發，以及其他一兩件別的家具。窗子的對面是壁爐，壁爐的兩旁是書架。在拉法格眼中看來，書架上的書顯得很不協調，因爲書都是按內容的性質排列，中間夾雜許多大小不一的文件和小冊子，而且書架的上層堆滿許多舊報紙和稿子，快要頂到天花板了。此外，房間各個角落也都散落著紙張和書本，還有雪茄、火柴、菸草罐和煙灰等等，顯得相當凌亂，但是馬克思很清楚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他會在每本書上面做記號，不管這本書有多麼新多麼漂亮，他會加以隨意摺疊書頁——他和你談話時，隨時可以打開任何書頁來佐證他的論點，書和紙張就像是他的手腳，聽憑他任意使喚，「它們是我的奴隸，」馬克思經常這麼說：「我隨時可任意要求它們爲我服務。」拉法格打了一個很好的比喻，他說馬克思的心思就像是一艘破浪前進的戰艦，隨時準備航向四面八

方的思想海洋。房間裡的地毯從門口到窗口的部分已經形成一條深陷的毀壞痕跡，因為馬克思一個人在寫作思考的時候，經常從門口到窗口不停的來回走動。我們看他晚期這些大家所熟悉的照片和畫像，濃眉大眼，深邃的眼神，漂亮的大鬍子和一頭濃密的鬚髮，雖然已經灰白，但眉宇間卻流露出——一副智慧而慈祥的樣子，這與六〇年代初期拉薩爾在柏林為他拍的一些照片，嘴巴緊縮，眼光充滿敵意，一副自滿的樣子，比較起來實在是不同日而語，我們看到的是從離經叛道的馬克思到年高德劭的馬克思的不同面目。

我們前面提過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說，他在這次演說中必須討好各方人馬：英國工會只關心他們的罷工能否成功，而不在意他們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法國的普魯東主義者反對罷工，也反對集體化的生產方式，他們主張分工合作的社會形態以及便宜的貸款；義大利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義大利復興運動中的民主共和派領袖）的愛國主義者只對解放義大利有興趣，他們不要階級鬥爭。馬克思跟恩格斯解釋說，他很後悔在演說中使用「權利」和「義務」這些抽象的字眼，同時還宣稱「國際工人協會」的目標是「要維護道德和正義的簡單法則，人與人之間的來往必須遵守此一法則，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他同時還檢討英國由於工業進步所帶來的後果，這在《資本論》中有詳盡的分析討論，他說過去二十年來，英國在進口和出口的數量上增加了三倍，中產階級認為這將消滅貧窮，但事實剛好相反，工業和農業人口的生活卻反而變得更為悲慘。

在歐洲所有國家之中，除了那些專門剝削人們利益的人，只要是胸懷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得出

來，機器的改良，用科學方法從事製造生產，發明新的通訊設備，開發新的殖民地 and 移民，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所有這些都湊合在一起，事實上並未解除勞動大眾的悲慘處境。在當前錯誤的前提下，每一新式的生產力量的發展總是加深社會的對立，使社會敵對的現象更加尖銳化。在大英帝國的首都倫敦地區，在此一經濟進步的時代裡，餓死人竟是那麼稀鬆平常的事情。在世界的年鑑裡，這個時代將會被註明曾經為叫做商業和工業危機的社會瘟疫所籠罩。

馬克思以令人意外的容忍態度和精明手腕繼續領導「國際工人協會」，直到一八六九年的巴勒議會(Bale Congress)成立，此時主張集體化的一派已經全然擊敗對手。馬克思並未參加這些年度的會議，他只委派代表代理參加，他不想被「國際工人協會」的事務占去他太多的時間，有一次他甚至製造藉口要去歐陸為「國際工人協會」洽辦事務，而事實上卻躲在倫敦，他只是不願意參加會議而已，他寫信給恩格斯說道：「親愛的，要去做什麼呢？我們要學聰明些才好。」這個組織一年比一年龐大，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已經擁有八十萬個正規的會員，而且由於有許多其他的勞工組織聲稱與它有關聯，所以它的實際力量比表面上還要龐大。「國際工人協會」出版的刊物號稱他們的會員有七百萬，據當時警方的估計，至少也有五百萬人。他們組織罷工的失業救濟，並且抵制破壞罷工的人。「國際工人協會」這個名稱在許多雇主心目中就像是妖魔鬼怪一般，經常弄得他們寢食難安。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陣子忙於他們自己的寫作事業，沒有參加他們的活動，卻突然發現他們竟處於一個龐大無產階級運動的領導地位，一八六七年九月，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

事情有眉目了，下一次的革命比我們所預期的時間要來得早些，我們（也就是說，你和我）手

上已經握有這個有力的機器，比較一下義大利的馬志尼，已經活動三十年了！沒有任何財務來源！也比較一下巴黎的普魯東主義者，還有倫敦的歐德格（George Odger）、克萊馬（Sir William Randall Cremer）和波特（George Porter）等人，以及德國拉薩爾的徒衆，仔細想想，我們應該感到滿足了！

然而，就在此時，久坐不動的馬克思，他的權威再度受到挑戰，而這次衝突的對象是一位活躍的政治家，衝突的結果也最爲嚴重，這位人物以謹慎和理性著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此遭到嚴厲挑戰，以至於在歐洲各地的勞工運動中竟大亂陣腳。這個人名叫米開爾·巴枯寧（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在巴勒議會中，「工人國際」首度感受到他的震撼威力。

巴枯寧屬於近代俄國歷史中不幸的一代，成長於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 1796-1855）統治下的俄國，他出生於一八一四年五月十八日，十二月黨人（Decembrists）暴動（俄國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發生的反尼古拉一世之武裝暴動）發生時，他正好十一歲，十二月黨人的暴動是一群深受西方思想影響的軍官和詩人所策劃的叛亂活動，巴枯寧的母親娘家方面在這次暴動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這是普希金（A. S. Pushkin, 1799-1837，俄國詩人、俄羅斯近代文學奠基者）和十二月黨人時代的俄國，也是偉大文化正要初露曙光的近代俄國，然而尼古拉一世三十年的暴政將這一切壓制了下來，他透過恐怖的新聞檢查來箝制知識分子的一切活動，同時禁止俄國人民來往活動於西歐和俄國之間，巴枯寧和屠格涅夫（I. S. Turgenev, 1818-1883，俄國作家，對俄羅斯文學及世界文學皆有深遠影響）及赫爾岑等人正是這種環境下的產物，他們在國內由於高壓政策的逼迫，只得轉向西方尋求自由和光明，他們在

西方世界落地生根，心中卻始終懸著俄國的問題，赫爾岑說巴枯寧「心中潛藏一股無處發洩的巨大力量」。

他來自特佛爾省(Tver)的一個鄉紳世家，他是十個兄弟姊妹中的老大，他和他的弟妹們在一棟坐落於一條大河旁的十八世紀房子中一起度過童年，那一帶的人口不超過五百人，這裡的一切成爲他一生中最好的記憶。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瀰漫著一種想像的氣氛，同時也充滿著溫柔的感情和知性的激盪，這聽來頗有幾分屠格涅夫和契訶夫(A. P. Chekhov, 1860-1904, 俄國作家)的味道。巴枯寧既然是家中兄弟姊妹的老大，在性別和年紀上自然占盡便宜，他是名正言順的老大，他就常常帶頭引領他們和父親作對，他的父親四十歲時才結婚，娶了一個比他年輕許多的少女，也就是巴枯寧的母親。巴枯寧在回憶錄中透露，他曾經愛上自己妹妹中的一個，當她們戀愛或出嫁時他心中充滿了妒意，他甚至暗中破壞她們和她們對象之間的感情，他後來就常常引誘有夫之婦，等弄到手之後就隨之拋棄。他一輩子性無能，這也許和本性中亂倫的傾向有關。他四十四歲時在西伯利亞和一位十八歲的女孩結婚，他們後來還生了兩個小孩，不過據說是這位年輕妻子和別的男人的。

年輕時代的巴枯寧曾經參加一個文學團體，陶醉於黑格爾的理想主義哲學之中，團體中大家在戀愛時都還會披上一層理想主義的色彩，他用俄國的傳統思考方式去生吞活剝德國那種詭異的抽象思想，依照黑格爾的方法，從形上學到純粹存在以致絕對觀念，無不一一照單全收。一八四〇年，巴枯寧二十六歲時決定前往柏林，要好好領教黑格爾主義的精髓，另一方面他也是爲了會見他的一位妹妹，這位妹妹早經他的唆使，離開了丈夫並帶著小孩住在柏林了。

巴枯寧早年在俄國的生活始終是個沙皇的忠誠順民——他唯一的反抗對象就是他的父親而已。但是他來到柏林之後，受到年輕黑格爾學派的影響，立即投入左派的陣營。就在他這決定性的轉變，

想以革命行動來詮釋黑格爾的哲學時，他和弟弟妹妹們的關係也跟著鬧僵了。前面提到的那位妹妹已經跟丈夫妥協和好，又帶著小孩回俄國和丈夫團圓去了；另一位弟弟原來也跟他一起在德國，這時也回俄國去當政府官員去了；他最鍾愛的那位妹妹，後來跟著來德國，卻在此時愛上了他的朋友屠格涅夫，再也不理會他了。巴枯寧自己並未跟著成熟過來，他的正義感並未發展開來，他跟著潮流前進，現在開始宣稱自己是政治的革命家——一位純粹意志和行動的革命家，對他而言，顛覆的行為乃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過程，這和馬克思的策略顯然互相抵觸。在巴枯寧看來，誠摯和強烈的動作有其價值和效用，而強烈的動作總是具有破壞性，他在晚年時談到他自己的性格，他認為：「他具有破壞性的性格主要遺傳自母親，她同時具有一種專制性格，激勵他對所有自由的桎梏痛恨無比。」他這種激烈的性情同時也是性衝動過分壓抑的結果，他初到德國時就這樣說過：「這種破壞性的欲望，同時也是一種創作的欲望。」他有一種恍惚的大災難的預感：「整個歐洲，從聖彼得堡到倫敦和巴黎，將成爲一片廢墟。」赫爾岑說，有一次巴枯寧從巴黎到布拉格旅行，路上剛好碰到德國的農人在鬧事，「他們在一座城堡周圍喧嘩不已，卻不知下一步要怎麼做，巴枯寧走下馬車，當下立即弄清楚怎麼回事，然後以最快速度將農人加以編組成軍（他以前在俄國曾經是砲兵團的軍官），不久，當他回去坐上馬車時，整座城堡已經陷入一片火海中。」他經常強調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革命時要爆發出一股魔鬼般的熱情。

巴枯寧當然也有其博愛的一面：「對有革命熱情的人而言，個人情感在他身上是不會有什麼地位的，在必要時這種情感隨時都可以犧牲的。」他想要——雖然是以破壞之名——擁抱全人類，要在他的追隨徒眾中喚起兄弟愛的情感。

巴枯寧以他的身分地位和他的演說才華而言，大可和義大利的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 1807

1888)，義大利民族解放運動領袖，組織紅衫軍）及馬志尼一樣，成爲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領袖，但俄國並沒有這種運動可以讓他領導，而其他國家這類運動又輪不到他來領導，他只好在一些國家的革命活動中扮演湊熱鬧的角色。首先，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在法國爆發時，他立即趕往巴黎，加入工人國家警衛隊——巴黎警察局長對他的評語是：「好傢伙！革命的第一天他是個了不起的寶貝，但第二天他就該殺了。」三月時革命蔓延到德國，他立即趕往德國，他希望能夠幫助波蘭人叛變。他相信要解放俄國首先必須挑起全斯拉夫民族的革命才行，但是波蘭人不相信他，駐巴黎的俄國大使館已經發出一份通報，載明他是間諜。他只好繼續前往布拉格，想參加當地捷克民族的反叛活動，但並未成功。幾個月之中，他帶著偽造的護照四處來往穿梭，各地警察隨時都在監視他，一八四九年五月，他來到了德國的德萊斯登，當時薩克森尼(Saxony)的國王拒絕接受法蘭克福議會所擬定頒布的憲法，眼看著兩邊就要爆發衝突，巴枯寧對德國的統一活動不感興趣，他認爲他們的革命不會成功，但他既然已經來到這裡，總不能袖手旁觀，何況衝突行爲已經就要開始。他在街上遇見華格納，華格納當時是德萊斯登歌劇院的樂團指揮，他正要前往市政廳探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巴枯寧當下就和他一起前往，他們一到那裡發現臨時政府已經成立，巴枯寧對他們的領導人自我介紹一番，同時建議他們要死守城市，抵抗普魯士軍隊的入侵。那天夜晚，普魯士人果真來了，城裡革命軍隊的指揮官可能是敵方臥底，他下令撤去一切防禦工事，一些波蘭軍官也聞風遁逃。臨時政府的三人小組也逃掉了兩個，只剩下一個留守抗敵，巴枯寧和這場衝突本來毫無利害關係，卻被這個傢伙堅持有下來一起抗敵，他們一起巡視防禦工事，激勵士氣。不久，普魯士和薩克森尼的士兵一路殺入城裡，他們射殺抵抗軍或將他們扔到艾爾布河(Elbe)裡，巴枯寧主張將剩下的彈藥用來炸毀市政廳，大家同歸於盡，但大家不接受，一起退到佛萊堡，華格納要大家繼續退到詹姆尼茲(Chemnitz)，那裡

的工人會支援他們，可是當他們抵達那裡時，卻完全沒有動靜，當晚大家落腳睡覺休息時，被一網打盡，巴枯寧因為太累了，懶得逃跑，據他後來回憶，當時要逃跑很容易，結果他和一夥人被送回德萊斯登，關進監獄。

他在監獄裡待了八年之久，起先他在德萊斯登的監獄和克尼斯坦(Konigsberg)的碉堡裡被關了三個月，然後被判死刑。一天夜裡，他們把他叫醒帶到外面，他以為是要執行死刑，結果不是，他們改判他無期徒刑，要發放到奧地利執行監禁，後來他們發現他有煽動捷克人叛亂的前科，就把他改送往布拉格，以戰犯名義處理，關在一處碉堡的地牢裡。在這裡他不准跟外界接觸，不准和外界有書信往來，每天只准有一個半鐘頭的時間在走道上來回走動，而且由六個警衛看守。關了九個月之後，捷克當局聽說他的一些朋友準備要來劫獄，就把他移往另一個碉堡，並戴上腳鐐，綁在牆上。兩個月後，軍事法庭以叛亂罪名判他死刑，準備問吊，但後來又臨時改變，他們要將他送回俄國。

在邊界上，奧地利的衛兵將他的腳鐐卸下，這是國家財物，不能讓他帶走，可是俄國士兵接手之後，立即給他戴上另一副更惡劣的腳鐐，沙皇把他關到彼得—保羅(Peter-Paul)碉堡裡頭，同時逼他招供過去所犯的罪行並俯首認錯。巴枯寧患有壞血症，他的牙齒全掉光了，對坐牢已經非常厭煩透頂。有一次他過去所鍾愛的那位妹妹到牢裡來看他，他偷偷塞給她一張條子，這樣說道：「你永遠無法了解什麼叫做活埋，我現在就是，我時時刻刻這樣告訴自己：我是個奴隸，我完了，我這輩子沒指望了。在這地窖裡，內心時時掙扎不已，想著人類最急切的利益問題，但卻被迫三緘其口，動彈不得。我有許多主意，這其中有些還相當不錯，卻無從實現發揮，我內心有許多愛，是的，愛，卻找不到對象吐露。我有滿腔的偉大抱負，卻只能對這四面牆壁傾訴發洩，這些牆壁是我的知心對象，也是我的證人。」一八五五年尼古拉一世駕崩，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1818-1881)繼位，他的

統治似乎比較自由開明一些，巴枯寧的母親就去請願開釋他的兒子，起初毫無結果，巴枯寧已經要求他弟弟偷偷帶毒藥給他，要是請願再沒下文，他準備在獄中自盡，最後結果來了——終流放西伯利亞。

巴枯寧一旦走出牢房，就像怪物從瓶中釋放出來，活蹦亂跳，他來到東部的西伯利亞，在那裡他透過以前家中和十二月黨人的關係，找到一份貿易行的差事做，他的工作是外務員，可以經常到外地旅行，四年的流放生涯之後，他終於尋得了離開那裡的機會。一八六一年他從一位西伯利亞商人那裡弄到一筆可以抵達亞姆(Anhui)河口的旅費，到了那裡之後，他伺機偷渡到日本橫濱，然後再跳上一艘美國船一路航行到舊金山，在船上他結識一位英國傳教士，跟他借了三百美元，抵達舊金山之後，他又經由巴拿馬來到紐約，他要求赫爾岑寄錢給他當旅費，那年十一月底他來到了倫敦。

赫爾岑說巴枯寧回到歐洲就像十二月黨人放逐回來一樣，變得更年輕有勁，他並沒有被刑罰的折磨擊垮，反而因此訓練得更堅強更有韌性。他認為五〇年代的反叛行動被壓制下來，這對倫敦的流亡者打擊很大，但對他而言好像從未發生過似的，赫爾岑說他像讀一本書一樣，一章一章「讀遍」那些年所發生的所有事件，巴黎的二月革命以及德萊斯登和布拉格的暴動事件讓他覺得最爲刻骨銘心。當他還在舊金山的時候，他寫信給赫爾岑宣布他要回來，「全心全力把奧匈帝國搞垮，並解放所有斯拉夫民族。」一八六三年波蘭又發生暴動，他準備組織一支俄國兵團前往助陣，但波蘭人害怕他的惡名和怪誕手法連累，就設法把他留在倫敦，不讓他過來。他不肯罷休，就設法前往丹麥，希望能夠在那裡加入叛亂活動，同時刺激俄國政府以激起芬蘭的叛亂。他最後終於加入一群波蘭人，雇了一艘英國船一路駛往波羅的海，他們打算在立陶宛登陸。英國船的船長很討厭這批乘客——巴枯寧說他拿著手槍一路頂著船長的腦袋——也很擔心在波羅的海遇上俄國的巡邏船，巴枯寧終於如

願登上丹麥。

此後有幾年的時間，巴枯寧穿梭往來於瑞典、義大利和瑞士等三國之間，完全靠借貸和一位俄國王室女親戚的資助維生，他到處尋找革命活動去湊熱鬧，同時期待好好搞一個屬於自己的革命事業。到了一八六六年，他終於確定相信愛國主義式的叛亂，比如他曾經寄以厚望的義大利、捷克和波蘭，並非真正的革命，因為他們只是反抗統治者的壓迫，並沒有牽涉到任何社會改革行動。他現在覺悟到社會的革命必須是國際性的，一八六七年，他籌劃一個「和平與自由同盟」(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以建立「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這是一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組織，目標是「解放勞工階級，消除無產階級」。

一八六八年的夏天，巴枯寧成爲「國際工人協會」日內瓦分部的會員，他企圖把這個分部與和平主義者同盟合併在一起，卻遭到馬克思的反對，他認爲這個和平主義者同盟是「日內瓦的風囊」，同時同盟裡的其他會員也反對巴枯寧的此一企圖，他這時不想只滿足於「國際工人協會」給他的位置，更不想接受馬克思的指揮，他就自己召集當地工人，創立他自己的一個組織，叫做「國際社會民主聯盟」(International Social Democratic Alliance)，這個組織多半秘密活動，和「國際工人協會」的關係也是非常曖昧。馬克思再度反對巴枯寧的此一做法，因爲這等於還是兼併了原來日內瓦分部的組織，他堅持巴枯寧解散他的組織，要不然不要打「國際工人協會」的主意。但巴枯寧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盤，他表面上答應馬克思的要求，但暗地裡卻偷偷轉入地下活動，他一向就已經認定自己是龐大地下組織的首領，而事實上，他此時正逐漸真的在掌握他有生以來史無前例的巨大權力，他的組織很快擴展到義大利和西班牙，而這兩個國家正是「國際工人協會」尚未掌握到的地方，同時他在瑞士法語地區的勢力也已經發展到相當令人意外的地步，「國際工人協會」的第二個議會正打算設在

這裡。他前往朱勒(Jura)地區探視當地的製錶工人，當時的瑞士手錶工業正蒙受美國新興手錶工業的打擊，而落入了悲慘境地，巴枯寧在當地山區的許多小鎮四處遊走慰問，相當成功的一次作秀表演，他這次在那裡找到一位極為得力的助手，名叫詹姆斯·紀堯姆(James Guillaume)，他是小學教師，既勤奮又能幹，彌補了巴枯寧不足的地方。一八六九年的巴勒議會，七十五個席位的代表委員中，巴枯寧控制了十二席。

巴枯寧和馬克思開始展開互相較勁，他們在繼承權應否廢除的議題上爭論不休，巴枯寧堅持認為「在解放勞工時，應一併廢除此一權利」。——也許他因為爭取瓜分俄國家中父母遺產失敗而衍生此一主張。馬克思以他一向慣有的邏輯語調爭論道，既然私有財產的繼承是財產制度的一個結果，當今首要之務乃是攻擊財產制度的問題，而毋須去爲此一制度所帶來的問題大費周章，爭論繼承權問題是捨本逐末。

這場爭論有趣的地方在於，當時馬克思人在倫敦，無法親自前來參加大會，他就委派一位代表爲他宣讀意見，這位代表是個德國裁縫師，乖巧而呆板，毫無應變能力。巴枯寧本人親臨會場，一副盛氣凌人的姿態。一位旁觀者描寫有一次巴枯寧在「和平與自由同盟」的大會上發表演說的實況：「他跨著農人一般的沈重步伐走上講台……他的穿著不講究，一件灰色襯衫，外加一件法蘭絨背心。大家一齊喊叫：巴枯寧！這時坐在座位上的加里波的起身上前和他擁抱。有許多巴枯寧的敵手當時也在場，但他們不得不跟全場的人一起站起來致敬，掌聲不絕於耳。」另一個巴枯寧演說的場合，藍格爾(Wrangé)男爵這樣描寫道：「我已經記不得巴枯寧講了些什麼，其實他講了什麼內容並不重要，因為他的演說內容毫無邏輯連貫可言，實在乏善可陳，但是卻相當鏗鏘有力，且咄咄逼人，頗有光芒四射、語驚四座的氣勢——像暴風雨夾帶打雷和閃電，也像獅子在怒吼。這個人是個天生的

演說家，他是為革命而生的，革命是他的天職。總之，他的演講沒什麼內容，卻令人印象深刻無比，說得誇張些，他要是要求聽眾當場互相割喉嚨，我想大家會樂意這麼幹。」巴枯寧一生的革命事業也許徒勞無功，但他的行為卻象徵著一種超人力量的展現，蕭伯納也許說得沒錯，他說華格納的歌劇《齊格菲》編寫於德萊斯登革命事件之後，顯然正是在影射巴枯寧這個人的性格。在那次事件中，巴枯寧莫名其妙和普魯士人對抗，雖說不合於他的政治立場，而且徒勞無功，卻顯示出一種大公無私的驍勇氣魄，正如同他多次在獄中受刑折磨，最後死裡逃生且環繞地球一周回到原位，這充分顯示一種驚人的意志力量，如拜倫(Lord Byron, 1788-1824，英國詩人)所說：「土牢裡的亮光」。巴枯寧這種充滿想像力的行徑正是馬克思無法望其項背的，他像是浪漫詩篇中超人的寫照，在現實世界裡顯得怪誕而稀罕。他這次在巴勒議會中提議廢除財產繼承權的演說依然咄咄逼人，相當動人心弦，以至於理事會的提議無法順利生效，這在「國際工人協會」的歷史上倒是第一次。巴枯寧的提議案最後遭到否決，有許多委員棄權表決，馬克思的提議案也遭到否決，他的反對票甚至比巴枯寧還要多，那位不幸的德國裁縫師只能很沮喪的說：「馬克思會很不高興。」

顯然巴枯寧在「國際工人協會」裡的氣勢已經凌駕在馬克思之上，命運把巴枯寧帶來和他作對。俄國的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繼位之後，彷彿充滿了一股改革的新氣象，但新的暴動和新的革命行動在六〇年代末尾卻反而更加熾熱起來，而且這些行動不再像以前十二月黨人的紳士反叛，也不像四〇年代末期彼德薛維區(Petrashëvsky)的知識分子騷亂，現在鬧事的主要分子是貧窮的學生，因為他們此時竟然成為政府壓榨的對象，當局看法是，讓老百姓學習求知等於在鼓動他們來反對沙皇。在這些鬧事的學生當中有一位名叫奈查也夫(S. G. Nechaev)，他的父親以前是農奴出身，他憑著努力

苦讀而進入聖彼得堡大學就讀，他讀過巴貝夫和布蘭奇等人的東西，他的夢想是秘密結社以伺機反叛，他不久成爲聖彼得堡學生運動中左翼分子的領導人，警察對他發出通緝，他只得逃往莫斯科，然後前往日內瓦，會見巴枯寧及其他俄國流亡人士，這是一八六九年三月裡的事情。

巴枯寧很喜歡奈查也夫，他自己雖然渾身充滿破壞的細胞，卻生性溫和懶散，他在這位二十一歲的年輕人身上發現一股熱勁，一股睥睨一切的氣勢，這倒是反叛顛覆的絕佳人才，他身上帶有一種「魔鬼氣息」，剛好是他正爲「國際社會民主聯盟」編撰的革命活動計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選。奈查也夫和巴枯寧之間的關係，有點類似法國詩人藍波和另一位法國詩人維爾蘭之間的關係。巴枯寧在奈查也夫身上看到自己渴望的理想化身——冷酷、務實、熱誠，幾乎完全符合他的要求。他很喜歡他，稱他爲「男孩」，對他百依百順。

他們兩人一起合作編撰——原稿似乎是出自巴枯寧的手筆——一本令人望之生畏的《一位革命家的教義問答》(The Catechism of a Revolutionist)手冊，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說法，這本教義問答乃是融合了魯道夫(Rodolphe)、卡爾·摩爾(Karl Moor)、蒙地·克利斯托(Monte Cristo)及馬開爾(Macaire)等人的浪漫思想，而成爲一種理想的標準，其重要性在於這是以革命觀點首度頒布的完整革命守則，至今仍爲俄國所沿用。教義問答揭示，革命家是命定的人，不能有個人利益或情感，甚至沒有自己個人的姓名，他只有一樣念頭：革命。爲了革命他必須打破所有傳統禮教的束縛，甚至爲了達到目的不惜加以摧毀消滅。他必須冷酷無情，隨時準備犧牲性命，要訓練自己忍受折磨和酷刑，他不能有任何感情，即使是榮譽這種東西在與目的互相抵觸時，一樣要加以捨棄。他只能和對他完成目的有幫助的人做朋友，至於革命家之中能力較差者，則完全以奉獻自我爲主，如果同志中有人陷入困境，能否得救則視其對革命的作用程度而決定。至於已經建立起來的社團中，其中成員必須加以區分等

級，區分的標準並非依其個人品行而定，而是依其對革命家本身利害關係多寡的程度而定，有危險性的則立即加以摧毀，當然，其他等級之中的成員，如果有以猛烈破壞行動而促進革命家之利益者，則應加以鼓勵表揚。自由主義要加以吸收並與之融為一體，至於激進主義者則讓其自生自滅，只吸收其中少數精華即可，讓其變為真正革命家。革命家的唯一目標在於完成工人的自由和幸福，但要記住，只有大破壞性的全民革命行動才可能完成此一目標。俄國人不能走西方國家傳統的革命模式，他們老是珍惜他們稱之為文明和道德的固有社會秩序，結果他們的革命最後總是換湯不換藥，傳統、制度、階級等這些東西還是沒變。因此，我們未來的政府組織形態不能由從事革命的人高高在上，強加諸百姓身上：這必須由人民來決定。我的工作只是破壞、恐怖、完成、普遍、無情，因此，爲了此一目標，我們不僅要結合群眾中的頑強分子，同時也要結合盜匪，俄國未來的革命必須是這個樣子。我們須注意的是，巴枯寧在此一時期對耶穌會相當有興趣，常常談到他們應該追隨耶穌會的榜樣才行。

巴枯寧和奈查也夫都很熱中搞秘密社團，但是巴枯寧好大喜功，奈查也夫則心懷鬼胎，他到處吹噓他如何從彼得—保羅碉堡的監獄逃脫，事實上他根本從未在那裡被關過，他甚至跟巴枯寧吹牛說，他是全國性革命委員會的探員。他現在回去俄國，在莫斯科的學生群中，大事吹噓他是一個具有鐵一般紀律及可怕威力的秘密組織重要成員，他現在奉派回國散發一篇詩文，以悼念偉大革命家奈查也夫之死。有一位傑出能幹的學生運動領袖，在農業學校就讀，名叫伊凡諾夫(Иванов)，他利用所有閒暇時間教導農人的小孩讀書寫字，他這時懷疑奈查也夫的來歷，要求他提出他所屬組織的證明，這才發現他原來回來企圖組織秘密社團。奈查也夫引誘對方的四個黨羽，協助他一起把伊凡諾夫暗殺了。之後他弄了一份假證件逃出俄國，警察逮捕三百名年輕人，其中八十四人在審判之後有

的下獄，有的則放逐外地。

奈查也夫順利逃回日內瓦，他現在把巴枯寧看成是《教義問答》中所說的自由主義者，並且切斷他所有的經濟來源。當時巴枯寧透過一位朋友接洽好要將馬克思的《資本論》譯成俄文，同時也己拿了一筆可觀的訂金，可是他後來發現這本書很難譯，翻譯工作進行得非常緩慢，訂金早就用光了，奈查也夫就說他接這份工作吃力不討好，簡直在浪費時間，他就擅自寫一封信給巴枯寧那位朋友，言明巴枯寧不想繼續做那份翻譯工作，至於訂金，如果他有意見，則要小心秘密委員會可能加諸他身上的可怕懲罰。另一方面他設法偷竊巴枯寧的通訊文件，藉此要脅他聽任他擺布，巴枯寧至其實在無計可施，就寫信給歐洲各地的朋友，要大家提高警覺，小心奈查也夫這個人。奈查也夫就弄了一個奸細在巴枯寧的組織中臥底，他弄的這個奸細是個波蘭人，但他不知道他是沙皇的密探，結果自己在這件事情上面栽了一個大跟頭。

「國際工人協會」由於這些事情顯然已經受到了傷害，一八七一年俄國審判鬧事學生，《一位革命家的教義問答》跟著一起曝光，奈查也夫自己以「國際工人協會」的代表身分出現在莫斯科，他在一本冊子中聲明他自己的社會思想乃是來自《共產主義宣言》。我們可以想像馬克思吃驚的樣子，他一向就討厭秘密結社和地下活動，他的權力欲很強，他希望能夠一手掌控「國際工人協會」的一切事務，現在卻發現有人假借「國際工人協會」之名，進行秘密結社和地下活動，大談權力和搞小圈子，而且竟然公開代表「國際工人協會」在外面惹是生非。

其實，馬克思對巴枯寧是既羨慕又嫉妒，就像他以前對拉薩爾的感覺一樣，因為巴枯寧渾身充滿魅力，而且又善於指揮統御。巴枯寧身上有一種嬰孩的純真和俄國式的狡黠，同時夾雜著某種熱誠和堂皇的外表，他不時散發著一股迷人的煽動力量。據說他有一次去拜訪一位俄國舊式異教的主

教，他唱著宗教歌曲，然後讓對方相信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另一件事情，他居然有辦法把一位沙皇派駐在瑞士臥底的密探吸收過來，這位密探喬裝為一位退休的俄國將領，他被巴枯寧吸收過去之後，竟變成巴枯寧派回俄國的密探，專門為他蒐集那邊革命活動的情報，同時還為巴枯寧處理他在俄國家中的土地糾紛問題，甚至最後還幫忙巴枯寧解決經濟上的問題。巴枯寧的魅力尚不止此，他最特出的一次表現是居然也把馬克思迷倒了。一八六四年的秋天，「國際工人協會」成立的時候，他們在倫敦首度會面，當時馬克思在德國的好朋友伍爾夫剛死不久，他就特地對馬克思表示他的哀悼之意，同時跟他談到波蘭的最近一次暴動失敗，是因為地主拒絕接受「農人社會主義」，並表示他決心獻身社會主義運動（不久之後，他常常寫信給馬克思，並謙稱自己是他的學生）。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就對他常有讚美之詞出現，有一次還說：在過去十六年之中，巴枯寧是少數幾個人之一，不但沒退步，反而一直在進步的一個人。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畢竟還是有不少批評巴枯寧之處，比如他們就毫不客氣指摘巴枯寧縱容奈查也夫到處胡作非為，也毫不保留地揭發他在西伯利亞時的不檢點行爲。但我認為這實在有失公允。的確，巴枯寧有些瘋狂，也有很多不負責任的政治行爲，終其一生，他一直都反覆在玩小時候在家中帶領弟妹反抗父親的叛逆遊戲。還有，他一天到晚借錢，然後老是忘記還錢，這未嘗不是任性童稚心理的延續，而他能在個性上吸引人對其產生好感，這又未嘗不是他本性中含有孩童的純真所致，而終能驅使他們為他赴湯蹈火，然而，他的叛逆行徑終究還是想像的成分多於現實，他似乎永遠分辨不出想像和現實的區別，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他缺乏現實感，比如他會時常不經意連累他的密探受到危害，他和俄國的同志通信聯絡也極粗心大意，關於這個，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很可能驚訝，巴枯寧在通信中當然也使用密碼，但還是常常疏忽大意而露出破綻，以致讓對方落入警方

手裡。雖說他一直到晚年都仍能不斷吸引許多門徒，但舊門徒卻一個一個離他而去，即使像詹姆斯·紀堯姆那樣忠心的得力助手，最後仍不免掛冠求去。

此外，自從一八六六年以後，他開始大肆提倡「無政府主義」(anarchism)的教條，主張完全廢除政府，此一教條成爲《教義問答》中重要的一項主張，他在和馬克思的論戰中，以此一教條對抗馬克思的「德國獨裁主義」。他在此一教條中最爲吸引人的一點是，他認爲革命的統治組織必須完全來自人民本身，而不是來自上階層的決定，工人協會各個單位的決定必須透過嚴格的民主程序來完成。然而，巴枯寧畢竟不是個偉大的理論家，他的教條和他的實際作爲出現許多矛盾之處，這剛好給馬克思和恩格斯抓到了攻擊的把柄。他們指出，雖然巴枯寧吹噓他的「國際社會民主聯盟」主張未來的社會將不再有政府存在，但他們還是設置了一個獨裁者的位置，坐那個位置的人將是「公民巴枯寧先生」，他將作一切決定，大家都要聽命於他，另一方面，「國際社會民主聯盟」的組織那麼鬆散，要成就什麼像樣的作爲似乎也是不可能，何況事情還沒做到三分，就擺出一副準備大幹一番的招搖姿態，遲早會招惹當局的取締鎮壓的。此外，巴枯寧的徒眾於一八七三年在西班牙鼓動一場暴亂，成功之後，他們並未遵守無政府教條之前提，反而迫不及待接受官方職位，立即進駐當地議會，享受高官爵位的樂趣。

要巴枯寧和馬克思一起平等共事，似乎絕無可能，巴勒議會召開大會之時，巴枯寧一派的人企圖把「國際工人協會」的常務理事會總部從倫敦遷往日內瓦，卻沒有成功。下一次的議會大會於一八七二年九月在荷蘭的海牙(Hague)召開，馬克思和恩格斯決定親自前往參加，而義大利的巴枯寧黨徒未能出席大會，那次大會遂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一手主控，他們同時公開奈查也夫寫給要巴枯寧譯《資本論》的那位俄國朋友的威脅信件，最後，他們宣布將巴枯寧和詹姆斯·紀堯姆開除會員

資格。

然而，巴枯寧的勢力依然強大，「巴黎公社」正熱中於推動巴枯寧主義，他們的行動直接指向爲對抗馬克思的策略而來，巴枯寧自己曾於一八七〇年九月投入里昂的叛變行動，他們在那裡宣布共和，並且成立「公共安全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巴枯寧迫不及待趁此宣揚他的無政府主義政策，宣布廢除政府，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則指出，至目前爲止，無政府主義者並未達成願望，因爲他們留下兩個代表政府組織的「國家衛隊」(National Guard)兵團，只是徒然爲未來局勢製造無窮的糾紛。「巴黎公社」卻意外非常成功，巴枯寧一聽說杜伊勒利王宮已經陷入一片火海時，他欣喜若狂：「他大步迅速走入大廳——他平常走路是很慢的——用手杖敲打桌子並喊叫道：『朋友們，杜伊勒利王宮已經燒起來了，我要開酒會好好大肆慶祝一番！』」地中海國家的革命分子也都群起仿效，四處攻擊教士和王公，但馬克思批評道，工業的問題沒解決，這些革命活動都將是徒勞無功。

馬克思現在同時要迎戰法國的布蘭奇主義者及其相關黨羽，路易·布蘭奇是個行動派的社會主義者，他的徒眾們堅持認爲「國際工人協會」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事情，是「成立一支無產階級革命的武裝軍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國的地位有越來越趨於削弱的傾向，主要是因爲當地工會已經爭取到選票，而且被馬克思讚許巴黎公社的演講所嚇到，他們轉而傾向於支持國會中的自由派，他們進而要求成立自己的特別理事會，以有別於「國際工人協會」的常務理事會。恩格斯於一八七〇年秋天搬來倫敦，他身爲常務理事會的委員似乎做得並不成功，因爲英國工會對他的資本家身分始終耿耿於懷，而且他們討厭他嚴厲的軍事作風，他們甚至還說馬克思提拔他是因爲他給馬克思許多錢。德國方面，許多社會主義者因爲怕被抓去坐牢而紛紛脫離「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此時年事漸高，體弱多病，也覺得疲倦，他只想趕快把《資本論》寫完。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他們已經無法控制「國

際工人協會」，就只好加以抵制破壞，就像當年對付「共產主義同盟」一般，他們把總部移去紐約。自從一八六九年以來，「國際工人協會」在美國吸收了大約五千名會員，大都是德國移民，但一般美國工人對這個組織的興致並不大。一八七三年美國發生經濟大恐慌，光紐約州一地在一夕之間就有十八萬人失業，這倒給「國際工人協會」一個乘虛而入的機會，芝加哥和紐約的大規模失業示威遊行中，他們乘機參與一起湊熱鬧，一八七三年的煤礦工人大罷工，他更是大力支持，但是不久他們卻遭遇到無法跨越的困難。他們有一個支部，領導人是一位女性主義者，名叫維多利亞·伍赫爾(Victoria Woodhull)，她希望在美國展開獨立的運動，包括：爭取女人的權利和自由戀愛。而且她要吸收的會員並不僅限於工人，而是所有說英語的美國公民。倫敦總部那邊自然否定這種做法，但伍赫爾小姐並不理會，她召開大會，召喚「美國所有的男女同胞」來和她一起共襄盛舉，她自己還成為這個組織的主席。「國際工人協會」至此開始分裂，有人認為他們應該配合美國的環境，應該有包容胸襟才行。當時常務理事會的秘書是馬克思的一位老朋友，名叫索格(Friedrich Albert Sorge)，他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後離開德國來到美國。此時馬克思主義者繼續堅持他們的原則，美國的支部分化為許多勞工團體，一八七四年，「國際工人協會」經過常務理事會開會決定而正式宣告壽終正寢。

歐洲方面，巴枯寧主義的「國際工人協會」由於其所標榜的無政府主義教條根本行不通，而於七〇年代四分五裂。巴枯寧於一八七六年七月一日去世，他臨死前表示對群眾很失望，因為「他們對解放自己並不熱心」，同時宣稱「耶穌會那一套還是根本行不通」。有一個來自俄國的年輕女學生成爲他最後的一位忠實信徒，他常常要求她不斷告訴他家鄉的鄉下風景是否一如往昔，他居住的義大利式別墅花園中青蛙的叫聲，老是讓他想起俄國家鄉青蛙的叫聲，他記得小時候在家裡附近的田野和池塘裡常常聽到牠們的叫聲，他懷念不已。女學生跟我們描述道：「當他在傾聽的當兒，他眼

中銳利刁鑽的眼神不見了，嘴唇上浮泛著一股哀傷的氣息。」突然間，他所有的詭計花招、他所有的滔滔雄辯、他所有的叛逆行徑，都不見了，我們想起他如何脫離家庭，如何千辛萬苦從西伯利亞脫逃出來。他一生都在反叛社會，但他居然也有流露豐富情感的時候，他死前不久有一天夜裡從醫院出來，他就順道去探望一位朋友，這位朋友用鋼琴為他彈奏貝多芬的音樂，「一切都成為過去，」巴枯寧說：「這個世界遲早會毀滅，只有第九號交響曲會繼續留下來。」

但是，在這段時期之中，勞工階級運動的真正高潮點則是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事件。

「巴黎公社」事件可以看成是近代歐洲政治思想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們在前面已經論及這場內戰如何讓米西列心力交瘁到中風倒地，也提到泰涅如何因為這場為時兩個月的社會主義風暴而感到驚訝萬分，以致下半輩子不遺餘力連帶一起貶損法國大革命，而法朗士在當時才二十幾歲年紀，也是眼見共產黨人的胡作非為作風而驚嚇不已。然而，平心而論，「巴黎公社」畢竟是勞工階級在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他們理論的見證，中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恥於提到這件事情，但有許多哲學家卻對此情有獨鍾，馬克思於公社垮台之前的四月中寫信給一位叫做庫格曼(Ludwig Kugelmann)的朋友說：「勞工階級和資本家階級及其政府的鬥爭，由於這次巴黎的事件而進入一個新的里程，將來不管結局如何，歷史會有其公斷的。」三年後，一位被關在聖彼得堡監獄的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Prince P. A. Kropotkin, 1842-1921，俄國無政府主義者，曾參加第一國際，屬巴枯寧派)，連續一個星期每天輕敲他牢房的牆壁，告訴另一位年輕人關於巴黎所發生的事情。

普法戰爭中，拿破崙三世和他那昏庸無能的政府很快即被擊垮，這之前，除了農人之外，他倒能維持各階級之間利益的平衡而相安無事，現在第二帝國倒塌了，如馬克思所預言，所有階級變得

四分五裂，內閣中的自由派成立臨時共和政府，當時還指派一個小職位給布蘭奇，當國家衛隊一個兵團的指揮官，布蘭奇要求所有巴黎成年人總動員以抵抗普魯士軍隊的入侵，但此時中產階級政府害怕勞工階級趁火打劫、發動叛亂。不久梅茲(Metz)陷落，普魯士軍隊已經逼近巴黎，布蘭奇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者乘此機會趕緊發動革命，但很快即被臨時政府救平。一八七一年元月二十九日，臨時政府和普魯士簽訂停火協定，割讓亞爾薩斯和洛林兩省，並且賠償大筆款項。二月，國民會議在南部的波爾多召開，選提埃爾(Louis-Adolphe Thiers, 1797-1877，法國歷史學家，曾任第三共和總統，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後代表法國與德國締結和約)為他們的領導，並決議從事內政改革之前，必須先籌錢償付賠款，這項籌錢計劃的目標要一口氣償付賠款以及交戰期間的借貸開銷，他們因而必須終止國家衛隊的開銷負擔，提埃爾甚至還要求他們全部繳械，結果他們於三月二十六日「巴黎公社」選舉那天發動叛變。

巴黎被普魯士軍隊圍困了整整五個月，大家苦不堪言，拿破崙三世無端把法國捲入戰爭，帶來這個屈辱悲慘的下場，現在共和政府又把法國捧給德國，任對方恣意宰割。新的政府由社會革命者所領導——布蘭奇已因叛變而被逮捕下獄——他們宣布廢除警察和軍隊，開放公立學校，徵收教會財產，公開甄選國家公務員，年俸以六千法郎為基準。但是此一新政府不敢從事太多改革措施，又害怕走入獨裁政治，而且小心翼翼不敢隨便用國庫裡的三十億準備基金，也不敢把政府移去凡爾賽，當時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已經移去了那裡，他們很擔心會引發內戰。提埃爾所領導的政府毫不猶疑開始圍攻巴黎，「巴黎公社」在五月中一個星期之內被擊垮(五月二十五日)，他們處決了兩萬到四萬之間的共黨分子，而共產黨在潰敗之前也處決了對方的人質，並放火焚燒許多建築。這是一幅社會主義者和中產階級勢不兩立的鮮明圖畫，從此以後，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政治勢力平行發展，

互不相干。我們讀法國近代歷史，對法國大革命時代中羅伯斯比的恐怖統治耳熟能詳，卻總是忽略「巴黎公社」時期，提埃爾大肆屠殺共產黨人的恐怖作風，他們在短短一個星期之中處決、監禁及放逐的人數幾達十萬人之譜，而大革命中羅伯斯比的恐怖統治在三年之中才達到這個數目字而已。

其實，「國際工人協會」並未真正與「巴黎公社」發生什麼關係，只是其中有些成員在這次活動中參與行事，並扮演某些重要角色而已。當「巴黎公社」正在進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國每天翻閱大小報紙，以興奮心情密切注意他們的動向，戰事爆發時，恩格斯甚至企圖以遙控方式指導他們如何在蒙馬特的斜坡上和政府軍作戰，這當然無濟於事。「巴黎公社」瓦解兩天之後，馬克思以「法蘭西內戰」為題在「國際工人協會」的常務理事會上發表演說，引起英國人的不滿和驚懼。他寫給上述那位德國朋友的信上這樣說：「此刻我榮幸能夠成為全倫敦最受人誹謗和唾棄的人，在二十年蟄伏書房之後，這對我毋寧是一件好事。」

然而，「巴黎公社」畢竟沒有遵循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示的方針去從事革命活動，他們反而在印證布蘭奇和巴枯寧的直接暴力理論，馬克思一向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取代中產階級政權，其方式應該是循序漸進，但他現在反而讚賞「巴黎公社」共產黨人的大膽作風，似乎只是在昭告世人，舊的制度已經死亡了。

事後他和恩格斯分析「巴黎公社」的貢獻，恩格斯談到其中一點：「他們糾正其不自覺之訴求，使之成為自覺可行的計劃。」問題是，他們在短短兩個月之間占據巴黎，本來來不及重新組織社會，而且，從一開始他們的出發點除了是社會革命行動外，至少也夾雜著愛國主義的成分在內，但恩格斯同時也認為，社會主義者強調凸顯這些事件是「正當而必要的」。一八九一年，「巴黎公社」二十週年紀念時，他自己就宣稱，如果社會主義的「無知之輩」想了解什麼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他只要

看看「巴黎公社」即可。我們要注意的是，製造神話的傾向和有歷史感的社會主義者從此結合在一起往前行進。

這當然和「辯證法」的奧秘有關，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和寫給德國友人的書信中，即習慣引用此一觀念來談「巴黎公社」事件：

這些巴黎人多麼有彈性，多麼有開風氣之先的精神，多麼有自我犧牲的精神！……其偉大之風範在歷史上簡直無可比擬……工作、思考、打仗、血染巴黎，在醞釀一個新社會之際，根本不理會已經來到跟前的敵人——他們開風氣之先的精神和熱誠互相閃爍輝映。……他們知道為求得解放，為求得符合現代社會要求的標準，他們必須長久奮鬥，在歷史和人事的不斷變遷中不停的鬥爭努力，勞工階級知道他們的歷史使命，知道如何以英雄的姿態去達成此一任務，他們對中產階級的惡毒謾罵和中產階級的那一套教訓只能一笑置之。……工人的巴黎，還有他們的公社，將是未來新社會的先鋒而留傳千古，那些烈士們將在勞工階級的心中永誌不忘，歷史已經為他們供奉上牌位，永世垂範。

歷史在任何時代都有其特定的不變觀點，歷史有其一套道德觀點，不容許爭論，它會宣判「巴黎公社」的終結者是錯的。了解這個——了解我們是對的——我們就可以允許自己誇張和簡化，這時候，馬克思自己的馬克思主義——這包括他後來一些更加不謹慎的弟子——已經和「科學的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所標榜的嚴酷方法漸行漸遠了。

馬克思：商品的詩人與無產階級的獨裁者

馬克思的偉大著作《資本論》是一本獨特而複雜的作品，我們必須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去加以分析討論。當馬克思正在進行第一卷的撰寫時，他寫信給恩格斯說（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不管這部作品會有什麼缺點，還是會「具有一種藝術創作的特點」。下一封信（八月五日）他則說他這本書是「一件藝術作品」，並且提到由於「藝術性的考量」，這本書不得不延後完成。當然，《資本論》一書不但具科學性，而且也具藝術性，這點毋庸置疑。這本書融合了許多極為不同的論述觀點和許多極為特出的思想技巧，它包含了經濟論述、工業發展的歷史，以及當代思潮的批判，至於道德方面的問題，在客觀的科學方法上面已經沒有地位，它不像經濟問題那麼具有科學性，也不像歷史那麼具有宏觀的啓示視野，總之，它本身的性質並不那麼確定，因此就不在作者的討論範圍之內。然後，環繞在這整個龐大架構外圍的，像古代羅馬人在他家鄉特利爾所建造的黝黑堅固的磚牆和花崗岩石柱所環繞而成的方形議堂，則是瀾漫著一股德國式的形上學和神秘主義光圈，隨時要從縫隙中滲透出來。

但是，真正使這部作品成爲一個完美總體的，則是馬克思的詩人氣質——早在學生時代，他就已經顯露強烈的作詩才華，當然浪漫詩並非他所擅長，他現在的題材是人類歷史，他年輕時代在詩

中所表現的人性荒蕪的一面著實令人訝異，現在則是充滿數學和邏輯。不管如何，《資本論》之所以充滿迷人魅力，除了其論證貼切中肯而發人深省之外，主要也是因為它基本上乃為一本充滿想像力的藝術傑作。

在我們真正進入《資本論》的堂奧之前，不妨先談談我們初次接觸這本書時的強烈感受。

馬克思一般著作的特點是，他在引用黑格爾的辯證方法時，主要是對立要素的互相作用，而不是由下而上的漸進程序，他的作品因而不按部就班發展其論點，我們很難在其中掌握到哪裡是開頭、哪裡是結尾。但《資本論》的第一卷並非如此，馬克思在此頗能以正常方式建築其架構，我們一旦越過其開頭較為抽象的部分之後，往下讀下去時，會覺得像在閱讀一篇史詩。

首先吸引我們、讓我們覺得有興趣的是作者的不凡洞見，這立即引起我們的敬畏之心，他娓娓述及機器製造方法之發展以及資本之逐漸累積如何從封建世界演變而來，其間充滿原始野蠻和人性的要素，把原有的秩序打散之後再重新加以組織，使其成為更龐大複雜的形態，甚至打破了原有的國與國之間的界線、飄洋過海，結合各地不同的風俗民情和文化人種，如此這般資本主義形成了空前複雜且龐大之經濟形態，超乎人們意志所能掌控的範圍。然而，這一切的發展並非純粹只是技術層面而已，由於並非只是非人性要素的操作，這裡頭牽涉到了人性原則的運作——如馬克思所說：「這種熱情是人的本性中最激烈、最原始，同時也是最可鄙的一面：個人利益的狂熱追求。」但是馬克思的不凡之處在於，他能夠更進一步看到人類本性中一個特殊的心理學現象：一個人可以從別人身上剝奪東西，讓對方折磨痛苦，而自己竟然可以完全保持無動於衷。

在處理這個主題時，我們發現馬克思實在是個罕見的偉大諷刺家，他無疑是史威夫特以後最偉

大的諷刺天才，而他們兩人居然也有許多相像的地方，史威夫特所提出解決愛爾蘭貧窮的「謙虛建議」中，最直截了當的方法就是讓貧窮飢餓的人吃自己的小孩，這未嘗不是防止犯罪的妙方。提到防止犯罪，馬克思有他的看法（《資本論》第四卷）：罪犯製造罪惡就好像哲學家製造觀念、詩人創作詩、教授寫書一樣，而這些行為都對社會有利，因為這可以提供許多其他公民就業的機會。

馬克思和史威夫特另一點相像的地方是，他對與金錢有關的一切反應很敏感，史威夫特對會計之類的東西，或對現行流通的貨幣都有一種知性的敏感反應，比如在《德拉皮爾書簡》（*Draper's Letters*）中，我們彷彿到處可以感受到或聽到錢幣銅板的聲音。馬克思對金錢的概念比較哲學性，我們前面提到他以前在寫關於盜林的文章時，就把地主林中的樹木加以人格化，高高在上，農民在面對它們時，只有犧牲一途。湯瑪斯·摩爾爵士（Sir Thomas More, 1477-1535，英國人文主義者、天主教聖徒，著有《烏托邦》一書）的時代正值資本主義要起步發展的時候，許多土地不准人居住，卻都用來飼養綿羊，他就說羊在吃人——現在，馬克思為我們描繪出一個商品主宰人類的圖畫。

商品有其自身之運動法則，它們像電子在軌道上旋轉運行，它們推動機器，它們推動人去操作機器。而商品的最大代表是金錢，金錢代表一切，馬克思認為錢或銀行發行的紙幣都只是為了交易方便而設計，其自身並無價值存在，但卻代表著某種力量，具有某種拜物教（fetishism）的性格，有時甚至取代了人的力量。一八五六年，馬克思在一次英語演說中，以一句話概括了此一主題：「我們所有的發明和進步，其結果是不斷給知性生活帶來物質的力量，最後人類生活將變成被物質的力量完全掌控。」人不知不覺陷入工資、利潤和消費的大網之中，馬克思過分強調金錢的拜物教現象，影響人類的生活本質，這說來未嘗不是和他冷酷的性格有關，他將此種性格投射到外在世界上面。他像其他一些偉大的諷刺家一樣，他在別人身上看到他所厭惡的缺點，立即迫不及待要大肆撻伐一

番，另外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特殊的酷烈性格，他在批判嘲諷時的那種尖銳力量，比如涉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人對他人的責任等等，在當時實在無出其右者。

顯然馬克思也深愛他自己的抽象風格，他不厭其煩把這種風格漫無節制加以使用，《資本論》中有許多這類篇幅說來除了誇耀自己的才學之外，其實並無多大助益，我們有興趣的是其中令人信服的論理分析，他在這方面所使用的方法反而展現著一種美感，如同梅林所說，透過這種方法的運用，馬克思能夠巧妙而精確的區辨事物之不同，只不過若是我們仔細看的話，會發現他有時刻意把具體的工業發展過程帶入一種形上學的巧妙比擬（恩格斯就常抱怨利用辯證法的論證方式，常常會把歷史進展的過程搞混）。但是《資本論》的第一卷之中，抽象的章節和歷史敘述的章節互相巧妙混雜在一起，這些抽象的部分則顯示出其諷刺之功能，馬克思一開始即有意大玩遊戲，透過一種三段論法來催眠我們，則無非在於展現他的形上學法則，藉以激勵我們對問題的思考，然後再把我們帶回到問題的核心，說明一切經濟原則都是出於人類的私心，這種人類的本能在無異於一種引力的作用，是一種必然的傾向，他有意無意不斷提醒我們，工人之被剝削壓榨，即是由此而來的必然結果。馬克思和許多其他博學的經濟學家不一樣，他善於運用遊戲詩文，我們讀《資本論》一書可以深深感受到它和一般傳統的經濟學著作非常不一樣，讀了《資本論》之後，傳統經濟學中所有論點背後殘酷的人際關係之現實面立即顯露無遺。

馬克思在展現他的理論之際——商品原理和嚴密的邏輯分析——總是不斷使用許多資本主義的法則運作下所衍生的現象來支撐他的理論，在這些章節中我們看到一大堆的工廠報告，對工人悲慘和污穢處境的描寫，並且不遺餘力的刻畫工廠雇主的醜陋嘴臉，這些工廠雇主甚至還拿道德、宗教及理性等堂皇的理由來粉飾自己的惡劣行徑——這一切讓人讀來義憤填膺，我們會懷疑在我們的文

明中居然存在這麼醜陋的事情——工人的悲慘處境以及雇主的道德淪喪。

馬克思有時爲了增加他的敘述效果，會拿古代的社會來互相比較對照，以凸顯當今社會的悲慘處境。古希臘時代的奴隸制度，他們犧牲一批奴隸的權益，卻換來貴族政治和其他方面文明的高度發展，但是當今工業社會底下的工人比古代的奴隸還不如，他們除了「把一些粗俗沒讀什麼書的暴發戶變成紡織大王、香腸製造商及染料商之外」，毫無作用可言。中世紀時代的封建制度在未解體之前，農奴至少還可以透過對義務的履行而能獲得某種權利的保障，每個人還都保有自己的身分，可是現在的工人一旦碰到工廠倒閉，雇主和政府則一概不聞不問，任其自生自滅。古代的爵爺不管怎樣還會保障他們農奴的身家安全，現在的中產階級卻只知道一味的剝削壓榨，藉以不斷累積他們自己的財富。馬克思不時要我們湊身去看看帳房、紡織工廠以及礦坑等是什麼樣子，他像是「永世之神」的信徒，他要替天行道，以公正的精神判決地球上所發生的這些不義的事情。

我們初次接觸《資本論》時所獲得的印象大抵如此，但是只要我們冷靜思考一番，同時對比馬克思寫的其他東西，便不難發現其中的諸多矛盾之處。

其中最爲明顯的一點，即是歷史學家的科學觀點和先知的道德觀點之衝突所造成的矛盾，俄國的社會學家柯瓦列夫斯基 (Maxim Kovalevsky) 說道：「馬克思最令我驚異的一點，是他在政治問題上的盲目偏執，這與他一向所推崇的冷靜客觀方法，特別是在研究經濟問題上必不可少的這種方法，恐怕有所出入。」同時辛德曼 (H. M. Hyndman) 對馬克思的這種風格也極感驚訝：「他對自由黨的政策所持的態度和所發表的言論可以激發強烈憤怒，這與他對當代經濟問題的看法實在很不協調。」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一方面告訴我們只有資本主義才可能帶動人類進步不可或缺的某些特

定的「歷史事件」，但另一方面他又對我們控訴資本家的不仁不義，這就像達爾文曾經是路德教派的信徒，卻弄出弱肉強食的進化理論，把群眾搞得惶惶不安。身為歷史科學家的馬克思，他宣稱社會主義所主張的集中化制度只有透過資本主義的競爭過程才能成立，在《資本論》第二卷之中，他有一段文字就談到資本主義雖是一個恐怖制度，但其發展仍屬必要過程：「仔細看看資本主義的製造方式……我們發現這是一種很經濟的方式，其本質是把世俗的勞力附著到商品之中。沒有一種生產方式像資本主義那樣，動用那麼多勞力，不只浪費血肉精力，也糟蹋腦力精神。的確，人類在歷史中的發展有時必須依賴個人的犧牲，完整的社會組織即是由此而來。既然我們這裡所談到的所有經濟（比如礦區勞工的生產方式）皆源於勞動的社會本質，那麼勞工在生命和健康方面因此而浪費糟蹋也就無可避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只此一途，別無他途，即使必須因此犧牲部分人類，也只好任其如此，因為人類的救贖也可能因此而獲得，每一個別資本家如果不是冷血的奴隸主人，就是滿口謊言的大騙子。

我們首先不妨相信馬克思以「科學方式」加以證實出來的資本家的惡形惡狀，而「經濟」將保證工人最後會得到勝利，這牽涉到馬克思主義中的「剩餘價值理論」(Theory of Surplus Value)。

根據馬克思的說法，工人像市場上的商品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其價值由工人賴以維生的最低工資及其工作和生殖的能力而決定——這是所有雇主樂於接受的事實。工人因此依據此一最低工資而受雇，比如說他必須每天工作六小時，但雇主卻要求他工作八到十小時，否則即以解雇威脅，雇主因此從工人身上剝削二到四小時的工作量，他將此一額外得到的工作量之價值轉嫁到他的商品上面，此一被剝削的工作量之價值稱之為「剩餘價值」，也就是雇主的利潤之由來。因此，雇主變得越

來越肥，也越囂張，而工人爲了生存，只好任其剝削到底。

雇主這邊希望工人盡其所能努力工作，工資越少越好，可是，這如何說明勞動決定價值呢？——馬克思在李嘉圖和亞當·斯密身上找到這種原始概念的來源。其實我們很容易說明有許多東西其價值顯然並非由其勞動所決定：老家具、老師傅、鑄元素。至於製造產品在市場上的價值也絕不是其中所付出的勞動多寡來決定，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那麼一位資本家雇很多勞工，花很少資本在工廠上面，他所得的利潤必然比雇很少勞工而花很多錢在工廠上面的資本家要多——馬克思的說法似乎即是如此，但這顯然不正確。英國的費邊主義者(George)，主張用緩慢漸進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團體)從史丹利·傑瓦斯(Stanley Jevons, 1835-1882, 英國經濟學家、邏輯學家、邊際效用學派創始人之一)那裡得到靈感，弄了一個相反的理论，他們把價值奠立在訴求的標準上面：任何商品的價值由其對使用者有用的程度而決定，這說明勞動的價值並非視其付出的多寡而定。

馬克思起先並不單單只是想在《資本論》的前面談這個問題，他打算在後面部分繼續談到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但他來不及完成就死了，直到一八九四年恩格斯才爲他出版這後面未完成的部份(第三卷)，在這裡馬克思終於承認：「一般而言利潤和剩餘價值是不同的兩回事。」所有利潤從剩餘價值而來，但是由於資本家之間互相競爭的結果，大家爭著把資本投注到比較有利可圖的相同生產部門，這一來大家的利潤就相對減少，反之，比較冷門的部門反而利潤提高，結果大家的利潤總究還是拉平，這說明利潤的總數和剩餘價值的總數是相等的，但是，個別的剩餘價值由個別的資本家加以吸收，利潤因而分攤開來，符合他們個別所投注的資本。至於商人，他並未如工人那般創造價值，他只是出錢購買資本家的產品，從資本家的剩餘價值中去加以牟利。而爲商人工作的人也未創造任何剩餘價值，他們也是從資本家手中牟取利潤，他們和工人一樣，都是資本家底下的犧牲者，

至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主，他以類似收租的方式從資本家和商人手中收受屬於他的剩餘價值部分。

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剩餘價值來自勞動的這種論調實在是一種很抽象的概念，這與價格和相對利潤無關，卻展現一種神秘的特性，好像只存在於農田和工廠的勞動身上，而並不存在於商人和資本家或甚至商人的雇員身上。爲了證明此種勞動價值的客觀性，我們必須試圖說明，某一特定時刻所具有的總體利潤與該產品資本家在支付工人酬勞之後於市場上所標示的價格是否相等——但馬克思似乎從未計算過這個。因此，我們實在很難看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的一些抽象論證到底證明了些什麼，關於這點，約翰·史特拉區(John Strachey)近時在其《資本主義危機的本質》(The Nature of Capitalist Crisis)一書中倒是談論不少。馬克思說，如果利潤和剩餘價值相等，那麼，隨著工業生產越來越機械化以及對人力勞動要求的減少，我們會看到利潤的比率亦將隨之減少。但是，如果說現在利潤的比率已經減少，這又如何證明人力勞動和資本家的投資所製造出來的利潤之間有何必然的直接關係呢？其實，我們將會說明，資本主義的危機問題和所謂的「勞動價值理論」並無任何關係，前者並不能證明後者。「勞動價值理論」和辯證法一樣，只是某些形上學者憑空創造出來的東西，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的專家自居，他們努力要將自己的道德價值觀加諸人們的思想上面，將之與事物的本質結合在一起。

從一八六七到一八九四年整整有二十七年的時間，所有價值皆由勞動所創造的這種觀念始終盛行不衰，馬克思的徒眾一致堅持此一信念，並期待他們的大師有一天會解決所有問題，讓所有敵人啞口無言，但是隨著一八九四年《資本論》第三卷的出版，大家這才恍然大悟，即使是擁護馬克思的經濟學家也難掩其失望之情。

義大利經濟學家羅利亞 (Achille Loria) 認為，馬克思生前遲遲不肯將他下半部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公之於世，卻必須等到他死後才由恩格斯替他整理發表，這中間實在大有玄機，顯然《資本論》第一卷所帶來的震撼為後來繼續出版的部分所削弱。假若光從形上學眼光看，所有價值皆由勞動所創造的理論，其實並不比馬克思所認為的資本主義謊言——「價值效益論」(utility theories of value)——更站得住腳，如果說所有價值皆由馬克思所認為的抽象勞動力所創造，為什麼不也有可能為某種抽象的實用層面所創造？馬克思當然否定這點，但他忽略了一點，即勞動的價值似乎與商品所設定的價格無關，只有消費者才與之有關。

事實上，所有這些理論都不夠完整，商品價格的設定遠比實際情況更為複雜，特別是其所牽涉到的心理學層面更是常為一般經濟學家所忽略，他們總是認為價值——實際價格的意義與道德或哲學上的價格意義常會混淆不清——主要是由他們所附屬的團體所創造，舊式最愚蠢的資本家類型總是認為，他們透過提供腦力和資本而創造產品和勞動，他們提供給勞工工作的機會。代表英國中產階級消費者的費邊社會主義者則認為，消費者比農人或工人更有資格決定商品的價值。當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 1839-1897, 美國經濟學家，主張徵收單一地價稅，使土地增值收益全部歸社會所有) 還是加州一位窮印刷工人時，看到一大片富庶土地淪為富人爭相強奪的對象，把窮人擠了出去，他感到很吃驚，因而認為所有價值皆來自土地。馬克思不僅站在工人的一邊，他甚至要工人占有土地，因為他認為所有價值皆來自工人，他努力創造理論來支撐他此一看法，卻反而暴露了「唯物辯證法」的矛盾之處，比如他在辯證法中認為凡物皆是相對的，每一經濟體系皆是為各自階級利益服務的一種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卻又主張應該建立一種以個人行為為基礎的更為普遍性的原則，此兩種不同主張無疑自相矛盾。

恩格斯對前述之義大利經濟學家羅利亞顯然極爲不滿，至於那些對《資本論》第三卷不滿的人，他則提出他的答辯——這是他最後的一次文字發表，他來不及增補第二部分就去世了——但這個答辯充滿自圓其說，完全無視於馬克思主義地位的存在。他拿出他的人類學知識，試圖證明在原始人類中間以物易物的行爲狀況下，物品的價值無疑絕對爲勞動力所決定，「那時候的人，」他說：「當然也是很聰明的——比如養牛的人和他的顧客之間，爲了公平交易起見，他們會把所花的勞動時間一起算在交易裡面。同樣，在商品交易的概念上和原始人類比較接近的——比如俄國人或東方人——他們在交易時會不惜大費唇舌討價還價，以期在商品價值上所花費勞動能得到補償。」我們知道恩格斯曾向一位波斯商人購買一些銅製首飾，他居然會輕易相信對方跟他所說他在商品上所花費的功夫，因而爲此付出更高代價，這實在是一幅有趣的畫面——這也令人想起年輕時代的恩格斯所畫的一幅圖畫，畫中顯示一位笑嘻嘻的旅行商人賣劣酒給一位品酒專家。這顯示了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的謬誤，馬克思和恩格斯終其一生都在強調所有人類賣東西都期待得到比他們所付出的更高的回報，「所有人類嗎？」恩格斯會反駁道：「不，只有中產階級才這樣子！」但他這樣說等於是認定高加索地區的馬販或波斯賣小飾物的商人賣東西不會抬價錢，這等於是自打嘴巴了。不，我們賣東西會盡量想辦法賺取更多的利潤乃人之常情，而這正好也是資本主義開始之前和之後的人類的最大差別。

我們稍後再回到這個主題上面，我們現在不妨稍微研究一下馬克思的世界觀底下粗糙的心理學動機。一般經濟學家大都有不太了解心理學的缺點，他們對人的行爲動機常常只是略知一二，心理學和經濟學從來不會結合在一起去互相補足。馬克思了解人的自私心理和自我欺瞞的傾向，他同時也了解人不喜歡被擺弄或壓迫，但是他把這些現象全部歸諸是階級的產物，而不願意相信這是人的

共通性向——任何階級的人都會有的共通性向。

馬克思凡事皆以階級的劃分為依歸，但是人類經濟動機的複雜程度卻遠超過此一簡單的二分法，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不斷強調資本家和工人或地主和農人的衝突對立，他每次一提到剝削者指的一定是資本家。到了第二卷和第三卷，他提到資本流通的問題，他不得不也提到商人和銀行家，以及我們今天所謂的白領階級，也就是那些為銀行家和商人工作的人，這時一幅複雜的圖畫就應運出現了，但馬克思卻要等到他原稿的最後幾頁才去談論這些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在《論階級》(The Classes)這一章中才騰出一頁半的篇幅來談這個問題。馬克思在此說，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可以分為三大階級：「勞力工作者、資本家及地主，其收入來源分別是工資、利潤及地租。」但是同時也有一些「中間的游離分子，並沒有明顯的界線區分」。問題是，組成階級的要素是什麼？「乍看之下，此三大階級之區分似乎依其收入來源和收入性質來決定。」從這個觀點看，醫生和政府官員可以組成一個階級，「依此而論，各階級之中依社會各部門的不同利益和地位，又可加以細分，比如說，地主就可以分為葡萄園、農田、森林、礦區、漁業等各種不同之業主(原手稿在此結束)。」

馬克思對社會階級的討論分析在這緊要關頭，也就是面臨真正困難的當兒，他竟停了下來。

不過我們想指出這一點——如同最近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美國神學家，鼓吹「基督教現實主義」)所說過的——那就是馬克思論點的真正基礎所在，還是認為雖然資本家有那麼多惡劣的行徑，社會主義工人未來努力的目標，如同恩格斯在《反杜林》一書裡頭所描寫「要從匱乏跳到自由」，主要還是在於提升人類共同的幸福，資本主義時代的統治階層除了剝削壓榨窮人之外，他們並未實際成就過什麼，未來無產階級專政之後，他們當會避免重蹈覆轍。

在此一論點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出史前時代即已存在類似共產主義的社會，他們早年在《共產主義宣言》一書中強調：「所有人類的社會歷史，不管是過去或現在，乃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他們後來還是不斷尋找機會補充此一論調，在後來再版的版本中，恩格斯還特別補上附註，說明他們對原始社會中共產主義實行的情況所知並不多，同時他和馬克思閱讀許多人類學著作，想證實原始社會的組織形態的確是以共產主義為主，他們對美國民族學者摩根(Lewis H. Morgan, 1818-1881，美國民族學家、人類學主要創始人之一)所研究的北美易洛魁族(Iroquois)印地安人的社會形態特別感到興趣。我們因此可以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斷從過去的實例中尋找共產主義的證據，藉此增強他們對未來的信心。

馬克思很想在這方面寫書立說，但卻從未真正去做，他死後，恩格斯寫了一篇關於德國「馬克公社」(Mark, 中世紀時日耳曼民族的村落公社)的論文，他這篇文章主要是根據莫雷(G. L. von Maurer)的研究和一本叫做《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的小書寫作而成，他在此以摩根的論調為出發點，認為

在古老而祥和的社會中所擁有的那種單純生活形式，他們沒有階級之分，卻被最可鄙的一些東西所破壞以致毀滅：偷竊、暴力、狡詐、背叛等等，然後一種新的階級制度以一種最卑鄙的姿態乘虛而入：粗鄙的貪婪、殘暴的欲望、骯髒的強求，以及對公共財產自私的劫掠等等。

但是，恩格斯所描述的這個古代共產主義社區所引發的問題，在無產階級專政之後的未來社會主義社會裡難免不會發生，人類在過去曾經快樂而善良，為什麼後來會變得不快樂，而且邪惡呢？

依恩格斯的看法，他上述的古代社區之所以淪為如此，則是起因於部落與部落之間的爭戰撻伐，戰勝的一方總是要設法毀滅對方，劫掠他們，並加以大肆奴役一番。馬克思主義者對人性本質的觀念在此立即受到質疑，當然我們也可以假設古代社區部落中的平衡狀態比現代社會更加健全穩固——美國西南部的帕布洛(Pueblo)印地安村落實行共產主義經濟，經過四周圍遊牧民族的掠奪和白人的劫殺破壞之後，卻仍能存活下來，因此任何未來社會如果要保持穩定，那麼這種內部的健全平衡狀態似乎必不可或缺，只是我們疑惑的是，社會階級之產生，其背後之動力一定都是「粗俗」、「殘暴」以及「自私」的嗎？

關於原始社會實行共產主義的問題，我們似無繼續詳盡探討的必要，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本來就談得很少，我看恩格斯也沒努力在把這個問題納入他們的歷史辯證法則之中，然而，未來的問題還是值得注意，我們要問，一旦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之後，人類殘暴和自私的本性是否就會跟著全部消失？

馬克思和恩格斯有他們自己的一套烏托邦主義，他們覺得很得意，因為他們已經用「科學方法」建構了一套新的社會主義，用以取代舊式的「烏托邦」社會主義，上述的問題在他們的烏托邦世界裡根本不會存在。

我們先研究為什麼馬克思會認為無產階級革命之後，其道德水準一定比惡劣的中產階級社會為高。依照馬克思的理論，人類的道德觀念與他們的階級利益乃密不可分，因此，中產階級有中產階級的道德系統，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道德系統，兩個系統是互相對立的。中產階級的道德訴求是培養能夠鞏固他們地位以及如何欺壓勞工階級的德行，而無產階級的道德訴求是忠誠、自我犧牲，以及如何培養顛覆中產階級的勇氣。總之，無產階級可以顛覆中產階級，甚至囚禁他們、挫殺他們，

而中產階級卻不能反過頭來以相等手段對待他們，爲什麼呢？馬克思回答說，因爲由下而上的辯證進化過程中，無產階級代表「反命題」，他們要將「命題」帶向「綜合命題」，但是，無產階級的道德要憑什麼而能夠超越他們所要鬥爭顛覆的中產階級道德呢？

答案是因爲他們擁護基本人權，馬克思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常常談到人的基本權利問題，可是等到他在寫《資本論》時，反而沒談得那麼起勁。恩格斯在《反杜林》一書中宣稱：「平等的觀念在中產階級的形式和無產階級的形式中，有其各自的歷史背景，並非一貫不變，但其流行則無疑是從十八世紀中的觀念加以混合挪用而來。」馬克思有更進一步的看法，他著重在「挪用」這個字眼上面，他的觀念從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繼承而來，摻雜著盧梭的人權概念，認定人的基本價值，但他同時更著迷於摩根筆下所描繪的原始共產社會，著迷於那些「高貴的野蠻人」，他遂以科學的歷史學家身分冷冷指出，「人性發展」在那個時代裡實在比現代「吃人血肉」的文明社會高明得多。普魯東曾經把十八世紀自然人可以擁有私人財產的觀念帶給他那個時代，馬克思則加以挖苦嘲弄一番，可是他自己一輩子卻又不遺餘力的擁護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十八世紀哲學所宣告的其他要素「生命、自由以及幸福的追求」。英國的一位統治階層人物帕莫斯頓(H. J. T. Palmerton, 1784-1865，曾任英國首相，實行保守政策和炮艦外交)曾說：「一個國家的立法機構爲了維護全民的安全和幸福，在必要時可隨時剝奪任何階級的政治權利……這是建立任何文明政府的一個基本原則。」馬克思聽了這段話之後當下立即反駁道：「你這話可真是一廂情願，這麼說來民眾的權利豈不是毫無保障，他們得看立法當局——或更正確的說統治階級——的臉色，看他們願意給大家什麼樣的權利。」

我們現在要觸碰到馬克思主義真正最底層的部分——他們認為有階級之分的社會是錯誤的，如《共產主義宣言》一書中所說，因為階級會破壞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同時會阻撓大家對人類共同權利的認同。如果這些所謂共同權利不存在，那麼剝削壓榨之不當在哪裡呢？但是如果沒有穩當的方法可以證明這些權利的存在，我們至少可以證明在上帝面前，所有人類都是平等的。你沒辦法說服一個英國的托利黨去相信低階層階級的人並不比高階層階級的人沒價值，你也沒辦法和一個德國的納粹黨爭論日耳曼民族是不是全世界最優秀人種的問題。恩格斯後來在《反杜林》一書中，再補充敘述近代世界有關權利平等的歷史發展——他說明在中世紀神權教階制度底下，平等的觀念各國各有不同，然後近代工業的中產階級興起，他們從手工業走向製造業，爲了得到大量勞動力，他們必須向同業公會要求解除一些限制，而且爲了能夠順利促銷他們的商品，他們也必須向同業公會要求解除商業法規的一些禁令，最後終於在此一新的經濟制度底下產生了大批的勞工階級，他們成爲中產階級的「陰影」，他們跟中產階級要求平等，他不僅要求廢除階級特權，他們甚至要求廢除階級本身。但是歷史的證據顯示，你不能要求人類體制的進步一定非得民主化不可，你至多只能訴諸道德和情感的方法去要求改善而已。關於這個，馬克思很清楚地知道該怎麼做，他這本書的重要性不在於強調農田或工廠的勞力工作隱含有多大的價值，他反而以具體的方法揭露資本家如何欺壓工人，這才真正叫人讀來義憤填膺。他不斷強調這些殘酷的事實與人類的文明水平實在背道而馳，道德問題畢竟是相對的，他要我們相信，不消除這些，人類真正的文明無從建立，然後不斷跟我們推銷他自己的一套道德系統。

馬克思在此展現了一個猶太人特有的傑出性格，猶太人性格中最特出的一點天才是他們的道德感，以色列人民的聖書能夠成爲基督教教義的根源，說來絕非偶然。雖說許多猶太人的偉人並不信

仰他們自己的宗教，但他們卻憑藉自己的一套道德觀念而能展現出一股超凡的力量。佛洛伊德的情感補償作用學說事實上即帶有一種道德的洞見：人的本性中非理性及破壞的衝動乃是創造力的一種變形扭曲，爲了矯正此一偏差，精神醫生協助病人從事一種自我訓練，以期加以調整掌握——這種論調與純日耳曼式的容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瑞士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首創分析心理學)學說極爲不同，容格會把他的病人帶離困境，然後帶入一種神秘原始的夢境，之後就可能完全不管了。普魯斯特也許因爲身上含有一半猶太人的血液，才能免於像法朗士那樣淪入脫離法國純文學傳統的歧路，德國的納粹會迫害猶太人，其中一項因素未嘗不是猶太人道德權威的作祟所使然。對一個一直企圖重新捕捉野蠻人的自信和殘酷的民族而言，他們的道德觀念令人困惑不解：他們始終在展現一種原則，那就是跨越國家和階級，建立一種以種族爲主的教階制度。我們若看看猶太人在下面這張清單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會覺得相當有趣：雷南的猶太人研究、卡伊雅薇夫人對法朗士的影響、聖西蒙的猶太學生、工人領袖安德烈亞·戈夏克、共產主義者摩西·海斯及社會主義運動者拉薩爾。現在另一個猶太人馬克思把他那個時代完全陌生的價值觀點帶入經濟學之中，在十九世紀中葉，除了猶太人之外，是絕不會有人願意拿起道德武器企圖去粉碎中產階級的堡壘的。

除了猶太人之外，也絕不會有人會爲了無產階級的勝利去奮戰不懈的，這些從猶太傳統束縛中解放出來的第一代偉大心靈，他們急於在別人的社會或教條世界中大展身手一番，去解放或教化他們。因此，佛洛伊德能夠看出文明世界所禁忌或清教徒亟欲壓抑的性衝動的重要性，因而改寫精神分析這門科學；因此，愛因斯坦能夠看出大家深信不疑的牛頓體系的破綻，因而改寫現代物理學的觀念；因此，拉薩爾能夠在德國女人還是處於丈夫和父親所箝制的父權社會中之時，挺身而出爲女人打抱不平，爲女權覺醒的歷史寫下光輝燦爛的一頁；因此，普魯斯特能夠以藝術家和同性戀者的

姿態，把一個民族的悲劇命運及其內在高超的道德信念加以呈現出來；因此，馬克思能夠把猶太人的處境轉化成爲無產階級的處境，伸出援手爲他們打抱不平。

但是馬克思處於舊約聖經的傳統，而不是新約聖經的傳統，他的女兒艾蓮娜說，小時候父親爲他們講聖經的故事，講到耶穌的生平時，他會說耶穌是一位窮木匠的兒子，卻冤枉被富人處死。馬克思爲弱者打抱不平，對剝削者大肆撻伐，但其實他並不真正喜歡這兩種人，他不像一些勞工運動領袖那樣，可以把自己真正投入工人群中，和他們一起生活和活動，他對當代之工業生活簡直毫無經驗可言，他寫作的所有資料幾乎一概從恩格斯和英國國會中的藍皮書報告而來，他不斷揭露工業社會體制的陰暗面，同時不斷控訴資本家的醜陋面目，其實並沒有引起我們太大的共鳴。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他總是大肆醜化中產階級，然後透過無產階級來反映他們的罪惡。在馬克思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強烈的矛盾，他既要肯定人性的善良面，然後又要強調只有透過宣揚仇恨和殘酷才能達到善良，這種矛盾在未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遂形成一種道德混淆的現象。

那麼，《資本論》一書背後的原動力是如何產生的呢？這實在是馬克思一些難堪的著作中最爲難堪的一本，他早期的著作中多少還保留有一些愉悅快活的痕跡，但在此卻幾乎全然不復可見。一八六三年四月九日他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這樣說道：「再讀一遍你的書，我深深感受到自己年齡的壓力。」這裡指的是恩格斯所寫《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他接著繼續說：「你處理這個題材的手法充滿清新和熱情，同時又流露著大膽的見解，兼具科學性和豐富的真相灼見。你提到未來會更好的那種筆調充滿了溫暖而活潑的幽默感，可是一提到此時此刻的陰暗面，跟前面對比起來，卻又令人覺得灰心沮喪。」

但是恩格斯的書和馬克思的書兩者之間的不同，不單只是年齡差距的問題，我們讀《資本論》一書必須同時了解馬克思在這段時期的生活，才會了解爲什麼這本書會流露那麼強烈的苦澀筆調，他對資本家的嚴苛責難以及對窮人的誇大同情，多少反映出他自己當時不順遂的坎坷遭遇心境，而一骨碌把這種情緒不自覺地發洩在別人身上以及紙上。馬克思自己並不是唯一的受難者和被剝削的無產階級，他自己同時也是剝削別人的人，他不是一直在剝削燕妮和恩格斯嗎？他把一堆兒女生到這個世界上來，跟他一起受苦苦受難，他難道不必爲這個負責任嗎？當他最後把《資本論》第一卷完成送去準備出版時，他寫信給梅爾(Siegfried Meyer)說道(一八六七年四月三十日)：「爲了這樁工作，我犧牲了自己的健康，以及我家人和我自己的家庭幸福。」

沒錯——他繼續說得很好——他做這樁工作是爲了理想和爲了全人類：「我嘲笑那些所謂的『講實際』的人以及他們的智慧，比如說他們現在家裡藏有一頭牛，他們自然就不會想去理會別人的苦難，他們只管自己。我在想，我要是在死之前沒辦法把這本書完成，我就會覺得自己是個很不實際的人。」他的女婿拉法格說：「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爲人類工作。」如果有人從事科學研究而犧牲到了別人，馬克思說：「這也不能算是自私自利的行爲，因爲他埋首做研究工作，即是貢獻人類的第一步。」

可是，如果你選擇爲人類工作，如果你不願爲金錢而寫作，那麼你也不能要求別人爲你賺錢，你更不能要求別人爲你受苦受難。

如果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關係像是交流電的正負兩極，那麼，馬克思顯然是屬於正極，他放射出氫元素而本身維持不受影響，恩格斯則是屬於負極，逐漸被消耗殆盡。一八六七年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完成付梓時，恩格斯在四月二十七日的一封信中如此說：「我現在一心一意只想趕快

逃離這個討厭的商業圈，我只覺得自己一直在浪費時間，我一想到這個就更覺沮喪，如果我繼續待在這裡，我最後一定會一事無成——特別是我現在成了股東老閻之一，責任加重了，但情況也跟著變得更糟。」他說他想放棄他的事業，但收入勢必會跟著減少許多，「我放心不下的是，我如果沒收入，你怎麼辦呢？」馬克思帶著歉疚的口吻回信說：「我衷心期盼而且相信在一年之內，我的經濟情況會好轉，我就可以真正獨立了。要不是你的幫忙，我是絕對無法完成我的工作的，但我必須說的是，我常常為這件事情感到良心不安，因為要不是我的拖累，你根本不需要把自己寶貴的才華浪費在做生意上面，而且，不必跟著我一起受苦。」

但他緊接著忍不住就暗示，他目前需錢孔急，急著要一筆錢來周轉：「現在我最害怕的事情，是我必須在六或八天之內回倫敦（他當時正在德國接洽出書事宜），有一筆為數不小的債正等著我回去清償，我的債主正熱切期盼我趕快回去。家務事又是一大堆，不勝其煩，我實在無法心無紛擾的專心工作。」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此時馬克思的家庭狀況，女兒羅拉隔年必須出去工作，當家庭教師，馬克思夫婦一直不希望如此，但如今只有跟命運低頭一途。可憐的馬克思，他一方面要照顧家庭，另一方面又要埋頭寫作，心力交瘁之下，晚上每每不能成眠，終於演變為慢性失眠症。此外，身體的毛病也跟著越來越多，這同樣還是由於家庭和寫作上的雙重壓力所引起，多年來他一直為疔瘡所苦——沒有得過這種病的人絕對無法想像其令人厭煩的程度，經常會弄得人寢食難安，不勝其煩。此外，他又常患感冒，有關節炎和眼疾，同時也鬧牙疼和頭痛，但最嚴重的還是肝方面的毛病，他一輩子不斷為肝的毛病所困擾，他的父親就是因為肝癌死去，這形成他揮之不去的陰影。六〇年代中他這方面的問題越來越明顯，最後終於到了必須接受治療的地步，在寫作《資本論》的這幾年期間，他

始終爲死亡的陰影所騷擾，他會寫信告訴恩格斯說他有時候在睡覺時，手會因爲關節炎而痛得不自覺大叫出來，同時肝病會擾亂他的思路，僵化他的手腳。有一陣子他實在無法繼續讀書和寫作，他幾乎要癱瘓了，他常常想像要是自己瞎了或瘋了，不知道會像什麼樣子。他的痛苦大大影響到了周遭的人的安寧，他懷疑他是否往後都要過這種日子。燕妮爲他去一趟巴黎，接洽《資本論》的法文翻譯事宜，可是她一抵達那裡之後卻發現她要接洽的人竟已中風倒地不起，回程時因爲火車半路上出問題而延誤了兩個鐘頭才抵達英國，而坐往倫敦的馬車又在半路上翻車，等她回到倫敦，坐回家的馬車在路上又跟別的馬車相撞，她只好一路走回家裡。當時蓮琴的妹妹也住在他們家裡，這時卻突然病了，燕妮還未回得家門之前，這位妹妹竟一命嗚呼哀哉死了。馬克思的母親已經臥病很久，這時也死了，他寫信給恩格斯說死神已經開始在召喚他的家人：「我自己也是一隻腳已經踏入墳墓了。」他之前去柏林探訪拉薩爾時，有一封寫給恩格斯的信專門談疾病的問題：「談談拉薩爾吧！來布修斯(Karl Richard Lepsius, 1810-1884, 德國埃及學家、比較語言學家、現代科學考古學奠基人)有一本談埃及的大部頭書，他說猶太人出埃及記的故事其實如馬納托(Manetho)所說，一個叫做摩西的埃及神甫把一群患有麻瘋病的猶太人帶離埃及，所以麻瘋病是猶太人專有的病，我們這位拉薩爾老兄的麻瘋病已經鑽入了他的腦裡，其實這是梅毒的第二徵兆，他沒把梅毒治好，他的骨頭已經被病毒入侵……他有一隻腿已經開始不對勁了……是神經痛還是什麼的。我們的拉薩爾無視於身上的病，目前過著富人一般的奢侈生活，我看這樣子下去，這病是絕對好不了的。」

馬克思期盼《資本論》的第一卷完成之後他的情況會有所改觀，但這個期盼落空了。恩格斯告訴他說，他認爲他的前景會變好一點，事實並未盡然。馬克思的貧窮落魄，會喜歡依賴別人，可以說是他生活上一貫不變的永恆特性，而每當情況變得不順遂時，他就變得更加惡劣難堪。辛德曼說，

馬克思和一些別的開始上了年紀的人不一樣，他越來越難侍候。《資本論》正是此一時期的產物，他說他在寫〈工作時間〉(Working Day)那恐怖的一章時，正是他剛生過病腦子不是很清楚的時候，書完成時他寫信告訴恩格斯說：「我希望以後如果那些中產階級還繼續活著的話，他們會記得我的疔瘡。」因此，就在他大肆攻擊工業體制的同時，他也正式宣告他自己的苦難，昭告上蒼——也就是說，歷史——見證他如何被錯誤對待，同時控訴歷史這個虛偽的惡棍，讓許多人受苦受難然後卻又不聞不問。這本書可以說是馬克思自己半生血淚的結晶，但由於過分醜化受挫的生命寫照，使整本書看來卻又像是一幅充滿仇恨和哀傷的圖畫，高貴的奉獻情操和醜陋的刻畫描寫互相交織重疊，他的意志越激昂時，所呈現的處境就越陰暗。

我們看到他醜陋的資本家擺在一旁，而把未來崇高的共產主義者擺到另一旁時，這似乎是兩個沒有交集的東西，但是他聲明未來共產主義成功之後，要像資本家一樣，拿出殘酷逼人的手段來以牙還牙，並以暴力方式報復一番。馬克思的作品中的確充滿許多暴虐的要素，一八五〇年四月他在「共產主義同盟」大會的演說中就這樣說：「大家不要怕做得太過分，對我們所憎恨的那些人曾經給我們留下憎恨的機構，我們要展開報復和攻擊，我們要一路這樣幹下去。」馬克思不僅是政治上的態度如此，即使是個人私下的一些行為，亦大抵如此，比如他在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就提到二十年前拒絕為他們出版《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出版商，「最近從窗口跌了出去，據說脖子還跌斷了，這下子可好了。」

如果我們把馬克思身上的一些意象孤立起來看——這些意象是那麼鮮明生動，以致我們有時會忘記他由於缺乏現實感所製造出來的錯誤經驗的假象——我們即可透視馬克思內在世界觀的錯誤之處。

我們看到的是殘酷、暴行、壓榨、毀壞和屠殺、活埋、蠢動的屍體、吸血鬼：

伯納維塔·布朗克(Bonawita Blank)神父……善於操縱喜鵲和歐掠鳥，牠們雖然會到處自由飛來飛去，但最後一定會飛回他身旁，他把牠們嘴的下部剪掉，讓牠們無法自行啄取食物，一定要由他餵食才行。一位小中產階級從遠處看到這兩隻鳥停在神父肩上，看起來很溫馴聽話的樣子，就很佩服神父，覺得他實在很有一套。神父的傳記家說他是鳥的恩人。波蘭人被束縛，被瓜分和打上烙印，他們卻拒絕去愛他們的普魯士恩人……但是資本家不僅是依賴勞工而活，他們還要回過頭來奴役剝削他們的勞工，想把所有的勞工趕盡殺絕……好比蠶在吐絲，勞工的被剝削情況莫不如此，似乎只有被壓榨殆盡才得罷休……這個可憐的議會竟拒絕給六月叛變的人一個特赦的機會，這個機構很快即被中產階級粉碎擊垮，共和的美夢隨之消逝殆盡，吸血鬼活在六月叛變者的血液中……從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舊的革命幽靈在其中漫步，隱藏在拿破崙三世的鐵面具背後，動彈不得……開放全面選舉的美夢也只是曇花一現，以人民之名的民主措施，一切都是欺騙謊言……女海神提蒂斯(Tethys)早已向她的兒子阿奇里斯預言，他將會年輕早逝。我們的憲政體制就跟阿奇里斯一樣不健全而淪於早熟早夭的下場……這個憲法早在胚胎之時就已經不健全，不是為人民的立場在設想，其下場自然可想而知，以武力始而以武力終……我們黨裡的鬥士不明就裡坐在武力的肩上而不自知，等到有一天早上才發覺事態不妙，原來他們的屁股下正頂著刺刀……中產階級那一群人自從本世紀初以來，早就在一些剛得到私有土地的自耕農面前放上步哨，一路緊盯不放，他們像吸血鬼一般要把他們的心肝和腦髓吸乾才肯罷休。

關於後面這點，麥斯·伊斯特曼認為實在是馬克思拙劣品味的表現例子，他使用複雜的隱喻，頗為接近聖經中的啓示錄昭示，當然馬克思對付敵手的方式總是愛用複雜無情的隱喻。

上述所引這些片段幾乎都是出自馬克思最輝煌時期的作品：從《新萊茵新聞》上面的文章、《法蘭西階級鬥爭》到《霧月十八日》，而他後來在更為陰鬱的作品中把這些意象更進一步加以擴大，且看《資本論》中對工人的描寫筆調，他寫道：

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中，所有方法皆用來提高生產而不惜犧牲個人勞工，資本家爲了達到生產目的可以對勞工任意剝削壓榨，他們可以把勞工任意宰割，把他們貶爲機器的附屬物，讓他們吃受苦受難，將他們的價值一概抹殺，剝奪他們的智慧潛力而只成爲一種個別的機械力量；同時扭曲他們的工作環境，使他們淪爲專制主義下怨恨的產物，終其一生奴役他們，並驅使其妻子兒女一樣在資本主義車輪底下一起苟延殘喘。

在德文裡有一句話 *lasten wie ein Alp*，意思是「沈重有如一場噩夢」，這是馬克思很愛用的一句話，《霧月十八日》一書開頭第一句話即如此寫道：「死去一代的傳統盤據在活人腦中，沈重有如一場噩夢。」在前述他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他應該爲一位朋友在事業上的失敗負責任，他說他的良心沈重有如一場噩夢；拉薩爾死的時候，他寫信給海茲飛女伯爵，說這個事件對他而言，「沈重有如一場邪惡而纏人的噩夢」。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寫《資本論》的感覺，沈重有如一場噩夢，另外也提到「國際工人協會」及其有關一切，「對我而言實在是沈重有如一場噩夢，要是能加以擺脫我會很高興。」馬克思似乎永遠活在一連串的噩夢當中，有時是被死人糾纏，有時是被工作壓力糾纏，

永遠是一樣的創傷，是什麼創傷卻從未明朗化——情形如同他的辯證法，他有時宣稱這是一種基本的自然真理，有時宣稱這是人類行爲的原動力。情形如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他有時宣稱這是無法避免的不道德過程，有時則又宣稱這是最惡劣的人類罪惡——從未明顯指出這個創傷是死神加在人類身上，還是人類自己加在自己身上。永遠是渾沌不清的狀況，是過去讓現在透不過氣來，還是未來要把過去一筆勾消。上述那一大段引言中，他提到一八四八年的法國憲政體制：「這個憲法早在胚胎之時就已經不健全……以武力始而以武力終。」也就是說，在胚胎時以武力保衛，然後用武力去催生，最後當然也是用武力加以結束。

「你看，」他有一次寫信給恩格斯這樣說：「我像聖經中的約伯(Job)，基督教聖經故事人物，備歷危難但仍堅信上帝)，是災難裡的主角，只不過我沒他那麼怕上帝。」不，他一點都不怕上帝，他也把自己看成歌德式的惡魔，但這種比喻似乎也不恰當，因為歌德式的惡魔是扭曲變形的。他雖然會擺出撒旦式的姿態嘲弄那位扭斷脖子摔死的出版商，但是，透過辯證式的玩笑，這種嘲弄姿態恐怕難免也會扭斷他自己的脖子，因為出版商不正也把他的書活埋了嗎？他最喜歡的英雄恐怕是普羅米修斯，因為普羅米修斯是個受煎熬的撒旦，約伯可不願意如此，但馬克思既不是約伯，也不是撒旦，他要解放人類。在《資本論》一書中(第二十三章)，普羅米修斯變成被資本家綁住的無產階級，我們記得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怎樣被天神宙斯折磨懲罰——據說馬克思每年都要重讀伊索奇勒斯的悲劇——這好比馬克思被他自己的肝病所折磨，他一直擔心他會和父親一樣罹患肝癌而死。但是，如果說宙斯派老鷹來懲罰普羅米修斯，那麼普羅米修斯把火帶給人類，未嘗不也是對人類的懲罰，要救人的自己並未得救，而殺人者並未從墳墓中出來，復活還未出現，因為剝奪者尚未被剝奪。

如此這般，《資本論》中交織著苦惱和挑撥所帶來的創傷，指出這點並無損於馬克思作品的權威。

性，剛好相反，不管任何領域的著作，其重要性不只取決於其視野的寬廣及所提供之訊息的豐富，同時要看其對問題透視的程度，任何有關人類思想的偉大作品——也許不包含所謂準確的科學，但部分仍是——乃在於能夠抒發一種清晰明朗的新穎經驗之見解，並由此發人深省，《資本論》即是這樣的一本作品。馬克思在他個人身上的經驗中尋得通往社會廣大經驗之途徑，並將自己與之認同，他在《資本論》中把自己個人的創傷延伸到工業體制下人類的創傷並與之互相交融，只有像他那麼痛苦和憤怒的靈魂，在世界上活得惶惶不安，才能夠認出並透視人類問題的根源，人類生活的衝突，以及大家所忽視的病態現象。

現在的問題是，從今天的眼光看來，《資本論》一書中的診斷在今天到底仍保有多少價值？馬克思的期待實際上實現到了什麼程度？

馬克思肯定資本主義制度包含太多矛盾因而終將邁向滅亡，他的理論——他認為與黑格爾相反——可以大致概括如下：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是私有財產，競爭遂不可避免。每一位資本家都想賣出他所有的產品，因此他勢必要努力提高生產效率，可是要努力提高生產效率——這得引進許多機器，工作人手勢必跟著減少——許多人只好因而失業，工資也因而減少。這時商品的數量增多了，可是有能力購買的人卻減少了，資本家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必須削價出售商品，結果造成互相的競爭，這之間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每十年為其景氣和不景氣的循環期，資本家為了避免跌入不景氣的循環期，他必須為他的商品尋找國外市場——但這種方式最後還是救不了他。

想要以更高效率製造出更多的商品，就必須在工廠上面投資更多的錢，結果資本家的工廠越開越大，工業生產繼續發展膨脹，慢慢形成工廠與工廠之間互相兼併的行爲，最後資金變成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但事實上，大企業越是發展，其經手的資金數額就越大，利潤的比率卻反而變得更少，這種矛盾最後不免引發悲慘的下場——再也沒有新的市場可以容納商品了——整個社會變成無法正常運作，除非那些集中在少數人手上的資金瓜分開來，讓他們相信，資金瓜分給大家分享比個人獨享對大家更爲有利，因爲他們獨占資金卻不能爲大家圖利，這不合乎社會利益。勞工階級是分享這些資金的最合適人選，他們是大多數，是群眾的代表，他們的利益就是群眾的利益，資本家則否，資本家的利益和他們互相衝突，但他們現在卻受資本家嚴酷壓迫，毫無抗爭餘地，如今他們終於覺醒，將起來創造一個歷史上所僅見的不虞匱乏的時代。

現在，也許我們可以拒絕黑格爾——馬克思的辯證法是真正自然法則的說法，但卻無法否認馬克思在此巧妙運用此一辯證法否定了資本主義，並宣告社會主義之無可避免。他宣稱繁榮會帶來貧窮匱乏，資本家手上的資金對群眾一無用處，沒有比這更矛盾的說法了，「勞動價值理論」的形上學根本談都不用談，馬克思便一口判定資本主義已經走入死胡同，他彷彿比其他中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看得更寬更廣，認定資本主義和歷史上其他經濟現象一樣，有開端，必定也會有結尾。他以數學家、歷史學家及先知的姿態判定資本主義死期已近，這倒是從未有過斷論。

然而，馬克思忽略了社會現象的變遷是有機的，他沒看出這點，我們至少可以指出他對未來所建構的遠景有幾點是謬誤的。

首先，他以猶太人的身分把猶太人和無產階級放在一起定位，這一開始似乎就錯了。在馬克思

的時代，猶太人和勞工階級都一樣沒有選舉權利，他們都是被摒除在社會之外的一群，但不一樣的地方是，無產階級在智能和體能上一一起被剝削，如恩格斯所說，他們的小孩並不了解他們的不幸，因為他從不知道什麼叫做幸福。猶太人的出路雖然很狹窄，但他們卻很有機會從事智能方面的訓練，在他們飄浮不定的生涯中，雖然束縛重重，紀律的訓練則從未間斷過，他們至少有輝煌的過去，他們期待復國，等到傳統的束縛一旦打開，像馬克思這種人很自然立即脫穎而出，秉著現代思想的洗禮，一馬當先，走向時代的巔峰，而且，他另一方面又繼承有希伯來先知精神權威的傳統，他更是如虎添翼了。

反觀無產階級，他們毫無訓練可言，即使要組織工會或要有效對抗資本家，他們都不知該如何著手，因為他們缺乏前例可循的傳統做後盾。另一方面他們對社會歷史的知識又知道不多，對其他世界也是不甚了解，他們更沒什麼學習的機會，資本家希望他們越無知越好，而他們由於地位卑微，往上爬升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中世紀時代的猶太人之所以欲振乏力，乃是因為沒有國家做背景，現代的無產階級之所以欲振乏力，乃是因為階級所限。但馬克思確信隨著他們和統治階層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對立越來越尖銳，他們將會很快學得必要知識和自我訓練以及統治階層所擁有之執行事務的技巧，可是，有誰能像馬克思這樣的共產主義者來教導他們呢？而且，他們能學得和他一樣好一樣快嗎？

他此一錯誤觀念和另一個多少也是錯誤的觀念有連帶的關係，他認為共產主義者所宣稱的無產階級未來必定勝利，其情況與中產階級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勝利將如出一轍。但是，歐洲的中產階級現在已經掌握到權力，他們不但受過良好教育，而且也已有了相當豐富的行政經驗，既有財富，又有權威。然而工業體制下的英國無產階級——馬克思在「資本家」中主要的處理對象——他們經

年在礦區勞動，在工廠操作機器，在狹隘的生活圈子中苟延殘喘，他們早就喪失了參與政治行動的能力。馬克思似乎從未考慮到安坦·巴納甫(Antoine Barnave)——他是最先探討經濟範疇的人士之一——對勞工階級所下的悲觀定論：「這個時代社會上的窮人除了要貧窮折磨之外，他們同時更喪失了擁有智慧和大膽想像的本能。」而中產階級即使在贏得權勢之前，就已經擁有財富和文化了；英國的無產階級一直在努力追求財富和文化這兩樣東西，可是他們最後仍然無法免除中產階級的觀點去看這個世界：當他們透過工會的運作而獲得較高待遇及較少工作時間，他們就不會去考慮要鬧世界革命了；當他們在國會中擁有發言權時，他們已經和統治階層融為一體了。馬克思從未看出這點，他不知道統治階層只要稍稍施小惠，即可化解一場鬥爭的危機，即可收攬人心，達到天下太平了。

馬克思更不會理解當勞工階級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且達到相當水平時，他們的心理狀態是什麼。

在馬克思眼中看來，當代人的職業和習慣、欲望和野心，都必然帶有階級色彩，都被卑鄙的中產階級所主導，他無法想像無產階級會附和他們，如果一個無產階級想追求中產階級追求的，馬克思會認為他離經叛道，是小中產階級的可憐犧牲者。他從未想到德國和義大利可以把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結合在一起，完全不引起勞工階級的反對，和平過渡到與舊式中產階級政府並無兩樣的另一種新政府的形態，即使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以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為開端，以後恐怕也是走入和上述德、義兩國相同的結局。

更甚者，馬克思根本不了解美國，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他為《紐約論壇》寫的文章中宣稱，當時的美國政府為「至目前為止最高形式的人民政府」，甚至要勞工階級們向「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人民

政府」致意。但他不久之後寫給恩格斯的信中則說，「這個假借民主之名的冒牌共和國」，在《資本論》的末尾部分則稱美國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大本營，「正以巨大的步伐邁進，無人能擋。」馬克思始終無法了解的地方是，美國沒有歐洲的封建制度背景，不僅易於發展資本主義，而且更易於建立民主社會，在這裡根本就沒有階級的問題，大家從事不同的行業，卻使用相同的語言，凡事有一套相同的標準，大家能夠互相容忍，這是別的工業社會看不到的。在美國，我們的社會活動乃是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上面，金錢的流通很快，階級制度根本無法成形，跟歐洲比較起來，我們沒有根深柢固的階級觀念，也沒有由階級觀念所帶來的大家族集體通婚及大家族企業的景象，我們的政府體制以民主為依歸，雖然有時政治也是操縱在有錢人手裡，但他們大抵有一定社會聲望，有群眾擁護的基礎，這在歐洲則是絕無僅有的。

我們也有工業上的粗暴現象，甚至比歐洲還多，但我們卻從不會把這種現象發展成歐洲一些封建國家那樣，演變為不可收拾的危機，我們絕無階級鬥爭之可能，主要是我們社會平等的觀念相當穩固，我們從無歐洲那種根深柢固的階級制度的束縛，縱然我們有階級利益的問題，卻也為平等觀念所化解了。我們的法律制度並不那麼健全，但我們卻目標一致，這個目標可能如馬克思所說，是中產階級的目標，而這種目標卻只有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方式才可能達到。一般人沒有封建觀念的束縛，大家可以自由自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這絕不是馬克思能夠想像得到的現象，因為他自己即做不到這點。在美國，一個普通的現代人，他會想要有現代化設備的舒適家庭（馬克思從未想到也無法為妻女弄一個舒適的生活環境），他會想要有美輪美奐的公園，他要電影，他要運動娛樂（馬克思聲稱他研究過騎馬術，但恩格斯有一次在曼徹斯特教他騎馬，他卻從未跨過第三階段的課程），他會想要在自己國內自由自在旅行：郊遊、划船、露營等等，還有童子軍和基督教青年會活動，他

同時要求社會服務——醫院、圖書館、道路設施——這類服務可能來自政府稅收，也可能來自私人捐贈。所有上述這些在蘇聯或在法西斯國家，也都是一般人會想要追求的事物，在美國可以輕易達到此一目標，則是因為有一段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相當景氣的緣故，但我們同時也做了許多其他的事情，這在其他一些民族卻不是能夠輕易得到：自由活動和自由言論。

從今天的眼光看來，上述那些情況都是社會主義革命所要追尋的目標，然而，社會主義並不能創造政治或文化的紀律，即使一群社會主義者有朝一日掌握到權力了，他們依然無法真正遂行他們的理想或建立起他們心目中的體制，這些必須依賴整個社會的有機過程蛻變而來。今天似乎只有那些享受過現代舒適生活及已經習慣於安穩生活的人，才會挺身為保衛舒適和安穩的生活而奮戰，他們和馬克思觀念中的無產階級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馬克思總是認為，只有那些被虐待過的人以及智能和道德高人一等的人，才最有資格活在這個世界上，但他卻忽略了社會的現實面，在社會上人們有隨意結交朋友或不結交朋友的自由，其實這已經很接近他一輩子不斷在宣揚鼓吹的無產階級社會了，然而，他並沒看出這點。我們應當記得，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必將滅亡及階級之存在必將瓦解的預言主要乃是奠立在一種心理學的假設層次上面，在當時這根本無從證實，但他忽略了一項事實，即隨著時間的演變，坐享其成的一方並非一成不變，對被剝削的一方永遠無動於衷，他並沒看出這種演變的可能性，因為他認定雇主和勞工之間永遠無妥協之餘地，他們勢必非對立到底不可。

換句話說，馬克思根本不願意承認民主的可能性，他生長在一個極權政體的國家，而在其他民主體制國家的生活體驗又讓他灰心失望，早年法蘭克福議會的民主風潮有如曇花一現，並未符合他的期望，而他和佛克特之間的糾紛以不了了之收場更是讓他絕望透頂。此外，他永遠自認自己高人

一等，他不自覺的優越感則更表現在他對同僚間的不民主態度上面，他有許多計劃未能順利付諸實行以至於流產，他全歸咎於其他無產階級同僚不肯聽命於他，最後，由於他生活上的貧困潦倒以及內心世界的挫折阻礙，使得他無法認同和諧博愛的世界的可能性，他不肯相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能建立在友誼和互信的理性基礎上面，因此，他無法相信當代世界可能有民主制度的存在，當然也就無法看出未來由一群未經訓練的無產階級所統治的世界會有什麼樣的問題出現。他在晚年比較願意承認——他和辛德曼之間的談話以及一八七二年九月八日他在阿姆斯特丹勞工會議上的演講——一些民主國家如英國、荷蘭及美國可能以和平手段達到革命目的，但是，他所宣揚的理論認為一場階級鬥爭的衝突大戰乃勢所難免，此一論點卻早已深植人心了。

自從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事件之後，隨著德國和法國民主議會的流產，他在《共產主義宣言》之外，再附加另一個他認為相當有創意的社會主義政治理論的新教條：無產階級專政。在他看來，無產階級抓到政權還不夠，同時還要把中產階級的所有體制一概剷除，他們要建立自己全新的一套體制，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所有與資本主義有關的要素要連根拔除。馬克思心中所構想的真正能爲人們謀福利的政府——他也常常提到民主體制的可能——是全然毫不留情的無產階級專政，而主導此一政權的正是他和恩格斯這種凌駕在階級之上的能幹之輩。

然而，馬克思的思想畢竟還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儘管其中已經塞滿許多教條，但尙未完整。《資本論》——除非我們將之捧爲聖經——還是有不少值得探索商榷之餘地。

馬克思畢生都在爲完成作品而嘔心瀝血，像《費爾巴哈題綱》和《政治經濟批判導言》這兩本書他根本沒有真正寫完，多少帶有隨筆的味道，即使像《共產主義宣言》這樣的書，也是在重大壓

力之下勉強完成。至於《資本論》的第一卷也是在恩格斯的堅持和燕妮的督促下，耗盡幾年時光才終於能夠面世，他在寫作方面的確面臨許多困難，而這些困難多少還是帶有神經質的成分，因為他始終深怕他寫的東西不夠好，擔心他的學養和邏輯訓練夠不上學術水準，好比他早年所寫詩中的主角用「零碎的磚石」建造他的碉堡，深怕不夠穩固一般。另一方面，他寫起東西來會感到特別痛苦吃力，主要也是因為他所選定的題材範圍過於龐大複雜，經常令他無所適從，即使背後有強烈的興致在驅使，始終還是覺得痛苦萬分。一八六七年的春天，《資本論》第一卷終於出爐面世，馬克思期盼隔年冬天之前能夠完成第二卷，他寫信給恩格斯提到他弄到許多「新的資料」，可以好好處理土地財產權方面的問題，他這次把談論的對象箭頭直指俄國，正如第一卷談工業問題主要以英國為主。他在六〇年代末開始下功夫學習俄文，勤讀俄國的文學和歷史，並且從俄國方面弄到許多有關的文本檔案，他想以一種權威的姿態好好談論俄國的經濟問題，他不想重蹈「勞動價值理論」的覆轍，結果卻因而阻礙了工作的順利進展。他搜集了堆積如山的統計資料，下筆時卻又必須不斷回頭尋找馬克思主義的源頭論點，好像薛西佛斯(Sisyphus)把石頭推上山，石頭冷不防又滾了下來，一切又必須從頭來過，這樣的折騰工作方式，實在超乎常人之想像範圍。恩格斯後來在整理馬克思的遺稿時，就對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說，他真想把這堆東西全部燒掉。在馬克思未完成的一些遺稿中，有一點是他企圖談論未來俄國革命有可能出現的情況，並預言其所呈現之狀況將超乎他所宣稱的資本主義法則。

誠然，如同愛德華·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 1850-1932, 德國社會民主黨及第二國際右派領袖、修正主義代表人物)所說：「儘管馬克思在處理細節及其相關枝節部分時，有注意到自從他早期所寫的有關社會主義之論著以來，整個時代已經經歷了相當大的演變，但是，他在下結論時仍然脫離不

了一八四八年時代所下的未經修正的論點。」不錯，馬克思不是不知道時代已經有了變化，他的心靈一直很活躍，他始終在求知上進，他在總結前人觀點的工作上的確有其獨到的功夫，但是他的觸角既然觸碰到現代並延伸到未來，其工作之艱難程度則又超乎我們的想像範圍了，如果說他學習俄文是爲了掌握俄國土地制度發展的所有歷史文件資料，那麼，如果他也想了解巴爾幹半島有關這方面問題的話，恐怕也得去學羅馬尼亞文了。

《資本論》不只是尙未完成，就某種意義上而言，它根本是無止境的——的確，馬克思死後，恩格斯花了整整十二年的時間整理他的遺稿，甚至在恩格斯死後，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 德國社會民主黨及第二國際領導人物之一)從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〇年之間又陸續整理出許多資料(馬克思對前人經濟論點之批評總結)——除此之外，還包括了許多其他未寫或未完成的斷簡殘編：一本專門談「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論著，準備挑起全人類的大革命；一本人類學著作，談從古代到未來的共產主義生活；一本文學評論，說明巴爾札克是中產階級社會的解剖家；還有一本書談高級數學，從微積分的角度說明辯證法的原理。《資本論》最後變成和米西列的歷史著作一樣，成爲「藝術作品」，因爲內容所涉及的事物已然打破均衡的狀態——馬克思常常會寫到一半時，在一些事物上由於新的發現或新的靈感，而在其上面大費筆墨，以至於超出了原來所設定的範圍，這當然無可避免會引發許多新的思想和更深入的見解，特別是再加上後來恩格斯的許多補遺和註解說明，這比馬克思還活著時的思想範圍無疑更爲龐大蕪雜，很少著作像這樣，原著者已經死了，但他書中的論點和思想卻仍然不斷在擴充膨脹。而馬克思本人在撰寫此書時，又由於一些外界活動的影響，比如「國際工人協會」，書的進展不免受到干擾，而後來恩格斯在做遺稿整理工作時，又受到「社會民主黨」組織工作的影響，不免也干擾到全書的進展，這些因素自然而然而都使得這本著作始終無法變得完整

(因此，如果說我們無法完整勾勒出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的所有教條，顯然那是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構他們的思想體系時，經常受到當時外界許多事件的影響，受到了干擾和阻礙)。然而，他們經年累月長期慢慢孕育出來的結晶，畢竟還是成爲人類世界戰鬥的絕佳武器。

第二十四章

馬克思死在他的書桌上

我們在前面已經敘述過，馬克思對拉薩爾張牙舞爪的搞運動方式感到極為不悅，甚至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特別是拉薩爾死後，德國工人把所有榮耀都加在他身上，不斷對他歌功頌德，還把他的肖像供奉在家中，對於這個，馬克思實在感到厭惡無比。他相信海茲飛女伯爵跟他講的一個故事，她說，拉薩爾以支持兼併什列斯威—霍爾斯坦這塊地和俾斯麥交換條件，要求俾斯麥對工人做某些讓步，梅林認為拉薩爾這樣做對德國勞工極為有利，但馬克思卻很不喜歡他拿共產黨的名義去和俾斯麥打交道，他寫信給恩格斯說，共產黨「應該清除像拉薩爾這樣的敗類」。

一八六七年，威廉·李卜克內希和倍倍爾在回到德國之後，當選為北德意志國會的議員，隔年他們在艾森納(Eisenach)的工會議會中創立一個新的「社會民主勞工黨」(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什麼鬼名字！」恩格斯在寫給馬克思的信中這麼罵道。普法戰爭期間，拉薩爾的黨徒於一八七〇年七月投票贊成戰爭公債方案，李卜克內希和倍倍爾則根本放棄投票，到了該年十二月，德國已經打贏戰爭，雙方一致拒絕投票贊同進一步戰爭公債方案，李卜克內希和倍倍爾甚至反對兼併亞爾薩斯和洛林兩省，但卻為巴黎公社事件大聲喝采不已，不久兩人則以叛亂罪名被拘捕坐牢兩年，當時拉薩爾徒眾的首領史懷哲(J. B. Schweitzer)也一起被捕。普法戰爭結束後，兩方人馬為了集結力量

一起對抗俾斯麥而結合在一起，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李卜克內希在哥達鎮(Gotha)正式把雙方的人馬結合在一起，成爲一個獨立的黨派。

這個黨派成立一個委員會，拉薩爾徒眾一方派七名委員，李卜克內希這方派七名委員，然後把政黨綱領寄給馬克思過目，詢問他的意見。馬克思固然很高興見到德國的勞工黨派終於能夠結合在一起，但對拉薩爾一派的教條始終還是耿耿於懷，李卜克內希對此則沒什麼特別的意見。政黨綱領經過稍事修改之後，兩黨正式合併，一切進行還算順利。然而，馬克思竟突發奇想給他們寫了一封長信(即後來大家所熟悉的《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大談他曾經不太注重的一個重要問題，使得這次德國勞工政黨合併事件又增添了一段是非插曲。

馬克思首先表示反對政黨綱領草擬人拿馬克思主義中的「勞動價值理論」爲基礎，草擬其政黨大綱——他自己也許對此一題目相當神經質。他們宣稱：「勞動乃一切財富之源泉。」不！自然也是其中泉源之一部分，你不只是付出勞力工作，你仍得有工作的手段媒介。

他接著繼續談另一個問題，這跟巴枯寧對他的控訴有關，他想趁這個機會進一步發揮一番。巴枯寧強調一個社會應該擺脫政府的箝制和束縛，並宣稱馬克思身爲德國人，竟主張施行極權主義的確，馬克思曾經談到未來的德國應該走中央極權政府的制度，而不是聯邦共和制，他現在趁機說明他自己也反對政府制度，他主張自動組合的行政方式以達到人性全然自由的目標。

他由此進一步確定勾勒出未來由無產階級革命所統治的社會主義社會應該像什麼樣子，至目前爲止，他在《共產主義宣言》中只是提到舊的社會「將被一種組合所取代，在這種組合中，每一個人的意志將帶來所有人的自由發展。」但他從未解釋無產階級專政之後要如何達到此一境界，這時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他則暗示社會主義的社會其最初步驟的建設方針，但我們發現他在此所揭

示的原則雖然超越了他早期論著的範圍，卻是我們所熟悉的現代社會，新秩序脫胎自舊社會，不可能全盤否定舊社會的一切，到時不再有階級的存在，但不平等的現象將依然繼續存在，還不可能出現一切皆平等的情形。「哥達綱領」中所描述之「平等權利」和「公平分配」等詞彙乍聽之下似乎很吸引人，但從今天眼光看，則根本是癡人說夢，「法權體系的水平不能超過經濟水平及經濟水平決定的文化發展階段所許可的程度」。此外，從舊社會延續而來，由於各人能力、體能及智慧各不相同，大家所從事工作之性質必然有所區分，到了新社會，既然所有價值皆由勞動所創造，則社會主義社會底下的所有工作者必然會擁有所謂的權力（馬克思根本就忽略了勞心的工作者在「質和量」方面——從所付出的勞動力觀點看——是否一定超越在勞力的工作者上面，他也沒想到由於較吃力的工作應獲得較高獎勵這件事實，會在今天的蘇聯造就另一個不平等的階級）。

馬克思接著說道：

只有在更高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在分工制對個人的奴役解除之後，不再有勞心和勞力的分別，勞動不再只是為了求取生存，而成爲生命最首要的必要條件，生產力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而提升，合作性財富更豐盛——中產階級狹隘的權利觀終歸會被揚棄，到時候我們的社會才可標榜：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馬克思當然不是不了解他的社會主義前輩所標榜的天真烏托邦想法，但是他自己卻看不出來，他所標榜「合作性財富更豐盛」的未來，未嘗不是一廂情願的天真烏托邦想法，似乎只要共產主義社會一來臨，所有一切人生問題便迎刃而解，他顯然對未來寄託了太沈重的希望了。

這是馬克思畢生生涯中最後一次重要的演出，他生命的最後十年多少也獲得了一些慰藉：恩格斯已經搬來住在倫敦，他能夠為療養身體而四處旅行。但是在六十歲之年他仍覺得似乎一事無成，他曾經一手把「國際工人協會」解散掉，因為他發現他已無法控制它，如今《資本論》第一卷問世，卻也沒有得到他預期中該有的認可和肯定，他期待看到適當的評語出現，恩格斯寫了一篇，打算刊在《雙週評論》(Fortnightly Review)上面，但後來主編認為這篇文章太枯燥，不適合他們雜誌的讀者，稿子只好退了回來。這時他期待他的學生、也是朋友，辛德曼，出版一本叫做《全民英國》(England for All)的書，這本書主要以描述馬克思的思想為主，但是作者深怕挑起讀者的強烈反應，卻在書中說明他的論點主要來自「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一位有創意的作家」，馬克思的名字則完全略去不提。

馬克思的女兒燕妮·朗格和丈夫一起住在法國，一八八一年的春天生下一個嬰兒，馬克思夫婦在該年夏天專程前往法國探望一番，但是回到英國之後，燕妮·馬克思卻病倒了，她罹患了無法治癒的癌症，她的神經也跟著差不多要崩潰了，她寫信給恩格斯，信中充滿感謝的話語，多謝他多年來對他們的照顧云云。馬克思的母親過世時，他曾經專程回去一趟特利爾家鄉，他寫信給燕妮：「我特地挑了一天回去看看你家的老房子(在羅斯納街(Rosentasse))，我對那裡總是特別情有獨鍾，因為那裡會讓我回憶起我快樂的年輕時代，以及和你一起共度的美麗時光。每天總是會有人問起當年那位特利爾最美的姑娘，舞會中的王后，如今如何了，我想到自己的妻子居然始終活在鄉人的心目中，大家無不以『最美的公主』目之，真叫人感到無比安慰。」這些讚詞毋寧像是一杯毒藥，如他年輕時所寫的情詩，他像詩中所描寫的情人，讓他心愛的人喝下他給的毒藥，而自己卻無動於衷。

到了十二月，燕妮已經奄奄一息了，馬克思卻為胸膜炎所苦躺在另一個房間，他的女兒艾蓮娜後來如此寫道：「我始終忘不了那天早晨，他覺得自己比較有精神了，就下床走進母親的房間，突

然間，他們好像又變得年輕了起來——她像個可愛的女孩，他則像個迷人的年輕小夥子，他們好像正準備要一起攜手共度未來的生活，這根本不像是一個病魔纏身的老人在同一個垂死老婦做最後訣別的景象。」威廉·李卜克內希說，燕妮在死前像小孩子一般期待德國第一次大選的結果，當時已經頒布反社會主義條例，但大選結果「社會民主勞工黨」獲勝，她真是高興極了。馬克思寫信給索格說，燕妮死前另一件讓她感到高興的事情是，貝爾佛·巴克斯(Belfort Bax)寫了一篇關於他(馬克思)的文章，發表在發行量很大的刊物上，這讓她感到異常欣慰。她斷氣前講的最後一句話是：「卡爾，我已經完全沒力氣了。」馬克思自己病倒在床上，無法去送葬，恩格斯趕到時，馬克思說：「摩爾人(指馬克思)也死了。」

他說的沒錯，他自己其實也差不多了。燕妮死後第二年他前往阿爾及利亞、蒙地卡羅(Monte Carlo)、安古恩(Englert)、以及日內瓦湖區，但卻一路帶著胸膜炎奔波個不停，回到英國之後，爲了避開倫敦的霧氣，他立即又躲到瓦特島去，卻在那裡染上感冒病倒了。燕妮才死後不久，他的女兒燕妮·朗格也於一八八三年一月跟著死了，他一直爲這個女兒的健康憂心，可嘆沒錢送她去海邊靜養。同年三月，馬克思感染肺炎腫，三月十四日恩格斯來看他，管家女傭蓮琴一看到恩格斯就哭了起來，她說他吐了許多血，她上樓去看他，發現他坐在書房裡，她想，他可能是睡著了，他自己從床上爬起來，走進書房，坐到書桌案前。恩格斯走進書房，摸他的脈搏並聽一下他的氣息，這才發現他已經斷氣了。

恩格斯比馬克思多活了十二年，他的女友麗絲·彭斯(Lizzy Burns)於一八七八年去世，他爲了讓她高興，就在她臨終前正式和她結婚。麗絲生前每當馬克思家小姐們來探望恩格斯時，恩格斯就打

發她出去逛街，給她錢要她去酒館喝杯酒，然後坐馬車穿過公園回家。他一直努力想證實麗絲和她姊姊是英國大詩人羅伯·彭斯的後代，卻始終無法真正找出證據。麗絲死後，她有一位表妹叫做瑪麗·艾倫(Mary Ellen)，主動住到恩格斯家裡來，要求幫忙料理家務，不久這位女孩和一位富有的承包商兒子發生情感糾紛，恩格斯就強迫對方娶這位女孩，對方家庭很冒火。這對男女終於還是結了婚，恩格斯發現這個男的實在一無是處，既無革命情操，也沒什麼頭腦，他想幫忙他開創事業，卻搞得一敗塗地，最後只得把這對男女一起弄到家裡來住，他寫信給朋友理奇納·伯恩斯坦(Regina Bernstein)說道：「現在家中人口眾多，食指浩繁，兩隻狗，三隻貓，一隻金絲雀，一隻兔子，兩隻小白豬，十四隻雞，外加一隻大公雞。」不久，女孩生了嬰兒，恩格斯很喜歡這個小孩，常常和他玩。另一方面他也籌錢給她丈夫做生意，無奈這位年輕人根本不上進，又做不好事情。馬克思夫婦死後，蓮琴就過來這裡，照顧他的生活起居。

生命中最後這幾年他似乎過得很快樂，他二十幾歲第一次來倫敦時，曾經被倫敦街頭萬頭攢動的熱鬧景象所嚇住，如今他可以悠遊自在行走在倫敦街道上，渾身是勁，跟年輕人沒有兩樣。他和馬克思以前一樣，住在一排大同小異的一間屋子裡頭——威廉·李卜克內希說，屋子的後院到處是煤煙，根本分不出碎石路和草地——這一整排屋子的前門看起來都一模一樣，他常常在晚上回家時會弄錯房門。來到倫敦之後，他結交了一些比較有趣的朋友，也比較有時間讀書寫作，當然，也更有趣樂的機會。馬克思的女兒艾蓮娜以前曾經去曼徹斯特他那裡待過一陣，她描述有一天早上他出門時大叫：「最後一次了！」他已經辭掉工作，傍晚時「我們站在門口等他回來，遠遠看到他走過田野……手中的拐杖在空中飛舞著，一路唱著歌走過來，臉上洋溢著愉快的笑容」。恩格斯搬來倫敦之後，他每個禮拜天都會在家裡款宴客人，這些客人大都是來自各階層的聰明才智之士，或是一些

對社會主義運動有貢獻的人士，大家在此可以高談闊論，盡情抒發己見。他的地窖裡總是塞滿一大堆波爾多紅酒，他也常常送這些酒給馬克思喝。經常是大家在高談闊論、酒酣耳熱之際，恩格斯會當眾高歌一曲，他很喜歡唱一首叫做〈布雷的牧師〉(The Vicar of Bray)的英國歌曲——他說從這首歌可以學到很多英國歷史——然後他就把這首歌譯成德文。聖誕節前的兩個禮拜，他會把所有熟識的女士請來家裡，他把一大堆的蘋果、胡桃、葡萄、杏仁以及橘子等扔進一個大桶子裡，然後請這些女士們把桶子裡的水果搗碎，伯恩斯坦說：「晚一點的時候，男性客人們來了，他們必須從桶子裡拿起已經準備好的長杓子，然後在桶子裡把搗碎的水果攪弄三圈——這的確不容易，必須手臂的力氣很夠才行。當然，這個動作只是具有象徵的重要性而已，力量不夠的人就免除不必做了。最後由恩格斯本人結束這個遊戲，然後他就去地窖裡取出香檳酒，大家圍坐在廚房裡喝香檳酒慶祝聖誕節。」到了聖誕節那天，他從木桶裡取出搗碎的水果做成布丁，分送給每位朋友，當天就在家裡款待大家吃聖誕大餐，大家吃著熊熊燃燒著的布丁。

他對馬克思始終忠心耿耿，任何和馬克思有過節的人他絕不寬容。自從《全民英國》這件事之後，他再也不跟辛德曼來往，其他任何傷害過馬克思的人，他再也不肯理會他們。他繼續對抗拉薩爾派的人，至於威廉·李卜克內希，他曾經否定馬克思所寫《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也因而拒絕和他來往。除此之外，任何團體要求他任何事情或詢問任何事情，他都會溫和待之。梅林說過，恩格斯一直都很贊同拉薩爾派的人所採取的務實政策，先讓德國勞工階級爭取到選舉權和參政權，其他政策和教條的問題留著以後再談。他同時寫信給索格，要他先不要急著出版馬克思批評亨利·喬治的書，因為喬治想代表「聯合勞工黨」(United Labor Party)出馬競選一八八六年的紐約市長，他認為喬治終究會妥協的，而且，同時「群眾的運動要依不同國家的不同環境去推行，這不是一條直線的

道路，先挑起群眾的意識才是最重要，其他都是次要」。

他現在顯然以馬克思主義的掌門人自居，但他變得比以前更溫和敦厚，許多對他的讚譽蜂擁而至，他卻自認承擔不起。一八八九年，德國的「社會民主勞工黨」創立「第二國際」，一八九三年的夏天舉行會議時，他親自前來參加，當時反社會主義條例已經廢除，他終於可以回去德國，社會主義者就邀請他前來參加這次的會議。當他坐火車穿過萊茵地區，從火車上看到科隆大教堂的尖塔時，他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他說：「多美的地方，能住在這裡多好啊！」這次會議在瑞士的蘇黎世舉行，當他走入會場時，群眾的歡呼聲讓他感到受寵若驚，他在俄國社會主義者阿塞洛(P. B. Axelrod)家裡接見一群來自俄國的小同志，他說，他們的眼睛實在很美，「但是其中最可愛的一個，」他寫信給他的弟弟如此說：「則是來自維也納的一位工廠小女孩，她的臉蛋和丰采真是少見的迷人。」他後來寫給索格的信這樣說：「那些人真好，可惜我實在承擔不起——真高興已經過去了。」他還說下次一定要事先寫信給他們，不要為他如此鋪張，「免得到時候又要在眾人面前好像招搖過市一般，只有議會的議員和大演說家才配享受這種尊榮，我根本就沒資格，我的工作配不上這種榮耀。」

他一直想要努力把《農民戰爭》一書加以擴大成爲一本堂皇鉅著，這將牽涉到德國整個歷史的問題，但是《資本論》一書遺稿艱巨的整理工作卻耗去了他最後十二年的時光，但也只整理到第三卷而已——這一卷討論到「勞動價值理論」——到了一八九四年十月，也就是他死前的一年，他把所有剩下的資料全部移交給考茨基。

說來實在也是十分諷刺，恩格斯最後還是必須接手馬克思丟給他的兩顆最燙手的山芋：「辯證法」和「勞動價值理論」，而這兩樣東西正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靈魂所在。恩格斯曾經受馬克思之託寫些「反擊柏林哲學家杜林的論戰文章，杜林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體系可說一無所知，但是

在年輕一代的德國社會主義者之間卻有相當的影響力。恩格斯想為辯證法辯護，即使有馬克思做後盾支撐，他的書卻未展現該有的說服力。不久，馬克思死後，他必須為年輕一代社會主義者解答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疑惑。馬克思自己曾以尖酸刻薄的筆調描述馬克思——黑格爾辯證唯物主義的唯物特點，掩蓋了烏托邦主義不務實際的一面，並且對中產階級宣判死刑，可是同時卻對自己的許多盲點視若無睹，然後又不願意進一步仔細檢視自己所提的一些論點。在《資本論》的序論中，他一樣不肯好好闡述一下他的歷史唯物觀點，反而變本加厲更加重其嚴酷的外貌。現在恩格斯則必須為他收拾善後，盡其所能把這件事情說清楚，我們發現，恩格斯早期所吸收的老式德國理想主義慢慢又回流進入他們的辯證法了。我們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命中的不同階段總是有其不同的思想偏向，而辯證法的詮釋之所以如此分歧不一，顯然即導因於此，以及兩人在氣質上的差距。

另一個是「勞動價值理論」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爭議也很多，恩格斯至死都在努力為這個理論作辯護，但卻始終沒法完成他的工作就死了。他現在罹患食道癌，已經不能開口講話，只能用寫字溝通，他在黑板上用粉筆寫字來告訴朋友他心裡的想法，他說他正以「苦行僧和幽默的功夫」在忍受他的痛苦。

他把遺產分為兩份，一份給馬克思的女兒，另一份給麗絲·彭斯的表妹（她一直抗議這份遺產分配不公，希望多分一點），另外兩萬馬克捐給黨，然後他寫信給倍倍爾要他「好好保管一切，……不要落入普魯士人手裡，當你覺得已經處理妥當時，就好好為自己喝一瓶好酒吧，別忘了順便記上我一筆」。他同時囑咐處理他遺體的方式，火化之後將骨灰撒入大海。在一個淒風苦雨的秋日裡，他的朋友們將他的骨灰撒入英格蘭的外海。

在威廉·李卜克內希的回憶錄中有一段文字描寫一件夢魘一般的故事，篇幅很長，想必這段故事對他具有某種特殊意義。他描寫有一次他帶馬克思的兩個女兒去倫敦市區看威靈頓公爵的葬禮，當時一個七歲，另一個八歲，臨出門前她們的母親還特別叮嚀路上要小心，不要讓兩個小女孩陷在人群中迷失了。威靈頓公爵的葬禮盛況空前，倫敦街頭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群，真是萬頭攢動，人聲鼎沸。長長的送葬行列在他們面前緩緩通過，正當他們準備要離去時，人群突然往他們這邊蜂擁過來，李卜克內希緊緊抓住兩個小女孩的手，努力想排開蜂擁過來的人群，但人實在太多了，他根本無力阻擋，他想把兩個小女孩放到自己肩上來，可是她們已經被人群擠壓得動彈不得，他只好兩手分開分別抓住她們的手腕，人群推擠的力量越來越大，這時他知道如果不放手，她們的小手臂可能會被他扯斷，他只好把手放開，這下子好了，兩個小女孩不知被人群擠到哪裡去了，他只聽到人群中的叫喊聲，卻看不到兩個小女孩的蹤影，他心裡開始發慌，他不斷在人群中推擠，想擠出一條路來，後來終於擠到一旁比較空曠的地方，還是看不到小女孩的影子，他真正感到害怕起來，突然背後有小女孩的聲音叫他的綽號：「圖書館！」他因為很有學問，大家都叫他「圖書館」（共產黨的小孩叫大人同志時不能稱先生）。兩個小女孩出現在他面前，他真是喜出望外。晚上回來時，他沒對馬克思夫婦提這件事情，據說那天有一些婦女在人群中活活被擠死。

這件事情在威廉·李卜克內希看來顯然具有某種深層的意義，在那樣混亂的場面中，他想起在放逐生涯中燕妮如何把他拯救上來，可是他可曾預先看到他自己的小孩卡爾·李卜克內希(Karl Liebknecht, 1871-1919, 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左派領袖之一、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在未來的混亂世界中，做父親的如何挺身而出來保護他呢？顯然，身為反對分子的後代，他們未來的命運可能正如他自己，在威靈頓公爵的葬禮中所經驗到的，將要在一片混亂中受苦受難。

燕妮·朗格死在她父親之前，而她自己的一個小男孩也是在馬克思死後六天跟著死去。艾蓮娜是家中最年輕的女孩，大家都叫她「杜茜」，父親死的時候她剛好二十八歲，她是家中小孩中最聰明的一個，馬克思很疼她，她剛出生不久時，她前面的一個小男孩艾德加(Edgar)死了，她從小就像個男孩，剛好填補了馬克思失去了小兒子的遺憾，她長大以後竟成爲馬克思的最佳助理人選，他是他的秘書、伙伴兼護理，她了解工人運動，她爲父親處理一切通訊事宜，掌握所有工人活動的線索。她十六歲時，有一個叫做李沙加雷(H. P. O. Lissagaray)的法國社會主義者(他曾寫過一本關於巴黎公社的歷史著作)愛上了她，並且跟她求婚，她自己有些心動，母親也不反對，可是馬克思不知是否出於自私心理，竟以對方性格不穩定爲由而加以婉拒了。她後來在寫給奧立夫·史萊諾(Olive Schreiner)的一封信中即隱約提到此事，她說：

如果你有機會來我家，見過我的父母，你就可以了解父親對我的重要性，也可以了解我對愛人和被人愛的渴望，以及我多麼需要別人的同情。我多麼了解我父親！多年來不幸的生活中，我們中間存有一層陰影……但我們的愛始終一成不變，我們永遠互相信賴對方。我也很愛我母親，她當然也愛我，但她不像父親那樣了解我，母親死的時候，我感到悲傷極了，覺得以前對她不夠好，但是爲了讓父母高興，我也犧牲了自己的黃金年華，至於父親，他一直很信任我——我們的本性是那樣的相像！

的確沒錯，她是所有女兒當中最像馬克思的一個，她有一頭黑髮，一雙明亮烏黑的眼睛，額頭很寬，個子不高，身體寬廣。她很有活力，喜歡大笑，講話聲音宏亮，好像在唱歌。她很喜歡朗誦

台詞和表演，有一陣子馬克思還讓她去上戲劇表演課程，還說她適合表演「熱情的場景」。不久她慢慢將這方面的才能轉移到社會主義活動的公開演說上面，恩格斯在這方面也常常鼓勵她，倫敦東區的工人後來能夠組織成一勞工聯盟，她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每次他們開會她出現時，大家就會大聲喊叫：「我們的大師傅來了！」她同時教導一位叫威爾·桑諾(W. E. Thorne)的勞工領袖讀書寫字。她也參加了一八八九年倫敦碼頭工人大罷工的活動，馬克思死後，她幫忙恩格斯一起整理父親的遺稿，著名法國小說《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的第一本英譯本即是出自她的手筆，她同時為心理學家哈甫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 1859-1939，英國散文作家、醫生，研究人類性行爲，其著作《性心理學》被控爲淫書)翻譯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挪威劇作家、詩人，以社會問題劇著稱)的作品，也爲他所主持的「美人魚系列叢書」(Mermaid Series)編輯一齣伊莉莎白一世時代的戲劇《警告淑女》(A Warning to Fair Women)，可惜後來出版社換了老闆，順便換掉這位《性心理學》(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作者，覺得他的名字不適合出現在這個系列叢書上面，結果，《警告淑女》也就無疾而終了。

艾蓮娜是屬於一八八〇年代聰明前進的女性類型，是那種令當時英國人膽寒的前衛女性。貝翠絲·波特(Beatrice Potter, 1866-1943，英國兒童文學作家、費邊社會主義者)當時對慈善事業很感興趣，她當時還沒成爲席尼·韋伯(Sidney Webb, 1859-1947，英國經濟學家、社會史學家、費邊社會主義倡導者之一)的夫人，正在主編一本自由思想家的雜誌，一八八三年春天，馬克思夫婦剛過世不久，她和艾蓮娜在一次場合中見面認識，艾蓮娜聽說她的上任主編因爲褻瀆罪名去坐牢，覺得「非常生氣」，波特小姐在日記中寫道：

我無法和她爭辯，她不肯相信基督教之美……她認為如果真有基督這個人，他必定是個頭腦簡單個性溫和的人，他缺乏英雄氣概。她宣稱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人們不要去相信另一個神秘的世界，大家要努力為今生今世而活……她長得很清秀好看，穿著打扮卻很不講究，她同時有一頭黑色飄逸的鬢髮，一對眼睛充滿著生命力和友善的眼神，可是在這些底下則隱藏有一種不健康刺激生活的跡象，一種與麻醉劑有關聯的某些特徵。她獨自生活，但是和布拉德洛夫 (Bradlaugh) 俱樂部的人卻關係密切。

艾蓮娜在父親死後一年，即和上述俱樂部的一個會員過從甚密，而這個會員卻是一個有妻室的人。她當時在一個上流階級的寄宿學校工作，學校知道了這種情況之後就立即請她走路，她寫信給艾利斯說道：「我很需要工作，可是很難找得到，『體面的』人不肯聘我。」

她所有的朋友都勸她不要跟這個人交往，這個人名叫愛德華·阿甫林 (Edward Aveling)，是法國和愛爾蘭混血兒，是個年輕聰明的科學教員，同時也是「反宗教運動」(Socularity) 的發起人之一。他自從認識艾蓮娜之後，也熱心參與社會主義的活動，演講、寫文章和一起參加鬧事。然而，他同時卻是個不知廉恥的無賴——他倒是很像蕭伯納《醫生的困境》(Doctor's Dilemma) 一劇中那位狡猾而有才氣的藝術家路易斯·戴布達 (Louis Dubedat)。他長相很醜，但口才很好，相當有魅力，辛德曼就說：「他能夠像倫敦最帥的男人，在半小時之內把一位很美的女士迷倒——這種魅力他屢試不爽，因而樂此不疲。」可是他非常不可靠，特別是金錢方面，他會去住旅館不付帳就偷偷開溜，他到處借錢，甚至挪用公款，卻從不知道要還錢。另一方面他情感洋溢，頗有藝術家氣質，有一陣子他想去當演員，還跟一個劇團到鄉下去表演，他自己也寫了一些獨幕劇，給他自己和艾蓮娜一起表演。他很喜

歡享受，品味極爲奢華，始終都在追求個人至高無上的生活享受。

英國人會說「像阿甫林那樣的壞胚子實在不多見」，他要求加入辛德曼的「社會民主同盟」，但是他們的執行委員會卻不願意接納，最後由於艾蓮娜及馬克思生前一些法國和德國朋友的推薦才得以如願。恩格斯經常在家中舉行的晚宴他是常客，那是因爲艾蓮娜的關係，有時一些其他客人實在很討厭阿甫林，就說如果他來他們就不想來，恩格斯很疼愛艾蓮娜，就繼續讓阿甫林來參加晚宴而無視於他人的抗議。愛德華·伯恩斯坦每次跟費邊主義社的人提到阿甫林這個人，他們就裝腔作勢一番，說：「啊，他是個聰明的傢伙……我們不能否認，他對我們的運動頗有一些貢獻呢。」奧立夫·史萊諾寫給艾利斯的信這樣說：「我開始覺得阿甫林這個人很令人畏懼，說我不喜歡他仍不足以表達我對他的感覺，每次一靠近他，我就感到惶恐不安，每次一看到他就覺得畏怯萎縮……我喜歡艾蓮娜，可是那個傢伙就是令人覺得不舒服。」

阿甫林對艾蓮娜不忠實，他不久就失蹤了，一陣子之後卻又出現了，身染重病。艾蓮娜知道他已經和別的女人搞在一起，他開刀手術和養病期間，她還是寸步不離照顧他到病好爲止，這是一八九八年的事情。她寫信給蓮琴的兒子說道：「我越來越了解，行爲錯誤是一種道德病，……有許多人缺乏道德感，就像一些人耳朵聾了或近視或其他毛病一樣，我現在比較了解，我們不能因此而去責難他們，我們要想辦法治癒他們，要盡力而爲。」這看來似乎是艾蓮娜過去對她父親的忠誠現在轉移到阿甫林身上來，他們都有才華，卻老是爲錢煩惱——彷彿她以「道德感」取代「金錢感」似的。就在阿甫林病快好的時候，艾蓮娜卻突然服毒自殺了。那天早上她收到一封信，信中揭露阿甫林在失蹤期間，他的元配妻子死了，他就趁此和一個年輕女演員結婚了。艾蓮娜死的時候，只留下一張條子，上面只寫一句話：「這些年來的生活真是太悲哀了。」

艾蓮娜死了之後，把恩格斯遺留給她的錢全都留給了阿甫林，阿甫林帶著這筆錢和新婚妻子到別的地方享受去了。但是幾個月後他自己也死了——在陽光下，躺在安樂椅上面，手上還拿著一本書。

馬克思另一個女兒羅拉，前面已經提過，嫁給法國人保羅·拉法格，他們生過幾個小孩，卻沒有一個存活下來，據說是由於道德敗壞所帶來的報應。拉法格放棄行醫，有一陣子還開照相館，靠微薄的收入度日。他生性吝嗇小氣，法國的社會主義者都叫他「小雜貨商」，他曾經參加巴黎公社事件，還被選為內閣要員，但也許是能力所限，從未在位置上發揮過什麼效用。恩格斯死的時候留給羅拉七千英鎊之多，她就這筆錢分為十等份，她打算這筆錢一用完就夫妻兩人一起自殺。一九一二年，他們已經快七十歲了，有一天他們被發現死在床上，注射大量嗎啡而死。

要在人類社會之外建立屬於自己的另一套心靈和意志的大本營，所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夠慘痛的了。

燕妮·朗格有五個小孩，其中三個男孩及一個女孩存活了下來，這是馬克思僅存的後代，其中一個叫做尚·朗格(Jean Longuet)，在喬雷斯謀刺事件之後，成為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左翼領導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反戰運動中扮演一重要角色。他的兒子羅伯—尚·朗格(Robert-Jean Longuet)，也就是馬克思的曾孫，當我正在寫作本文之際，他正在摩洛哥辦一份雜誌，鼓吹當地居民起來反抗法國的軍事政權，自從一九三一年的大蕭條以來，法國人已經讓他們陷入百般悲慘的境地，當地政府為了保護自己國內的市場，已經犧牲了許多摩洛哥哥的產品了。

第三部

列寧：烏里亞諾夫兄弟們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看來，俄國除了是一隻怪獸之外，什麼都不是。早年在德國他們都聽過許多沙皇的恐怖事跡，一八四八年革命及辦《新萊茵新聞》時期，他們一致認為如果德國能和俄國好好打一仗，當有助於德國的統一以及帶來革命運動。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英、法兩國於一八五〇—五六年在黑海地區的克里米亞半島進行的對俄戰爭，阻止俄國在戰勝土耳其之後的勢力擴張)前夕，他們認為自從一七八九年以後，「整個歐洲實際上只剩下兩股勢力：一方面是俄國和極權主義，另一方面是革命和民主」。可是從實際上看，他們又免除了身為德國人的優越感，他們瞧不起斯拉夫民族。一八五二年，恩格斯正在學俄文，他寫信給馬克思說道：「我們兩人之中一定要有一个人懂得某些國家的語言、歷史、文學及其詳細之社會體制，因為我們很快即會和這些國家產生瓜葛。今天巴枯寧會變得那麼重要，那是因為沒有人懂俄文。老式的泛斯拉夫主義辯稱古代斯拉夫公社可以轉變成共產主義及俄國農民是天生共產黨的說法，可以被充分駁斥。」這之前赫爾岑會說過，俄國在這些原始公社中的根基，注定她有一天會把共產主義帶給歐洲，恩格斯對此還頗不以為然。

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確信俄國遲早會爆發革命，那是亞歷山大二世即位，爆發一連串農民

暴動及貴族的憲政要求之後，不過他們對俄國人捉摸不定的意識形態仍持懷疑態度，一八六八年國際工人協會的一次會議之後，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這樣說道：「巴枯寧先生似乎有意把整個工人運動納入俄國的麾下領導……他們標舉的『唯心主義』是我們的協會所沒有的，俄國式的唯心主義！」

接著在一八六八年秋天，馬克思聽說他的《資本論》俄文譯本已經在聖彼得堡出現，他著實大吃一驚。他起先期待英譯本會首先出現，可是終其一生，這個期待終究還是落空。現在俄文譯本搶先出現，而且是緊接在原著出版的次年，顯然是第一個外語譯本。「命運真是捉弄人，」他寫信給庫格曼這樣說道：「我用德語、法語和英語跟俄國人奮戰了二十五年，他們畢竟才是我真正的『主顧』。」他接著有感而發：「俄國人總是不斷在追求我們西方所提供的激勵思想，他們真是一群『識貨』的行家。」

由於這個緣故，馬克思開始真正密切注意俄國的動向，他這時開始學習俄文，並且將俄國的問題納入《資本論》第二卷的中心主題，但是，馬克思似乎從未真正了解過俄國。

一八八一年二月，一位年輕的俄國女馬克思主義者薇拉·札蘇利區寫信給馬克思請教他一件事，她詢及他在《資本論》一書中，是否暗示以農為主的俄國一樣必須經過資本主義剝削的所有階段之後，才能期待產生革命，這個問題在當時確實把馬克思給難倒了，他擬了幾個草稿卻遲遲無法回信，可見這個問題顯然超乎了他的想像範圍，似乎也是馬克思在行將就木之年最為難的一個問題。恩格斯在一八五二年的信中斷定俄國的農民公社完全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的基礎，但馬克思並不這麼篤定。馬克思答覆說，他在《資本論》中所說的現象，乃是針對西歐國家的問題而發，特別是一個人勞動的私有財產轉變成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問題，這當然不包括東歐國家古老的社區經濟制度。在他所擬的答覆草稿中，他本來打算好好深入鑽研此一問題，他草擬了幾個與事實相反的假設：

俄國在一夜之間建立了西歐國家必須經過幾百年才能發展出來的現代金融系統，俄國從西方引進最先進之機器裝備及農耕技術，在廣大田地上「進行大規模的有組織的集體農業耕作」。畢竟，他年輕時，就在特利爾家鄉附近一帶看過從中世紀遺留下來的農場遺跡。然而，事實正好相反，在俄國解放農奴之後，農人首先面臨課稅和舉債的壓榨，最後依然是一窮二白，土地全又被剝削殆盡，如同回到了羅馬帝國晚期農人的處境一樣，這個問題似乎只有革命一途才能解決。

最後馬克思簡單而謹慎的回覆對方的問題，他說他認為農人社區組織在俄國將是發展新社會的最有利方式，「但是這種方式如要順利發展，首先必須排除所有阻礙這種發展的不利要素。」

恩格斯於一八七四年答覆俄國人卡糾夫(P. N. Tkachov)的詢問時表示，俄國要以革命方式發展農人社區組織，其先決條件是西歐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已經成功，這才能給他們提供有利的環境。一八八二年，《共產主義宣言》第二種譯本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中就說，如果能夠早日打倒沙皇，西方世界的革命會適時跟進，這將有助於促進上述農人社區組織的發展。

馬克思的著作在一八八〇年代和一八九〇年代初期吸引住許多俄國年輕人，這些年輕人中間有兩兄弟是來自伏爾加河(Volga，位於俄國西部)上的西姆畢斯克省(Simbirsk)，一位叫做伊利亞·尼古拉維區·烏里亞諾夫(Ilya Nikolaevich Ulyanov)的小學校長家裡。

伊利亞·尼古拉維區本人是個既有個性又有能力的人，他由於在工作上績效卓著，而能在地方議會上占有一席之地，並得到可以世襲的貴族頭銜。然而他的出身只是亞斯特拉汗地區的小中產階級而已，而且長相又不好看，手指很短，顴骨很高，鼻子扁扁的。他的父親很年輕時就過世，什麼都沒遺留下來，伊利亞的哥哥必須一個人挑起維持家計的重擔，他犧牲自己的前途，努力工作和縮

衣節食，爲的是讓當時七歲大的伊利亞能順利完成初等教育，然後進入卡山大學（University of Kazan）就讀，伊利亞沒有辜負大哥的期望，他順利讀完大學學業，取得了物理和數學的教書資格。

伊利亞的大哥所具有的這種勤勞、嚴峻及奉獻之精神，可以說爲未來烏里亞諾夫一家的發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而這種特質絕不是我們一般外國人所看到的俄國樣子所能理解的，要了解這個獨特家族的作風，他們如何過一種秩序和紀律的生活，如何維持自我節制和嚮往教育的熱誠，我們不妨回憶一下早期新英格蘭地區那種儉樸生活及高思想水平的習慣，即可了解一二。不久，這個家族又加入了一位帶有德國血統的女人，名叫瑪麗亞·亞歷山卓娜·白朗克（Maria Alexandrovna Blank），她是俄德混血兒，家族信仰路德教派，從小在德式傳統中教養長大，她的父親本來是醫生，後來買了一塊土地經營農作，就放棄了行醫，整體而言，她的家庭在文化教養的層次上似乎比烏里亞諾夫家族高些。然而，就瑪麗亞自身的處境而言，她並沒有什麼優勢，由於家道中落，她的父親無法像教育家中其他小孩那樣，爲她聘家庭教師教育她，最後全家都還必須投靠她的一位德國姨媽，這位姨媽親自教她讀書識字及音樂。這個家庭成員很多，但紀律很好，每個人都知道節約自制，父親對小孩管教極嚴苛，比如就嚴格禁止瑪麗亞和姊妹們喝咖啡或茶，即使長大了也是一樣。她們每個人只能擁有兩套白棉布做的衣服，短袖低領，不分冬夏，只能就這僅有的兩套互相替換。

伊利亞和瑪麗亞於一八六三年結婚，當時男的三十二歲，女的二十八歲。一八六九年，伊利亞成爲西姆畢斯克省的小學督學，全家搬往省會所在地西姆畢斯克（如今已改名爲烏里亞諾夫），不久，伊利亞成爲小學校長——他只醉心於工作本身，對仕途並無野心——他在這個位置上做了許多舉足輕重的貢獻。整個俄國此時剛宣布解放農奴不久，除此之外，亞歷山大二世就位的最初幾年，在司法和教育方面也做了許多重大改革，這使得像伊利亞這種人能夠發揮所長，大肆表現一番。伊利亞

成長的過程始終籠罩在尼古拉一世的高壓政策之下，大學時代，他常會和一些同學偷偷聚會，並且高唱十二月黨人里列耶夫(K. F. Rylyev)所作的歌曲，現在他有時帶著小孩離開市中心到林中散步時，他會對著自己的小孩唱這些歌曲，其實，他一直是個忠誠的公務人員，他和妻子也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但在西姆畢斯克一帶卻以「思想自由」著稱，只不過因為他過於熱心爲人服務，這方面的傾向竟經常被人所忽略了。他常會義務爲窮人的子弟補習功課以應付考試，現在他開始努力爲西姆畢斯克地區建立正規學校制度而到處奔波，全年不分春夏秋冬，不論颳風下雨，他必須在省境內四處周旋，他要和官員打交道，和教師磋商，晚上睡在偏遠的農舍，他能夠和各種人輕易來往相處，在十七年之間，在他努力奔波下，有四百五十所學校成立，入學比率增加兩倍以上。

在這同時，烏里亞諾夫家的小孩們也一天一天在西姆畢斯克的住家中跟著逐漸長大，西姆畢斯克這個小城坐落在伏爾加河一處高聳的河岸上，鳥瞰遼闊寬廣的伏爾加河面，大河緩緩流經一片廣大的平原，平原一望無際，而這座小城距離莫斯科五百六十英哩，距離聖彼得堡九百三十五英哩。城裡的建築從今天眼光看來顯得有些破舊凋零，淡色的磚瓦，白色的牆壁，一些老舊的房子還鑲有木頭的裝飾，顯得頗爲別出心裁，陡峭的街道上鋪有許多圓石塊，這裡是西姆畢斯克省政府的所在地，也是省裡官員的棲息之處。城郊的一些斜坡上有許多果園，這裡出產著名的伏爾加綠色小蘋果，春天來臨時有幾個星期的時間，這裡盛開各種花朵，據說這個時節西姆畢斯克之美乃全俄之冠，無與倫比。可是不久夏天來臨之後，到處是飛砂和爛泥，則又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惱人景色。

在烏里亞諾夫的時代，俄國的階級制度在西姆畢斯克一地的住家劃分方式可說表露無遺，在最高的地段，他們稱之爲「王冠」，住的是高階層人士，住家前面有美麗的花園，裡頭盛開著紫丁香，這裡住著兩種人：貴族和政府官員。貴族高高在上，趾高氣昂，俯瞰著低他們一層的政府官員，政

府官員則由上往下，分爲十四級。西姆畢斯克有其傲人之文化傳統，俄國十八世紀著名的大學者卡拉姆金(N. M. Karazin)有一陣子曾經住在西姆畢斯克，他是近代俄國語言和文學的始祖，他曾經模仿司各特的歷史小說風格寫了一本俄國歷史，大肆歌頌早期沙皇的輝煌事跡。另一位名人是作家岡查洛夫(L. A. Goncharov)，他是西姆畢斯克一位商人的兒子，他曾在京城中央政府裡做過大官，他筆下歐布洛莫夫這個角色可以說是墮落的俄國仕紳之最典型代表，至於克倫斯基(Крестьян)和烏里亞諾夫兩家則是西姆畢斯克在文化學術上的傑出產物。從「王冠」區往山下走下去是市場和一些大商家，許多生意人就住在大街上，最底下河岸的碼頭旁邊，住的則是最低等的小老百姓，他們和一些豬狗混雜在一起，擺設著一些攤位，賣香腸和低等劣酒。

烏里亞諾夫一家人起先住在「王冠」區的邊緣角落，他們顯得很不自在，伊利亞出身平民，瑪麗亞又是出身路德教派，他們與這些貴族似乎格格不入，與另一群政府官員也是無法水乳交融，這些高官顯貴對最近的一些改革措施表示強烈不滿，至於那些商人，他們也從不往來。瑪麗亞每天要忙許多家務，要想辦法如何節約家庭開銷。一八七〇年的四月二十二日，他們剛搬來西姆畢斯克不久，瑪麗亞生下一名男孩，取名爲弗拉迪米爾(Vladimir)——這是她的第三個小孩，第二個兒子之後她又生了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其中一個兒子不久死了。一八七八年，弗拉迪米爾八歲的時候，他們全家搬進了另一幢比較大的房子。

這幢房子今天還在，烏里亞諾夫姊妹們把室內整飾一番之後，已經成爲紀念館。從外面看去，這幢低矮的黃色房子坐落於看來像河床的寬廣大街旁，頗有幾分東方風味。走進去之後，我這位美國訪客頓時覺得這一切看來竟是那麼親切熟悉，以至於無法想像我是從美國波士頓老遠跑來這裡，現在回到了沙皇時代的俄國，我隨即想到在今天蘇聯境內竟存在著一個這麼乾淨和安寧，完全與世

無爭的地方。屋內的家具大都是桃花心木製成，就像你在祖母的房間內可能看到的樣子。客廳的天花板很低，擺設很簡單，有一架老式的大鋼琴，架子上擺著一本貝里尼(Vincenzo Bellini, 1801-1835, 義大利歌劇作曲家，作品以旋律優美抒情著稱)的《清教徒》(Parisi)樂譜，樂譜裡夾有一些已經乾了的羊齒類植物的葉子。兩個窗子中間桃花心木鏡框的鏡子和桃花心木的細腿桌子顯得很光潔明亮，和牆壁上的單調壁紙形成強烈對比——幾乎所有房間都是淡黃或淡灰色調。從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樹木上的綠色小葉子，顯然已經經過一番修剪。飯廳裡有一張大飯桌，上面覆蓋著一條鑲有花邊的白色桌巾，這大約也是全家人一起閱讀以及小孩做功課和下棋的地方，牆上掛著一幅地圖，旁邊有一台小裁縫機，有幾個書架，架上擺著左拉、都鐸(Alphonse Dauder, 1840-1897, 法國小說家，作品富於感情和幽默)、雨果、海涅、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 德國詩人、劇作家、歷史學家、文藝理論家)、歌德等人的文學作品，以及一些俄國的古典名著，此外，還有許多地圖和地球儀等等。

屋裡因為人口眾多的關係，所以整個房子顯得很大。樓上，最小的男孩和另外兩個最小的女孩睡同一個房間，你可以在房間裡看到他們的玩具和木馬，他們畫的圖和學校的獎狀，還可以看到一本一八八三年的雜誌，上面赫然刊載有《湯姆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最大的女孩自己睡另外一個房間，此外還有一個小房間，那是保母的房間，弗拉迪米爾出生時，家裡請來了一個保母。

同這一層樓上，有兩個房間與其他房間隔開，必須從另一個樓梯上來，這是兩個較大的男孩亞歷山大(Alexander)和弗拉迪米爾的房間，亞歷山大比弗拉迪米爾大四歲，弗拉迪米爾喜歡模仿亞歷山大，然後又喜歡和他競爭，每當家人問他早餐要吃麥片加牛奶或奶油時，他總是會說：「和沙夏(Sasha)」

一樣！」沙夏是亞歷山大的小名，他自己的小名叫弗洛迪亞(Valodya)，沙夏要去山上溜冰，他一定非跟去不可。他們的房間互通，卻是截然不同的風格，弗拉迪米爾的房間屬於希臘歷史學家色諾芬(Xenophon, 431BC-355BC)和羅馬詩人奧維德(Publius Ovidius Naso Ovid, 43BC-17AD)的世界，亞歷山大的房間稍大些，卻是達爾文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英國博物學家，第一個提出人類起源問題，支持達爾文主義)以及史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和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邏輯學家，為實證論和功利主義者)的世界，而且房間到處是做化學實驗用的器材。他們洗臉用的毛巾掛在牆壁上，每當他們的表兄弟姊妹來他們家玩，闖進他們的房間時，他們會說：「承蒙光臨，無限歡迎。」

亞歷山大的個性很堅強內斂，他小時候從來不哭，長大之後變得很含蓄持重，他的個子很高，長相也好看，可是目光卻顯得陰沈而哀傷。在學校讀書時，他是模範學生，功課永遠保持名列前茅。他後來不肯再相信宗教，卻始終不願跟家人說明原因，有一天晚上，父親問他要不要去參加晚禱，他只說一聲「不要」，之後父親就不再追問原因。他很喜歡杜思妥也夫斯基(F. M. Dostoevsky, 1821-1881，俄國作家，作品反映小人物的痛苦、社會上的不平等，代表作有《罪與罰》、《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小說，但他決定研究科學。

弗拉迪米爾跟他不一樣，他喜歡屠格涅夫，他常常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反覆讀屠格涅夫的小說。他喜歡吵鬧，精力很旺盛，很愛挑釁。他有一頭紅髮，顴骨很高，有一點斜眼，很像亞斯特拉汗一帶的韃靼人。他小時候很遲鈍，很遲才學會走路，也許如他的姊姊所說，因為他的頭太大了，他同時也粗手粗腳，每次玩具一到他手裡便立即加以摧毀。他不像哥哥亞歷山大那麼老實，他有些狡猾，

有一次他在姨媽家裡把一個盛水的瓶子打破了，他跟姨媽撒謊說不是他打破的，三個月後一天晚上母親哄他睡時，他知道不會有事，這才哭著跟母親招認這件事情。他很喜歡捉弄妹妹和弟弟，有一次母親彈鋼琴，一群小孩圍著她唱灰狼和小孩的故事，當大家唱到悲傷的部分時，最小的米提亞(Mitya)會忍不住大哭起來，其他人會安慰他，但弗拉迪米爾會更進一步加油添醋，讓他哭得更厲害。

弗拉迪米爾入學以後在功課上的表現雖然不如亞歷山大，但大致上也算相當不錯，他的領悟力很強，學習新事物的能力也很強，所以他回家以後通常不必再花時間在功課上面。但是他有一次公然捉弄法語老師，所以這門功課的分數很低，這使得他的父親相當懊惱。大約十五歲左右，他就不再相信宗教，他把身上戴的小十字架扔了。他對科學的科目不感興趣，但歷史和古典學科卻很強，特別是拉丁文，他可以為他的姊姊安娜(Anna)和另一位同學補習拉丁文，讓他們在兩三年之內完成了八年才能讀完的課程。

亞歷山大二十歲，弗拉迪米爾十六歲的時候，他們的父親竟突然去世了，他經常工作過度，他當時已經當上全省的督學長，工作十分繁重，必須經常為各個學校的校長解決許多問題，可是現在他在教育工作崗位上服務了二十五年之後，由於一八八一年發生謀刺亞歷山大二世事件，他的教育改革工作立即遭遇重大挫折，教育經費面臨減縮，他發現工作做不下去，就提前四年宣布退休。後來上任的主管雖然要求他回去繼續工作，但他對教育工作已經心灰意冷，特別是一八八四年新上任的教育部長頒布一項新的教育法規，規定學校不准聘任有「自由思想」的教師，並且開除「不可靠」的學生，同時規定「廚子的小孩」不准接受教育，伊利亞·尼古拉維區氣得中風而死，他死於一八八六年一月。

父親死後，弗拉迪米爾變得更目中無人，以前父親管教很嚴，現在他自由了，甚至對母親都開

始放肆起來，有一次他和亞歷山大在下棋，母親要他做一件事情，他隨便應了一聲，然後繼續下他的棋，這時亞歷山大就要求他馬上去做母親要他做的事情，否則立即停止玩棋。另外一次，傍晚時分，其他小孩都在院子裡遊戲，透過窗子，他們可以看到弗拉迪米爾和亞歷山大坐在屋裡下棋，兩人靜靜坐著，一動不動，聚精會神看著棋盤，最小的妹妹跑到窗子，大叫道：「他們兩人坐在那裡，好像被宣判苦刑的犯人！」兩兄弟這才突然轉頭望向窗子，這時小妹妹一溜煙跑開了。

其實，這時候兩兄弟的感情也變得沒以前那麼親密了，亞歷山大去聖彼得堡讀大學，有一次大姊安娜就問他：「你認為我們的弗拉迪米爾現在該怎麼辦呢？」亞歷山大回答說：「這不會有問題的，他的能力很強，只不過我們之間並不互相了解。」

亞歷山大研讀動物學，他寫信給母親說他剛剛因為一篇研究環節昆蟲的論文而獲得一個獎章。他和大姊剛去聖彼得堡讀大學時，父親給他們兩人每個月各四十盧布的生活費花用，他告訴父親說他三十盧布就夠了，但父親還是每個月給他四十盧布，他每個月把多餘的十盧布存下來——他當然沒提，怕引起安娜不高興——等到八個月後學期結束時，他就退還八十盧布給父親。

父親死後隔年三月裡的某一天，一位女教師來到弗拉迪米爾唸書的學校，給他看一封她剛收到的從聖彼得堡的親戚寄來的信，信上說亞歷山大因為參加謀刺沙皇，已經和一批學生一起被逮捕了，這些學生年紀最大的二十六歲，最小的二十歲。信中充滿恐怖的語氣，謀刺的一共六個人，亞歷山大是最後一個被捕，他因為懂得化學，被分派製造炸彈的任務，他被捕的時候，他的姊姊安娜剛好也在他那裡，就一起被抓走了。她平時跟弟弟雖然很親近，但是對他的政治活動卻一無所知，她只是事後才想起來他曾跟她提過他聽來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勇氣去幹那種事情，我想我沒這個膽量。」

弗拉迪米爾一直在猶豫不知如何跟母親報告這個消息，他想一個人偷偷上京城去打探事情的虛實，但這時瑪麗亞看到了這封信，她決定自己去。當時鐵路尚未開闢到西姆畢斯克，這趟旅程有一部分必須騎馬。弗拉迪米爾想找一個人陪伴母親一起上京城，然而，這時大家都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都避之唯恐不及，最後瑪麗亞只好自己一個人上路。

瑪麗亞到月底終於獲准見到亞歷山大，她來到彼得——保羅監獄，在會客室中隔著兩道欄杆和兒子講話。她在聖彼得堡停留了一個多月，除了在監獄裡會見兒子和女兒之外，每天到處奔波求情。審判時她獲准出席旁聽，亞歷山大既不是主謀，又沒實際參與行動，理當不致死罪，但是在庭上他爲了開脫其他同伴罪名，竟自己一個人扛下所有罪責，他在庭上滔滔不絕陳述自己的政治理念，這倒讓他的母親感到相當訝異，想當年離家赴京求學時，看起來還像個少不更事的青少年，現在她眼前所見卻已經是個充滿英雄氣概的大人模樣，她越想越覺難過，就悄悄起身離席。她繼續跟當局求情，期盼能爲兒子求得無期徒刑，至少能夠暫時保住性命。五月初的某一天，前一晚她還在獄中見過兒子，那天她在街上看到報紙，才知道亞歷山大已經被吊刑處決掉了。

幾天之後安娜無罪開釋，但放逐到她外公的家鄉，瑪麗亞黯然回到西姆畢斯克，她必須裝出若無其事的样子，她要讓其他小孩怡然自得繼續生活下去，鄰居也都佩服她的堅強，但卻逐漸疏遠了，親戚朋友沒有人繼續再跟他們來往，一位小學老師，是伊利亞生前的好朋友，以前常來跟伊利亞下棋，從此以後再也不來了。

弗拉迪米爾此時正準備他的期末考試，考試結果成績相當好，學校老師不得不頒發金獎章給他，但大家都已經知道他哥哥發生什麼事了。

他這時已經十七歲，必須扛起一家之主的責任，安娜說，亞歷山大的事件之後，他變得非常「無

情」，如同學校的校長克倫斯基所說，學校的許多老師都認為他「極為含蓄」和「不合群」，他不管和誰，「熟識的人或學校裡的老師，都保持著冷漠的態度」。這不知道是不是傳聞，托洛斯基說，當他聽到哥哥被處決時說：「我們絕不會和他走相同的路線！」不過，有一件事可以確定，如安娜所說，由於他哥哥的死，他開始認真考慮革命的問題，他曾對帶給他亞歷山大被逮捕消息的那位女教師說：「這麼說來，這是亞歷山大唯一能選擇的道路了。」

一八八〇年代對烏里亞諾夫一家人而言的確是一段難捱的歲月，新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於一八八〇年代初亞歷山大二世遇刺之後即位，基於前任沙皇的悲慘下場，他即位之後就停止一切改革政策，首先他否決掉設置諮詢機構的提議，亞歷山大二世時代爲了配合教育階層的要求，曾打算設置此種機構，他如今取消此一決策，等於完全阻隔了從民間傳來的任何意見。此外，他強化希臘正教教會的權力，並相對削弱地方議會的權力，把農民社區組織納入獨裁管理，同時盡其所能阻塞西方思潮的滲入，強制屬地內所有德國人、波蘭人和芬蘭人都要講俄語。亞歷山大·烏里亞諾夫曾爲他的同黨草擬了一份政黨大綱的文件，沙皇當時在文件上批上他的相反意見，大意是說當今的政權並無可議之處，不會挑起任何百姓之不滿：「大可放心矣。」

如今弗拉迪米爾發現他自己的前途並不樂觀，學校的校長克倫斯基出面爲他做擔保人，保證這個小孩曾在父母嚴格調教下，有過「相當嚴格的宗教和理性的訓練」，絕無叛逆之傾向，同時更保證，這個小孩如能進大學，他的母親將隨同陪伴，以盡監督之責。聖彼得堡警局局長跟他們建議，把這個小孩送去外省偏遠地區讀大學。

最後經過安排的結果，他們同意讓弗拉迪米爾進離伏爾加河一百五十英哩的卡山大學就讀，瑪麗亞帶著另外三個小孩搬去卡山跟他住在一起。弗拉迪米爾首先進入法律學院就讀，但是他發現一

進入大學之後，他哥哥事件的陰影立即籠罩過來，學生鬧事所帶來的後遺症在各地餘波盪漾著，甚至影響到了學術機構的運作，有自由思想的教授紛紛被解聘，有嫌疑的學生則一概開除。十二月中在莫斯科又發生一連串學生搗亂的事件，一路波及到卡山大學這邊，這裡的學生召開會議，要求大學督學出面參加會議，同時要求恢復學生被剝奪的權利。那天夜裡，警察來到瑪麗亞家裡把弗拉迪米爾帶走，他曾參加學生遊行，雖然未扮演什麼重要角色，但他是暗殺沙皇兇手的弟弟，身分特殊。不久，他被學校開除，並且驅逐出卡山鎮。

他去外公的家鄉找他的大姊安娜，後來全家也跟著搬去那裡，隔年春天，他申請要求回卡山大學繼續讀書，但遭到教育當局拒絕，教育局的官員在申請書上批問：「這不是烏里亞諾夫家的另一個孩子嗎？也是從西姆畢斯克來的吧？」那年秋天他申請到國外繼續唸書，一樣遭到回絕，不過當局則同意他們回去住在卡山。

這次他們搬回卡山住在城郊一處山上的兩層樓小公寓裡，這裡充滿一種東方古城的風味，有許多仍操韃靼語，就在這個時候，弗拉迪米爾開始接觸馬克思寫的東西。

這段時期也正是俄國傳統政治觀念開始瓦解的時候，自由派的貴族由於穀物市場的世界性危機，必須仰賴沙皇的幫助才能安然渡過難關，這時他們變成不再是自由派了。一八八〇年代，擁有大地主身分的大文豪托爾斯泰企圖把自己的財產分給窮人，過著無拘束、禁欲、靠自己雙手勞動養活自己的一種新的基督教生活。一八七〇年代的主要政治活動是「人民意志黨」(Party of the People's Will)的大肆活躍，他們企圖以俄國傳統叛亂和暴力方式把農民組織起來，並將之附屬於巴枯寧的社會主義，然而由於麥子的價格上揚，許多農民得到大量好處，生活獲得大幅度改善，要挑起他們的

顛覆叛亂一時之間竟變為不可能，而且巴枯寧在西歐所帶動的社會主義活動始終無法和這裡的農民社區組織互相掛鉤。不久，沙皇開始大肆捕捉「人民意志黨」的成員，許多人紛紛下獄或遭放逐，最後他們訴諸恐怖主義來和當局對抗，終於謀刺亞歷山大二世得逞，但是走了一個壞的，卻又來了一個更壞的，在當時亞歷山大·烏里亞諾夫這一批年輕人心中的想法是，只有謀殺一途，把新上台的更壞的一起幹掉，他當時在法庭上的審判時這樣說：「我們沒有可以好好聯結在一起的階級以對抗政府……我們的知識分子既無能又無組織，在現階段絕無從事戰鬥之可能……他們又無群眾基礎之支持……所以只有藉恐怖主義的手段來保護他們的權益。」

事實上亞歷山大·烏里亞諾夫這次的事件可以說是最後一次的恐怖主義手段，在此之前，暗殺亞歷山大二世成功的那群人可以說實現了奈查也夫的瘋狂夢想：爲了達到顛覆目的，有人願意出來犧牲奉獻。然而其領導者總是在目的達到時跟著犧牲成仁，新一代的年輕知識階層遂缺乏領導人手，亞歷山大·烏里亞諾夫跟他的伙伴便面臨了這樣的問題，他說他們唯一可行的方法只有恐怖主義手段，但現在連這個手段都不通了。他讀過馬克思，這從他所草擬的黨政大綱中可以看出來，但他認爲現階段的俄國除非沙皇垮台，否則馬克思主義者就無法在俄國推動工人革命，如今，弗拉迪米爾自己也讀起馬克思來了，他在這裡頭發現到了確實可行的辦法了。

自從「人民意志黨」的時代以來，俄國在工業方面的發展，雖然遠較西歐國家落後許多，卻大大超越在馬克思所曾預期的標準上面，他從不認爲俄國可能抄到捷徑，可以直接從農業社會一躍而達到工業社會的社會主義境界。從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九七年這二十年之間，俄國在紡織品方面的產量增加了兩倍，鋼鐵增加了三倍，在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七年的十年之間，其紡織工人從原來的三十萬人增加到六十萬人，鋼鐵工人從原來的十萬人增加到十五萬人。一八八〇年代引發過多次罷工

事件，雖然都被壓制下來，卻也因而催生了一些基本的工廠立法：工廠檢查、廢除童工、限制青少年和婦女做某些危險性的工作，以及如期以現金支付工資等等（最後這項經常為雇主所忽略，不是薪資縮水就是拖延給付）。對弗拉迪米爾而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線曙光，照亮了他的視野，他認為這不但適合俄國的處境，世界其他地區亦然，而他認為自己的氣質更是適合成爲其代言人，他那銳利的頭腦、好戰的本性、偏好尖刻批評的傾向，以及不偏不倚的客觀感情等，可以說都與馬克思十分聲氣相通。

弗拉迪米爾坐在一間由廚房臨時改造的書房裡讀《資本論》第一卷，他的姊姊安娜描述他如何「坐在廚房的爐子上，底下鋪著一些舊報紙，聚精會神讀他的馬克思，一邊讀一邊做出強烈的手勢，然後興沖沖的跟我們說明馬克思的理論以及馬克思如何打開他的視野等等。」弗拉迪米爾有一項本事是馬克思所沒有的，安娜接著說：「他身上會不斷散發出一股信心，認定別人一定會接受他所說的一切，他有一種本事，他可以輕易說服別人接受他的意見，當他在研究某樣東西而有所發現或有所創見時，他會迫不及待拿來跟朋友共享，然後使他們認同他的看法。」卡山大學裡有許多學生常來聆聽他大談馬克思，但不是在他家裡，當時烏里亞諾夫家是個禁忌的場所，許多人不敢隨便登門造訪。那時候卡山地區的一位馬克思主義領袖，是個學生，叫做費多雪耶夫（Z. F. Fedoseev），年紀和弗拉迪米爾差不多，但他們卻從未謀面——托洛斯基說有一層理由可以說明這個現象，在當時即使是個堅決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會盡量避免和諷刺沙皇兇手的弟弟有所瓜葛。因此，弗拉迪米爾從未有機會讀到由一群躲到瑞士的俄國政治難民於一八八三年所創辦的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工解放」（Liberation of Labor）的刊物，然而，他卻已經接觸到了俄國一股新生的力量。

他現在既然已經被大學阻絕於門外，除了讀馬克思之外，居然無事可做——有時和弟弟下棋消

遣娛樂。他的弟弟說他棋下得極好，而且下棋的規矩很嚴，他不在乎輸贏，但一定堅守規矩，比如他下棋時可以讓步，卻絕不准對方回手，他堅守「起手無回大丈夫」的規矩。那年冬天（一八八八—一八八九），安娜的未婚夫為他安排和一位沙瑪拉(Sarala)地區的一位律師（是個高段棋手）以通訊方式對弈，弗拉迪米爾在這個時候學會抽菸，他母親很不高興，她說抽菸有害健康，他不聽，後來母親只好搬出經濟理由，當時全家靠母親的津貼在過活，他從此戒菸不抽。

另一方面，他的母親也很擔心他在卡山地區會惹上政治麻煩，剛好她在沙瑪拉鄉下地區曾委託安娜的未婚夫為他們購置一塊土地，地點就在西姆畢斯克底下的伏爾加河岸旁，她決定帶他去那裡生活一陣，以免他在卡山惹是非。他們離開得真是時候，就在他們離開卡山之後幾個星期——一八八九年五月——費多雪耶夫所領導的馬克思主義團體以及弗拉迪米爾所隸屬的一個團體，全被當局一網打盡，都判了重刑。

但弗拉迪米爾並不適合去鄉下當地主，「我的母親，」他後來告訴他的太太說：「她要我去鄉下種田，可是我學不來，我無法和農人相處。」在他看來，他無法忍受那種上屬和下屬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值得注意的一點，一九〇五年的一場革命中，這塊土地的下一個地主被農人殺害了）。當然，他很懂得如何和鄉下人周旋，他知道怎樣和他們溝通，比如，他能夠在深入交談中了解他們的生活情形以及他們心中的想法，他似乎遺傳到他父親早年和人溝通交往的特出天賦。他常常和他姊夫的弟弟聊天，對方是個富農，他懂得買土地然後再轉賣給農人，由此賺取暴利，弗拉迪米爾曾笑他說這真是一種狡詐的買賣，但是農人卻都很喜歡他。這幾年短暫的鄉下生活可以說是弗拉迪米爾唯一一次和農人的直接接觸，但由於他的細心觀察和研究，卻已經足以提供給他俄國社會發展的完整資料了，他同時也搜集許多地方上農業方面的統計資料，這跟社會主義黨所期待的仍有很大出入，但

他卻很高興，因為他藉此機會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他由此說明了俄國在解放農奴之後，農人有的成爲中產階級，有的則淪爲無產階級。

一八八九年的秋天，他向教育部長申請要求讓他以校外旁聽生的身分參加期末考，他解釋說他必須要賺錢養家，沒有大學文憑他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教育部長接到他的申請之後，就去警察當局查證他的資料背景，判定「他是個壞傢伙」而拒絕他的要求。烏里亞諾夫家的小孩很喜欢游泳，這段期間他們常常跑去廣場上的池塘游泳，有時一天兩次，弗拉迪米爾的弟弟說，他哥哥很喜欢把兩手枕在頭下躺在水上仰泳，他們在水上靜靜飄浮著，享受外省的寧靜生活。最小的妹妹說她很喜欢「微風從大草原上徐徐吹來，大地一片靜謐」的那種感覺。他們住在這裡就跟以前住在別處一樣，很少跟鄰人來往，如果家裡有人來訪，弗拉迪米爾就會偷偷從窗口溜出去。他在屋外的菩提樹下擺了一張桌子，每天上午都去那裡讀書寫字。晚上他們會泡一壺茶坐在陽台上讀書或下棋，安娜寫了一首小詩描寫他們秋日夜晚的生活情況，她描述許多飛蛾和蚊蟲從周圍黑暗中飛過來，聚集在燈下飛舞個不停，因爲天氣暖和，他們錯以爲夏天快要來了。

隔年五月，瑪麗亞親自上聖彼得堡向教育部長再一次提出申請，她寫說她「每天看著兒子無所事事，糟蹋大好青春年華」，實在是痛苦無比。這次終於有了結果，她的兒子獲准參加任何大學法律學院的期末考試。弗拉迪米爾這次跟母親一起來聖彼得堡，有機會買到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他在書中印證了所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他在一年半之內修習了一般人要四年才能完成的課程，至於他的讀書方法，從以下一件事情我們可以獲得一個概括的印象，一九一八年冬天的制憲會議上，亞伯特·萊斯·威廉斯(Albert Rhys Williams)曾問他讀書的方法，他當時正在學俄文，弗拉迪米爾就說：「要有系統，按部就班。」威廉斯說他的方法其實很簡單：「首先，先弄通所有的動詞，以及所有的

副詞和形容詞，然後把文法和句法規則加以融會貫通，最後隨時隨地跟人練習。」他這次上京獲准參加考試，結果在一百二十四人當中，他考了第一名。

然而，這時卻發生了另一件悲劇，他的妹妹奧爾嘉(Ольга)此時正在聖彼得堡讀大學，就在他上京來考試時卻染上了傷寒。她是家中女孩裡頭最聰明的一個，和弗拉迪米爾的感情也最親近，在鄉下的時候，他們經常一起讀書，一起談論一些嚴肅的話題。她很想讀醫學，可是當時的醫學院不收女生，她只好改讀物理和數學。她讀書很用功，即使生病了還是孜孜不倦——這似乎是烏里亞諾夫家的傳統——她甚至還要幫忙其他同學複習功課以應付考試。她病倒了之後，弗拉迪米爾帶她去醫院看病，情況很糟——誰都知道當時俄國的醫療水準極為落後。瑪麗亞再度上京來，卻是來見女兒的最後一面，她死的那天正是她哥哥亞歷山大被處決的周年忌日。

弗拉迪米爾在妹妹死後，覺得留在京城無事可做，只好跟母親一起回沙瑪拉鄉下。瑪麗亞對小孩的影響廣泛而深遠，他們小的時候，她從不對他們疾言厲色，也從不責打他們，但她對他們的愛也從不明顯表露出來。弗拉迪米爾一直想趕快脫離家庭，卻捨不得離開母親，他決定在鄉下多待兩年，好好陪母親。他還要花五個月的時間準備律師的資格考試，同時他跑去前述和他通訊下棋的那位律師那裡當助理，他出庭為一些小刑事案件的被告辯護，卻從未贏過，他唯一贏的一次是他自己出面控告一位地方上商人的案件，這個商人一向把持伏爾加河上的渡船並且非法勒索過河的人，他有一次向弗拉迪米爾強制要求坐他的船而不准坐別的船，弗拉迪米爾就親自出面控告他的非法行為。地方上的人對這個人早已厭惡至極，卻沒有人有辦法懲治他，而當局也不願意主動處置這個人，弗拉迪米爾這時不顧一切壓力，在法庭上控告這個人的惡劣非法行為，卻成功了。

一八九一年至九二年之間，饑荒和霍亂四處蔓延，許多知識階層的人紛紛下鄉，托爾斯泰當時

已經六十三歲，他率領家人率先投入鄉下的救災行動，時間長達兩年之久，他和他的兒子們設立幾百個給災民免費飲食的賑災據點，同時免費提供種子和馬匹給他們，以便他們能夠重整家業。當時，據說弗拉迪米爾是沙瑪拉地區唯一兩個不願意加入免費餐飲服務行動的其中一人，甚至也不肯加入救災委員會。他這個時期的立場如何，我們唯一能得到的資料是一位社會主義黨死對頭對他的控訴，他聲稱弗拉迪米爾坐視饑荒蔓延而無動於衷，乃是因為他想藉機期待俄國的農民崩潰瓦解，以利於建立工業的無產階級社會。托洛斯基的說法是，以當時情況而論，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極不合適加入任何政府的公職團體，革命的目的正是要對沙皇政府不斷施加壓力，直到把它擊垮為止。

誠然，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確已經為弗拉迪米爾建立起一套無情冷酷的信念。這時國外地區，英國碼頭工人大罷工行動正如火如荼，巴黎公社慘敗之後，法國的勞工運動也已經恢復元氣，隨著第二國際的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熾熱火花又再度燃燒了起來。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是「勞工解放」一派的領袖普列漢諾夫，他於一八八九年參加第二國際的第一次大會，在會上他以俄國為主題發表演說，他說：「俄國以勞工運動為主的革命運動必定勝利，沒有第二個可能。」一八七八年德國的俾斯麥曾經頒布反社會主義的法令，但不久之後，一八九〇年德國大選，社會民主勞工黨大獲全勝，得到一百五十萬票的選票支持，反社會主義法令自動廢除。聖彼得堡地區的工人把馬克思和拉薩爾的著作撕開為好幾個部分，大家熱烈互相傳閱。一八九三年，費多雪耶夫所寫的一篇馬克思主義論文在沙瑪拉一帶四處流傳，這篇文章首度揭示以馬克思主義套用在俄國特殊處境的論點，費多雪耶夫研究過亞歷山大二世時代俄國農民的狀況，他認為自由派的人士總是把農奴的解放這件事情歸諸亞歷山大二世的開明思想，其實這是毫無關係的，這項改革背後的原動力主要是來自大地主本身，特別是波羅的海沿海一帶的地主仕紳，他們認為解放農奴之後，用雇傭方式經營農業比較

合算，也比較合理。由於上述一連串事件的推動，弗拉迪米爾在行事動力和知性思想上變得更有自信，他對社會主義黨那些人越來越看不起，他開始不斷在言論上攻擊他們，他的姊姊說那些人覺得「他實在是個魯莽冒失的年輕人」。

弗拉迪米爾在性情上會變得冷酷而不近人情，這說來未嘗不是外省鄉下生活呆滯、腐朽及僵化的氣氛所致。記得亞歷山大鬧事剛被抓走的時候，他們家附近鄰居有一個圖書館的管理員就說：「真是遺憾啊！他在我這裡借了一本書，看樣子是不可能還了！」

就在他逗留於沙瑪拉最後一個冬天的一天夜裡，他在一本雜誌上讀到契訶夫的一篇短篇小說，叫做《第六號病房》(Ward No. 6)，第六號病房是俄國一個小鎮上一家醫院裡的精神病房，這個小鎮離鐵路兩百俄里，契訶夫筆下的這家醫院周圍布滿許多蕁麻之類的乾燥植物，景觀極為荒涼。醫院進門的走道上老是充塞一股從病人衣物和被褥上散發出來的難聞味道，這裡有一個警衛，是退休的老兵，他專門對付修理這裡的精神病患。精神病房裡的天花板早已燻成一團烏黑，像鄉下農人茅屋裡的樣子，我們可以想像冬天的時候這裡有多難捱。這裡關著一個年輕人，他罹患被迫害精神妄想症，他老是認為有警察在迫他要迫害他，他常常喃喃自語，咒罵人類的卑鄙，咒罵強權踐踏真理，窗上的鐵條讓他想起強權的愚昧和殘酷，不過人類的好日子終將來臨。這裡的主任醫生是個有教養之輩，他很關心醫院的業務，他知道他的醫院很落伍，一切都跟不上軌道，然而他想改革卻總是力不從心。他每天晚上在家裡讀書，喝伏特加酒，他會不時想到醫院的缺陷跟人類巨大的苦難和死亡相互比較起來根本不算什麼，甚至想到有一天地球會停止轉動，太陽會熄滅，醫院的問題更是微不足道了。

有一天他來到第六號病房，有機會和這位被迫害狂的年輕病人好好長談一番，他要他好好冷靜療養，這時年輕人開始數落他，罵他是獄卒，把他們當犯人囚禁在這種可怕的地方，目的無非是要

他們一死。接著醫生跟他解釋說，哲學家的心靈是不會在意外在世界對他的影響的，他在醫院裡一樣可以活得很快樂，想想古希臘時代的斯多噶派（Stoic，公元前四世紀由希臘哲學家季諾創立的學派，主張理想的生活應是安身知命、服從自然秩序）哲學家，他們根本就不在意受苦。年輕人很氣憤的回答說，的確，受一點苦可以讓他產生鄙視人類生活的心理，他一直在受苦，而醫生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哪裡懂什麼叫做受苦。這位年輕人的父親本來是個有錢的官員，後來卻被控偽造文書罪而丟官入獄，他的哥哥又死於肺結核，整個家頓時分崩離析，他也因此而不能入大學就讀，只好回到鄉下地方，卻變成精神病患。從此以後醫生常常來第六號病房探訪這位年輕人，醫生跟他說，雖然他們之間有很多觀點不一樣，但他發現他們是這鎮上唯一懂得思考並且可以互相談論嚴肅話題的兩個人。

這篇故事接下來描寫這位醫生自己最後也成為第六號病房的病人，弗拉迪米爾發現自己的處境和這篇故事裡的角色很相像：惡名昭彰的俄國醫院、教育之路受阻隔的年輕人、服務公職的父親因為細故而離開工作崗位。然而契訶夫的這篇傑作同時還像是一篇寓言，影射一八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俄國知識分子的內心苦悶和無力感。醫生自己身不由己一步一步淪為第六號病房的病人，他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當他發現自己也變成病人時，他想奮力脫身卻不可得，警衛打他，把他制伏在床上，讓他動彈不得，他這才發現，他已經陷入了和其他病人相同的命運，他和年輕人一樣都是無助的囚徒了，一樣被判定精神有問題，他最後中風死在第六號病房裡頭。

弗拉迪米爾讀完這篇故事之後，感到一陣恐慌，他想走出去透透氣，但夜已經很深，大家都睡著了，第二天一早他告訴他姊姊說：「我覺得自己就是第六號病房裡的病人！」

第二十六章

列寧：革命大導師

外省鄉下單調乏味的生活並非一無可取，這種生活有其相對的法則，它至少帶來一種強韌的凝聚力。

弗拉迪米爾於一八九三年的秋天離開沙瑪拉地區，他當時正好二十三歲，從那時候起，他的故事進入另一個截然不同的階段，我們處理的方式自然跟著有所不同。在他看來，俄國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運動的領導人、沙皇的禁止和壓迫、老百姓的愚昧和麻木，這些障礙必須小心翼翼加以處理應付，目前也許不得不暫時忍耐一些時候，但只要意志堅強，持之以恆，終究會有成功的時候。

弗拉迪米爾的身上混合著許多特質，這些特質使他能夠如願以償。首先是他身上的德國人血液，講究堅毅、效率和勤奮，而這些正是俄國一般知識分子所缺乏的，他在道德上的一致性與其他俄國人那種搖擺不定的極端情感和極端道德十分不同，俄國人的這種傾向如果去表演戲劇可能很適合，要從事真正實際的行動可能就不行了，他們固然也會產生像托爾斯泰這樣偉大的人物，但大致而言，在西方人眼中看來，這種傾向還是顯得有些荒誕不經的。弗拉迪米爾倒是很接近一樣是在沙皇極權統治下不斷反彈的另一種人物，但他顯得更為細膩謹慎。沙皇的殘忍冷酷反而引發另一股反動的力量。

量，這股反動力量不惜一切代價要和沙皇反抗周旋到底，奈查也夫即是此等角色，但他卻是幻想多於行動能力，終究只能以住進彼得——保羅監獄收場。恐怖主義的一批人也是，他們熱心有餘，卻也是行動能力不足。弗拉迪米爾在沙瑪拉時曾經接觸過一批早期反抗運動的流亡人士，他了解一項事實，即想要和沙皇對抗，首要之務就是先好好活著。像他這樣的角色，加上馬克思主義的啓發，他終於能夠挑起人類歷史上一場驚天動地的大革命。

弗拉迪米爾經過一番脫胎換骨之後變成列寧，他終於決定消除他的社會身分，然後變為反社會的謀叛者角色，甚至後來逐漸拓展馬克思主義成爲一種世界觀之後，他也打算放棄自己是俄國人的身分認同，他希望打破國界，把全人類聯合起來。

他雖然天生冷漠孤傲，開始時還是不習慣充當謀叛者的角色，他的姊姊一直反對他用寫信方式和他人聯絡，因為怕會連累收信的人。他從西伯利亞放逐回來時，竟無視於自身安危而取道沙斯科——塞洛(Tarskoe-Selo)進入聖彼得堡，因此而再度被捕。沙斯科——塞洛是沙皇避暑之處，那裡警衛極爲森嚴，走這條路無異是自投羅網。不過，他在策動謀叛的技巧上卻有如他當年在研究法律一般，絕不馬虎大意。他這次再度被逮捕只關了十天，身上的政治文件因爲全用隱形墨水書寫，所以沒被查獲。出獄之後他立即通知所有同黨，今後大家以密碼通訊聯絡。

他沒有像巴枯寧牛一般的強壯體魄，他才二十幾歲就染上了胃部的結核病，一八九五年他前往國外會晤普列漢諾夫時，就順道去瑞士一家療養院治病。幾年之間過度工作的結果，身體健康每下愈況。他第一次被捕時就已經有神經方面的問題，而且還生病。西伯利亞的流放似乎改善了他的體質，但是在刑期結束的前些日子因爲擔心刑期延長，身體狀況又變壞了。他二十幾歲時頭髮就已經

差不多掉光了，晚年時一天到晚憂心黨內的分裂危機，因而經常不支而崩潰倒地。他後來慢慢懂得保養自己的身體，以便能夠應付各種狀況。有一次他在監獄中被關了三個月，牢房只有五乘十英尺寬，高才六英尺，他每天早上就用蠟磨地板，藉此鍛鍊身體，每晚睡前做五十個伏地挺身，然後才上床睡覺。在西伯利亞的時候，他經常去滑雪打獵，每當大夥人圍在一起聊天，喝茶抽菸或無所事事的時候，他就脫隊一個人去散步。

他從不介入個人的瓜葛糾紛，而這正是放逐生活的最大弊病，他這方面做得比馬克思成功，在本性方面，他比馬克思更懂得體貼別人，他會經常關心呵護他的同僚，而且他堅持一個馬克思永遠做不到的原則，那就是絕不介入或批評他人的是非。革命成功之後，有一位女同志暗地裡離開丈夫和一位年輕英俊的海軍軍官私奔去克里米亞，他的同事們都主張把他們抓來判刑五年，但他最後還是決定不加以懲罰，他認為這是個人的私事。他的原則是絕不捲入他人的是非，如果一定非得如此，他就採取與對方決裂一途。在西伯利亞放逐時，一些社會主義黨的放逐者和人民意志黨的放逐者發生爭執，列寧就決定跟他們斷絕來往，他後來寫道：「沒有比這些放逐者之間的是非爭端更糟的了，他們叫人無法忍受。他們從不想自己的處境，落到這般境地還不知道好好自我節制，我們不能讓這些無謂的爭端干擾到大家，我們有許多事情要做——不要把精力浪費在這一類事情上面。」

但是，真正的悲劇性的墮落，才叫他感到難堪。在西伯利亞的放逐期間，發生一件悲劇，令他感到極為痛心疾首。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先鋒費多雪耶夫當時也被放逐到西伯利亞來，列寧跟他有一些接觸來往，有一天他竟突然自殺，原因是不堪其他放逐者的中傷打擊，有人指稱他私下挪用放逐者基金的公款，他被放逐受刑已經有夠難堪了，如今再蒙受這種誣讒，終於嚙不下這口氣，就把自己寫作賺來的錢以及公家的基金全部丟棄，只靠每個月的八盧布過活，但最後還是精神崩潰而舉槍

自戕，他自殺前留了一張條子給列寧，他說他尋死並非因為「理想幻滅」，他「對人生仍然充滿不可動搖的信心」。有一位同志，是費多雪耶夫的好朋友，聽說他自殺了，也跟著舉槍自殺，另一位勞工階級的同志，因為怕被迫害，竟也為此發瘋了，還有另一位是單獨被囚禁時染上肺結核，也在這時死了。有一位從敖得薩(Odessa)來的年輕猶太人策德爾包姆(Julius Cederbaum, 1878-1923)，他謀叛的化名叫做馬托夫(Martov)，他起先和列寧一起被放逐到距離莫斯科兩千英哩的葉尼塞河(Yenisei)一帶，不久又被送去北極圈一帶，離列寧有七百英哩遠，後來聽說也是受人詆譏中傷而發狂。列寧寫信給母親提到馬托夫的不幸遭遇時說：「願老天救救我們這些放逐流刑的人！」因此他盡量想辦法不去和這些人混在一起，他寧可一個人留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不去和他人有所瓜葛。

但他還是有一個很親密的同志，名字很長，叫做娜德芝姐·康絲坦丁諾夫娜·克魯斯卡雅(Nadehda Konstantinovna Krupskaya)，當時激進的年輕人並不流行結婚，但他們還是舉行了婚禮，正式註冊為夫妻，因為不如此，娜德芝姐不可能獲得當局的同意，前來和他會合相聚。

娜德芝姐的父母都是出身仕紳階級，但他們都是孤兒出身，結婚時身上一無所有，她的母親從學校一畢業就去當家庭教師，她的父親是陸軍軍官，年輕時曾被派去鎮壓一八六三年波蘭的叛變，他竟從此喜歡上波蘭，後來就留在那裡，成為某一處軍管區的團長，他發現當地的俄國人喜歡欺負猶太人，常常在大庭廣眾下剪他們的頭髮，而波蘭人也一樣欺負猶太人，不准他們在墳場上圍籬笆，然後放豬在裡頭到處亂跑。他下令禁止這些惡劣行徑，他還在當地蓋了一間醫院，頗受當地居民的愛戴，可是不久卻遭人告發許多罪狀，包括：跳波蘭馬茲卡舞、講波蘭話、忘了上教堂做禮拜等等，終於被解除職務，並規定永遠不得復職。他只得回俄國去，這場官司拖了十年之久，這之間他幹過

保險公司經紀人和工廠視查員，娜德芝姐從小必須跟著父母到處搬家奔波，嘗盡許多人間的辛酸，最後她的父親被判決有罪，卻也在這同時死了，她當時十四歲，她和母親一無所有，只能依靠政府給的一點微薄津貼過活。

娜德芝姐始終不知道她的父親是不是個革命主義者，但她記得她家以前常有革命主義者來訪。有一次他們全家去鄉下地區探訪她母親以前當家庭教師的人家，他們離開要回去時，在半路上被一群農人攔了下來，對方以為他們是地主，把馬車夫揍一頓，並揚言要把他們全殺了。她的父親當時很鎮靜，等脫身之後，她聽到父親跟母親說一般農人都很憎恨地主。她十歲的時候，很崇拜學校裡的一位女老師，她跟學生講話時都是一副很嚴肅的樣子，她是人民意志黨的黨員，娜德芝姐當時心想，長大以後一定要去當鄉下的小學老師。那年春天，亞歷山大二世被人民意志黨的人謀刺成功，這位小學老師也一起被抓走，在沒有窗子的土牢裡關了兩年。

娜德芝姐長大以後，和母親一樣去當家庭教師，另一方面去聖彼得堡的一間女子學院讀夜間部，她很喜歡讀托爾斯泰的東西，她自己動手操作所有家務，排除任何不必要的奢華習慣。一八九〇年代初期，她在一家工人的禮拜天學校教地理，她發現有一班工人學生在研讀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她自己也跟著開始研讀馬克思，很快即跟著成爲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從她年輕時代的照片看來，高領子及捲起袖子的裝束，一副叛逆的男孩模樣，兩眼炯炯有神，嘴唇緊閉，像是睥睨一切的倨傲樣子。

她和列寧相識於一八九四年的年初（她比列寧大一歲），列寧自己說，他當時在聖彼得堡無所事事，每天在街上到處尋找馬克思主義者。他隔年組織成立「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League of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娜德芝姐就跟他一起工作，列寧當時的做法是盡量避免和知識分子打交道，而直接深入勞工階層，和他們打成一片。他用心去了解他們的問題，他越過寬廣的

皇家大道與人聲鼎沸的飯館和金碧輝煌的歌劇院，他走向背後另一片木造房子的簡陋住宅區，狹隘而陰暗無光的小巷，娜德芝姐陪他一起做這樁工作，首先她從學生那裡爲他搜集資料，然後一副勞工階級女人的打扮，陪著他逐家探訪這些勞工階級。列寧編寫一些關於工廠的報告及工業立法的小冊子，娜德芝姐和一些「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的女同志就拿著這些小冊子去各大工廠門口散發，或是到勞工住宅區去挨家挨戶分送。列寧被逮捕入獄之後，他們就伺機鼓動鬧事，一八九六年夏天紡織工人大罷工，他們就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不久，娜德芝姐自己也被逮捕下放，她就想辦法和已經在獄中的列寧聯絡上，列寧很希望能夠在每天出操時和她互相看一眼，他們約好時間和地點，但連續幾天下來卻始終沒有抓到機會。後來他們終於能夠在西伯利亞相聚，娜德芝姐把自己的母親也一起帶來，她的母親以前常常幫忙他們躲警察，她們來了之後，列寧就弄了兩間連在一起的公寓房子，他自己住一間，她們母女住一間。

列寧有一種本事，他即使在警察的監視下，被單獨關在牢房裡，或被遣送到兩千英哩外的西伯利亞，他依然能夠指揮部下從事戰鬥計劃。在監獄裡的時候，他能夠把通訊內容藏在麵包裡藉以和外面的同志聯絡，經常是警衛走過來時，他就趕緊把麵包吃到肚子裡。他就是利用此一方法把草擬好的〈五月宣言〉(May Day Manifesto)偷偷弄出去，散發給所有工人，策動大罷工行動。同時也是透過類似這種艱辛的方式，他慢慢完成討論資本主義如何在俄國發展經過的馬克思主義大著，他有辦法在獄中弄到藍皮書報告和一些統計資料，他甚至利用從監獄出來到被遣送前往西伯利亞之間的三天時間，在莫斯科圖書館猛力工作，然後在遣送途中有一個月時間在中途停留，他更是加緊利用，每天走二英哩路到地方圖書館繼續工作，最後到達放逐目的地之後，他立即寫信給家人，要他們把他所需要的書趕快寄來。有時他必須等上一年半的時間才能收到他的郵件。「這不足爲奇，」他在信

中如此說道：「距離實在是太遠了呀！」他要算準郵件的出發時間，核算中途的耽擱，火車行走的速度，經由這些精細的核算方式，他總算能夠跟西方世界保持密切的聯繫。

我們從這些往來的信件中獲得一個印象，即列寧不只透過通訊指揮他的同僚，同時也由此一方帶動家人的一切活動，他的母親、姊姊、妹妹和弟弟，甚至他的姊夫，全都參與了他的政治活動，甚至或多或少都捲入了他的革命行動漩渦中。我們讀他們這些人的書信或回憶錄，感到奇怪不解的地方是，這些一八九〇年代最有文化教養的人竟會不約而同那麼熱心於想要顛覆他們的社會，這令我們聯想到英國社會中阿弗列德·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 1859-1936，英國詩人、拉丁文學者)和勞倫斯·豪斯曼(Laurence Housman)這兩個家族的事蹟。即使瑪麗亞這位做母親的都會盡力唆使自己的兒子去從事這些勾當。列寧第一次被捕是因為他去西歐旅行回來時，旅行箱底層藏有非法書刊，當時經過邊境入關時，警察已經發現他的旅行箱藏有非法書刊，但仍然故意放行，然後派密探暗中跟監，最後加以逮捕，當時旅行箱已不在身旁，列寧早已事先以密碼方式寫一封信給她姊姊安娜，要她準備一個相同的旅行箱，以便法庭上可供證據之用。安娜說這個問題給她帶來很大困擾：她必須偷偷去弄一個相同的旅行箱，還要把旅行箱弄得舊舊的，最後卻又發現這個問題給她帶來很大困擾：這一切害得她以後每次經過賣旅行箱的商店就會害怕。列寧被放逐到西伯利亞時，母親和弟弟米提亞也被捕了，最後於一九〇四年，安娜也一起被捕了。

列寧給家人的這些信件中有一大部分都在談論他的著作出版事宜，他的家人或我們這些後來的讀者讀起來可能會覺得索然乏味，但這絕非列寧的冷漠本性所致，其實他對人類的矛盾態度在此顯露無遺，爲了達到未來終極的目標，平常的個人關係似乎必須暫時犧牲，但他仍然以一種特殊敏感的姿态去參與介入，爲了達到目標，他甚至不在意自身的利害關係，而積極去認同他人。在西伯利

亞放逐期間，或甚至終其一生，他從未捨棄與家人休戚與共的一體感，他不但孝順母親，對弟妹更是呵護照顧得無微不至。一九一〇年他有一封給弟弟的信這樣說道：「親愛的米提亞！接到你的信已經有一些時日了，我拖到現在才回信，心裡感到非常不安。你的復元情況進行得如何了？我希望醫生聰明些，不要過於忽略你才是。我在巴黎市中心騎自行車要很小心才行，這裡的交通很忙亂，稍微不小心就會出意外。可是，你冬天在鄉間騎馬竟然會騎到摔下來，想必這是一匹很兇猛的馬，而你騎牠的方式大概也一樣兇猛！撥點時間寫封信跟我報告你的健康狀況吧！你現在是不是全沒問題了？安娜寫信告訴我說他們預期你的腿大概可以完全治好，但肩膀恐怕會有問題，你以後可以騎自行車吧？我真不相信他們無法治好骨折。你要好好注意治療，不可掉以輕心。」列寧想到他的弟弟米提亞受傷行動有所不便，也許下棋會給他帶來一些慰藉，他接著就說：「我好想下棋。」幾年後，他以這種相同體貼的態度對待高爾基，他常常陪他一起在卡波里(Capri)度假，一起談笑，一起喝酒。高爾基在倫敦的時候生病了，他去探望他，並且還幫他打理房間。

娜德芝姐終於離開黨的工作，全身投入西伯利亞，她寫道：「過著這種單調的生活，人最後竟喪失了時間感，比如有一件事情，弗洛迪亞和我必須努力去想V·V·到底是三天前還是十天前來看我們的。」秋天快要結束之前，他們趁還未下雪，河裡還未結冰時，常常到河邊散步，沿著河岸走很長的路，河裡的水晶瑩剔透，可以清楚看到河底的卵石以及小魚在冰凍的水中游來游去。冬天來了之後，到處積雪結冰，他們就去滑雪，每天滑好幾俄里遠的雪，藉此運動取暖，娜德芝姐的母親有一次摔倒了，還挺嚴重的。當野地裡出現山鳩時，他們就知道寒冬快要過去了，他們會來到森林的外圍一帶，傾聽山鳩的咯咯叫聲，以及小河的潺潺流水聲。弗拉迪米爾會走入森林，娜德芝姐拉著正興奮著要狩獵的狗，她可以深深感受到大地正在復甦的那種強烈感覺。弗拉迪米爾雖然能夠

在沼澤中跋涉自如，能夠在雪中突破各種障礙，卻不是很擅長於打獵，娜德芝姐在回憶錄中寫道：「有一次，我們一夥人去獵狐狸，弗拉迪米爾很興致勃勃的樣子，他說：『我要好好大展一番身手。』突然有一隻狐狸跳到他跟前，他抓著槍，狐狸瞪著他看了好一會兒，然後一骨碌跑開了。我們大家都很莫名其妙，就問他：『你剛才為什麼不開槍？』他回答得很妙：『你們都看到了，這隻狐狸很漂亮。』」

同時之間，他們一起翻譯韋伯論英國工會同盟的書，這倒是可以賺一些稿費。另一方面，弗拉迪米爾也完成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Capitalism in Russia)一書，他隨後著手研究一套哲學，準備要好好和愛德華·伯恩斯坦廝殺一番，因為當時伯恩斯坦正企圖以康德的哲學去修正馬克思主義。弗拉迪米爾這時也教一位店員做會計工作，他跟他說，他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寄生蟲。他送一批兒童書給一位波蘭製帽工人的六個小孩，這位製帽工人是他在放逐期間結交的一位好朋友，日子過得極為窮困，他只能做一些適於西伯利亞天氣戴的帽子。他充當農人的法律顧問，為他們解決許多法律上的糾紛，他同時更為普列漢諾夫組織的「社會民主黨」草擬政黨大綱。

一九〇〇年二月，他放逐西伯利亞的三年刑期結束，他陪娜德芝姐一起到烏發(Уфа)，因為她還要服刑一年，接受監視看管，然後列寧就一個人回莫斯科和家人團聚。米提亞到火車站去接他，兩人一見面之後，米提亞說，他先是詢問大家的近況，然後就「迫不及待大肆批評伯恩斯坦」，他在西伯利亞已經讀了他論社會主義的書，他認為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股危險逆流：「我們刻不容緩要跟他展開一場無情的殊死戰。」他一回到家裡就問有沒有他的信件和電報，馬托夫是否已經來過，安娜說他們全家人都有些失望，大家都以為他一回來會先跟家人團聚一番的，沒想到一入家門就先探問同志的消息，然後還要米提亞立刻出去為他拍一封電報。

一八九〇年代初期的幾年之間，馬克思主義逐漸在俄國風行起來，那是因為當局當時還搞不清楚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東西，可是，不久警察就開始密切注意「社會民主黨」的動向。一九〇〇年的春天他們已經有許多人在南部被捕，當時有人主張召開一次「社會民主黨」的大會，列寧就認為太過於危險而堅決反對，他倒是覺得目前最可行的辦法是先在國外辦一份報紙，把革命的氣氛鼓動起來。他在俄國短暫逗留了一陣，一方面籌錢，一方面聯絡其他同志，之後就逕自潛往德國慕尼黑，不久娜德芝姐也來到那裡和他會合。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火花》(Iskra)創刊號開始面世，以「社會民主黨」的名義發行，一九〇二年，列寧自己在德國斯圖加特(Stuttgart)印行一本小冊子，叫做《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他在這本小冊子中草擬了創立一個革命黨的政黨大綱。

列寧寫的所有東西都有其特定功能，都是針對當下設定的立即目標而寫。

馬克思不同，他負荷太重的文化擔子，《資本論》固然有豐富的說理，書中充滿五花八門的學問，引經據典信手拈來，直要叫人嘆為觀止，但充其量也只是像《憂鬱之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那樣的作品，如果說它的父親是猶太教的道德先知，那麼它的母親就是文藝復興。列寧的寫作風格可謂大異其趣，他不像是馬克思那種滿腹學問的傳統學者，他甚至連作家都不是，他最具野心的扛鼎大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最多也只是補充馬克思的見解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學問，如果硬要和《資本論》相提並論，那真的是小巫和大巫在別苗頭了，不過，列寧的最終目標乃在於喚起行動，他搜集許多統計資料，主要還是在於指陳事實，如此而已。當然，他這本書缺少馬克思那種嘲諷和憤懣的語調，那是因為要應付當局嚴苛的檢查之緣故，列寧後來談到《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Imper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Capitalism)一書時，也都是爲了相同的理由而稍事加以節制一番的。他的所有著作顯然毫不考慮文學風格，他只要人相信他寫的，他的目的在於說服對方，所

以他的寫作筆鋒趨於嚴肅冷峻，他毫不講究修辭，左派人士慣用的一些語彙他也一概捨棄不用，米爾斯基(D.S. Mirsky)說：「他大約是所有革命作家中，寫東西最扼要中肯的。」他寫東西很客觀平實，言簡意賅，絕不拖泥帶水，而且他善於運用修飾語彙藉以傳達他所要表達的意思，俄國人說，這主要還是得力於他在拉丁文方面的修養，另一方面，俄語在語法上變化多端的特殊結構，使得他得以鍛練出一種簡潔的風格，他在論戰文字方面固然有其反覆嘮叨之嫌疑，而且也過分耽溺於馬克思式的直截了當謾罵方式，但一般而言，仍不失其客觀公允之立場及其不偏不倚之中心論點。托洛斯基說：「他和親密同志之間的通訊就像在打電報……複雜的問題他可以用三言兩語就解釋得一清二楚。」總之，他寫的東西之所以讓人印象深刻，無非是其背後所隱含的那種堅定、誠摯及直截了當的無形力量所使然。

如果想更進一步了解列寧在知性上的超人之處，那非聽聽他的演說不可，高爾基說列寧的演說讓他覺得像是「鋼鐵摩擦時所爆發出來的冷冷火光，在那單純的閃爍中，卻包含著至高無上的真理」。

列寧要他的聽眾抓住的，正是他所要傳播的真理。有人也許認為他的見識不夠廣泛，但他本性中卻有一股求知若渴的動力，他對任何領域的思想時時刻刻都抱持一種想去一窺究竟的欲望，然而，他卻不得不縮小他的興趣範圍，他和一般受過教育的俄國人沒有兩樣：愛好音樂和文學。高爾基說有一次他去看列寧，看到他桌子上擺著《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列寧說：「是的，托爾斯泰，我一直想重讀狩獵那一段，卻老是沒時間，我想到要寫一封信給一位同志，實在是沒有時間讀書。昨晚，我還在讀你寫的談托爾斯泰那本書。」他說著笑笑，往沙發上一坐，接著放低聲音說：「像個巨人是嗎？多麼偉大的思想！這可是屬於你的大作家，先生。你該知道他另一迷人的地方，在他之前，沒有人像他那樣在文學中把農民描寫得那樣真實的。」另外有一次，他和高爾基一起聆聽貝多

芬的《熱情》(Appassionata)鋼琴奏鳴曲，他說：「我未聽過有比這首曲子更偉大的，真希望每天都聽，這真是偉大的超人音樂，我忍不住常常在想——也許很天真——人類可真能創造許多迷人的東西呢。」他照樣笑笑，但接著卻很無奈的說：「可惜我不能時常聽音樂，這會影響神經，叫你滿口胡說八道，不知所云，這些人活在這麼糟的世界而還能創造這麼美妙的東西，你會想摸摸他們的頭，但現在不能用手去摸任何人的頭了——你的手會被咬掉，你必須打他們的頭，毫不留情，即使你的原則是對任何人使用暴力。嗯，我們的任務實在是艱鉅無比。」當他去研究自然科學的時候，他只是爲了證明事物的新理論，他會很尊重這些理論，他絕不會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互相衝突。

從某種角度看，列寧並沒有知性上的好奇心，因爲他不能允許自己隨便投入不必要的知性活動，甚至在馬克思主義的領域中，他都沒辦法深入鑽研到其精髓的部分，他那本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大作《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其實也只是一本論戰文集，主要在於批判當時受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 1838-1916，奧地利物理學家、哲學家、經驗批判主義創始人之一)影響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危險的唯心主義傾向。

對他而言，他只要能夠從馬克思或恩格斯的理論尋找到證據，藉以駁斥他認爲是錯的哲學論點，那就夠了，他要的是某種「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經過千百次肯定過」的東西，他並不要「去創造新的哲學觀點」，新的理論並非他所要的東西，他只要安安全全「抱住」馬克思和恩格斯即行。他顯然並不了解他的對手實際上正在做些什麼，他想像不出他們正奠立在新發現的科學基礎上面——當時是一九〇八年，原子的分裂理論已經確立。對列寧而言，他要的是掌握實際的外在世界，透過實際行動來證明一切(關於這點，馬克思在《費爾巴哈題綱》一書中已經說過)。但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是相對的，經常走向絕對的極端，而這個過程則由「辯證法」來加以確定，「辯證法」是唯一能夠

說明任何存在物質「自我運動」法則的理論，說明「變動」的關鍵要素和「對立」的原理，以及「除舊布新」的現象。「原子的破壞性和豐富性，物質變化多端的形式和動作，這些都是唯物辯證法的主要點」，而社會科學之中，辯證法的最佳例證就是階級鬥爭，其對等概念是「死亡、貧窮、乾涸」，辯證法是強而有力的。如果我們好好固守這些概念，當做教條努力去實行，那麼社會主義的勝利就「無可避免」了。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可以比成像是一塊大鋼鐵，牢不可破，你一旦動搖分毫，那麼客觀真理立即不見，你不得不立即跌入中產階級錯誤的懷裡。

他不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熱中於批判歷史，即使像《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樣的書，都不帶批判歷史的色彩，他只是以論戰的姿態去對抗俄國的社會主義黨而已。至於在政治領域裡，列寧的注意焦點則更局限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失敗時，恩格斯曾經寫一封信給馬克思，提到實際革命的失敗，對他和馬克思這樣的思想家而言，在士氣上的打擊實在很大，下次再發生這種事情時，最好還是避開為妙。對列寧而言，他無法了解這種想法，他覺得實際行動失敗之後，更應該再接再厲。一九〇五年俄國的革命失敗——這情形很類似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列寧當時一點都不退縮，他反而更注意事態的發展，更加緊密全面部署另一次革命，他行動的根源乃是出於直覺，毫不猶豫，而他的堅定信念就是以馬克思主義來支持他的行動。他一心一意要組織一個黨，他的所有行動幾乎全是建立在這個組黨的信念上面。

然而，如果我們想仔細去研究列寧藉以帶動群眾的各種革命政策，那將會是很煩悶乏味的一件事情，我們只要稍稍涉獵一下他那瑣碎囉嗦的論戰文字，便不難了解為什麼他的一些對手會說他簡直就像宗教狂一般執著於教條式的理念，毫無妥協之餘地，不過，我們要是只接觸他所寫的文字或他對黨內同志所發表的談話，那是無法真正了解他的，如果說他那些爭論性的文字叫人不忍卒讀，

那是因爲他所談的那些問題早已超出了思想觀念的範圍，那些問題已經不是——列寧自己卻認爲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問題，而是實際政策的問題了，他的真正目的並不是要用理論去證實他的策略，而是要群眾去認同他的策略並加以追隨，因此，列寧在理論方面的成就實在乏善可陳，他的真正才幹乃在於處理實際政治狀況的本領，這時別人或他自己的理論完全派不上用場，不過，他會用馬克思主義的論點來支持自己的策略，他如果犯錯了，他會勇於改正同時採取另新的策略，也許策略會不斷改變翻新，但他在理論上永遠堅持一個原則：俄國的革命不會只是俄國人的革命，它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

因此，他要同時面臨兩個問題：一方面補充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引導俄國的革命沿著馬克思主義的路線走。

關於第一個問題，自從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失敗之後，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忽略且加以擱置的一樣東西，此時列寧重新提出來同時加以強調發揚，那就是馬克思大學論文所提出的「動態原理」，以及《費爾巴哈題綱》中所標榜改變世界的意志，他強調——他很喜欢引用恩格斯說的話——馬克思主義絕不是教條，而是改變世界的行動指南。列寧超越拉薩爾的地方是他沒有個人的野心和虛榮，他只是想把馬克思主義拿來付諸行動而已。

當時馬克思主義在西歐已經淪爲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一八九五年列寧在巴黎見到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拉法格就告訴他說，不可能有俄國人懂得馬克思，因爲當時的西歐已經沒有人真正了解馬克思了。德國的國會選舉，由於社會民主黨大獲全勝，他們似乎覺得不再需要馬克思，而對馬克思主義頓時失去了熱情，甚至開始懷疑起馬克思主義的信條，愛德華·伯恩斯坦於一八九八年開始著手做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工作，他指出，德國社會民主黨不再像以

前的「共產主義同盟」那樣是個革命的政黨，他們進入國會，只期望做些無關痛癢的改革而已，伯恩斯因此提議大家應該趁此坦誠修正一些原先所設定的觀點，他顯然對馬克思主義者要消滅中產階級的主張感到灰心失望，因為彷彿突然之間，勞工階級和中產階級之間對立的張力縮小了，中產階級的權力增加了，但相對的勞工階級的生活狀況也跟著改善了，兩者之間的對立沒有以前那麼尖銳，而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似乎也沒有以前那麼嚴重了。而且，主要是一些社會主義者也對俾斯麥和威廉二世的改革工作真正發揮了其影響作用。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在當時也的確有重新釐清的必要，他們堅持他們的科學觀點不帶有道德的動機，同時卻又強調人類自然權利的口號，但他們始終拿不出一套可以獨立於階級利益之外的道德準則，因為如果擁有一套如此的道德準則，則社會的團結和諧必可達到，階級的鬥爭亦可以避免。道德意識的成長是漸進的，那麼社會主義的發展必然也是漸進的，如此一來，「進化」(evolution)就自然而然的可以取代「革命」(revolution)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其國會中的運作方式大致而言即是印證了這層道理。

現在對列寧而言，他的頭號對手是沙皇，俄國的處境和當時的德國根本就不能相提並論，以「進化」方式走向社會主義似乎絕無可能，他和沙皇的道德準則顯然是處於勢不兩立的局面，因此，伯恩斯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批判，他會感到生氣憤怒，我們是很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一類的修正理論無疑必會打擊俄國革命的士氣，會大大影響到他的利益，因而這一類的修正主義者在他看來實在無異於罪大惡極的異端。

在俄國他要對抗許多特殊的異端，而這些異端無非都和修正主義有關聯。首先是我們已經提過的社會主義黨，這一派人士堅持相信農民革命的潛力，農民和他們是聲氣相通的，列寧為他們分析

自從農奴解放以來，整個情勢已經和以前大不相同，想要求社會其他階層跟他們一致行動是不可能的，他們同時痛恨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禍害，因為這破壞了傳統鄉下的生活模式，列寧則宣稱資本主義的過程乃不可避免，大家要依賴現實的條件行事。另外，他還要對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那一派，這一派人士主張工會主義，他們不搞政治，只要全心全力搞經濟，他們確信勞工階級最後會自己達到社會主義的境地，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領導者有必要負起對抗沙皇的責任。這派人士所犯的毛病和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問題可說如出一轍，他們認為什麼都不必做，歷史會自動完成馬克思主義的使命。這樣的對抗一直延續到列寧被捕而告一個段落，但他在獄中依然必須和一批「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繼續對抗，他們這些人以能在政治上保持自由派身分而覺得滿足。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失敗之後，他迫不及待急著釐清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任務，這時候俄國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連連挫敗，許多人莫名其妙淪入神秘主義的形式，一九〇八年，列寧適時出版《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其目的即是在於努力糾正一些淪入旁門左道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很擔心社會民主黨這些人會被現實的假象所蒙蔽，而脫離馬克思主義行動派的陣營，他以馬克思主義的掌門人自居——這可從上述他的書中看出端倪，多少帶有一種宗教使徒的姿態，他企圖以一種神學系統的方式來昭告他的徒眾，新的理想主義並不可靠，因為他們以為上帝會下凡來幫助他們，但事實是，人類必須靠自己來創造自己的未來。

現在對他而言，真正的當急要務已經不是論戰或爭論觀點的問題，他需要的是人們服從他的領導。

列寧統御別人的能力並非如馬克思那般來自一種大學問家或先知姿態的那種權威，那只能領導

少數如徒弟之流的徒眾而已。他要吸引一批忠誠的伙伴，能夠和他一起共事，然後聽從他的領導指揮。他以大哥的姿態和他們相處，這多少源自以前在家中和姊妹相處的經驗，也多少帶有小學老師的味道。柯瓦列夫斯基有一次在巴黎聽他演說，不禁感嘆說道：「他要是去當老師不知會多傑出！」一九〇七年的一次大會中，他的敵手對他吼叫道：「講話不要像老師，我們不是小學生！」一九一七年，蘇卡諾夫(N. Z. Sukhanov)在一旁看到列寧和一群徒眾在一起，他覺得他們就像是「老師」和「小學生」。

列寧不管是跟工作伙伴或是群眾在一起，他總是忙個不停，不厭其煩為他們解釋這個、解釋那個，確定他們是否真的了解他的意思，他凡事必親自監督，如果他們做對了，他會很高興，如果做錯了，他會不斷糾正他們，直到做對為止。即使在爭論一些哲學性的問題，他也會把對手當小學生看待：「如果普列漢諾夫是個理想主義者，他把路走歪了，脫離了恩格斯，那麼，既然你是恩格斯的信徒，為什麼不是個唯物主義者？巴札洛夫(V. Bazilov)同志，這實在是多麼不可思議啊！……還有，道吉(P. Dauge)同志，我也要警告你，從馬克思到『第茨根主義』(Diezgenism)和『馬赫主義』的路是一條通往沼澤的爛泥巴路——這不是個人的問題，不是伊凡或西多或保羅個人的問題，這是整體行動方向的問題。」比較遲鈍或比較不用功的學生，他就拿出以前他父親在家鄉教導學生那一套，耐心去加以循循善誘，即使是很聰明的學生他也會不斷敦促他們。他不像馬克思那麼嫉妒，他絕不會插手干涉別人的私事，也絕不會為小事情記恨，他對政治立場的不同雖然也會很敏感，但他絕不會感情用事(馬克思就做不到這點)，他不會讓情感上的偏見影響到他的政治行動，就好像小學老師對某個學生有偏見但絕不會影響到打分數的公平一樣。我們在紀錄片《從沙皇到列寧》(From the Tsar to Lenin)上可以看到列寧最真實的身影，短小精悍的身材，像牛一般的大額頭，他坐在椅子上向前欠

身或爭辯，或滔滔不絕，或微笑，眯著眼睛，露出一副俄國式的精明樣子，頗有語驚四座的氣勢，彷彿他全身的精力都集中在嘴唇、眼睛和雙手上面似的。他講話時沒有一般演說家的誇張動作，也沒有一般政治家的矯揉故作模樣，他保持一種不亢不卑的大導師姿態，講起話來坦白而直接，不疾不徐，彷彿高高在上，卻又不會讓你覺得高不可攀，在當代革命家之中，實在找不出第二個這麼有魅力的。

列寧雖然沒有馬克思那種霸氣，也不會裝模作樣，但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得到，他在執行政治行動上居然是最不民主的。他很喜歡他的伙伴，很能欣賞他們的能力，他下達命令從不會引來第二個意見，當然他也絕不規避責任，他會為他的說話和行為擔當一切責任，好像老師在帶領一群聰明的學生，大家不必有意見，一切按照老師的規定行事。蘇卡諾夫說，列寧在策劃和下達命令方面很有套技巧，他絕對不允許留有討價還價之餘地。

這當然和列寧本身的特殊性格或他早期的生活背景不無關聯，如果他成爲獨裁者角色，這似乎也是俄國特殊社會環境所使然。但是，他變成統御一切的獨裁角色時，他絕不像一般政治家那樣是出於追求個人的榮耀和利益，我們可以這樣說，列寧是少有的沒有私心的偉大政治人物，他從不注意自己的名字有沒有出現在報章雜誌上，他不要求人們要對他表示敬意，他不會注重自己的儀容外表，自然更不可能裝模作樣了。他有許多政治敵手，但他從不會想置對方於死地，他只是覺得遺憾不能把他們吸收過來和自己站在同一陣線上。他和馬克思或巴枯寧不一樣，他以西方政治家的姿態從事革命，在不同的傳統中發展他的革命事業。

俄國的社會環境的確特殊，一般人民和知識階層之間在文化上的差距很大，自然而然人民的領導者會站在高上去領導他們。托爾斯泰晚年的生活就過得極爲矛盾，一方面他因大地主的身分而

覺得良心惶惶不安，另一方面他又極力想放下身段去過一般農民的生活，他的處境可說極為尷尬。列寧懂得怎麼和人們談話，他可以輕易和他們打成一片，知道他們之中有人會成爲他革命伙伴的一分子，他很了解社會的現實面，很清楚知識分子和群眾之間知識上的巨大差距，他在《怎麼辦》這本小冊子裡就引用卡爾·考茨基的話，認爲如果讓無產階級自己動手去搞革命，他們是永遠無法達到社會主義目標的，社會主義的運動必須由上層的人來領導，「掌握科學利器的，不是無產階級，而是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在小冊子中說：「因此，目前的首要急務是把工人革命轉變成以黨活動爲主的知識分子革命（我們特別強調『以黨活動爲主』，否則的話，這種轉變就沒有意義），我們要提升工人的水平到有能力革命的地步，我們不能永遠淪落爲如一些經濟學家所說的『勞工大眾』或是『普通工人』。」在他看來，大多數群眾都是無知的，他們一旦發起暴動謀亂，很容易落入主謀者的手裡任其操縱，這與原先控制他們的當權者剝削他們的情況並無兩樣。

然而，在俄國，列寧要一起合作的一些知識分子卻大都顛頂無能，沒有權力經驗，不知道責任感，優柔寡斷，他們根本還沒有心理準備。有一陣子社會民主黨的人抱怨列寧太過於跋扈，列寧的一位老朋友克奇札諾夫斯基（G. M. Krizhanovskiy）就責問費爾多·丹（Fyodor Dan）：爲什麼大家無所適從時，列寧仍然一意孤行？費爾多·丹就說：「因爲沒有人像他那樣全天候二十四小時都在忙著搞革命，他的腦中除了革命，其他什麼都沒有，他連睡覺時夢見的都是革命，對這樣的人你還能說什麼！」在《怎麼辦》這本小冊子中，列寧把俄國看成是「一個被政治奴役的國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已經徹底被政治所奴化，而對黨的榮耀和黨的一切運作方式仍然一無所知。」

由此可見，列寧合作的對象是多麼難纏，他能運用的材料是多麼鬆散，他同時要帶領一群缺乏訓練的人手。但他還是發展出一套對俄國以及全世界而言都很新穎的東西，他自己成爲一位訓練有

素的革命將領，以傑出的方式領導他的軍隊，同時又以豐富的學識做後盾，他所訓練出來的紀律和行動標準絕不亞於醫療協會救急的方式。他在《怎麼辦》一書中說過，他和他的朋友們在「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那段日子裡實在是痛苦萬分，「簡直是一場難過的折磨，在這歷史性的時刻裡，我們卻像是一群原始的手工匠，我們竟大言不慚的說：給我們一支有組織的革命隊伍，我們就可以把俄國搞得天翻地覆！每次一想到這件事情，我就覺得很慚愧，那些假社會民主黨的人不斷教訓大家『要降低革命的要求』，一想到這個我就覺得更加難堪，他們不知道我們要的不是原始手工匠式的革命策略，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革命。」

的確，他現在正在從事真正的革命，《怎麼辦》這本他的主要政治宣言所揭示的正是此種理念：要以強硬手段取代「原始手工匠」的作風。

這種革命的組織工作落在一小撮人的身上，他們獻出自己的身家性命去為革命目標奮戰到底。政治警察要取締一群烏合之眾的運動很容易，但是，如果這個運動背後有一批訓練有素的主腦人物在主導，他們能夠掌握客觀形勢，能夠和當局迂迴周旋，這時，事情就不能一概而論了。背後的主腦人物永遠隱藏在某個秘密角落，而他們的群眾可以自由自在到處散布非法書刊，並引發各式各樣的鬧事活動，政治警察終究只有疲於奔命，莫可奈何。當群眾在外面公然活動的時候，「我們幾個經驗老到的革命者就躲在一角暗中做策劃部署的工作——準備傳單、草擬行事大綱、指派各城鎮或各工廠或各教育機構的行動領導人等等。我知道有人會批評我的做法『不民主』，對於此種批評，我容後會詳細加以解釋答辯。」因此，中央委員會可以掌握住各支派的活動線索，然後又互相保持距離，而且高高在上，指揮若定。這種方式的活動層面相當大，可以涵蓋各式各樣的革命組織——不只包括勞工階級的組織、工會、工人自我教育團體等，甚至也包括了所有社會主義者及社會各階層的民

主團體。此外，他們也不會忽略另一群可能與他們聲氣相通的游離分子，「這包括工廠中的高級雇員，還有郵政局、鐵路局、海關、貴族、教會機構，或甚至警察局及朝廷裡的一些人士等等」，這些人隨時都可能助上一臂之力，當然，黨不會立即把這些人吸收入組織的核心，「剛好相反，我們會先好好訓練他們，讓他們能夠發揮作用，別忘了還有學生，他們的煽動能力也很強，他們的作用不會亞於專業的革命家。」

列寧說，這樣的組織系統並非意謂著「只有核心人物在從事思考活動，而其他人一概不參與這種活動，事實上這些群眾之中多的是專業的革命分子，他們可能貢獻許多寶貴的意見」。至於談到「民主的廣泛原則」，這在專制極權的俄國根本不可能，你不能在這裡的革命團體中引用民主的原則。一說到民主，首先你的一切活動必須公開，其次所有的事情都要由選舉來決定。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可以搞民主，因為他們任何事情包括召開大會等都可以公開，可是在俄國你必須偷偷摸摸從事活動，什麼事都不能公開，你如何能夠搞民主？要搞選舉也一樣不可能，每個人的身分都必須隱藏著，你如何用選舉的方式去選出你認為最合適的人選去從事某種工作？只有流亡到西歐世界的革命分子可以誇耀民主，因為環境不一樣。「只要稍微想一想，你就可以了解在政治警察虎視眈眈之下，廣泛的民主原則不但無用，而且可能帶來極大的傷害。」如果同志間大家能夠秉持革命歷史的優良傳統，大家互愛互信，民主似乎就是多餘的了。「大家根本不必去冀望幼稚的民主方式……大家要有強烈的責任感，因為我們從經驗中了解到一個真正革命黨的組織是大家同心協力在奮鬥，不分彼此的。」

由此可見，俄國特殊的社會環境所塑造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分子列寧，其革命的組織方式基本上和奈查也夫或巴枯寧是沒什麼不同的。列寧很不喜歡一種做法，那就是「組織一個戰鬥單位，像七十年代的恐怖活動一樣，來和沙皇正面決戰，一舉將沙皇擊垮。」但是「從歷史或邏輯的眼光看，

這實在很荒謬，因為我們要的是整體性的革命，而不是只對付沙皇一個人。」

此時列寧就面臨了一個黨內政策分裂的問題，這似乎已經不是觀念或策略的問題，這牽涉到大家氣質不同的問題，的確，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俄語原意為「多數派」，是列寧於一九〇三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組成的一個強硬路線派)和孟什維克(Mensheviks，俄語原意為「少數派」，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內一個溫和派系，由馬托夫領導，在一九〇三年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與布爾什維克分裂)兩者之間的不同關鍵即在於氣質上的問題。

一九〇三年夏天，社會民主黨召開第二次大會，這兩支人馬正式決裂。這次大會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一個麵粉工廠中召開，工廠裡到處有老鼠鑽來鑽去，外面又布滿了比利時和俄國當局派來的密探，不久他們有兩位代表被逮捕並驅逐出境，最後他們就把大會的會場移到倫敦，時值八月，天氣燥熱無比，開會的場所又是一片髒亂。

整個開會的氣氛非常緊張，大家不同的政治主張不斷傷害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感情。列寧自己由於情緒過於緊張，弄得幾天不吃不睡，完全不得安寧。依照一般議會開會的慣例而言，我們實在很難想像他們當時會把一個大會弄得那麼烏煙瘴氣，大會的主席普列漢諾夫，也是革命運動之父，竟會頻頻打斷意見和他相左的人發言，而且還反唇相稽罵對方是驢：「馬不說話，驢子卻說個不停。」有一位年輕代表看不過去，就跟列寧的妻子娜德芝姐提議讓列寧取代普列漢諾夫主持會議，免得大會鬧到不可收拾。列寧的確比其他黨員優越，娜德芝姐就說：「他即使討論議題時說話語氣火爆，但他當主席則無任何偏袒，至少他不會打擊對手的意見。」然而，這場大會最後還是鬧到不可收拾，列寧終於怒不可遏——這很少見——他怒氣沖沖離開會場，還用力關上門，大會結束時，他竟整個

人崩潰了。

不過，他同時也贏了。「真是羅伯斯比再世，」普列漢諾夫跟一位少數黨的同志這樣說。其實列寧的真正對手是馬托夫，而馬托夫正是他昔日的盟友。馬托夫在其敵手眼中看來仍然是個傑出的天才人物，高爾基說他「非常有魅力」，他的聰明尖銳而又不失其細膩，娜德芝姐說：「他抓得住列寧的思想，然後將之發揮得淋漓盡致。」事實上，他正是列寧最得意的門生，他渾身充滿著革命的熱誠，可惜卻流於哈姆雷特式的鬆散不一。托洛斯基說馬托夫的「肩膀很單薄，他的單眼眼鏡老是垂落著，而且髒髒的。」昂利·古爾布(Henri Guilbeaux)說他「幾乎完全不注重修飾外表」。高爾基在另一個場合說他「為黨的分裂感到沮喪震驚，他甚至氣得全身發抖，在屋子裡走來走去，抖著雙手解開襯衫的硬領，雙手揮個不停。」

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為黨草擬了一個黨政大綱，表面上大家為其中一項條款意見不一而鬧分裂，馬托夫要黨接納一些自由派人士，因為他們認同黨的黨綱，但列寧堅持只有願意積極活動且願意接受紀律約束的人才資格加入，他知道此時俄國各地的不滿情緒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後來於一九〇五年爆發。農人普遍為債務逼壓，但又收成不好，淪入饑荒，他們此時又因為農奴早已解放，沒有地主可以依賴，已經到了快活不下去的地步，他們開始劫掠莊園豪宅，並且要求分配土地。此時社會主義者首度可以在工人會議中發表演說而不必擔心警察的干預，就在他們召開大會時，俄國南部爆發空前的大罷工事件，整個過程發展得極為迅速，以至於馬克思主義者趕不上他們的腳步，列寧想要趁此好好導引他們，以免大家盲目搗亂，造成不良後果。「這一切錯誤，」列寧在大會上說道：「皆由擁護馬托夫的信條那些人所引起，他們忽略一項錯誤，甚至把這項錯誤認為是正當。我們要知道，我們所從事的是政治上的反對活動，我們必須秘密進行，我們的活動是一種地下小圈子

的活動，即使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會面活動，都要十分隱秘才行，這當然很痛苦，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俄國這樣，知識分子之間如此，工人階級之間亦然，可是馬托夫同志的信條卻擺明反對我們這種做法。」

他得到黨內大多數的支持，附和他的人後來稱爲「布爾什維克黨」，亦即多數黨，他的對手則稱爲「孟什維克黨」，亦即少數黨。以俄語的意思講，前者代表多數、強者、豐富、最大等含義，後者則代表少數、弱者、匱乏、最小等含義，而以黨的觀點看，前者代表「堅硬派」，後者代表「溫和派」。

由於這次分裂，馬托夫被趕出《火花》雜誌，編輯大員只剩列寧和普列漢諾夫，但不久之後他們兩人也互相鬧翻了。普列漢諾夫是俄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他比列寧大十三歲，出身貴族家庭，二十歲的時候放棄軍職而加入社會主義黨的活動，一八七〇年代曾經帶頭領導社會主義黨一次大遊行活動，可是當他們開始搞恐怖活動後，他就和他們決裂了。他頗能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技巧，同時又懂得擷取其中精華加以發揚光大。高爾基說他看來很像新教的牧師，一副高高在上的自信姿態，認定「他的觀念無可爭議，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理」。每當有工人從俄國前來求見他的時候，他就兩手交叉在胸前，然後開始一番訓話，結果他們落得無法跟他談他們心中所要說的話。他離開俄國太久，他跟國內勞工運動的實際狀況早就已經脫節，列寧的妻子娜德芝姐有一次拿一封信給他看，這封信報告一些勞工運動的近況，列寧等這封信已經很久了，因爲他急於知道實際情況是否與他所判斷的相符，可是這封信卻完全引不起普列漢諾夫的興趣，甚至讓他覺得索然乏味——「他好像失去重心的樣子，臉上流露出一副不屑的樣子」——此後她就再也懶得理他了。

事實上，他早就和列寧在爭奪《火花》雜誌的主導權了，這事發生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決裂之後，普列漢諾夫承受不了以前老同志的壓力，就跟列寧提議讓一些孟什維克的黨員加入《火花》

的編輯陣容，當時列寧一心希望這些人能夠再跟他們復合，就一口答應了下來，但他自己則辭去編輯職務。這時孟什維克黨就利用這機會開始大肆攻擊他，普列漢諾夫甚至在《火花》上批判《怎麼辦》這本小冊子，把列寧說成「獨裁者」，一心只想「官僚集權」，有意「把黨內同志變成受他主宰的齒輪和螺絲釘」，而且還策劃過「一個以神權政治為基礎的烏托邦政權」。結果，許多孟什維克的分子因而能夠進入中央委員會，當初布爾什維克的勝利至此完全粉碎無遺，不過地方上的委員會擁護列寧的黨紀律原則，還都支持布爾什維克，最後，中央委員會這邊擔心失去像馬托夫和普列漢諾夫這兩位著名的領導者，就解除列寧外交事務主管的職位，並限制他發表言論的自由，這似乎擺明他既不能有發言權，同時也不能和俄國境內溝通。

列寧最後只得離開中央委員會，他真正被孤立了，身邊只剩二十七個徒眾，而社會主義共產國際方面，卡爾·考茨基也裁決反對他，甚至像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左派領袖之一、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當初那麼擁護他批判修正主義的人，如今也倒向孟什維克了。

對他而言，要和那麼多朋友決裂實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他這時期寫的文章卻完全沒有惡毒的怨言，他的確不失為一個性情良善的人，也不失為一個完美的鬥士。他的文章著墨焦點還是在馬克思主義路線的爭論上面，他不對他們發出任何怨言，他只是覺得失望，因為他的對手不懂得如何和沙皇對抗。雖然他曾說過真正的革命黨員「會不惜一切革除不合適的分子」這類措詞強烈的話，但他的心腸還是太軟，他過於容易相信別人，有一陣子他還很信任一位叫馬林諾夫斯基（A. V. Malin'ovskiy）的臥底間諜，娜德芝姐早就在懷疑這個人，直到有一天在布爾什維克的會議上，馬林諾夫斯基自己把黨證丟下來離去，他這才恍然大悟。娜德芝姐說：「他就是太過於重感情，才使得這些政治決

裂事件叫人覺得那麼難過。我記得第二次大會期間，我們發現和阿塞洛、札蘇利區以及馬托夫等人決裂已經無可避免時，弗拉迪米爾真是難過到了極點，我們整夜坐在那裡顫抖著。他要不是那麼重感情，他應該可以長命一點的。」他和馬托夫曾經一起被捕，曾經一起辦《火花》雜誌，「之後，弗拉迪米爾和孟什維克抗爭得很厲害，每次只要馬托夫表現出稍微改變路線，他就會對他恢復以前的態度。」革命成功之後，列寧對高爾基說：「我覺得非常遺憾，馬托夫沒跟我們在一起，他是一位多麼出色的同志，多麼誠懇的一個人！」當時馬托夫還留在俄國，在審判布爾什維克叛徒時，列寧還是讓他走了，他臨終時，列寧很感傷，他跟娜德芝姐說：「他們說馬托夫快死了。」說話語氣充滿了感情。

當他被剝奪一切而變成一無所有時，他反而產生一種肅穆的喜悅：「要消滅組織的戰鬥的確相當艱困，微風突然變成風暴，這場風暴掃盡所有一切——做得多麼好！——掃盡小圈子的利益、情感和傳統，然後製造出公共機構來，黨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器官。」同時他爲了說明自己的立場，這時出版《進一步，退兩步》(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聲明書，他以辯證法來印證自己的處境，他說(這真是一段奇怪的文字)，他和他的徒眾在第二次大會時從少數變爲多數的布爾什維克，然後又從多數變爲少數，這是否定的否定，「總之，不只燕麥的生長依循黑格爾的法則(黑格爾的《大邏輯》和恩格斯的《反杜林》均以燕麥的麥苗生長過程說明辯證法則)，而且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黨內鬥爭也是。」不管怎樣，辯證法的過程是不會倒退的，事實即是如此。真正的「反命題」是革命，不是黨內的投機作風，「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組織及黨紀律等革命原則的最終全面勝利，這是毋庸置疑的。」

列寧在離開中央委員會同時出版他的聲明之後，和娜德芝姐帶著背包去山中住了一個月——這

時是一九〇四年的夏天，他們已經住在瑞士日內瓦。這次一起上山的有一位新來的女同志，她在黨裡的名字叫做褚薇卡(Nevka，「野人」的意思)，她才剛逃出政治放逐的束縛，「全身充滿喜悅和精力，四周環境的氣氛都受到她的感染，」她很高興跟他們同行，可是不久就開始感到洩氣了：「你們喜歡去連一隻貓都看不到的地方，可是我很不習慣沒有人煙的地方！」娜德芝姐說：「不錯，我們總是選擇荒郊野外，然後深入山裡，遠離人群。」他們隨身帶了許多書，卻一本都沒看，晚上一到他們就鑽入床上睡覺，他們幾乎一文不名，每天只吃乳酪和雞蛋。他們在一家客棧裡遇見一位社會民主黨的工人，他跟他們建議不要和其他遊客一起用餐，最好是和車夫一起吃飯，的確，這便宜許多。他們望向山頂，「上面積滿了雪，有許多藍色的湖泊，以及潺潺不絕於耳的瀑布聲音，這時候，弗拉迪米爾的精神又恢復了正常。」

第二十七章

托洛斯基：年輕的老鷹

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在倫敦召開的時候，當時有一位樣貌聰明的年輕猶太人也來參加大會，他和馬托夫一樣來自黑海地區的喀爾森省(Kherson)，那次開會時跟娜德芝姐提議讓列寧取代普列漢諾夫當大會主席的，就是這位年輕人。

列夫·大衛多維區·伯朗斯坦(Lev Davydovich Bronstein)於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八日出生在伊麗莎維特格勒(Elizavetgrad)附近一個叫做亞努卡(Yanovka)的小村莊，在年紀上他比列寧小將近十歲左右。他出生的這個村莊原來是一位軍人的屬地，是一塊沙皇餽贈的封地，當初沙皇政府打算好好開墾這塊大草原，卻長不出農作物，後來就把一些猶太人趕到這個地方來。這裡的猶太人大都經營一些小生意，而且自成一個猶太社區，列夫的父親跟他們不一樣，他從那位軍人那裡買下(或租下)大約六百五十畝的土地，他隨後在這塊土地上蓋起自己的房子，並開始墾荒，種植農作物，飼養豬牛和馬，他靠勤勞和節儉，不久竟也成爲一位「富農」。他擁有一架十馬力的蒸汽機，可以推動打穀機以及村裡唯一的一座磨坊，許多農人從四面八方老遠跑來租用他的機器，代價是收成的百分之十。他後來發現他的穀物在城裡的中間商那裡可以賣到較好價錢，或者可以在那裡囤積以等待高價，他就再也不肯跟村裡的穀物商打交道了。

列夫生長在這樣的家庭環境，雖然才剛剛脫離貧困，而且還有許多束縛尚未解除，但已經算是很舒適安穩了。他可以感受到下層社會階級的存在——農人和僕人，他們會羨慕他吃得比他們好。但他倒不特別感覺到上層社會對他有什麼壓力，這個地區的新貴都是一些暴發戶，在當時的確風光過一陣，家裡都設有彈子房，也都懂法語，但是一八八〇年代初期，麥子價格暴跌，一夜之間這些暴發戶新貴竟都銷聲匿跡了。列夫在小時候曾經目睹這些事情發生的經過，他記得有一陣子他父親曾經向這些新貴中最顯赫的一個家庭租過一塊地做生意，每當他們到他家來探訪時，總是會不斷炫耀他們以前的日子有多風光，然後走的時候總不會忘記順手牽羊從他們家中帶走一些糖和菸草。

當時俄國境內反猶太的風氣很盛，他們倒反而沒受到什麼太大的傷害，特別是亞歷山大三世上台之後，推廣排外政策，連帶也影響到了猶太人的生機，但對伯朗斯坦這家人而言，頂多也只是不能再添購土地擴展家產而已，列夫也因而延後一年才能上學——因為當時規定每個小學的猶太學生名額不能超過百分之十。雖然如此，列夫的父親還是想盡各種方法不斷累積他的財富，而列夫自己在學校裡的表現也相當出色。他們變得富裕之後，開始慢慢脫離猶太的禮拜儀式，列夫的父親就公然宣稱自己不信上帝，列夫自己雖然學了希伯來語，卻從不講意第緒語（Yiddish，一種猶太語）。他在黑海的大海港敖得薩上學，那裡混雜著許多不同種族，種族歧視的問題比較不那麼尖銳，但當地的希臘正教不但敵視天主教，同時也痛恨猶太人，他後來在自傳中寫道：「這裡種族的不平等，可能正是我對現存秩序不滿的重要因素，不過，這比起社會其他方面的不公正，反倒算不了什麼，這在我不滿的項目中並非占據首位——甚至根本不算特別明顯。」

列夫對社會不公正的感覺首先來自於他父親農場中的農人，他在敖得薩上學的幾年中，他和他母親的一位外甥住在一起，這是一個聰明而有文化教養的人，他教他俄文文法，他因為有自由思想

的傾向，雖然算是很溫和，仍然被摒除於大學門外。當時列夫已經十幾歲，每當放暑假要回亞努卡家裡時，「穿著漿洗過的帆布西裝，腰上繫著皮帶，上面的扣環還閃閃發亮，頭上戴著一頂有黃色徽章的白色帽子」，這一身穿著打扮使得他每次下田工作就顯得笨拙不堪，他父親雇的一些男女傭工會暗中取笑他，有一個從村裡來的割草工人，說話一向尖酸刻薄，他有時候就會故意在列夫的面前嘲諷他和他父親的小氣刻薄，列夫聽了會很生氣，很想好好罵他一頓，可是繼而一想，他又很佩服他的「聰明和勇氣」，反而欣賞這個人的做法。有一天這個人跟他說：「回家去和母親吃蛋糕吧。」他回到家門口時看到一位赤腳的鄉下女人，她走了好幾哩路來領他們欠她的一盧布工資，她坐在門口的地上，因為她不敢坐到門口的石階上面，也不敢敲門，就在那裡坐到天黑。列夫知道許多農人爲他們做事只能換來一些麥粥和湯喝而已，除非大家在農舍的院子裡集體靜坐抗議，才有可能吃到一點肉。有一天，列夫在外面打完板球回來，看到父親在和一個農人吵架，原來這個農人有一頭牛跑到他們的田裡，他父親就把這頭牛抓住關了起來，他跟這個農人索求賠償牛對農作物的損害，否則牛要扣留不還，農人苦苦哀求，列夫當時看了這一景覺得很難過，彷彿可以感受到農人內心對父親的怨恨，他就跑回臥房哭了起來，一直不肯出來吃晚飯，後來父親就要母親去跟他說，牛已經還給了農人，農作物的賠償也不要了。

列夫在敖得薩讀書的第二年竟被學校勒令停學（一段時間之後可以恢復就學），原來他帶頭抗議一位不受歡迎的法文老師，這位老師有種族偏見，他欺負一位德國男孩，故意給他偏低的分數。列夫的母親很生氣，他從學校回來的時候，就故意不理他，但他的父親卻跟他說：「做給我看看你怎樣對你們的老師吹口哨？是不是像這樣，把兩根手指頭放在嘴裡？」父親說著就做出吹口哨的樣子，然後哈哈大笑，兒子則強調他是和同學閉著嘴巴吼叫而已，父親卻堅持他一定有吹口哨。

隨著列夫在知識上的逐漸進步，他的世界與家裡的農場生活就越來越脫節，同時，他跟父母的距離也越來越遠。他的父親對他在學校的成績表現感到很驕傲，可是自己卻完全不識字，他努力學會認識一些字母，也只是爲了了解他兒子讀的書的書名而已，現在聽說敖得薩的一位醫生要他兒子上戴眼鏡，他竟覺得惶恐不安。和列夫住在一起的表叔是個出版商，後來還成爲俄國南部地區一家最大出版社的老闆，他自己也飽讀詩書，列夫會對文學產生熱情，可以說主要即是受他影響。他讀到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曾經在學校和一位同學合辦了一份雜誌，後來努力去幹家教，主要是想自己賺些錢可以去劇院看戲。「在我看來，」他說：「作家、記者和藝術家代表一個比其他領域更爲吸引人的世界，這個世界只對少數人開放。」

然而，在他父母眼中看來更爲嚴重的事情則是他竟然跑去參加革命活動。他在敖得薩讀的學校由於沒有高年級的班，他只好到另一個鎮尼古拉耶夫(Знаменск)繼續就讀，這裡離家比較近。他這時已經十六歲，就在這時候他開始認識一些社會主義黨的人和馬克思主義者，其中有一位是在幹園丁工作，是捷克人，自學成功，列夫跟許多激進學生和一些流亡人士經常在他那裡聚會，大家互相傳閱非法書刊。列夫的父親知道這些事情以後非常生氣，威脅要和他斷絕關係。列夫從小對數學很有天分，他的父親期盼他能進大學讀機械，因爲他當時正在籌劃要建一個製糖工廠和一個釀酒廠，他希望以後他的兒子可以幫他經營這些事業，但列夫卻拒絕了，他開始去當家庭教師來養活自己，並且和園丁家中那些激進朋友一起過一種公社式的生活。

列夫自從來到尼古拉耶夫之後，他稱自己爲保守主義者，他看不起那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俄國境內到處是警察，而敖得薩警察之多乃居全俄之冠，這裡的政治觀念非常落後。」不過，他尙

未真正暴露於革命運動中，他一開始即迅速偏向左傾，這倒嚇跑了一些朋友，他與社會主義黨的人站在同一陣線上反對馬克思主義者，他說，他和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有一部分理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體系太過於完整」。在尼古拉耶夫一帶的一位主要馬克思主義者是一個年輕的女人，名叫亞歷珊卓拉·麗芙娜·蘇可洛夫斯卡雅（Alexandra Lvovna Sokolovskaya），在年紀上比列夫夫大六歲，她小時候的生活環境很窮苦，當年薇拉·札蘇利區謀刺特列波夫（Трепов）將軍一案曾對她造成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後來在敖得薩學助產醫學，因而認識一些曾在日內瓦大學讀過書的學生，之後她在「勞工解放團體」中和普列漢諾夫、列寧及薇拉·札蘇利區等人一起工作過，她現在已經從社會主義黨的恐怖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當時認識她的人都說她有一雙「溫柔的眼睛」及一顆「鐵石心腸」，有許多男士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當時的列夫早已以能言善辯聞名遐邇，一群社會主義黨的人放話說，他可以輕易粉碎亞歷珊卓拉的任何論點，列夫似乎也為此而覺洋洋自得，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對個人而言是一種威脅，這是社會主義黨人的共同看法。他們兩人之間因而經常發生一些年輕男女慣有的爭鋒頭逞強的有趣插曲，兩人每次見面總是少不了會來一番唇槍舌劍，根據麥斯·伊斯特曼的描述，列夫曾說：「你還是自認為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嗎？真可惜，我實在無法想像你這樣渾身是勁的年輕女孩，竟可以忍受那些狹隘乾燥乏味而又毫不實際的東西！」然後亞歷珊卓拉會反唇相譏：「是嗎？我也實在無法想像你這樣處處講究邏輯的人，竟會淪入模糊曖昧的理想主義情感而洋洋自得！」當時有一份報紙原來傾向於社會主義黨，這時卻轉向馬克思主義，成為俄國第一份合法的馬克思主義報紙，列夫就寄一封信給當地公共圖書館，要求他們停止訂閱該報紙。但是事情演變到他和亞歷珊卓拉的一個弟弟要合寫一齣戲劇時，整個劇情的發展急轉直下，因為我們這位社會主義黨的英雄此時暴露出了他個性上的弱點——他愛上她了，但這位年輕迷人的馬克思主義女孩竟一口加以回

絕，且「無情地宣告社會主義黨的失敗」。整個事件的高潮則發生在列夫離開赦得薩一陣回來之後，他要那位捷克園丁邀請亞歷珊卓拉參加一個新年聯歡晚會，並告訴她說他已經開竅了。那天晚上他的態度十分友善，等到半夜他們坐下來要開始用餐時，他站起來並舉起杯子說：「詛咒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把乾燥乏味帶給生命的人！」亞歷珊卓拉站起來離開房間，說：「這種事情是不能隨便開玩笑的。」列夫當時就像聖經中前往大馬士革的保羅，驚愕得不知所措，但他還是讓她知道，他並未改變立場。

他說他這段時間一直感到很疑惑納悶，因為他始終不了解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和觀點到底是什麼，他們唯一的思想基礎是一本手抄的《共產主義宣言》，而且還抄得不齊全，這在當時年輕氣盛而且野心勃勃的列夫看來，當然是看不在眼裡，但他還是注意到了工廠暴動事件有其值得注意之處，當時俄國的工業發展已經慢慢從北部延伸到了南部的烏克蘭，尼古拉耶夫已經有兩家大工廠，工人達八千人之多。一八九六年，列寧和「鬥爭同盟」在聖彼得堡帶領紡織工人發動大罷工，隔年春天，當時列夫已經十八歲，他和亞歷珊卓拉的弟弟開始組織地方上的工人，他們首先和一位工廠裡的電工技師接觸，這個電工技師有相當豐富的機械方面的知識，在當時的俄國來講，也算是屬於高層面的知識分子。他們組織了工人之後，稱其組織為「南俄工人聯盟」(South Russian Workers Union)，然後開始四處散發非法傳單及小冊子等，這些傳單和小冊子都是列夫用複寫紙抄寫的方式，以每兩個小時抄一張的速度慢慢謄寫而成。

他們活動了整整一年之後，到了一八九八年一月，警察才開始出面取締他們，有兩百個人被捕，包括六個主謀者，他們當初即已協議好，萬一發生事情絕不躲避，以免當局打擊大家的士氣。列夫在地方上一個很惡劣的監獄中被關了三個月，而且是單獨關閉，沒有衣服換，沒有肥皂，沒有書籍

或任何書寫的文具，沒有鄰居，也不能運動，只有一堆跳蚤。冬天的時候窗子完全封死，所以不通風，每次典獄長來巡視，可以從他的表情看出牢房裡的味道有多難聞。他每天在牢房裡走一千一百一十一步，自己胡亂哼出一支曲子，這支曲子後來在革命時還成爲大家熟悉的著名革命歌曲。不久他被送往敖得薩一座比較現代的監獄，他在那裡可以換衣服，可以吃到家裡送來的食物，而且可以跟其他犯人講話。他的妹妹給他送來一本有四種語言的聖經，他努力學習其中的法語、德語和義大利語。此時，他們活動的文件落入了警察手裡，原來當初事發時，大家匆忙把這些文件交給那位捷克園丁的老管家保管，這位老管家隨便把文件埋在雪堆裡，後來雪融化了，一位割草工人發現這些文件，就拿去交給了警察。列夫坐了兩年牢之後，又判四年西伯利亞的流刑，一起前往西伯利亞的還有亞歷珊卓拉，她當初也一樣被捕，他們後來在監獄裡結婚，如今他們要一起前往西伯利亞雷那河（Lena）一帶，很接近北極圈，距離列寧和馬托夫被放逐的地方更爲靠近東邊，達一千英里之遙。

那個地方——和莫斯科的距離比較起來，反而更爲靠近美洲的阿拉斯加——托洛斯基說：「在那裡生活簡直是陰暗無光，十分乏味，完全與世隔絕。」夏天的時候，蚊子一大堆，有時還會把牛叮死，房子裡到處是蟑螂，他們要讀書時，必須把這些蟑螂趕走才能翻開書頁。他和亞歷珊卓拉當時已經有一個十個月大的女兒，天氣很冷，每當他們要外出時，必須用一條皮製的披風把她的頭蓋住，路上常常停下來，掀開披風看看嬰兒是不是還活著。他們和一對夫妻住在一起，這對夫妻一天到晚喝酒，在荒僻的地帶這很稀鬆平常，但他們每次喝酒總要大吵大鬧，甚至大打出手，有一位年紀很大的親戚和他們住在一起，每次總會牽扯進去，列夫常要去爲他解危。

列夫起初爲一家西伯利亞的報紙寫文學評論和一些生活小品文章，他的文筆很好，所以報社答應給他開闢專欄，每個月有六十盧布的酬勞，可是不久聖彼得堡當局下來一道命令，不准報社再刊

登這個人的文章。

在西伯利亞期間，他終於有機會徹底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他在敖得薩坐牢時還排斥馬克思主義，可是不久他有機會在監獄的圖書室裡讀到一些宗教和歷史的雜誌，他逐漸為自己解開一些有關歷史問題的疑惑：十七世紀以來「共濟會」(Freemasonry)在歐洲的發展。他當時尚未接受歷史的唯物主義觀念，他認為歷史的現象是許多不同因素的產物，但這些因素如何產生，他仍不甚了解，後來他有機會讀到義大利的黑格爾——馬克思主義學者拉布里奧拉(Antonio Labriola)的一些論文，對這個問題他總算抓到了一些頭緒，拉布里奧拉的一句話「觀念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對他像是當頭棒喝，他開始了解「共濟會」的發展其實正是由中世紀工匠工會演變而來，他們爲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對抗外界對他們體制的威脅，因而形成一種組織形態。來西伯利亞之前，在經過莫斯科時，他第一次聽到列寧這個名字，並且讀了他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到了西伯利亞後，他開始正式研讀《資本論》，離開西伯利亞時，他已經成爲信念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了。

社會民主黨的信條隨著橫貫西伯利亞的大鐵道在東部地區散發開來，列夫和亞歷珊卓拉還爲此發表肯定的聲明，革命的精神在俄國再度散播開來，當他們讀到托爾斯泰因爲否定聖母瑪麗亞純潔受孕的說法而被逐出教會的消息時，他們都感到非常吃驚，就說：「我們必須救救這群神經病人。」恐怖活動又開始展開，有兩位政府首長被暗殺，社會民主黨的人聲言反對此種行爲。一九〇二年，列夫收到幾本《火花》雜誌，和一些書夾雜著一起寄來，而且都已經出版一年多了，接著他又收到列寧的《怎麼辦》一書。這時候列夫已經寫了一篇論文，主張大家必須組織一個有中央系統的社會民主黨，這篇論文還在放逐地互相傳閱著，他同時發現在歐洲的同志已經超前他們許多，他現在急於和他們打交道，他想去那裡。

搭火車逃亡是最穩當的方法，當時在西伯利亞有許多農人都受過社會主義黨流亡人士的影響，而且西伯利亞幅員廣闊，到處是河流和森林，警察追查不易，很有助於流亡人士的逃亡。

他們現在已經有了兩個小女兒，亞歷珊卓拉也堅持列夫該走，後來列夫逃到西歐之後，他們竟然無法互相聯繫，後來不久，亞歷珊卓拉再度遭到放逐，列夫說：「生活把我們分開了。」

一九〇二年八月，列夫乘一輛載滿稻草的馬車逃走。當他抵達火車站，臨上火車前，幾個朋友交給他一箱衣物以及一本偽造的護照，他必須在護照上填上姓名，他當時想起從前在敖得薩監獄裡一位典獄長的名字，他就隨便把這個名字填上去，這個名字叫做托洛斯基，從此以後他就叫做托洛斯基了。

他在沙瑪拉停留了一陣，沙瑪拉是當時《火花》雜誌在俄國的大本營，他一抵達那裡之後立即加入他們的陣營。沙瑪拉的一些同志都對他很覺好奇，就稱他為「年輕的老鷹」，列寧的老盟友克奇札諾夫斯基給他取了一個別名，叫做貝羅(Бело)（俄文「筆」的意思），當時正在猶豫要讓他去國外寫作，還是留在國內搞組織活動，最後決定送他去國外的《火花》總部。他這次越過邊境時還算順利，沒什麼問題，反倒是為他送行的一个學生在路上和他發生一場爭執，原來這位學生對《火花》雜誌近來不時批評國內恐怖主義作風感到極為不滿，兩人為此一問題而爭論不休，這位學生甚至還威脅要丟下他不管他死活。

他抵達維也納時身上竟一文不名，他逕自前往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黨魁阿德勒(Victor Adler)所辦的報社辦公室，卻受阻於一個社會民主黨的黨官僚、報社的總編輯。托洛斯基一進門就說要見阿德勒同志，這個黨官僚戴著兩副眼鏡，冷冷地問他是不是要找「博士先生」。「是的，」托洛斯基回答。對方就問他：「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我們這位年輕的老鷹說不知道，因為他一路過來躲躲

藏藏，對外界所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今天是星期日，」這位大編輯說，然後不理會他，逕自要往樓下走去，托洛斯基堅稱他有要務在身，必須當面立即稟報，「是嗎？即使你的任務有那麼重要，要來報告你們的沙皇又被暗殺了、又爆發革命了，即使是這樣，你也不能打擾到博士先生禮拜天的休息呀！」托洛斯基說他當時覺得這個人很不可理喻，就一直糾纏著他，直到要到他家裡的地址為止。的確，當時那位社會民主黨黨魁很累了，何況他當時正在忙一個選舉。後來托洛斯基去阿德勒家裡之後，他就自我介紹一番：「我是俄國人。」阿德勒說：「這不用講我也知道。」然後他就告訴我們這位年輕的老鷹說，即使俄國真爆發了革命，也不必急著非得半夜去敲他的門不可。

當初托洛斯基離開俄國沙瑪拉的時候，他們曾經給他一筆足夠到瑞士蘇黎世的旅費，但是他在旅途中隨便散發給對他提供幫助的人，一路把錢散光，所以抵達維也納時才會身上一文不名。現在阿德勒給他二十五元奧地利幣，已經足夠去到蘇黎世，但是當他抵達蘇黎世時，身上照樣全部掏空，而且他到達時又是半夜，沒有車錢、沒有旅館費（托洛斯基喜歡亂花錢的習慣很值得注意，這是他本身慷慨海派的習性所使然，他後來就學會把自己身上的財產拿去交給旁人保管），他就雇了一輛計程車一路前去阿塞洛家裡，把阿塞洛從睡夢中喚醒，為他付車錢。

阿塞洛派他前往倫敦，他抵達倫敦時天還未亮——當時是十月——他就直接前往托屯南王宮路（Totenham Court Road）列寧的住處，列寧和娜德芝姐那時候化名為一對德國夫妻住在倫敦。托洛斯基一抵達那裡，就依指示的暗號在門上猛敲三下，娜德芝姐前來開門讓他進去，「貝羅來了！」她叫道，列寧還在床上，就躺在床上接待他，很親切，但也很訝異。娜德芝姐去為他付過車資之後，回來為他們煮咖啡，卻看到「弗拉迪米爾坐在床上，很興致高昂地和托洛斯基談論一些很抽象的話題」。托洛斯基跟列寧述說南俄地區的近況以及他一路過來的經過，他談到同志之間一般的聯絡狀況很差，

《火花》雜誌在卡科夫(Karkov)的秘密地址是錯的，《南方工人》(Southern Worker)的編輯拒絕和《火花》合併，因為大家在觀點上仍有一些歧異，比如他們就擺明很反對自由派人士，但托洛斯基則認為主要理由是他們想保持獨立，不過，他還是認為大家應該可以合作；最後他則談到送他到邊界那位學生如何對《火花》雜誌的同仁充滿敵意。

列寧對這位年輕人感到很滿意，他對他所分析的《南方工人》的當下處境，覺得很貼切中肯。

列寧帶他到倫敦四處遊逛，托洛斯基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描述這次的經驗：

我們站在橋上，列寧指著國會大廈及一些著名的建築物，我已經記不得他確切的用字遣詞，但我記得他大意是說：這是他們著名的國會大廈。這裡的『他們』指的當然不是一般英國人，而是統治階層。他的暗示語氣顯得很強烈，但是，這句話從他的肺腑湧上來，自然就充滿了弦外之音，他以後講任何話莫不如此，比如他談到文化的寶藏，人類的新成就，大英博物館豐富的藏書，歐洲報紙的廣泛資訊，以及後來提到德國的大砲或法國的航空，語氣都是如此。

列寧有一點是馬克思絕對做不到的，那就是他從不追求中產階級的享受。他出身中產階級，成為勞工階級的領導人，但從他目前的生活模式看來，顯然與無產階級完全認同。據說他和娜德芝姐不願意生小孩乃是因為他們收入太微薄，他們不斷搬家，而且隨時有入獄或放逐的可能，他們必須為革命工作而放棄一切世俗的享受，列寧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奢華，因為他只能依靠黨給的微薄薪水維生，他以前從來就不注重穿著，他母親和姊姊安娜每次上京城總是要為他打點一些衣物。娜德

芝姐剛到慕尼黑跟他會合時，發現他住在一個很小的房間裡，用一個錫杯喝茶，每次喝完茶就隨便沖洗一下，然後掛在水龍頭旁邊的釘子上面。列寧死後，有許多傳聞說他們以前在國外的流亡生涯有「多麼窮困」，娜德芝姐為此出面澄清，她說的確很苦，但尚不至於如某些流亡人士「十年之間毫無收入，完全沒有俄國方面的財源支持，生活在飢餓邊緣」。不過，她在《對列寧的回憶》(Memories of Lenin)一書中，則描寫他們住在慕尼黑時，和一個有六口成員的勞工階級家庭住在一起，這些人擠在一個房間和一個廚房，他們兩個人則擠在一個小房間。後來他們搬到郊外住在一個小房子，必須自己添購家具，等他們又必須搬家時，這些家具一共賣了十二馬克。由於沙皇密探的騷擾，他們必須把《火花》雜誌的總部搬去倫敦，起先他們住在一個簡陋的單人套房，後來娜德芝姐的母親也來了，托洛斯基就找了一棟有兩個房間的屋子，這裡常有一些同志出入，大家必須打地鋪，《火花》雜誌的總部就設在這裡，列寧不像馬克思那樣擁有許多書，他平常都到圖書館讀書工作。

娜德芝姐想強調的是，列寧過的絕不是「苦行僧」的生活，他只不過一心一意想達成他的目標罷了，他也有許多生活上的娛樂，比如有一陣子他就常去巴黎的一家劇院聽一個歌手唱歌，這位歌手善於編寫革命歌曲。住在倫敦的時候，他會常去櫻草山(Primrose Hill)一帶散步，因為馬克思的墓園就在附近。他有時也會搭公車去鬧區遊逛，然後順便去勞工階級住的地方走走看看，他會用英文唸出狄斯累利的名句：「兩個多麼不同的國家！」他對一般的博物館沒興趣，但巴黎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博物館」則叫他流連忘返，他會「檢視每一樣最小的物件，端詳每一幅圖畫」。娜德芝姐自己則沒什麼娛樂可言，她母親來了之後可以幫忙她料理一些家務，她自己則可以全力投入政治上的工作，她是《火花》的秘書，托洛斯基說她是「整個組織工作的核心，她要接待來訪的同志，他們要走時要交代如何行事，她同時要負責聯絡事宜，以密碼方式寫信和讀信。她的房間經常傳來紙張燒焦的

味道，因為她必須把某些機密信件放在火上解讀。她經常抱怨那些同志們沒好好寫信，常把密碼搞混，要不然就是使用化學墨水，把兩行字疊在一起。」有一位布爾什維克黨的工人說，娜德芝姐有時會微笑，但絕不大聲笑，他於一九〇七年在芬蘭看到她時，身上所穿的灰色襯衫和他於一九〇三年在日內瓦看到她時，竟然是同一件。

我們若仔細觀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俄國的一些革命運動，則會發現有許多革命精英分子都是在沙皇的嚴酷壓制下造就出來，這些人大都接觸過各階層的人物，有的還放逐國外，他們學會各種外國語言，很快適應當地風土民情，有的長期被監禁在監獄或放逐西伯利亞，他們藉此機會可以學習適應惡劣生活環境並趁機會閱讀和寫作——這些男男女女由此形成一特殊文化團體，他們不理會世俗的羈絆，他們活著的目標就只爲了追逐某種人生的榮耀。列寧是這些人當中的佼佼者，他身上散發著一股道德力量，逼使他不顧一切，一心一意只爲完成自己的革命目標。托洛斯基對而言，就像是另一個拉薩爾，不過他比拉薩爾更清醒、更冷靜，他爲自己建立起一套革命家該有的嚴格紀律，摒除拉薩爾身上的那種浮誇氣息，然而他還是很敬佩拉薩爾，他期待像拉薩爾那樣光芒四射。盧納察斯基(A. V. Lunacharsky)在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遇見托洛斯基，他形容托洛斯基長得很英俊瀟灑，全身充滿傲氣，很注重穿著打扮，似乎與當時流亡的馬克思主義分子的裝扮有些格格不入，與列寧更是形成強烈對比。盧納察斯基說列寧從「不在鏡子裡去看歷史如何反射，他不在意後代的人會怎樣看待他——他只要一心一意努力工作」，但是，托洛斯基似乎「常常只注意他自己」。

顯然他的興趣比列寧廣泛許多，比如他就很喜歡閱讀法國小說，他在巴黎時遇見一位年輕的女同志，名叫娜塔麗亞·伊凡諾夫娜·薛多娃(Natalya Ivanovna Sedova)，她帶他參觀羅浮宮並遊遍整個巴黎。薛多娃的革命生涯最早開始於讀寄宿學校時，鼓動全班同學閱讀激進書刊並拒絕參加祈禱，

她來到巴黎後專門爲社會民主黨負責接待來巴黎的同志，她就是因此才和托洛斯基認識，兩人因而成爲伴侶，她還爲托洛斯基生了兩個兒子。托洛斯基說他本來很反對藝術，可是來巴黎之後竟愛上了藝術，而且還爲此寫了一些藝評，他走的是拉薩爾和恩格斯的路線，而不是馬克思和列寧的路線，他偏向世界人和八面玲瓏個性的社會主義者傳統。

然而，在托洛斯基眼中，列寧畢竟還是高人一等的人，像他這樣毫不妥協的馬克思主義鬥士，在他筆下談起列寧時，彷彿列寧是超越在所有人類之上的偉大神祇，筆調充滿了佩服和尊敬，這不免讓人想起柏拉圖和蘇格拉底之間亦師亦友的一幅圖畫寫照。

一九〇三年，托洛斯基尚未真正開始追隨列寧的領導，該年年初列寧在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談及打算把托洛斯基安排在《火花》雜誌中工作，他說這個年輕人「能力很強，不但精力充沛，而且有信心，他會繼續不斷躍進」。剛開始時，他並不欣賞托洛斯基在寫作上的華麗風格，但他肯定他會繼續進步的。當時普列漢諾夫對這位才華出眾的年輕作家頗覺不以爲然，但主要還是擔心他和列寧會聯合起來對抗他，所以他反對把他納入雜誌的編輯陣容，並且以十分冷淡的態度對待他。可是，當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決裂時，托洛斯基竟投向少數黨，他說他當時才二十五歲，對老一輩的領導人心中仍充滿尊敬之心，他不理解爲什麼列寧會那麼無情的排斥他們，所以他投向少數黨以表示對他的抗議。之後幾年他不斷批評列寧的獨裁作風，然後以獨立的社會民主黨員姿態，來回折衝於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

列寧來不及加強他的陣容之前爆發了黨分裂的危機，而就在他陷入無助的處境時，他竟發現這個年輕人居然能秉著一股能耐邁向領導的地位。

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大屠殺事件驚動了俄國的所有流亡人士，日俄戰爭一敗塗地，陸軍和海軍連連敗北，整個士氣瓦解殆盡，老百姓對沙皇政權的痛恨也跟著沸騰到了極點。一位希臘正教的教士舉著宗教旗幟帶領群眾示威遊行，他們要跟沙皇請願：特赦政治犯、政教分離、一天工作八小時、把土地轉移給人民、開放國會全面普選等等，他們的請願活動以一句話做總結：「如果您拒絕傾聽我們的要求，我們就在皇宮前廣場坐以待斃。」沙皇下令不分男女老幼，格殺勿論，革命運動就此全面爆發，工人罷工一波接著一波，這樣全面性的革命運動真乃舉世罕見。以前十二月黨人謀反只是貴族階層的革命運動，恐怖活動的謀刺行爲也只是中產階級的革命活動，如今是由工人階級帶頭領導的全民革命運動。列寧事後寫道：「只有在那個時候，農奴的、粗魯的、父權的、虛假的以及馴服的俄國才能翻轉過來，也只有在那個時候，俄國百姓才能獲得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革命教育。」

列寧對這次事件的發展始終抱持著密切注意的觀望態度，不久帶領那次示威遊行的加彭神父 (Father Gapon) 來到日內瓦和他見面，他覺得很興奮，就幫他運送槍械去給聖彼得堡的工人，但船在半路上觸礁擱淺，船上貨物全部遺失。列寧這時經常去日內瓦圖書館研讀軍事策略及指揮作戰方面的書籍，四月他去倫敦參加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他發現從俄國方面來的代表都反對國外方面的領導，因為國外這些流亡人士都不了解現在國內的實際狀況。六月的時候傳來赦得薩地區波坦金戰艦 (Potyomkin) 叛變的消息，他趕緊派一個布爾什維克黨的工人回去指揮叛變，指示如何占據赦得薩城以及如何鼓動當地艦隊附和叛變，可惜這位工人抵達時叛變已經被救平。十一月二十日列寧親自回去俄國一趟，但此時已經沒有什麼作用，倒是聖彼得堡的蘇維埃突然出現許多布爾什維克黨人，有一位年輕的布爾什維克工程師，名叫克拉辛 (L. B. Krassin)，他購買許多武器分發給工人，可惜時機已經

不對，而且主要是在列寧的獨裁領導下，在有狀況發生時，沒有列寧的親自指揮領導，群龍無首，根本發揮不了作用，另一方面，托洛斯基此時又不肯和他合作。

托洛斯基也於二月中回到俄國，他是第一批回去的流亡人士，他從基輔(Кiev)一路小心翼翼往上潛行，他寫了許多小冊子交給克拉辛拿去一家地下印刷廠付印，然後到處散發，等他抵達聖彼得堡時，才二十六歲的他，卻很快成爲京城裡響叮噹的人物。不久之後，他的女朋友薛多娃在一次森林的秘密會議中被騎兵隊逮捕，他自己則於夏天潛入芬蘭，等到十月大罷工發生時，他又潛逃回來，同時糾合孟什維克黨員於十月十三日晚上召開工人代表的蘇維埃會議，這次會議同時也結合了社會主義黨的黨員，納入同一個指揮路線，但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者因爲列寧不在，擔心被他們兼併，所以不願意參加會議，一直到十一月列寧到了才加入會議。十二月九日大會主席被捕，托洛斯基成爲大會的主席，他一手草擬所有蘇維埃文件並爲三家革命報紙撰寫論文，其中一家報紙爲孟什維克黨所經營，銷售量很大，遠遠超過布爾什維克所經營的報紙。由於在放逐流亡期間經常有演說的機會，他現在的演說技巧已經非常出眾，據盧納察斯基說，甚至早已超越法國人喬雷斯之上，他不管是單向演講或雙向辯論都堪稱傑出無比，無出其右者，以個人和他人的關係而言，他有許多缺點，但他可以輕易說服群眾接受他的意見，他能夠把乏味冷僻的馬克思主義邏輯解釋得頭頭是道，甚至意趣橫生，而成爲說服對方的絕佳武器。他批評政府官員的那種嚴厲語氣更是咄咄逼人，毫不保留，他在面對工人演說時常會引用地方俚語典故，每每引發哄堂笑聲，而於面對知識分子時，他善於引經據典的功夫也總是令人心服口服，他能夠輕易把聽眾帶向他所預期的境界，而達到他所想要的效果，他要挑起群眾的憤怒。

是的，一波接一波的憤怒，十月三十日他們要脅政府發表頒布憲法的宣言，然而，內政部長才

剛發表此一宣言，警察總長同時已經在城裡到處部署兵力，隨時準備應戰，雙方衝突突眼看著一觸即發。托洛斯基一輩子脫離不了反猶太陰影的壓力，年輕時還曾經為此躲在農莊裡不敢出來，現在政府則藉機再度鼓動反猶太風潮，藉以轉移群眾對政府不滿的情緒。警察憑藉一些彩帶和伏特加酒，運動一群小店商、小偷、酒鬼和飢餓的游民，來和一群與這些人一樣可憐的民眾對抗，一場屠殺混戰於焉開始，托洛斯基事後曾經以一種憤懣的筆調描述這場屠殺。全國各地有大約一百個城市捲入這場屠殺，死亡人數有四千人，受傷的則達一萬人之譜。

這時人民反政府的憤怒情緒有增無減，一些重要的工業城市紛紛成立蘇維埃組織，有些地方甚至還自己宣布共和，十月二十四日莫斯科發生鐵路大罷工，還波及到電報和電話通訊，一週之後，此一罷工行動蔓延到全國各地，整個俄國已經幾乎全面癱瘓。同時，各地農民也跟著一起暴動，他們燒燬了兩千個農莊，並推派代表前往莫斯科議會，同時組織「農人聯盟」(Peasant Union)。黑海地區的西巴斯托波(Sebastopol)一處海軍兵營發生叛變，一位士兵因為不滿長官禁止他們離營參加政治會議，憤而公然開槍射殺兩位軍官，緊接著許多西巴斯托波的士兵和黑海艦隊紛紛加入叛變的行動，這印證了列寧當初的想法：「波坦金戰艦」的叛變行為有可能引發骨牌效應。這些叛變行動夾雜著某些人對立憲會議的要求，不久，這波鬧事行動也蔓延到了波蘭、芬蘭、立陶宛、喬治亞等這些俄羅斯帝國的附庸國，他們焚燒俄文教科書，攻擊俄國地主和官吏。一九〇五年這次的革命行動中，估計有兩百八十萬人參加示威遊行反對沙皇政府，而且這次的革命有些類似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也波及到了許多其他國家，奧地利、德國、保加利亞、義大利及法國各地都不斷傳來大罷工的消息。

蘇維埃組織聲明開放新聞自由，成立新聞檢查的專屬部門，同時發動罷工立法一天八小時工作時間的要求，抵制處決克朗鎮(Kronstadt)叛變的海軍士兵，並要求解除波蘭地區的戒嚴命令。蘇維埃

趁機組織新的工會，解決一些失業問題，不久竟然能夠插手——托洛斯基要求無政府主義者注意這個行動——接管一些政府已經無法控制的部門，到了十一月底，他們居然掌控了一百四十七家工廠，三十四間工作坊，以及十六個工會——管理的人數達二十萬人之多。俄國各地有許多人都紛紛來跟他們投訴疾苦，這些疾苦包括沙皇政府對他們的各種壓迫，以及退休老兵生活無依無靠和哥薩克人（Cossacks）被迫離開終身的工作崗位等等，不一而足。最後，蘇維埃頒布一個「財政宣言」（Financial Manifesto），要人民停止繳稅，並要他們向工作單位要求給予黃金或足重的銀以支付其工作酬勞，他們同時向外國資本家警告，一旦他們革命成功，沙皇政府向他們舉借的債務，新的革命政府一概不予以承認。

然而，蘇維埃組織只持續五十天而已，內政部長下令射殺農人並焚燬他們的屋子，西巴斯托波叛變的軍艦被四面八方的火力圍剿，軍艦上叛變的士兵不是落水溺死，就是被屠殺殆盡，無一倖免。聖彼得堡的蘇維埃在其頒布「財政宣言」兩天之後即悉數被捕，莫斯科地區的工人罷工行動在聞悉蘇維埃瓦解之後，竟演變為和當局對峙的慘烈內戰，其慘烈程度不亞於當年「巴黎公社」的殺伐，八千名工人，其中只有大約兩千人有武力裝備，和沙皇的騎兵展開激烈的肉搏廝殺，持續九天之久，最後被由聖彼得堡派來的沙皇禁衛軍一網打盡，這些軍隊不只屠殺工人，同時對著平民住宅頻頻濺射火砲。在一片血肉模糊的廢墟中，豎起一塊牌子，旁邊吊著一塊人肉，牌子上面寫著：「請手下留情。」這些禁衛軍士兵早有上級指示，「不必留情，格殺勿論」，他們在莫斯科工人住宅區大肆焚燒殺戮，屠殺了約一千人左右，不分男女老幼，連嬰兒都不放過，受傷的則抬上救護車，然後將他們推落到街道上，讓他們當街活活摔死。從加彭神父率眾遊行請願到隔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一國會誕生，這之間沙皇政府一共屠殺了一萬四千人，處決一千多人，兩萬人受傷，被逮捕的則有七萬人之

譜。

托洛斯基在庭上受審的時候，他像當年的拉薩爾一樣，本來是被告，卻咄咄逼人擺出一副控告人的姿態。「庭上諸位判官先生，」他慷慨激昂的說：

檢察處邀請你們來審判工人代表的蘇維埃鼓動並武裝工人和政府當局對抗，如果你們要我回答有沒有這回事，我要斬釘截鐵回答：沒錯！是的，我願意接受此一控告，但我要保留一個條件，只是我不知道檢察官大人願不願意接受這個條件，或者庭上願不願意同意這個條件。首先，我要請問你們所謂的「政府當局」指的是什麼？指的是我們俄國目前的真正政府是嗎？這個政府長久以來一直在和國家背道而馳，一直在萎縮，萎縮到只剩下警察和軍隊，以及一些官僚寄生蟲。我們此時此刻的俄國已經不具備有一個國家該有的功能，卻只是淪為一個只會屠殺百姓的自動機器，這樣一個只會塗炭生靈的政府，我不知道要如何去稱呼它，如果你們願意承認所有這些屠殺和焚燒虜掠——如果你們願意承認發生在特威爾(Tver)、羅斯托夫(Rostov)、庫爾斯克(Kursk)、塞德利茲(Selitz)等這些地方的一切，以及發生在季辛幼夫(Kishinyov)、敖得薩、貝洛斯托克(Belostok)等這些地方的一切，如果你們願意承認所有這些均是出自我們俄羅斯帝國政府當局的手筆，那麼，我也就一樣願意承認，的確沒錯，我們在十月和十一月之中的確曾經以武力和俄羅斯帝國的現存政府當局對抗過。

我們看到一張托洛斯基被關在拘留所牢房裡的有趣照片，五短身材，寬闊的肩膀，一頭黑髮，下垂的鼻子，小鬍子，藍色的眼珠，兩眼炯炯發亮，看起來的確很像老鷹，由於眼睛有神，兩顆眼

珠子彷彿要從單眼鏡透視出來似的，也許想透視他那堅毅的靈魂。他坐在牢房裡，一隻腳跨在另一隻腳上面，雙手擺在一隻腳的膝蓋上，表情不慍不火，甚至有些溫馴，但整個看來倒很像一個國家的頭子正面臨重大危機，隨便擺個姿勢給照相師拍照。

他這次被判終身流刑，必須回到西伯利亞北極圈，不過，根本還來不及到達目的地，他在半路上就逃脫掉了。他到半路一個中途站時假裝生病，然後就順利開脫了，他之所以能夠那麼輕易開脫，乃是因為看管很鬆，他們認為犯人即使能夠脫逃，只能沿著原路回去，那勢必會再被捕捉，至於其他方向，都是死路一條，在歐布河(Oub)和烏拉山之間是一片沒有人煙的荒地——只有一片雪地和少數操不同語言的原住民住的茅屋，而且當時正是二月大寒天，是最蕭瑟的季節。然而，托洛斯基終究還是脫逃成功了，他說服當地一位農夫用鹿拉著雪橇，和他一起橫過一片荒野，在一星期之中走了四百三十英里路，然後一個人騎馬越過烏拉山，喬裝成政府官員，他還在路上打電報給薛多娃，兩個人會合之後，一起搭火車一路直奔芬蘭，當時列寧和馬托夫正在那裡。

這以後幾年之間的革命發展，托洛斯基全寫在他那本精彩的《一九〇五年》(1905)一書之中。一般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撰寫自己所參與的革命行動，大都離不開從恩格斯筆下的一八四八年革命開始，但托洛斯基這本書則超越了恩格斯的範圍，他自己在書中扮演主角，他的題材也更為廣泛，而且筆調上也充滿戲劇性手法，從某個角度看，《一九〇五年》一書可以看成是他未來大革命歷史精彩的先驅導言，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尚未真正掌握事件發展的脈絡，但他已經能夠在這上面發揮或多或少的影响力，同時在未來行動上產生了一些指導的作用。歷史往前發展，歷史的寫作沿著不同路線進行，最後這些不同路線則匯合在一起。

托洛斯基檢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之所以失敗，主要在於攤牌的關鍵時刻裡，沙皇掌握了武力

行動的先機，他所控制的海軍和陸軍，其成員主要來自農人階級，他們在軍中衣食無憂，等於爲沙皇所收買，也就失去了反叛的原動力，俄國革命的原動力只能寄望於無產階級，他們的訴求正如同法國十八世紀末中產階級的訴求，蘇維埃背後的主力基礎正是無產階級，至於社會民主黨在當前無疑已經擁有相當的行動經驗，其主導權則是毋庸置疑。

但目前的問題則是，革命已經走到這個地步，社會民主黨要如何調整自己的腳步，他們必須決定如何繼續導引革命的方向，他們很清楚俄國的特殊處境，在西方國家中並無先例可循，孟什維克只期盼中產階級的民主，他們並不想完全剷除資本主義，他們期待一個以自由派人士爲主的政府，社會主義者只淪爲一個附庸的反對黨而已。列寧的理論則是主張必須由無產階級和農人專政，走的完全是西方的模式。托洛斯基在芬蘭時發展出一套「不斷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的理論，這套理論和列寧後來的想法完全不謀而合，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布爾什維克掌權之後，即是以此爲其指導方針。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所寫的《共產主義原理》一書中即闡明，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只限定在一個單獨的國家之中，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必然一起跟進。現在托洛斯基宣稱，不只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不能全然保持民主——因爲爲了滿足工人的需求，只有訴諸社會主義一途，以剷除資本主義的存在——而且，以俄國落後的經濟水平看，其社會主義革命必須與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並駕齊驅一起進行。托洛斯基堅持此一歷史發展的路線，此後永久不變。

從這時候起，到他於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之後回到俄國，關於托洛斯基的所作所爲，我們不打算在此加以贅述，簡而言之，他以特立獨行的姿態穿梭於維也納、柏林、蘇黎世、貝爾格勒、巴黎及馬德里等歐洲大城市之間。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爆發後，他在歐洲各國躲躲藏藏，逃避各國政府

的通緝，最後，有一位派駐法國的俄國上校被他的部下謀殺，托洛斯基在巴黎發表一篇聲明，因而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他轉而來到美國。俄國新的一場大革命爆發時他正逗留在紐約，他兼程取道英國返俄，在英國時被英國政府拘留了一個月之久，當時俄國的臨時政府不希望他回來，要求英國政府繼續扣留他，但蘇維埃分子則堅持要求放人。

托洛斯基說，他早在一九〇五年和孟什維克合作時即已對他們感到失望，即使群眾仍舊支持他們，但他已經覺醒過來，他說：「我感到訝異，而且疑惑不解，即使像馬托夫那樣絕頂聰明的人，對事態的發展竟會弄不清楚。」一九一七年，托洛斯基和列寧這兩張馬克思主義的王牌終於正式攜手一起合作。

第二十八章

托洛斯基向歷史認同

我們看得出來，馬克思主義到本世紀初期已經發展到了一個相當的地步，這剛好給一位才氣煥發且野心勃勃的年輕人提供一個大展身手的機會，托洛斯基不像馬克思那樣是具有原創性的偉大思想家，他也不像列寧那樣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人物，他甚至連偉大的反動家都談不上，他只是在一個風雲際會的革命狂潮中躬逢其盛，在其中尋得了適當的立腳位置，然後大肆發揮其長才。對整個體制而言，他既無創新亦無破壞，但他站在最前線，成爲第一流的角色。

學生時代的托洛斯基在同學之間經常表現出辯才無礙且善於推理的一面，但他不知道他的目標是什麼，他只是爲了表現而表現，直到有一天他成爲馬克思主義的一員大將——他才知道他的才幹終於有用武之地，他要革命，他要改造世界。他很清楚他所扮演的角色，他知道這是一場大賭注，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身家性命和舒適生活，以及家庭和朋友，全都壓在此一賭注上面，他的最後回報可能是政治權力的榮耀，這似乎也是馬克思主義有可能提供的唯一世俗回饋，但他同時也在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光環中學到完美的革命方法和革命準則。

托洛斯基有一段話提到他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對他如何產生重大的影響，這似乎可用來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立的傳統。起先托洛斯基曾經打算和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一起工作，有時

候工人稱這些人爲「博士先生同志」，他們長久以來深受日耳曼的學術主義和維也納的懷疑主義所杯葛，那位鼎鼎大名的阿德勒博士有一次宣稱說，他自己的政治立場寧可建立在基督教的啓示錄教義基礎上，而不是唯物辯證法上面，托洛斯基爲此大感吃驚。

托洛斯基說：

在這種氣氛之下，我特別感到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對我的重要性，我對這本書愛不釋手，他們的許多觀念印證了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同時也提供給我許多新的行事準則。社會民主黨的那些維也納領導者使用和我相同的法則，可是只要稍加注意，我們就會發現我和他們對同一個觀念竟抱持不同的詮釋方式，我和他們之間的互相認同原來是表面而短暫的，是不真實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通信對我而言，他們所揭露的絕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心理學的作用，越是仔細閱讀他們的書信，我就越覺得我和他們在心理作用上原來是聲氣相通的，我對人和對一些觀念的態度與他們是完全一致的，我知道他們有許多充滿憤怒和仇恨的部分沒表達出來，這我能夠加以想像和猜測。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徹頭徹尾的革命主義者，但他們並未流於狹隘觀念或苦行僧作風，他們兩人，特別是恩格斯，對人類的了解可謂十分透徹，因此他們的革命風格乃遠遠超越一切，他們的個性和外觀絕無瑣碎粗俗之傾向，他們的品味、心性及戲謔——有時固然流於平凡——永遠具有其高貴精神的特質。他們在批判一個人時可能毫不留情，但絕不流於無謂的謾罵（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即托洛斯基在寫作《我的自傳》(My Life)時，他尚未讀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全集，他們的通信全集於一九二九年由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出版，他的自傳也出版於此一年），他們可能無情，但絕不背叛，他們對一切世俗的榮耀如頭

銜地位等根本不屑一顧，在世俗之輩眼中看來，他們的貴族氣概表現在他們的革命精神上面，其特質是不顧一切，勇往直前。

然而，我們在此可以看出來，托洛斯基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的興趣焦點乃在於態度本身，而不是藉由此一態度所完成的其他一切，他把自己看成是革命貴族。盧納察斯基談到，社會主義革命黨的領導人查諾夫（V. M. Chernov）在十月革命之前，接受了臨時政府給他安排的一個位置，當時托洛斯基大叫道：「多麼沒出息！放棄自己的歷史地位去屈就一個小小的部長位置！」在他看來，真正的榮耀不在一時，而在長遠，盧納察斯基說：「托洛斯基很重視他自己所扮演的歷史角色，他會犧牲一切，甚至犧牲個人的性命，只爲了維護他在後人心目中完美的革命領導者形象。」洛克哈特（Bruce Lockhart）於一九一八年二月首度訪問托洛斯基之後，於日記中如此寫道：「他有一點很令我訝異，他這個人隨時可以爲俄國犧牲性命，但必須有很多觀眾看他表演才行。」這讓我們感覺人類進步的要素乃操在他手中：真理的爭執就是托洛斯基的爭執。他在自傳中提到小時候在學校裡由於鼓動同學反抗法文老師而被學校勒令休學一事，他把這些同學劃分爲三組：第一組是「背叛」他的，第二組「維護」他，第三組「保持中立」。第一組的同學他「斷然絕交」，第二組的同學則「加以培養」，他說：「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的政治考驗，我這樣加以劃分：背叛我的是一組，支持我的是一組，保持中立的是一組。在我以後的生涯當中，永遠有這三組不同的人存在，我不斷在許多不同環境中遇到這三類不同的人。」我們讀托洛斯基的自傳，很容易被他個人的情感所導引，他不像列寧那麼冷靜，他習慣於感情用事，他經常必須透過別人來證明自己的一切。

我們近年來看到托洛斯基辛苦幫忙建立的國家已經逐漸淪為羅伯斯比式的恐怖獨裁作風，而他自己也戲劇性地淪為巴貝夫式的反叛角色，這一切似乎已經大大違背了他的所有原則。我們看到列寧的繼承者重寫俄國革命歷史，主要就是爲了把托洛斯基排除在外，甚至把托洛斯基從一個國家追逐到另一個國家，迫害他的兒女，置他們於死地而後已，然後公開譴責他的所有罪狀，這中間包含許多惡毒拙劣的誹謗和謾罵，甚至拿他和「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即俄國沙皇伊凡四世[Ivan IV, 1530-1584])，對臣僚實行恐怖統治)相提並論，他們所列他所有莫須有的罪狀——直到全世界都知道史達林怎樣在迫害托洛斯基，彷彿三〇年代的蘇維埃政客不將這位無家可歸的落難人物剷除，則不足以否定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其實創造托洛斯基這個角色的不只是托洛斯基自己，他的敵人多少也爲他創造了許多戲劇性的傳奇成分。當革命的火花已經在蘇聯境內冷卻下來，而西方世界的進步思想也正逐漸式微之際，托洛斯基卻反而像是一座燈塔一樣，在黑暗的海面上散發著耀眼的光芒。

但我們必須從內在方面來看這個人，我們必須了解他的真正傾向和他所奉行的準則是什麼。

他以前還在學校唸書的時候，每次從敖得薩回到鄉下農莊，總是隨身攜帶學校的課本，穿著城市人的衣著，還戴著新潮的眼鏡，一副整潔光鮮的樣子，他總覺得與鄉人格格不入，覺得自己比他們高一等，這種高人一等的感覺以後一直存在於他和群眾的關係之中，他在《我的自傳》中就坦白承認，他和一般群眾有著相當的距離，他起初對社會的抗議行爲並非出於「對受壓迫者的同情心」，而是基於「對不公正現象的忿怒」，「即使後來我的革命思想已經成形，我對群眾還是抱持不信任的態度，因此對革命行動也就抱持一種抽象拘泥甚至是懷疑的觀點。我跟自己抗爭得很厲害，我不斷讀書和思考，並且不斷透過經驗，藉此來征服我的偏執傾向。」盧納察斯基和許多認識托洛斯基的人都一致認爲：「托洛斯基專橫跋扈，不能或不願意去關注群眾，這和列寧非常不同，這使得他始

終落得孤獨一身。」他認為——他在一篇談賽琳 (Louis-Ferdinand Céline) 的書的文章中如此說——「革命運動的本質即在於把人類帶離狹隘自限的黑夜世界。」沒有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像他那樣，那麼以自我為中心去看待革命運動。

他既無列寧那種建立融洽人際關係的才幹，又無史達林那種能夠建立自己的世界並操縱公眾輿論的狡猾政治手腕，以至於他直到今天仍處於與一九〇三年黨分裂時期及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期沒有兩樣的落魄地位，即使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他回到了俄國，真正支持他的人也是寥寥無幾，他的背後根本沒什麼群眾基礎。唯一的例外是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當時革命戰事爆發危機，他以戰爭委員代表的身分前往前線指揮戰事，這時他總算有機會顯露他帶領群眾作戰的才幹，他搭著武裝火車風塵僕僕穿梭於各前線之間，他一邊激勵士氣，一邊火速調度補給，同時埋頭撰寫戰事報導。另一方面，他不斷對老一代訓練出來的軍事專才施加壓力，要他們為革命貢獻作戰技術，居然還十分成功，他同時處決了許多臨陣脫逃的軍官，由於他紀律嚴明的鐵腕作風，前線的戰事總算穩定了下來。當彼得格勒陷入危險之際，列寧當時主張棄城退卻，作戰司令官也已下達所有士兵準備後退的命令，這時托洛斯基突然跳上一匹馬，揮動手槍，大叫道：「兄弟們，大家拿出勇氣來，托洛斯基同志來領導你們作戰！」整個軍團跟著回到作戰位置，原來那位司令官身先士卒，衝到最危險的火線位置開始指揮作戰，自己雙腿因而受到了重傷，許多士兵奮勇上前，拿著槍和刺刀對抗敵方的坦克。在政治上，托洛斯基也是如此，洛克哈特說，托洛斯基每當被逼到絕境時，他就會發揮出驚人無比的力量。後來史達林要謀殺迫害他而所有歐洲國家又都拒絕給他庇護時，他只好又拿出堅毅作風來防衛自己，而他這時的聲望也達到了頂點。

所有這些都因背後有一股力量在支撐他，而支撐他的這股力量，與其說是追求人類幸福的欲望，

倒不如說是出於對人類文化的一股熱忱，如他在《文學與革命》(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一書中所說，現在社會主義終於有可能造就出「真正的人類文化」，開始要照射整個人類社會。托洛斯基此時心目中所看到的人類現象，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所繪製的社會發展圖表，而不是人類生命的榮枯興衰。當然，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行動，但除非他已經了解處境且已全然掌握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他絕不輕舉妄動。他寫道：

從早年開始，我即在心中建立一種根深柢固的想法，即一般性勝於獨特性，法則勝於事實，理論勝於個人經驗。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想法更加確定……已經成爲我文學和政治作品中心主題的一個重要部分。笨拙的經驗主義以及對事實不分青紅皂白的盲目崇拜，這經常只會淪於想像而產生錯誤的詮釋，這令我無比厭惡。我要超越事實去尋找法則……在任何領域，只有當我手上握有一般性的線索之時，我才覺得能夠活動自如。

這樣的哲學觀念有壞的一面，同時也有好的一面。壞的一面是，這會產生一種不良後果，即人受環境影響所產生的領悟會取代不偏不倚的邏輯推理——我們別忘了他在數學上的才能——比如他在政治上的判斷即產生此種錯誤，淪入一種坐井觀天的偏差。好的一面是——當他在檢視已經發生的事件，已經有事實的基礎呈現時——這會形成相當有見地的歷史眼光。托洛斯基和一些典型的馬克思主義專家不同，因爲他會編織一些抽象的「命題」，這可以提供給他許多足以容納發揮想像的空間，我們會在他所寫的作品中看到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群眾行爲，而且字裡行間也充滿許多俄國作家傳統特有的現實洞察力，同時又展現著他個人性格，這些特質使得他的所有文字作品不時流

露著某種美感，令人讀來不忍釋手。《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我的自傳》，以及有關列寧的傳記和《文學與革命》等這幾本書，都可以看成是當代絕佳文學作品的代表。

他說：「社會革命裡的激進主義已然成爲我內在生命的永久主軸，我人生中的一切目標，我的行事準則，以及我一些散漫的意識形態等，皆是由此衍生而來。」是的，生命中的永久主軸有時會成爲我們無法掌握的一種賭注，他曾告訴我們，他在前半生的過程中曾經有幾次抗拒行爲而延遲了自己的發展：他曾經「抗拒」第一次革命，然後是亞歷珊卓拉和馬克思主義，接著則是藝術，還有，在一九一七年之前，他也始終都在抗拒列寧。然而，當他一旦放出賭注的繩索，他立即變成有如脫韁的野馬。人類心靈的發展有時實在微妙難解，它在發展的過程中有時難免忽略一些重要的新要素，托洛斯基在其晚期的作品中不斷透露，他其實從革命一開始即不斷走向列寧(他承認，他和列寧有衝突，但他不斷壓抑這些衝突，以便尋得一個權威的主軸)，等到列寧死後，列寧即成爲他心目中的偶像，他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一樣，都是一種教條式的說理，他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那種探測挖掘的本領，即使他有寫作才華，卻又沒有列寧那種處理人類實際事務的才幹，他最後只得將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寫入他的作品之中。

我們不妨看看這到底代表什麼意義。首先，就我所知道，沒有一位第一流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夠像托洛斯基那樣在作品中，把馬克思主義得自黑格爾的歷史觀念，像神學家在詮釋神學那樣，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這裡有幾句話摘自他談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書，寫於該事件發生不久之後：「如果親王不能很平和的改革這個國家，歷史把他置放到政府的領導位置，他只是努力維持秩序：摧毀政治的幻象和中產階級的偏見。」「這時歷史把加彭神父帶了進來，讓他帶領群眾示威請願，徒然以

失敗收場。」「每當我們重讀這些古典人物(馬克思、恩格斯及拉薩爾)的精彩通信內容——一個在柏林，另兩個在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倫敦——他們虎視眈眈注視著所有政治事件的進展，他們詳盡記錄這一切，並預言革命不久即將到來。每當我們重讀這些書信，我們就可以深深感受到一股革命的火苗就要沸騰起來，彷彿大家已經迫不及待，卻又表現得從容自在，我們忍不住要去懷疑那殘酷的歷史辯證法，因為他們爲了達到一時的目標，竟去和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庸才互相附和，他們已經失去理性而陷身於革命的瘋狂之中。」歷史以其辯證的三位一體選擇了史維亞托波克——密爾斯基(Svyatopolk-Mirsky)親王來打破中產階級的迷夢，並迫使加彭神父引發行動來下達革命結論，最後則粉碎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火焰。也許我們必須用「神旨」和「上帝」來取代「歷史」和「歷史辯證法」這兩組字眼，才能了解上述的玄奧論調，托洛斯基的所有著作中到處充塞著歷史的神旨力量，查普曼(John Jay Chapman)談到詩人伯朗寧(Robert Browning, 1812-1869, 英國詩人)時說，上帝在伯朗寧的詩中爲他創造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感嘆詞及介系詞等，托洛斯基筆下的歷史也是如此——充滿了神旨。直到最近，他淪落於孤獨的放逐生涯中，這位嚴酷的「歷史」角色不再出現於他的文字之中，他要忙著和蘇聯當局的敵手對抗，這時候「歷史」的臉孔不見了。

他真正發揮出「歷史」的行動力量，大約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後的第一次蘇維埃大會上，他擺出一副先知的姿態，以輕蔑和憤怒的口吻把馬托夫和他的徒眾趕出會場，在這布爾什維克勝利的顛峰時刻裡，他大叫道：「你們這些已經被孤立的可憐傢伙，你們完蛋了，你們所扮演的角色已經結束了，從現在開始，請你們回去你們的地盤——進入歷史的垃圾堆去吧！」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思想看，這段話實在頗爲耐人尋味，試想，把自己投入歷史的洪流之中，只是爲了避免成爲「被孤立的可怜傢伙」，而當你在歷史的洪流中失敗了，你就必須「進入歷史的垃圾堆」，變成

完全無用之物。今天，我們也許同意布爾什維克的做法，剔除馬托夫這個人，因為他不是個有行動能力的人，但他對布爾什維克的批判卻又不能不說慧眼獨具，十分發人深省。他說，成立一個社會主義政權不符合馬克思所設想的樣子，其結果必然無法達到馬克思所預期的理想，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其統治階層所組成的方式應該以民主共和為主，由全民投票方式來選舉政府官員，如今「所有權力歸於蘇維埃」的口號卻被列寧竄改為「所有權力歸於布爾什維克黨」，形成不分青紅皂白排除異己的獨裁形式，許多人則只好不幸淪入「歷史的垃圾堆」。試看今天史達林的蘇維埃政權，托洛斯基正是這群不幸淪入「歷史垃圾堆」中的人之一，成為「被孤立的可憐傢伙」，但他可能這樣想，正如同易卜生的《人民公敵》(Enemy of People)一劇中的史托曼醫生所說，最堅強的人經常總是被孤立的。

因此，馬克思主義在道德上的混淆在托洛斯基身上可說是顯露無遺，對這個問題提出批判質疑的，已經不再是伯恩斯坦溫和的康德哲學，而是活生生的由馬克思主義所建立的國度所發生的許多事件。我在此打算引述托洛斯基所寫列寧的傳記第一冊，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法文譯本，當時上述問題尚未引起特別的注意，托洛斯基寫到列寧的母親時這樣說道：「她在經過一連串命運的打擊之後，一股源源不絕的道德力量讓她能夠重新建立內在的平衡，同時去支持需要她幫忙的人。她的這種道德天賦可以說是與生俱來，但必須與她很接近才能感受出來，在這世界上，如果缺少這一類慷慨的女性本質，則生命立即失去意義。」他談到列寧小時候承認的那則謊話，他說：「我們可以看出來，對列寧而言，道德的絕對必要並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列寧的許多敵人都能夠認同這點。」列寧的姊姊安娜說她的哥哥亞歷山大不懂得說謊話，這在謀刺沙皇的審判法庭上已經有所說明，關於這點，托洛斯基則說：「我們忍不住要說，多麼可惜！這樣的心性，在無情的社會鬥爭中，一牽扯到

政治，竟落得毫無自衛的能力。然而，許多嚴厲的道德家，他們大都也是職業的說謊家，則把說謊看成是社會衝突的一種反映，甚至是一種和社會戰鬥的武器，以個人的道德努力想要逃脫這張社會謊言的大網，那是不可能的。」以前列寧有一位敵手指控他「毫無道德意識」，托洛斯基說：「現在，這裡所謂的毫無道德意識似乎包含了：爲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是的，列寧不是教皇或康德的道德崇拜者，教皇或康德高高在上爲我們芸芸眾生頒布道德的教條，他們不必和這個世界戰鬥。列寧追逐超個人的偉大目標，他的所有道德必須以此一目標爲主。」

兩年後，一九三八年莫斯科的三月大審之後，托洛斯基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叫做《他們的道德和我們的道德》(Their Morals and Ours) [刊於一九三八年六月號的《新國際》(New International)]月刊，當時有許多人批評克里姆林宮的諸多錯誤措施，以及對布爾什維克老黨員的無情打擊，主要就是根源於布爾什維克本身太過於熱中耶穌會式的政策，托洛斯基的這篇文章重點即是針對此一批評提出反駁，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他談論此一問題的主要代表作，那麼他在文章中說了些什麼呢？首先是對耶穌會的詆毀，許多人認爲他們爲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這種說法實在有失公平，他們所抱持的宗旨是，手段無關好壞，主要是要能夠完成目標，如果爲了邪惡的目的而無端殺人，這當然是犯罪行爲，可是如果射殺一隻正在咬小孩的瘋狗，這就是一樁美德了。「耶穌會採取一種軍事組織方式，嚴格遵循中央集權，擺出一副挑釁姿態，不只威脅他們的敵人，連他們的盟友也不能倖免。」他們在他們那個時代裡的確表現得比天主教其他教士更爲優越，因爲他們「行動一致，更爲大膽，也更精明能幹」。可是當他們一旦淪於「官僚」作風，紀律不再那麼嚴明時，他們的整個秩序就跟著瓦解了。

因此，說謊和殺戮對他們而言，並不成其爲道德的羈絆，因爲他們藉此手段可以達到目的，而

此一手段在戰時更是不可或缺，這取決於我們要不要贏得戰爭，只要能贏得戰爭，用什麼手段的問題就不是那麼重要了。托洛斯基在上述文章中不自覺地不斷強調此一現象，然後進一步大肆抱怨克里姆林宮當局的「假道學」作風和對「虛偽的公開崇拜」，同時抨擊政治局裡一位誹謗他的人是「沒有榮譽感和良知的中產階級」。我們試想，當初布爾什維克黨的人排斥孟什維克黨的人，他們的榮譽感和良知又在哪裡呢？我們在另一段文字中找到了答案：「這裡的關鍵不在於對仗的陣營中哪一個陣營會造成多少受害者的問題，美國的南北戰爭中，北軍的殘酷和南軍的殘酷，以歷史的眼光看，本來就不可同日而語，一位奴隸的主人以殘暴的手段束縛住他的奴隸，以及一位奴隸以殘暴的手段要掙脫束縛——我們總不至於說他們在道德的法庭面前是平等的吧！」因此，在互相鬥爭的階級上面有一個道德的法庭，而主宰這個道德法庭的正是「歷史女神」。對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一般人而言，他們看待美國南北戰爭的眼光必定不是如此，他們不會夾帶價值判斷去看北軍和南軍的道德問題，那麼，即使假定有一方代表比較開明的力量，另一方則否，一個歷史學家在看這段歷史的時候，是否該拿出「不同的標準」去評判一方是英雄主義，另一方是殘酷？在使用「殘酷」這個字眼時，托洛斯基指的不是一般共產黨人心目中的道德判斷，而是指一般語言的含義（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俄文中「殘酷」這個字眼在譯成英文時應該是「嚴酷」的意思比較恰當，這在前面我們引用列寧批判馬托夫的話中已經出現過。「嚴酷」沒有道德的含義，「殘酷」則有。但是在俄國人的生命，不管是過去或現在，都含有太多殘酷的因素，已經成爲稀鬆平常，以至於「殘酷」這個字眼似乎跟著失去了其道德含義。當雙方衝突得很厲害的時候，道德的共同概念頓時失去意義，雙方各自堅持只有自己的道德概念才是真理，托洛斯基這裡所處理的正是此種現象。我們外國人許久以來常爲俄國官方的謊言所迷惑，有時對他們所提出來的道德概念竟也跟著混淆了）。

也許我們可以設定一種觀點來面對這種矛盾現象，藉此來說明我們的善惡觀念有多少比例是真實的，有多少比例是由階級所決定的，可以比托洛斯基在此所設定的更為恰當些，我在討論「辯證法」那一章的結尾部分會如此嘗試做過。但是我們可能沒有人像托洛斯基那樣真正與階級鬥爭奮鬥過，要真正去建立這方面的正確觀點誠非易事。而且共產黨自身的爭執糾紛在和平時代的關係中已不復存在，這形成了托洛斯基和我們所面對的問題之間的障礙，有許多爭執已經是純屬個人的問題——或者說，屬於社會階級的問題——關於這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宣言》一書中率先探討，當時有人批判共產主義「否定宗教和道德……以及一般社會體制不可或缺永恆真理」，馬克思和恩格斯反駁說，既然一般社會體制全都建立在剝削的基礎上面，這些東西就毫無價值可言。同時有人批評共產主義摧毀婚姻和家庭，他們則反駁說，工業體制下的家庭關係毫無意義可言。如此看來，不同階級的人類的確有其不同的行為模式和道德準則，那麼這個問題就沒有爭辯之餘地了。托洛斯基在此對這個問題下的定論比《共產主義宣言》更為偏頗：這些人是誰，竟膽敢探討我們的道德問題？他們都是些「歷史上微不足道的小扒手」。我們看他這篇文章的標題〈他們的道德和我們的道德〉，顯然有意挑起爭論，藉此引開我們對問題的注意力。

他再度回到列寧身上，「列寧的無道德意識，」他說：「也就是說，他拒絕高層階級的道德，但這並未阻撓他終生忠於同一個理想，並未阻撓他去為受壓迫者貢獻心力，並未阻撓他在思想上展現高度的良心以及行動上展現大無畏的精神，同時也未阻撓他對一般工人、女人及小孩流露平易近人的態度，如此說來，他的無道德意識難道不是一種高層次的人類道德的表現嗎？」的確不錯，列寧有他自己的道德邏輯，但我們卻發現他自己還是始終為這種道德邏輯所苦，只不過是他不像托洛斯基那樣仔細去加以檢視和歸納這種邏輯，托洛斯基今天一直努力把過去的一切和列寧緊緊結合在

一起——他要我們知道這世界上曾經有過一位富於人道而又勇於犧牲奉獻的布爾什維克偉大人物。

我們不會認為托洛斯基有何特別富於人道的表現，他一方面要整頓社會主義的路線，以期能夠彰顯必要的效率，另一方面又要展現馬克思主義無情的一面，特別是他手中掌有權力的時候。當然，整個布爾什維克的作風是獨裁，而絕不是民主，對一個沒有民主概念的民族而言，其革命政權會走向獨裁專制乃是必然的結果，特別是革命之後幾年的內戰，更迫使他們在面臨生死存亡關頭時只有拿出鐵腕作風一途，布爾什維克曾經寬容對待其政敵，後來也警醒了過來。他們曾經釋放一位叫做克拉斯諾夫 (P. N. Krasov) 的前沙皇麾下的將軍，他們當時相信他會遵守諾言，願意放棄和布爾什維克政權對抗，但釋放不久之後，他立即回頭帶兵攻打他們。這場危機激起了托洛斯基的所有潛力，他顧不得道義和情感，也不理會百姓的反應，他只有施展鐵腕作風一途。一九二〇年他出版一本小冊子，叫做《為恐怖主義辯護》(The Defense of Terrorism)，藉以反駁當時考茨基所出版的一本小冊子中對布爾什維克的批判，他為布爾什維克大肆殺戮軍事和政治的敵人而辯護，他同時也為自己所策劃的強制軍事勞動辯護，托洛斯基不會忘記提醒我們，這些東西是「在戰鬥列車上以及在內戰的砲火下所寫就」，但我們讀來卻深深感受到一股可怖的意志力量，要對受其統治主宰的對象毫不留情加以鞭策宰割。

他不惜處決許多臨陣脫逃的兵士，藉此整頓紅軍紀律，擊敗白軍，然後不顧列寧的意見，貿然把好好的一支軍隊改編成爲勞動大軍，許多兵士發現他們賣力剷除了革命的敵人之後，竟然要轉而從事公共勞動，許多人遂紛紛棄械脫逃。另一方面，這位「戰爭委員的代表」又堅持反對工會存在，他認為工會是勞工爲了對抗雇主而存在，如今他們已經建立了以工人爲主的共和國，工會就不再存在，

存在的必要。列寧跟他解釋他們現在所建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還不完全是個工人的共和國——因爲主導工人的上層官員並非工人階級出身——而寧可說是一個「經過官僚扭曲的工人共和國」。

一九二一年的年初，他們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這個政策允許適度的個人交易，後來因爲農民反對而作罷，然而這個政策卻已經和共產主義的理想有了抵觸，早在一九二〇年二月托洛斯基提出這個腹案時，列寧便表示不贊同。這時發生了一件意外事件，雖然很快即被淡忘，但對後來俄國整個政體的發展則不能說沒有影響作用。一九二二年二月，克朗鎮海軍基地的水兵爲了保護農民的權益而發動叛變，這些水兵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中曾經立下許多汗馬功勞，這次叛變很快即被布爾什維克的軍隊所收平。托洛斯基事後發表聲明，聲稱克朗鎮的水兵不再是十月革命的英雄，因爲他們的叛變是一種反革命的行爲。叛變發生當時，「新經濟政策」當局已經接受叛變士兵的要求，卻同時挾持叛變者的家屬，然後乘其不備悉數屠殺殆盡——這包括所有水兵和兵營裡的一些妓女，無一倖免。我們記得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托洛斯基對克朗鎮水兵的叛變行爲還甚感欣慰，聖彼得堡的蘇維埃組織還努力爲他們開脫罪名，以免於被沙皇處決。我們了解到托洛斯基對自由的熱誠實在是負面多於正面，他不能容忍別人和他站在對立的地位。他在一九二四年出版的《文學與革命》一書中，即使標榜文學不爲政治服務，甚至反對文學淪爲黨的宣傳工具，然而他還是努力把蘇聯其他作家納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如有不聽話的，便加以申斥圍剿。

這段期間列寧開始對托洛斯基表示出責難的意見，這是他們之間嚴重不和的時候，列寧責難他過於「熱中知性活動而忽略了實際事務的問題」。列寧死前不久，在下給中央政治局的遺囑條子中就說，托洛斯基是中央政治局裡頭「最能幹的人」，但同時也批評他「自視過高，對行政事務過於躁進」。在我們眼中看來，托洛斯基可以說是個信仰理性的英雄人物，他在自傳中說，小時候每次聽到讀理

科的同學談論「不吉祥」的禮拜一，或談論在路上遇到神父之類的瑣事，他會忍不住很生氣。另外，每當他在亞努卡鄉下地區看到人們在測量梯形田地時，他用歐幾里德(Euclid)定理很快即可測出其大小，但人們硬是不肯相信他，他們寧可花幾個小時一步一步測量，這時他就會氣得跳腳，並破口大罵（就像我們上述他在罵考茨基那般）。然而，馬克思畢竟不是歐幾里德，在革命的時刻裡，也許你可以輕易測出社會力量的水平，如同托洛斯基喜歡形容的，社會力量的平行四邊形，但社會畢竟是有機的，它的形狀會變化，你必須時時注意人們的想法。托洛斯基終其一生不斷努力在詮釋馬克思主義理性的一面中，什麼是妥當的，以及什麼是盲目的。

列寧向歷史認同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宣言》一書中，宣稱「無產階級無祖國」這個教條，其實他們當時對這個論點並沒有特別重視，可是伯恩斯坦在後來提出的「修正主義」中，有許多篇幅皆用來攻擊這個教條，他指出德國的工人階級在國會已經占有一席之地，他們對國家有義務和責任，而此種義務和責任乃超越在自己的階級之上，換句話說，他們對國家的義務和責任比他們對自己階級的義務和責任還重要。一八九〇年代初期，恩格斯眼看著歐洲正在醞釀戰爭，他期待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贊成戰爭借貸法案，以期和俄國開戰時可以支援，但在當時的第二國際大會期間，他和一位荷蘭籍的退職教士，也是荷蘭一個小政黨的領導人，名叫紐溫維(Anton Willem Nieuwenhuis)，竟發生意見上的衝突。這位荷蘭人堅稱一旦歐洲發生戰事，他可以以小政黨領導人的地位號召歐洲各國工人拒絕加入軍隊服役，並且可以發動罷工。恩格斯的看法一向偏於樂觀，他認為歐洲的大戰爆發之前，大型的社會革命會先來到，但他隨即產生疑慮，因為他發現——他一向無法接受普魯士所主導的政府——德國在擴充軍備的同時，也一起擴大公職人員的編制。一八九三年，他發表許多文章鼓吹德國慢慢淘汰常備軍，以建立一支全民皆兵的人民軍隊。

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國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員一致投票支持戰爭借貸法案，可是才兩年前而

已，第二國際才剛草擬一項定案，主張工人階級不參與任何戰爭，因為「任何戰爭都是為資本家的利益和王公貴族的野心在廝殺，最後全都是外交秘密協定的一場把戲」。他們同時宣稱，一旦有戰事發生，他們更要藉此機會鼓動人們起來顛覆資本家。

列寧對一九一四年八月那則消息感到相當訝異，他起初簡直無法置信，他在德國的《前進報》(Vorwärts)讀到這則消息時，直覺認為這是德國政府捏造的事實，因為《前進報》是當時政府的傳聲筒。不久他又聽說普列漢諾夫在巴黎號召一些俄國流亡人士加入法國軍隊，他忍不住說：「難道普列漢諾夫也變成了叛徒不成？」然後就想到可能這與普列漢諾夫曾在軍隊待過有關。最後他更獲悉馬克思和恩格斯傳統的繼承人考茨基——這是個聰明絕頂的人，列寧一向對他很尊敬——也改弦易轍，倒向愛國主義的陣營，同時，第二國際的一些領導人也紛紛採取支持準備開戰的政府的立場。

娜德芝姐說，列寧年輕時哥哥被捕這件事情——他們家所有自由派的朋友沒有人願意陪他母親上京城——對他造成一輩子的深刻印象，他一直很看不起自由派人士的膽怯無能。這種情結在一九〇五年重新出現在他對立憲民主黨人的憤怒和譴責這件事情上面，這些人在沙皇的國會中一向被視為無用的僕役，如今沙皇要解散他們，他們就紛紛投向反動陣營。列寧看到這種情形，年輕時的那種夢幻破滅感覺又油然而生，十七歲時他強烈感受到突然之間四圍的人都棄他而去，他必須獨自對抗一切壓力，如今一九一四年的處境再度喚起他那種相同的感覺，他必須好好調整自己的腳步。一九一五年六月，他在一本名為《第二國際的崩潰》(The Collapse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的小冊子中這樣說道：「這場戰爭的經驗，好比歷史上的任何一場危機，也好比人類生活中的任何一場災難，會剷除掉一些人，但同時也會讓另一些人變得更明朗堅強。」

他變瘦了，五官顯得有些突出，他一向活潑自信的神采不見了，因而變得非常陰鬱，托洛斯基

所說他一向慣有的「陽剛善良的氣質」如今也變得冷酷寡情，許多人覺得他變得沒以前那麼隨和親切，他聽到任何殘暴的事情發生時，他會哈哈大笑。俄語用在辯論時一向慣有的詼諧節奏，在外國人聽來總覺美妙悅耳，如今從列寧口中講出來，除了咄咄逼人之外，也已經沒什麼味道了。當時普列漢諾夫來瑞士洛桑(Lausanne)演講，宣揚如何保衛祖國，列寧前去和他辯論，他講話時很沈著冷靜，但在蒼白的臉色中仍難掩其激動的情緒，他不肯和對方握手，也不稱呼他為同志，他以強烈語氣大肆譴責考茨基——稱他是偽君子、妓女、懦夫——他從未如此口出惡言罵過任何併肩作戰的同志。他並不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支持戰爭的看法，這是他的對手最樂於聽到的事實，問題是，現在的處境已經完全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所認同的是中產階級對抗封建制度的戰爭，如今中產階級已經式微，我們要的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而且勢在必行。一九一六年春天，他寫過一本叫做《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的小冊子，他以馬克思的論點分析資本的成長和壟斷，現今資本的出口取代以前商品的出口，他描述英國、德國、法國和美國等四個列強如何瓜分世界並進行殖民，這四個列強占有全世界大約百分之八十的資金，而前面三列強又占據有百分之八十的殖民地，他們不斷對殖民地進行壓榨和剝削，一段時間之後——馬克思的經濟衝突理論這時彰顯了出來——被壓榨剝削的國家群起反抗，努力爭取自身的利益。這種情況如今轉到工人階級身上，巨大利益的誘惑逼使社會主義者群起對抗資本案，勢必將他們打倒。

一九一五年的九月及隔年的四月，反對戰爭的社會主義者聚集在瑞士召開兩次會議，列寧和同黨無聲無息，在愛國主義的吼叫聲下，只能躲在陰暗的小角落裡，悶不吭聲。他這時彷彿又回到了一九〇四年那次四面楚歌的孤立狀態，但是在孤獨的逆境中他反而變得更加堅定自己的信心。

一九一四年八月的時候，列寧和妻子娜德芝姐住在波蘭的克拉考(Cracow)，他們曾經從窗口看到許多傷患從克拉斯尼克(Krasnik)的戰場上抬回來，他們看著許多受傷或垂死的士兵的妻女和家人跟在擔架後面奔跑著，那種場面真叫人不忍卒睹。我們在列寧的著作中很少看到他流露人道主義的胸懷，但事實不然，列寧死的時候，娜德芝姐在葬禮上發表一篇簡短的演說，她說：「各位同志，這些天來我一直守在弗拉迪米爾的棺木旁，我心裡一直不斷反覆想著他這一生的所作所爲，我要跟各位說的是，他深愛所有的工人和受壓迫者，但他從來不說出口——我也不說，要不是在今天這種場合，我是不會有機會說出來的。」的確，列寧是那種感情深藏不露的人，我們看到的經常是他在公開場合的憤怒言語，以及推展行動的堅定語調。至於沙皇政權的殘暴、工業體制的弊病、戰爭的屠殺等等，這些似乎不必他費口舌去加以批判，因爲大家有目共睹。他是所有革命家之中最具陽剛氣概的一個，他從不掉眼淚，但他有許多超乎人們想像的痛苦。高爾基說：「俄國這個國家受苦受難，但有人教導我們說，忍受苦難乃是通往救贖的道路，我在這樣一個國家中從未見過像列寧那樣的人，那麼痛恨不幸和受苦受難……在我眼中看來，列寧很偉大，因爲他堅持相信，人類的生活中不應有苦難，人們應該努力把這種可惡的東西趕走。」

他即是爲了解除人們的苦難而投入革命，緊接著又要忍受內戰的煎熬，然後以嚴酷的手段統治整個俄國。托洛斯基說革命初期，布爾什維克以軍法處決一些劫掠擾民的士兵，列寧會爲此感到內心不安，後來不久，一些西方使節問列寧關於處決政治犯的問題時，他揶揄道：「你們沒聽說嗎？——我們不久前才剛處決了一千六百萬個政治犯啊！」他有一次和高爾基來到鄉下，他們和一些小孩聊天，他就跟高爾基說：「這些小孩日後會生活得比我們快樂，他們不必經歷我們曾經有過的那些苦難，他們不會懂得什麼叫做殘酷。」

他現在已經整個人迷失在一些事件中了，歷史力量在推動他，他已經完全身不由己了，許多認識他的人這時候都很驚訝，因為他們發現他根本不在意自身的重要性，巴拉巴諾娃 (Angelica Balabanova) 說她現在已經無法把他和他剛流亡到國外來時的樣子聯想在一起，「從外表上看，你絕無法把他和革命領袖聯想在一起」。從蘇黎世的圖書館到克里姆林宮，我們看不出他有實際掌握到什麼權力，或是在扮演什麼大人物的角色。洛克哈特說他在十月革命之後初見列寧時，「第一眼看去，還以為他是鄉下雜貨店的老闆，而不是政治領袖」。克拉拉·蔡特金 (Clara Zetkin, 1857-1933, 德國社會民主黨及第二國際左派領袖、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 曾經描寫過列寧接待德國共產黨代表團的經過：這些德國人在德國國會中早已見慣馬克思主義者的打扮——一身大禮服，一副官僚氣派，所以他們想列寧也當如此。但很出乎他們意料，列寧按約定的時間準時出現，他毫不做作的走進房間，很自然而簡單地和他們交談，讓他們感覺到好像不是在跟大人物談話。列寧重病危急時從柏林召來醫生為他治病，這位一向為他看病的醫生會留下一段紀錄，可以說是列寧習慣於苦行作風的最佳見證：

我起先在他的臥房見到他，他的房間很大，但也很單調，只擺設一張僕人專用的那種床，一張書桌，幾張木製椅子，另外有一張桌子上面擺滿了書，此外什麼都沒有，沒有壁畫，也沒有地氈。一九二二年六月，我再度見到他，那時他已經搬去鄉下一棟前莫斯科市長住過的大宅，他希望能在那裡好好養病，但他竟然不肯睡在舒適的大房間，而搬去住在附近一棟小房子裡一個僕人專用的破舊小房間，我就跟他說，如果繼續窩在這個小房間，他是絕對治不好病的。

列寧身上的特徵中唯一會引起人注意的，就是他那雙淡褐色的小眼睛，銳利、精明、炯炯發亮。

這雙眼睛現在透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爲他磨亮的透鏡望向整個歐洲，他把焦點集中在戰爭雲霧背後的真正衝突上面，他並不企圖重新分析戰爭期間的心理狀況，這我們可以從他此時的文字中看得出來。國家主義有一陣子已經快要銷聲匿跡，但在某些國家中卻又突然變相茁長起來，只是並未真正發展到超乎理性的地步，列寧以客觀的態度密切注意歐洲在這方面的動態，同時期待會出現某種力量去抑制這種發展。他以宏觀的角度去看所有事情，面面俱到，他會注意商業動態、銀行事務、國會、外交、殖民地人民、工廠、軍事，以及階級之間隱藏著看不見的對立狀況，但他更看得出無可避免的是，這些對立狀況會加以整合，一方面成爲獨占壟斷和國際信託業務，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整合，而是分裂的話，則階級和國籍必然趨於分化。有一位美國人說，他在克里姆林宮看到列寧拿起報紙激動地讀著，「彷彿他要在那上面燒出一個洞似的」。高爾基說：「他說話總會帶給人一種印象，好像他急著要傳達給你某種真理，好像他不是爲自己的意志在講話，他講話是出於歷史的意志。」

他不像托洛斯基那樣緊抱理論不放，他會注意周遭實際處境的變化，而適時去掌握住他所能掌握的部分。歷史不是一種人神同形的現象，不可能既要當記錄人類事務的天使，又要當守護人類的前天使，這在托洛斯基而言的確如此，但我們發現列寧則是以自己的意志在認同歷史，十月革命的前夕，他寫信給蘇維埃中央委員會說：「如果我們的革命現在可以一舉成功，卻要加以拖延，歷史是不會原諒我們的。」我們聽說他有一陣子想阻斷事態的發展——一般馬克思主義者碰到無法掌握事態之發展時慣有的作風——他不希望去承擔責任，高爾基告訴他說有一位女伯爵企圖投涅瓦河（Neva）自盡，他說：「歷史就像是一個兇狠的後娘，發起性子時，每一個人都要遭殃。」他說完閉上眼睛，一副無可奈何的陰鬱樣子。不過，列寧腦中通常列爲第一要務要考慮的，還是以百姓爲第一優先。

他很少想到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以及該不該以獨裁方式去主導社會發展的問題，直到一九一六年二月，他感受到革命行動已經迫在眉睫時，他覺得他必須在這件事務上面整理出一些頭緒出來，他趕緊轉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體系求助，他在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中，尋求證據來解釋工資不平等及政府之退化等現象，此即《國家與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一書之形成，但此書除了在闡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烏托邦主義傾向之外，實在乏善可陳，他想像「要正確而順利推動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工作，其中不可缺乏的官僚過程，如簿記分類和控制方法等，早已由資本主義簡化完成，現在的工作是監視、記錄及核發收據等，任何人只要能讀能寫或懂一些簡單數學公式，即可配合此項工作。」換句話說，這項工作將由「大多數的公民一起來擔任」，「他們可以藉此好好控制資本公司，這些資本家此時當然已經成爲雇員，同時也可藉此控制一些有知識的鄉紳地主，他們此時仍未改掉資本家的某些惡習。」其實這些問題他大可等到最後時刻才來討論，他不必急著在這種時刻去寫這本書，去討論這一類問題，這本書寫於一九一七年的夏天他躲在芬蘭的這段時間，寫了一半碰上十月革命因而中斷下來，直到他掌權之後才繼續寫完出版，他說：「去實際經驗革命實在是比去談論革命更爲愉快，也更爲有用些。」

然而，列寧終究無法完成一種社會哲學去好好策劃未來的一切，但這倒也不是由於他缺乏想像。他對歷史的想像如今已經轉化爲實際的政治工作，他必須忙於處理當下的事務，而列寧對當下事務的處理方式，可以說是當代的人所能想到的，最具想像力的極致發揮——物盡其用，人盡其力。可惜的是，像史達林那樣盜匪式的政客，對馬克思主義根本也沒什麼概念，竟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下乘虛而入，他以列寧的繼承人自居。

不管怎樣，在被西歐社會主義者孤立的狀態下，列寧終於還是把俄國撐了起來。

一九一二年，革命運動開始死灰復燃，該年的二月雷那的金礦爆發一次重大的暴動事件。雷那地區的金礦產量甚豐，頗有利益可圖，但是地處北極圈，是托洛斯基第一次放逐的地方，在那裡工作非常辛苦，一年中的冬天有六個月的時間全是黑夜，夏天則是蚊蟲滿布。在那裡挖礦的工人簡直像奴隸一般，全天候沒有休息地工作，他們的妻子全都被趕去侍候礦區公司的一些官員，或是陪他們睡覺。有一天，公司宣布裁減他們的薪水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然後他們又在食物中發現一匹馬的陽具，終於忍無可忍而發動全面罷工。聖彼得堡當局應業主要求立即派來一支步兵隊伍，這支隊伍的指揮官即是當年鎮壓加彭神父請願示威的軍官。他一來即刻逮捕罷工委員會的委員，第二天一群工人前來示威要求釋放他們的伙伴，他下令射殺這些工人，結果有兩百七十人被殺，兩百五十人受傷。內政部長在國會質詢中被問及這次屠殺事件時，他只簡單的說：「這沒什麼，一概如此處理。」

同年四月，俄國境內緊接著發生三十萬人的示威大罷工，五月一日，又發生另一次規模更大的五十萬人大罷工，現在的罷工口號是「社會主義萬歲！」當初沙皇政府爲了緩和農民與地主之間的衝突而培養出一個以富農爲主的中間階層，但沒想到此一做法卻又帶來富農和一般農民之間的矛盾對立，農民的生活變得更爲困苦，他們很多人紛紛賣掉土地，前往工廠工作，這一來則又造成工廠工資的下跌。這一年有七個孟什維克以及六個布爾什維克獲選進入第四屆的國會，布爾什維克在四月創刊《真理報》(Pravda)，其發行量大大超越孟什維克所辦的報紙。工會不顧沙皇政府的壓制又開始蠢動起來，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四年連連發動許多次罷工，其規模大都超越一九〇五年時的罷工活動，一九一四年的春天和初夏，巴庫(Baku)地區的煉油工人怨聲載道，聖彼得堡的許多女工在工廠

中受到塑膠和化學原料的感染而紛紛中毒，然後布提洛夫(Burtov)地區的軍需工廠又發生暴動，這一連串的事件又激起了全國無產階級一致的忿怒，隨時都有可能再度爆發另一次大規模的革命，布爾什維克當時估計，全國已經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支持他們。

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國會中的代表一致反對俄國捲入歐戰，紛紛退席抗議，卻也因此而以叛國罪名被逮捕審判，主要的證據是列寧從國外寄給他們的一些反動文字，他們全被判終身流放西伯利亞。早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之後，孟什維克的絕大多數黨員即主張「清除」所有不合法的政黨組織，以免加重來自沙皇政府的壓力，但列寧卻反對此種做法，因為這乃意謂著全盤放棄階級鬥爭。一九一二年一月的一次蘇維埃大會中，布爾什維克宣布和孟什維克脫離關係，從此不附屬於社會民主黨，而自成一個獨立的政黨。一九一五年九月在吉莫瓦(Zimmerwald)所召開的社會主義者反戰會議中，布爾什維克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此即「第三國際」的由來。列寧此時即使人在克拉考和蘇黎世，卻可以深深感受到他自從一九〇二年以來所盼望的一個有紀律的組織，如今彷彿經由他一手帶領，已經茁長壯大。

關於此一情形，麥斯·伊斯特曼在二〇年代初期曾在俄國待過，他有一段很生動的文字描寫：

這一代的男女有幸能夠躬逢俄國的這一場革命，當你在俄國各地偏遠地區旅行的時候，不管是在汽車上還是火車上，你會看到一些寧靜安詳卻又堅毅的姣好面孔——可能是個額頭飽滿，留著棕色鬍子，看去很有哲學智慧的中年男子，也有可能是在個上了年紀的女人，一雙弓形的大眉毛，一張堅毅而慈祥的嘴巴；也有可能是個年輕貌美的女人，卻是一副雄赳赳氣昂昂的姿態——你探問，便會發現他們正是「革命老同志」。他們是恐怖主義活動的傳統下長大的一代，是

殉道傳統堅強而高尚的後裔，他們從小被教導要博愛人類，但絕不感傷濫情，他們懂得如何做自己的主人，他們視死如歸，他們從年輕時代就學到一樣新觀念——如何務實思考。他們不管是在監獄還是放逐流亡，永遠不妥協，他們成爲高貴的一群，成爲可以成就英雄事業的人類精英，好像圓桌武士或是日本武士，帶著高貴的精神走向未來。

令人感到訝異的是，這支隊伍現在全望向正在流亡中的列寧，蘇卡諾夫不是個布爾什維克，列寧回俄國時，他曾參加當時的歡迎行列，他很感驚訝，因爲「整個布爾什維克的努力居然全維繫在國外鐵一般的精神領導中心身上，沒有這個領導中心，所有黨內同志完全無法動彈，而當這個領導中心出現在眼前時，他們立即熱烈攀附過去，好像忠實的僕人、好像聖杯傳奇中的武士，他們要奉獻出自己的一切。」

列寧抵達芬蘭車站

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列寧以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爲主題對一羣年輕人發表演講，他跟他們說：「我們這些老一代的人恐怕沒機會活著看到即將到來的這場革命的殊死戰。」二月十五日，他寫信給他妹妹，說他收到從俄國寄來的一筆來路不明的款項，他說：「你的嫂嫂挖苦我說，那是我的退休金，哈！哈！這真是笑話一則，不過，這裡的生活費可真是昂貴，而我現在又精神不好，簡直無法工作賺錢。」

他們完全依賴娜德芝姐的母親所遺留下來的一筆小錢在生活，這筆錢在戰爭期間經由一位維也納的股票掮客轉手過來，卻被扣除了一大半，等拿到手時大約只剩下一千塊美金左右，到了一九一七年，他們手上的錢已經所剩無幾，列寧就寫信給他姊夫，要求他在俄國爲他安排出版一本教育百科全書，由娜德芝姐執筆編撰。

他們在蘇黎世的時候，起先住在一個供膳食的公寓裡頭，因爲「弗拉迪米爾喜歡那裡服務簡單的確，喝咖啡用的杯子已經斷了把手，許多人擠在廚房一起吃飯，大家的交談也都很簡單。」可是不久之後，他們發現這裡竟是一個龍蛇雜處的地方，有一個妓女在那裡「公然宣稱自己的職業，另外有一個人，雖然很少說話，有時卻無意間透露出自己是個兇犯。」他們對這些人很感興趣，但

娜德芝姐爲了怕招惹無謂是非，就堅持要搬家，後來他們搬去一位鞋匠家裡，可以自己擁有一間獨立的房間，可是這幢房子很破舊，他們感覺好像住在一幢十六世紀的古屋裡。其實以相同的租金他們應該可以租到較好的房子，在這裡，他們房間的窗子面對著一個製造香腸的工廠，工廠常會發出一股惡臭，他們只能在半夜打開窗子，白天的時間則待在圖書館，列寧並未想到要搬家，因爲他們的房東太太曾說過，「士兵們應該拿起武器對準他們的政府」。他們的午餐經常必須以燕麥粥餬口，每當燕麥粥煮焦了時，列寧就會對房東太太說：「你看，我們的生活多麼愜意，每天都有燒烤的東西吃。」

這幾年間，列寧常常寫信給他妹妹說他們的神經常常繃得很緊，一九〇五年之後，流亡生活很不好過，如今十二年過去了，他們有許多同志的處境甚至比一八九〇年代的放逐生涯還糟，許多人甚至都精神崩潰了。其中有一個同志，他的妹妹曾經被處吊刑，他來列寧家裡時，老是看到他妹妹的鬼魂出現。另外一個在莫斯科暴動時浩劫餘生，有一天來看他們，「他一來就口沫橫飛說他看到許多馬車上面載滿了玉米，馬車上面還站著許多漂亮的女孩。」列寧覺得他的神經有問題，就要娜德芝姐去找來一位精神醫生，診斷之下，醫生說這個人是餓瘋了。不久之後這個人來到巴黎，在自己身上綁了石頭，投塞納河(Saine)自盡了。還有一個，他原來在俄國國內是一間工廠的工人，由於常常參加政治活動，被工廠解雇，老婆和小孩的生活頓時發生問題，生活沒有著落，他開始變得瘋顛起來，乾脆去當專業的破壞分子，有一天晚上，他喝了許多酒，就把老婆和小孩趕出家門，自己一個人鎖在屋內，把煙囪堵起來，然後點起爐火，第二天早上，人們發現他已經死在屋內了。這一段時期他們所要面對的是另一種新類型的特務，以前的老式特務總是躲在街角監視你，你很容易擺脫他們，現在新類型的特務是一批精明幹練的年輕人，他們直接滲透到你的組織裡，讓你防不勝防。

列寧和娜德芝姐曾經去巴黎探訪拉法格夫婦，娜德芝姐在會見馬克思的女兒時顯得有些興奮，以至於她談到婦女在革命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時，竟緊張得支支吾吾起來，顯得有些不知所云。列寧跟拉法格談到他在寫的一本批判馬克思主義神祕論的書《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拉法格同意他的看法：宗教是空洞的。馬克思的女兒看了拉法格一眼說：「他很快就會證明他的信念是坦誠摯的。」後來列寧聽到拉法格夫婦雙雙自殺的消息時很感吃驚，當時他就對娜德芝姐說：「如果有一天我們不能再為黨奉獻心力，我們必須坦然面對真理，像拉法格夫婦那樣自我了斷。」

列寧的岳母常對人說：「他們（列寧夫婦）過那種生活有一天會毀了他們自己。」她自己死於一九一五年，她死前一年一直想回俄國，但是在那裡沒有人可以照顧她的生活，她最後跟她女兒說：「不過我可以等，我等著和你們兩人一起回去。」她生前經常忙著招呼照顧在列寧家出入的一些同志，她要幫忙在他們的外套內層或裙子底下縫上「盔甲」，以便把非法書刊帶回俄國，她同時要幫忙撰寫夾帶密碼的信件。列寧常常買一些小禮物送她，希望她能夠過得快樂一些，她平常有抽菸的習慣，有一次碰到假日，她的香菸剛好抽完，列寧就跑遍全城，去幫她買到香菸為止。她一向信神，可是從不在他們面前談信仰的問題，就在她死前卻突然說：「我年輕時一向信神，但是隨著年齡增長，生活經驗增加，我發現這一切實在沒什麼意義。」她要求死後火葬，那是三月裡一個暖和的日子，她和女兒一起出去散步，她們還在伯恩(Berne)公園的椅子上坐了半個小時，回來之後不久就死了。

娜德芝姐在母親死後不久自己也病倒了，這種病情最早出現於一九一三年，如今再度復發。她覺得自己的心臟有些不對勁，兩手抖個不停，醫生的說法是她的心臟衰弱，她的神經已經敗壞。她變得無法工作，列寧就帶她去山上養病，現在已經證實她得的是甲狀腺失調凸眼症，她一想到自己看起來像一條魚，心裡就覺得很難過，列寧的姊姊安娜甚至在以前的信中就說過她看起來有點像

鯪魚，而她的革命名字竟然就叫做「鯪魚」。我親耳聽她說過，有一次一位女士去克里姆林宮探望她，事後跟人說她看起來活像一條鯪魚。現在她的甲狀腺失調問題不斷在惡化，列寧帶她去伯恩的醫院開刀，手術進行了整整三小時，又沒麻醉，真是苦不堪言，列寧在這段時期的信件中經常提到娜德芝姐病痛的問題。

三月中旬某一天，他們剛吃過晚飯，娜德芝姐正在收拾碗盤，列寧則打算前往圖書館，一位波蘭的同志匆忙跑進來大叫道：「你們沒聽到消息嗎？俄國又爆發革命了！」

這次歐洲大戰，俄國在戰場上連連敗北，再度引發另一波自從一九〇五年以來最大的革命熱潮。隨著俄國在戰事上的失利，他們在波蘭的礦區和工廠一個一個被接收，而國內一半以上的生產全投入戰鬥行列。一月二十二日，加彭神父率眾示威遊行請願的週年紀念日，彼得格勒城內發動十五萬人大罷工，三月八日又發生另一次罷工，所有工人全湧上街頭。軍隊中的士兵本來大都從農人中徵召而來，現在已經不肯聽命行事，甚至哥薩克軍團及塞米諾夫斯基(Semyonov)軍團，他們以前曾經奉命鎮壓過莫斯科的暴動，現在也都全倒向革命叛變的行列了。百姓對戰爭厭惡至極，對沙皇早就失去了信心，王室內又有拉斯普廷(Gregory Rasputin, 1872-1916，西伯利亞的農民神醫，因治好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子的病而得寵，後因干預朝政被保皇派謀殺)這號人物在作怪，他們正準備秘密和德國談和，但一些大地主和中產階級則急於剷除貴族階級，他們始終主張繼續戰爭，沙皇爲了避開京城的煩擾，前往戰爭指揮總部視察軍情，可是回彼得格勒時，他所乘坐的火車竟被鐵路工人攔住不肯放行，這時整個君主政體竟停止不動，沙皇被迫以電報方式宣告退位，但幾天之後還是被加以逮捕。他曾經企圖以慣用伎倆解散第四次國會，結果這次不再有人聽從他的命令，他們甚至還成立了一個臨時委員會，組織一個臨時政府。另一方面，自從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幾陷於癱瘓的工人蘇維埃

此時也趁機重整旗鼓，成立了一個執行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包括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兩個政黨，他們決定把軍隊帶進來，與工人混合組成「工人與軍人代表的蘇維埃」。

列寧此時只能依賴外國報紙的報導去了解國內的狀況，這些報導大都含混模糊或充滿偏見，但是他唯一能夠掌握的資訊。在他能夠回去俄國之前，他事先在《真理報》上面發表了幾篇文章，指示一些行動的方針。此時俄國的權力懸在兩大團體之間：臨時政府和彼得格勒的蘇維埃——這兩個團體各自代表截然不同的利益，互相水火不容。蘇維埃代表人民，是人民的發言人，他們要求和平、麵包以及自由。臨時政府的主要目標只是要打擊貴族，消滅羅曼諾夫(Romanov)王朝，他們的組成分子主要以中產階級為主：國防部長由古查科夫(A. I. Guchkov)擔任，他是莫斯科的大工業家，也是真正的大地主；外交部長由米留烏科夫(P. N. Milyukov)擔任，他原來是歷史教授，也是卡代黨(Kadet Party)的創始人，這個黨主要是俄國中產階級的領導團體；另外，司法部長則由一位年輕的律師擔任，他正是列寧小時候家鄉那位會擔保過他的小學校長克倫斯基的兒子，他曾以無礙的辯才著稱，在法律事業上相當成功，在彼得格勒高層社會的婦女圈中頗受歡迎，他自認他此刻正在扮演一個極為顯赫的角色而洋洋自得。

列寧在他的文章說，這個臨時政府完全不可靠，因為它無法給予百姓所想要的東西。首先，它不能給予和平，因為它完全依賴英法兩國的補助，必須出兵為他們打仗，同時亦未聲明反對兼併亞美尼亞(Armenia)、加里西亞(Galicia)及出兵攻打土耳其的帝國主義作風。它不能給予人民麵包，因為中產階級的原則是保障自己的財產，要求他們施捨麵包，這與他們的原則互相抵觸。最後，它也不可能給予人民自由，因為這是一個由地主和資本家組成的政府，這些人一向就怕群眾有自由。只有蘇維埃才能夠真正代表人民，一方面它所涵蓋的不只是俄國的農人和被剝削的大眾，同時也包含

了全世界正在抗爭中的無產階級。

革命才正處於開始的階段，它的下一個步驟是從中產階級手上奪取權力，全俄國的工人、農人以及士兵必須在彼得格勒的蘇維埃領導下組織起來，他們必須剷除舊有的警察，然後建立一支「人民的義勇軍」，這支義勇軍要盡其所能分配食物給百姓，「每一個小孩都能分到一瓶好品質的牛奶，富人家的成人不准多喝牛奶，除非所有小孩都已經充分喝到了牛奶」，同時，「沙皇和貴族所遺留下來的王宮和豪華大宅不能閒置不用，必須騰出以供無家可歸或貧窮匱乏者居住」。蘇維埃一旦掌權之後，絕對不承認以前沙皇或現在中產階級與各國所訂立的條約，特別一定要公布那些密約，同時要跟交戰各國立即簽訂停戰協定，然後解放各殖民地及其人民，並進一步鼓動所有國家的工人起來顛覆他們的中產階級政府，建立工人的蘇維埃。另一方面，現在中產階級政府跟世界各國所舉貸的幾十億元的債務，他們一概不承認，請各政府找那些出面借錢的資本家要錢，「因為如果要我們的農人和工人去負擔這筆債務，那無異於要他們承認資本家和地主過去對他們的剝削是正當的。」——現在，我們要答覆考茨基對我們的批判，他提到當前俄國的處境，警告我們說：「此刻無產階級迫切需要兩樣東西：民主和社會主義」。但是，我們忍不住要請問，這是什麼意思？米留烏科夫會說他想要民主，克倫斯基會說他想要社會主義——

列寧的第五封信寫到這裡就此中斷，因為他已經啓程回俄國，不得不停止撰寫這封信——前面幾天他一直忙著打點回家的大小事宜，晚上幾乎不能成眠。最初米留烏科夫曾經電告各國的俄國領事，要求各國政府協助不要讓他們的社会主義分子回俄國，但是普列漢諾夫及其同黨卻早已由英國政府以武裝戰艦護送回俄國，此時法國和英國政府竟拒絕發給列寧過境的簽證，就像他們當年拒絕讓托洛斯基入境一樣，如今歷史再度重演。列寧當時曾考慮駕駛飛機回去，但這牽涉到複雜的技術

問題，只得作罷。後來他想到也許可以弄一本假護照——最好是瑞典護照，因為瑞典人最不會引起懷疑，只是有一個問題，他半句瑞典話都不懂，經過邊境時很可能會出問題，唯一的辦法是裝啞巴，不要開口，但這仍然太冒險，他寫信給在瑞典的一位同志，要他幫忙找兩個跟他和季諾維也夫（G. P. Zinoviev）長得像的既聾又啞的瑞典人就地實習試試看，「到時候你一定會睡著，」娜德芝姐跟他說：「你會夢見孟什維克黨的人，然後你會在睡夢中破口大罵：混帳！事情這下子就砸了。」

三月十九日那天，許多流亡人士聚在一起開會商討如何潛回俄國的問題，馬托夫提議說服德國政府讓他們穿越德國境內回去，條件是他們回去之後釋放德國和奧地利的戰俘，列寧倒沒想到這個方法，他表示同意，可是其他人卻不願意冒這個險，馬托夫自己也因而變得畏縮不前，列寧這時反而堅持走這個路線。他們曾向瑞士政府求助，卻沒有下文，打電報回俄國，也沒有回音，臨時政府想盡辦法阻止這批人回去，而國內的社會主義分子也對他們抱持懷疑態度。列寧寫信給斯德哥爾摩的同志說：「在這個節骨眼竟然在這裡束手無策，真是折磨！」他坐在他的小房間裡撰寫他的《遠方書簡》（*Letters from Afar*），最後他打電報給瑞典的同志，要他派人回俄國去跟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奇凱茲（N. S. Chkheidze）求助，要求他想辦法把這群受困的孟什維克弄回去，結果回覆的電文是：「列寧必須立即回來。」安排的方式是透過瑞士的德國大使館，把列寧等一批人經由德國遣送回去，當時德國人的想法是希望列寧回去之後，把和他們敵對的俄國臨時政府解散。大家約定好他們在穿越德國國境時，不准下火車或跟外面的人有任何接觸，同時一起同行的名單必須經過瑞士社會主義者核定通過，另一方面德國政府要求列寧接見一位工會代表，列寧則說他將不接見任何人。

當列寧接到確定可以走的消息時，他堅持搭下一班火車立刻走，換句話說，幾個鐘頭之內出發。娜德芝姐覺得她不可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把行李打點妥當，而且還有許多其他事務必須和房東磋商

料理，圖書館的書也還沒還清，她就建議他們先走，她隨後再跟上來，但列寧堅持要她一起離開，一時帶不走的東西就放在一個箱子裡，以後有機會再回來拿。他們和房東簽有租約，但房東從未注意他們的行動，他們當初來租房子時，房東太太看到列寧太太的樣子本來不想租給他們，她說：「你可以看出來，她是那種典型的俄國女人，她的衣服很不合身。」但對列寧的印象似乎較佳，他的胸膛看起來很寬闊有力的樣子，他們的兒子說：「老天，他的頸背像牛那麼粗！」列寧夫妻從不拖欠房租，而且娜德芝姐和房東太太也處得很好，房東說：「他們這對夫妻似乎從不吵架，列寧太太這個人很好相處，她和我太太一起共用我們的廚房，兩個女人在廚房裡擠來擠去，卻相處得極為融洽。她似乎是個很好的家庭主婦，但她的心思仍然在別的事務上面。」當娜德芝姐跟房東太太說他們準備要回俄國時，房東太太露出為他們擔憂的樣子：「怎麼在這個節骨眼要去那種動盪不安的地區呢？」列寧太太就跟她解釋說：「我在那裡有許多事情要做，留在這裡則無事可做。」列寧臨走時對她說：「好啦，卡莫拉太太，這下子天下太平了。」

他們搭四月八日早上的火車，一共三十個流亡人士，這之間卻沒有一個孟什維克。陪伴他們同行的是瑞士的社會主義分子普拉頓(Friedrich Platten)，他負責這趟護送行程，一起同行的還有一位波蘭的社會主義分子拉戴克(Karl Radek)。有一些同志為列寧向德國人求助且要穿越這個敵國的國境，而覺得惶然不安，有許多人甚至來車站要求他們不要走，列寧不說一句話，逕自步入車廂，他發現車廂內早已坐著一位同志，大家懷疑這是一位密探，「這個人若無其事坐在他的位子上，突然，我們看到列寧抓住他的衣領，一下子把他推到月台上。」

德國人在火車上供應許多食物給他們吃，遠超過他們所需要的分量，看樣子德國人有意跟他們

炫耀德國的富足。列寧和娜德芝姐在大戰的末期從未涉足和他們交戰的國家，令他們吃驚的是，他們在穿越德國國境時竟看不到半個成年男人，沿路所見，不管是火車站或是鄉間田野，盡是婦女和小孩，要不就是一些未成年的青年男女。列寧認為他們一進入俄國境內會立即被逮捕，他就和同行的同志在火車上草擬到時候在庭上辯護用的大綱，但大多數時間他還是自己一個人獨處。火車抵達斯圖加特時，一位工會的人由一位騎兵上尉陪同一起上火車來，他們坐在一節特別的車廂內。這位工會代表透過普拉頓以解放人民的名義向大家致意問候，並要求訪問列寧，普拉頓則回說他們不願意和他講話，也無法回報致意問候的厚意。這次行程唯一和德國人說話的是一位同志四歲的兒子，他把頭探入他們的車廂內，用法語說：「列車長是幹什麼的？」

在前往斯德哥爾摩的路上，列寧認為黨的中央委員會應該在瑞典設立一個辦公的地方。當他們抵達斯德哥爾摩時，瑞典的社會主義代表立即前往歡迎接待，他們在接待室裡掛上一面紅旗，並且準備豐盛的瑞典食物招待他們。拉戴克帶列寧去街上鞋店爲他購置一雙新鞋子，他說他現在已經是公眾人物，不能不注意自己的穿著打扮，列寧則說一件新外套和幾件內衣就很夠了，這次回俄國又不是要去開裁縫店。

他們乘坐雪橇從瑞典進入芬蘭，普拉頓和拉戴克只送他們到俄國邊境。列寧打電報給他的姊妹和妹妹，表示他將在星期一晚上十一點到家。在芬蘭，放眼望去，到處都是俄國風味，娜德芝姐說：「我們感覺到每一樣東西都是那麼熟悉、那麼親切，坐在破爛的三等車廂裡，看到那麼多俄國士兵，那種感覺真好！」車站月台上到處是士兵，有一個老人抱起一個小男孩，餵他吃復活節乳酪，一位同志把頭探出車廂窗外，大叫：「世界革命萬歲！」許多士兵莫名其妙看著他。列寧弄到了幾份《真理報》，當時的編輯是卡莫涅夫（A. B. Kamenov）和史達林，他發現報上的社論正在談論如何給臨時政

府施加壓力，和德國公開談判以要求和平，然後宣稱如果德國不願意，俄國士兵「將以牙還牙，誓死奮戰到底」。

列寧在車廂內對其他同志發表他的看法，這時火車響起汽笛，準備要開動，車廂內進來了幾個士兵，一位臉色蒼白的中尉在列寧和娜德芝姐旁邊走來走去，一些士兵走進另一個沒有乘客的車廂中坐了下來，這時列寧走過去在他們旁邊坐下，他跟他們說，他也認為為保衛國土而戰是正當的，但現在他們應該全面停止戰爭，這時他自己的臉色也變得蒼白起來，其他一些士兵紛紛進來，把列寧團團圍住，有的還站在座椅上，大家擠成一團，動彈不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娜德芝姐說：「他們變得非常專注，他們臉上的表情也變得更加嚴肅。」列寧這時就開始嚴厲盤詰他們一些問題，比如詢問他們平常的生活情形以及在軍中心裡的想法如何等等：他們的指揮官是誰？——大多數軍官都有革命思想嗎？——他們沒有忠心的下屬嗎？……為什麼升遷的機會這麼少？——他們不懂得鑽營，只能依附著老長官——士官比較容易升遷——他們只信任同袍，對外面的人，特別是白領階級，則敬而遠之。後來大家談論得很熱烈，列寧就跟他們建議向列車長要求一個更寬敞的車廂，大家圍在一起繼續熱烈討論，他整個晚上就不停地跟他們高談闊論。

第二天大清早火車抵達貝洛斯特托夫(Belostrov)，一個布爾什維克的代表團上車來，一起上來的還有卡莫涅夫和史達林，列寧已經有好幾年沒看到卡莫涅夫，第一眼看到他就說：「你在《真理報》上面扯了些什麼呀？我們才剛讀了幾份，你可真會寫啊！」列寧的妹妹瑪麗亞(Maria)也來了，跟她一起來的還有一個女性工人的代表團，她們要求娜德芝姐發表談話，但她說她已經高興得說不出話了，大家轉向列寧，希望他發表一點感想，這時火車上的隨車人員——他們不知道他是誰，只知道他可能是個特殊人物——就把他抬起來，讓他站在餐車的餐桌上，群眾紛紛圍攏過來，列車長也走

上來，通知隨車人員準備開車，列寧只簡單講了幾句話，火車慢慢駛離車站，這時列寧就問其他同志，他們是否一抵達彼得格勒就會立即被逮捕，那些布爾什維克的代表只是笑笑。

早在兩百年前，在歐洲偏僻的一角裡，維科即已在他的著作中宣稱「社會絕對是人所創造出來的產物」，他和他的前輩大師格勞秀斯一樣看法，更進一步肯定，人類的社會體制只有透過人的行為才能加以詮釋。格勞秀斯這位維科的前輩大師，他曾經是新教徒，甚至是個異端，他的偉大著作一向被列為禁書，維科始終不敢公然編輯他的著作出版，在他自己所居住的天主教管轄區拿波里(Naples)城裡，在宗教法庭的威脅下，他只有乖乖把上帝納入自己的體系中。

到了十八世紀末期法國大革命期間，巴貝夫不只宣稱社會是人所創造的產物，他要更進一步改造這個社會，他後來失敗了，他解釋說：「我們只要稍微認真思考一下，在這個腐敗的權勢中，我們要真正施展我們的計劃，不得不承認，我們成功的機率只有百分之一而已。」

一九一七年的列寧，他用辯證法包裝著維科的思想殘渣，他不用擔心宗教法庭的威脅，他也不確定控制社會是否像控制機器那麼單純，但他一路勇往直前走向彼得格勒，他知道他成功的機率遠遠超過百分之一，他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的前夕，他手上握著要啓開人類另一歷史新頁的鑰匙。

現在，列寧要啓開的這扇大門，所展現的前景如果與他所期待的样子不符合，他隨時準備要改弦易轍，因為我們知道，他是所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最不相信先知判斷的人。「理論的歸納現在全派不上用場。」他不久前才在《遠方書簡》中這樣說，他不確定現在要帶給俄國人民的到底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窮困農民和無產階級的革命民主專政」……「我們現在如果硬是以半生不熟的理論強套在當前複雜多端且迫在眉睫的革命實務上，那後果將不堪設想，我們寧可把理論當做指導行動的參考。」

我們在本書第一部份中曾提到米西列如何以藝術手法讓過去的歷史重新栩栩如生躍然紙上，但真實歷史的材料卻遠遠超出藝術手法所能掌控的範圍。列寧現在企圖以實際行動來掌控當前的事件，進而左右未來歷史的發展，如果這個發展超乎了預期的樣子，那並不足為奇。西方世界的人在這個時刻裡早已超越貪婪、恐懼和困惑的束縛，俄國則還在掙扎。

從芬蘭進入俄國的這個火車站是個灰泥色的破舊小車站，灰色和粉紅的色調相雜，有幾根很細的柱子撐住一個屋頂，這是火車進站停靠的地方。火車從一端進來，另一端則通向候車室、餐飲室及行李間。從現代歐洲國家的眼光看，這個火車站的格局和外觀倒很像是鄉下地區的小火車站，絕不像是個大都會（指彼得格勒）的火車站。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候車室中磨損的座椅，餐飲室中玻璃櫃裡附有價錢標籤的蛋糕甜點，這又是歐洲典型小火車站慣見的風貌，同時也很像一般中產階級的機構企業場所。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在那裡看到一些頭上罩著頭巾，手上提著包裹和籃子，靜靜坐在椅子上等火車的農婦。

當時那裡還保留有一個沙皇的休息室，列寧的火車在四月十六日深夜進站後，許多同志即是在那裡迎接列寧。他在月台上遇見許多從監獄或從外地放逐回來的人，他們看到他時都激動得熱淚盈眶。

關於迎接列寧的過程，黨外社會主義分子蘇卡諾夫曾參與其事，後來留下了一段紀錄。列寧不慌不忙走進沙皇的休息室，他外套的扣子沒扣上，臉上表情顯得有些僵硬，手上捧著一大束剛剛下車時人們獻給他的玫瑰花。這時，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奇凱茲，他是孟什維克黨的人，對著列寧迎面走來，列寧突然停住腳步，好像碰上了什麼障礙似的。奇凱茲以非常肅穆的表情以及極簡單明瞭

的語調開口說：「列寧同志，本人謹代表彼得格勒蘇維埃及全體革命同仁，歡迎你回到俄國來……但我們認爲目前階段我們的主要工作是消除革命行動中裡外所有的障礙……我們竭誠歡迎你加入這個行列來共襄盛舉，努力達成最後目標。」蘇卡諾夫說，列寧站在那裡，「好像發生在距他幾步遠的這一切與他全然無關似的，他左右張望一番，看一下圍著他們的群眾，甚至還望向沙皇休息室的天花板，並且不時摸弄一下手上那束玫瑰花（那束花實在太大，與他的身材有些「不相稱」）。最後，他

不理會奇凱茲，也不發表致答詞，就直接轉向群眾：

各位同志、戰士、水兵以及工人們，我很高興在這俄國革命勝利的時刻裡見到你們，見到你們這批國際無產階級軍隊的尖兵……帝國主義劫掠的戰爭正是歐洲內戰的肇端……在李卜克內西同志的號召下，人們將拿起武器對抗資本主義剝削者，時候近了……在德國，每一樣事物都已經在沸騰了！也許不是今天，但必定是明天，或是不久的將來，歐洲的資本主義必將全面崩潰。你們正在從事的俄國革命已經踏出了第一步，已經開啓了一個新紀元……國際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他離開沙皇休息室，外面月台上有一位軍官走過來跟他致敬，他有些吃驚，就跟他回了禮，此時這位軍官對一支手持刺刀的水兵隊伍下達立正口令，緊接著四周圍亮起探照燈光，樂隊開始演奏〈馬賽進行曲〉，群眾中不斷響起歡呼叫聲，列寧問：「這是怎麼回事？」然後往後倒退了幾步。他們告訴他說，這是水兵和工人歡迎他回到彼得格勒的儀式，他們不斷高呼喊叫「列寧！」兩個字，軍官這時走向列寧再度行禮致敬，有人輕聲說他們要他說話。列寧向前走了幾步，然後脫掉帽子說：

「各位水兵同志們，我在此跟各位致敬，但我不知道你們是否還相信臨時政府給予你們的承諾，我確信他們善於甜言蜜語，不斷承諾許多事情，然而事實已經證明，他們在欺騙你們以及俄國的廣大民眾。人們要的是和平、麵包和土地，但他們卻給予你們戰爭和飢餓——地主依然霸占著土地……我們要為社會主義革命奮戰到底，直到無產階級最後勝利的來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真是精彩！」蘇卡諾夫說：「我們這些人平常都在瞎忙，陷於無謂的粗俗事務而不自知，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如今，突然出現一道光芒——列寧的聲音從鐵路車廂那邊傳過來，像是『來自外界的聲音』，驚醒了我們，他在這革命過程當中突然丟給了我們一片真理，既不刺耳，又不誇張，但像是一記突然而新穎的啓示。」這時大家終於真正了解到「列寧是絕對正確的，他不只告訴我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已經開始，不僅指出世界大戰和帝國主義的崩潰兩者之間的必然關聯，他更強調且證明『世界革命』之不可避免，我們要堅持自己的立場，和當代歷史的潮流緊緊結合在一起。」這些已經毋庸置疑，人們如今都可以親眼目睹；但人們懷疑列寧是否真的知道這些概念如何運用在他們自己的革命政治上面，以及他是否真的了解當前俄國的處境等問題？目前不必去操心，因為此時此刻的一切實在太精彩了！

眾人把列寧高高抬起，將他置放到停在外頭的一輛裝甲車上面，當時的臨時政府早已在街上設立了路障，並且禁止出動裝甲車，因為群眾遊行如果動用到這種裝備，有時後果會很難收拾，布爾什維克並不理會這些。列寧此時站在裝甲車上，四周圍滿了群眾，他準備再發表演說。火車站前的廣場上擠滿了人群，有紡織工人、金屬工人、士兵和農人等。廣場上沒有電燈，他們打亮所有探照燈光，紅色旗子上面的金色字體在強烈燈光照耀下閃閃發亮。

裝甲車隊從火車站前開始啓動，其他裝甲車熄滅自己的燈光，藉以凸顯列寧所乘坐那一輛的光

線，他看到沿路兩旁站滿了歡迎他的工人。娜德芝姐說：「沒有經歷過革命的人，實在無法想像這種壯觀的場面。」那些水兵都是來自克朗鎮的海軍基地，探照燈光則是來自彼得—保羅碉堡監獄。他們一路前往克新斯卡雅(Kristinskaya)皇宮，這是沙皇的一位芭蕾舞星情婦以前住的地方，現在已經由布爾什維克加以盤據，成爲布爾什維克黨的總部。

皇宮內到處是大鏡子和透明的大燭台，天花板上畫滿了壁畫，座椅上一概鋪有綢緞椅套，樓梯很寬闊，還有，到處擺了許多很大的白色櫥櫃。皇宮中還有一些銅像和石膏像，但早已被先前闖入者打破，芭蕾舞星的一些家具已經被挪到一旁，換上一些簡單的桌椅，四處零散擺設著。有一些中國花瓶被棄置在一些報紙和宣傳單中間，擋住了去路。大家忙著爲列寧遞茶水，並準備爲他致歡迎詞，但列寧則希望他們談點實際的策略問題。此時整個皇宮四周已經擠滿人群，大家一致要求列寧談話，他走向陽台面對群眾，一時之間，彷彿當年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1725，俄國沙皇，在擊敗強敵瑞典後，建新都於聖彼得堡，即後來的彼得格勒)徵召許多工匠在這片沼澤地所建造的這個大都會，突然竟沸騰了起來。列寧一向只在黨會議中發表演說，上一次面對群眾演說是一九〇五年對一群馬克思主義的學生談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他這時面對的是更爲廣大的群眾，他以一種權威的語調激起大家的熱情，堅定他們的信心，他的演說好像突然響徹全世界各個角落。

當時蘇卡諾夫站在皇宮外面，他說，那天夜晚大家起初聽到列寧講話時都顯得有些驚愕，特別是他以沙啞的聲音說到「這些盜匪資本家……爲了一群剝削者的利益而糟蹋歐洲的人民……祖國的抵抗防衛即意謂著資本家對群眾的抵抗防衛」這些語句時，許多人都怔住了，一些警衛士兵低聲說：「這是怎麼回事？他在說些什麼？如果他下來這裡，我們來給他點顏色瞧瞧！」後來列寧下來和他們面對面時，蘇卡諾夫說，他們沒有「給他顏色瞧瞧」，蘇卡諾夫後來也沒聽說他們這麼做。

列寧又走回屋裡，但不久又再度出來發表第二次演說，最後則是召開會議。在廣大的舞廳中，歡迎詞一篇接著一篇，托洛斯基說列寧顯得有些不耐煩，「好像站在門口的行人，急切地等著雨停下來。」他不斷看手錶，輪到他講話時，他一口氣講了兩個鐘頭，許多人都聽得目瞪口呆，無所適從。

「我和幾位同志在回來的路上，」他說：「我心裡一直以爲我們會一下火車之後一路被帶往彼得堡——保羅的碉堡監獄，結果沒有，真是令人感到意外，但是，大家不要以爲我們已經逃過了這一關。」緊接下來他不談蘇維埃所設定的土地改革及其他諸多立法問題，他轉而直接宣稱農民不必去理會政府的干預或要求政府任何的支持，應該組織起來自己去搶奪土地，而城市裡的工人則趕快武裝起來，自己去接管工廠。他不但根本不理會蘇維埃多數黨的意見，同時更進一步批判他們自己布爾什維克的許多做法。他強調，無產階級革命已經箭在弦上，勢在必行，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加以阻擋，大家要勇往直前，絕不向臨時政府妥協。「我們不需要任何國會的形式，我們不需要中產階級的那一套民主，除了工農兵所組成的蘇維埃之外，我們不需要任何政府！」

蘇卡諾夫說，列寧的談話內容雖然充滿強詞奪理的語調，卻由於他說話方式口若懸河，清晰明白且直截了當，頗能令人信服，但他顯然忽略一件事情：他沒有分析俄國要實行社會主義，其在社會經濟基礎上的「客觀前提」條件。蘇卡諾夫繼續說，「我走在街上，竟突然感覺好像頭上被戴上了一个枷鎖，不過有一件事情很明顯：我不是黨內人士，我絕不可能跟列寧併肩同行。一陣新鮮空氣襲來，天色漸漸微亮，眼看著又是另一天的到來。」當時有一位年輕的布爾什維克海軍軍官曾經躬逢此一盛會，他事後寫道：「列寧的一席話可以說爲昨日的革命策略和今日的革命策略，劃下一條分野，爲日後的革命目標指示了一條明確的路線。」

然而，其他大多數領導者卻爲列寧這一席話感到震驚，當晚大家並未討論他的談話內容，但是

第二天當他在社會民主黨例行會議上再度大放厥詞時，大家再也按捺不住了。「列寧，」一位布爾什維克黨員說：「現在可真正繼承了歐洲一個空了三十年的王位，我指的是巴枯寧留下來的遺缺。列寧那一套完全是新瓶舊酒，根本就是已經過時的原始無政府主義觀念的復活。曾經是社會民主黨的列寧，曾經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曾經是我們社會民主戰士領導者的列寧——這個列寧已經完全不見了！」當時左翼分子巴格達諾夫(Bogdanov)坐在講台下，他聽了列寧的演說之後很生氣，他站起來對其他聽眾罵道：「你們爲這種無聊的談話在鼓掌，真是可恥——真是可恥到了極點！還有臉自稱是馬克思主義分子！」

列寧談話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合併，但他此時似乎在把布爾什維克逼上另一條路。對許多布爾什維克黨的人而言，他們覺得列寧此一做法彷彿在爲一九〇三年那次的黨分裂事件報一箭之仇。

娜德芝姐說，他們回到國內那天晚上，在克新斯卡雅皇宮的歡迎會之後，她和列寧就直接回去列寧的姊姊安娜和姊夫馬克(Mark Timofeyevich)家，列寧的妹妹瑪麗亞當時也住在那裡。他們上床睡覺時，發現安娜所領養的兒子在他們的床頭貼上《共產主義宣言》一書的最後一句話：「全世界的工人聯合起來！」

娜德芝姐說，她那晚和列寧幾乎沒說過什麼話，「一切盡在不言中」。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到芬蘭車站：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及發展 / 艾德蒙·威爾森(Edmund Wilson)著；劉森堯譯。 - 初版。 - 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0 [民 89]

面：公分。 - (歷史選書：38)

譯自：To the Finland station : a study in the writing and acting of history

ISBN 957-469-065-2 (平裝)

1. 社會主義 - 歷史 2. 共產主義 - 歷史 3. 馬克思主義 - 歷史

549.2

89007684